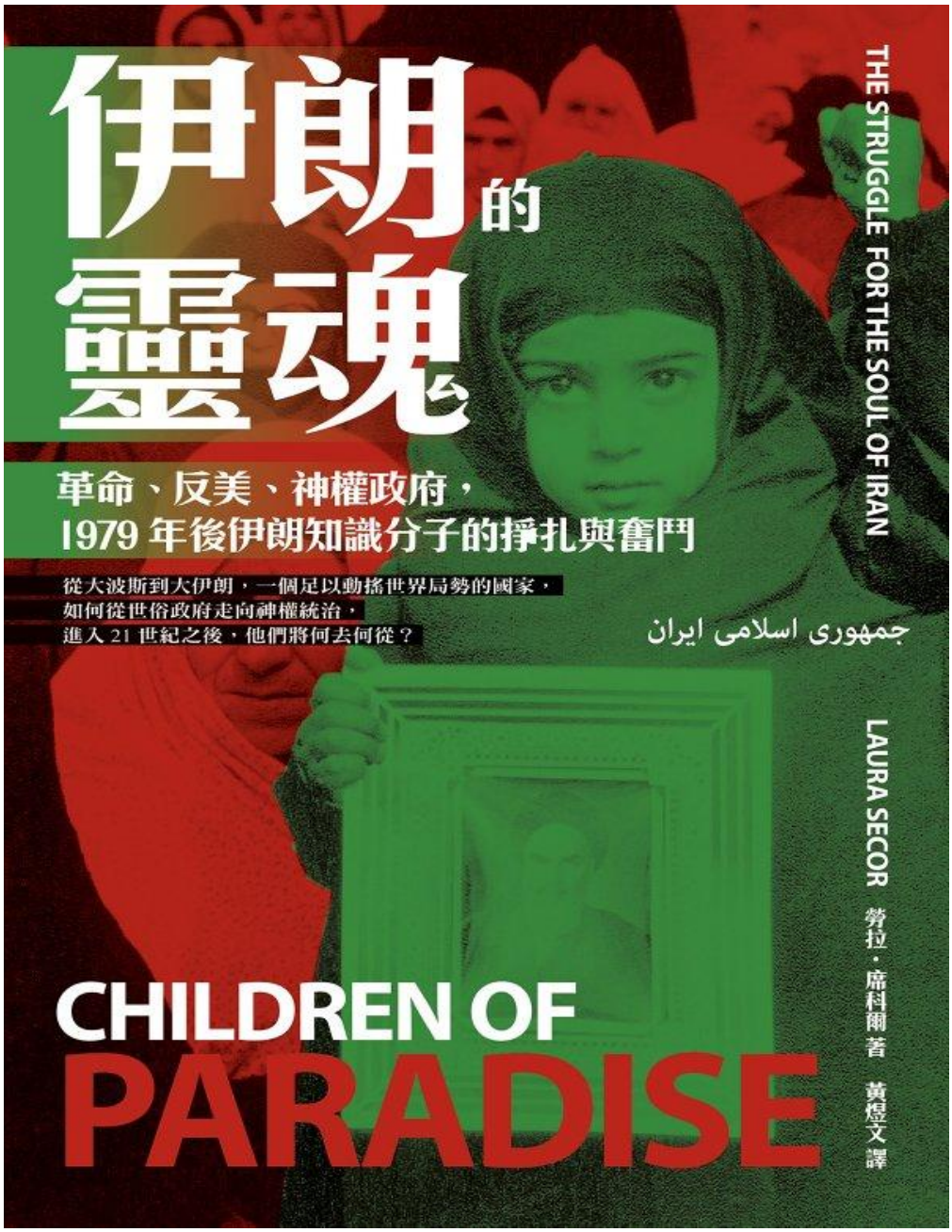
伊朗的灵魂

——革命、反美、神权政府，

1979 年后伊朗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奋斗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RAN

伊朗的靈魂

CHILDREN OF PARADISE

革命、反美、神權政府，
1979 年後伊朗知識分子的掙扎與奮鬥

LAURA SECOR
勞拉・席科爾 著
黃煜文 譯

目录

好评推荐.....5
导读：持续实验与奋斗的伊朗政府及其异议分子.....11
导言：伊朗政治制度 与美伊关系发展回顾 18
序言.....25
第一部 革命.....33
第一章 小黑鱼 33
第二章 伊斯兰共和国 62
第三章 持续沉思的时期..... 104
第四章 血的洗礼 147
第二部 重生..... 176
第五章 扩大与限缩..... 176
第六章 热月 203
第七章 伊朗历三月二日..... 236
第三部 改革..... 254
第八章 连环谋杀案..... 254
第九章 伊朗历四月十八日 284
第十章 总体计划 322
第十一章 奇迹室 352

第十二章　蜘蛛的房屋 391
第十三章　盖棺论定 466
第四部　反抗 498
第十四章　普通人 498
第十五章　阿希耶赫 529
第十六章　污泥与尘垢的史诗 594
第十七章　知识分子肮脏战争的结束 638
后记 674
致谢 683
注释 689
参考书目 741
索引 758
人名 758
文献 781
单位、组织、派系 789
地点、地名、国家 797
其他 808

好评推荐

一部细腻、踏实、深入伊朗社会变革脉动的精彩作品。透过对人物与事件的描写，作者带领我们认识那些一个又一个不放弃希望的伊朗人，所积极争取的改变以及遭逢的命运。作者笔下的人物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与立场，但都期盼一个更好的伊朗。革命后的伊朗比我们过去所知的要更丰富，但也经历更多苦难，而读者有幸可以读到这些罕见的故事。

——张育轩／说说伊朗创办人

二十一世纪通讯媒体的普及与蓬勃发展，自媒体现象让更多以往底层不可听闻的声音都逐渐浮上台面，议论纷纷已成常态。本书叙事观点主要是以异议分子的视角入手，记录

着主流叙事外的声音，读者阅读这本书一边对照官方叙事，将可看到伊朗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同一场域的两种观点。《庄子．齐物论》提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两种观点都是在同一情境下产生，也各有其理据，甚至对照地阅读，发现两者有着相生相成的互动关系，故若要理解清楚事件的脉络，本书将给予了接近全景式的阅读体验。

——庄德仁／台北市立建国中学历史教师，
台湾师范大历史所博士

作者以充满人性温度的笔调结合精准细腻的剖析，述说伊朗自一九七九年什叶派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之后三十年波澜壮阔的政教冲突史，彻底颠覆了当今伊朗是被一群守旧的什叶派教士以严苛教法治理而毫无言论思想自由的刻板印象，揭示伊朗人民正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尝试调和传统神权至上与现代自由人权理念，建构独特的伊斯兰式民主政权。研读本书如同进行一场思想与文化启蒙之旅，翻转吾人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惯性思维。

——蔡源林／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专任副教授

凡是把伊朗想成铁板一块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本书将带领读者深入到令人恐惧的讽刺漫画背后的世界。原书名《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Paradise）所说的孩子，指的是一群杰出的梦想家，他们抱持的转变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今日的伊朗。这是一部审慎报导的思想史，但全书不只是如此而已。席科尔无惧于描述革命共和国的残暴，而最重要的是，整本书透露出知识分子的热情与承诺所散发的光芒。

——芭芭拉．德米，《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作者

这本书出现得正是时候……具有极高价值，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伊朗复杂的幕后故事。

——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传奇书评人

难以释手的作品。

——《欧普拉杂志》（The Oprah Magazine）

伊朗的思想生活可能愈来愈受限制，政治进展可能愈来愈局促，故事中复杂难懂的主人翁想守住街垒，却往往以失败收场，而他们也渐渐走投无路。尽管如此，促使他们挺身而出与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的理念与论战，将继续存在于地下，躲藏在封闭的门后，直到有一天将再度绽放新的花朵。席科尔描述的伊朗故事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但对我们来说，这当中也蕴含着警告：不要践踏这片土地，等待来春降临之时，你将无力阻挡新生的力量。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席科尔窥视这个维持了数十年的复杂神权政治体制「黑箱」，她的作品必将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

——纽约文化网站「风味线」（Flavorwire）

一部介绍伊朗文化与伊朗知识分子的作品，伊朗知识分子敢于对伊斯兰共和国统治者做出意识形态挑战，整个过程

令人毛骨悚然。

——上架提示出版社书评（Self Awareness）

深刻而详细的描述，并非只是对伊朗近期动荡历史的记录，而是成功展现其独特的精神与意义。

——《国土报》（Haaretz）

揭露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令人感到震惊……作者记录了当局血腥镇压与民众奋勇抵抗的真相，发人深省。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

这部令人身历其境的思想史……提供了理解过去四十年伊朗政治思想的坚实基础，正是这些政治思想在伊朗这个复杂而迷人的国度激起了各式各样的政治行动。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这是首度有作品将焦点放在统治者以外的个人身上，这些焦虑而充满决心的知识分子试图推动政治变革，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被改变，他们最渴望的是恢复与保存伊朗的尊严，还有他们自己的尊严。

——阿札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罗莉塔》与《想象的共和国》作者

导读：持续实验与奋斗的伊朗政府及其异议分子

陈立樵／辅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的巴列维（Pahlavi）政府遭革命势力推翻，没多久后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成立。迄今这四十多年来，伊朗在国际舆论之间多是负面的形象，例如保守封闭、宗教狂热、恐怖主义的温床、违反核子协议规范等等。然而，一国改朝换代在历史中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新政权建立后所呈现的肃杀气氛也不是伊朗独有，[1]但何以伊朗在革命后的情况特别受到国际间的关注？原因在于伊朗革命之后这四十多年来，都是持反对美国的立场，所以成为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批判与谴责的对象。不过，我们不应只从美国掌握的主流价值观来看待伊朗。

本书《伊朗的灵魂》（Children of Paradise）呈现了伊朗这四十年来国内政治的情况，特别是异议分子在伊朗遭到政府打压的故事。本书作者席科尔在序言提到的一段，笔者看了相当有感触。她说：

伊朗不是个快乐的地方，却值得我们致上最高的尊重——这个国家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列强争斗，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府形式实验，而且为了让这场实验持续下去而不断提出质疑，最后对异议分子的生活构成了威胁。

确实这国家经历过很长一段不快乐的阶段，即使现在也不算快乐，长久以来与外国强权对抗之下，也影响国内的政治氛围，在众人对于时局有不同立场的讨论中，免不了有些人就成了所谓异议分子，在对抗政府的过程中牺牲了。

回溯伊朗近代历史，自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西亚地区的势力竞争，对当时伊朗的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若对近代中国外交史有所了解的话，应也能够理解伊朗所面临的命运，要致力周旋在列强之间，寻求让彼此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

进入二十世纪，欧美强权在石油利益、冷战（Cold War）优势之争夺，仍然没有减少对伊朗的压力。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伊朗试图取得石油利益主导权，首相穆沙迪克（Mohammad

Mosaddeq）推动石油国有化政策时，遭到想要控制伊朗石油的英国与美国推翻，随后美国在伊朗握有最多的政治与石油利益。[2]在这么长时段的过程之中，有些伊朗人选择与强权为伍，以便获取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利益，也有人走上誓死与强权对抗之路，当然也有人如墙头草，也有人觉得无所谓。

一九七七年底之后，伊朗的反政府势力兴起，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列维国王突然离开伊朗。宗教人士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虽不是革命领袖，而且他因一九六〇年代曾反抗过巴列维的政策而遭到驱逐出境，但已透过在国际媒体发言而成为反政府的指标人物。二月临时政府成立，革命人士巴札尔甘（Mehdi Bazargan）担任首相，可是似乎霍梅尼已经运用了自己的号召力，形成了「平行政府」（Parallel government），[3]不断自行发起行动打击任何与巴列维政府有关系的人物与团体。

霍梅尼正好是那类想要誓死与强权对抗的人，他并非排斥外来思想与文化，而是着重在反对外来的压迫。在他与巴列维对抗的年代，正是美国在经济与军事方面对伊朗最有影响力的时刻，反巴列维也就与反美划上等号。霍梅尼个人的反美情绪，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煽动了部分伊朗人的反美行动。革命本身与反美并无直接关系，但革命之后却因为霍梅尼的

领导，而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走上反美之路，也酿出了美国大使馆被包围、突破，外籍外交人员遭到挟持的事件。巴札尔甘的临时政府当下解散，代表已无法控制霍梅尼所造成的局势了。

霍梅尼及其支持阵营往后便把持着「反美」的话语权，只要任何人有可能对外接触，就会受到政府的「关爱」。虽然在这时代有很多伊朗人觉得，伊朗的气氛已经比较没有三十年前那么肃杀了，但仍然会有些人如本书中提到的，被政府监视、盘查、拷问，甚至罗织通敌罪名，有人宁死不屈，有人想办法逃离，也有人不得不认罪，也有很多人「被消失」。

当然上述伊朗人的不堪遭遇，都是相当痛苦的，也都该获得同情。但笔者的想法是，这不尽然是一九七九年革命以来伊朗政府的问题，而是伊朗政府仍在与强权对抗的产物。控制国家舆论一事，本来就是每个政府都会做的事情，无论是所谓专制或者民主国家，政府总是扮演着「老大哥」（Big Brother）监控着一切。[4]多数人可能认为美国是最注重舆论自由的国家，但一九五〇年代在封锁苏俄的时候，国内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也是监控着是否有人与共产势力来往。到了我们这时代，情况并没有太大差异，要不然就不会有史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视工程的事件了。在美国，肯定也有不少人被政府监视、盘查、拷问，

甚至罗织通敌罪名。

一九七九年以来的伊朗政府，因反美立场而遭到美国的封锁、制裁、谴责，伊朗政府对此肯定需要有所回应，也有必要防范美国及其阵营可能的渗透，以期能够稳定自己。每个国家总是会有所谓异议分子，不认为要跟政府持一样的立场，这样其实没有错。只是当伊朗政府仍在思索如何稳定自己的时候，自然有需要压制不同的声音，进一步视他们为企图结合外来邪恶强权的鼠辈。于是，一九八九年霍梅尼去世，但伊朗对抗外来压迫的奋斗尚未结束，接任领导人位置的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仍维持既定的路线，即使经历过拉夫桑贾尼（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三任总统，有些舆论在伊朗仍是很敏感的。

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最支持伊朗的异议分子，因为可藉由宣传他们的意见、声援他们的行动，来打击伊朗政府的形象。像是伊朗导演帕纳希（Jafar Panahi），他拍的电影遭到伊朗政府禁播，可能就是他影射国家的问题，获得了政府的「关爱」。但在欧洲获奖也不代表帕纳希拍得多好，而是颁奖单位可藉此让国际知道伊朗是如何邪恶。如本书提到的，「当前的不安乃是西方阴谋长期计划下的结果」，这可能都是部分伊朗人的心声。换位思考，若我们是政府领导人，在

一切情势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台下有一票人对施政提出不同的看法就算了，他们竟到外面告洋状，尽管我们知道这只是意见表达而已，但真能高尚地容忍他们的声音存在？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让国家更好，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如本书〈后记〉所说，这些异议分子「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但问题在于，伊朗至今还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美国，无论是长久以来的制裁或是今日的核子协议（Iran Deal），都可看到伊朗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努力。伊朗政府确实有很多「实验」尚未有结果，当然很难「快乐」。

过去台湾曾出版过《在德黑兰读罗莉塔》、《德黑兰的囚徒》这类有关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之后的小说，但比较偏向于女性议题，也属于自传类型的作品。而本书作者为记者，故事内容非个人经验，主要取材于一九七九年迄今四十年来众多所谓的伊朗异议分子，尽管笔者认为不能单纯靠这些所谓异议分子的遭遇来说明一切，但本书格局更大，也可「更新」台湾读者对于伊朗既有的讯息，感谢猫头鹰出版社的引介。当然除了本书所说的故事之外，伊朗还有更多的面向值得读者去探索。

＊＊＊

(1)可参考 Shireen T. Hunter, Iran and the World: Continuity in a Revolution Decade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

(2)可参考 Ervand Abrahamian, The Coup: 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3)可参考 Ervand Abrahamian, The Coup: 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4)可见乔治奥韦尔着、杨炼译，《1984》（台北：时报文化，二〇二〇）。

导言：伊朗政治制度与美伊关系发展回顾

崔进揆／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当代南亚与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是影响伊朗国内政治、对外关系和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事件。革命前的伊朗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国王主政下，政策态度亲西方，与美国维持友好紧密的关系；革命后的伊朗在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掌控下，拒绝西方势力干涉伊朗政治，反美、反以色列立场鲜明。另，发生于同年十一月的美国使馆人质危机亦值得特别关注，该事件重挫美、伊两国关系，双方至今仍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彼此敌意甚深。事实上，伊

朗的对外关系发展受到该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影响，「最高领袖」和「总统」是实际具有决策影响力的人物，尤以不受任期限制的「最高领袖」地位最为崇高。霍梅尼是伊朗革命后首任「最高领袖」，现任则是一九八九年继位的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伊朗的大政方针都须得到「最高领袖」的认可。

西方国家在判断中东情势和伊朗对外关系时，除了考虑「最高领袖」因素外，主要依据的是民选「总统」的意识形态和其对于特定议题的想法与立场，并以保守派、改革派和中间派来概略区分伊朗的政治菁英。一般来说，保守派人士多有宗教神职人员的背景，倾向较为严格的社会规范，并愿意赋予「最高领袖」更多的权威，现任总统莱西（Ebrahim Raisi）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改革派人士重视社会正义、公平选举、政治多元主义等议题，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是代表；中间派又被西方媒体称为温和派，在各项社会议题上多持包容的立场，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和罗哈尼（Hassan Rouhani）两位前总统被视为中间派政治领袖的代表。在哈塔米和罗哈尼主政期间，美、伊两国关系曾短暂获得改善，攸关伊朗核计划发展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又称「伊核协议」），就在罗哈尼任内签署完成。

伊朗近二十年的对外关系同时受到国内领导菁英和国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美、伊两国关系进展，以及奥巴马（Barack Obama）、川普（Donald Trump）、拜登（Joseph Biden Jr.）三任美国总统的中东政策。奥巴马外交政策的特色是多边主义外交，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功能，而国际社会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主要就是透过多边主义外交途径来解决。在奥巴马政府积极主导下，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与伊朗在二〇一五年签订了所谓的「伊核协议」。根据协议内容，美国、欧盟、联合国安理会同意解除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则同意将其核计划发展交由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监管。由于国际社会放宽对伊朗的限制，并解除经济制裁，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得以与伊朗正常往来，而伊朗也可以将石油和各种商品的出口收益用来改善民生经济。奥巴马执政期间，美伊关系相对和缓，欧盟国家与伊朗关系也同步得到改善。

川普在二〇一七年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影响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美伊关系再陷谷底。川普不认同奥巴马多边主义外交路线，在竞选期间就大力抨击奥巴马政府的「伊核协议」，认为协议非但未能让伊朗放弃核武的研发，还使得伊朗在经济制裁解除后，能以更充裕的资金和能力发展军备、金援特定恐怖主义团体，

严重威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与安全。是故，川普政府在二〇一八年五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以「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进行新的核子谈判。川普政府还要求欧盟国家必须配合美国政策，否则将连带受到美国的制裁。欧盟国家并不认同川普政府的政策，但迫于政治现实和制裁风险，虽不愿意完全放弃「伊核协议」，但也只能顺从美国，被动修正对伊朗的政策，美伊关系、美欧关系、欧伊关系皆受到影响。

川普任内还将伊朗定义为中东地区最主要的乱源，颠覆一般认为「以巴问题」才是影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观点。川普政府认定伊朗「什叶新月」势力已在二〇〇三年的伊拉克战争后大幅扩张，因为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内战中皆可以看到伊朗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不仅以色列的安全受到挑战，阿拉伯半岛上的逊尼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受到威胁。在川普政府主导下，美国一方面利用沙特阿拉伯等逊尼阿拉伯国家来制衡伊朗的「什叶新月」势力，一方面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发展，将伊朗形塑为阿、以两方共同的敌人。此外，川普政府也将伊朗革命卫队列入国务院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任内还以无人机击杀革命卫队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雷曼尼（Qassim Soleimani），原因是其涉嫌策划多起针对美国公民的攻击行动。苏雷曼尼之死让伊朗群情激愤，宣布不再遵

守「伊核协议」，亦攻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川普主政下，美伊关系高度紧张，两国将开战的臆测亦时有所闻。

拜登二〇二一年就任总统后，持续关注伊朗的核进程问题，但修正川普争议性的外交政策。在反核扩散议题上，拜登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极为相似，皆重视多边主义外交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国际组织与制度中的领导角色。拜登政府主动释出重返「伊核协议」的意愿，并协同缔约各方在奥地利维也纳与伊朗展开多个回合的谈判。二〇二二年八月，各方代表初步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和欧盟目前皆针对恢复核协议的草案进行最终文本的修正。在二〇一五年「伊核协议」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同意放宽对伊朗的限制，以换取伊朗重新遵守「伊核协议」的意愿。惟重返「伊核协议」，以及未来协议能否顺利执行，美国尚须获得区域关键国家的支持。拜登二〇二二年七月中东行的重点之一就是与区域国家商谈伊朗的问题，而为取得以色列的信任与对「伊核协议」的支持，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Yair Lapid）签署「耶路撒冷宣言」协议，防止伊朗取得核武是重点。拜登政府亦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商讨建构共同防空系统的可能性，目的在于防范伊朗日增的军事威胁。

回顾过去二十年中东区域情势发展，以及美伊关系进展，核问题和伊朗影响力扩张是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关切的重点。

在核问题上，伊朗始终坚持和平使用、发展核能的权利，但其过去反美、反以色列的历史，令西方国家无法信任其会彻底放弃拥有核武的企图。事实上，核议题和经济制裁让伊朗长期遭受国际社会孤立，国际形象不佳。此外，伊朗藉由伊拉克战争海珊（Saddam Hussein）政权被推翻之机，将其影响力延伸至阿拉伯半岛，又深度介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黎巴嫩的政治，让域内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伊朗的角色和动向。目前伊朗已是影响区域秩序和地缘政治发展的关键国家，而所谓的「伊朗威胁」更让逊尼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愿意放下世纪仇恨，共同对抗伊朗代表的「什叶新月」势力。预计二〇二二年乌俄战争和未来美中两国对抗的趋势，将使得中东地区未来出现国际政治中的极化现象，成为美国、以色列、逊尼阿拉伯国家与俄罗斯、中国、伊朗「什叶新月」两大集团对抗的态势。

献给乔治、查理与茱莉亚

序言

当伊朗学生冲进德黑兰（Tehran）的美国大使馆，把大使馆职员当成人质扣押了四百四十四天时，我还是个孩子。那是我有意识以来首次注意到的国际新闻事件。在电视上，德黑兰成了一座交通堵塞的城市，愤怒的年轻暴民到处焚烧美国国旗。我有很多词汇看不懂。什么是大使馆？什么是人质？但影像与感情我却能够体会。在世界的另一边，有个外人难以进入的国家，这个国家与我的国家有着深刻而难解的纠葛，而双方产生的敌意也让新闻频道的主播感到震惊。

在我这个世代的美国人眼中，伊朗是讽刺漫画中令人畏惧的对象，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神权政治国家，由神态阴沉的阿亚图拉[1]担任领导人。伊朗是个难解的外交政策问题，也是个难以窥知内容的黑箱。一九七九年后，很少有美

国人到伊朗旅行，与当地有关的深度新闻报导自然少之又少。当我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之后，伊朗便成为我深感兴趣且非去不可的国家。毕竟身为一名通讯记者的特权，就是能够前往自己完全生疏的地方。伊朗签证是出了名的难办；一九九九年，新闻工作者萝宾．莱特在《纽约客》刊载的一篇故事，把伊朗描绘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我明白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取得签证。

我知道伊朗最近选出的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2]誓言改革伊朗的专制政权。但我想象不到在一九七九年冻结的景象背后，存在着一个充满活力与自我反省的国家。学生活动分子依然在使用从美国大使馆抢来的专用信笺，并且把这些信笺当成影印纸，他们捍卫报纸反对审查制度，而哲学家则努力思索新的理论，使自由权利与他们协助建立的伊斯兰国度能和谐共存。有一个人是一九七九年率先进入使馆绑架人质的成员之一，他已经成为民主改革的拥护者，如今在德黑兰市议会里致力解决交通问题。这样的翻转不仅引人侧目，也不可思议。这名市议员解释说，革命的意识形态有其局限，无法解决世俗的都市问题。我相信，在这个简单说法的背后，存在着一整个脉络：国家与个人这二十年的发展经验，还有思想气候的转折，使他能够谈论民主变迁以及把市议会当成推动民主改革的卑微手段。

我从未去过中东。我在《通用语》这本报导思想生活与学院政治的杂志担任作家与编辑，而当时我正处理一篇我自己撰写的关于前南斯拉夫的故事。我在文章里提到，前南斯拉夫异议知识分子遵循的路线似乎与伊朗的轨迹相反，他们从共产主义内部的改革批判路线，转变成凶残而排他的民族主义，从而让自己的国家四分五裂。我逐渐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国家与我的志趣相符——在这个国家里，观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如此压缩，以致于国家的历史与创立这个国家的人的生平合而为一，变得难以区分。我很确定我在《通用语》杂志的编辑也读过《纽约客》的报导，当他在编辑我的故事时，他抬起头不假思索地说，他期待有一天我们两人能在他的办公室再次开会一起写一篇关于伊朗的报导。

我开始把投递到杂志社的伊朗学术书籍收集起来。我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与处理其他主题之后才会翻开这些书籍，但对于像我有这种爱好的作家来说，伊朗是个梦寐以求的报导。

二〇〇四年，我启程造访伊朗。当地的气氛比我想象的来得压迫。对于改革的兴奋之情使人忽略了促成政治松绑的必要条件。我看到的状况或许对于曾经造访前苏联集团的人来说相当熟悉，而这里与许多邻近国家相比无疑较不严厉。不过，伊朗依然是个封闭国家，凡是忠实描述伊朗政治现状

的报导绝不会否认这个事实。

即使是一般的伊朗民众也能做出实际的假定，认为自己的电话遭到监听、电子邮件遭到监看。敏感的会面最好透过精心安排的一连串接触来进行。我的一些受访者固定遭受跟监，其他人则接到骚扰电话或被迫持续向曾经在狱中讯问他们的人报告。我在市集遇见一个商人，他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求私下见面，我答应了，在繁忙的街角，他压低音量向我解释他的工作场所中层层的政治控制。

在伊朗，焦虑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不可能只是报导伊朗的状况而不受这种焦虑影响。在伊朗这样一个地方，没有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反对，就连忠诚而轻微的反对也不存在。但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伊朗也是一个公民精神拒绝消亡的国家。伊朗民众排除万难，面对无孔不入的监视与经常发生的暴力压迫，依然努力投入，这对我们沾沾自喜的民主制度来说有着借鉴作用。

我动身前往伊朗的时候，这场改革实验显然已经落幕。我遇到的许多伊朗人在提到已经转变成改革者的人质绑架者以及即将离职的哈塔米总统时，总是带着苦涩的沮丧，彷佛他们成了希望破灭的象征。接下来的十年间，我五次造访伊朗，试图拼凑这个故事，显示改革如何串连、如何崩解，

以及如何在二〇〇九年绿色运动时风起云涌——改革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改革在什么地方与伊朗的意识流相符，以及这场改革为伊朗留下什么。这是一则讲述革命本身与往后三十年动荡岁月的故事。这段时间伊朗民众过的生活，他们透过思想沙龙与狱中书信、梦境与童年回忆传达的讯息，让我觉得像是一部史诗级小说，不仅充满灾难与翻转，而且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给，而这部小说的核心也反映出整个历史发展。

二〇〇五年六月，我在德黑兰与一名年轻部落客见面，当时他才刚从悲惨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同年秋天，我在《纽约客》撰文报导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遭受伊朗司法系统迫害的事。一年后，鲁兹贝赫抵达美国，当时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跟我以及我的丈夫同住，直到他安顿下来，他同为记者的妻子索尔玛兹．夏里夫也来到美国与他团聚。

我们共度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某天早上，我们坐在厨房柜台长桌旁，指着各种物品，比较它们的波斯语与英语名称：大蒜、香蕉、胡椒。多么简单，但却不怎么灵光，当你指的是「厨房」（kitchen）时，嘴巴却有可能说出「鸡」（chicken）这个字，反之亦然。我们晚上一起翻查字典直到深夜，我们谈论伊朗的政治，这个主题让欲言又止的鲁兹贝赫改变想法，使他决心好好传达自己的观点。随着他的英语

日渐流利，我开始渴望在另一方面获得进展——伊朗革命的历史以及革命造成的影响——使我能真正探索他的人生历程。

几乎跟我在伊朗国内外认识的每个伊朗人一样，鲁兹贝赫有着最原初的创伤。他提到家乡有一处禁止进入的墓园，他小时候一直想象那个墓园是怎么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人能够解释。革命的十年是充满暴力的十年：街头械斗，炸弹爆炸，政治处决，与伊拉克进行的残酷战争，最后则是国家毫无道理地屠杀政治犯。国家表面上照常运作。但对伊朗人来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年纪大到足以害怕自己会失去性命，或者质疑自己是否成了帮凶的人——一九八〇年代是一段被压抑的记忆，国家因此永无宁日。本书的写成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解释墓地的由来以及鲁兹贝赫身处墓地边缘时的不安。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把伊朗选举政治的摇摆视为伊朗国家性格的明确彰显，并且任由我们的外交政策辩论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渲染成可怕或和善。我们很可能忽略了真正的核心，因此未能注意到那些深受政治结果影响的人历经的政治经验。伊朗不是个快乐的地方，却值得我们致上最高的尊重——这个国家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列强争斗，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府形式实验，而且为了让这场实验持续下去而

不断提出质疑，最后对异议分子的生活构成了威胁。无论伊朗要走向何处，它都会率先抵达，而且完全仰赖自己的力量。

本书要阐述的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对于一名外国记者来说，要撰写这样的历史未免过于放肆。这是一本关于真实人物的书，其中一些人也许比较有名或获得较多的赞扬，但无论是谁，他们复杂而不完美的人生都照亮了他们一路走来的历程。书里没有美国主人翁，也没有美国政策处方。书里谈的是伊朗人与「一段」历史——这段隐藏的历史绝大部分反映了伊朗政治与思想生活中巨大而多变的潮流。这个潮流引领多少伊朗人立定志向，我们无从得知。十年前，改革派总爱说全国八成的民众赞同他们的做法，只有两成支持政府。二〇一二年，我上次造访伊朗的时候，我听到强硬派引用了完全相反的比例。恐惧的状况下，无法反映真正的舆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深刻的分裂就像撕裂伊朗政治阶级一样，也撕裂了伊朗的社会。我愈了解伊朗，就愈相信这个内在冲突不仅定义了伊朗，也成为伊朗命运的引擎。

＊ ＊ ＊

(1)伊朗的高阶宗教人士，意指「真主的象征」。

(2)哈塔米的任期在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五年，但本书出版时已是二〇一六年，此处所指的时间可能是作者造访伊朗的二〇〇四年。

第一部　革命

第一章　小黑鱼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海底有一条睿智的老鱼召集她的子女与孙子女，一共一万二千条鱼，然后讲了一则故事给他们听。

老鱼开始说道：很久很久以前，一条小黑鱼与母亲生活在山中的小溪里。从黎明到黄昏，母亲与孩子不断绕着圈游

着，在裂缝里进进出出，直到夜幕低垂，她们才返回家中，在长满苔藓的岩石底下安睡。

某天早晨，天还没亮，小鱼叫醒母亲，宣布她要离家。一个简单的念头盘踞在她的心中：小黑鱼想知道，这条小溪通往何处？

母亲笑了。「亲爱的，」她说道，「小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小溪就是这样，它不断地流动，哪儿也不去。」

小黑鱼确定这不可能是真的。尽管有长辈的威胁，以及同辈的敬畏，小黑鱼还是出发了，她顺着瀑布而下，来到一片池塘，那里可以看到的生物只有蝌蚪。

蝌蚪告诉小黑鱼，他们出身贵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他们充满自信地说，他们所在的这片池塘，就是整个世界。蝌蚪的母亲是一只青蛙，她责怪小黑鱼，说她是「没有价值的生物」，会带坏她的孩子。

小黑鱼并不畏惧，她继续向前游，在前往大海的路上，她凭借机智躲过了掠食者，并且克服许多险阻。

在海中，小黑鱼发现一群跟她一样勇敢不服输的鱼儿。鱼群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们把渔网拖到海底，让渔夫乖乖认输。

最后，小黑鱼找到了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她的地方。还没加入其他鱼群之前，小黑鱼就先游到水面，享受阳光照耀背部的感觉。小黑鱼知道，在水面很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但旅行至今已让她了解到，自己的生命不过是沧海一粟。「真正重要的是，」小黑鱼对自己说道，「我的生或死对别人的生命能有什么影响。」

就在此时，一只苍鹭突然俯冲而下，一口吃掉了小黑鱼。在苍鹭的肚子里，小黑鱼听见哭声。那是另一条鱼，既娇小又年幼，正想念着自己的母亲。小黑鱼灵机一动。她可以四处游动，给苍鹭的胃搔痒，小黑鱼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她的小同伴。当苍鹭笑的时候，小鱼可以从他的胃里跳出来。小黑鱼则继续待在胃里，她可以用草叶子做成匕首，杀死苍鹭。

于是小黑鱼给苍鹭搔痒，小鱼跳了出来。从水中的安全处，小鱼看着苍鹭扭曲着身子高声鸣叫，并且不断拍打翅膀，最后倒地不起。但小黑鱼再也没有出现。

祖母鱼讲完故事。她与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个子孙一起进入了梦乡。有一条小红鱼还醒着。她禁不住想着关于大海的事。

以上描述的这篇儿童故事的大概内容，启迪了一个世代的伊朗革命分子。《小黑鱼》的作者是萨玛德．贝赫朗吉，出版的时间是一九六八年[1]。在这一年的八月底，二十九岁的贝赫朗吉顶着炎热的天气，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伊朗北部阿拉斯河附近的几个村子巡回游历。他与一个朋友在当地收集民间故事，先前他在家乡的偏远村落也常从事这样的工作。有一天，他在河边涉水而行以消暑，他的朋友则在河里游泳。阿拉斯河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暗潮汹涌，但这名年轻作家浑然不觉，湍急的河水一下子就将他冲离原先所站的位置。贝赫朗吉不会游泳。他大声呼救，等到他的朋友游过来救他时，他已经消失在河水的深处。《小黑鱼》的作者溺死，他的遗体被冲到下游五公里处，三天后才被找到。

十年来，贝赫朗吉旅行于穷乡僻壤，将自己购买的书籍分送给有需要的孩子。贝赫朗吉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他倾向于左派，农村的赤贫令他心有所感。在旅行中，他注意到一件事：伊朗不仅是个不平等的国家，也是个与自身疏离的国家。伊朗的菁英沉溺于欧美的观念、文化与习惯，但伊朗的国情与欧美却是天差地别。

贝赫朗吉在早期一篇文章里提到，伊朗的师范教育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于美国，教材关切的重点，包括孩童的肥胖问题与学校的营养午餐计划，与伊朗的乡村生活完全脱节，让

人觉得十分可笑[2]。当伊朗的孩子学习英语时（这是贝赫朗吉也学过的语言），课本上提到热狗与棒球，这些文化标志对伊朗乡村的孩子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伊朗教师必须把重点放在伊朗儿童的急迫需要与文化现实上，必须想出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以符合实际的环境需求。

为了规避检查，贝赫朗吉把短篇小说写成民间故事的形式，却在小说中挟带革命的要求，甚至主张以暴力推翻一味仿效美国的统治阶级。如果《小黑鱼》让今日的西方读者觉得，就童书的标准来看，这本书对孩子实在太黑暗，那么这并非贝赫朗吉在意的事。「我不希望能理解世事的孩子读我的小说只是为了好玩，」他写道，「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把希望建立在虚假与空洞的愿景上，而应该引领他们把希望建立在对社会严酷现实的理解与诠释上，并且让他们懂得对抗这个严酷的现实。」[3]

贝赫朗吉去世十一年后，当他的同胞把渔夫的渔网拖到海底时，许多人提到他的小说是启迪他们的来源。那是一则关于勇气与自我牺牲的寓言，鼓励大家不要盲目接受传统或受命运所限制。在贝赫朗吉写作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八年时，对一些人来说，伊朗就像一条平民的山中小溪，只是不断地兀自流动着，却不流向任何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伊朗就像傲慢而自以为高贵的青蛙池塘，它甚至对喂养其自身

的山中小溪一无所知。革命的种子就是拒绝受偶然的出身、对掠食者的恐惧或命运的河岸所束缚。

伊朗为什么在一九七九年爆发革命，对此已经没有人产生疑问。在此之前，西方强权掠夺伊朗的资源，使伊朗的领袖沦为傀儡。伊朗人遭受政治打压与明显不平等的待遇。伊朗的宗教领袖与商人阶级看见自己珍视的文化与经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国人有利的制度安排。我们现在知道，一九七九年的伊斯兰革命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但我们忽略或低估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的是，伊朗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拒绝行为——拒绝现代性，拒绝西方，甚至最重要的，拒绝绝对统治。它是从热情而矛盾的民众进行的激昂且矛盾的对话中产生的，而革命产生的国家也是热情而矛盾的。

在伊朗国外，我们把伊斯兰革命与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严峻而超然不凡的脸孔以及神权政治在二十世纪的回归连系在一起。在这则故事的背后与内部还有另一段历史——革命的冲动就跟产生这股冲动的社会一样复杂且现代，而这段历史衍生的公民参与文化也和小红鱼的追求一样难以止息。从革命后建立的国家试图否认自身起源的多样性与试图镇压民众的投入来看，这个国家同样走上了一条悲剧的弧线。

伊朗伊斯兰革命与共和国，不只是有关宗教的故事，而且可能连宗教都不是主要的部分。这个故事是关于政治和认同、关于社会分化和社会凝聚，以及关于在世界各地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这也是一则个人无止尽地追求大海，与克服看似难以跨越的藩篱的故事。

伊朗革命分子有时会把他们的革命形容成许多思想与行动主义溪流的汇聚，这种说法刚好应和了贝赫朗吉的小说。其中有些溪流是宗教的，有些则是世俗的。当溪流的流域变宽，宗教与世俗的观念就算不是变得不可区别，至少也变得密不可分。这种状况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然而一旦发生，历史就随之展开，此后的发展便势不可挡。

萨玛德．贝赫朗吉诡异地溺死，这个谜团在众人心中挥之不去，藉此营造神话几乎成了难以抗拒的事。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贝赫朗吉的朋友与德黑兰思想界领袖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他是积极反对伊朗专制君主穆罕默德．雷札．巴列维的随笔作家。阿雷．艾哈迈德在德黑兰的沙龙以主人身分款待过贝赫朗吉，他曾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谈论这名老师、说故事人与民俗学者，并且称呼贝赫朗吉为他的年轻兄弟。正是阿雷．艾哈迈德传播了贝赫朗吉被巴列维秘密警察谋杀的传说，他甚至说服贝赫朗吉溺死当天与贝赫朗吉在一起的朋友不要说出意外的详细经过[4]。

那年秋天，阿雷．艾哈迈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我们必须痛苦地为这名年轻兄弟哀悼并且颂扬他吗？不管怎么说，我们能拥有几个萨玛德呢？……不，这么做不对。现在，是否更好的做法是，我……既不为这名年轻兄弟哀悼，也不带上手杖，而是开始散布传言，说萨玛德跟小黑鱼一样，顺着阿拉斯河流向大海，有一天他将再次出现。」[5]

与贝赫朗吉一样，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也是世俗溪流中最重要的一条鱼。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篇延伸的文章，题为《西方毒害》，于一九六二年秘密出版。《西方毒害》痛责伊朗人做了阿雷．艾哈迈德眼中所谓崇拜西方且憎恶自己的行为。这种病症腐蚀了伊朗的产业、文化、权力与自尊。由西方发明且由西方控制的机器，摧毁了伊朗的田园生活。旧的经济与文化制度遭到铲除，但新的制度是在别的地方设计，演进的过程也呼应外国的历史与文化，对伊朗绝大多数农村民众来说，新的制度根本不合理。要反转现代性是不可能的；伊朗人唯一的希望是由自己来控制机器，使机器不会取代农村民众的劳动力，而且可以做为改善农村民众生活的工具。

《西方毒害》成了革命伊朗反美的基础文件。但《西方毒害》的呼吁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苦恼。伊朗过于仰赖西方，采用了非根植于本地文化历史的外国思想传统——伊

朗人因此认为自己不如西方人，而且从西方人轻视伊朗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这些批判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对伊朗哲学思想的影响太深入，以至于无法完全抛弃，而西方的吸引力也过于深远。伊朗彷佛陷入了一种恐怖情人关系，一方面自我憎恶，另一方面又遭人轻视。也就是说，伊朗一方面爱着虐待自己的人，另一方面也憎恨自己。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西方的思想传统从根源开始就与波斯的思想传统交织在一起。纳贾夫与库姆的什叶派神学院教导同样的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是欧洲思想的基础。几个世代以来，伊朗的海外留学生深受欧洲观念的影响，他们把这些观念带回国内。伊朗思想家以这些欧洲思想流派为基础，然后又回过头来反对这些欧洲思想流派。阿雷．艾哈迈德在他的反西方宣言的最后，居然引用了阿尔贝．卡缪、欧仁．尤内斯库与英格玛．博格曼的作品。真的有可分离的西方传统这样的东西吗？如果有，那是否是某种外来的，根据外国文化与不同环境改编或已经适应外国文化与不同环境的事物；又或者，那是否甚至是一种伊朗人可以声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事物，就像法国人或德国人或美国人也认为同样的事物是他们出生就拥有的东西？一九六〇年代的伊朗思想家具体表现出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当他们致力创造伊朗本土的思想语言与政治意识形态时，

他们援引了西方的思想来源，因为这些来源对他们来说就跟来自本土一样自然——同样俯拾皆是，同样充满意义，同样有用。

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死于一九六九年。当他去世时，一名堪称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已准备接下最后的棒子，往革命的终点线冲刺。阿里．沙里亚蒂将形塑出一个意识形态，由此支撑起一个世代的梦想：好战的、超越的、非外来的、完全属于伊朗人自己的梦想。

沙里亚蒂是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一名深具魅力的演说家与意识形态倡导者，他曾在一九六九年初与阿雷．艾哈迈德见面。沙里亚蒂更年轻、更狂热也更富想象力，当时的他已经在课堂上掳获学生的心，即使敲响了下课钟，听得入迷的学生仍端坐在椅子上不愿离去——在某个程度上，沙里亚蒂肯定意识到，阿雷．艾哈迈德的火炬很快就要交到他的手中。当《西方毒害》的作者去世时，沙里亚蒂写道：「我完全忘记我与亲爱的贾拉勒之间所有的记忆、链接、友谊、亲密关系与和谐。他的脸逐渐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张隐约出现的脸庞。那是我自己的脸！我彷佛听见自己的死讯。」[6]

沙里亚蒂要求舍弃他认为的阿谀奉承、迷信、消极的教

士伊斯兰教，并且复兴他认为的真伊斯兰教——好战而寻求正义，能解答几乎所有的人类难题。他把伊朗世俗反对派的语言与关切，和伊朗什叶派群众的认同结合起来。能做到这点，沙里亚蒂大概也能分裂原子了吧。

沙里亚蒂的魅力充满传奇。他上课时习惯迟到，边讲课边抽烟，而且滔滔不绝连讲六个小时。但他的演说是如此撼动人心，以至于他的一名学生对他的传记作家说道：「他讲课时，你整个人会被他带着走，你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正坐在椅子上。」[7] 今日，一些反对他最力的批评家甚至也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感伤的情绪。他们说，事后证明，他确实是个危险人物。但是啊，你真该听听他的声音。

沙里亚蒂于一九三三年在一个传统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出生，他的家乡是东北部的一座沙漠城镇，离土库曼疆界不远。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宗教老师，曾在马什哈德建立重要的伊斯兰中心。沙里亚蒂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清楚遵循他父亲的路线。沙里亚蒂的父亲主张摆脱迷信与消极，让宗教成为伊朗人生活的积极力量。他告诉沙里亚蒂如何研究西方与伊斯兰的观念：在两条溪流游泳的能力，一条是传统的与宗教的，另一条是现代的与理性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与分裂的社会，或甚至是与分裂的自我对话。

根据传记作家的说法，沙里亚蒂是一名叛逆而懒惰的学生。他逃学，作业总是赶在上学前一刻写完，在课堂上捣乱与恶作剧。虽然他在学校的表现欠佳，但空闲时间他都在阅读父亲的两千本藏书。沙里亚蒂早期的一名老师如此描述沙里亚蒂：「这个学生比所有老师都要学识渊博，却也比所有的同学都要懒惰。」[8]

沙里亚蒂阅读了列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阅读了波斯诗人与苏菲主义托钵行者[(1)]。他日后对苏菲主义的其中一个宗派——自我责难派——产生特别的兴趣，这个宗派故意公开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好让自己受到众人的嘲笑与羞辱。他们想藉由在公开场合受辱来坚定自己内在的决心；对于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相当反常的自我牺牲。虽然沙里亚蒂只是短暂涉足这个宗派，但这个宗派却意外地与他的感性极为搭配，沙里亚蒂终其一生都在对着镜子玩游戏，他创造了另一个自我而且沉迷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在演讲厅一群助手簇拥下拥有着公众生活，另一方面却又过着神秘、忧郁、自我撕裂的孤独日子。

一九五〇年代初是政治觉醒的时期，不仅对沙里亚蒂是如此，对整个伊朗也是如此。历经数十年压迫的专制统治，一九四一年，年轻而羞怯的新国王穆罕默德．雷札．巴列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承王位。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国王消

极推动相对开放的政策，这段时期开始时沙里亚蒂十二岁，结束时他二十岁。期间，英国持续强硬主导伊朗政治，把新任的国王当成卑微的臣子。但此时劳工运动开始蠢蠢欲动，国会也呈现山雨欲来之势。知识分子、新闻工作人员、教士与政治人物抛开前一任的国王加诸在他们身上的顺从沉默，开始以热烈的辩论与新政党来填充公共空间。

在刚取得力量的国会中，窜起了一名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穆沙迪克，穆沙迪克承诺伊朗人民实行法治与不受外国干涉。尤其穆沙迪克提议石油产业应该收归国有，由国家控制。伊朗，一个盛产世界最珍贵资源的国家，不应该受到贫困的羞辱，而让外国得利。穆沙迪克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担任首相，他有效地从英国手中夺回伊朗的石油产业，而且每一次行动都比巴列维国王棋高一着，使这名靠着外国撑腰之有名无实的领袖权力几乎被架空。一九五三年，美国对于伊朗首相与主张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之间的关系有所疑虑，于是在中情局的协助下，由穆沙迪克的国内政敌发动政变推翻穆沙迪克。

在这场动荡中，巴列维国王显露出他冷酷而脆弱的一面。害怕宫廷阴谋而且在民众面前缺乏安全感的他，变得愈来愈多疑与暴虐。他摧毁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伊朗人民党与民族主义人士，然后随即对教士进行镇压。他把伊朗的石油

产业移交给国际财团，虽然伊朗也能分得部分利润，但伊朗人不能审计账目，也不能加入董事会。

在穆沙迪克主政时期，伊朗似乎有可能走出自己的路，在或许源自于西方的左翼与自由派思想影响下，这一切都将由强大的民族自尊感、拥有自身资源的期盼以及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来界定。现在，来自西方的强风横扫伊朗，这阵风既残酷又难以抵抗。人们要不是像巴列维国王那样屈服，就是必须找到某个可坚守的目标——某个看似柔软但却坚固得足以让人立定脚跟抵挡这场风暴的目标。

以上就是沙里亚蒂在青少年晚期身处的大环境。沙里亚蒂参加了支持穆沙迪克的宗教团体，他认为君主制与伊斯兰教互不相容。就读师范学校的时候，他成为支持穆沙迪克的活动分子，甚至在穆沙迪克遭政变下台后仍持续进行活动，这使他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沙里亚蒂毕业后开始在小学任教，他有时也代替父亲在家族开设的伊斯兰中心担任主讲。他的传记作家提到，在这段期间，沙里亚蒂曾经于深夜在城墙涂鸦支持穆沙迪克的文字时被捕。他被迫舔掉所有的涂鸦文字，直到他的舌头肿胀发黑为止。

在一九五〇年代不断延伸的阴影下，民族主义运动纷纷休止或瓦解，沙里亚蒂因此隐退到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中。诺斯底主义相信神明居住在人的内心，主张透过神秘的方式寻求启发，藉此让人从堕落的物质世界中——沙里亚蒂称之为「发臭的烂泥」[9]——解放自己的美善本质。沙里亚蒂在马什哈德大学攻读文学时开始写诗，而且加入了诗文圈。在他加入的圈子里还有一名年轻的马什哈德教士，他的名字叫阿里．哈梅内伊。

沙里亚蒂获得前往巴黎留学的奖学金，一九五〇年代晚期与六〇年代初期，他在巴黎攻读社会学并且加入积极参与政治的伊朗留学生圈子。这段期间，他猛烈地公开抨击伊朗与外国势力之间令人恼火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沙里亚蒂哀悼伊朗受过教育的现代菁英贬低自己而崇尚外国观念。他写道，这些伊朗人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想象一个以西方为模范的未来，但一般民众却与地方传统紧密结合，他们拥抱过去，觉得未来不属于自己所有。沙里亚蒂对这个问题做了精明的诊断：「没有未来的过去，将会死气沉沉陷入停滞，没有过去的未来，将是怪异且空虚的。」[10]于是他决定着手创造一个有用的过去与一个乌托邦的未来。

为了建构崭新而原创的神话，沙里亚蒂从西方哲学传统中挖掘最好的与最具革命性的观念，并且将这些观念归结于伊朗本有的广泛教义中——亦即什叶派伊斯兰教。但伊朗的什叶派通常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更热衷于仪式与眼泪，而

非发起英雄式的暴动。因此沙里亚蒂必须创造出新的什叶派。他眼中的什叶派是革命的与好战的，必须能鼓吹推翻专制者，而且要在辩证法的推动下宣扬无阶级的社会。沙里亚蒂的什叶派是人文主义的，因为它要求个人与真主之间不能有教士中介。事实上，教士被指责为让伊朗民众无法接触真实什叶派的元凶。根据沙里亚蒂的说法，伊斯兰教保障个人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伊斯兰教也支持普世的经济平等；伊斯兰教甚至可以用来支持达尔文的演化论。

这不是说所有这些观念都与伊斯兰教兼容；而应该说，根据沙里亚蒂的说法，这些观念其实全源自于伊斯兰教，而且源自于先知与十二伊玛目（imams）的生活，十二伊玛目从阿里开始，什叶派认为阿里是先知的继承人。对沙里亚蒂来说，集体记忆具有可塑性。回忆并不是挖掘真实，而是现在式的自我创造。

沙里亚蒂的特殊天分在于，他能把现代的革命信条传递给笃信宗教的伊朗人，并且不是以西方教条的形式，而是将其诠释成伊朗人最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从他题为〈我的偶像〉的文章来看，沙里亚蒂的形成影响力其实来自于他在巴黎发现的几个人物。其中有两名是研究伊斯兰教的法国学者，此外还有反殖民主义学者法兰兹．法农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尚－保罗．沙特。沙里亚蒂远离家乡才找到他要

的东西。他的根源是法国人，但在他的心中，法国人的观念却有助于巩固伊朗转向内省的需要。

沙里亚蒂要求回归真实的伊斯兰教，认为如此可以对现代问题做出回应。但沙里亚蒂定义的真实伊斯兰教却令所有研究《古兰经》的学者感到陌生。我们应该这么说，沙里亚蒂的主张其实是他反省现代经验与欧洲影响力之后得出的结果——这段另类的历史几乎是沙里亚蒂自己创造的，然而他却宣称他将这段历史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学者阿里．米尔塞帕西写道：「沙里亚蒂的作品是一种复兴主义；从他创造的什叶派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中，他『复兴』了或许从未存在过的伊斯兰倾向，却契合当时伊朗民众的需要。」[11]耐人寻味的是，沙里亚蒂带进对话的西方意识形态居然是当时两个重要的无神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据说沙里亚蒂曾经坦承，如果他不是穆斯林，那么他会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其中仍有一些欧洲成见是沙里亚蒂无法忍受的。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主张无神论，而且反宗教，沙里亚蒂认为这种倾向与伊朗民众的精神渴望和信仰无法兼容。沙里亚蒂也注意到，西方对宗教的批判导致思想自由与科学发展。但在伊斯兰社会，宗教却是抵御帝国主义支配与文化侵蚀的最后一道防线[12]。其次，沙里亚蒂仍是一名民族主义者[13]。他不希

望伊朗人把自身的斗争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或者更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与苏联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知道苏联这个帝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剥削与冷血。因此，沙里亚蒂并未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议程。他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借用他最喜欢的观念，然后主张这些观念乃是什叶派本有的东西，他称之为阿里的什叶派。

存在主义是战后法国的流行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或许是更奇怪与问题更多的伙伴。但存在主义呼应了十六与十七世纪伊朗伟大哲学家穆拉．萨德拉的作品，萨德拉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且主张具体世界应先于范畴与属性，范畴与属性乃是人类判断力加诸于具体世界的观念。对战后欧洲的存在主义者来说，这种形上学的洞察——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存在先于本质——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洞察。人类的意志作用于这个被剥夺了内在意义的世界上：个人透过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来打造意义，这不仅是个人的自由，也是个人的责任。

这种解放个人的观念令人神往。然而，沙里亚蒂看着世俗乃至于虚无主义的战后欧洲，对于这样的观念会造成什么结果深感忧心[14]。沙里亚蒂与其他前革命时代的伊朗思想家厌恶欧洲现代性的死气沉沉，以及伴随而来低落的公共道德、无情的经济制度与遭到遗弃的传统。伊朗有着不同的经验与

不同的渴望。与旧欧洲一样，伊朗仍坚守自己的宗教，道德层面如此，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但与旧欧洲不同的是，伊朗已经目睹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的所有历史，它与欧洲的观念角力，又吸收欧洲的创新，它对欧洲启蒙的一些成果感到欣羡，也对启蒙的其他成果感到厌恶。

最终，沙里亚蒂想象伊朗取得有限的自由。虽然伊朗人在宗教上有责任抛弃专制主义，但根据沙里亚蒂的想象，他们的国家在解放后将可提供宗教上的指引，使伊朗人的意志顺从于真主的意旨。沙里亚蒂把伊朗的政治臣民比拟成需要幼儿园照顾的孩童。他提出一种「指导式民主」，由完美而无可置疑的领导人领导，这样的领导人将能体现与建立乌托邦的革命社会。这样的领导人也不受制于未启蒙的民众一时兴起的念头。

这个观点让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家国王。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个观点类似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velayat-e faqih），一九七〇年代初，有几年的时间，一群年长的教士曾在纳贾夫施行这种制度。

一九六四年，沙里亚蒂从巴黎学成归国，并且在马什哈德大学任教。他有许多学生来自于上层与中上层阶级，他们

倾向于左派而且对宗教兴趣缺缺。沙里亚蒂把唤起年轻人对伊斯兰的热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让学生知道伊斯兰足以与左派思想匹敌，而且能协助学生实现他们最重视的理想：社会正义、理性、科学进步、反对专制主义。在此同时，对于那些被世俗菁英激怒的传统阶级年轻人，沙里亚蒂则给予他们具有力量的养料。他们不是过时信仰的落后参与者：他们是革命的先锋。

沙里亚蒂的说法使他在教士阶层树敌。沙里亚蒂不认为人与真主之间真的需要有教士担任中介。他坚持伊斯兰必须接受多元与彼此竞争的诠释。一九六九年，当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造访马什哈德时，他试图说服沙里亚蒂，知识分子与教士必须合作才能打败巴列维国王。在此次造访的一场会面中，阿雷．艾哈迈德向房间里唯一的教士阿里．哈梅内伊伸出手，做为合作的一种象征[15]。

沙里亚蒂确实与一名教士建立短暂而命定的同盟。在德黑兰这座充满活力、不断往外扩展的伊朗二十世纪首都，阿亚图拉摩尔塔札．莫塔哈里协助建立了一个机构，让现代主义的教士——他们相信充满动力的伊斯兰可以透过诠释来满足当代的需要——能在此聚会、演说与建立新的信众社群。这个机构于一九六七年正式成立，称为侯赛因宗教会所，这是一座位于德黑兰北区，正面以大理石砌成的综合性建筑物，

在优雅的蓝色磁砖圆顶下，涵盖了演讲厅、图书馆与装饰了华丽镶嵌艺术的清真寺。创立者刻意将侯赛因宗教会所的地址选在德黑兰北区，为的是与保守教士的设施相区隔，后者集中在德黑兰的市集周围以及传统的南区。在侯赛因宗教会所演说的新思想家，他们的目的是接触在德黑兰北区生活的世俗菁英，并且让他们远离马克思主义，转而支持伊斯兰现代主义。

直到一九六九年为止，阿亚图拉莫塔哈里与他的核心圈子，包括一名年轻教士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几乎包办了设施所有的演讲活动，之后在莫塔哈里的邀请下，沙里亚蒂来到德黑兰，开始定期在侯赛因宗教会所演说。沙里亚蒂很快就超越莫塔哈里与拉夫桑贾尼，成为侯赛因宗教会所的主轴。一名观察者日后回忆说，当莫塔哈里演说时，演讲厅通常是半满；但沙里亚蒂演说时，群众挤爆了大厅，外面的「楼梯、庭院，乃至于地下室」也都是人[16]。沙里亚蒂的演说是反教士的，而且通常是政治性的；他表示要培养一个「革命社会」[17]。不久，侯赛因宗教会所就成为专为聆听沙里亚蒂而存在的地方——也成为革命伊斯兰主义的温床。

莫塔哈里对于这样的发展感到不安[18]。他担心沙里亚蒂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使侯赛因宗教会所陷入危险。最

后，莫塔哈里与拉夫桑贾尼以及其他曾经以侯赛因宗教会所为家的教士离开了这个设施。更保守的教士开始把侯赛因宗教会所称为异教徒的巢穴，并且质疑沙里亚蒂的虔诚。因为沙里亚蒂不只是一个在《古兰经》中寻找答案的信徒；他也是一个探勘者，在经文中寻求符合他的目的的意义，而且任意解读伊斯兰历史与神学。大家愈来愈能清楚地看出，沙里亚蒂的目的是动员——他要把伊斯兰形塑成一个动员的意识形态。沙里亚蒂不止一次公开表示，马克思无法激励伊朗农民挺身而出，但伊斯兰可以。

随着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声浪日渐升高，沙里亚蒂的言词也愈来愈激烈。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沙里亚蒂差一点就要主张革命。一九六五年，沙里亚蒂表示：「我们的社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概念上都还没有做好迎接巴列维国王之后的社会的准备。仓促起事很可能造成一场灾难。」[19] 当沙里亚蒂不号召大家发起激烈而立即的暴动时，他经常会提出这样的观点。沙里亚蒂是否在掩饰，故意在公众面前表示顺从，以避免被萨瓦克（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也就是被巴列维国王残酷的情报与安全单位盯上，但实际上他却秘密地培养他的好战倾向？或许这种两极化的倾向都真实反映了沙里亚蒂的智性与性格。他的热情使他无法采取温和的做法，但他又太反复无常，以致于无法坚持自己的热情，所以他有时会在激烈的

态度之后转而采取相反的立场，有时则会两者并行。

直到一九七一年，沙里亚蒂才出现决定性的剧烈转折。那一年，武装激进分子攻击希亚赫卡尔这个村子的宪兵队。武装分子成了人民英雄。巴列维国王意识到国家的难以驾驭，于是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伊朗原本已经可以容纳大量犯人的监狱设施，在一夜之间又做了大幅扩充。希亚赫卡尔事件的同年，一座阴森的新监狱出现在德黑兰的西北郊区。在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的管理下，埃温监狱的名声很快超越了当时恶名昭彰的德黑兰卡斯尔监狱，成为伊朗国王最残酷的刑求地点与国家的新巴士底监狱[20]。

现在，沙里亚蒂转而支持他原先协助释放的力量，并且开始激励民众起而反抗国家。他把这些武装分子称为殉难者，并且表示「这些殉难者是历史的脉动」[21]。到了一九七二年，侯赛因宗教会所成为伊斯兰左翼游击队，又称为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招募新血的地方。沙里亚蒂既非圣战者组织的领袖，甚至也不是成员，该组织从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开始就主张武装暴动；但这个地下团体的意识形态——左翼、伊斯兰主义、反教士，以及强调暴力与殉难——与沙里亚蒂的主张大致相同，因此他的作品成为该组织最佳的宣传，他的追随者也很容易就成为圣战者组织招募的对象。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对此深感不满。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日，沙里亚蒂发表关于存在主义的演说，这将是他在侯赛因宗教会所的最后一场演说。根据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沙里亚蒂知道下个星期警察将会袭击设施，学生与警察将会发生冲突，他与他的伙伴很可能会被逮捕。于是这名曾经说过「发动吉哈德(2)，如果你做得到，你就杀人，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殉难而死」的演说者，与自己的父亲一起逃往伊朗北部 [22]。十一月十七日，警方包围侯赛因宗教会所，学生占据建筑物进行抗争。他们在未落成的清真寺里礼拜，高唱口号直到深夜，他们一边祷告，一边哭泣。

沙里亚蒂躲藏了一年。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持续搜捕他，但一无所获。然而，他们确实找到他的作品。他们在每个地方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家中、手中与心中发现了他的作品，他们仅凭持有他的作品这项罪名便逮捕民众。终于，他们逮捕了沙里亚蒂年老病弱的父亲，并且将他关押到牢里充当人质。如果沙里亚蒂投案，那么——也许——他的父亲能够获释。沙里亚蒂考虑了两个半月。终于，他投降了，但他的父亲仍被关了一年多才获释。

沙里亚蒂未经审判被关了十八个月。根据他的传记引用的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数据，沙里亚蒂在狱方指示下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宣称伊斯兰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毫无类似之处——这两种信条事实上是不相容的。这是伊朗官方对

付左派，特别是对付圣战者组织的一贯做法；一九七〇年代的政治犯被迫复述官方的说法，在公众面前改变自己的论点[23]。沙里亚蒂另一篇在监狱写的文章〈回归自我〉，则是赞颂伊朗民族的伟大。

根据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的档案纪录，沙里亚蒂是在监狱里亲笔写下这些文章，然后由情报单位打字，交由伊朗最大报《宇宙报》刊载。但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档案的真实性有争议，而沙里亚蒂的辩护者坚持主张，沙里亚蒂从头到尾一直维持独立的想法，他在出狱后写下这些文章，说明他确实想法上有了改变。无论这两篇文章是真是假，沙里亚蒂获释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回归哪个自我？〉——主题似乎跟之前两篇是一样的，文中呼吁不能从革命行动中退却。一九七七年五月，他离开伊朗前往英国。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在伦敦时，透过彼此熟识的人得知，沙里亚蒂即将被安排偷渡到英国。索鲁什来自德黑兰南部一个好勇斗狠的小区，他是一名非神职的神学家，也是一名攻读化学的学生。在伦敦，他参与了被流放海外的伊朗学生反对团体聚会。这些学生在聚会中讨论沙里亚蒂的作品，把他的书当成教科书来学习。

索鲁什赞扬沙里亚蒂，但也对他抱持怀疑。他认为沙里

亚蒂的思想中，马克思的成分稍嫌太多。在此同时，索鲁什自己则比较倾向于霍梅尼。但当他得知沙里亚蒂即将前往南安普敦时，他决定把握这次机会，亲自与这位伟大人物面对面交换意见。一九七七年六月，他已约定好与这位知名的演讲者见面。

六月二十日，索鲁什抵达南安普敦，但在此之前沙里亚蒂已经因为心脏病发而被发现死在自己房间门口。他的女儿们在前一晚从伊朗抵达当地。数十年后，索鲁什对访谈者表示，她们身穿丧服，「背靠着墙，像饱受惊吓的小麻雀」[24]。

沙里亚蒂这一生拍的照片，每一张看起来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头发理得很短，发线略高，黑色的眼珠子看起来既锐利又充满忧虑。他有一张圆脸，目光中带有一丝幽默，微笑时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他几乎总是穿着西装外套与打着领带。如果外套更合身一点，衬衫熨得更平整一点，沙里亚蒂看起来会像个银行家而非充满魅力的革命思想家与精神追求者。因此，索鲁什对沙里亚蒂遗体的描述特别引人注目：「他长发披肩，我从未看过如此庄严的沙里亚蒂。他看起来非常平静。」[25]

沙里亚蒂在伊朗革命前夕死去，他的观念对革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沙里亚蒂具体呈现伊朗在二十世纪关键时期的

苦恼，他为两个世代的思想家提供共同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开始完全奉行他的观念，最终却与他争论。他们根据沙里亚蒂的设计建造自己的家园，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家园成了牢笼。

学者对沙里亚蒂的评价不一，有人说他是愿景家，也有人说他是江湖术士；有人说他是革命英雄，也有人说他是通敌者；有人说他是抒情诗人，也有人说他是造假者，甚至是剽窃者。但对许多伊朗人来说，沙里亚蒂是小黑鱼，他描绘了通往自由的路线，杀死了天上的苍鹭。他的作品有许多是以演讲的形式由学生传抄下来，但他也撰写书籍，其中一些是神秘主义的作品，还有一些充斥着难解的虚构角色，却以真人的方式呈现——他探索某个学者的作品，但这名学者却是他虚构出来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爱人。

沙里亚蒂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四岁，但他是个老烟枪而且承受巨大的压力。伊朗革命分子立刻而且永远都会宣称沙里亚蒂是被巴列维国王的海外特务谋杀，但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点。验尸之后，沙里亚蒂的遗体被送往伦敦，他的伙伴为他举行葬礼，之后他的遗体被送往大马士革埋葬。

伊斯兰葬礼仪式通常由与死者同性的四名近亲进行，但沙里亚蒂在英国并无任何同性近亲，所以由四名革命运动年

轻人依据仪式洗净沙里亚蒂的遗体，再以传统的白色裹尸布包裹。这四个人是易卜拉欣．亚兹迪、萨迪格．戈特布札德赫、穆罕默德．穆智台希德．沙贝斯塔里与那天前去见他的化学系学生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亚兹迪与戈特布札德赫将成为伊朗革命后初期政府的要员。沙里亚蒂去世时，沙贝斯塔里是一名年轻教士，在汉堡一间清真寺主持礼拜，一九九〇年代成为要求宗教改革的教士成员之一。

至于索鲁什，他将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非神职神学家。与沙里亚蒂一样，他也主张具有活力的伊斯兰，认为伊斯兰就算不能成为承载的工具，也必须拥有足够的弹性接纳当代的观念与关切。另一个与沙里亚蒂相同的地方是，索鲁什也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试图去调和对伊朗国家的愤怒以及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索鲁什是伊朗领导伊斯兰改革的世俗理论家——他是沙里亚蒂的继承人，也是在他死后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者。

＊ ＊ ＊

(1)此处指的是苏菲主义中以苦行僧方式生活的修士（dervish）。

(2)吉哈德（jihad）的意思很广，除了一般所见的圣战，主要是有为了自己目标奋斗的意涵。

第二章　伊斯兰共和国

所以我们的城市将被拥有清醒心智的你我所统治，而非如今日绝大多数的城市那样，居住着一群为了影子而彼此争斗与为了官职而彼此争论的人，彷佛这些事物能带来伟大的善，并且如同在梦里一般受着这些人的黑暗统治。事实上，在城市里，能够掌权统治的人必须是最不渴望取得官职的人，如此所有的需求必能获得最好的分配也最能避免意见的不合，一个国家若是受到完全相反类型的统治者统治，将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绝无例外，他说道。[1]

——柏拉图，《理想国》

一九六三年，在设拉子这座城市，阿里雷札．哈吉吉生

于两个世界之间。他的母亲出身贵族，却嫁给了一名市集商人。这名商人榨干了她所有的财产，然后另娶妻子，将他们母子留在设拉子南区贫民窟里过着勉强餬口的生活。在那里，邻居是粗鲁的、贫穷的与虔诚的。阿里雷札的母亲因为自身的虔信而变得孤高寡合。从她身上，阿里雷札学会了阅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这是他的同辈做不到的事。阿里雷札的母亲无法容忍电视，也无法容忍任何装模作样的西方事物。阿里雷札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藉由书本来排遣寂寞，并从中寻求关于人性与世界的知识。

渴望求知的阿里雷札时常造访当地的图书馆，令馆员难以置信的是，他借了《基度山恩仇记》，然后一个晚上就读完。每天放学后，阿里雷札会到小区的新清真寺祷告。这间清真寺也有图书馆，也就是在这里，阿里雷札发现了萨玛德．贝赫朗吉的作品。《小黑鱼》告诉他贫穷的孤立与富有的隔阂。他觉得自己同时在山中的小溪与广阔的大海中游着，他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自己的生活与他那些富有、过着世俗生活且见过世面的亲戚有着令人不解的差距，他们的家美丽奢华、应有尽有，自己住的地方则是家徒四壁。阿里雷札当时不知道，他正住在伊朗社会裂缝的正上方，这道裂缝将引发一场革命与持续不断的余震。阿里雷札决心要让自己获得充分的学识。他有一颗聪明的脑袋，对自己也有着强烈的期许，他没有受

父亲的庞大身影垄罩着，逼迫他承袭家族事业，或主宰他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可以凭借自己心智的力量，与他的亲戚一较长短。

对一个智性上得不到满足的人来说，设拉子南区很难找到一个明显的安身之处。但距离阿里雷札家只需要步行一小段路，有一个神龛，还有一座被树木围绕的清真寺。在新清真寺，阿里雷札可以逃离邻里乡亲粗鲁的行为与亵渎的言语，进入到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一个重视谦恭、互助、同情苦难与伊斯兰道德的社会。从这些教士的身上，可以想见他那些受过教育的亲戚拥有的教养，但不同的是，这些教士恪守他母亲所信仰的道德界线。对阿里雷札来说，清真寺是他的父亲与老师，是政治聚会与精神的家。在巴列维国王统治逐渐衰微的这十年间，清真寺总是热烈讨论着社会正义、暴政与不平等的结束，尤其是不平等，阿里雷札特别有资格感到深恶痛绝。

阿里雷札梦想成为一名教士。十五岁时，他放弃高中学业，转而到离家最近的神学院就读。当院长阿亚图拉哈什米．达斯特盖布跟学生谈到《古兰经》时，阿里雷札兴奋地对这名老教士提出一连串问题。为什么《古兰经》这么说？为什么《古兰经》不这么说？某天夜里，阿亚图拉把阿里雷札拉到一旁。他解释说，神学院不适合阿里雷札。所有的学

生都来自农村，只有阿里雷札来自设拉子。阿里雷札最好还是回高中读书，等拿到文凭之后，再回来攻读宗教。从谈话中，阿里雷札发现，自己的问题被人认为是莽撞无礼，他在无意间顶撞了这些长者的权威，因此被要求离开这所学校。

虽然他成为教士的企图心因此减弱，但伊斯兰教依然是阿里雷札的两项最爱之一。他的另一个最爱则是电影，这是来自西方的禁果，隐匿在他无法接触的电影院里，除了因为他的母亲不准他看电影，也因为他买不起电影票。他的邻居曾经自制了一个旋转画筒，然后将好莱坞电影胶片的卷盘放进去，阿里雷札只用一只眼睛朝着盒子里被照亮的内部仔细观看。就这样，阿里雷札迷上了电影。他藉由担任邻居孩子的家教，教导他们功课，换取看几回电视或看几场美国电影。《新天堂乐园》是一九八八年的意大利电影，内容讲述一名电影导演儿时对电影的痴迷；几年后，当阿里雷札看到这部电影时，他觉得里头的故事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人生。阿里雷札从小就认定电影是个钥匙孔，透过电影，他可以看见在世界上遥远的其他地方，那些人的心灵，以及生命与爱的本质。

如果阿里雷札住在德黑兰，如果他再大个五岁，他很可能会在沙里亚蒂的吸引之下，在侯赛因宗教会所度过每个漫长的夜晚。但那是一九七七年，接近沙里亚蒂去世的时候，沙里亚蒂与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作品才刚要在阿里雷

札居住的设拉子流通。沙里亚蒂去世时，阿里雷札十四岁。当他朋友的哥哥，当时在大学念书，找他一起去参加沙里亚蒂去世四十天的纪念仪式，并且到校园进行抗议时，他什么也不懂，只是兴致勃勃地答应了。

那一天的事件将烙印在阿里雷札的记忆里，但不是因为沙里亚蒂的缘故。当他抵达校园时，朋友的哥哥几乎立即消失在人群里，一名警员拦住还是个瘦弱男孩的阿里雷札，要求他出示大学学生证。阿里雷札灵机一动，他告诉警察他要找他的高中老师要成绩。但警察将他打倒在地。没有人对他伸出援手。

警察挥手要他退到警车与消防车后方位于天堂花园附近与法学院旁的一处地点。在那个地点还有另一名惹了麻烦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梅夫塔希。大约六个月后，梅夫塔希遭巴列维国王的警察杀害。革命后，阿里雷札就读的高中改以梅夫塔希的名字命名。但在那天下午，梅夫塔希与阿里雷札只是默默地看着学生涌入宿舍，准备在那里举行纪念仪式。此地此刻，空气中充满了紧绷气息，众人预期到可能出现暴力，但内心深处却又因此感到兴奋。就在此时，在阿里雷札身旁的马路上，一名年轻人开着一辆雪铁龙在路边停下。

「梅赫里!」那名男子呼唤着。那是他女朋友的名字。「梅赫里！过来这里。」

那名年轻人看到阿里雷札与大量涌出的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穿着庄重的宗教服装。「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他问道。

「他们来参加沙里亚蒂的纪念仪式。」阿里雷札说道。

「沙里亚蒂？」年轻人说道，「沙里亚蒂是谁？」

梅赫里钻出人群，来到雪铁龙的车窗旁。年轻人亲吻她，一个打招呼的长吻，阿里雷札从未在公众场合看过有人这么做。

十四岁的他，有很多事情尚未经历过。除了有钱亲戚的婚礼，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宴会。他不知道年轻人有轻浮的一面，也不知道当时全世界流行的青少年文化充斥着肾上腺素、性欲与叛逆。处于贫困与清真寺之间，他的童年甚至全在严肃的讨论、书籍与礼拜中度过。现在，在阿里雷札心中正播放着一部电影，在天堂花园出现了一个鲜明的场景，一名无拘无束的年轻人与他的女友坐在雪铁龙里，而一名男孩闷闷不乐地站在路边，男孩觉得自己彷佛过着修道院的生活一般，他对政治的关注如同那已然失去的成为教士的渴望，都是相

当克制且严肃以待。当下他突然领悟，有些人投身于政治，例如设拉子大学的学生，有些人则为了生活终日奔忙。对阿里雷札来说，政治「就是」生活，是他的意义来源，是他最好的沉醉之物。若非如此，一个人将会自暴自弃，将会沉湎于女孩、车子与午后阳光。这样的人生实在太不值得。

当天晚上，设拉子爆发伊斯兰革命。在新清真寺有一个纪念沙里亚蒂的典礼，当群众离开清真寺时，有人开始反复地高喊：「阿亚图拉霍梅尼万岁！」这是首次有人在伊朗的示威抗争中喊出这名流亡教士的名号——此后，开始有无数人在游行中高喊他的名字。没有人提到巴列维国王，众人只高喊着霍梅尼。当警察攻击群众时，阿里雷札与梅夫塔希趁机溜走。抗议群众冲向市内的卡普里电影院，用石头砸碎了电影院的平板玻璃。

对许多抗议群众来说，卡普里电影院象征着不道德、西方毒害与腐败。对阿里雷札来说，卡普里电影院是他计划隔天要去参加七十毫米电影节的所在地。在此之前，卡普里已经放映了《雷恩的女儿》与《宾汉》；阿里雷札想看《万夫莫敌》。第二天早上，当阿里雷札抵达电影院时，买票的人早已大排长龙，但长久以来一直装饰着电影院窗户的约翰．韦恩与芭芭拉．史翠珊的海报，现在却在破碎的玻璃中闪烁着。看电影的人问剧院老板发生了什么事。

他其实可以说：「伊斯兰革命爆发了。」往后一两个月，示威抗争将蔓延到德黑兰，在往后数年的革命与后革命暴力中，伊朗五百二十五家电影院将有一百九十五家遭到破坏。但当天早上，在设拉子北区，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电影院老板大胆猜测说：「大概是一些醉汉酒后闹事吧。」

在伊朗的革命思想家中，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是最坚定的一位。他的文字与思想极为清晰，逻辑直接而有条理。他有哲学家的纪律、教士的确信、神秘主义者的灵魂，而他的耐性与巨大的野心将震惊全世界。霍梅尼深陷的眼眸与斧凿的轮廓，使他有着威严的外貌。从他浓密粗黑的眉毛之下——他习惯只挑起其中一道眉毛——放射出冷酷、威严而充满智性的目光，彷佛能扫视所有看不见的事物。

霍梅尼生于二十世纪开始之际，父亲是省区教士，霍梅尼出生才五个月就失去父亲，由母亲与兄长将他抚养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青少年的霍梅尼协助建造地堡，而且学会使用步枪。十七岁时，他进入神学院就读。三十四岁时，他已完成进阶的教士研究，开始发表论文，他研究的课题从诗到政治，从法学到神秘主义，无所不包。与沙里亚蒂一样，霍梅尼对于伊朗的情势感到愤怒，他将自己的宗教视为抵抗与力量的泉源。

什叶派兴起于七世纪，是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派，什叶派信众相信穆斯林的合法领导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以及阿里的后代子孙。先知有十二名继承者，什叶派称这些继承者为伊玛目，每个伊玛目绝不会犯错而且被赋予了神圣的智慧。但人世的厄运与悲剧使伊玛目偏离了他们的正道，而穆斯林社群也未能团结一致接受他们的神圣领导。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起来，只有在真主指定的时刻，他才会再度在世间现身。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最重视阶序的宗派，通常被比拟成天主教会。什叶派教士从刚由神学院毕业的穆智台希德[1]到大阿亚图拉，完全根据威望来进行排序。大阿亚图拉不仅拥有最高的学术地位，而且可以响应学生与追随者的要求对广泛的实际事务发布伊斯兰教令[2]。一般的穆斯林可以从大阿亚图拉中选出一名马尔贾．塔克里德（又称仿效的根源）[3]，马尔贾发布的宗教命令，所有穆斯林必须立誓遵守。鲁霍拉．霍梅尼于一九六三年成为马尔贾，同年，他的政治地位急速窜升，成为君主制的反对者。

霍梅尼在一九四四年的作品《揭露秘密》[2]中表示，唯一具正当性的政府是由教士指导的伊斯兰政府。同年，他呼吁教士及其追随者要挺身而出成为好战分子。霍梅尼相信，巴列维国王已经将国家出卖给外国人，外国人不仅将掠夺伊朗

的资源，也将败坏伊朗的灵魂。与沙里亚蒂以及宗教现代主义者不同，霍梅尼对于西方文化影响并不存在复杂的情愫：他彻头彻尾地讨厌西方。一九六三年，巴列维国王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女性参政权与允许非穆斯林担任公职。霍梅尼抗议说这两项措施违反了伊斯兰。事实上，这两项措施是为了掩护巴哈伊信徒[4]（后伊斯兰的宗教少数族群成员）渗透到政府之中，并且确保政府能忠于以色列[3]。巴列维国王把这次改革称为白色革命，但霍梅尼却认为这是美国式的改革。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白色革命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但巴列维国王迎合美国的态度却一目了然。这位伊朗君主热衷于建立军队，而军队的配备与建议完全来自于美国。愈来愈多的美国商人，特别是国防产业的相关人员，开始在伊朗定居。一九六四年，做为与华府协议的一环，伊朗国会通过法案，让居住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享有刑事豁免权。霍梅尼严厉谴责道：

如果美国人的仆人、美国人的厨子，在市集杀害了马尔贾，或开车撞死了马尔贾，伊朗警察没有权利逮捕他！伊朗法院没有权利审判他！卷宗必须送往美国，由我们的主子来决定该怎么做！……让美国总统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厌恶的人，因为他把不公义的事加诸在我们穆斯林

身上。今日，《古兰经》已经成为他的敌人，伊朗民众已经成为他的敌人。让美国政府知道，美国的名声已经在伊朗破坏殆尽。[4]

巴列维国王下令逮捕霍梅尼，而且对随后的示威游行进行开枪镇压，造成多达四百人死亡，然后又将霍梅尼流放到邻国伊拉克。但这位阿亚图拉的发言让愤怒的民众心有戚戚焉，巴列维国王对他的严厉处分，使他的声望更加提升。

在流亡期间，霍梅尼进一步发展他在数十年前首次提出的政治愿景。真主不可能在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期间刻意让穆斯林生活在黑暗之中。但霍梅尼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已指出，全世界的政权都是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它们主张的并不是正当性或正义。唯有真主的政府才拥有这些美德。在不存在神圣统治的状况下，举目所及，「从道路清洁工到最高级的官员」，到处充斥着「混乱的思想……自私自利、好色淫荡、不知检点、犯罪、背叛与数千种诸如此类的恶行」[5]。我们可能认为这就是人的境况。但霍梅尼相信，人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他起初以神秘主义者的角度切入，相信人必须投入于精神的道路才能臻于完美；之后，他转而认为这属于政治的领域。一个正义而神圣的政府，在教士的指导下，将可提升它的臣民，使他们不再沉沦于混乱与黑暗。

霍梅尼在伊拉克纳贾夫发表一系列演说，之后在一九七四年将这些演说集结成一部论著，书名为《伊斯兰政府》。霍梅尼在书中表示，一个国家的宪法与立法都不能超越已揭露的真主话语[6]。在第十二任伊玛目缺席之下，指导国家的责任就落在最受尊敬的伊斯兰学者（faqih）身上，只有他才有资格诠释神圣经文。

霍梅尼写道：「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是理性的与外在的；这是以任命的类型存在，就像为未成年人任命监护人一样。从责任与地位的角度来说，国家的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其实没什么区别。」[7]霍梅尼认为人犹如婴儿一样没有判断力，这种说法与沙里亚蒂的「指导式民主」以及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家国王不谋而合，后者认为哲学家国王可以用他的智慧来统治宛如穴居人一般愚昧无知的民众。霍梅尼思想中带有柏拉图的元素，这并非出于偶然。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像中东什叶派神学院那样，如此尊崇地保存了古希腊哲学家的观念。在什叶派神学院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伊斯兰学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段期间，霍梅尼致力提出这项愿景，许多伊朗年轻人虽然不认同他的想法，但还是愿意追随他。霍梅尼之所以能打动年轻人，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自豪而目空一切的民族认同主张，以及他不屈不挠反抗暴政的意志。与《伊斯兰政

府》相比，霍梅尼的书信与宣言是用比较接近方言的语言写成，因此传布更广，而且里面传递的都是这类讯息。这些书信让人想起霍梅尼在一九六四年挺身而出反抗巴列维国王的事，而且书信中也严厉抨击东方与西方两个帝国，认为它们阴谋将以色列强加在穆斯林世界之上，使以色列成为穆斯林的压迫者。〈世界人权宣言〉是个骗局——是「群众的鸦片」，霍梅尼尖锐地写道——签署的国家只关切超级强权的权利[8]。只有伊斯兰才能保障穆斯林的权利。霍梅尼比沙里亚蒂更为粗鲁也更为直接，但他所认同的政治基调仍与沙里亚蒂相当契合。这绝非出于偶然。因为沙里亚蒂比教士更能号召伊朗年轻人远离世俗左派而亲近伊斯兰。绝大多数教士抨击沙里亚蒂的反教士主义，但霍梅尼却精明地不发一语，张开双臂拥抱沙里亚蒂的追随者。政治上的伊斯兰开始集结，完美的风暴即将形成。

阿里雷札在设拉子目睹的示威抗争开始在全国各地爆发。巴列维国王的回应愈是严厉，示威者的决心愈是坚定，最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在一九七八年秋天宣布戒严，而且派坦克上街。整个国家正逐渐脱离巴列维国王的掌握。伊拉克无法再庇护邻国这名身陷风暴中心的男子，只好催促霍梅尼移居他国。由于科威特人也拒绝让他入境，这位阿亚图拉于是前往法国。

霍梅尼耐心而无所顾忌地公然生活在诺夫勒堡一间涂着白色灰泥的屋子里，在巴列维国王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霍梅尼经常在一棵苹果树下发表对时事的看法。他当时表示没有意愿进行直接的教士统治。教士可以在幕后提供「指导」，但国家的行政事务最好还是交给技术官僚。曾经支持穆沙迪克的自由派民族主义分子，现在转投霍梅尼阵营。伊朗自由运动是一个已经成立一段时间的民族主义伊斯兰自由派团体，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个工程师，名叫梅赫迪．巴札尔甘，伊朗自由运动实际上已成为霍梅尼的亲卫队。这些民族主义者并不支持「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民族主义者出现在霍梅尼的核心圈里，显示霍梅尼愿意接纳革命运动的各种复杂成分，而不支持教士统治的人也不介意让霍梅尼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相应地，民族主义者也努力不懈地为霍梅尼四处奔走，他们向巴列维国王的西方盟友保证，如果他们能让巴列维国王离开，那么伊朗将会顺利过渡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民族主义者甚至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建立关系，担任起霍梅尼、美国人与巴列维国王军队之间的中间人，并且说服军方不要介入[9]。

革命分子攻击阿里雷札的最爱——电影院，而他们攻击的理由却是他另一个最爱——宗教。这个场景在往后数十年一直在他心中徘徊不去，但这并未激怒他，或让他改变立场，

或让他的内心分裂。阿里雷札的个性温和，政治一直是他的核心关切。他心里想的是，攻击电影院是一种错误的战术，只会让民众产生反感；但由于他并未参与其中，因此他也无力阻止。他每天与投掷石块的人一起加入示威游行，活生生的历史脉动令他感动不已——从空气中，他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源源不断的群众正推动历史的巨轮前进。他成为他阅读与喜爱的欧洲小说里的角色：伊尼亚齐欧．西洛内的《面包与葡萄酒》，里面提到意大利农民以宗教与左派之名反抗法西斯主义。在设拉子，人行道、墙壁与柏树都随着这层含义而悸动着。

阿里雷札保持超然的态度。他心想，自己既是历史的动物，也是历史的行动者。如果他生在以色列，也许他会成为一名犹太教正统派。他怀疑，就像人会选择观念，观念也会选择人。阿里雷札认为，因为他能思索这种想法，所以他也能试着理解与他不同的伊朗人的观点，并且从中选择最能捕捉他的革命信条。他与六个共产主义团体见面。他那些富有的世俗亲戚属于这些团体：有些人是斯大林主义者，有些人是托洛斯基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者。这是阿里雷札首次发现自己成为他的亲戚争取的对象，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服这个来自设拉子南区的穷亲戚加入他们的左派阵营。

在大学里，阿里雷札加入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研读会。他

一边阅读马克思，一边对照宗教文本，试图找出两者的不一致处。不久，被激怒的研读会会长告诉他，课堂上没有时间响应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必须留待以后再说。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青年团体气氛也大致相同，阿里雷札每天早上参加他们的讨论，他努力想让自己了解所有的革命思想。圣战者组织是伊斯兰左翼游击队团体，人员来自侯赛因宗教会所的沙里亚蒂追随者，但到了革命时期，这个组织逐渐以一名充满魅力的领导人为中心，这个领导人名叫马肃德．拉贾维。他的作品是圣战者组织唯一阅读或讨论的书籍。阿里雷札后来就不再参加他们的会议。

唯一能让阿里雷札感到自在的讨论会是沙里亚蒂另一批追随者组成的小团体，团体里都是一些以知识分子自任的人士，他们坚持沙里亚蒂的好战什叶派观点，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这个团体采取平等主义的激进立场，恪守沙里亚蒂的主张，认为真实的信仰者不需要教士中介，他们因此也不支持「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这些人认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拥有神圣智慧。

阿里雷札认为，他在沙里亚蒂的阿里什叶派中，找到了他在左派分子与神学院遭遇专制主义与不宽容时的解答。阿里雷札参与沙里亚蒂追随者的小团体虽然时间相当短暂，但长期而言，对他来说却是个错误的赌注。当革命伊斯兰主义

的主流于一九七九年获胜，并且在往后十年间在霍梅尼手中透过一连串的血腥镇压巩固权力时，阿里雷札在这段过程完全成了局外人。尽管阿里雷札并未如团体领导人与其绝大多数追随者那样，在动荡的一九八〇年代遭受监禁或处决的命运，但他曾参加团体的事实终究在他身上留下黑色的印记，即使日后在政府内部工作，他依然遭到孤立。这是个围绕着非正式的成员资格与意识形态亲缘性的网络组织起来的政府、体系与国家。在这个处境下，没有什么比无所归属更加危险。

然而，在革命展开的时期，阿里雷札却感到如鱼得水。阿里雷札从小就冷静稳重，这是智性首次在社会上成为最热门的商品，其中尤以当时彼此竞争的两种知识最为抢手：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主义。阿里雷札的朋友巴赫拉姆是他认识的人当中最帅气英挺的一个。在革命前，阿里雷札与巴赫拉姆走在街上，年轻女孩总会找借口接近他的潇洒朋友。但巴赫拉姆不属于任何类型的知识分子或好战分子，革命后，女孩们转而受到活动分子、理论家、革命分子与学者的吸引。巴赫拉姆于是拜托阿里雷札帮他赢回那些离他而去的女孩们的心。于是他们故意进行一些对话吸引那些马克思主义美女注意。由巴赫拉姆对马克思主义发表意见，阿里雷札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政治的投入已众所皆知，他佯装对于巴赫拉

姆的说法感到印象深刻。巴赫拉姆用这种方式交了两三个女朋友。但往后几年，阿里雷札在狭窄的生活圈中，会记得巴赫拉姆是最早批评革命的人之一。巴赫拉姆抱怨意识形态让人与人之间彼此敌视，而且扭曲了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英俊的巴赫拉姆交不到女朋友，无论在哪里众人莫不为了意识形态而彼此仇恨，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仇恨对方。

革命酝酿了许久才发生，不过一旦发生便肆无忌惮地快速延烧。宣布戒严无法让巴列维国王获得任何好处。大罢工让整个国家瘫痪。暴动也随之展开。巴列维国王慌乱地进行各种补救措施。他任命一名首相负责安抚的工作，但之后又把他换下来，改任命一名将军上台，之后眼见国家不可避免得做出改变，于是又把将军换下来，转而任命另一名首相来负责过渡工作。巴列维国王于一月十六日离开伊朗。报纸标题在欣喜若狂之下史无前例地使用八十四点大型字体：「巴列维国王离开了（Shah Raft）。」伊朗人在街上大肆庆祝。二月一日，毫无争议的领袖与革命的象征，阿亚图拉霍梅尼搭机抵达梅赫拉阿巴德机场。报纸报导：「伊玛目已经来了（Imam Amad）[5]。」

伊朗全国把霍梅尼当成救世主，热烈地欢迎他，而霍梅尼为这个欢欣鼓舞的国家带来的则是他的美德与明确的威吓。伊朗是个矛盾的国家，不仅急于与他人斗争，也迫不及

待地与自己斗争，整个国家因此满目疮痍。但霍梅尼却是个前后一贯的人。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霍梅尼向全国民众表示:「我想任命的政府是一个根据神圣命令建立的政府，反对这个政府不仅是违反人民的意志，也违反真主的意旨。」[10]他只承认自己的力量，而否认所有革命的力量。六月，霍梅尼以吟咏的语调说道:「有些人以为用伊斯兰以外的力量就能粉碎暴政的高墙，这些人错了[11]。选择伊斯兰以外道路的人，对人类毫无帮助[12]。」

霍梅尼在法国时已经暗地里任命一小批人组成革命会议，负责在政府建立前主持国家事务。会议成员包括一群头脑冷静而充满野心的教士，他们忠于霍梅尼，而且服膺「宗教人士的政治管理」观念。这些人当中有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赫希提与中级教士阿里．哈梅内伊以及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革命爆发不到一个星期，他们与其他会议成员共同组成了伊斯兰共和党。这是个拥有巨大毁灭力量的组织。

伊斯兰共和党控制了清真寺、国家广播机构与其他媒体。伊斯兰共和党除了仰赖霍梅尼个人的魅力——霍梅尼在一九七九年时的号召力确实无人能及，伊斯兰共和党本身也是个庞大的高压统治机构。由于怀疑巴列维国王军队的忠诚度，霍梅尼先前已经下令创设一支准军事部队以保护他与革命

会议的安全。这支部队称为革命卫队。伊斯兰共和党底下还有一批打手，称为真主党(6)，专门对反对者进行骚扰。阿亚图拉贝赫希提主掌新成立的司法部，他大权在握，指派与他关系密切的教士到全国各地召开革命法庭，对「反革命分子」进行速审速决，包括旧政权官员、库德族分离主义分子、政治反对者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物。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八个月内，在没有证据或法律辩论之下，革命法庭径行处决了七百五十七人，理由是「在世间播下腐败的种子」[13]。这个数字是过去八年来巴列维国王政权处决政治犯人数的七倍以上——而这还只是开始[14]。

霍梅尼与激进教士的行为彷佛这场革命完全是由他们主导，但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地位并非表面上看来那么稳固。那些发动示威抗争与罢工让巴列维国王政权垮台的伊朗人，主要是世俗的左翼分子、民族主义分子、自由派人士与伊斯兰左翼分子，这些人并不赞同由教士来进行统治。巴黎时期围绕在霍梅尼周围的民族主义伊斯兰自由派或许是其中最弱小的群体，他们最不可能在权力斗争中认真挑战教士。然而，这些人却最能让前西方盟友减轻焦虑。因此，霍梅尼放心地在一九七九年初提名温和派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梅赫迪．巴札尔甘担任临时政府总理。许多激进派教士对于这个决定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巴札尔甘将成为美国霸权与影响力

再次进入革命伊朗的特洛伊木马。

巴札尔甘是另一个时代的残余，这名温和的七旬老人，他的时代要不是已经过去，就是尚未到来。他戴着粗框方形眼镜，下巴看起来有点紧绷。他是一名工程师，与沙里亚蒂的父亲同辈，他曾经在穆沙迪克政府任职，主掌曾经短暂国有化的石油产业。当时，他曾批评穆沙迪克的民族主义者不虔诚。巴札尔甘认为，要有效对抗巴列维国王，必须有教士与传统阶级的参与，因此他成立了自由运动，这是一个结合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反对党。

巴札尔甘是民主派人士。在巴黎生活七年使巴札尔甘得出一个结论——宗教可以在世俗统治、科学进步的社会里发展茁壮，他相信人民主权而非高压统治最终可以让国家与伊斯兰价值一致。尽管如此，巴札尔甘却与教士维持一个现实的同盟关系。当霍梅尼与其他教士在一九六〇年代初反对女性参政时，据说巴札尔甘曾私底下表示反对，但最后却采取了政治态度而非道德立场：他的自由运动宣称，在选票不具重要性的国家里，参政权毫无意义，因为能投票的人与不能投票的人没有什么差别。

此外，不同于当时宗教与非宗教的激进分子，巴札尔甘捍卫言论自由、少数族群权利与私有财产；他不在乎第三世

界革命运动的语言，他认为强调殖民主义与剥削只会造成分歧而且很容易向苏联的野心靠拢[15]。巴札尔甘是技术官僚。他在德黑兰大学告诉群众：「不要期望我跟霍梅尼一样……，霍梅尼就像推土机，所到之处，岩石、草根与石块全压个粉碎。我是一辆精美的小客车，必须在铺好的平整路面上行驶，你们必须为我铺平道路。」[16]

在革命的伊朗，没有平整的道路可以行驶。巴札尔甘既不能平息民众乌托邦式的动乱，也无法破解革命会议的图谋。这位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理直到三十多年后，也就是他去世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找到支持他理念的人。在巴札尔甘担任总理期间，他面临的是一个民众被武装起来的国家，安全部队已完全失去功能。革命会议控制了这些临时起意的民兵，称他们为委员会（komitehs），并且要求他们遵行伊斯兰化的工作事项——巴札尔甘不同意这些事项，也从未咨询过这些事项。委员会监督民众是否穿着不适切的伊斯兰服装、聆听西方音乐、持有妇女裸露照片，以及两性之间是否有禁忌互动或其他道德偏差行为。霍梅尼为委员会的行动辩护，认为伊斯兰国家有责任为了提升民众而干涉私人生活[17]。

伊朗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巴札尔甘领导的合法政府，另一个是由草根革命委员会、民兵以及行刑队支持的教士法庭组成的法外网络，这个网络完全忠诚于霍梅尼与伊斯兰共和

党。巴札尔甘的政府试图掌握革命卫队的指挥权，但未能成功；他也试图让革命法庭接受司法部的监督，但也失败[18]。巴札尔甘曾对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表示：「理论上，政府主导一切，但实际上，真正管事的是霍梅尼。他与他的革命会议、革命委员会以及他和群众的关系才是主宰者。」[19]

在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国里，哲学家将成为国王，不只是因为睿智，也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国王。哲学家的智性之光乃是哲学家存在的理由；智性而非野心将驱使哲学家服务他的同胞，甚至使他违反自己遗世独立钻研学问的天性。然而，在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激进派教士「如同在梦里一般进行黑暗统治，他们为了影子而彼此争斗，为了官职而彼此争论」[20]。这些教士面临的最重要以及在政治上最困难的任务，就是为自身的统治建立永续的基础。为了制定革命国家的宪法，引发的斗争臻于白热化，而巴札尔甘对此几乎没有准备。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不到两个月，伊朗人便面临一场公民投票。投票的选项是：伊朗是否将成为伊斯兰共和国？没有任何定义，也没有其他选项。投票结果有百分之九十八投下「赞成」票。[21]但伊斯兰共和国是什么？由谁决定？六月，巴札尔甘与盟友根据法国第五共和宪法提出自由派与大致倾向于世俗的宪法草案。草案须经伊斯兰教法专家会议审查与批准。专家会议的选举过程充斥

着违法乱纪，包括对反对「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人士进行暴力攻击[22]。在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担任主席而阿亚图拉贝赫希提担任副主席的状况下，专家会议完全被伊斯兰共和党以及其他附随政党垄断[23]。他们从总理手中夺取宪法，然后重新起草，添入霍梅尼国家理论的元素。结果产生一份创新而充满矛盾的文件，文件中呈现的紧张情势将定义这个国家的未来。

绝大多数政府的正当性都来自于单一来源。但伊朗政府的正当性来源却有两个：人民主权与真主主权。就像绝大多数有过的妥协那样，结果就是两者都蒙受了损害。伊朗将成为共和国，但程度却超出霍梅尼原先的预期。伊朗将拥有一个民选的总统与能够立法的国会。伊朗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在君主的掌控之下，而是需要民众的参与及同意。但在此同时，却由教士出任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与真主在人世的副摄政来指导国家。最高领袖将指挥武装部队、掌控国内治安机构与外交政策，以及任命司法总监与宪法监护委员会，而且这两个职位与机构都由教士出任。法律由国会通过，但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必须经由宪法监护委员会许可，宪法监护委员会犹如最高领袖的臂膀。

巴札尔甘向霍梅尼提出抗议。他反对这部宪法，认为这部宪法将使国家完全落入教士统治阶级的掌控，而且也将败

坏未来的世代，使其起而反对伊斯兰教。但霍梅尼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现在，宪法明文规定了宗教学者的统治原则，」三个月后，霍梅尼对一名访谈者说道，「我认为，在这方面，宪法的规定仍有不足。在伊斯兰教中，宗教学者拥有的特权比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大得多，而教士们……却未能坚持这个理想，因为他们不愿意与知识分子敌对！」[24]

在世界的另一端，穆罕默德．雷札．巴列维国王成了绝望的亡命之徒。他行经埃及、摩洛哥、巴哈马与墨西哥，走到哪儿都担心新政权会派人来暗杀他，而他的安全还有一个更迫近的威胁：五年前，巴列维国王被诊断出罹患淋巴癌，不仅伊朗民众不知情，连他的家人也被蒙在鼓里。一九七九年九月，巴列维国王的侍从武官与美国的中间人接触，巴列维国王的处境出现重要转折。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允许巴列维国王赴美接受医疗。美国政府不顾美国驻德黑兰大使的反对，后者警告，除非巴列维国王不再要求波斯的王位，否则承认巴列维国王将对「美国的利益以及在伊朗的美国人安全造成严重损害」[25]。但与白宫关系密切的人士坚持，华府对于被罢黜的国王负有责任；这个人罹患重病，而且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愿

意接受他。

有几个理由可以支持美国大使的看法。霍梅尼希望将巴列维国王引渡回伊朗，审判他镇压伊朗人民的罪行。但与把巴列维国王送上刑场的愿望相比，许多伊朗革命分子其实更不想看到巴列维国王待在美国。他们担心一九五三年的政变会再次重演：或许巴列维国王前去投靠北美盟友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与支持他的中情局会合，以夺回他的王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大约四百名革命学生突破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占地宽广的美国大使馆的高墙。这些学生在一个称为「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团体授意下冲进大使馆，绑架了约五十一名美国人质，并且要求美国必须引渡巴列维国王。

霍梅尼并未下令占领大使馆；从各方面来说，这起事件都让他感到惊讶。尽管如此，霍梅尼还是不顾巴札尔甘的反对，给予学生祝福。伊斯兰共和党将这些绑架人质的学生纳入自己的组织中，确保这些人在往后数十年能在政治上一路扶摇直上。

占领美国大使馆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树立方针，也为伊朗的内政政策迈出蛮横的一步。激进派教士已经受够了巴札尔甘。为了逼他离开，他们只好让政治升温到连他这

种温和的人也无法忍受的地步。绑架人质事件做到了这一点。而这起事件也让伊斯兰主义者从世俗左派手中夺取了反帝国主义的据点，成功从侧翼包围伊朗反对派长久占据的高地。

巴札尔甘一向支持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与他的政府成员一直与美国外交人员维持接触，并且认为这是他们日常职责的一部分。现在，他们的外交政策落空，同时也失去了对内政局势的掌握。巴札尔甘递出辞呈。在最后的电视演说中，巴札尔甘向民众表达他内心的恐惧，他担心未来伊朗人民的主权很可能被教士的统治取代[26]。

一个月后，明定「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新宪法获得公投通过，但实际上参与投票的伊朗民众不到一千六百万人[27]。霍梅尼公开表示，他不会轻易行使他的大权，除非是为了防止悖离伊斯兰教的状况发生[28]。然而实际上，往后十年伊朗将成为当代最不负责任与最专制的政权之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一九八〇年首次举行总统大选。阿亚图拉霍梅尼支持独立候选人阿博尔哈桑．巴尼－萨德尔，此人以激进的伊斯兰经济学家自称，而且留着格鲁乔．马克思的八字胡。巴尼－萨德尔在法国时曾帮助过霍梅尼，然后成为革命会议的一员。由于没有真正的竞选对手，巴尼－萨德尔在总统大选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

新任总统与前总理巴札尔甘不同，他并不是一个高尚的自由派人士。他是他身处的极端时代下的人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决心对抗他的政敌。巴尼－萨德尔毫不掩饰的自信使他一下子触怒了伊斯兰共和党的教士。他宣称，「总统应该主掌一切」，他也提到教士「终将失败」，革命委员会将解散，而彼此竞争的权力中心将被去除[29]。

阿亚图拉贝赫希提与伊斯兰共和党决心阻止巴尼－萨德尔，他们试图说服霍梅尼相信，这位民选总统是国家的敌人。对手抨击巴尼－萨德尔滥用权力、「自我中心」而且是「教士的敌人」[30]。他们说新任总统是「换了一张脸的巴札尔甘」[31]，抱怨他开始转向自由主义，而且警告他必须「与革命站在同一阵线」[32]。他们利用他们在国会的多数，让巴尼－萨德尔在自己的内阁中遭到孤立，几乎所有的阁员都来自伊斯兰共和党，他们还逼迫巴尼－萨德尔任命与他为敌之人担任总理。

彷佛巴尼－萨德尔遭遇的难题还不够似的，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伊拉克与伊朗交恶已有一段时间，彼此持续进行挑衅，而且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但现在萨达姆．侯赛因(7)决定利用伊朗遭受孤立与革命动荡之际控制阿拉伯河的水道。这已经不是小型的边境冲突[33]。伊拉克独裁者派出二十二个师进攻伊朗领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军事行动。

国际上并未出现抗议的声音。美国官员日后回忆，两伊战争爆发时，他们抱持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伊拉克是苏联的附庸，而伊朗绑架了美国外交人员做为人质，几乎等同于与美国开战。占领大使馆事件使伊斯兰共和国受到国际的冷遇。但伊朗的革命分子对于世界各国的沉默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他们过去一直怀疑国际秩序对他们不怀好意，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确认这一点。

战争非但未能让伊朗的政治派系团结一致，反而造成更严重的分裂。巴尼－萨德尔认为学生应释放美国人质，好让伊朗能向西方购买备用的军事零件。他要求停止对军队进行意识形态清洗，因为此时的军方比以往都更需要指挥官。但令巴尼－萨德尔感到挫折的是，人质危机继续拖延，而军方的整肃也依旧持续。

结果，伊朗总统居然公然成为反对派的领袖，无论从哪一国的宪法来看，这都是一件奇怪的事。巴尼－萨德尔获得自由派与一部分左派的支持，其中包括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后者此时有大量的年轻人加入，许多甚至是青少年[34]。巴尼－萨德尔在他的报纸上谴责革命政权的暴力行径——刑求、审查制度、暗杀阴谋等等诸如此类。他的结论是：「在这样的共和国里担任总统，我无法感到骄傲。」[35]他甚至要求霍梅尼向他保证，如果自己出事，他的妻儿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36]。

霍梅尼并未直接响应。但霍梅尼最终还是警告总统，必须与圣战者组织保持距离。

圣战者组织是巴尼－萨德尔握有的最好筹码，他不愿意放弃他们。一九八一年二月，抗议民众开始在街上与真主党发生冲突，真主党是支持政权的好战分子的通称，他们手持棍棒、刀子与手枪对抗圣战者组织与总统的支持者[37]。霍梅尼成立委员会来进行调解，但委员会却专门针对总统，而且剥夺了他剩余的权威。教士关闭巴尼－萨德尔的报社，逮捕他的亲信，禁止他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最后在六月透过国会的不信任投票免除了他的总统职位。

「我很遗憾，」当巴尼－萨德尔的逮捕令发出时，霍梅尼如此说道，「我试着避免……免职的结果。」但「外国势力的介入以及夹杂在这些人当中的狼群，不让我们避免我们想避免的事」[38]。

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成了伊朗境内的亡命之徒，他的行踪成谜。总理曾经是巴尼－萨德尔的对手，此时由他主掌政府。教士告诉民众，革命的成功是为了建立伊斯兰国家，而不是为了建立自由或民主。在此同时，巴尼－萨德尔则与圣战者组织订下盟约，誓言推翻政府，另建一个「民主的伊斯兰共和国」[39]。

伊朗爆发的混乱局势已经迹近于内战。圣战者组织与同盟的左翼分子利用焚烧的巴士、轮胎、树木与桶子堆成街垒，持续八个小时对抗革命卫队。这些人不同于巴札尔甘的那群有教养的自由派分子，他们是革命的街头暴徒、炸弹客与暗杀者。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一台被安装了炸弹的录音机在德黑兰南部一间挤满群众的清真寺里引爆，阿里．哈梅内伊当时正在演说，他的右臂永久受损，脖子与喉咙受的伤也损害了他的声音。「感谢真主，伊斯兰的敌人全是一群笨蛋，」霍梅尼安慰说，「他们的阴谋诡计反而让民众更团结。」[40] 另一枚炸弹在德黑兰的一个广场爆炸，第三枚在街上被发现并且顺利拆除。

但是，最严重的攻击发生在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当天伊斯兰共和党举行每周一次的集会。有两枚炸弹——反对团体从未宣称是他们干的——在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爆炸，一枚位于讲台附近的垃圾桶里，当时阿亚图拉贝赫希提正在台上演讲，另一枚则在观众席里。这起爆炸让两层楼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屋顶的钢梁也扭曲变形，杀死至少七十名官员与公务员，包括贝赫希提本人。两个月后，八月三十日，一枚炸弹炸掉了总理办公室，当时总理正在主持国防会议，总理与四名官员被炸死。

教士最近才平息了一起武装部队的未遂政变，对他们来说，和平共存显然已无可能。非得将巴尼－萨德尔与圣战者组织从政坛上清除不可，为了做到这一点，伊斯兰共和党发起了恐怖行动。总理被炸死的数天后，司法部授权大规模逮捕与处决反对派人士。圣战者组织与革命卫队开始猛烈交火，其中尤以德黑兰南区特别严重。巴尼－萨德尔与圣战者组织领导成员逃往法国，但他们的追随者——圣战者组织成员、库德族民族主义分子、左翼分子与民族主义者——总计有二千六百六十五人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到十一月间被处决。检察总长表示，这些死亡「不仅是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41]。

阿里雷札．哈吉吉是幸存者。在那段期间，阿里雷札认识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不见。有些人被处决，有些人死在战场。他有个朋友，是个非常杰出的物理系学生。革命后，这个朋友加入革命卫队；但他的单位却是由一名前萨瓦克军官来负责教导，他一气之下离开革命卫队，转而加入圣战者组织，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真正的激进主义。他在与巴尼－萨达尔有关的骚乱中被杀。阿里雷札觉得自己的朋友在被利用之后又被处理掉。没有任何武装派系在乎他受过的教育、天分与未来的前途。

革命爆发时阿里雷札才十六岁。他想到大学读书，藉此离开设拉子南区，摆脱活动分子的环境，进入到新主流的中

心。但在他高中毕业那一年，却没有任何大学可以就读。在霍梅尼的指示下，从一九八〇年开始，真主党占据了大学校园，对各个学院科系与学生团体进行整肃，并且将课程全面伊斯兰化。大学关闭了三年。阿里雷札与他的伙伴完全无事可做。他也许可以出国念书，但他的母亲没有钱让他出国。他也许可以自愿从军，但他的父亲却抢先一步入伍，并且要求阿里雷札在他在前线的时候帮他照顾店铺。

阿里雷札就这样泯然消失在设拉子的市集中。阿里雷札不顾父亲的反对，在店铺里摆了一张书桌，上面堆满了书。他就坐在客人之中看书。战争把设拉子变成阿里雷札无法接受的样貌。产油的边境城市阿巴丹在一九八〇年遭到围困，当地的年轻人涌入设拉子到处找女孩搭讪，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们的家乡被伊拉克人攻占。阿里雷札觉得这些人一点也不在乎战争。他认为，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可以从他的选择看出。革命就像爱情：在爱情与自利之间，真正的爱人会选择爱情。然而，跟阿里雷札一样认真看待战争与革命的人主要是真主党人，他们全是「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马前卒。而阿里雷札与这些人也格格不入。阿里雷札仍然属于受沙里亚蒂启发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这是个激进的团体，不仅是伊斯兰主义者，也是平等主义者，但这些人主要专注于经营报纸，他们的人数不多，却孜孜不倦地写下大

量的文字作品。

阿里雷札不想让自己成为历史，也不想让自己的年轻时光虚耗在设拉子的市集里。一九七九年，霍梅尼下令组建一支庞大的志愿民兵，称为巴斯基，由超过与不到征兵年龄的男性以及所有女性组成。阿里雷札在一九八〇年时只有十七岁，比正规军的征兵年龄少了一岁，于是他便到巴斯基的训练营报到。训练营的教导一部分是体能，一部分是意识形态。阿里雷札相信，与伊拉克的战争超越了派系政治，他与巴斯基的真主党人之间不应该心存芥蒂。然而，管理训练营的人可不是这么想的。有人认出了阿里雷札，并且指控他为了刺探情报而渗透到巴斯基，于是他被赶出了训练营。

阿里雷札加入了海军。战时入伍使他能堂而皇之地从另一场战争脱身——政治敌对势力之间的战争，这些势力把年轻的追随者当成可以牺牲的炮灰。在海军基地里，政治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事物。阿里雷札与其他被征召入伍的青年无法进入城市或与其他民众来往，他们只能藉由阅读官方报纸来得知外界消息。阿里雷札日后回想，如果一九八一年时他不在海军基地，他很可能遭到逮捕或遭遇更糟糕的状况。当时阿里雷札上船赶赴前线，及时目睹两伊战争在霍拉姆沙赫尔决定性战役的尾声。

霍拉姆沙赫尔位于阿巴丹北方十五公里处，濒临阿拉伯河，伊拉克于一九八〇年九月首次围攻该城。霍拉姆沙赫尔在伊拉克以重炮轰击三十六小时后陷落。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为革命传奇，精疲力竭的巴斯基与革命卫队以清真寺为据点，最终还是无法守住这座城市。在伊拉克占领期间，霍拉姆沙赫尔成了一座鬼城，一半的城区被夷为平地，到处都是涂鸦与弹孔。伊拉克士兵用霍梅尼的照片来练习打靶。一九八一年秋，伊朗军队突破被围困一年的阿巴丹，一九八二年五月，在长达一个月的战役结束后，伊朗终于收复霍拉姆沙赫尔。

阿里雷札在战役的最后一天抵达霍拉姆沙赫尔。他在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待了一个月。随着霍拉姆沙赫尔的收复，伊朗在开战后才一年半的时间就成功击退入侵的伊拉克军队。此时的伊拉克很可能因为并吞伊朗领土的希望破灭而撤兵返回巴格达，霍梅尼因此有机会与伊拉克缔结有利的和约，然后转而处理伊朗自身的内部问题：政治暴力、社会不安、自由落体的经济。然而霍梅尼并未这么做。相反地，伊斯兰共和国还是持续着这场战事，决心一举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党政权。接下来持续六年的战争将使这两个国家陷入困境。

阿里雷札返回海军基地，然后离开军队回归平民生活。他还身负其他的义务。他的母亲跌断了骨盆。阿里雷札相信，

在设拉子的医院里，一个无依无靠的贫穷妇女一定会遭到忽视。他必须坐在病榻旁，才能确保她获得适当的照顾。但革命之后，医院依照性别加以隔离分区，技术上来说他已不能待在妇女区里。于是他与护士达成协议，他一方面帮父亲顾店，另一方面到医院照顾母亲，而在医院的时候，他可以坐在病床旁边阅读加布列．贾西亚．马奎斯的作品，同时只要病房里有病人按铃，他就要负责上前照顾，让护士们在一旁聊天说笑。

有一天，阿里雷札偶然碰见清真寺的图书馆员，这个馆员曾在阿里雷札小时候介绍他阅读《小黑鱼》。馆员得知当年那个嗜书如命的虔诚孩子现在居然在市集里工作，心里感到十分惊讶。革命过后，这名馆员在大学监督委员会里任职；他拥有阿里雷札想象不到的人脉。馆员提议透过正确的政治管道为阿里雷札提出大学入学申请。阿里雷札申请电影学系与政治学系，他两个科系都上了。

学习电影是一个梦，一个奢侈品，阿里雷札最终选择进入声望卓著的德黑兰大学政治系。晚年时，阿里雷札有时会后悔自己做了这个影响命运的选择。即使政治是每个家庭主妇、出租车司机与街角的杂货店老板都自认为是专家的一门行业，但在伊朗攻读政治总是要受到意识形态检查。尽管如此，政治是阿里雷札存在的核心。在面临选择时，他总是优

先选择政治。

阿里雷札是革命的真诚信仰者，他的激进一如他对宗教的虔诚，而他对政治也颇为精明。然而他在青少年时期押错了宝——押在沙里亚蒂身上而非霍梅尼——这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沙里亚蒂的名字被用来为街道命名，沙里亚蒂把伊斯兰当成意识形态，这种做法开创了时代，而他号召的社会正义，就连霍梅尼也必须追随。沙里亚蒂的名字既不可提起，又不可批评。教士很清楚沙里亚蒂能释放的力量。他们把沙里亚蒂当成野马来驾驭，但最终又不得不予以压制。

像阿里雷札这样的人会为国家的官僚工作，却无法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会围绕在政治派系的外围，却无法被他们吸收。遇到麻烦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说话或为他担保。阿里雷札十分精明，因此能保全自己。他在中年时流亡到加拿大，依然忠于革命的他，尽管仍满腔热忱，却从未拥有过革命，因此也从未失去革命。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巴尼－萨德尔与导致他去职的暴动对伊朗权力核心的冲击其实远不如巴札尔甘来得长久。伊斯兰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虽然在政治上被击倒，但他所象征的理念却从未消褪，反而随着时间而日渐彰显。巴札

尔甘认为，在新伊斯兰国家里，像他这样的人会有或应该要有生存的空间，而法治与伊朗人民发起的革命并非不能相容。

在巴尼－萨德尔执政的末期，三月，革命法庭在埃温监狱审判巴札尔甘的前副总理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这场审判将使巴札尔甘重回国家舞台，而这回他将为反对派发出愤怒而绝不妥协的声音。

根据在大使馆找到的文件，绑架人质者指控风度翩翩且英语流利的外交官埃米尔恩特札姆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而且对革命的路线抱持怀疑的态度。这场审判完全是急就章，随便找个房间仓促改成法庭，巴札尔甘担任辩方证人，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打领带。身穿棕色 T 恤的监狱官员为了维持法庭秩序，竟要求全场人员齐声赞美真主。埃米尔恩特札姆与旁听的八十名民众起身赞颂：「真主至大，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处死异教徒萨达姆。」穿着蓝色牛仔裤的法庭官员宣读《古兰经》。

法官是一名教士，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吉拉尼，他转头看着埃米尔恩特札姆问道：「你找辩护律师了吗？」[42] 埃米尔恩特札姆说有，法官随即打断他的话：「有巴札尔甘先生为你做证，帮你说话，你不需要辩护律师。」

巴札尔甘直到最后都忠于他的副手，他在政府里的经验，

加上之后巴尼－萨德尔的戏剧性事件，让他往后几个星期在法庭上持续卖力表现，这一切显然都让他感到痛苦。这名前总理表示，指控埃米尔恩特札姆与美国中情局勾结，企图对霍梅尼不利，这些全是空穴来风。埃米尔恩特札姆与美国大使馆接触确实是事实，但那完全是他的职责，而且也经过总理的授权。

巴札尔甘向法庭表示：「如果有任何人必须接受审判，那个人应该是我。」

在后革命时代的骚动中，伊朗的反情报机构陷入瘫痪，巴札尔甘于是派人前往美国与苏联大使馆，希望这两个超级强权能各自提供对方的情报。巴札尔甘表示：「美国人给了我们很多情报」，主要是关于伊拉克军队在伊朗边境的调动以及阿富汗的国内状况[43]。「苏联人完全不透露任何情报。」（之后才知道，苏联人透露情报的对象不是巴札尔甘政府，而是教士。）

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审判成了报纸间的战争，一方是当局庞大的宣传机器，持续攻击这名前任官员是帝国主义者的间谍，是一名叛国者，应该处以死刑，另一方是巴札尔甘的小报《天平报》，则详细报导埃米尔恩特札姆在法庭上提出的辩词。被告无法检视用来指控他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未翻译

成波斯文让民众知道里面的内容。国家媒体完整公布对埃米尔恩特札姆的起诉书，但巴札尔甘与埃米尔恩特札姆在法庭上的陈述却完全从公开纪录中被删除。《天平报》报导埃米尔恩特札姆充满挫折地向法庭表示：「这些指控把我丑化成魔鬼……。你看到了，在这里，我被说成是真主、先知、伊玛目与伊朗的敌人……。这些指控全是谎言，没有文件可以支持这些指控。让我为自己辩护。」[44]

巴札尔甘的言词更是激烈。他说激进派教士是「机会主义者与罪犯」，说他们「没有良心」，他宣称：「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公开说明自己的决定，我们将如何在阿拉的帮助下，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来挽救国家免于这场浩劫。」[45]

六月七日，就在埃米尔恩特札姆因从事间谍工作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几天，《天平报》编辑遭到逮捕，报社也被永久停业。埃米尔恩特札姆将在监狱里待上二十七年——超越所有的伊朗政治犯，与纳尔逊．曼德拉一样久。他被偷渡出来的信件与回忆录生动见证了往后三十年伊朗监狱的状况，他的故事将启发在他首次进入埃温监狱之后出生的世代中的某些人。

伊朗自由派改革运动的发起人原本应该是巴札尔甘，然而实际上却不是如此。改革运动的主要人物、意识形态倡导

者乃至于幕后的官僚，全都是反对巴札尔甘的人物。他们对温和的、技术官僚的、自由派的革命思想毫无兴趣。相反地，他们是沙里亚蒂的子嗣，走的是乌托邦式的、狂热而极端的路线。他们信奉阿里什叶派、相信普世的社会正义以及透过伊斯兰教获得解放。他们绝大多数支持激进派教士、霍梅尼与伊斯兰共和国，即使当这些势力巩固一党专政时，他们仍未改变立场。这些人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他们与他们的朋友也将看起来如同巴札尔甘那样可疑，而他们的子女将不寻求他们的指引，反而从埃米尔恩特札姆这种人身上获得启发。

＊ ＊ ＊

(1)穆智台希德（mojtahed）是伊斯兰信仰的教法学者。

(2)伊斯兰教令（fatwas）是指穆斯林法学家对公众或私人事务以宣告的方式表达意见。每当穆斯林社会中出现新议题时，就需要颁布教令。教令也可以作为法庭宣判的参考。

(3)十二伊玛目派的最高阶宗教人士。

(4)巴哈伊是十九世纪创立于伊朗的教派。他们信仰上帝，接纳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概念，相信耶稣、穆罕默德、释迦摩尼都是上帝派遣到人间的使者。教义简单且具普遍性，目前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新兴宗教。

(5)有些伊朗人认为霍梅尼就是那个回到人世间的第十二位伊玛目。

(6)这与一九八二年在黎巴嫩成立的真主党是不同团体。

(7)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发音比较接近胡笙或侯赛因，此处采用台湾常见翻译。

第三章　持续沉思的时期

在记忆中，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总是回想起某个让他难以理解的场景。他在德黑兰大学前面的书店里，革命的时刻已经接近。他是大学生，积极参与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活动，而且加入了好战的伊斯兰主义左翼团体。他在书店看到另一个年轻人，那个人也是活动分子，属于武装反对派成员。在那个时期，好战分子想要存活，就要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萨瓦克往往混在他们当中。反对派成员彼此甚至不会互通姓名或地址。但那天下午，穆斯塔法向那名特别的年轻人自我介绍，他违反了运动的所有规则与本能，与哈桑交换了地址。两人从此成为文学的同好与好友，直到哈桑年纪轻轻就在一场意外中死亡为止。

穆斯塔法在革命运动中属于沙里亚蒂这一派。侯赛因宗教会所是唯一能让他满足所有复杂渴望的地方——他对解答、尊严与自尊的渴求。穆斯塔法的父亲是市集的地毯与木材商人，生了七个儿子，穆斯塔法排行第五。他的家庭过着

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在习惯、价值与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上非常传统。他们住在德黑兰最虔诚的小区，名叫呼罗珊广场，离城中之城，也就是市集不远。

洛赫瑟法特家的儿子们，只有穆斯塔法对心灵生活感兴趣。但当时在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的世俗左派无法激起他的热情，穆斯塔法是个情感强烈的年轻人，容易生气但也容易亲近，他毫不掩饰自己过人的才智与炽热的情感。

当时——一九七〇年代晚期，穆斯塔法正值青少年的时候，追求的是激进主义。穆斯塔法由于小区的关系而与梅赫迪．巴札尔甘有过接触，但自由运动太老派而且太温和，不合穆斯塔法的胃口。他比较喜欢沙里亚蒂强烈的抒情主张以及霍梅尼强调的公正。接受他们的说法，意味着拒绝成为臣民，无论是巴列维国王的臣民还是其他反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都不会是他的选项。几十年后，穆斯塔法重新审视沙里亚蒂与霍梅尼的说法，他不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暴政倾向，甚至还支持他们。

伊斯兰主义运动虽然极为新颖，却缺乏文学内涵，而正是这方面的欠缺使穆斯塔法在那天下午出乎意料地在书店与哈桑接触与讨论。伊朗的知名小说家与诗人绝大多数是左翼分子。这些人藐视宗教，认为宗教不过是农民的迷信，他

们也瞧不起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的文学，因为这些文学都带有宗教内涵。这些人向俄罗斯寻求灵感。俄罗斯小说在巴列维国王的禁止下，开始在德黑兰的地下出版社大为流通，封面清一色是白色，大家人手一册。

穆斯塔法与他的新朋友梦想成立一个组织，为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运动培养真正现代乃至于前卫的文学之声。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名他们认识的诗人。诗人告诉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文学组织，那是一个以马什哈德中级教士阿里．哈梅内伊为中心的文学圈子。这个圈子已经有十三名优秀的成员。穆斯塔法与哈桑于是放弃自组团体的想法，转而接触哈梅内伊的组织。

当时，他们与一名充满魅力而古怪的教士穆罕默德．雷札．哈基米见面。哈基米并未穿着教士长袍，头上也没有缠头巾（turban），而是顶着一颗亮晶晶的秃顶，脑袋边缘长着蓬乱的白发，与脸颊粗硬的胡子连成一片，身上则穿着长而宽松、宛如睡衣的衬衫。炽热的热情穿透他的全身，在他教导的人身上生根，就像电流寻找通往地面的最短距离一样；他经常萌生诗意般的狂想与神秘的想象以及乐音般的语言与急迫的说服力。哈基米几乎与当时所有的重要教士都有来往，包括霍梅尼与哈梅内伊。他是门徒、导师、缪斯。大阿亚图拉只有在哈基米在房间里记录他们的话语时，才愿意发

表演说。沙里亚蒂委托哈基米担任他的遗作管理人，只有哈基米才能在沙里亚蒂死后编辑他的著作。

哈基米注意到穆斯塔法，他觉得穆斯塔法有探索宗教知识的潜力。哈基米催促穆斯塔法来库姆学习伊斯兰知识。唯有加入教士，穆斯塔法才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选择，而是必须要走的路，是天职。获得哈基米这种地位崇高的人青睐是莫大的荣誉，但穆斯塔法感到犹豫。他定期前往离德黑兰不到两小时车程的库姆，当地思想生活的活力与抽象令他精神为之一振。但穆斯塔法不认为自己想成为一名教士，他愈是犹豫，哈基米愈是坚持。

跟哈基米在一起时，穆斯塔法成了一个时刻争辩不休的人，他觉得受挫，而且经常会突然悲从中来。哈基米反射出穆斯塔法的狂热与理想主义，但两人的近似只会加剧穆斯塔法的焦虑与自我责难。这段时间不是只有哈基米想拉拢穆斯塔法。圣战者组织此时遭遇严重的分裂，部分成员转向马列主义，而且也想说服穆斯塔法加入。尽管沙里亚蒂的伊斯兰主义有希望凝聚众人之力，但身为沙里亚蒂的追随者仍将同时涉足于两段急流之中，并且将经过一片充满狂热的地貌。穆斯塔法就站在上面。

对当时的穆斯塔法来说，被征召入伍几乎就像是被判缓

刑。他在军营里读了《辩证法的冲突》，这部反驳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出自尚未成名的年轻学者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之手，而索鲁什本人曾获得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赞赏。索鲁什在书中批评辩证法的论证太僵化、难以修正且过于抽象，无法对于实际存在的社会做出洞察。索鲁什承认人类的知识有其局限，因此应谦虚以对，同时也坚持理性应先于空想。

索鲁什清晰的思想如夏日风暴般向穆斯塔法袭来。索鲁什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诱惑，也让沙里亚蒂搅动的热潮降温。索鲁什以作者身分说出的话完全与沙里亚蒂或哈基米背道而驰——事实上，穆斯塔法并不希望自己拥有这样的特质。索鲁什的文字既不崇高也无法激起愤怒的情绪，它们是节制的、分析的与讲究精确的。索鲁什谈论宗教与政治——历史的灵魂部分，其语调却不像精神导师，而像哲学家。这是第一次，穆斯塔法了解索鲁什的影响力提升并非基于与人争强斗胜，而是凭借不带情感的逻辑。由于索鲁什的缘故，穆斯塔法得以果断地挥别沙里亚蒂与圣战者组织，转而投向霍梅尼。

在霍梅尼的胜利领导下，穆斯塔法走出基地，参与了最后几天令人目眩的叛乱。他与数百万伊朗人一起在梅赫拉阿巴德机场迎接霍梅尼搭机返国。而他在革命初期也支持革命会议的激进派教士与「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穆斯塔法的乌

托邦正在形成。他不想与胜利的主流争论来破坏这一切。但索鲁什已经在他的智性播下种子，这些种子日后将以穆斯塔法乃至于索鲁什无法预见的方式开花结果。

穆斯塔法在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加入的诗人圈并未如他预期地成为新伊朗文学场景的核心。相反地，这个圈子分裂了，它成为革命运动的缩影，十三名优秀成员有人支持建制派，有人与建制派为敌。有些成员，包括哈梅内伊，一夜之间变成当权者。其他成员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早期的影响力随即消失，党派甚至在一九八二年被宣布为非法。穆斯塔法原本是这个杰出诗人圈的年轻后辈，现在却只能在这个同盟的残骸中摸索前进。

这场革命仍是穆斯塔法眼中的革命，它的确定性仍屹立不摇且闪闪发亮。穆斯塔法的梦想是敲响革命的声音，确立革命的色彩与象征，使其宣示伊朗是现代宗教前卫的诞生地。为了培养这种思想环境，穆斯塔法认为，伊朗革命需要一个能媲美革命卫队的艺术队伍。

从诗人圈的瓦砾堆中，穆斯塔法挑选自己的盟友，引进好战的画家、诗人、小说家、平面设计师与电影制作人来建立网络。这是一段令人陶醉且漫长的时期。穆斯塔法在德黑兰四处收集相机、设备、书籍与补给品。他建立机构，命名

为 Howzeh-ye Andisheh va Honar-e Islami（伊斯兰思想与艺术中心）。Howzeh 这个字也有神学院的意思，这个双关语让穆斯塔法颇为得意。他的机构不仅将给予伊斯兰伊朗艺术世界文化认同，也将赋予它一个有形的处所，一个具生产力的蜂巢。他从最高领袖办公室获得一些资金。但最终穆斯塔法只能仰赖自己的资源，卖掉自己的车子来支持其艺术团队的工作。

艺术中心制作戏剧与电影，主持每周一次的诗人聚会，举办展览与作家工作坊，动员年轻艺术家与平面设计师创作可以定义伊朗革命美学的海报。这些海报结合左派大胆的色彩与强烈的图像以及什叶派流血、苦难与殉死的意象。伊拉克、以色列与美国以骷髅头与大蛇的形貌如恶魔般隐隐浮现，但最终它们都像巨大面具一样被正义之士打个粉碎。海报宣传活动与赞扬游行，哀悼战死者与激励年轻人上战场；海报以血泪的形式颂扬伊斯兰教将战胜巴列维国王的腐败与帝国的背信弃义；海报也进行灌输、教育、引诱与威胁，并且赞扬位于世界各地的伊朗领事馆。

就在这个时候，曾在穆斯塔法当兵时期以清晰的思想对穆斯塔法产生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家索鲁什从伦敦回到德黑兰。穆斯塔法忙于艺术中心的会议与活动之余，也参加了索鲁什的演说与研讨会。他对这名年长的哲学家有

一股强烈的亲近感，因为索鲁什出身穆斯塔法的小区，与他有着相同的乡土习惯与心灵习性。索鲁什甚至曾与穆斯塔法的兄长一起上过学。

穆斯塔法赞美索鲁什作品的冷静与清晰，而在见到本人之后，他更感到信服了。非常少见地，当穆斯塔法忍不住质疑索鲁什的逻辑时，索鲁什心平气和地做出回应；他的解释简洁而具有说服力。随着穆斯塔法愈来愈受到索鲁什的吸引，他也愈来愈疏远沙里亚蒂与哈基米的魅力与狂乱，这两个人曾是他年轻时期与他的性格相近的人物。这样的疏远不可避免带来冲突，除了与哈基米的关系出现问题，以及哈基米认为索鲁什的思考方式对信仰的根基产生威胁，穆斯塔法也因为独立思考而招致危险。他是运动的发起人，现在却想退出运动。

艺术中心不断扩大而且成果丰硕，到了一九八一年，伊斯兰共和党想将艺术中心交由政府管辖。哈梅内伊不断派人与穆斯塔法磋商，邀请他加入伊斯兰共和党，甚至愿意让他出任艺术与文化事务的职位。这项提议一点也不突兀。在街头中，穆斯塔法与艺术中心成员始终站在真主党这一边。他们反对巴尼－萨德尔与圣战者组织，有些艺术家甚至在骚乱中自愿担任治安人员保护各地建筑物。穆斯塔法无疑是忠诚的，但一想到附属于他人，赤裸裸地让文化听命于权力，让

思想独立受到限制——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同事，他便忍不住感到恼火。穆斯塔法拒绝伊斯兰共和党的要求。为了报复，伊斯兰共和党切断资金，而且难以置信地指控他与他的艺术家支持巴尼－萨德尔与圣战者组织。

穆斯塔法退出了。他成立的机构落入伊斯兰共和党之手，而且不再以原先他构思的样貌存在，他自己则考虑离开伊朗移居海外。但穆斯塔法尚未绝望。革命伊朗依然是而且比过去更加是新文化的摇篮，在这里，众人依然可以将伊斯兰教与二十世纪晚期的艺术与哲学、革命的政治以及伊朗的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他在伊朗仍大有可为。

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伊朗拥有中东最大的报社。现在，这间报社——《宇宙报》——属于革命国家所有。《宇宙报》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有个名叫穆罕默德．哈塔米的中级教士，他刚好认识穆斯塔法的朋友哈桑的家人。在哈塔米的支持下，一九八四年，穆斯塔法与哈桑在《宇宙报》创设了《世界报文化副刊》，由穆斯塔法担任编辑。《世界报文化副刊》除了名字，其余部分都独立于《宇宙报》。

终于，穆斯塔法开始实现他的梦想。在《世界报文化副刊》中，穆斯塔法与他的共同编辑刊载他们对杰出革命知识分子的访谈，让这些人能以自己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想法。副

刊显示出宗教杰出人物的活跃景象，而哈塔米也给予编辑充分的挥洒空间。《世界报文化副刊》连系索鲁什，邀请他提供照片刊登在副刊封面上，并且在内页刊载对他的访谈。索鲁什拒绝了，但同意为副刊撰写文章。穆斯塔法向广大民众传布他的作品，流通的程度远超过索鲁什的预期。

这个以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之名为人所知的男子，他的成长过程与绝大多数伊朗人一样，少不了乡土的诗歌与民间文学，这些作品不仅跨越了社会疆界，甚至也不受伊斯兰教局限。一九四五年，索鲁什出生于德黑兰传统下层中产阶级小区附近的一个商人家庭，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也住在这个地方，索鲁什的亲戚没有人上过大学。但索鲁什的父亲喜爱十三世纪诗人萨迪，萨迪是设拉子人，曾经目睹与描写蒙古入侵下流离失所的穆斯林遭受的苦难。每天早上，索鲁什做过晨祷之后，他的父亲会倾尽全力大声朗诵萨迪的作品。索鲁什在上学之前，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聆听这些诗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文学与思想生活，也是唯一直接来自他的家庭的思想经验。

索鲁什的父亲也许没受过教育，但也看得出儿子的思想潜力。他省吃俭用送索鲁什到阿拉维高中读书，这所学校在学术上颇负盛名，而且看重传统的虔信。这个国家强调科学成就即是社会流动的关键，而阿拉维高中特别卓越的地方在

于它拥有化学、物理与生物实验室。校长拥有物理学与伊斯兰哲学的背景，这两门都是索鲁什感兴趣的学科。但索鲁什认为学校努力结合这两门学科——从宗教文本推演出科学原理——不仅吊人胃口而且无法令人信服。他不仅与校长争论，也与自己争论；伊斯兰教、科学与哲学就像拼图的零片，他知道这些零片终将拼凑在一起，只是对他来说，整体的形貌依然模糊不清。这些学科若能适当地结合起来，必然可以解释宇宙，然而这些学科却跟同极的磁铁一样相互排斥。它们在他的口袋里摩擦作响，点燃他的野心，也让他感到挫折，最终在历经成年的思想生命旅程之后，他才能够理解。

阿拉维高中与伊朗绝大多数学术或宗教机构一样，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也就是索鲁什念高中的时候，充斥着反对派的政治浪潮。索鲁什最好的朋友是一名热血的圣战者组织早期成员，他邀请索鲁什加入游击队，一起反抗君主制度。但如索鲁什自己后来所言，他不愿意踏入黑暗，他的朋友要他一头栽进去，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员，他没有勇气这么做。他告诉他的朋友，社会需要的不单是革命分子。社会也需要各种不同的人：医师、诗人、木匠。难道索鲁什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索鲁什并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会认真阅读圣战者组织、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反对巴列维国王统治的团体的书籍，

但也对这些书籍有所批判。圣战者组织是激进派：他们质疑教士的权威而且吸收欧洲左派的意识形态。相较之下，索鲁什在两方面更倾向于保守。从一九六二年阿亚图拉霍梅尼被捕的时候起，索鲁什就非常钦佩这名资深教士，甚至在这位阿亚图拉出狱时跑去见他。此外，索鲁什带有学者的气质，他的心灵与严谨的抽象逻辑较为契合，而与意识形态和自我牺牲的狂喜以及阴谋诡计格格不入。到了高中快结束的时候，索鲁什的朋友已经泯然隐身于圣战者组织最隐秘的核心圈子里。他将追随游击队的脚步对抗巴列维国王与霍梅尼；之后，他将跟着圣战者组织的领导阶层前往法国，然后前往伊拉克，他与索鲁什将渐行渐远。

在此同时，索鲁什进入德黑兰大学就读，他同时攻读伊斯兰哲学与科学。他阅读莫塔哈里与巴札尔甘的作品，曾一度被他们的洞见所震撼；他在穆拉．萨德拉的思想中找到了对亚里士多德本质论的批判，并且一直铭记在心；他钻研苏非派诗人鲁米的诗歌；当沙里亚蒂开始在侯赛因宗教会所演说时，正好是索鲁什服兵役的那两年，他总是尽可能前往聆听他的演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索鲁什阅读了霍梅尼伊斯兰政府的论著，并且开始以霍梅尼的追随者自居[1]。往后几年，他严厉批评「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但在学生时期，他仍认为这位老教士要比其他人更能融合哲学、神秘主义与法学，

并且能提出关键的愿景。

索鲁什是个认真而谦逊的学生，但在他感兴趣的领域之间存在着缺口，而伊斯兰哲学对此毫无弥补的可能。索鲁什认为，应该要有一门思想学科连结经验与不可见之物，举例来说，一门可以解释过去与现在的科学对世界的理解为什么存在着巨大落差的形上学。身为科学家，索鲁什渴望回答什叶派伊斯兰哲学无法提出的问题。他在伊朗南部城市布什赫尔担任一年的实验室督导，负责监督食品与药物研究，之后他便带着自己收藏的诗歌与穆拉．萨德拉的作品，于一九七三年前往英国读研究所。

结实、满脸络腮胡子、平和、幽默，索鲁什既喜欢独处又善于交际，他是个思想的旅人，几乎所有的家当都存放在自己的心中，但也不介意旁边有人陪伴。他受到强烈甚至好斗的智性驱使，智性的锋芒因为他对苏非诗歌的隐喻与引证的喜好而略微软化。沙里亚蒂由于内心的焦虑而隐退到诺斯底主义之中，索鲁什则独特地结合神秘主义与冷静的理性主义，使他的内心产生一种平静的超然态度。尽管如此，索鲁什年轻时对掌握观念的渴求却十分强烈。他在伦敦的第一年都在学习分析化学。但索鲁什也想为自己建立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并且提升自己的英文，于是他买了约翰．帕斯穆尔的《百年哲学》。

索鲁什发现，有一个思想宇宙是他尚未探寻的。伊朗哲学系吸收了一些欧陆哲学家的观念，特别是法国人与德国人的观念，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思想的全貌。这些观念是西方传统的宏大愿景，是在摇晃的欧洲底下移动的构造板块，这些观念对于热衷政治的伊朗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伊朗的大学几乎都忽略了与欧陆哲学同时存在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这个传统强调逻辑、语言与知识论——探讨人类知道什么与人类如何知道的问题。

分析哲学家不探讨「世界精神」、存有、虚无或时间，相反地，他们以数学的精确来钻研与人类悟性有关的细微问题，他们不像欧陆哲学那样使用华丽的词藻或突如其来的洞察来表现时代的渴望与焦虑。与欧陆哲学相比，分析哲学似乎枯燥而琐碎，伊朗人因此不认为有引进分析哲学的必要。所以索鲁什才会在帕斯穆尔的书里发现他从未听闻过的思想流派，但这个思想流派到目前为止却最能符合他的科学心智。从帕斯穆尔的书中，索鲁什也首次得知卡尔．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贡献。其他理论家苦思归纳的问题：科学家如何能从特定的观察中确切得出通则性的结论？波普尔甚至否认这类问题的存在。科学并非从观察开始并且朝着建立通则的目标前进。相反地，人类心智已经倾向于通则化，而且经常出错。科学的任务就是进行特定的观察来检验这些通则。这正

是为什么科学家总是要以经验来检验他们的假设。

根据波普尔的说法，如果一个理论可以被证伪，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所有老虎都是肉食性的」，这段陈述可以被发现一头老虎不是肉食性的来加以证伪。这段陈述因此是一个科学的——可验证的——假说。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可能的观察都只能用来支持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就是不科学的：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可以很轻易地将所有结果都解释成支持自己的论点。

这个观点的核心带有一种谦逊的态度，这点很合索鲁什的胃口。人类的心智无法一眼就掌握真实——无法透过观察，无法透过总括一切的理论，无论这个理论有多么卓越，也无法透过归纳。或许人类心智根本无法知觉真实。更确切地说，科学家努力打扫井里的蜘蛛网，希望能更清楚地看到井底，但始终无法如愿。科学家获得的不是真实，而是愈来愈少的虚假。波普尔批评的伪科学——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到占星术——连这点都做不到。

索鲁什透过帕斯穆尔七页的摘要与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这个简单而持久的科学方法原理，建立起与波普尔的连结。索鲁什与波普尔有着深刻的类似之处；不是偶然间对某件事或甚至某几件事意见相同，也不是认为

波普尔的观念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尽管一开始索鲁什可能真的这么想。索鲁什逐渐认同波普尔观点背后的基本怀疑论，他对各种蒙昧主义或神秘思想的不耐，以及他对清晰散文与逻辑论证的热爱。索鲁什日后表示，他从波普尔身上学到，要从事哲学思索有多么容易，要做到真正学术严谨的发言有多么困难。

索鲁什向他就读大学的心理系提出申请，他解释自己想学习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被告知自己想象的学科确实存在。这个学科叫科学哲学，索鲁什应该带着他的问题去伦敦大学的切尔西学院。索鲁什去那里继续他的学业。一九七〇年代，索鲁什直接阅读康德与休谟的作品，不需要经过其他伊朗宗教思想家的中介，例如阿亚图拉莫塔哈里，索鲁什就是在他的作品中首次得知康德与休谟。他潜心钻研语言哲学与实证主义，阅读保罗．费耶阿本德、拉卡托什．伊姆雷与波普尔的作品，波普尔的好友海因茨．波斯特是索鲁什的教授之一。在此同时，索鲁什也研究化学。

哲学最令人陶醉与最抽象的形式——知识论、形上学——令索鲁什全神贯注。哲学渗透到他吃的、看的与呼吸的一切事物之中，这股冲动驱动着他的四肢与舌头；他在医院候诊时写了一本书（尽管篇幅很短），在一天之内反转了他先前所有的想法。私底下索鲁什为他人生这段时期取了一个名称：

持续沉思的时期。令他悲伤的是，鲁米的诗，过去一直深受他的喜爱，此时却与他毫无共鸣；然而，日后当他重新找回对鲁米的喜爱时，他为自己努力赢得的改变已然在他的心中生根。

索鲁什在伊朗研究的伊斯兰哲学包括了心智与灵魂理论，但伊斯兰哲学未能触及人类知识是否真能掌握事物本质的问题。他在英国的课程精确针对这个问题，对他的许多假定提出挑战。索鲁什日后解释说，身为一名信仰者，他接受的教育是相信人浸泡在确定性的海洋中，从一个确定之物漂浮到下一个确定之物。但身为哲学的学习者，他发现人是从猜测漂向猜测，从怀疑漂向怀疑。

伴随着确定性的消失，索鲁什过去理解的伊朗伊斯兰思想固有的决定论也在他手中瓦解。伊斯兰学者相信，真主的意旨决定了世界与世界的事件。人类实现了神所规定的命运。自由意志的问题——人是独立、理性的施为者吗？抑或人只是真主意旨的承载者？——困扰着伊朗的哲学家、神学家与法学家。索鲁什提到，就连霍梅尼也曾经提过，如果有一天隐遁的伊玛目出现在他面前，他必定会问他如何解决自由意志的问题。

有一天，在知识论课堂上，英国哲学家唐诺．吉里斯提

出一个假设的场景。他说，我们都坐在这个房间里，做我们自己的事。但假定有一块非常强大的磁铁围绕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这块磁铁的存在，但由于磁铁在那里，房间里一切事物的行为都将出现变化。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但如果我们知道磁铁的存在，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动实际上都不是自然现象，甚至是暴力造成的。

这个思想实验改变了索鲁什呼吸的空气味道。整个宇宙是什么样子？他感到困惑。地球这个行星又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被未知的能量场域围绕，那么我们的实验呢？我们以为这些实验可以向我们显示自然的状态。但也许自然本身也受到我们无法察觉的力量影响。也许，当我们谈到因果的时候，我们孤立了错误的原因，或者对于产生结果的必要因素视而不见。这是索鲁什转向非决定论与远离宗教教条的开始。索鲁什了解到，拥抱非决定论等于开启了整个全新的宇宙，道德是如此，知识论是如此，就连政治也是如此。

对于流亡的伊朗反对派社群来说，政治最直接联想到的就是沙里亚蒂。索鲁什赞扬沙里亚蒂的作品并且从中学习，但也对于自己看到沙里亚蒂对宗教叙事的操弄感到困扰。为了让什叶派具有革命性，沙里亚蒂从伊斯兰教的万神殿中选择了一些英雄——其中最重要的是伊玛目侯赛因，他在卡尔巴拉抵抗压迫者时战死。但面对同样的压迫者，选择和平这

条路的伊玛目哈桑，沙里亚蒂却完全略而不提。索鲁什对于这样的选择感到不安。在十二名什叶派伊玛目中，唯有侯赛因特别好战。但沙里亚蒂却做出例外的选择，认为侯赛因是革命伊斯兰殉难灵魂的象征。对索鲁什来说，这表示沙里亚蒂更重视动员群众，而不在意寻求真实，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神学的真实。沙里亚蒂对伊朗怀抱的理想以及他对不公不义的憎恨，这些都是高尚的想法。但沙里亚蒂贬低民主，这是很有问题的，而他为了教条而牺牲真实，这是不可原谅的。几年后，索鲁什在提到沙里亚蒂时对访谈者说：「我们总是有责任打破偶像。」[2]

回到一九七〇年代，索鲁什代表霍梅尼与沙里亚蒂对抗。他发起反左派观念的战争，认为左派对宗教构成威胁。他觉得沙里亚蒂借用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索鲁什阅读大量马克思的作品，为霍梅尼的伊斯兰立场找出可以反驳这名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证据。他很兴奋地发现对抗马克思与黑格尔——因此也包括沙里亚蒂——的强大武器其实一直存在着，但未被翻译成波斯文。这件武器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索鲁什于一九七四年读了这本书。

波普尔年轻时曾是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却放弃佛洛伊德与马克思而投入爱因斯坦的怀抱，后者的相对论令他赞叹不已，不仅杰出，而且十分大胆：这个理论预测的事件似乎不

大可能发生，而且这些事件还可以透过实验明确地加以反驳。反观佛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理论则包裹得密不透风、无懈可击，波普尔对他们的敬意在比较之下马上降到了低点。波普尔仍对马克思抱持着真实的情感，尤其马克思是出于人道主义的驱使而关怀经济弱势族群。尽管如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先驱施以焦土式的攻击。

波普尔这两册巨着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八年前，波普尔因为父母都是犹太人而赶在德奥合并（Anschluss）前逃离奥地利——内容追溯他认为的极权主义政治思想谱系，从柏拉图开始，经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与马克思。然后波普尔热情而简要地介绍自由主义国家，他认为在这种国家里，个人可以自由而理性地争论，机构设立的用意是为了制衡国家的权力。自由主义许诺了一个跟人类科学一样不完美的国家，以及跟真实一样闭塞的正义。但波普尔相信，开放社会拥有能自我改善的工具，因为开放社会允许理性的心智自由运作。相反地，做出乌托邦式许诺的意识形态，却容易造成束缚与人间地狱。

索鲁什对于波普观点中肯定的部分不感兴趣。当时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把《开放社会》视为用来对付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棍棒，他打的旗号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乌托邦伊斯兰。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对黑格尔的仇视特别令他满意。波普

尔相信，黑格尔「神谕式」的写作风格——华而不实，充满宣言而非论证，从而抗拒理性的挑战——使欧洲哲学神秘化与空虚化。更糟的是，在黑格尔的作品中，波普尔看见了纳粹主义的种子：相信力量就是正义，一种浪漫的部落主义，而且号召盲目地顺从权威。

但波普尔最痛恨的还是辩证法。批评者认为波普尔过度简化与误解黑格尔的理论，黑格尔认为逻辑或历史的行进是螺旋式的，在这个过程中，正题与反题将产生新的真实。对波普尔来说，这种说法完全是非理性的，是一种蒙骗年轻人的无用花招。科学家与逻辑学家发现矛盾的证据时，会抛弃原先的假说，另外提出新的假说。而根据波普尔粗略的理解，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矛盾无法证伪理论；更确切地说，两个矛盾的理论会结合起来，涵盖到一个综合的真实里。这是一个不可证伪的观念——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事物及其反面的观念，这种观念什么也没解释，什么也没研究。索鲁什援用这个批判来反对伊朗马克思主义者与沙里亚蒂的热情追随者的辩证思维。

更令索鲁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为了反驳马克思而提出的证据。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他认为这种历史被铁律决定、历史结果是可预测的信仰，是一种坏科学与坏政治。波普尔表示，历史决定论容易过度解读一般趋势，例如将科学

总是倾向于进步或阶级总是倾向于两极化的现象，诠释成法则或不可避免的向量。但趋势不是法则，趋势可能会无预警地停止或反转。没有任何科学可以支持科技会无限进步，或穷人会愈来愈穷、富人会愈来愈富的假设。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谬误——归纳谬误，波普试图在科学哲学中去除这种谬误——相信我们在某一天与第二天观察到的事物也能在第三天观察到。历史取决于杂乱无章的变量，历史的结果通常是意外的与不可预见的，历史的施为者，包括个人在内，总是秉持着自由意志。认为个人都在自身的民族认同（黑格尔）或社会阶级（马克思）的预定下做出某种行为或抱持某种价值，这样的想法是反动的，因为这是让历史与政治听凭非理性力量的摆布，「否定冷静与缜密判断的力量与抛弃运用理性可以改变世界的信念」[3]。

波普尔的批评者认为，波普尔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波普尔只谈马克思的《资本论》，但马克思在早期与晚期作品中却完全不是决定论者。在欧洲，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个学派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人类主动性与自由意志的角色进行的内部辩论中产生的。

尽管如此，波普尔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十分重要。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当经济不平等奴役人类时，政治自由如表达自由或结社自由不过是摆设。波普尔的看法刚

好相反。在一切不透明且专制统治的国家里，不存在任何正义，当然也不存在经济正义。「经济权力是所有邪恶的根源，这种教条式的说法应该予以抛弃，」波普尔写道，「真正该了解的是，『任何』不受控制的权力形式都会带来危险。」[4]

波普尔认为，民主是对抗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利器。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只要底层的经济结构维持不变，波普尔赞扬的民主的理性自由选择将不过是幻觉。但波普尔相信，国家是由机构组成的，国家的合宜或残酷完全受制于这些机构的职能。他写道：「我们早该知道『谁掌握国家权力？』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权力如何被掌握？』与『多大的权力被掌握？』这两个问题来得重要。」[5]

这些话将在索鲁什返回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之后以及往后数十年间一直在他的心中回荡。但波普尔对于「谁」掌握权力与「如何」掌握权力所做的区别，相较于索鲁什一九七四年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之时，在他回国之后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只是罗列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来替阿亚图拉霍梅尼辩护。

索鲁什在持续沉思的时期发表了多篇文章，不过他在伦敦期间最重要的作品却是他写的书。首先是《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然后是《历史哲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攻

击对霍梅尼主义者很有帮助，后者把世俗左派视为最大的敌人，而紧追世俗左派之后的则是同属左派的圣战者组织。在《辩证法的冲突》中，索鲁什认为辩证法提出经验性的主张，却伪装成抽象的理论，因此辩证法的成立与否必须以经验事实加以验证。他回顾科学史，找不到任何例证可以支持辩证法的进展。如果历史的发展并未遵循辩证法的模式，那么辩证法这个理论又有什么用呢？为了呼应波普尔的说法，索鲁什描述辩证法是一个像空气一样的理论，能够填满整个钥匙孔，却开不了锁。

《辩证法的冲突》是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在军中读的作品，这部作品使他彻底从圣战者组织转向主流的革命建制派。像穆斯塔法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就索鲁什所知，革命后短短两年间，这本书在伊朗卖出了十万册左右。

终于，索鲁什在伦敦写的一本书使他受到当代大神学家如莫塔哈里与霍梅尼本人的注意。这本书研究的是穆拉．萨德拉的形上学，索鲁什试图透过阅读哲学与科学史来充实穆拉．萨德拉的思想内容。该书很厚重，引用了爱因斯坦、维根斯坦与圣奥古斯丁的说法。虽然这本书在出版时为他赢得最高的赞誉，但索鲁什日后提到《宇宙永不止息》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说他无法调解不可调解的事物，他在写作时，人生正值尴尬的阶段，他已经离开车站，却尚未抵达下一站。

索鲁什在二〇一〇年回忆说：「那本书的作者早已不在人世。」然而在一九七九年时，这本书却让这名年轻学者一跃成为伊朗的学界菁英。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阿亚图拉莫塔哈里曾要阿亚图拉霍梅尼也读读这本书，霍梅尼自己就是一名研究穆拉．萨德拉的学者。此后，霍梅尼个人对索鲁什产生了兴趣。

一九七九年九月，索鲁什还没完成博士论文就回到革命中的伊朗，在德黑兰师范学院伊斯兰文化系担任系主任。他很快就被劝说为新政权服务，从霍梅尼以降，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名杰出的世俗神学家将会是深具影响力的宣传者。索鲁什在国营电视台与倾向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重要发言人辩论，即使他这么做是为极权的神权政体说话，却还是援引了波普尔的说法来批判马克思。当巴尼－萨德尔被解职时，索鲁什为霍梅尼的胜利欢呼，而且下了一个结论：「我们很高兴终于可以不用忍受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就像健康的身体排泄掉腐臭的部分，民众终于将他排出了。」[6] 他在巴尼－萨德尔被驱逐后的恐怖统治时期写道：民众享受久旱逢甘霖的喜乐。他们该服从并感谢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否则，但愿不会如此，如果民众对于真主的恩惠毫无感谢之意，他们将会遭到报应。」[7]

日后一名批评者说道，索鲁什抨击伊朗人民党与圣战者

组织是「伪装的教条主义」，但他自己服务的国家却以更明目张胆的教条主义来响应伊朗人民党与圣战者组织的挑战——派拿着棍棒的真主党暴徒上街，放火焚烧书店与电影院，攻击穿戴「不适切」头巾（hijab）的妇女[8]。几年后，索鲁什的批评者，特别是被他攻击左派的言论激怒的人，大声斥责他是伪善或机会主义。但至少波普尔的观念基于某种理由对索鲁什是有共鸣的，但其中有个观念对他来说却是难以理解，而这个观念将在历史事件与个人信念的相互影响下冉冉升起。这一点在一九八一年时还很难想象，但往后不到五年的时间，索鲁什确实成了一个开放社会的拥护者，他的许多同事，包括左派与圣战者组织成员，如果他们确实发生转折的话，却要花上更长的时间才真正了解开放社会的可贵。

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索鲁什尤其与伊朗各大学的关闭有关连，这件事将让波普尔大为震惊。索鲁什日后抗议说，这个关连完全是误解。他坚称是革命大学生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关闭校园，当时校园就像街头一样，充斥着政治与零星战斗。伊朗各大学成为世俗左派的堡垒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最近更成为圣战者组织的据点。霍梅尼的支持者发现自己的人数远远比不上对方，这种处境令他们无法忍受。随着伊斯兰共和党以暴力将对手逐出政府，与伊斯兰共和党结盟的学生不仅攻占美国大使馆，而且以暴力控制伊朗的学术机

构，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手持棍棒的民兵攻击校园。当校园内的学生坚决抵抗时，革命委员会下令对他们开火。学生与机构人员逃离伊朗的血腥校园，结果校园就这样关闭了三年。这些事件是伊朗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文化大革命这个不祥的名称来自于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一场更具戏剧性的活动。

对伊朗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三件事。首先，它代表往后三年伊朗完全没有高等教育。其次，它是一个专门用语，用来表示对伊朗的教授乃至于学生进行整肃，整个一九八〇年代，他们全遭受严厉的政治正统思想审查。最后，它意味着国家教育课程必须完全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占领大学后过了两个月，六月中，阿亚图拉霍梅尼让文化大革命成为官方活动，他任命七个人组成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负责「根据伊斯兰文化重新建构……高等教育」[9]。在重新组建的大学里，将不会有「外国势力的共谋者与其他间谍」容身之地，霍梅尼口中的共谋者与间谍当然是指亲苏联的左派与亲西方的自由派[10]。

索鲁什回忆时表示，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总理，总理忙于政治活动，疲惫不堪的他经常在委员会开会时睡着；司法部长只对制定法规感兴趣，参加会议的次数寥寥可数，最后干脆退出；一名强硬派的阿亚图拉，他是神学院教师，毫无大学生活的经验，总是畏畏缩缩；一名杰出的作家，他经常生

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到最后，实际参与的只有三名成员。他们是留美的教育学者，强硬派的伊斯兰共和党成员贾拉勒．丁．法尔西与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他们的任务不是关闭大学，也不是整肃大学。他们真正的工作是重启大学——当然这么做是有条件的，霍梅尼要求大学必须在合乎国家意识形态与清除外国势力之后才能重启。因此委员会主要关切的是修改大学课程。

显然，索鲁什不是这项任务的人选。他在一九八一年与一九八二年的演讲中表示，理想的伊斯兰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能拥有自信尊重学术自由及吸收东方与西方的观念。索鲁什认为思想自由无论如何都会危害宗教真理的想法是错的：「我们既不能为了真理而限制社会自由，也不能滥用自由，把神话与谬误当成真理来传布。」[11]此外，他衷心建议不要干涉理科，理科的理论应该由理科自己的方法来加以证明。索鲁什提出著名的解释，他说科学是难以驾驭的，科学没有祖国。

但拥有影响力的阿亚图拉贝赫希提认为，同样的道理不能适用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由基础哲学构成，因此只有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分。索鲁什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如果人文学科的基础哲学是西方，那只是因为这些学科是在西方由西方人产生。面对这种状况，应该做的不是贬抑其他民

族的人文学科，对穆斯林来说，应该在人文学科领域依照伊斯兰哲学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正典。阿亚图拉霍梅尼仔细聆听两方说法，然后派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员前往库姆，由教士给予建言来改革人文学科。

委员会派了大学教授团队前往库姆，与教士合作编写新教科书。教授们在路线最强硬的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赫－雅兹迪（一般都称他为梅斯巴赫）主持的神学院与教士一起工作，而梅斯巴赫支持以暴力压制异议人士。大学的主要仲裁者，同时也是梅斯巴赫二十年的朋友，曾向索鲁什抱怨梅斯巴赫难以共事：「没讲几句，就演变成斗殴的场面。」[12]最后产生出来的教科书，冠上了诸如《伊斯兰心理学》与《伊斯兰社会学》这样的名称，花费甚巨，但收效甚微，对于伊斯兰伊朗的人文学科课程改变不大。

然而，其他的改变确实造成影响。就长期来说，审查制度与强制要求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将使人文学科成为政治雷区，使伊朗绝大多数最好的学生规避人文学科而选择硬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此同时，光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这段时期，学院的整肃就让大约七百名符合资格的学者丧失工作，而且在校园里制造出一股偏执、思想僵化与人身不安全的气氛。学生当中混入了间谍，人数多到教授必须小心翼翼地回答挑衅的问题，而且总是猜疑这些发问的学生究竟是来上课

的还是来收集情报。

索鲁什认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三项成就，首先是缓和当时最糟糕的极端主义，其次是在大学封闭期间持续出版学术作品，最后是在一九八三年让大学重新开放。索鲁什亲自负责将科学哲学课程引进到伊朗，甚至将科学哲学列为大学毕业的必修学分。根据索鲁什的说法，整肃委员会不需要向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报告，而且类似的组织遍布于全国所有政府机关之中。

此外，霍梅尼主义学生狂热、教条、极端而且十分暴力，他们在政府支持下，人数持续膨胀。许多教授被迫离开大学，不是因为受到官方整肃，而是遭学生赶走。根据索鲁什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也认为这些革命学生被授予过大的权力来从事这些骚扰行为，委员会也花很多时间试图说服学生以更成熟的方式处理问题。索鲁什提到，学生想让大学无限期关闭，或至少关闭个二十年，但委员会却希望重启大学。

然而，激进派学生萨迪格．齐巴卡拉姆却表示，索鲁什在受到道德劝说时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齐巴卡拉姆后来成为一名知名的政治分析家，而且公开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扮演的角色道歉，他表示自己在整肃的过程中一直感到良心不安，于是他把自己的忧虑告诉索鲁什，他认为索鲁什是委员

会中最明理也最包容的人。但是，齐巴卡拉姆表示，索鲁什两手一摊，「他对这件事毫不在意，看起来冷淡而漠不关心……，彷佛这些事发生在阿富汗，这些学生不是离乡背井的伊朗子民」[13]。索鲁什日后宣称齐巴卡拉姆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也夸大了他的重要性，他认为齐巴卡拉姆完全忽视了委员会里其他成员比他更有权力而且显然比他更支持整肃。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索鲁什至少知道自己身边的人就算不需要受到严重的谴责，但也确实乏善可陈。在大家眼中，委员会另一名成员法尔西是以残酷闻名的埃温监狱典狱长的好友。而就索鲁什印象所及，法尔西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总是直接前往监狱。他们见面时都谈些什么？法尔西是否带着激进派学生去见典狱长，如果是，目的是什么？他们在批判谁，那些人的下场如何？索鲁什并未继续思索这些事。但有些场面他无法避免或解释，有些时刻当法尔西出现在他身旁也令他感到不安。有一次，在索鲁什建议下，委员会与大学的教职员开会，一名教授发表他的关切与批评。最后，这名教授表示，委员会总是想刁难教授，但教授们不会屈服。「不，」索鲁什记得法尔西冷淡地回答，「我们不会刁难任何人。如果有人找麻烦，我们会杀了他。」

然而，或许做为一种典型，在往后数十年间，索鲁什在后革命时代初期的活动要比他那些一贯强硬的同事更受到

详细检视。一部分是因为随着名望的累积，他的道德性格的一贯性成了全国民众注意的焦点，另一方面是因为索鲁什一直拒绝道歉。最晚到了二〇一〇年，他仍坚持自己未曾伤害过任何人。他是否曾对暴力镇压赋予正当性？他是否曾利用自己与权力高层的关系来保护那些比他更容易受伤害的人？当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遭到残酷对待，而他自己有一天也将遭受同样的遭遇时，他是否曾为这些人高声疾呼？索鲁什为自己与政府合作的时代筑了一道高墙，他总是这样响应批评者：为什么总是要问我啊？可恶的是我身边那些人呀！在难熬封闭的专制思想与统治时期，伊朗民众从索鲁什的作品中获得解脱，但索鲁什的说法无法让他们认同他是个坦荡荡的道德英雄。众人不仅对索鲁什的看法如此，对伊斯兰共和国的看法也是如此。

一九八三年，索鲁什离开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同年，委员会成员扩增到将近二十人，其中有许多是高级教士。索鲁什是唯一一位递交辞呈的委员，而这个委员会至今还在运作。索鲁什认为，委员会已无存在的必要；无论如何，他还是无法接受国家的政治逐渐转向非民主的方向发展。

当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在《宇宙报文化副刊》刊载索鲁什的作品时，这些文章引起了轰动。索鲁什获得霍梅尼器重时，他也许未曾对遭受攻击的大学伸出援手，但在思想领

域，他仍是一名战士。在不理性的年代，他积极捍卫理性，独自一人对抗体制，只要霍梅尼还活着，他就会持续批评。索鲁什要求在浮夸的时期保持谦卑，在充满愿景的乌托邦主义时代主张渐进改革，在广泛仇外的年代坚持对外开放。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伊朗，所有反对当局意识形态的势力才刚被击溃，索鲁什就开始拐弯抹角地批评「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以及支持者强加的僵化的伊斯兰道德规章。索鲁什在一九八四年写道：「先知并非被派到天使面前，先知不把人类当成不完美的天使，先知也不认为必须要把人类转变成完美的天使。人类就是人类，人类无法被转变成天使。」[14]索鲁什推论说，如果人类可以变得完美，而政治人物肩负着让人类变得完美的责任，那么这些政治人物就会把自己当成是真主在尘世的代理人，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而且妄自尊大地认为自己可以享有特权。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对霍梅尼的直接批判。

索鲁什对教士提出质疑，当他撰文讨论宗教时，彷佛宗教可以透过理性与观察来加以探讨。这些探讨就像人类做的一切努力一样，总是有瑕疵，总是需要改进。不仅如此，索鲁什认为，虽然信仰的核心可能难以形容，但人类对于真主真理的理解与应用却建立在人类研究的局限、方法与时限上，无论人类研究的主题是政治、药理学还是宗教都是如此。因

此，人类所有的知识学科必须相互链接才能产生有利的结果：如果思想家保持开放的态度，那么数学的进展可以造成神学的进展。索鲁什认为，不需要畏惧开放。世上不存在被分割出来的巨大西方传统威胁着要侵犯伊斯兰教。思想不属于任何单一的文化，而属于整个人类历史。

刊载索鲁什的文章之后，穆斯塔法让原本支持他的体制大感震惊。《世界报文化副刊》是官方喉舌，但它刊载的文章却让官方思想论述逾越界线。穆斯塔法的顶头上司穆罕默德．哈塔米感到紧张。穆斯塔法知道自己的做法会给哈塔米带来麻烦。如果穆斯塔法想让副刊继续存在，他不能只刊载索鲁什的文章，也应该让批评索鲁什的人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穆斯塔法找到索鲁什最难对付的对手，他是一名哲学家，名叫雷札．达瓦里．阿尔达喀尔尼。达瓦里与《西方毒害》的作者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同为艾哈迈德．法迪德的学生。法迪德是一名口述哲学家，他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将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观念传入伊朗。法迪德与他的学生接受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哲学。根据伊朗思想家的说法，科学是一种与伊斯兰教竞争的西方宇宙论。这个世界要么是由科学上可发现的事实构成，不然就是由伊斯兰真理构成；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因此必须承认伊斯兰真理居于首位，而且要保护伊斯兰真理免于受到科学方法与

科学主张的侵害。

达瓦里把他的科学观点扩展到社会契约上。自由主义的政府观把社会契约化约为凡人之间缔结的契约，每个人都试图最大化自己的权利。但在这个世界观里，更高层的真理存在于何处？——道德与社会价值并非仰赖法律或契约而存在，而是由于真主的命令。对达瓦里来说，自由主义只是文明误入歧途，把个人自由置于神圣真理之上的另一种症状。一个有德行的社会必须接受监护而且要符合天启。其他的选择，包括致力于民权与人权的民主政府，都是腐败而空洞的。一九八二年，达瓦里谈到〈世界人权宣言〉明订的宗教自由时写道：「现代人在真理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但他却不与真理立约，反而与自己立约。」[15]

达瓦里认为，西方的政治问题源自于西方的形上学问题[16]。西方传统的基础，也就是西方的核心洞见，在于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中心，而非真主是宇宙的中心。这种人文主义导致西方将宗教与哲学置于科学与科技之下——选择人民主权而非监护——而且将这种病症输出到全球各地。从他的观点来看，西方的思想传统是特异的与不可分割的。外人无法从西方的思想家或产物中进行拣选，任何思想家或产物最终都会导致人文主义而且接受人文主义的养料。就连伊斯兰哲学也因为受到古希腊的影响，所以也是不纯粹的。达瓦里转而

诉诸苏非派神秘主义来废除自我，摒弃世俗的依恋，以及顺从真主。而顺从真主最终成了顺从由真主在尘世的代理人统治的国家。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索鲁什与达瓦里的导师法迪德公开进行一场喧腾一时的论战。由于这两名哲学家都与统治当局有合作关系，因此这场论战得以完整展现在民众面前，而双方的论述也都在可接受的思想范围内。这是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最后一场公开的政治哲学辩论。

伊朗的知识分子或许对这场辩论的气氛感到兴奋，他们通常将这场论战形容成波普尔与海德格尔的代理人战争。索鲁什向读者介绍波普尔的思想，使波普尔的思想蔚为风潮，一九八五年左右，《开放社会》居然出现三种波斯文译本。由于索鲁什的缘故，波普尔在伊朗的名气无疑超越他在英国或奥地利的知名度，波普尔在英国与奥地利主要以科学哲学家与维也纳实证主义的批判者为人所知。在伊朗，波普尔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至于海德格尔，他在伊朗的历史耐人寻味，如同波普尔的历史与索鲁什密不可分，海德格尔也与法迪德个人的生平与心灵息息相关。法迪德人称口述哲学家，因为他几乎没有留下文字作品。但是，早在海德格尔深奥难懂的哲学被翻译

成波斯文之前，法迪德已然将他的思想的某个版本传布给学生，而这些学生日后将倾向于伊朗的强硬派伊斯兰主义。至于这个版本是否忠于原作则不是重点。

法迪德于一九四〇年代在法国与德国学习欧陆哲学，他并非严守教规的穆斯林。但他认为西方几近于十足的邪恶，他相信伊斯兰教可以成功对抗西方的黑暗。从海德格尔的观念中，法迪德了解到「真理」与「存有」曾经为人所理解，但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形上学却让「真理」与「存有」变得晦涩难解，至少让西方失去了宗教性与精神主义，使西方倾向于科技，而科技不过是一种支配工具。法迪德宣示，保有原貌的东方即将兴起，在东方，「真理」与「存有」尚未败坏。法迪德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中，也看到黑格尔有过的著名观察，在拿破仑身上看到的马背上的历史。

革命后，法迪德对西方的憎恨更加强烈，他的思想充满阴谋论，他觉得到处潜伏着贩卖西方毒害思想的恶棍，他们正等待机会一举推翻伊朗的革命成果。虽然海德格尔的杰作《存有与时间》直到二〇〇七年才完全翻译成波斯文，但法迪德与他的追随者却认为海德格尔是对抗西方毒害力量的良方。无神论的法迪德宣称，无神论的海德格尔是「唯一一位观念与伊斯兰共和国一致的思想家」[17]。

法迪德是个有魅力、有学识、情感奔放而且能言善道的人；他的学生回忆法迪德在家里上课，他的追随者一动也不动地聆听直到黄昏，完全忘了时间或空间、饥饿或疲倦[18]。与沙里亚蒂一样，法迪德喜欢煽动，喜欢自相矛盾，喜欢说自己不相信的事；但出于智性上的傲慢，目中无人的法迪德做得比沙里亚蒂更过火，他以睿智的愚人自居，经常恶作剧、嘲讽与佯装直率。他以侮辱有影响力的人为乐，但对于无法为他带来任何好处的大一学生却慷慨伸出援手。虽然许多伊朗知识分子称呼他为导师，但法迪德却对这些人相当冷淡。有个年轻作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献给法迪德，宣称他所知的一切全来自这位老先生的教导，法迪德说道：「每年春天，我从对街的商店买了草种，种在自家的草地上，但长出来的净是些奇特古怪的杂草，跟我原先种的完全不同。宣称受到我的教诲或反对我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与我教导的一切毫无类似之处。」[19]

革命后不久，在两人的共同朋友要求下，索鲁什短暂与法迪德会面。会面的过程相当愉快，但之后，根据索鲁什的说法，法迪德散布索鲁什是社会民主人士的谣言，这在当时的伊朗等于是一种侮辱。在法迪德的余生，这个称号成为两人互相辱骂中最恶毒的词汇。索鲁什宣扬西方的科学与分析哲学，这对法迪德的西方邪恶观点构成直接挑战。索鲁什的

立场也挑战了革命精神，而这种革命精神某种程度上可以定义为排外主义。所以这两位哲学家与各自的盟友都认为，自己是在争论什么才是革命国家的灵魂。

索鲁什提到，法迪德支持以暴力对付在他眼中与国家、伊斯兰、兴起的东方为敌的人，而且丝毫不感到内疚。索鲁什又说，法迪德告诉他的学生，在伊朗以外的地方提到正义、人权、民主、宽容与自由，那全都是谎言，而全世界的文化与政治组织都是阴谋者[20]。因此，伊朗人不应该理会这些场面话，而应该用暴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连法迪德过去的学生也提到他在后革命时期的讲课内容——后来被集结成书，书名为《末日的征兆》——如同梦魇一般且漫无边际。

在西方，海德格尔的哲学观点是否不可避免地使他加入了纳粹党？——关于这一点，引发了长期的争论。同样地，在伊朗，法迪德在后革命时期支持极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也产生类似的争议。索鲁什从未认同海德格尔派——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想把海德格尔与纳粹做出区隔的做法，他认为法迪德的哲学骨子里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对法迪德与他的圈子的访谈者说道：「如果这些人攻击自由主义，那么他们是站在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伊斯兰或社会主义或其他立场……。换言之，海德格尔哲学中负面及受人辱骂的部分构成了这群伊朗人。」[21]

法迪德与他的圈子也相应地对波普尔与索鲁什抱持负面的看法。法迪德在一九八〇年代讲课时表示，波普尔宣传一种堕落而放纵的自由主义；他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与无知的提供者[22]。一九八四年，法迪德抨击索鲁什与波普尔，他写道：「他们把这种无用的东西当成哲学，这简直是对人类历史的侮辱……。这些人被国际犹太人组织操纵，我会将他们的阴谋告诉伊玛目霍梅尼……。我，艾哈迈德．法迪德，有个简短讯息给伊玛目霍梅尼：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将毁了这场革命。」[23]

法迪德的支持者也开始投稿接续这场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是雷札．达瓦里．阿尔达喀尔尼刊载在《宇宙报文化副刊》上的作品。达瓦里曾在德黑兰学习哲学以及在戈姆学习神学，他也以海德格尔派自居，而且认为相较于欧陆的真正传统，分析哲学是一种「反哲学」。一九八五年，在《宇宙报文化副刊》一篇对波普尔作品的翻译评论中，达瓦里轻蔑地说：「谁是波普尔？我们海外的敌人利用他来反对革命，而在伊斯兰共和国的队伍中居然有人将他奉若神明，认为攻击他的观念就是亵渎。」[24]事实上，波普尔的伪哲学助长了科学与科技的进展，压抑了宗教、第三世界的解放与社会正义[25]。对波普尔的批判在保守的宗教圈里广泛流传，在国营的报纸与主麻日[(1)]礼拜上都有人热烈抨击这位维也纳哲学家。

或许没有任何事要比直接与口头的反对更能让哲学的心灵专注；或许对索鲁什而言，思想上至关重要的莫过于清楚明晰。因为就在这段时期，也就是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索鲁什才刚离开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他就完全不掩饰自己的自由派立场，开始批判「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

巴札尔甘的临时政府早已是过去式。「自由派」成了专门用来辱骂巴札尔甘政府的词汇，在巴札尔甘下台的六年后，索鲁什觉得有必要为「自由派」正名，或许还要为巴札尔甘翻案。虽然索鲁什从未支持美国大使馆的占领行动，但也从未在巴札尔甘担任总理期间为他辩护。尽管如此，在一九八〇年代，索鲁什逐渐发觉法迪德一伙人曾对这名自由派总理进行抹黑丑化，他认为必须改正这种状况。

一九八六年，索鲁什在德黑兰大学发表三场演讲，两场谈法西斯主义，一场谈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演说，标题为〈敢于求知〉，这是取自康德论文《何谓启蒙？》的一句话。索鲁什借着这句话来主张，不只是启蒙运动，就连自由主义的核心也是检视与批判，这当中不存在秘密，也不存在确定性。在不透明与压迫的年代，索鲁什建议伊朗人应该追求这样的自由主义。在一九八六年的另一场演说中，索鲁什认为，设计并且试图执行一套社会蓝图，特别是天堂般的蓝图，终将导致法西斯主义。

索鲁什并不期望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论点，但有一个人的反对特别让他失望。穆罕默德．哈塔米此时担任文化部长，他找人将内心的不悦转达给索鲁什，而且说了很严厉的话。

索鲁什认为哈塔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法迪德的影响。至少，他觉得哈塔米摇摆不定，有时支持索鲁什的普遍理性主义，有时支持法迪德的反西方二元论。当哈塔米相信法迪德是对的之时——西方受到固有与具传染性的邪恶感染，他便认定索鲁什支持的西方理性必定是腐败的。索鲁什从哈塔米欠缺清楚的哲学忠诚看出他精神的犹豫不决，并且认为这损害了他的政治能力。对索鲁什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他认为法迪德是个扭曲而邪恶的人，不仅支持暴力也反对人权，他相信头脑聪明、心地善良的哈塔米是被法迪德模棱两可的言语所蒙蔽。

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不像索鲁什那么有同情心。穆斯塔法对于哈塔米为了刊登索鲁什的文章提心吊胆感到不耐。他觉得哈塔米胆怯而守旧。哈塔米还在《宇宙报》的时候，曾经提到报纸的角色是为民众发声，而民众的声音「等同于霍梅尼的声音」[26]。

一九八〇年代末，哈塔米被要求提出一份担任《宇宙报文化副刊》执照持有人、发行人与总编的推荐名单。穆斯塔

法是明显的人选，但哈塔米并未推荐他。穆斯塔法辞职，而且把他圈子里的知识分子一起带走。

《宇宙报文化副刊》急速衰退。此后，穆斯塔法短暂担任政府的文化顾问。但他身为文化推广者的工作尚未结束。他的《宇宙报文化副刊》引发的兴奋情绪或持续论辩的需求也未因此终止。

于是，穆斯塔法创立自己的刊物与思想沙龙，刊物的名字叫《地平线》。《地平线》独立于国家，与索鲁什密切合作。讽刺的是，与穆斯塔法的原意相左，《地平线》日后成为政治运动的传播媒介，而且将希望寄托在穆罕默德．哈塔米身上。

＊＊＊

(1)每个星期五的祈祷日。

第四章　血的洗礼

一九八〇年代是个通往黑暗的螺旋。革命原本应该产生一个公正而独立自主的伊朗，结果却陷入战争、贫困与完全孤立。政治上的公开争论由于巴尼－萨德尔遭到驱逐而终止，而伴随着政治斗争、泄密与诉诸公众舆论而来的宣传战也跟着结束。现在，伊朗的政治消失在不透明的帷幕之后。

伊朗在国际上遭到孤立，深受经济封锁之苦，而且在伊拉克前线流干了年轻人的鲜血。几年后，许多伊朗决策者宣称他们在霍拉姆沙赫尔战役收复失土后曾反对继续与伊拉克作战。但伊朗官方的政策却是「战争，战争，直到胜利为止」，或直到萨达姆．侯赛因无条件投降为止。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伊朗战斗部队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四来自于巴斯基民兵，而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末，战死的十九万人中也有百分之四十三来自于巴斯基民兵[1]。巴斯基民兵主要由青少年构成。这些阵亡者长眠于德黑兰南部的贝赫什特．札赫拉公墓，墓地上的玻璃框放着还未长出胡子的男孩照片，一排接着一排，

宛如散发着鬼魅气氛的毕业纪念册。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伊拉克的飞毛腿飞弹定期落在德黑兰与其他伊朗城市。一名住在日托中心附近的伊朗年轻妇女永远忘不了有一天她离家的时候发现家门前的人行道散落着小手。在断断续续进行了八年的战争里，大约有一万七千名平民死亡。但这个数字并未包括往后数十年因芥子毒气的残存影响而死亡的数万条性命。伊拉克人使用这种武器打击军事目标与平民，但全世界却无视这种行为，而美国还继续提供伊拉克政权关键的军事情报。

伊朗的经济如自由落体般直线下坠，其状况之惨烈既能说是空前，也可说是绝后。战争、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与外国禁令共同造成经济的严重破坏。此外，经济计划也成为竞争的政治派系争论的焦点，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而非常仰赖石油收入的伊朗恰于此时遭逢世界石油供过于求造成的油价崩跌。到了一九八八年，伊朗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只有一九七六年的一半[2]。贫困人口大幅攀升。这种规模的衰退不仅在伊朗是第一次见到，如伊朗主要经济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史上也是罕见的[3]。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日，在紧张与暴力的笼罩下，总统大选使阿里．哈梅内伊取得权力，也巩固了一党专政。在伊斯

兰共和党几个最知名的创党元老中——贝赫希提、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担任总统，拉夫桑贾尼担任国会议长，贝赫希提派他的爱将三十九岁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担任总理。这是伊朗这段时间最统一与最稳定的政府。现在，唯一重要的政治活动来自于伊斯兰共和党的内部派系，尽管这些派系之间只有些许程度上的差异。

一九八〇年代，以这三个主要政治人物为首，开始出现派系。总统阿里．哈梅内伊与日后被称为伊斯兰右翼（Islamic Right）的派系合作。这个伊斯兰共和党内的传统保守派系支持私有财产权与反对经济中央集权。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的派系称为伊斯兰左翼（Islamic Left），这个派系与曾经占领美国大使馆的学生以及担任打手的伊朗真主党结盟。这个激进派系支持国家控制经济与将伊朗革命输出海外的强硬外交政策[4]。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的派系走实用主义路线。他的派系倾向于左翼还是右翼全凭感觉决定，拉夫桑贾尼善于经营三角关系，他知道如何在对手之间进行挑拨，而且运用自己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游走于派系之间，他常无预警地采取行动，有时会秘密策动对手相争来从中得利。这三个政治首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纵连横，在可预见的未来形塑了伊朗的政治戏码。

阿里.哈梅内伊，一个与诗文圈有往来的马什哈德教士，

同时也是喜爱约翰．史坦贝克与维克多．雨果的文人，他在革命前与世俗知识分子有着紧密连系。哈梅内伊也与阿亚图拉霍梅尼关系密切，一九六〇年代初，他曾在库姆与霍梅尼一起学习。哈梅内伊吸收了左派的反帝国主义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主义，他也将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倡导者赛义德．库特布的作品翻译成波斯文。

当时，侯尚．阿萨迪是共产主义伊朗人民党的成员，他宣称自己在巴列维国王执政时代曾与哈梅内伊一起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他的说法受到质疑，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从他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哈梅内伊年轻时那人性化的一面[5]。阿萨迪回忆哈梅内伊是个温和而虔诚的人，对文学充满热情而且包容不同的政治立场。阿萨迪写道，当他感到沮丧的时候，哈梅内伊会邀他散步。两个人绕着牢房走动，假装自己走在童年时期的风景中，并且交换彼此对文学与政治的看法。哈梅内伊与阿萨迪曾想办法让牢房里第三名狱友存活下来：一名十几岁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战士，他被打成重伤，而且快要饿死，然而除非施加威胁，否则他不愿意张开嘴巴。阿萨迪于是设法威胁这个年轻人，让哈梅内伊将细碎的肉片从他的齿缝塞进去。在经过几个月奇怪的同志情谊之后，当阿萨迪被移往不同的牢房时，他看见哈梅内伊在发抖，于是在离去时将自己的毛衣送给哈梅内伊。两人拥抱；据说哈梅内

伊流着泪对阿萨迪说：「在伊斯兰政府统治下，无辜的人不会流下任何一滴眼泪。」

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九七九年革命将哈梅内伊的团体推上权力宝座，而阿萨迪的团体则被驱赶到灭亡边缘。哈梅内伊先后担任国防部长、革命卫队长官与德黑兰市主麻日领袖。虽然哈梅内伊属于革命的核心圈子，其政治影响力却无法与拉夫桑贾尼以及贝赫希提相比。

哈梅内伊于一九八一年担任的总统职位被削除了许多权力。巴尼－萨德尔担任总统时，教士故意弱化这个职位，使权威朝总理倾斜。哈梅内伊与总理相处不睦。经济歧见是双方争论的主因，而令哈梅内伊反感的是，穆萨维公开宣称自己才是政府实际的领导人，总统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哈梅内伊两度向阿亚图拉霍梅尼要求找个比较圆滑的人来取代穆萨维，但两度遭到最高领袖拒绝。基于某种理由，穆萨维被视为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得宠的儿子以及哈梅内伊的对手。

穆萨维是一名年轻的世俗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建筑师与报社编辑。他的妻子札赫拉．拉赫纳瓦尔德是著名艺术家，与沙里亚蒂关系密切。一九七〇年代，穆萨维也是侯赛因宗教会所的常客，但并不认同沙里亚蒂的反教士思想，因此他

不像圣战者组织以及其他追随沙里亚蒂反教士思想的人那样走向灭亡。相反地，穆萨维成为贝赫希提的盟友与副手。革命后，贝赫希提带头攻击自由派人士并协助将「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写入宪法。教士们多次逼迫巴尼－萨德尔任命穆萨维担任外交部长，但巴尼－萨德尔以穆萨维是激进分子而且是敌对阵营的成员为由加以拒绝。巴尼－萨德尔流亡后，穆萨维短暂主掌外交部，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引进教士的禁欲风格，移除了手工地毯与会议桌椅[6]。

穆萨维是民粹主义者，他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商品与劳务，包括教育与医疗。他不顾市集商人的反对，支持将所有对外贸易国有化，而哈梅内伊代表的正是市集商人的利益[7]。穆萨维担任总理期间，与他共事的人回忆穆萨维虽然无趣，却是个有效率的官员，他在一个杂乱的体制里致力推动政策，这个体制有部分是国会，有部分是神权政治，而且还充斥着阴谋诡计。

穆萨维在公开场合的形象较为鲜明。他是阿亚图拉霍梅尼激进外交政策的门面，拒绝联合国调停与伊拉克停火，而且威胁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它们继续对抗伊朗，「战火将会延烧到它们身上」[8]。穆萨维还表示，以色列是个「恶性肿瘤」[9]。一九八五年，苏莱曼．哈特，一名埃及边境警官，他在西奈射杀了犹太观光客一家人，四名孩子、两名妇女与一

名老人死亡。后来哈特在狱中上吊自杀，伊朗国家广播电台引用穆萨维的话说：「为了表彰这个伟大人物的勇敢抵抗，我们将以他的名字为德黑兰的街道命名。」[10]在学生攻占美国大使馆四周年纪念日上，穆萨维站在大使馆围墙岗哨的屋顶上发表演说，赞扬学生公开文件揭露革命的「自由派」敌人，他指的肯定是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11]。

但是，穆萨维这一切的作为并未使他在政治同侪中胜出。他担任的职位都很一般，有时他高喊的口号不过是重复阿亚图拉霍梅尼说过的话。不仅如此，在他担任总理期间，没有人想得到日后他会成为已经消逝的革命希望以及民主改革运动的象征。他的转变呈现的与其说是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本身，不如说是伊朗历史快速转换的潮流，这股潮流不止一次而是两次，透过穆萨维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穆萨维、哈梅内伊与搅局的拉夫桑贾尼之间，阿亚图拉霍梅尼扮演的角色非常类似前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他不是大公无私的仲裁者，而是巧妙的平衡者。霍梅尼的视角就像奥林帕斯诸神，不是来自于人类的才智或政治的中立，而是来自于他对自己一手创立的政府形式的持续与稳定有着超乎一切的关心。即使霍梅尼未将胜利交给对手，也没有任何派系能取得胜利。在经济上，霍梅尼从左翼转向右翼，又从右翼转回左翼，他关注的与其说是最终的经济结构，不如

说是确保这三个权力掮客都能在政治上存活下来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取得胜利。

总之，不管对派系领导人还是对霍梅尼来说，一九八〇年代都是逆转与妥协的十年。革命分子没有统治经验。他们带着意识形态热忱担负起任务，最终却无法对急迫的实际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政治胜过了意识形态；但政治人物努力用革命的色彩来包装自己的实用主义，藉此消除已动员群众的疑虑，并且防止群众的矛头转向政权本身。

伊斯兰共和国悄悄进行实用主义的最清楚明证或许是伊朗门事件，在这起事件中，缺乏美制武器零件及新机型的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秘密进行交易。美国人透过以色列人提供武器给伊朗，换取伊朗协助确保伊朗代理人在黎巴嫩劫持的美国人质获释。当秘密协议的内容曝光时，穆萨维与拉夫桑贾尼极力否认报导的细节，并且宣称他们对于伊朗的两个死敌有着难以平息的仇恨。

伊斯兰共和国一直以来的趋势在一九八八年形成政策，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布伊斯兰教令，明确将政治置于意识形态乃至于宗教之上。霍梅尼宣称，「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存续是伊斯兰共和国的首要之务。在统治者的裁断下，政权的利益甚至凌驾于斋戒、礼拜与每年到麦加朝圣这些伊斯兰教

的指示之上。霍梅尼的伊斯兰教令是个赤裸裸的权力主张。

霍梅尼肯定觉得自己即将面临一个岌岌可危的时刻。伊朗的资源已经枯竭到了极限——穆萨维估计军事预算将会归零，而军事领袖私底下告诉霍梅尼，伊朗需要现役军队七倍的数量才能击败伊拉克拥有西方武器装备的军队[12]。此外，波斯湾的一艘美国军舰才刚击落一架伊朗民航机，机上二百九十人全部罹难。美国宣称这起事件纯属意外，但德黑兰方面则不这么认为——伊朗政治人物怀疑，这起事件很有可能是美国直接介入战争的前兆，这将使战争更加昂贵与更难以取胜。伊朗当局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抑或只是利用这个说法来做内部宣传，至今仍有争议。因为此时的霍梅尼不让民众讨论这场被他神圣化的战争。为此，他不仅需要掌握所有的权力，还要能说服民众相信国家利益要比神圣命令来得重要。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霍梅尼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与伊拉克停火。在向民众解释他的决定时，最高领袖吟咏说，我们本来是更能够忍受死亡与殉难的，但政治与军事专家却认定这场战争已无法支持下去。「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难以接受，」他对他的「革命儿子们」恳求说，「但这对你们的老父亲而言不也同样难受？」[13]霍梅尼强调，他不仅以伊朗的国家利益之名，也基于他的宗教责任同意停火：「做这个

决定要比吞下毒药更致命，」霍梅尼说道，「我服从真主的意旨，并且喝下这帖毒剂以符合祂的心意。」[14]

阿亚图拉霍梅尼不知道的是，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开始，他已迈向生命的最后一年。但八十五岁高龄的他，随着癌症病情的恶化，肯定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而随着他的逝去，所谓的后革命伊朗第一共和时代也将终结。

战况的危急与人员战死的稀松平常，已无法激起或唤起民众为国牺牲。革命卫队与巴斯基将返回后方，他们必须恢复正常生活。经济需要大规模重建，甚至可能需要外国投资。面对这些状况，激进主义完全帮不上忙。霍梅尼需要社会与伊斯兰左翼停止争端。但他也必须安抚这些力量，因为伊斯兰共和国仰赖这些力量与国家的统一。

因此，霍梅尼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他采取两个最显眼而极端的行动的一年。其中一项行动是对外公开的，那就是一九八九年二月颁布的伊斯兰教令，要求处死写下亵渎小说的小说家萨尔曼．鲁西迪。这个教令在西方激起强烈的反对声浪，也让穆萨维派系士气大振，他们在国会立法要求终止与率先出版该小说的英国的外交关系。但是，就伊朗国内政治的脉络来说，鲁西迪事件与其说是为了肯定革命的坚定态度，不如说是一场用来转移注意力的余兴节目，好让国家能顺利

过渡到由技术官僚主导的重建时代。

霍梅尼另一个从结果来说影响更为深远的极端行动发生在伊朗监狱铁丝网高墙内。这个行动发生的时点与极端性将使历史学家困惑不解，也在伊朗全民心中留下创伤。

在德黑兰最西北部的地区，在一个住宅巷弄陡峭与道路蜿蜒的怡人中产阶级小区里，埃温监狱宛如幻象。这座巨大监狱建筑群所在的地点笼罩在一片褐色阴影之中，这块外观鄙陋的无人地带，看似毫不引人注意，却长满植物，从外围到监狱本身，甚至还要走上一大段路。从灌木丛的缝隙隐约可见栅栏与守望塔，但这些设施也可能被误认成别的东西。走了一会儿，道路便开始爬升到山腰的一处公园，这座公园被小溪一分为二，溪边搭起了一排排闪闪发亮的水果摊与铺有地毯的露天茶馆。

一九七一年，当巴列维国王察觉自己的政权正处于危急存亡边缘时，他在此地兴建埃温监狱，关押了三百二十名囚犯。一九七〇年代初，巴列维国王在全国各地总共囚禁了多达七千五百名政治犯。在这些政治犯当中，许多人未来将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巴列维国王的监狱严酷凶残，而且还变本加厉，埃温监狱尤其恶名昭彰。讯问者用打结的电缆抽打犯人的脚掌，这种刑罚称为笞刑。神经电击可以从

脚底一路传到大脑，永久性地损害肾脏与神经系统。遭受刑求的受害者无法想象世上还有比伊朗监狱更糟糕的地方。

到了一九八三年，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略微扩大的埃温监狱监禁了一万五千名犯人。原本只能容纳十五人的牢房，现在却关押了七十五人；就连走廊也挤满蒙上眼睛的犯人。巴札尔甘的前副总理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有两年半的时间待在一间囚室里，囚室挤满了人，因此大家必须轮流在地板睡觉，每个人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15]。

这些不幸堡垒的住民有着新的入住理由。伊斯兰共和国认定某些行为是犯罪行为，甚至针对这些行为制定了死刑，例如叛教、喝酒、「侮辱先知」与「违反贞洁的罪行」，包括婚外性行为与同性恋等等诸如此类。被指控「播下腐败的种子」或「向真主宣战」的犯人也要面临处决的命运。其中后者被伊斯兰律法定义为持有武器造成国内不安，但在伊朗刑法下，它的定义被扩张到包括任何武装异议团体的成员，即使被告从未持有任何武器。巴哈伊教信徒是伊朗人数最多与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他们被冠上捏造的罪名，被判处长期徒刑。许多人遭到处决[16]。

阿萨多拉．拉杰瓦尔迪是埃温监狱典狱长兼德黑兰检察官，他过去是一名布匹商人，曾在巴列维国王执政时代因试

图炸掉以色列航空（El Al）办公室而被送到埃温监狱服刑。拉杰瓦尔迪戴着超大的塑料框眼镜，眼镜刚好遮住他那两道拱形的黑色浓眉；他跟真主党信众一样满脸胡渣，五官似乎朝着下巴的方向集中。他把自己的家人全带到监狱里居住，表面上是因为他对自己管理的机构感到自豪，但之后则是为了防备可能的行刺，因为拉杰瓦尔迪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十年压迫中最严酷的同义词。

与旧体制不同，伊斯兰共和国禁止刑求与强迫认罪——却允许身体刑罚与「自愿」认罪，最终还是导致相同的结果。埃温监狱的管理人员由革命卫队担任，讯问者则是年轻教士与神学院学生。他们的任务是从每个政治犯口中得到自行认罪的「访谈内容」。讯问者会抽打犯人的脚掌、剥夺他们的睡眠、将他们泡在水里以及假装要处决他们，直到他们同意接受访谈为止。他们会扭转并且打断犯人的前臂与手掌，将锐器插进他们的指甲里，并且威胁要对他们的家人不利[17]。埃米尔恩特札姆被单独监禁了五百五十五天，曾经三度被蒙上眼睛带到处决室。有一次，他还在处决室里坐了两天。一九九四年，他估计自己已经看到数百名犯人死亡或被逼疯[18]。另一名曾经被关在埃温监狱的犯人回忆自己的脚踝被绑起来倒吊在天花板，鼻子与嘴巴则被塞进自己的便盆里[19]。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什么也闻不到，也尝不出食物的味道；他

不断地呕吐，几乎差点饿死。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有超过七千九百名伊朗政治犯被处决——至少是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九年被杀人数的七十九倍[20]。

除了处决，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初，认罪似乎成了重点所在。整个过程经过细心规划，在埃温监狱两层楼的礼堂里，在犯人的观看下上台拍摄，然后在整个一九八三年秋天，利用两小时的黄金时段进行播放。错过电视或广播的人可以阅读文字稿，这些文字稿被汇集成小册子，称为黑色报告卡。绝大多数认罪者是圣战者组织成员或左翼分子。他们甚至被迫抨击他们最亲近的人：丈夫、子女、父母、朋友。有些上台的人显然已经疯了，他们人格分裂、歇斯底里或狂笑不止，或恳求监狱人员杀了他们。

认罪过程不是为了用来说服，而是用来证明反对势力的破产与当权者拥有不可抵抗的力量。当知名的政治犯悔罪时，尤其会让他们的追随者颓唐丧志；有人说：「那就像看到真实的死亡一样令人痛苦。」[21]另一个人写道，圣战者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派系领袖认罪的那天晚上，「大家的内心好像有什么东西断裂了。我们从来没想到像他这样有名望的人会在众人面前跪下。有人评论说，那就像看到一个人吃自己的肉一样令人作呕」[22]。

对于一些悔罪者来说，公开认罪只是他们向过去反对的政权服务的开始。此后，他们完全在监狱人员的掌控之下，与其他人一起被关在过度拥挤的牢房里，他们监视他们之前的伙伴，并且将其他的犯人送上绞刑台。这些悔罪者被称为塔沃布，他们的道德形象在刑求与共谋下遭到损毁。塔沃布要比其他犯人享有较好与较多的食物、较轻的刑期，而且可以到监狱的工场工作；狱方设立了特殊的悔罪者团体与一份称为《悔罪者讯息》的报纸[23]。但塔沃布为了这些小特权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可弥补的。这些人成了伊朗人想象的代表人物，一个人性沦丧的图腾，大家固然对于狱方为了逼迫他们这么做而对他们施以虐待感到不平，但他们的所做所为依然引发广泛的怨恨。

在霍梅尼的核心圈里至少有两名教士因为某种原因得以亲眼目睹监狱的生活，他们对于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不安，于是向最高领袖表达不满。其中一名是司法总监兼司法部长，他带着被刑求的受害者去见阿亚图拉霍梅尼，并且描述他们的遭遇。另一个人则曾被指定为霍梅尼的最高领袖继任人选。

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或许是在世的阿亚图拉中，唯一一位地位与学识足以与霍梅尼匹敌的人。蒙塔泽里也曾致力发展「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理论，而且游说将这个理论规定在宪法之中。但蒙塔泽里的情感或性格却与霍梅尼迥然

不同。蒙塔泽里成长于贫穷的农村，他一直维持着年轻时的说话腔调，因此一些受过教育的人有时会把他当成丑角。蒙塔泽里的塌鼻子上戴着看似聪明的眼镜，他面无表情时脸上也隐隐泛着笑意。他在外交政策上是个激进派，主张伊朗必须干预黎巴嫩与阿富汗。但他也是个坚定的人权捍卫者，认为人权是最基本的原则。

一九八〇年代中的某个时期，霍梅尼免除了拉杰瓦尔迪的埃温监狱典狱长职位，改由蒙塔泽里主掌伊朗的监狱体系。蒙塔泽里任命的监狱人员对于拉杰瓦尔迪的手下留下的烂摊子深感厌恶。有人提到前任的监狱人员「简直是疯子」[24]。在蒙塔泽里的监督下，联合国与伊朗国会的观察员获准进入监狱，犯人终于可以获得家人探视，可以洗热水澡与使用肥皂，有放风时间，可以抽烟，有语言课程，有文具可以书写，可以讨论政治，以及可以阅读非宗教书籍。强制的公开悔罪与礼拜改成简短的「悔过书」，为了解决过度拥挤的问题，蒙塔泽里的同事释放许多塔沃布以及已服完刑期但还没悔罪的囚犯。到了一九八六年年中，埃温监狱的政治犯拒绝因恐怖而产生的疲惫，他们组织了绝食抗议，成功要求从他们的牢房里移走更多的塔沃布与一般囚犯[25]。

圣战者组织成员在监狱中占压倒性多数，蒙塔泽里对这些人的责难并没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他的儿子在圣战者组

织策画的爆炸案中身亡，当时被炸死的还有贝赫希提。但蒙塔泽里看待伊斯兰共和国的方式与霍梅尼、执政党以及三大派系有明显的差异，他认为：伊斯兰共和国是公义的，也是脆弱的，它的内部纷扰不安，它参与了不可能获胜的战争，而乌托邦的希望可能维持也可能摧毁他们建立的这个太过人性化的国家。包括霍梅尼在内，首脑们逐渐显露的务实主义，在外交政策上可能带来稳健的影响，但在内政层面，这种务实主义却违背了革命最深切的渴望，也就是维持伊斯兰共和国的存在，而它最终既违反了伊斯兰主义，也悖逆了共和主义。蒙塔泽里和其他人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

一九八六年，霍梅尼写信给蒙塔泽里，对于他在监狱采取的宽大做法表示不满，此时距离霍梅尼指定蒙塔泽里为接班人才一年的时间[26]。最高领袖惋惜说，蒙塔泽里受到政权内部批评者太大的影响，而他喜欢公开谈论这些人的负面观点也不适当。此外，霍梅尼暗示蒙塔泽里对于圣战者组织的态度软弱，他宣称释放圣战者组织囚犯已经导致了「爆炸、恐怖与窃盗」。

一九八七年年底，霍梅尼开始将监狱重新交给拉杰瓦尔迪。昔日的监狱人员怀抱着被辞退时酝酿的报复心态返回监狱。拉杰瓦尔迪宣称，在蒙塔泽里管理期间，圣战者组织成员——强硬派用 monafiqin 这个谐音字来称呼他们，意思

是「伪善者」——受到温和的待遇，「违反了伊斯兰的利益权衡」[27]。

事实上，这一次圣战者组织几乎完全从伊朗的国内场景消失。伊朗当局宣称九成的圣战者组织成员都被关进牢里[28]。圣战者组织领袖，包括马肃德．拉贾维，已经于一九八一年与巴尼－萨德尔一起逃往巴黎。这样的距离让这些领导人无法产生影响力，而圣战者组织的普通成员许多早已放弃运动，他们期盼在出狱后重拾宁静而平凡的生活。

但在一九八六年，马肃德．拉贾维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前往伊拉克，为他所谓的伊朗民族解放军建立行动基地，这支由流亡者组成的杂牌军获得萨达姆．侯赛因支持。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霍梅尼宣布停火的两天后，伊拉克军队从北中南跨越伊朗国境，为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做最后一次努力。民族解放军参与了这次行动，在伊拉克空军掩护下，据说他们派出了七千名战士，代号是「永恒之光」（Eternal Light）[29]。

圣战者组织曾一度在伊朗人当中掀起消极的支持，民众认为圣战者组织是教士统治之外最有可能的选项。青少年尤其受到这个团体的吸引，他们觉得圣战者组织是唯一能制衡革命激进乌托邦主义而且愿意以武力对抗神权统治的反对

力量。但是，反对革命采取的路线，乃至于躲在德黑兰街垒后面对抗真主党是一回事，与无情的外敌连手推翻自己的政府又是另一回事。圣战者组织在一场威胁伊朗将近十年的战争中与萨达姆．侯赛因结盟，使它彻底失去伊朗民众的支持（随着时光流逝，在沙漠烈日无情曝晒下，圣战者组织逐渐沦为不祥而危险的狂热崇拜）。

在切断补给线以及以炮舰机进行攻击下，伊朗人轻易击退了入侵者。但霍梅尼与圣战者组织的冲突还没结束。霍梅尼要报复的不只是战场的俘虏，还包括从过去到现在同情圣战者组织的人：那些被关在拥挤监狱里的犯人，以及那些最有可能在入侵后不久从监狱收音机听到伊拉克入侵消息的人。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病弱的阿亚图拉发布伊斯兰教令，批准了一项二十世纪的重大罪行，不过这个罪行在伊朗恐怖阴暗的孤立中几乎未曾被提及。

在霍梅尼的命令中，「全国各地监狱凡是仍坚定支持伪善者的人，都将视为向真主宣战并且将予以处决」。「真主之敌」将交由受信任的国家官员快速审理然后判处死刑。霍梅尼在德黑兰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在各省选任类似的委员会。霍梅尼在写给委员会的信件上说道：「我希望你们以革命的愤怒与仇恨来对付伊斯兰之敌，如此方能取悦全能的真主。负责做出决定的先生们不能有些许犹

豫，不能显露任何的怀疑或担忧，必须试着以『最残暴的手段打击异教徒』。」在响应司法首长的问题时——伊斯兰教令是否涵盖尚未审判以及已经执行部分刑期的犯人，霍梅尼解释说：「在上述这些案例中，如果犯人在任何阶段或任何时间仍维持支持伪善者的立场，他的刑罚就是死刑。立即歼灭伊斯兰之敌。面对这些案件，要穷尽一切手段加速判决的执行。」[30]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早上，犯人的家属蜂拥到监狱门前，他们每两天就会来这里一次，要求探视或打听自己亲人的消息。但监狱的大门紧闭，家属没有得到一句解释就被迫离开。大门另一边的犯人，没有电话、信件、包裹、电视或收音机——甚至没有药品，病人也不许送往医院。监狱的各个区块都被隔离起来，公共空间也被封闭。所有的犯人彷佛都被大地吞没了。

一个接一个，从圣战者组织成员开始，犯人被带到三人死刑委员会面前，询问他们的立场。如果犯人说「圣战者组织」，那么他就会立刻被送上绞刑台。如果他说「伪善者」，那么他们会追问他：是否愿意在摄影机面前抨击他的伙伴？是否愿意将绞索套在圣战者组织积极分子的脖子上？是否愿意揭穿虚假悔罪者的真面目？是否愿意为了伊斯兰共和国穿越雷区？只要对一个问题提出否定的答案，受害者就会

被迫写下遗嘱，丧失所有个人的财物，例如戒指、手表与眼镜等等。然后他将被蒙上眼睛，送往行刑场。

左翼分子的审问排在圣战者组织之后，他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是确认：他们是不是叛教者？犯人是不是穆斯林？他是否愿意公开宣示放弃历史唯物论？他是否会在斋戒月斋戒？他的父亲是否礼拜、斋戒与阅读《古兰经》？无论如何，穆斯林只有在他的父亲遵守伊斯兰的教规时，才有可能是叛教者；这表示他从孩提时期就已经拒绝养育者的教导。成长过程并未受过这类教导的人大致上可以获得饶恕，如果他们接受鞭刑与强制礼拜的话，就有赎罪的机会。女性左翼分子也是如此，因为女性不被视为是有自主权的成人，因此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几年后，这些幸存者的目击描述将像笔形小手电筒一样被用来探索那年夏天那几个星期被精心隐匿的事实。

在埃温监狱，根据一名前监狱官员的说法，从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五点，每半个小时就有堆高机将囚犯运到六辆起重机上绞死[31]。一九八八年整个七月与八月都在重复这样的过程。行刑官埋怨工作过量，并且要求改以枪决方式执行，但沉默与秘密乃是这次行动的关键[32]。卡拉季位于德黑兰附近，有些犯人曾经被关在这里的戈哈达什特监狱，他们日后回忆，在准备行刑之前，监狱里来了冷冻货车，在监狱工作的阿富

汗人不断打手势，警告他们即将遭到绞死[33]。根据埃温监狱的幸存者扎伊尔德．埃米尔西兹的说法，行刑的惨绝人寰甚至让狱中最狠心的刑求者也受到创伤：「哈吉．阿姆贾德是一名警卫……，以脾气暴躁与残酷闻名，在大屠杀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不大爱理人……。另一个刑求者穆罕默德．阿拉巴赫希状况也很类似。」[34]

没有人知道一九八八年夏天有多少犯人被处死，但一般估计的数字集中在四千到五千人左右。唯有伊斯法罕是例外，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仍掌控这里的监狱体系，所以这里的犯人才幸免于难。蒙塔泽里日后估计圣战者组织成员在全国各地被杀的人数在二千八百到三千八百人之间，左翼分子大约是五百人[35]。加上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已经处决的数千人，这个数字——以及对长期关押的人犯进行有效率而毫无道理的杀戮——已足以让民众感到颤栗与恐惧。

死者的家属在十一月开始大批接到通知，但当局不让他们进行传统的四十天哀悼仪式。许多受害者被埋在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里，而且遗体也被放在专属于被诅咒者的地方。在德黑兰，当局挖掘巨大的壕沟，然后将尸体填进去，但掩埋的位置太接近地表，有目击者回忆曾经看到地面弃置着人骨与个人物品。埋葬的地点有安全部队严密巡逻，他们禁止家属触摸或坐在地上[36]。

为什么，在他生命的末尾，在战争结束的那个星期，以及在他击败所有教士统治的大敌的七年后，阿亚图拉霍梅尼亲自下令犯下永远让伊斯兰共和国蒙羞的人道罪行？历史学家埃尔凡德.亚伯拉罕米安猜测，监狱的大屠杀是一场「血的洗礼与自我实施的整肃」：这么做可以清除意志不坚之人，留下的统治菁英将对霍梅尼设计的体制立下血的誓言[37]。至今还没有人想出比这更好的解释。

霍梅尼与他的手下尽可能地延长革命的时刻，首先是动员支持者对抗政权的内部敌人——自由派、左派与圣战者组织，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敌人，也就是美国；之后则是动员伊朗人民发起对抗伊拉克的殉难与牺牲的战争。如果狂热、恐惧与霍梅尼的个人魅力结合起来让国家气氛充满神圣目的，那么这股气氛的消散将使整个国家在除魅与揭露之后化为一片焦土。或许霍梅尼害怕伊朗的复员，他觉得必须采取激烈措施才能支持伊斯兰国的存续，并且排除一切疑虑，清楚表明「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永久性与全面性。

藉由监狱大屠杀，霍梅尼让他的政权支持者都成了共犯。根据霍梅尼预定的接班人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说法，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总统与总理都不知情。但在事情发生后，政权的核心圈便为这次行动辩护。国会议长拉夫桑贾尼宣称只有一千名政治犯被处决，这个数字既非真实，也不能为自己

脱罪[38]。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总统哈梅内伊表示，被处决的犯人与民族解放军有「连结」：「你认为我们应该发甜点给狱中那些与在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发动武装攻击的伪善者有接触的人吗？如果这些人与这类组织早有接触，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他们？这些人应该被判死刑，而我们将会处死他们。我们不会轻易看待这种事。」[39]总理穆萨维也认为，这些犯人被处决具有正当性，因为他们涉及了阴谋。

只有蒙塔泽里拒绝做出制式响应。他基于道德本能而对虐待犯人感到厌恶，而他也不做任何政治算计一贯地反对虐待的行为。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蒙塔泽里写信给阿亚图拉霍梅尼，信中提到处决在战场上俘掳的圣战者组织成员固然没错，但在监狱里关押数年的囚犯显然对入侵的事一无所知。他列了九个理由给霍梅尼，希望他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包括「处决已经被我们的法院判处死刑以外刑罚的人，没有任何程序或新的审判，完全漠视所有的司法标准与裁决，将对政权产生不良的影响」[40]。

当这封信未能阻止处决时，蒙塔泽里又在八月四日寄了一封信。这位预定的接班人向霍梅尼表示，一名在省监狱担任死刑委员的省宗教官员前来见他。这名官员感到苦恼，因为一名犯人在委员会面前大力抨击圣战者组织，但当被问到是否愿意走过雷区时，他回答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过雷

区！此外，你不能对我这样的新穆斯林有这么高的期待。」委员会的情报官员不顾这名宗教官员的反对，将这名犯人判处死刑。蒙塔泽里表示，这名情报部官员控制整个流程，完全凌驾于同事的宗教判断之上。蒙塔泽里写道：「阁下可以看到哪一种人正在执行您的重要指令，数千名犯人的性命因此深受影响。」[41]

终于，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蒙塔泽里直接向德黑兰的死刑委员会陈情。

蒙塔泽里写道：「我受到伪善者的打击比你们都来得大，在监狱以及在监狱以外都是如此。我的儿子因为他们而殉难。如果是为了报复，我应该比你们更为积极。但我寻求权衡利益的做法以及革命、伊斯兰、最高领袖与伊斯兰国的利益。我担心后世与历史将如何评判我们。」

蒙塔泽里提到，许多犯人因为在狱中受到虐待，因而坚决反对政府。他们的信仰不是犯罪，他们的领导人叛教不代表他们也叛教。蒙塔泽里担心他即将接掌的国家的法治状态：「我们在伊斯兰法学中学到的，在处理人民的鲜血与财产时必须小心谨慎，这些难道是错的？」他质问：「你们是根据什么标准处决一个在此之前并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你们现在不准家人访视与打电话，但明天你们要怎么回复他们的家

人？」

在无可反驳的最后一个段落里，这位激进的阿亚图拉与「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共同作者提出了支持言论自由的主张。蒙塔泽里写道：「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不是个人，他们是意识形态，是世界观，是逻辑形式。要响应错误的逻辑，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杀戮无法解决问题，只会扩大问题。」[42]

虽然蒙塔泽里的陈情得不到响应，却还是不放弃。十月，他写信给总理穆萨维，提到逮捕与处决只会疏远人民，而人民是革命的资产。蒙塔泽里要求总理为此事负责，因为人称「可怕的阿亚图拉」的情报部长穆罕默德．雷沙赫里技术上来说是穆萨维的下属，蒙塔泽里写道：「我们对许多人造成的不公义将难以恢复，因为主掌安全与情报部门的官员心地褊狭、严酷与不近人情。」[43]

但这些反对意见不仅未能拯救任何人的性命，甚至断送蒙塔泽里自己的政治生涯。阿亚图拉霍梅尼指控蒙塔泽里同情巴札尔甘底下那些被击败的自由派分子，他表示，自己绝不会让政府落入这些人手里。霍梅尼剥夺了蒙塔泽里接掌最高领袖的资格，他在信中表示：「你缺乏担负最高领袖责任所需的坚忍。」[44]

这位一度可能成为未来最高领袖的人物退出政坛，但保留了霍梅尼下令处决的伊斯兰教令，上面留有领袖个人的印记，还有他自己提出的反对信件，以做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依据。往后数十年，虽然蒙塔泽里遭受的苦难并未停止，其行为却成为深刻而不朽的楷模，他的信件也成为围城下散发人性光辉的护身符。

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去世前两个月召开会议修改宪法。虽然激进派进行了猛烈的反抗，但保守派还是成功废除总理一职，将行政权集中在总统手里。修改后的宪法也规定，下一任最高领袖不需要像霍梅尼与蒙塔泽里那样具备大阿亚图拉的身分，但必须是个伊斯兰法学家，「拥有适当的政治与管理长才」[45]。拉夫桑贾尼赞同这项决定，他指出，要当上大阿亚图拉需要花费将近一辈子的时间，这样会让潜在的领袖人选过于年老，缺乏必需的精力来领导国家[46]。于是「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这项制度从精神领袖的领域降格为政治管理层面，而这也引发另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袖具有庞大的权力却又无须负责的现象是否仍具有正当性。但眼下这似乎不是最急迫的问题。

会议处理的下一个决定是最高领袖是由一人还是由三人会议担任。这两个选项都是宪法允许的，但过去曾有一名教士对此做出解释：「我们需要一个凝聚人民感情的焦

点……，人民如何能喊出『喔，领袖会议，我们是你们的士兵』这样的口号？」[47]当决定由一个人来接任霍梅尼最高领袖的位子时，穆萨维派系的激进分子开始游说由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继承他父亲的衣钵。但他们还是输了这场战争，总统哈梅内伊成为同情两派的教士妥协下的候选人。由于哈梅内伊不是拥有许多随从的大马尔贾——他只是称号为霍贾托尔－埃斯兰的中级教士，各方政治人物都误以为哈梅内伊是个容易操弄的对象。

哈梅内伊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追上霍梅尼的威望。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数十万名伊朗人涌入德黑兰街头，他们有些人还搥胸、划伤自己的脸颊来哀悼霍梅尼的死亡。有八个人为了触摸他的遗体而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更多人因此受伤。「我们成了孤儿!」群众吟咏道。群众甚至一度在推挤中让最高领袖的遗体摔出棺材，他们争抢裹尸布做为纪念品，裹尸布因此被撕成碎片。众人还跳进尚未封土的墓穴里。艾哈迈德．霍梅尼被打趴在地上。最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遗体终于得以安息，他安眠的地方盖起了巨大的陵墓，幽暗的现代神龛将成为穿越德黑兰市郊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旁一座闪闪发亮竖立着尖塔的地标。

哈梅内伊以谦卑的身段继承霍梅尼的位子，这种态度不仅是文化，也是环境使然。「我是个有着许多缺点与瑕疵的人，

事实上，我只是个卑微的神学院学生，」哈梅内伊在就职演说上说道，「然而，责任落在我的肩上，我将尽我所能与对全能真主的信仰来履行这个重责大任。」[48]

在这个沉重压力下，即使是比哈梅内伊更显赫的人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哈梅内伊日后的发展将比许多人想象的来得更加卑微。哈梅内伊也将成为一个脆弱而顽固的人——许多分析家推测，最高领袖这个角色是造成他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霍梅尼去世才两个月，拉夫桑贾尼就被选为总统。穆萨维已无任何行政职可以担任，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也不让国会里剩余的激进派人士担任公职。往后八年，伊斯兰左翼支持者只能在刊物、大学与报纸的政治荒野漂泊流浪。这些人在这些地方的遭遇将成为往后故事的重点。

第二部　重生

第五章　扩大与限缩

阿克巴尔．甘吉回忆这场革命就像爱情，让他对一切感到盲目，在他的内心视野只看到乐园，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伊斯兰共和国。在革命动荡期间，也就是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甘吉相信自己获得了唯一真理。往后几年，他认为基本教义派就是代表唯一真理的信仰。到了一九八九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不是乐园，而甘吉也不再是基本教义派。与

许多前伊斯兰左翼成员一样，甘吉成为流浪者。

被赶出权力核心后，伊斯兰左翼好战分子转而从哲学、社会学与政治理论寻求新的答案，来解决他们原本仰赖沙里亚蒂与霍梅尼解答的问题。他们组织智库与创办期刊，开始忙乱而勤勉地努力，几乎是从零开始。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存在？他们如何区别真主的作为与真主的作为反射在他们眼中的影像？对于像阿克巴尔．甘吉这样的人来说，革命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会不断修正，甚至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甘吉不知道，这样的观点将使他从忠诚的伊斯兰共和党马前卒转变成全国反抗势力的偶像。

个子矮小而动作矫健，散发着欢乐气息的深色眼睛与生动的嘴巴，甘吉于一九六〇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并且在德黑兰南部的贫困小区长大。他的母亲带着他到清真寺，也带他参与宗教庆典。伊斯兰信仰是甘吉家族共通的联系。德黑兰南部破败而拥挤；在城市的北部，富裕的阶级居住在山丘上，居高临下，俯瞰着被令人窒息的烟雾笼罩的市区。一九六〇年代，德黑兰是一座人口刚超过两百万的城市，还不到二十世纪末德黑兰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城市里处处可见严重的社会裂痕。甘吉由于憎恨自己遭遇的不平等而萌生政治意识，他受到沙里亚蒂的观念吸引，沙里亚蒂认为真正公义、平等的伊斯兰社会曾经存在，而且可以恢复。在一

个称为儿童与青少年智性发展机构的地方，与同世代许多人一样，甘吉在这里的图书馆发现萨玛德．贝赫朗吉与《小黑鱼》以及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的作品。甘吉与他的伙伴离开父母的传统清真寺，前往他们自己的政治清真寺，这里充满沙里亚蒂阿里伊斯兰教的演说以及从遥远的阿尔巴尼亚与拉丁美洲传来伊朗的左翼思潮。

一九七〇年代晚期，甘吉成为邻里的青年领袖，他组织罢课与示威抗争，散发沙里亚蒂的书籍以及霍梅尼演说的录音带与小册子。甘吉与其他年轻好战分子在市集组织罢工，如果商人不愿关闭店铺，他们就采取威胁手段。当革命分子成功推翻雷札沙，而信仰者委员会攻入兵营夺取武器，建立忠于霍梅尼的革命卫队时，十九岁的甘吉是第一批加入者。

甘吉是在伊斯兰思想与艺术中心——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的艺术据点——向革命卫队提供文化研讨课程时遇见了穆斯塔法。这两个人建立了友谊，甘吉因此与革命的思想尖兵接轨。从一开始，甘吉的机敏与淘气就使他与革命运动有所区别，但他仍拥护运动的正统性。在身为作家与活动分子的传奇生涯中，甘吉对任何人从未有过模糊的态度，同样地，也没有任何人对他有着模棱两可的评价。对他的支持者来说，甘吉是个无所畏惧的自由思想家；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鲁莽而极端。但无论甘吉一生中如何转换立场，他与穆斯

塔法的友谊一直维持不变。

即使在革命卫队内部也存在着派系，而且在意见上有着潜在的致命差异。甘吉隶属的团体认为自己是左翼分子与伊斯兰主义者，而这个团体与革命卫队指挥官以及教士不和。甘吉日后提到，当时他已经远离革命主流，因为他读了汉纳．鄂兰的《论革命》，这本书在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翻译成波斯文。从鄂兰对法国与俄罗斯历史的描述，甘吉看到当前伊朗的阴暗面，他开始对革命伊朗的未来感到担忧。

《论革命》写于一九六三年，鄂兰在书中提到法国大革命与随后受法国大革命启发的几场革命，她认为这几场革命是失败的，因为这些革命释放出阶级狂热的力量，使社会正义的追求取代了自由的追求。穷人的急迫需要激励了革命分子，而旧体制赤裸裸的腐败则刺激了穷人，两者于是诉诸恐怖。对比之下，美国独立革命从未表示要解决「社会问题」或动员下层阶级，美国独立革命的领导人也没有忘记对人类自由的追求。最终，在革命研究中经常遭到低估的美国独立革命，才是真正依据至今仍存续的宪法建立新政府形式的革命。鄂兰写道：「整个过去革命的纪录清楚显示，凡是以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必将导致恐怖，而正是恐怖让革命走上绝路。」[1] 然而，动员穷人对抗富人，总是比煽动政治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来得急迫而有效。

即使身为革命卫队成员的甘吉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接受了鄂兰的论点，他当时也还未公然偏离伊朗革命与伊斯兰共和党在恐怖、民粹主义与一党专政时期采取的路线。但他确实挑起了政治争端，主要是针对革命卫队指挥官穆赫辛．雷札伊。根据甘吉日后的解释，对于霍拉姆沙赫尔之役胜利后的战争政策，他与盟友提出跟雷札伊不同的看法，而他们认为逐渐介入政治的革命卫队不应该干预政治。他们也担心雷札伊正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保守派对抗伊斯兰左翼。当他们向霍梅尼请愿，希望罢黜雷札伊时，却遭到最高领袖的严厉斥责。

此后，甘吉从军旅生涯转而从事思想事业，而后者显然更适合他。甘吉为穆斯塔法的《宇宙报文化副刊》撰稿，他抨击伊朗的海德格尔派支持的观点与欧洲法西斯主义并无不同。甘吉深信，伊朗哲学家并不真的了解海德格尔；他们从海德格尔身上学到的是如何仇恨西方。

甘吉透过《宇宙报文化副刊》认识了穆罕默德.哈塔米，哈塔米分别在一九八二年与一九八九年出任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哈塔米的部门通常被称为 Ershad，也就是指导部，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部门。在一个高压统治的国家负责监督媒体与文化，指导部其实就是个审查、监视与管控的部门。但同样地，指导部也是让言论自由的狭窄窗口维持开放的部

门。如果在伊朗政府内部有任何人了解与捍卫记者、诗人、制片与剧作家的正当职能，那就是指导部，一个为了包围与防堵这些人而设立的部门。尤其在哈塔米担任部长期间，指导部的官员本身就是文化人士。

哈塔米聘请甘吉到指导部底下的国际新闻处工作。虽然甘吉属于统治体制的一员，却总是想象自己是当中的自由人，一个拥有革命精神的捣蛋鬼，既忠于革命又挑衅革命。甘吉最终被派驻到土耳其安卡拉的伊朗文化中心。他在当地推广他心目中的伊朗革命文化。在那个充满好战精神与派系主义的时期，甘吉的想法与官方的说法相距不远，却曾两度邀请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到安卡拉，而且将索鲁什的作品翻译成土耳其文。

当霍梅尼剥夺蒙塔泽里的接班人资格时，甘吉毫不掩饰他的不满，他认为这会让「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学说蒙上阴影。甘吉日后回忆说，在此之前，他其实已经对这个学说存有疑虑。但在一九八八年，他把自己的反对公诸于世，而伊朗在土耳其的情报人员也把他的象征行为当真：他们向德黑兰总部回报甘吉撕毁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肖像。指导部将甘吉召回德黑兰，一九八九年，他在德黑兰接受调查而且禁止返回安卡拉。

当时，指导部的气氛变得较为紧绷。新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对于自己的权力缺乏安全感，于是在各个部门安插自己的人马，这些人通常是教士：他们的忠诚度无可置疑，目的是充当哈梅内伊的耳目。这些代表人互通声气而且直属于最高领袖办公室，他们因此握有与他们法律上的地位不成比例的权力。即使在指导部，甘吉也觉得自己与同事受到监视。他愈来愈不想投入于政府工作，反而希望将心力放在思想探讨上，而这样的思想探讨对于愈来愈多想进行探索的人来说，也有着全新的急迫性。

在拉夫桑贾尼执政期间，甘吉潜心研读社会学。他阅读马克思、韦伯、托克维尔、哈伯玛斯与涂尔干；透过这些学者与散乱地阅读人类学作品，甘吉逐渐对各式各样的观念、哲学、文化产生兴趣。在这段期间，索鲁什对宗教多元主义的强调引起甘吉的共鸣。甘吉想象真理是一座他试图攻顶的山：这座山被小径环绕着，每一条小径都能通往山顶。

面对这个时期的关键问题——清真寺与国家的关系，甘吉与索鲁什的意见相同。甘吉认为，在宗教国家里，宗教很容易受政治影响。批评国家就等于批评伊斯兰。如果批评国家的人是对的，那么宗教本身就有缺失，甚至可能出现危险；如果宗教不可能有错，那么批评者势必成了叛教者，而叛教者是不可容忍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后者的观点，将自

身定义成唯一真实宗教的保护者。所以，甘吉身为最初的国家批评者，逐渐认为政治不是真主的成果，而是人类的产物。如果伊朗政府是凭借人类双手创造的世俗之物，那么「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根本毫无道理可言。国家的领导人应该由人民选出并且由人民罢免。教士不应该拥有特殊的政治角色。

在总统拉夫桑贾尼主政期间，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发行的新刊物《地平线》大受欢迎。此时的穆斯塔法已没有义务同时刊登索鲁什的文章以及艾哈迈德．法迪德与雷札．达瓦里对索鲁什的回应。虽然稍迟了一些，但《地平线》还是实现了前革命时代的梦想——也就是《地平线》作家们所说的「宗教智性主义」的诞生地，一个既彻底现代又彻底伊朗的观念实验室。

愈来愈多的思想家——几乎全是前革命分子或原本效忠政权之人——会在每个星期三前往《地平线》办公室，一起集思广益为宗教自由主义建立新的愿景。阿克巴尔．甘吉是当中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讨论聚焦在波普尔与索鲁什身上，在许多问题上，参与者——人数达到三四十人——希望由索鲁什担任最后的仲裁者。众所皆知，每次开会，《地平线》圈子里的不同成员都要负责报告，阐述索鲁什哲学的特定面向。透过开会讨论，《地平线》圈子共同理解这些观念并且将这些观念转译成更浅显易懂的政治愿景，例如多元主义、

公民身分与市民社会在伊斯兰共和国里扮演的角色。

《地平线》圈子是刊物发行时期的一个神话，对革命路线感到不安的虔诚年轻人往往怀抱着兴奋之情遥望圈子里的人物。《地平线》的文章十分吸引人，它的关切是抽象的，指导方针往往旁征博引；然而，没有人认为《地平线》的文章晦涩难解或只有学界人士才感兴趣。更确切地说，一般认为《地平线》体现了宗教政治思想的新潮流，匡正了一九八〇年代的专制与暴力，而且为民主与宽容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撰文的思想家都曾经是与霍梅尼政权密切往来的人物。

《地平线》对读者的调查显示，刊物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平均年龄是三十岁。超过三分之一没有大学学历，几乎有一半住在德黑兰以外地区。将近八成说自己是信仰者，从略微虔诚到非常虔诚者都有 2。这个分布与上一个十年的激进派革命学生背景大致相同：年轻人，包括大学生与公务员，来自社会的传统区块。有些人指出，正因为《地平线》寻求革命分子的支持，才使得政府认定《地平线》对于政府本身的正当性构成特定威胁。

一九九一年，索鲁什将自己的文章集结成册，书名为《宗教知识的限缩与拓展》。在世界其他地方，这种以知识论与形

上学为主题的书很可能摆在学院的图书馆里任其腐朽。在伊朗，抽象的语言，无论是诗意的还是哲学的，都是这个国家固有的语言。索鲁什的作品有可能引起民众兴趣。透过这本书，民众终于可以不明言世俗主义而能辩论世俗主义的优点。民众也能质疑教士的权力，而不至于让自己消失在绞刑台上。因此，这本书与其作者对伊斯兰共和国反动势力构成严峻的挑战。

索鲁什的核心洞见既简明又具启发性，其中蕴含的怀疑主义有部分来自于波普尔，有部分则带有神秘色彩。宗教闪闪发亮的内在核心——也就是事物本身——无法为我们所有，我们的双手也无法触及。就像科学真实那样，宗教真实只能透过我们心灵的沉思与我们的知识体系才能为我们所知。所以，我们真正知道的是我们的心灵与知识体系，而我们的心灵与知识体系既不神圣也非毫无谬误。真正神圣与毫无谬误的——也就是宗教本身——是落在井底的璀璨宝石，为了找到宝石，我们要穷尽一生的时间去清除井底的淤泥。

宗教无法说话，只能由人类代表宗教说话，但人类说的话依然只是人类创造的事物。宗教知识与所有的人类知识一样，是主观、可质疑的，而且受到历史脉络的形塑。宗教知识是努力的过程，而非终点。此外，索鲁什从美国逻辑学家与哲学家乌伊拉德．范奥曼．奎因那里得到洞见，认为所有

领域的人类知识都是彼此链接的；索鲁什推断宗教知识也会随着历史环境以及科学与其他理解领域的发展而更改与变迁——拓展与限缩，宗教知识也容易受到其他领域的技术与洞见的影响。所以，虔诚的人不应该害怕人类努力的进展，包括科学在内，甚至应该将这种进展当成具有生命脉动的有机体的一部分而予以支持，事实上，神学也是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

波普尔把这种思维称为「批判理性主义」：这种信念认为人类知识有其极限且不可靠，因此任何对真实的寻求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与集体的努力持续不断地运用理性。索鲁什提到，与上述说法相反的论点——亦即，相信存在着某种真实，可以为特定的人所知——将使某些问题无法解答，甚至连问题都无法提出。为什么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能够在时代变迁中留存下来？为什么神学家在伦理与法律问题上会产生无法调和的意见？此外，这类确实性也贬低了信仰，使信仰成为信仰者在恐惧下承继或接受的事物。索鲁什相信，透过公开辩论与理性产生的信仰是更为优越的信仰。批判性的辩论将使神学更加巩固与真实，反观教条主义只会助长煽惑、投机与贪婪。

索鲁什相信，成为一名批判理性主义者就会成为一名多元主义者，无论在宗教还是哲学领域都是如此。他认为，真

实的宗教是可以指明正确道路的宗教，但同样的道路对每个追求者来说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某个宗教也许对某人来说是真实的，但对另一个人来说，也许别的宗教才是真实的。索鲁什把三大一神教的先知比拟成果园里的果树，每棵果树都会结出自己的果子。

有些人在听到索鲁什的理论之后感到十分激动，对他们来说，索鲁什使宗教从教士的手中解放出来，使政治脱离宗教，信仰摆脱偏见，让理性辩论与批评脱离神学的教条主义。如果没有人有资格代表真主发言，那么宗教就没有理由不准教士以外的人发表意见。宗教思想与其他领域的思想一样，应该开放讨论、批评、辩论与修正。此外，如沙里亚蒂主张的，宗教不应该涵盖政治与其他人类事务，因为宗教知识只是诸多人类事务的一种，本身并不神圣。索鲁什日后说道，沙里亚蒂试图让宗教变得丰满，他则试图让宗教变得苗条。索鲁什认为「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神学基础是薄弱的，因此必须从它的结果来加以判断。此外，根据索鲁什的观点，西方毒害是一种危险的荒谬说法，把盲目的仿效与全然的拒绝当成面对整个西方时唯一可能的响应。在索鲁什的多元主义看法中，一个自信的文化是动态而开放的文化，能够认识到自己有着各色各样耀眼的影响力。

索鲁什在一九八〇年代晚期与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重

要作品与其说和穆拉．萨德拉以及莫塔哈里有关，不如说主要受到波普尔与奎因的影响，尽管如此，索鲁什仍未放弃伊斯兰典籍。事实上，索鲁什引用某些伊斯兰典籍的程度就跟引用波普尔一样广泛，至少在情感上一样能紧密配合。这些典籍来自于穆塔兹拉学派，穆塔兹拉学派是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的理性主义伊斯兰哲学家，他们是自由意志的捍卫者，主张理性先于启示[3]。穆塔兹拉学派认为，真主有目的地创造一个理性的宇宙，好让人类能运用自身独立的能力来认识宇宙。索鲁什也接受这个观点，因此当神学家以「因为那是真主的意旨」这句话来回答恳求者的问题时，索鲁什对此嗤之以鼻。理性的真主不可能创造出无法以价值来加以解释的事物。由于索鲁什认为真主的意旨是理性的而非独断的，因此他相信神学解释应该更仰赖逻辑，而非断然地主张神圣的权威。

穆塔兹拉学派与索鲁什也用同样的观点来解释道德。行动的善或恶，不是由真主的命令或禁止来决定，而是反过来，正因为某些行动是善的或恶的，所以真主才命令或禁止某些行动。道德独立于真主之外而且存在于行动之中，因此即使有人不知道真主的指示，他也能运用理性来分辨善恶。索鲁什把这种正义观称为「道德世俗主义」，而且以「新穆塔兹拉学派」自居。在穆塔兹拉学派内部，道德世俗主义也引发争议，有些思想家认为，即使是没读过《古兰经》的人也能获

得永恒的救赎，因为理性能引导他们分辨善恶与循善而行。穆塔兹拉学派的另一些人则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最终将使得启示变得毫无必要。

关于启示与启示的起源问题，穆塔兹拉学派的看法相当激进。他们认为《古兰经》是被创造的文本，而非永恒的文本，这表示《古兰经》有一部分是历史时刻下的产物，因此不难想见一旦外在环境变化，《古兰经》也会跟着改变。索鲁什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在较晚出版的一本书（一九九九年）里做了更深入的推演。索鲁什类推鲁米的说法：如果我们希望将海带回家里，我们必须提供一个容器。当我们把海水倒进水壶里时，大海依然是海，但大海确实呈现出水壶的形状与容量。我们希望将超自然带到物质世界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超自然将呈现其容器的性质，亦即，先知与《古兰经》。但这些容器是此世的与暂时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容器的轮廓可以构成超自然本身的疆界。

索鲁什认为，在宗教中，人格不过是附随之物，即使是先知的人格也一样。他思索着，也许礼拜时身体的姿态与动作其实只是先知个人的一种习癖。也许这些姿态与动作并非促成先知与真主交流的原因，而是交流之后产生的结果。其他人仿效这些动作，希望藉此能让自己被送往先知所在的地方，但终归是徒劳。索鲁什在较晚出版的这本书里提出的洞

见，主要出自穆塔兹拉学派与伊斯兰的神秘主义。但是，索鲁什的说法也导致库姆的一些教士指控他叛教[4]。在这场争论中，索鲁什对一名访谈者提到：「我们说樱桃是樱桃树的果实，难道我们必须说樱桃是真主的果实，才表示我们是一神论者？」[5]

穆塔兹拉学派以巴士拉、巴格达、也门为根据地，之后又以邻近德黑兰的沙赫勒雷伊为据点，这个学派代表了中世纪伊斯兰活跃的论辩文化，学者撰文捍卫自己的原则，不仅反对较为正统的伊斯兰哲学家，也驳斥无神论者与自由思想家。在逊尼派与什叶派因为哈里发继承问题出现分裂的时期，穆塔兹拉学派也因为该效忠谁而出现裂痕：巴士拉的穆塔兹拉学派同情逊尼派的立场，但巴格达的穆塔兹拉学派却支持什叶派。虽然从七六五年到八四八年，穆塔兹拉学派成为巴格达哈里发国官方教义的提供者，但他们的观点属于菁英阶层，最后还是被正统的阿什阿里学派取代，后者认为理性必须屈从于启示，这点较能符合民众的情感。

穆塔兹拉学派从此一蹶不振。最后，逊尼派穆斯林也支持阿什阿里学派，而且把穆塔兹拉学派的观念视为异端。但转入地下发展的穆塔兹拉学派却渗透到波斯什叶派乃至于也门什叶派神学中，后者又称为宰德派。索鲁什试图复兴穆塔兹拉传统的精华部分，并且提醒伊朗人，什叶派本身也有

批判理性主义的基础。

霍梅尼去世时，索鲁什已经拥有广大的支持者，主要都是信仰虔诚的读者，他们从索鲁什的理论中找到了挣脱革命的道德与政治僵局的出路。在索鲁什的伊斯兰教义中，人可以成为信仰者而无须成为追随者；一个好穆斯林不仅可能而且甚至必须进行公开的批判辩论，即使对手是教士也一样，而且应该学习世界各地政治哲学家的观念。

根据索鲁什的观点，穆斯林社会没有理由不去学习世俗的政治理论来设计出可能的最好国家。毕竟，政治与意识形态都是人类的知识形式，谁也不能说政治与意识形态要比其他领域的知识更接近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宗教核心。因此，索鲁什认为，要从伊斯兰教义中推演出政治体系乃至于民主体系是白费工夫。真正重要的是，要在穆斯林国家参与政治，必须要有好的穆斯林价值。所有的问题都要公开以理性进行辩论。

索鲁什的批判严重打击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正当性，新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决心加以反击。霍梅尼死后，新任最高领袖办公室宣布：「把宗教视为其他人类科学的应变量（dependent variable）(1)，这种想法的传布不仅危险，而且否定了伊斯兰国的正当性。」[6] 哈梅内伊或许看到法迪德圈

子里也有类似的反西方自由主义的想法，因此认为这些人可以做为捍卫他的权力的利器。在他担任最高领袖期间，以法迪德追随者自居的人（法迪德本人于一九九四年因为肠道疾病去世）几乎成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哲学家，他们的影响力远超过他们实际在政治体制里的人数。法迪德圈子的成员也主掌了许多伊斯兰共和国的文化与思想机构，包括科学院，而他们也将索鲁什逐出科学院。法迪德死后，他的追随者许多转向傅柯与后现代主义者来强化他们对西方的批判。

索鲁什提出反对的看法，他认为在一个仍努力想达成现代性的国家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希望看到理性死亡，而非理性的谦卑。几年后，索鲁什把法迪德死后对伊朗国家的影响比拟成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对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影响。但是，索鲁什自身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尽管政府当局最大的期盼是《宗教知识的限缩与拓展》不要出版，但这本书已经四处流传。索鲁什的作品销售超过两万册，而且引起了相当于原书篇幅十倍的响应。这是伊朗宗教思想复兴的开端。

《地平线》圈子的思想家不仅阅读索鲁什的作品，在索鲁什的影响下，他们也接触他们原本不大可能涉猎的英美分析哲学领域，并且将其中的洞见与语言的精确注入到新伊斯兰思想中。分析哲学迹近于数学的抽象以及鲜少涉及欧洲历

史或文化，使它能比欧陆哲学——分析哲学与欧洲的脉络总有些格格不入——更深入地移植到伊朗。

《地平线》出版了许多关于波普尔的作品：他的作品的译本、阐述他的观点的论文，甚至还有对波普尔的访谈。访谈是在一九九二年于波普尔在萨里的家中进行的，访谈者是一名年轻的伊朗学者侯赛因．卡马里，他曾在索鲁什的指导下翻译了几本波普尔的著作。卡马里一直记得，虽然波普尔已经快九十岁，但还是自己来应门，而且为这名年轻伊朗学生介绍家中的一切。卡马里向波普尔预约了四十五分钟的访谈，但波普尔给了他两个半小时。最初的工作是卡马里为波普作品的译本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论。波普尔看了之后，觉得这篇文章的企图心太大，卡马里应该另外发表，而由波普尔自己写了两页的导论给他。

如果在与卡马里见面之前，波普尔并未察觉自己在伊朗的声望，那么在见面之后，他也应该知晓了。当一名伊朗哲学家批评波普尔不应该认为马克思的所有作品都支持历史决定论时，波普尔写了两封信给这名哲学家，捍卫自己的观点[7]。当波普尔于一九九四年去世时，伊朗一个民间文化机构为了纪念他，举办了持续一整天的研讨会，由讲者接力讲述波普尔的著作。

然而，到了波普尔去世之时，他在西方并未像在伊朗那样受到重视。他在科学哲学的地位完全被托马斯．孔恩所掩盖，而且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欧陆哲学课程，他的学说几乎没有什么篇幅。几年后，卡马里对一名美国同事说，他想写一篇论文，题为〈波普尔之后〉，同事却感到一头雾水，彷佛他赋予了一个最不重要的人物神话般的地位。

《地平线》不是唯一的思想报刊，也不是最大胆的刊物。《周末》杂志刊载了勇敢的残余世俗左派的文章。《女性》杂志由另一名从《宇宙报文化副刊》出走的编辑夏赫拉．谢尔卡特成立，主要报导女性主义议题，而且与《地平线》关系密切，两家刊物共享一间办公室。《对话》杂志由哲学家拉明．贾汉贝格鲁与其他几位世俗知识分子创立，试图从非宗教的视角讨论民主、多元主义与市民社会。《对话》的编辑是见多识广的世俗知识分子，出身受过教育的菁英阶层，而《地平线》的编辑则是思想传统而虔诚的人士，出身市集与下层中产阶级，他们绝大多数是家族中第一个追求心灵生活的人。然而这两份报刊却建立起友好关系。双方会交换作者，进行讨论，合作共同的主题。

更世俗的思想家会认为《地平线》对于某些主题有所保留。《地平线》零散地刊登一些女性写的文章，但对于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争取女性权利却不是那么认真看待。索鲁什

曾经有两篇讲稿与两次访谈谈到后革命时代的「女性问题」，但要不是某个独立学者将这些文章收入书中，这些文章早就散失亡佚[8]。在演说中，索鲁什强调，即使神圣经典形容女性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目的而存在，而先知与伊玛目也因此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是未充分发展的人类，但现代穆斯林没有必要接受他们的论断。更确切地说，现代穆斯林有权根据逻辑与常识来质疑这些说法。

伊朗女性主义圈子热烈讨论伊斯兰法学中的女性权利问题，但索鲁什却回避这场论战，他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的访谈中指出，他认为必须先从哲学原则谈起，最后再谈法律权利，而不是反过来。这个立场与索鲁什的一般观点大致符合。他是个哲学家，而非政治策略家。对于一个伊斯兰哲学家来说，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有没有可能主张女性是充分发展的人类，而后法学才能依照这个哲学逻辑加以发展。但这个哲学讨论并非《地平线》的首要之务，而《妇女》杂志则将焦点放在争取女性法律权利上。对索鲁什来说，两性之间原本就有着深刻的差异，抹除这项差异是不自然的。当索鲁什听到有人谈到「平等权」或「性别平等」时，似乎认为这是对性别差异的否定，而不是对理性人类都该拥有的普世权利的一种追求。

在女性权利与其他相关问题上，索鲁什与世俗自由主义

的差异显得格外明显。索鲁什认为，西方的权利观念发展得太过度。例如，在他的观念里，穆斯林民主让同性恋者取得权利是难以想象的事。根据他的说法，虽然伊斯兰民主不是由教士或依据伊斯兰律法来统治，却是由植根于每个公民与民选官员心中的伊斯兰道德来指引与约束。

《地平线》的虔诚知识分子与《对话》的世俗思想家，如果他们仔细思考，会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但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期间，各流派的伊朗异议分子主要还是倾向于统一而非分裂，而他们不久就将遭受暴力与无情的打压。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改革派逐渐发现，自己有了难以对付的敌人——政权内部有一些坚定乃至于暴力的分子，他们认为思想运动藉由《地平线》进行渗透，对统治的意识形态构成难以容忍的挑战。

《地平线》圈子大部分都感到吃惊。绝大多数成员认为自己是体制内的异议分子，他们的发展信条是让革命意识形态面对变迁环境时进行调适与试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的潮流。此外，在更为压迫的一九八〇年代，伊斯兰共和国容忍了索鲁什及其支持者。在霍梅尼时期，最大与最有组织的反对势力——特别是圣战者组织与世俗左派——被当成国家公开的敌人而且遭到猛烈迫害直到灭亡为止。但霍梅尼愿意容忍他认为的忠诚追随者当中出现派系歧见，或许是

因为他对这些人没有明显的好恶，也或许是因为在圣战者组织与左派被消灭之前，他抽不开身来处理这件事。据说当被问到对《宗教知识的限缩与拓展》有何看法时，霍梅尼表示他对索鲁什的观点没有意见。但是，霍梅尼死后，当索鲁什与《地平线》圈子引发新一波的热潮时，新任的最高领袖可就无法坐视不管了。

因此，一九九五年，就在索鲁什发表文章主张教士不应该支薪以避免腐化后不久，哈梅内伊也在国营报纸发表社论警告索鲁什不应该挑战教士的权威。根据与哈梅内伊亲近的人士表示，「索鲁什博士争议」成了「国家和谐」与「伊朗国家独立」的问题[9]。当国会议长宣称「革命的敌人藉由这些复杂的理论来利用天真的民众，动摇他们的信仰，藉此来破坏革命」时，他指的就是索鲁什[10]。在库姆，同样出现大声疾呼的批评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激烈的强硬派人士阿亚图拉梅斯巴赫－雅兹迪，他轻蔑地说，「我们将会把这些流行的观念丢进历史的垃圾桶」，凡是主张可以多元解读伊斯兰的人，都应该好好加以羞辱一番[11]。

早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索鲁什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危险。就在这一年，一群来自压力团体「真主党支持者」的民兵在索鲁什于伊斯法罕发表演说时威胁要对他不利。往后逐渐可以看出，就算真主党支持者与最高领袖办公室没有

直接连系，至少也与权力结构有牵连，他们几乎完全依照阿亚图拉梅斯巴赫－雅兹迪嗜血的伊斯兰教令来行动。第一次威胁事件后过了三年，一九九五年，伊斯法罕的大学生邀请索鲁什发表演说，内容是谈沙里亚蒂的遗产。威胁再度蜂拥而至，校方不得不取消这场演讲。学生们仍不死心，他们在校外找了场地，有超过一千人前来聆听索鲁什演说。但索鲁什在台上还没来得及开口，民兵就从听众中一拥而上，朝着哲学家的脸与头痛打，并且从胸前扯开他的衬衫。一名学生救了索鲁什，并且将他藏匿在大楼地下室，直到真主党人散去为止。

当时，大家仍难以想象当局会支持这种暴行，特别是针对早年与伊斯兰共和国密切合作的人物。一般认为总统拉夫桑贾尼自己也同情改革派。索鲁什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恳求拉夫桑贾尼：「我卑微地请求你主持正义，不是为了我，而是因为这些暴行羞辱了我们文化的自尊与我们的尊严。」[12]超过一百名知识分子也联名为索鲁什向拉夫桑贾尼请愿。但拉夫桑贾尼保持沉默，强硬派报纸持续诋毁索鲁什，真主党支持者则宣称，只要这名哲学家试图演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加以阻止。

一九九五年十月，索鲁什试图到德黑兰大学演讲，演讲的主题是鲁米。真主党支持者冲进会场，朝索鲁什站立的讲

台丢掷椅子，封住出口，并且宣称他们前来与索鲁什辩论。索鲁什反驳说他无法在胁迫下进行辩论。第二年春天，当索鲁什受邀到阿亚图拉莫塔哈里逝世纪念会上致词时，真主党支持者再度出现，他们手执棍棒与匕首，要求在刀尖下进行辩论。索鲁什再次写信给拉夫桑贾尼：「黑暗崇拜者的胜利，传达了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希望的枯竭与我们思想的衰微。保持沉默是不行的，不能让他们获胜。」[13]

但是，就算总统有权力停止攻击，他却不行使这个权力。无论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还是在他下台之后，索鲁什都找不到安全的处所。二〇〇〇年，索鲁什受邀前往西部[(2)]省分首府霍拉姆阿巴德演说，随行的有异议教士穆赫辛．卡迪瓦，他是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学生，以伊斯兰法学的观点批判「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索鲁什、卡迪瓦与索鲁什已经成年的儿子刚在只有两个房间的机场降落，就发现整栋建筑物已经被真主党支持者成员团团围住，而且这些人还朝着建筑物丢掷石块与挥舞刀子。民兵围困了七个小时，改革派知识分子一直待在建筑物里无法动弹。终于，霍拉姆阿巴德的警察首长进入机场。他建议索鲁什与卡迪瓦换上陆军制服，让他们在伪装下溜出机场。

卡迪瓦大为光火。警察首长怎么会做出这种建议？警察的工作难道不是维护他们的安全——保护他们免于受这些

暴民的攻击？

根据索鲁什的回忆，警察首长冷静地回答：「我们有需要保护的人员名单，但你们不在上面。」

卡迪瓦拒绝穿上制服。警察首长对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冒险离开机场，穿过那群携带武器的暴民前去搭乘巴士。上了巴士之后，警察首长告诉他们不要坐在靠窗的位子，因为他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沿路很可能有民兵向他们丢石头或开枪。巴士载着这群知识分子前往军营，索鲁什与卡迪瓦在那里度过紧张的两个小时，然后他们被带上汽车，在未能上台演讲的状况下被直接送回德黑兰。

这段期间，情报部长曾三度传唤索鲁什进行漫长的讯问。几年后，索鲁什回忆，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被要求将答案写在白纸上，而讯问者则是典型的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两个人轮番要求他如实交代。但当时发生了一件事让索鲁什印象深刻，这件事足以代表他的国家近来的历史，也显示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分裂日趋恶化。

索鲁什在街上遭到逮捕，他被塞进车内，然后被带往情报部。当他在小房间里等待讯问者时，逮捕他的人与开车的人就坐在他的旁边。经过漫长的沉默之后，逮捕他的人说道：「我等一下就会离开这个房间，讯问者会过来。但在我离开

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那名探员解释说，一九八〇年代，他跟同事都很高兴能与情报部一起工作。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对抗真正的邪恶：「萨达姆的人民」，以及圣战者组织与左翼分子。探员与他的同事都乐意为了完成这项职责而杀人或被杀。他们知道如何完成这项工作，也了解这项工作背后的哲学意义。探员说，但现在发生的事，「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就是逮捕像你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索鲁什问道。

「我听过你好几次的演讲，」那个人懊悔地说，「里面有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 ＊ ＊

(1)在数学中指他的值受其他变量影响，在社会科学模型推测中，指推测的结果。此处应指宗教成为受其他因素影响，一种被动的存在。

(2)原文写东部，应是作者笔误。

第六章　热月

不难想象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为什么要采用全新的历法——新历法一个星期有十天，月分则以伪拉丁文衍生的名称命名，例如冬天的「Pluviôse」（雨月）与「Ventôse」（风月），春天的「Germinal」（芽月）与「Floréal」（花月）。革命分子显然觉得历史在十八世纪末出现了断裂。这是唯一一次历史不是以分秒持续累积来产生微小的变迁，而是被一口气推升上去。就连过去也成了崭新的事物，不再与现在紧紧相邻。旁观的英国人嘲弄革命法国历做出的累赘创新，他们觉得法国历每个月的名称彷佛矫揉造作的童话里的十二个侏儒姓名：喘吁吁、打喷嚏、冷冰冰、花盛开、急阵雨、树成荫。新历法的使用只持续了十二年，至于革命维持多久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创造的某个历法名称此后却恰如其份地成为研究或经历革命的人使用的专门术语。

热月这个名称表现了夏季的炎热，热月始于七月底，终于八月底。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布宾领袖马克西米连．罗伯

斯比在共和二年（法国以外称为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被送上断头台，结束了他的一生。罗伯斯比的死标志着反动时期的开始，反动紧随着革命，正如夏天紧随着春天，此后远至俄罗斯乃至于伊朗，都把革命朝反动转变的过程称为热月。在热月，革命的热忱破灭，极端主义者被处决或被逐出权力核心；乌托邦主义被舍弃，秩序恢复，强调技术治国的新菁英重建过去的官僚系统。从断裂的混乱与暴力中诞生了新独裁体制，并且承诺带来稳定。一九三八年，哈佛大学教授克莱恩．布尔顿在他的作品《革命的剖析》中特别辟出一章讨论热月，布尔顿把热月形容成是一种从危机热病中恢复的过程与旧秩序重建的前兆。

布尔顿是研究雅各布宾与塔列朗的学者，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成为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主任分析师，被派驻到英国工作。一九六五年，布尔顿对《革命的剖析》做了修改与更新（此时离他去世还有三年，而在此前两年，汉纳．鄂兰出版了《论革命》），他对法国、英国、美国与俄国革命进行比较，寻找其中的共通点，试图解释这类翻天覆地的动荡如何进展。布尔顿写作时带有一种霍布斯式的超然；面对人类进行对抗、感受狂喜与遭遇不幸时的激烈情感，布尔顿不为所动，因为他想理解的是革命最根本的机制。布尔顿的作品在后乌托邦时代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时期的伊朗找到许

多热切的读者，这点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伊朗的知识分子开始将布尔顿的模式套用在他们发起的革命上。

以热月来说，布尔顿的描述不可思议地与伊朗革命相契合。布尔顿指出，革命分子通常不会是那些在绝望的地方受压迫的可悲人群，在那种地方，富人往往过着物资匮乏的穷人无法想象的奢华生活。更确切地说，革命分子往往是经济正在改善的国家里的困苦人群，这些人觉得自己有权过更好的生活。布尔顿写道：「革命不是弱者的复仇，不是绝望的产物。革命是因希望而生，革命的哲学在形式上是乐观的。」[1] 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阶级相对紧密，但阶级分化仍让他们感到苦涩的社会里；在政府散漫无能、无法对快速现代化做出回应的国家里，以及在菁英开始怀疑自己、对「自身阶级的传统与习惯」丧失信心的时候，也特别容易爆发革命。

布尔顿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前革命国家扮演的角色。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例如一九六〇年代后的美国，内心疏离的知识分子也许会责难现代资本主义，但他们提不出正面的议程，也不会认真考虑如何翻转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与特权。然而，在前革命国家，知识分子会走上极端，甚至转而效忠其他的事物，例如更好的世界：「革命分子的理想世界，与一般人眼中更好的世界，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革命分子热切感受到理想实现的可能，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摆脱当前的命

运，相信不只是不该如此，而且是不需如此。进一步来说，就是对现状带有一种根深柢固的憎恶。」[2]

革命国家建立之后，就会遵循一套属于自己的可预测日程。根据布尔顿的说法，革命国家最初的领袖会是温和派，就像巴札尔甘乃至于巴尼－萨德尔那样，但这些人很快就会被兴起的左翼极端主义者处决或流放。这些极端主义者会集权中央，搁置公民自由、打击异己、设立特别法庭与革命警察。

然后，极端主义者在道德热忱的驱使下，坚信这个世界及其居民必须洗心革面，他们会使用警察力量刺探民众的日常生活，惩罚微不足道的不当行为，赞扬违反人性的禁欲美德。布尔顿称之为恐怖与美德统治。当这种黑暗、狂热的能量耗尽的那一刻——亦即当这股能量终于合乎逻辑地来到连曾经领导它的极端主义者都被处决的那一刻——就是热月开始之时。

伊朗革命的剖析也许不一定完全与布尔顿的描述相符，但却惊人地类似。我们可以这么说，热月始于霍梅尼去世之时。与布尔顿的预测一样，最初的极端主义者——如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的雅各布宾——连同残余的伊斯兰左翼一同被逐出权力中心。但这些左翼人士并未像欧洲左翼人

士那样遭到处决或流放，他们的同事对恐怖统治负有责任，甚至可能责任更大，却依然担任公职。伊朗无意对恐怖与美德统治悔过，也未牺牲他们的罗伯斯比；更确切地说，一九八〇年代的流血事件完全未再次被提起。与所有被压抑的创伤一样，这种做法将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产生一股犹豫不决与内疚的力量。

革命之后，某种外观成为伊朗政府圈的主流。男性必须蓄胡来证明自己的信仰：留全胡，或者更好的做法，能隐约看出脸上长了胡子就行。即使在三十年后，年轻人如果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依然无法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总统拉夫桑贾尼，身材肥胖，有着一双小而聪慧的眼睛，在每张照片里都流露出阴郁的表情，却是个明显的例外。他鄙视邋遢的巴斯基外型，他说道：「如果成为真主党人即意味着要让自己的外表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而这种做法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会是一种罪，伊斯兰将会反对这一点。」[3] 拉夫桑贾尼以生面团似的宽阔无须脸庞为人所知；他的皮肤白皙，甚至白得有点光泽闪亮。民众给他取了「鲨鱼」这个绰号，这里的鲨鱼指的不是邪恶的海中生物，在波斯语中，同样的词汇只是中性地指一个人不长胡子。不过，这个词之所以用在总统身上，理由不仅止于外在形貌。

正如布尔顿预言的，拉夫桑贾尼放弃恐怖与美德统治的

刻苦简朴，由此开启了新的时代。他要求伊朗人消费更多的商品以刺激经济，他也告诫伊朗人，夸耀自己的虔诚是一种伪善的行为。拉夫桑贾尼说道：「只有在紧急状况下才有必要禁欲」，否则，「自命清高地装出虔诚与贫困的样子，反而显得矫情虚伪」[4]。他劝告主麻日伊玛目对年轻人松绑，因为「透过压迫、压力与威胁，我们只能部分保住社会的外观」[5]。

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任务并不轻松。经历一九八〇年代的动荡，霍梅尼的领袖魅力、战争以及革命的群众动员已将整个伊朗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少了以上这些条件，拉夫桑贾尼与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必须以职务能力来取代意识形态，就像各地的热月领袖那样。

起初，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退居幕后，让精明而务实的总统决定政策方针。哈梅内伊的缄默是可理解的。霍梅尼的地位难以承接；总统拉夫桑贾尼拥有领导威望而且掌控着庞大的政治体制；此外，新政府还必须面临许多问题。经济一团糟，战争让伊朗花费二千亿美元，而且在边界产生数百万难民，就连国内生产毛额也跟着萎缩。在技术官僚建议下，拉夫桑贾尼决定反转穆萨维内阁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他怀疑是这种政策造成国家的贫弱。

拉夫桑贾尼的修正路线在批评者看来，像极了国际货币

基金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新总统提议以出口取代进口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甚至于发展民间部门。拉夫桑贾尼想重建战时遭到破坏的设施，让农业部门私有化，并且扩充石化产业。要做到这一切，拉夫桑贾尼深信伊朗需要盟友，甚至外国投资。他开始让伊朗与波斯湾地区邻邦关系正常化。在此同时，拉夫桑贾尼要求放松伊朗的审查制度，允许指导部部长穆罕默德．哈塔米发放出版许可给报纸与书籍。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的头三年，指导部允许出版了八千本书籍，到了一九九二年，哈塔米许可发行的报纸与期刊数量已经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虽然还不到出版自由的地步，却已经比伊朗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来得开放。

拉夫桑贾尼的批评者担心这将成为扩大的热月——就像过去的法国那样，伊朗将牺牲掉所有革命代表的一切，以稳定为名，重新恢复众人熟悉的旧秩序。保守的右翼对于新总统的外交与经济政策愿意有条件地抱持观望态度，但却认为文化松绑是一种偏离意识形态与宗教不纯净的象征。在此同时，伊斯兰左翼支持文化松绑，却极力反对拉夫桑贾尼的外交与经济政策以及左翼被排除于拉夫桑贾尼的核心圈子之外。

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伊朗的内部紧张开始浮上台面。拉夫桑贾尼认为，伊朗做为上一个被伊拉克入侵

的国家，不可能坐视最近发生的侵略行为；然而，伊朗也不可能公然容许美国陈兵边界。于是拉夫桑贾尼决定，伊朗「不会为了让美国实现目标而流血，也不会为了让伊拉克留在科威特而流血」[6]。伊朗将保持中立。但一些伊斯兰左翼国会议员仍相信，如果伊斯兰共和国不起而反对美国，伊斯兰共和国将什么都不是。他们坚持必须将美国人逐出这个地区。有些人甚至觉得伊朗应该与伊拉克连手对抗美国。这些主张都遭到拉夫桑贾尼拒绝。

如果拉夫桑贾尼希望带领伊朗走向较少对抗的外交政策，那么不断向民众宣扬巴勒斯坦苦难与美国恶行的伊斯兰左翼肯定令他感到难堪，甚至成了他的眼中钉。拉夫桑贾尼一旦下定决心，就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派系斗争。在第一任任期期间，拉夫桑贾尼急欲压制反美与反对结构调整计划的激进分子，他显然认为自己与这些人在文化与审查层面享有的共同利益是可牺牲的。包括当时仍存在于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其中的各种好处也是可抛弃的。为了在短期内确保对伊斯兰左翼的胜利，拉夫桑贾尼做出了浮士德式的交易：他支持制定选举法，规定参加伊朗选举的候选人都必须合乎「绝对忠于」最高领袖这个条件，而且由宪法监护委员会决定谁具备或谁不具备这项忠诚。这个法律实质上将允许教士对选举过程拥有独断的权力。宪法监护委员会不属于拉夫桑

贾尼的中间派，而是由比他偏右的保守派教士掌控——而且是永久性的，因为委员绝大多数由最高领袖任命。一九九二年，这些教士是拉夫桑贾尼的战术盟友；几年后，他们将成为他的敌人。选举法依然继续施行，对「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下仅存的人民主权造成永久的打击。

在一九九二年国会大选中，宪法监护委员会许可的人选有利于保守派。比总统偏右的保守派强硬分子以压倒性的多数控制国会。一旦控制国会，保守派便开始巩固他们的革命正统主张。书籍、报纸、戏剧、电影与女性服饰——这些领域在热月开始时都获得松绑，而且得到拉夫桑贾尼的同意——强硬派希望这些领域能与革命伊斯兰价值更加一致。在经济方面，强硬派捍卫市集的特权，反对拉夫桑贾尼支持的更为现代的工业优先项目。因此，拉夫桑贾尼确保强硬派选举获胜，好让自己能够摆脱左翼的压力，但现在他却觉得右翼把他勒得更紧。

哈梅内伊逐渐站在强硬右派这一边，反对中间派的总统。哈梅内伊这么做，彻底改变了最高领袖的地位。「宗教学者」不再佯装自己是个居于高位的智者，在敌对派系之间进行权力平衡。哈梅内伊自己参与派系斗争，全力支持强硬右派。当国会里的强硬派坚决反对哈塔米允许的新言论自由时，哈梅内伊出面为强硬派发声。最高领袖介入后，拉夫桑贾尼别

无选择，只能以强硬派人士取代哈塔米——而他也确实在一九九二年七月这么做。哈塔米转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闲差。短暂的文化开幕式结束了。新指导部只会发放出版许可给符合「适当」宗教与民族主义资格的出版物——不管这个资格的意义是什么。

在此同时，强硬派与最高领袖办公室也镇压大学校园与街头的年轻人。学生人数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之间增加到三倍，使校园成为各种活动的据点，带来潜在的麻烦。最高领袖办公室要求在大学派驻更多代表，从事动员来纠正学生在道德与宗教上的散漫。一九九二年制定的巴斯基法律保护法赋予年轻民兵执法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进行逮捕。巴斯基民兵在城市街头设立岗哨，行使新权力，他们搜索车子里的非法西方音乐、杂志与录像带。巴斯基看到走在一起的年轻男女会当场拦住进行盘问，如果他们无法证明彼此的关系就会遭到逮捕。一九九四年，国会通过立法，允许执法者（包括巴斯基）可以射杀抗议者。

由于这些因素，使得伊朗校园里反对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人反而比反对教士的人多。伊斯兰学生协会是伊斯兰左翼成立的团体。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反对总统的市场改革，同时利用民众蓄积的不满情绪。伊朗的经济波动剧烈，对于战时的损失与改革的震撼反应十分快速。伊朗在战后突然出现

一群暴发户，此时外国的商品，从汽车到衣服，再度成为炫耀性消费的目标，这些暴发户中也包括过去的传统家庭，他们因为与革命国家连结而致富。拉夫桑贾尼的盟友，包括许多伊朗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即使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期间富人确实在短期内变得更为富有，但这位热月总统并未剥削穷人，而且从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贫困实际上也持续减少。但新阶级的存在过于显眼，引发了憎恨的情绪。前革命时期的菁英嘲笑这群暴发户举止如同乡巴佬，品味粗俗，对一般没有特权的伊朗人来说，新阶级的存在显示了腐败、裙带主义与非法取得财富之风盛行。

事实上，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都无法成功形塑伊朗的经济。更确切地说，在各派系为了主导伊朗经济方针而进行的拉锯战中，实际控制经济的权力反而落到了第三者身上，这些人在过程中默默地巩固财富与权力。到了一九九四年，伊朗的经济有四成掌握在所谓的「半国有企业」（para-statal）部门手里，这些半国有企业由几个庞大的半民营基金会组成，主持者一般来说都是教士，而且只听命于最高领袖。这些庞大而不透明的企业集团称为 bonyads，控制着从巴列维国王政权夺取来的基金而且囊括了整个经济，从工业到农业乃至于服务部门，将数百家企业归并到几个巨型保护伞之下。没有任何小企业可以跟这些企业集团竞争。财富聚

集的地方，无论是透过 bonyads 还是石油企业，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因此理所当然引发了怀疑。再一次，我们不得不引用布尔顿的说法：革命国家在热月的恢复期间，几乎总对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伊朗来说，这个发展逐渐与总统个人连结在一起。更糟的是，拉夫桑贾尼与他的家族最近才因为开心果事业赚了一大笔钱。

一九九二年左右，当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五十时，拉夫桑贾尼转而左倾。他开始提出属于他自己的一套国家主义，不仅挑战市集，也将资本移往政府与银行。他强调工业生产，彷佛伊朗政府可以把经济抓在手里，迫使伊朗走向现代化之路，并且在全球经济担任要角。为了缓和冲击以及让批评者缄默，拉夫桑贾尼将伊朗民众仰赖的消费补贴增加了一倍。但他的提案依然令右派感到嫌恶与芒刺在背。一九九三年一月，国会大幅削减拉夫桑贾尼的预算。往后一年，伊朗撑过了油价暴跌与货币贬值。由于在政治上不可能提高能源价格或削减补贴，于是使得伊朗消费过多的石油；出口锐减。拉夫桑贾尼被逼到了墙角。他已经没有选择，只能寻求被排挤的伊斯兰左翼的帮助。

侯赛因．巴什里耶赫的故事要从他的父亲，一名苏菲主

义寻求者与诗人讲起。在伊朗，成为一名苏菲主义者，意味着你将成为少数教派的一员，而且将交替地受到压迫与喜爱。诗是伊朗最受尊崇的文学，特别是苏菲主义抒情诗人哈菲兹与鲁米的作品。但苏菲主义是一种不具确定性的信仰，是一种探索而不是命定，是严谨伊斯兰脉络下的一种脱离常轨。巴什里耶赫的父亲从事冥想，接受神秘主义，从生活的所有层面与一切宗教中寻求真主。他对神的追求是如此真切，以至于就算探寻不着他也甘心。到最后，巴什里耶赫的父亲完全舍弃了宗教，他告诉家人：「我在所有宗教里找不到任何真理。」

一九五三年出生于伊朗西北部城市哈马丹，巴什里耶赫有五个兄弟姊妹。他的父亲对他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影响，早在他入学之前，他的父亲已经教他识字。巴什里耶赫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引导他阅读波斯文学经典，特别是诗人哈菲兹与菲尔多西。巴什里耶赫个性沉默寡言，在说话之前总会多加思考。虽然他一生研究的观念总是与他目睹的历史密切相关，但他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对学术的关切，而非对观念、历史与自身命运的热情。这种冷静沉稳部分出自他的天性，但部分或许是有意为之——从安全的堡垒中，他可以观察影响深远的政治生活蕴含的危险与沮丧。

巴什里耶赫很小就开始研读文学、诗与历史。他尤其喜

爱萨迪格．赫达亚特的小说，赫达亚特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贵族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含蓄地批评教士与巴列维国王。巴什里耶赫读了赫达亚特所有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对波斯文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一九三七年的中篇小说《盲眼的猫头鹰》，这部阴暗而令人眼花撩乱的散文诗，不断地混合与改换各种不祥的景象：一个古董花瓶、一瓶可能被下毒的酒、一名头发浓密的斜眼女人、一个驼背的老头、一个杀人的武器、一条河，以及古城沙赫勒雷伊的滚滚尘土。叙事者可能发烧或发疯，可能遭到监禁或即将死去，可能极度悲伤或只是极度亢奋，可能杀害或并未杀害那名女子，那名女子可能是天使、娼妇，也可能是他的母亲。《盲眼的猫头鹰》是一部文学现代主义经典，也是一幅引人入胜的社会肖像，它描述一个被传统窒息与催眠的社会，这些传统包括了对情色的压抑、对女性的贬抑以及把罪与更好的自我分离开来。一九五一年，忧郁而疏离的赫达亚特自杀，享年四十八岁。

对巴什里耶赫来说，赫达亚特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民族主义，他对前伊斯兰波斯历史的喜爱，以及他对伊斯兰的揶揄，包括伊斯兰腐败的教士、贪婪的宗教商人，还有伊斯兰衍生出来的褊狭传统文化。正当比他年轻一点的学生致力挖掘政治的伊斯兰时，巴什里耶赫却反过来，从反对伊斯兰中找出思想的健全性。他的父亲总是要求心灵的独立，而巴

什里耶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了解自己赞赏的诗人如欧玛尔．海亚姆、哈菲兹与萨迪主张批判思想与反对宗教的传统诠释。若是有任何宗教影响巴什里耶赫的思想，那就是苏菲主义的道德观点，以及苏菲主义对宽容、个别性与宗教内在经验的强调，而非对宗教外在责任与义务的重视。

尽管如此，巴什里耶赫十九岁时开始与朋友前往侯赛因宗教会所。与他们一样，巴什里耶赫来这里也是想寻求启发；但与许多人不同的是，巴什里耶赫觉得沙里亚蒂宣扬的只是另一套带有预示性且含糊不清的事物。某天晚上，巴什里耶赫看到沙里亚蒂滔滔不绝连讲六个小时，听众都累坏了，但沙里亚蒂自己倒是精神奕奕。沙里亚蒂接受非常现代的观念，包括存在主义，但巴什里耶赫认为，沙里亚蒂运用这些观念是为了回归传统。这种主张无法被巴什里耶赫接受，他寻求的是从宗教解放，而不是回归宗教。他怀疑，一个新的盲从即将诞生。

巴什里耶赫对于伊朗的世俗政治事务毫无兴趣，他曾表示自己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他喜爱的政治属于理论层面，是一种哲学，其根源与同情源自于世俗左派，而正是这种对政治理论的投入，使巴什里耶赫获得自己想象不到的划时代影响力。在大学时代，巴什里耶赫从比较角度与社会学观点学习国家与政治制度。巴什里耶赫并未从事任何活动，尽管他

倾向于左派，他仍认为伊朗国王试图在伊朗推动世俗化与现代化是无可非议的。

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伊朗的情势慢慢升温，此时巴什里耶赫前往英国留学，他在埃塞克斯大学取得政治行为硕士学位，在利物浦大学取得政治理论博士学位。他阅读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大量的英国政治理论。不过，巴什里耶赫的思想与霍布斯较为契合。这位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与乌托邦思想家完全相反，他关注的不是主持正义或构筑理想的国家愿景，而是把国家视为存在之物来进行观察，并且解释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根据霍布斯的观点，服从于主权者的权力，是让人类免于可怕的「自然状态」的唯一办法，在自然状态中，人类的生活——「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短暂」——将成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的国家是一头利维坦（Leviathan），不受公民自由、分立政府或独立司法约束，霍布斯认为这些都会削弱中央权威维持统一与和平的力量。更确切地说，主权者保护人民不受他人的侵犯，而为了回报主权者的怜悯，人民必须付出他们的自由做为代价。国家的昌盛不是仰赖国家的繁荣，而是仰赖臣民的服从。霍布斯写道：「虽然人可以想象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可能带来许多邪恶的后果，但缺乏这种权力的结果，却会产生每个人与邻人

对抗的永久战争，相较之下，后者要糟糕得多。」[7]

霍布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威权主义（他甚至简要地提到支持审查制度，因为这么做可以防止「不和与内战」）。但霍布斯提出的基本问题——国家为什么必要？——暗示国家并非来自上帝的命令，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人类愿意做出某种牺牲来换取和平这个更大的好处。从这一点来说，霍布斯是社会契约理论的早期阐释者，他预示的自由主义后来由洛克与尚－雅克．鲁索加以实现。

对巴什里耶赫来说，霍布斯对于人性、不祥的利益与政府功能的悲观理解似乎是真实的。巴什里耶赫翻译讨论霍布斯的二手著作，几年后，他将《利维坦》翻译成波斯文。这部作品不仅获得读者接受，而且大受欢迎。首先，这是第一次有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作品被引介给波斯文读者。其次，引介的时机也恰到好处。因为此时的伊朗人——或许最感到幻灭的莫过于伊斯兰左翼干部——开始对宗教政府感到质疑，他们面临的问题刚好与霍布斯提出的问题相同。如果国家不是真主的代理人，那么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必要，国家的义务是什么？巴什里耶赫详细说明这类问题，提供客观的分析工具给革命分子，因为这些焦虑的革命分子正急于对政治生活作出崭新而深刻的理解。有些人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适切描述了他们建立的制度，「宗教学者的政治管

理」就是伊朗的利维坦。有些从乌托邦希望中醒悟的人十分欣赏这名英国哲学家对国家不带感情的评估。

留学英国期间，巴什里耶赫也发现了克莱恩．布尔顿。在此同时，他也从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尼可斯．普朗札斯的作品中接触并且接受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被资本阶级掌握的简单工具，而是利益与同盟进行动态互动的场所，在互动的过程中，就连工人阶级也会被收编进去，转而维护资产阶级特权。巴什里耶赫吸收布尔顿、葛兰西、普朗札斯与其他人的思想，并且以伊朗革命与革命带来的不安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尽管在他写作之时，伊朗的动荡仍是现实发生的事件。

这个论文计划刚好符合巴什里耶赫的超然性格。在他的家乡，好战分子兴起，君主制倒台，权力斗争随之展开，数千人死亡，极端神权意识形态不仅击败其他敌对教条，也扼杀所有初萌芽的渴望。在伦敦，巴什里耶赫读遍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波斯文资料。一九七九年，他短暂回伊朗探亲一个月，然后在将近一年后又回去一次，每一次都带了满满两个大行李箱的报纸、小册子与书籍返回英国。巴什里耶赫仔细提供各项文献证明，描述霍梅尼领导的激进派教士、自由运动的温和伊斯兰自由派人士、圣战者组织的激进派穆斯林以及左翼分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他所撰写的从一九七九年到

一九八二年的伊朗革命巩固过程，在一九八四年他的博士论文《伊朗的国家与革命》出版后成为经典。只要是描述后革命时代初期的作品都不能不引用这部论文。在论文中，巴什里耶赫认为伊斯兰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运动，起因是旧社会阶级反对现代主义而产生的憎恨。

巴什里耶赫撰写论文时，刚好是穆萨维执政之初，伊斯兰共和党终于巩固了政府。巴什里耶赫相信，热月已经开始。但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巴什里耶赫归乡回到他几乎不认得的国家与大学。伊斯兰学生协会比大学学系或行政单位更有权力。革命卫队驻扎在校园大门，对进入大学的人士进行搜身。老一辈的教授——巴什里耶赫学生时期的老师——遭到孤立，日子过得很不愉快。学系的新老师很多是在宗教机构里仓促受训，然后派到大学传布意识形态。巴什里耶赫很快就发现，课堂里不可能有开放讨论，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经过精挑细选，确定忠于新政权才能入学。他有两门课——一堂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伊斯兰政治理论，另一堂是检视现代化理论——引起了审查单位的疑虑，不到一个月就被取消。巴什里耶赫于是转而教授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社会学。这些课程过去曾经开设过，课程内容不会直接触及伊朗的现实，要到数年后，当局才感到这些课构成威胁。

所以，在拉夫桑贾尼开始执政时，巴什里耶赫在德黑兰大学教授政治社会学、革命理论与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他从讲台上望去，无法确定谁才是他的学生。他知道大学行政单位让两伊战争的「殉难者」亲族、退伍军人以及与新政权密切相关的家族优先入学。他也知道校园里到处都是右翼的宗教团体。或许他怀疑比较好的做法是与学生保持距离，对这些学生了解得愈少愈好。他对学生说，他的目标是尽可能用最具说服力的方式引导他们认识思想家：当他教授马克思时，学生会相信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当他教授霍布斯时，学生会以为他是霍布斯主义者。巴什里耶赫不知道，或选择不去知道，他的课堂里坐满了副部长与其他失势伊斯兰左翼的重要人物。

拉夫桑贾尼始终是一个与朋友维持紧密关系、与敌人维持更紧密关系的人物，他精心安排将左翼分子逐出政府，却又为左翼的思想家占位符。拉夫桑贾尼把这个预留的地方称为战略研究中心。这是总统办公室辖下的智库，不过总统从未咨询过他们。一名官员日后解释说，这个机构不是动态的思想活动中心，而是用来收容左翼分子，让他们闭嘴领薪水的地方。当战略研究中心的智库人员忙着辩论与提出另一套观念时，政府只顾着从事自身的事务，而完全不理会他们。

穆罕默德．穆萨维．霍伊尼哈是战略研究中心第一任主

任。与他的许多伊斯兰左翼盟友一样，霍伊尼哈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过去。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霍伊尼哈担任伊朗的检察总长，他无可置疑地与伊朗早期的恐怖统治有关。他也是一九七九年攻占美国大使馆的激进学生的精神领袖。但他的助手说他是个有着开放心灵的人，而且抱持着非正统的宗教观点。霍伊尼哈坚持战略研究中心必须研究保守观念与保守思想家，而且要与拉夫桑贾尼预算办公室的自由派技术官僚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的智库人员必须邀请这类人物到中心来，与他们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认为这么做至少可以让这些左翼智库人员透过对手的观点来衡量自身的想法。此外，这么做也能让中心树立起宽容与文明的楷模，而这正是中心最终要宣传的民主思想学校的主轴。在中心内部，伊斯兰左翼开始将自己形塑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参与式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将被称为改革，而其阐释者则被称为改革派人士。

战略研究中心在德黑兰市中心有两个分支单位。社会与文化计划办公室位于市中心偏北一些。办公室中最知名的智库人员包括一名前美国大使馆人质绑架者，如今他对政治抱持着世俗观点，以及一名前革命卫队军事情报人员，他后来转而赞赏索鲁什以及被剥夺接班人地位的阿亚图拉蒙塔泽里。

战略研究中心最著名的分支单位或许是比较靠近政府

核心，位于德黑兰市中心马尔珍街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包括中心的外交政策与经济部门，中心里的智库人员，最知名的不仅与战略研究中心有关，也与改革运动关系密切。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是来自德黑兰南部身材魁梧的年轻激进分子，曾经为总理穆萨维工作。由于革命分子猛烈抨击而且解散了受人鄙视的情报单位萨瓦克，因此使得革命政权在两伊战争开打时居然没有情报单位可以派遣。哈贾瑞安是穆萨维政府派来建立新情报部门的人员，一开始直属于总理办公室，之后则为伊斯兰共和国工作。哈贾瑞安为情报部门草拟法规，然后在国会立法通过后于新部门工作。等到他离开情报与安全部前往战略研究中心任职时，他对革命的走向已有深刻的认识并且产生一股痛苦而不祥的预感。至于他在情报部门看到什么东西使他产生这种不祥的感受，即使他的朋友也很难猜得到。

与在《地平线》的同事一样，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也怀疑伊斯兰共和国需要重新认真思考——沙里亚蒂与霍梅尼的革命伊斯兰主义导致伊朗走向新的专制，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政治体制都需要从这种专制中解放出来。哈贾瑞安与两名同事两度前往库姆。在那里，他们成功说服反对既有体制的年轻教士穆赫辛．卡迪瓦到战略研究中心担任伊斯兰研究部门的主任。

卡迪瓦有一张老实的脸孔与随和的笑容，他的门牙之间有缝隙，兴奋的时候说话会跳过一整个音域。卡迪瓦曾在大学攻读哲学与社会学，也曾在库姆的神学院向蒙塔泽里学习。两伊战争期间，卡迪瓦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在胡泽斯坦前线担任类似随军教士的工作。驻防前线时，他开始质疑霍拉姆沙赫尔之后仍要继续战争的政策。这些疑问引发了其他的怀疑。霍梅尼死后，卡迪瓦着手撰写一本质疑「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著作。他认为:「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不过是伊斯兰化的君主制理论，主要受到柏拉图与愚昧的波斯历史影响，而与什叶派的教义无关。他相信，教士在社会上具有权威，但在政治结构内部则毫无权力可言。他支持代议制民主，认为不该有国王，也不该有最高指导。当审查单位不允许他出版这本书时，他感到十分沮丧。但身为战略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卡迪瓦还是将内心的挫折抛诸脑后。

由于卡迪瓦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批判主要放在法律层面而非神学层面，因此伊斯兰左翼的思想家一开始接受的是卡迪瓦而非索鲁什的说法，索鲁什认为不仅要对霍梅尼的国家理论进行大幅修正，甚至连更广泛的伊斯兰教领域也要做出调整。哈贾瑞安与在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对索鲁什相当熟悉，甚至参加偶尔在《地平线》举行的聚会（哈贾瑞安比其他人更常参加），但一开始他们只能算是外人。他们受的影响主要

来自马克思而不是波普尔，而且起初他们把索鲁什与索鲁什自己写的反马克思主义长文以及伊斯兰主义运动右翼联想在一起，至于他们自己则是来自于左翼。战略研究中心思想圈的成员尤其关切索鲁什对伊斯兰左翼的诠释过于简约，而且与宗教连结得太少，与世俗领域连结得太多。索鲁什抱持的大体上是现代化乃至于世俗化的思想，这令他们颇为担心。但他们还是认真看待索鲁什的观点。其中一名智库成员日后提到，毕竟索鲁什揭露了伊朗极权主义的根源，而且提出宗教多元主义与哲学的节制来做为对抗极权主义的良方。逐渐地，伊斯兰左翼不再有所保留，决定转而支持索鲁什。索鲁什自己则是变得愈来愈激进；经过数年的时间，他逐渐将伊斯兰左翼分子引领到一个陌生之地。

波普尔与英美分析哲学在《地平线》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政治社会学在战略研究中心的地位。哈贾瑞安与许多伊斯兰左翼的同事一样，在革命前深受沙里亚蒂的影响。但实际统治的过程引发的问题不是沙里亚蒂狂野的诗文所能响应的，这些都是与政治和国家职能相关的明确而实际的问题。即使是对哈贾瑞安这些人而言特别重要的马克思，面对复杂问题也只能提出最不管用的解决方式。哈贾瑞安在革命时期读的是机械工程，他在主持新智库部门之余，又回到德黑兰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受到文雅的年

轻政治社会学家巴什里耶赫的影响。

除了哈贾瑞安、两名来自哈塔米指导部的官员、一名未来的内政部副部长与一名未来的外交部副部长，还有许多刚崭露头角的政治人物为了满足求知的渴望而群集于巴什里耶赫的课堂。他们全是虔诚的人，许多人的宗教观比绍鲁什圈子的人更保守，对伊斯兰国家也更投入；但他们却接受巴什里耶赫的世俗背景，因为巴什里耶赫与索鲁什不同，他对马克思主义态度友善，而马克思主义构成这群人另一半的政治观。他们知道，驱使他们成为革命分子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做出修正。马克思主义不够细致。从巴什里耶赫身上，他们获得一条受马克思影响却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这条思路是分析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这条思路专注于社会力量、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而这样的多样性使得国家成为斗争与冲突的发生场地。他们的革命已经完成，但他们可以看出国家还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物。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持续动态关系，巴什里耶赫向他们引介了普朗札斯与葛兰西以及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不仅是国家的一部分，对于结构上的对立也是一道活门。哈贾瑞安与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无法接受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全盘反对，于是转而学习巴什里耶赫引进、诠释与默默适用于伊朗脉络的政治社会传统。

在伊斯兰共和国建国的头三十年间，巴什里耶赫写了十六本书，翻译了七部作品。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篇讨论革命理论的论文，文中将这些理论适用于一些实际发生的革命上，包括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这本印行了十五版，被巴什里耶赫视为重要著作的书籍，书名叫做《政治社会学》，书中检视了社会力量在政治生活扮演的角色。他也为一般读者写了《每个人的民主课程》；此外还有一本受傅柯影响的现代性社会学著作。巴什里耶赫把巴林顿．摩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翻译成波斯文，此外也翻译了霍布斯、哈伯玛斯与傅柯的作品。他最具争议的著作是一篇谈论宽容的论文，他认为强迫人民信仰宗教或执行宗教仪式，最终会因为信仰成了一种义务而使信仰受到损害。在另一篇论文中——在战略研究中心引起广泛讨论，巴什里耶赫认为有益的反对意见是必要的。

伊斯兰左翼分子很快就重整成为改革派人士，他们宣称巴什里耶赫是他们的导师。但巴什里耶赫就像过去的法迪德那样否认他们的说法。从他冷静的社会学家视角来看，这些人不过是国家内部派系斗争的参与者，他们是被边缘化的菁英，试图让自己重新挤进权力结构。为了这个目的——根据巴什里耶赫日后的说法，这些人想提升自己的目标与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把民主理论当成政治工具。几年后，巴什里

耶赫沉思道:「或许每个地方都是如此，民主这个抽象观念只有在做为一种真实有形的政治需要而被运用时，才能真正获得实现。」他表示，这些改革派人士「发现自己身处于各种对伊斯兰政府的不同诠释或不同意识形态之中，在这种状况下，只有竞争的理论最适合他们。所以他们从竞争的观点来理解民主。参与与竞争，这两者都是工具，而非民主的目的」。

尽管如此，当哈贾瑞安邀请他到战略研究中心讲授一系列课程时，巴什里耶赫还是答应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分析革命的进程。巴什里耶赫当时甚至指导哈贾瑞安撰写博士论文，探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弥赛亚主义。他不知道当时哈贾瑞安才刚离开情报部，也不认为这些授课是一种政治干预，他以为这只是在大学外进行的课程。对于听众来说，意义则不仅止于此，巴什里耶赫的课程就像一座鹰架，从这座鹰架上将建立起伊斯兰共和国的新外观。

民主观念原本在伊斯兰共和党意识形态倡导者眼中是一个滥用的词汇，却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掀起风潮。再加上索鲁什主张的宗教可以从多重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宗教随着历史而变迁，宗教不会只有单一一种真实的解释，所有的说法似乎暗示政权，即使是宗教学者本身，不能垄断真理，也不能正当地独占权力。

这群被称为改革派的思想家与政治人物，主要来自三个机构：《地平线》、战略研究中心与哈塔米主掌的指导部。但这些圈子呈现同心圆的状态：这些人彼此认识，当《地平线》举办晚宴时，三个团体的人都会参加。他们争论当前国家最急迫的问题，也就是宗教在国家行政组织里扮演的角色。身为改革派，关注的就是如何巩固国家的共和面向与反对教士的统治。这么做意味着要对宗教做出动态的理解，也就是对现代国家里现代民众的需求与现实做出回应，以及质疑——无论如何拐弯抹角地进行——「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极权式父权主义。不过，改革派的做法确实符合他们为自己的计划取的名字，他们认为自己并非公然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相反地，他们是共和国核心圈的一个派系。他们要透过改革保存革命国家，而改革要透过通情达理的主政者之间的对话与协商来达成。

在这种状况下，无论在当时还是从日后来看，我们始终不清楚总统拉夫桑贾尼是改革派的朋友抑或敌人。拉夫桑贾尼的经济自由主义遭受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与战略研究中心有关连的改革派。但一九八九年后，左派在全世界普遍衰退，这些思想家发现自己愈来愈倾向于社会民主或福利国家自由主义，而这样的愿景未必无法与拉夫桑贾尼技术官僚中最自由派的人士兼容。到了一九九六年，随着冷战结束与改革

派思想家转向更民主的国家愿景，前伊斯兰左翼也放弃了反美的主张。此时的改革派，似乎比拉夫桑贾尼协助夺取国会多数的强硬派，更可能成为处境艰难的总统的盟友。

尽管如此，拉夫桑贾尼仍须对最高领袖与右翼人士有所交代。一九九二年，拉夫桑贾尼不得不让霍伊尼哈离开战略研究中心。他从安全部门找人来取代这名激进派教士。哈桑．罗哈尼与拉夫桑贾尼关系紧密，但他对右翼的态度远比对改革派来得友善。他以最高领袖的代表身分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罗哈尼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让战略研究中心不再成为改革派思想的巢穴。中心一名智库人员回忆罗哈尼如此说道：「如果你们以为我们会相信你们说的那些民主的好听话，你们就错了。我们知道你们想推翻政权，但我们不会让你们如愿，因为我们不会犯下与巴列维国王相同的错误。」[8] 罗哈尼禁止中心智库人员对贫困、不公义、政治发展或反对意见继续进行研究；卡迪瓦只好停止他对什叶派统治理论的研究。此外，罗哈尼也禁止巴什里耶赫进入中心，甚至宣称他不该从过去所做的工作获得酬劳。当新主任让一名线人渗透到卡迪瓦在库姆进行的会议时，这名线人意外将报告传真到卡迪瓦盟友的办公室。智库成员群情激愤。他们想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到监视。某天早上，这些智库人员前往中心上班时，却被挡在门外不准进入。

自从拉夫桑贾尼协助保守派在第四届国会大选取得多数以来已经过了四年。一九九六年，由于拉夫桑贾尼提出的许多计划不是陷入困境就是遭到反转，他知道自己在下次国会大选时必须做出不同的选择。对他来说，是到了该支持前伊斯兰左翼的时候。拉夫桑贾尼觉得温和左翼分子是可接受的，这群人现在已经改头换面成为改革运动人士。拉夫桑贾尼的温和右翼与初生的改革运动共组同盟，成立了建设公仆党，强调法治、经济重建以及以科学与科技为基础进行发展。在一九九六年国会大选中，同盟的改革派提出政治自由主义，包括言论与集会结社自由。直到近期为止，学生团体对拉夫桑贾尼来说一直相当关键，他们也认为建设公仆党是民主改革的推动者而决定予以支持。新成立的同盟在大选中取得八席。

最近被逐出战略研究中心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称为市民社会的非政府空间里找到了新据点。某个离开中心的团体发行报纸，报纸名称是《你好》，由前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霍伊尼哈担任总编。三名前战略研究中心智库人员创立民调机构，称为「未来」，这使他们能不受国家资助或干预，独立进行后革命时代伊朗的社会学研究。其他人如哈贾瑞安则在国会大选后开始投入政坛。哈贾瑞安为改革运动界定目标与策略，使改革运动可以在宪法的合法架构下扩大人民参与的角色。

有了建设公仆党，拉夫桑贾尼终于组成有效的同盟，使他拥有政治力量来推动政策。但当他准备大施拳脚时，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也到了尾声。在国会大选成功的鼓舞下，总统发言人大胆建议修宪让拉夫桑贾尼能继续担任第三任总统。强硬派感到愤怒，而哈梅内伊也公开否决这项提议。拉夫桑贾尼无法继续担任总统，而他也不打算让右翼有机会担任，但问题是建设公仆党缺乏能激励人心的人选。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部分未加入建设公仆党的伊斯兰左翼分子宣布推举穆萨维参加一九九七年总统大选。穆萨维是伊斯兰左翼最具声望的人物：他是前任总理，是霍梅尼的爱将，曾带领国家渡过战争与匮乏。不过，对于支持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人来说，穆萨维也是造成分裂的人物；而穆萨维与拉夫桑贾尼在重要经济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此外，就伊朗的选举周期来说，此时宣布参选似乎太早。但穆萨维宣布参选却迫使右翼跟着表态。强硬派推举国会议长阿里．阿克巴尔．纳提格－努里参选总统，他们表示其他人没有必要出来竞选，因为纳提格－努里显然是最适当的人选。

三个月后，十月，穆萨维宣布退选。或许穆萨维是受到老对手的威吓，这名老对手现在正坐在权力的顶端。几年后，有传言指出，当哈梅内伊被提名担任最高领袖时，他才觉得自己终于击败了宿敌，在霍梅尼死后，他便禁止穆萨维参与

或甚至谈论政治。如果传言属实，那么显然解释了穆萨维耐人寻味的沉默。因为即使在他过去的顾问、部长、同事与朋友兴致勃勃地讨论社会契约理论、葛兰西、波普尔与伊斯兰教时，穆萨维却消失在沙希德．贝赫希提大学的建筑系馆里，成了一个供人臆测的政治谜团。

拉夫桑贾尼不可能支持纳提格－努里，尤其在他无法取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拉夫桑贾尼想动用自己的权力对付强硬派：他要向他们证明，他们需要他。但他已无计可施。终于，在一九九七年一月，一个不可能的候选人出现了。

穆罕默德．哈塔米，一个微笑、可亲的前指导部部长，他宣布他将竞选总统。虽然他支持拉夫桑贾尼充满争议的文化政策，他却绝不是一名煽动者。他的个性温和，行事谨慎，愿意妥协和解；对于当时激烈的哲学论战——索鲁什或法迪德，共和政体或神权政治——他的立场并不是那么清楚。支持他的改革派人士并不期望他能胜选。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选战来提升新刊物的能见度。但到了四月，建设公仆党同意哈塔米成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

第七章　伊朗历三月二日

穆罕默德．哈塔米唯一最大的资产是他的脸。这不是说他缺乏其他的特质：事实上，哈塔米博学、和蔼可亲且稳健，个性温和而愿意妥协。哈塔米生于一九四三年，父亲是来自亚兹德省阿尔达坎的大阿亚图拉。哈塔米年轻时在库姆神学院学习伊斯兰法学，之后又在伊斯法罕大学攻读西方哲学。一九七八年，哈塔米在德国汉堡主持一间伊斯兰研究机构，这里成为流亡海外的革命分子的聚集处。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这十年当中，哈塔米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担任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他拥有霍贾托尔－埃斯兰[1]这个教士头衔，身上总是穿着暖色调、剪裁合身的袍子。但在他担任公职期间，报纸一篇篇的报导描述的都是他的脸，彷佛当时伊朗的历史大事全从他脸上的皱纹表现出来。

这不是说哈塔米长得英俊，虽然以一个慈祥长者来说，他的确长得不差。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也长得英俊，至少有些伊朗人是这么认为。在美国，霍梅尼的脸成了穆斯林

愤怒与严肃的象征——霍梅尼的人生走到尽头之时，整张脸变得十分憔悴，蔓生的白色胡须尖端拉长了他的脸，双眼深埋在皮草般的弓形眉毛下方，尽管头发早已斑白，双眉却依然乌黑浓密。然而年轻时的霍梅尼有一张心形的脸、宽阔光滑的脸颊、动人的嘴形，以及炯炯有神的双眼；到了老年时，他那张历经沧桑的脸令人不寒而栗，面容铭刻着充满情感的智性，他的脸充满力量，象征着伊朗重新找回被忽视已久的民族尊严。穆罕默德．哈塔米则拥有不同的脸，他透过他的脸呈现出伊朗的另一种面貌。哈塔米的脸坦诚而亲切，随时随地带着自然的笑容。哈塔米有一副受欢迎的教授长相——这样的长相，即使你以前从未看过他，也会产生一种熟悉感。霍梅尼的脸带着权威感，但哈塔米的脸则是充满亲和力。

然而，从哈塔米的著作来看，这种吸引人的特质却隐含着矛盾。在战略研究中心、《地平线》乃至于他自己主掌的指导部里，哈塔米的同事满怀自信且毫无顾忌地引用西方与伊斯兰经典的观念，但哈塔米却依然抱持着前革命时期思想家的核心关切。他不想看到伊朗人在西方毒害下「认同遭到稀释」：「既无法成为自己，也无法成为西方人。」如同雷札．达瓦里，哈塔米也看到西方思想核心埋藏的有毒种子。哈塔米指出，在西方，启蒙运动的理念导致了帝国主义、暴力与无神论。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成为新资产阶级聚敛与夺权的

工具。此外，今日西方自身的经济与文化也面临内在危机。伊朗人应该通盘地观察西方经验，深入审视，并且试着理解，如此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然而，现代性与发展的观念来自西方；哈塔米认为，要成为已发展国家，意味着要采纳西方价值。而伊朗人确实有理由渴求发展。他们的国家在科学、经济与政治权力上远远落后西方，长期的专制统治不仅阻碍了政治与思想文化，也在伊朗宗教思想家心中形成寂静主义，使人重视形上学而忽视政治学。

麻烦的是，西方价值中最腐化的事物同时也是最吸引人的事物。西方重视自由：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饮食、穿着、思想与说话。人类很自然地受这种自由吸引。对比之下，伊斯兰教要求信众做到克制——要节制、诚实与正直，这些并非出于天性，人需要努力才能做到自我控制。因此，伊斯兰体系势必对个人自由构成妨碍，伊朗年轻人会问，为什么他们不能跟西方的年轻人一样享受自由。哈塔米认为，真正的自由源自于道德与精神的成长。但人需要指引才能了解这一点。哈塔米写道：「要让我们的社会稳定与强大，必须教导年轻人比享乐更有价值的道路，使他们从节制中得到快乐。」[1]

哈塔米相信，伊朗的未来在于拥抱伊斯兰文明。但这个

拥抱不应该是拥抱过去。穆斯林必须认识到，虽然他们的宗教是永恒的，但宗教的诠释却是动态的，要能够随着时代进行更新以因应现代世界。伊朗人可以重新诠释与赋予伊斯兰文明活力。但这必须从内心开始努力，而且需要自我认识：「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有坚定的认同感，我们就能批判传统；没有传统的民族总是缺乏严肃思想。」2

如果伊朗知识分子在挖掘西方最有用的现代观念的同时，又要舍弃西方有毒的核心——如果他们要深入考察伊朗与伊斯兰的传统与处境，以此来批判与更新当地的文明——那么他们就需要自由的空间、新鲜的空气以及出版自由这类事物。然而，尽管哈塔米提出警告，认为应该设下一些限制，他还是支持信息自由以及与西方对话：「一个有活力的伊斯兰社会，绝不能采取孤立的文化策略。」[3]哈塔米写道。日后，哈塔米将强调民众参与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他要求民众监督、评价与批评政府的表现。「政府的正当性源自于人民的投票，」哈塔米宣称，「而人民选举产生的强大政府是代议制的、参与式的与负责任的。伊斯兰政府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主人，伊斯兰政府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应该对所有国民负责。」[4]

从哈塔米的著作可以看出，哈塔米与改革派最具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相距甚远。虽然他的分叉式宗教观——核心原封

不动，但在诠释与法学上则是动态的——显然受到索鲁什的影响，却未达到索鲁什令人晕眩的高度。哈塔米依然是革命环境下的生物，或许这是适当的。毕竟他竞选的是一个历经伊斯兰革命未满二十年的国家的总统，而不是思想前卫的代表。

尽管如此，在他有时显露的惋惜与卑微的微笑以及在他平静而诚挚的言语中，哈塔米似乎提供了别的希望。哈塔米的脸不是由秘密警察的棍棒与拳头统治的脸，也不是用绞刑台让批评者噤声的政府的脸。哈塔米的脸不可能成为执意孤立于世界的国家的象征。哈塔米尤其相信——或许就是这一点最终让他受害——对话的力量与必要性。

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从《地平线》获得的比他在印制海报时期梦想的来得多。他终于在这里找到文化复兴的媒介，不仅充满活力而创新，而且具有伊斯兰与伊朗固有的特色。然而，《地平线》才创立不久，穆斯塔法就离开了伊朗。他一直希望能到西方深造一段时间。他认为这么做可以让他更了解自己的社会。因此，在拉夫桑贾尼主政初期，他前往加拿大蒙特娄麦基尔大学攻读伊斯兰哲学博士学位。但不久他就得知，在他离开伊朗后，《地平线》内部开始酝酿冲突，他只好匆匆返国。

从穆萨维退选到哈塔米参与一九九七年总统大选的几个月间，哈塔米暗中与同事与熟识者见面，向他们征询参选的可能。阿克巴尔．甘吉至少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议。哈塔米告诉他的密友，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当上总统。相反地，他预期自己只能拿到三百万到四百万票。有了这样的支持，他们可以发行振奋人心的思想期刊，而当局想要关闭这样的期刊想必也会有所顾忌。甘吉对于这个做法很感兴趣。

《地平线》其他成员认为这是个可能产生重大结果的政治时刻，必须加以把握，因为《地平线》成立的宗旨不只是思想上的，还包括政治上的目的。穆赫辛．萨泽伽拉是这些思想家的领袖，他是年轻的技术官僚，曾经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担任产业部门长官，直到他与索鲁什的关系成为政治负债为止。萨泽伽拉相信，《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弥漫的改革主义不仅是伊朗思想的新潮流，至少从潜在来说，它也是更大规模动员的核心。一九九七年，当哈塔米的选战气势高涨之际，萨泽伽拉也要求《地平线》的成员组织起来。即使——尤其是——真的能够掌权，改革派也必然要面对一场与哈梅内伊的斗争。他们需要一个政党与一间报社：一个能让他们抵挡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基础设施。

战略研究中心的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同意这个想法。其他人，包括甘吉在内，则倾向于维持较为超然的立场——或

许只需要发行周刊，将自己定位成市民社会的压力团体，而非拥有野心的政党。他们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计划的命运与哈塔米的选战有过于紧密的连系。

穆斯塔法的朋友把他叫回德黑兰，让他来调解这场纷争，但等到他回国时已经太晚。《地平线》已经决定性且永久性地陷入分裂。虽然刊物并未因为这场争端而停刊，但团结在这份刊物下的思想圈却被新的对手撕裂。

穆斯塔法的立场并没有太多神秘之处。即使甘吉的取径过于世俗：对穆斯塔法来说，改革派的计划依然是思想性的，而且离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能好好推动这项计划，其所实现的目标将比参与政治更多且持续更久。身为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与理论家，改革派知识分子有机会撬开伊朗社会的硬壳——它的传统，它的威权政治——使伊朗社会再也无法对外封闭。然而，如果他们现在就参与政治，他们将在还没聚集足够力量之前，就必须面对处于权力巅峰的政权。为什么要赶在社会做好充分准备以及强硬派认为改变不可避免之前推动改革？政党可能被禁，报社可能被勒令停业。但改革、觉醒、复兴无法轻易停止。穆斯塔法认为《地平线》正走向这条路，而且即将卷入一九九七年总统大选之中，如此一来非但无法促成改革，反而会让改革胎死腹中。

此外，哈塔米并非担任总统的适合人选。要站出来对抗哈梅内伊，需要力量、技巧，以及最重要的信念。穆斯塔法在哈塔米身上看不到这些特质。他认为哈塔米有时倾向于法迪德而非索鲁什，倾向于海德格尔而非波普尔；哈塔米不是一贯支持这场思想运动的朋友，早在《宇宙报文化副刊》时期，这场运动就受到他令人不快的监督。穆斯塔法认为，哈塔米不是改革派人士。他的思想混乱，内心举棋不定，在政治上也左右摇摆。

穆斯塔法很直率地承认这件事受到他个人立场的影响。他是保守的地毯商人家族中的异类；他至少有一个兄弟是伊斯兰联合党成员，这是个市集商人组成的秘密结社，与教士组织中最强硬的分子过从甚密。穆斯塔法为了进行思想探索而放弃了家族事业。他在激烈的家族争辩中独排众议大谈改革前景。他觉得自己既受轻视又受重视，所有的兄弟都爱护他，认为他与常人不同，尽管他的立场完全与他们的信念相反。他担忧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同事与盟友投入政治体系之中，他知道这个体系只会羞辱与驱逐他们。对穆斯塔法来说，这场运动的重要性不下于他自己的尊严；他为此倾尽全力，这也是他从索鲁什身上获得的启迪。令穆斯塔法感到焦虑的是，索鲁什居然支持哈贾瑞安与萨泽伽拉的做法。他私下抱怨说，索鲁什成了哈贾瑞安与萨泽伽拉的囚犯。但几年后，

索鲁什淡淡地回忆当初他是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政治这条路，他对任何人都不具有敌意，而他怀疑《地平线》内部的不和也许是强硬派的人教唆的。

穆斯塔法返回加拿大，隐居在他的小公寓里，往后几年，他的生活只有家人、图书馆、课堂作业、法文与阿拉伯文练习、硕士论文。继续存在的只有他的博士论文。但是，当他从伊朗回到加拿大时，他的研究对他已不具任何意义。他放弃了博士论文并且转而从事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涉足的领域，那就是他从学生时代就极力摆脱的地毯生意。洛赫瑟法特兄弟长久以来一直催促理智的穆斯塔法把家族生意拓展到加拿大。穆斯塔法不像他的兄弟那么有经验，或许也不像他们那么精明，但没有人看出他内心的愤怒。

在伊朗，穆斯塔法是个重要但低调的文化人物。在加拿大，他是个勇往直前的商人，努力不懈地推销他的地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企图心与活力。他的家族声望转化成经济上的信誉，他一度有二十五箱货柜的波斯地毯停放在加拿大海关。他日后回忆，当时他疯狂且拚命地经销这些波斯地毯，彷佛要靠自己的力量席卷整个加拿大市场。他曾一度负债，之后又还清债务，这个经验让他刻骨铭心。但这一切都无法抚慰他情感上的挫折，他的真正计划遭到劫持，走上一条他反对的道路，而且与他的明智判断相左，他知道这终将付出

极大的历史代价。

哈塔米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的主要对手纳提格－努里由最高领袖指定。由于纳提格－努里深受欢迎，因此大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国是访问。其他参选人包括雷札．札瓦雷，他是司法部副部长与宪法监护委员会委员，以及穆罕默德．雷沙赫里，人称「可怕的阿亚图拉」，曾担任穆萨维的情报部长。但这两个人甚至连百分之三的票数都拿不到。从参选名单可以看出，纳提格－努里当选总统应该是毫无悬念。

从各方面来看，当局推派的总统候选人纳提格－努里仍坚持革命主张。他抨击西方的「文化攻击」，认为这将使伊朗陷入「腐败、堕落与懒散」[5]。唯有巩固本土的伊斯兰文化，才能让伊朗免于这种潜藏的入侵。纳提格－努里强调防卫巴勒斯坦以及与美国永久为敌。他透过政府部门从事选战，而且还是在政府正常办公时间进行。一开始，纳提格－努里的竞选人员完全没有发现哈塔米阵营的学生活动分子绘制与悬挂竞选旗帜直至凌晨，他们把竞选明信片丢进车窗，在街上唱着歌曲。

在选举前，哈塔米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他是个退休的知识分子，以美式风格从事选举，并且搭乘巴士巡回各

省，他受欢迎的程度是过去伊朗选战所未有的[6]。哈塔米是个魅力超乎预期的政治候选人。他心胸开放，对选民友善，尽管穿着优雅的袍子，但谦虚的风范正好投合后革命时代伊朗民粹主义的胃口。哈塔米的理念——法治、市民社会、政治发展——直接来自于《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这些思想温室。但他让一般民众得以接触到这些理念，民众对于这些事物的渴望远比他的幕僚最热切希望的更为强烈。

哈塔米承诺，未来的伊朗，政府将不会保持沉默。伊朗民众缺乏一切求助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市民社会：独立的报社，草根的社团、政党、权力制衡——对敢于怀抱希望的人来说，甚至还想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以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虽然哈塔米穿着教士的袍服，头上裹着黑色缠头巾，标志着他是赛义德（seyyed）或称「先知的后代子孙」，却还是提出了这样的未来。哈塔米不是个激进分子。投票给哈塔米的人，心中通常怀抱着希望，相信伊斯兰共和国能有更好的未来，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仍有可能带来解放。

尽管如此，哈塔米必须面对当局势力与最高领袖权威的连手打压。长期以来，哈塔米只能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天生的魅力进行选战。然而，就在大选前两个月，他意外取得一项极大的战术优势。一九九七年三月，拉夫桑贾尼与他的建设

公仆党同意让德黑兰市长戈拉姆侯赛因．卡尔巴斯希支持哈塔米，而且让整个德黑兰市政府机器接受他的调度[7]。现在哈塔米有了充足的金援，而且在拥有伊朗五分之一人口的首都立起了竞选广告牌。到了五月初，也就是大选举行的月分，情势已经愈来愈明显，哈塔米不仅有后来居上的可能，参与投票的伊朗人也可能成为一九七九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面对这样的状况，改革派感到惊奇，但还是半信半疑，甚至未预先为哈塔米拟好胜选感言。可以确定的是，投票可能出现舞弊。哈塔米的弟弟穆罕默德．雷札．哈塔米向一名外国记者表示：「选前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已经确定哈塔米先生将会胜选，但如我所言，我们不确定这个胜选的结果是否会获得公布。」[8]哈塔米的选战吸引了拉夫桑贾尼的注意，毕竟他仍是现任总统，掌握了幕后庞大的人事资源。五月十六日，在主麻日礼拜上，拉夫桑贾尼宣示，最糟的罪莫过于选举舞弊。哈梅内伊也被逼着表态。他口头上重申相同的原则，他说道：「我不允许任何人在这场选举中舞弊，这不仅违反了宗教，也违反了政治与社会伦理。」[9]

大选的前两晚，《地平线》成员聚集共进晚餐。有人表示哈塔米仍然落后纳提格－努里，但两人的差距已经拉近。离开战略研究中心后创办了民调机构的几名社会科学家做了民意调查，他们选择这个时候公布最新调查结果，哈塔米将

会以压倒性的多数赢得这场选举。结果不出所料，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大约八成的伊朗选民投票，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九把票投给了哈塔米[10]。

温和、容易妥协、缺乏信念——几年后，哈塔米最亲近的盟友与幕僚将会提到，他们从哈塔米身上始终可以看到这些悲剧性的缺点。一九九七年，在这场被称为「伊朗历三月二日史诗」的大选之后，伊朗依然是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方。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对于这点说得尤其坦率，他也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到十年前，他原本是霍梅尼的接班人，后来因为反对监狱大屠杀而被剥夺资格。

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严守政治沉默已将近十年。现在，在一九九七年的十一月，他罕见地在库姆发表演说，除了宣泄他的愤怒，也概略陈述他在这段沉寂岁月里构筑的愿景。也许，他知道这么做将使他失去他尚未失去的东西。也许，他一点也不在乎。

蒙塔泽里是「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这个教义的创始人之一，他表示自己过去认为最高领袖可以在巴列维国王滥用权力后成为对抗专制主义的利器。宗教学者——最初是广受民众爱戴与尊敬的霍梅尼——可以制衡总理与总统的权力，确保两者无法进行绝对统治。然而实际的运作却与理想有很

大的差距。最高领袖反而成为绝对的统治者。人民选举总统与国会负责执行人民的意志，但这些民选领袖却缺乏权力。蒙塔泽里懊悔地说，最高领袖掌握所有权力，却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蒙塔泽里提醒听众，在什叶派传统中，只有十二位伊玛目不会犯错。虽然霍梅尼的追随者尊称霍梅尼为「伊玛目」，但即使是霍梅尼也只是凡俗之躯，而非神圣不会犯错之人。不仅如此，霍梅尼的言行在保守派教士里属于僵化恪守《古兰经》的类型。蒙塔泽里抨击对霍梅尼的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蒙塔泽里总是回到《古兰经》的内容，引用先知的说法与其他伊玛目的行谊，认为必须进行某种动态的「伊智提哈德」（ijtihad），也就是从当代的角度来诠释神圣经典。当蒙塔泽里提到什叶派创立者伊玛目阿里时——蒙塔泽里经常以他为例，他形容阿里是个温和、有弹性而且自信的人，他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应学习的典范，也凸显出哈梅内伊的难以相处。

蒙塔泽里无畏地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做法令人尊敬，而这也使他成为政治教士的异数。他不担心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可能带来的喧嚣与争吵。他不懂哈梅内伊及其下属为什么觉得批评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也不担心教士未预先选定候选人，民众就会陷入错误。伊朗人都是好穆斯林，就算选出错

误的国会议员，这些人也只是少数，在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好议员的状况下，这些不良的议员起不了什么作用。蒙塔泽里相信民众的智慧与善意。《古兰经》的经文要求统治者要「协商」。有些伊斯兰学者，霍梅尼也是其中之一，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指协商是许可的而非必要的，而且无论如何领导者需要协商的对象是有资格的伊斯兰学者，而非一般民众。蒙塔泽里对于这段模棱两可的经文采取了民粹主义的观点。至少到了一九九七年，他认为（与人民）协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政府正当性的基本根源。

在一九九七年的演说中，蒙塔泽里斥责巡逻伊朗大学校园的武装民兵。Hezbollah 的意思指「真主的党」，但蒙塔泽里坚持，没有任何一个真主的党会肆无忌惮地高呼口号而且用棍棒殴打政治对手。伊朗人民不应该受到这种野蛮力量统治。相反地，蒙塔泽里认为，伊朗人民应该拥有一个具有政党、权力分立、自由选举与言论自由的体制。而根据他的看法，根本不应该由宪法监护委员会选定候选人。总统与国会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这名原本可能成为最高领袖，却在一九八八年被剥夺资格的男子，对于他眼前这个体制内最高职位的扩张与滥用提出抨击。最高领袖的存在不是为了立法、为了偏袒某人、为了打压异议人士或确保任何特定的政治派系能够获胜。最高

领袖不应该指挥警察或军队，不应该成立属于自己的司法外特别法庭来管理教士，而哈梅内伊现在做的就是如此。最高领袖应该要在宗教法的领域内「指导」国家事务，本质上来说，最高领袖是政府的精神顾问。即使如此，最高领袖也不应该无视民众的意志或让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之后的作品中，蒙塔泽里还明确表示，最高领袖应该由民选产生，而且要向人民负责。

蒙塔泽里毫不隐讳地轻视那名取代自己成为最高领袖的男子。哈梅内伊无法成为而且未来也无法成为像霍梅尼与蒙塔泽里那样的法学权威。但就在成为最高领袖后不久，哈梅内伊试图让自己迅速取得高级教士的地位，而这个地位其实已经逾越他受的训练、他发表的作品以及学术社群对他的认可。蒙塔泽里让最高领袖知道，他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应该加以反对的。哈梅内伊的做法「堕落了」传统的什叶派权威世系，使这个世系退回到「幼稚期」[11]。

哈梅内伊对「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诠释，实质上架空了民选官员的权力。蒙塔泽里不久将指出，总统无法实施法治，行政工具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警察只向最高领袖回报，而最高领袖还主张自己能控制司法。此外，最高领袖可以召开特别教士法院，目的是为了整肃异议教士，而最近法院的管辖范围甚至扩大到「侮辱」教士的俗人身上。这个特殊的

革命法庭并不符合《古兰经》协商的原则，但霍梅尼与哈梅内伊却认为舍弃这项原则是适当的做法。事实上，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便开始扩充教士法院，使其拥有自身的安全网络，甚至拥有自己的监狱。教士法院的法官、检察官乃至于辩护律师都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而非向司法部或任何民选官员负责，而最高领袖倾向于从情报部与特别强硬的教士中选任法官。就连法院预算也由最高领袖监督而非国会[12]。

或许，接下来当特别教士法院将矛头指向蒙塔泽里时，也不让人意外。蒙塔泽里的一九九七年演说在核心的部分冒犯了哈梅内伊。特别法院对蒙塔泽里判处软禁的刑罚。革命卫队、巴斯基与情报部派暴民洗劫蒙塔泽里的家、办公室以及蒙塔泽里在库姆进行演说与授课的侯赛因宗教会所。根据蒙塔泽里回忆录的说法，这些安全部队听命于最高领袖办公室，他们破坏与查封了宗教会所，任由它沦为废墟。蒙塔泽里被软禁在自宅的二楼，所有通往屋外的门全被封死，仅留一扇门对外出入；而就在这扇门的里面，安全部队盖了一间小屋来屯驻武装卫兵。往后五年，除了自己的家人，蒙塔泽里无法见到任何人。

然而，蒙塔泽里的话语已经打破封住的门，传布到外界。蒙塔泽里在十一月的演说中表示，哈梅内伊已经让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与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几乎没什么差别的专制政

体。没有任何伊斯兰的事物是与压迫相关的。蒙塔泽里劝告哈塔米：「如果我是你，我会去找最高领袖，以适切而尊重的态度告诉他，每个人都知道你支持另一个候选人，但二千二百万人把票投给我。因此，这表示人民已经否定了现存的秩序。」[13]

＊ ＊ ＊

(1)霍贾托尔－埃斯兰（hojjat ol-eslam）意指「伊斯兰之证明」（proof of Islam），也是宗教界的头衔。

第三部　改革

第八章　连环谋杀案

突然映入眼帘的景象

让观看成了恐怖的梦魇，

就在这些景象吸引着你

欣赏这片点缀着白色橡树的广阔地貌时，

干瘪的尸体

冰晶般的脸孔

结了盐粒的尸身，

使劲抓住你的眼睛去改变它们。

——穆罕默德．莫赫塔里：《来自另一半》

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九岁时母亲去世，革命爆发，他在此时发现诗的存在。体格魁梧、面容忧伤、浓密的褐色鬈发与温暖而疲惫的眼神，夏赫拉姆在伊朗北部省分吉兰一个名叫夏夫特的村落的稻谷脱壳工人家中出生，在七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他与父亲以及所有兄弟姊妹睡在同一间寝室里，屋顶是用镀锌铁皮铺设的；不管家人如何劝告他多睡一点，天刚破晓，他就会起床运动与背诵诗歌。

夏赫拉姆不确定自己是否信仰真主。他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会祈祷，但与伊朗其他众多的工人阶级一样，他们家的

立场倾向于世俗左派。他的父亲贫穷，但自尊而守法。夏赫拉姆想要一辆脚踏车，他的父亲找到一个人愿意以他付得起的价格卖脚踏车给他。但当他与夏赫拉姆把脚踏车牵走时，夏赫拉姆的父亲想起自己没有跟对方索取收据。他们回头去找卖家，卖家说他无法开收据。让夏赫拉姆沮丧的是，他的父亲居然因此把脚踏车还给对方。

夏赫拉姆整个早上都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兄姊在学校，父亲在工作，弟弟巴赫拉姆在祖母家。就读四年级的他只有下午才有课。夏赫拉姆其中一个哥哥打扫顶楼时找到了两件东西，他觉得夏赫拉姆可能用得着。一个是老旧的小型电暖器，一个是破旧的诗集，里面收录了一些诗人的选集以及对诗作的评论，包括了伟大的波斯诗人海亚姆、哈菲兹、莫拉纳与萨迪。诗集的封皮已经快要解体。夏赫拉姆的哥哥亲手将这本书重新装订起来，然后交给夏赫拉姆。

小型电暖器少了插头。第二天早上，夏赫拉姆把电暖器裸露的电线接到二百二十伏特的墙壁插座上。强烈的电击将他击倒在地。下午，他的姊姊放学后发现夏赫拉姆不省人事。夏赫拉姆觉得自己没有死完全是运气好。

那位把电暖器与诗集拿给夏赫拉姆的兄长，是个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爱读书的人。夏赫拉姆小的时候，这个兄长

坚持夏赫拉姆必须读完书、写完读书报告才能出去玩。很想出去玩的夏赫拉姆于是读完了《小黑鱼》与萨玛德．贝赫朗吉的其他作品。有个老师给了夏赫拉姆一本书，夏赫拉姆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叫《哈萨纳克，你在哪里？》，书中讲述了一则晦涩难懂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七〇年，由穆罕默德．帕尔尼安以韵文形式写成，故事一开始的场景是天降大雪覆盖了一座繁荣的村落。害怕的村民纷纷躲进自己的家中。但是，一个名叫哈萨纳克的小男孩却决心找回云后头的太阳。他带领一群孩子，不顾父母的抗议，前往山中。大人们反对，因为山里面有野狼与大雪。你们会冻死在那里。但哈萨纳克还是率领孩子前往。

前往山区途中，他们遭遇野狼攻击。哈萨纳克知道，他与其他孩子必须赶在他们冻僵之前达成任务。于是他要其他孩子留下来对抗野狼，自己则继续上山寻找太阳。

现在只剩下哈萨纳克孤身一人，他毫不畏惧，一路往上爬，空气愈来愈稀薄，也愈来愈寒冷，他小小的身体抵挡不住严寒，几乎就要死去。尽管如此，他还是登上了山顶。他在那里发现了正在沉睡的太阳。

「太阳！」哈萨纳克叫道，「太阳！快起来！」

太阳被哈萨纳克的声音唤醒，开始冉冉升起，再次将光与热散发给村子，以及其他或远或近的村落，还有已经冰冻的高山。但是，太阳低头一看，在底下的山峰上，小哈萨纳克的身体早已冰凉没了气息。

此后，在其他孩子的耳中，在山中的岩石间，仍然回荡着哈萨纳克的声音。

「我将前去，我将移除冰雪。」他说道。

「我将前去，我将扫尽云雾。

「我将在乌云中清出一条道路。

「我终将找到太阳。

「凡是想看到太阳的人

「起身随我来！」

遭受电击之后，侥幸捡回一命的夏赫拉姆不敢再去碰电暖炉，而是拿起诗集开始阅读，这是他首次接触波斯文学的几个大师。他朗读这本书给自己听，而且是用尽力气大声朗读。这些诗作的情感发源地并非完全处于夏赫拉姆的意识生

活之外。夏赫拉姆开始写作。他把自己的诗拿给他的兄长看，兄长说他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诗人。

一九八一年，夏赫拉姆十一岁，巴尼－萨德尔担任总统，革命卫队与圣战者组织在市区进行巷战。在夏夫特，夏赫拉姆认识一个加入圣战者组织的男孩。这个男孩没有父亲，他很高，很穷，读了很多书。他在巷战中存活下来，而且短暂逃亡了一段时间，而后返回夏夫特来看他的母亲。枪声响起时，夏赫拉姆正坐在家中。他与家人朝那名年轻圣战者家中跑去，发现他家已被革命卫队团团围住。夏赫拉姆认出其中一名队员是另一个邻居家中的男孩。那名男孩拿枪指着夏赫拉姆与他的家人。「如果任何人往前一步，」他说道，「我就开枪。」

那名又高又穷的年轻圣战者正在母亲家中祷告，一名队员潜伏在窗边，一枪打中了他的前额。然后，攻击者进到屋内，把死者的头砍下来。夏赫拉姆看到他们把邻居的无头尸体拖到车内。那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他因为他的哥哥以及哥哥的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反对伊斯兰共和国。但从那时起，他打从内心反对伊斯兰共和国。

夏赫拉姆的青少年时期就跟一般青少年一样虚掷光阴。他用一年的时间完成高中前两年的课业，接下来就开始疏于

学习，甚至把诗抛在一旁，与朋友流连于吉兰首府拉什特的街头，对于不经意发现的街边新鲜事充满兴趣。有一天，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九八八年春天，十七岁的夏赫拉姆搬到拉什特。当他与朋友走在街上时，看到一个令他心动的女孩，他从未对其他女孩有过这种感觉。女孩名叫碧塔，住的地方离夏赫拉姆只有几条街。

夏赫拉姆打听到她的电话号码。但根据伊朗传统，最初见面必须由家人介绍，交往也必须由双方家长安排。约会在伊斯兰共和国是非法行为，重视女性荣誉的传统家庭也无法接受。所以夏赫拉姆只能打公共电话给碧塔，只要电话是她的姑姑、母亲或其他家人接的，他就马上挂电话。终于，碧塔接起电话。夏赫拉姆告诉她，他爱她。之后，两人开始偷偷打电话，有时还会到电影院见面。他们不敢上街，怕巴斯基以行为不检为由逮捕他们，此外也担心被碧塔的家人看到。直到一九九一年，两人终于结婚。夏赫拉姆觉得自己心中有某种东西正在萌芽。他重新开始写诗与阅读。

夏赫拉姆的哥哥在德黑兰担任排字工人，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诗人与作家。他把夏赫拉姆的诗拿给一些作家看，这些作家开始与夏赫拉姆通信，并且告诉他他们对他的作品的看法。夏赫拉姆与阿里.巴巴恰希时常信件往来，脸孔粗犷、满头鬈发的巴巴恰希是伊朗最富盛名的世俗文学杂志《周末》

的编辑。新婚的夏赫拉姆充满自信，一九九二年，他与妻子搬到德黑兰。

夏赫拉姆在拉什特有个朋友担任文化杂志编辑，他请求夏赫拉姆帮他一个忙。朋友问道，既然夏赫拉姆人在德黑兰，那么是否能代他向世俗诗人兼作家穆罕默德．莫赫塔里邀稿？莫赫塔里是伊朗文坛的著名人物，然而夏赫拉姆从未见过他。但他还是依照朋友的要求，靠着一通电话拿到了这名著名作家的稿子。

莫赫塔里邀请夏赫拉姆到他一个朋友家参加聚会。这是这位文学名人对一个力争上游的二十二岁诗人做出的慷慨之举。夏赫拉姆在聚会中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年少。但当莫赫塔里听到夏赫拉姆说话时，他肯定从这名来自夏夫特体格魁梧、目光温和的年轻人身上看到某种与他心灵相合的特质。当着朋友的面，莫赫塔里走上前去，亲了夏赫拉姆前额一下。

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不是那种会在聚会里嚼口香糖的人。但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夏赫拉姆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莫赫塔里却在作家聚会上嚼起了口香糖。夏赫拉姆现在心里想到的都是这些细节，无关紧要却又难以忘怀。

聚会中，作家们震惊地谈论起最近发生的可怕新闻。九天前，达里乌什．佛鲁哈尔与他的妻子帕尔瓦内赫在自宅遭

到杀害与肢解。佛鲁哈尔一家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分子。达里乌什死时七十岁，他曾在巴札尔甘政府担任部长，从事运动已超过四十年。他与帕尔瓦内赫批评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纪录。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布满了穿刺伤。据说凶手刺了达里乌什十一刀，帕尔瓦内赫则是二十四刀，每一刀都将刀子转了一百八十度。他们把达里乌什残缺的尸体面向麦加。谋杀案发生时，佛鲁哈尔家正受到情报部的严密监视。犯罪者不可能在无人注视下进入屋内。这对夫妇当晚宴请了几个宾客，佛鲁哈尔家的律师相信是这些宾客犯下杀人罪行，当达里乌什坐在书房说话时，他们趁机将他绑在椅子上，然后突袭正准备就寝的帕尔瓦内赫[1]。

达里乌什遇害的前两天，另一名作家兼政权批评者外出跑步，但再也没有返家。玛基德．谢里夫是沙里亚蒂的助手，在沙里亚蒂去世后负责编辑他遗留下来的作品。他也将尼采与德希达的作品翻译成波斯文。十一月二十四日，德黑兰警方在路旁发现他的尸体。在此之前的八月，左翼活动分子皮鲁兹．达瓦尼也因不明缘故失踪，遗体一直未能寻获。

莫赫塔里难道没有发现佛鲁哈尔家的事很不对劲吗？夏赫拉姆问他。夏赫拉姆觉得，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只是开始。

星期六，适逢假日，但为文化版面写稿的夏赫拉姆仍要上班处理周日报纸出刊的事务，此时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莫赫塔里失踪了。这个朋友是一名编辑，他请莫赫塔里写一篇文章，当他在约好的时间到莫赫塔里家拿稿时，却找不到莫赫塔里。

夏赫拉姆打电话过去，莫赫塔里的妻子告诉他，莫赫塔里在星期四傍晚五点出门购买灯泡与牛奶，从此音信全无。莫赫塔里的家人打算等假日结束再求助媒体。但夏赫拉姆力劝他们要早点采取行动。他的弟弟巴赫拉姆很快就在报纸上下了斗大的头条标题：「穆罕默德．莫赫塔里在哪里？」接着就是夏赫拉姆人生中胆战心惊的一星期。

夏赫拉姆在报社以及在一家名叫新计划的出版社工作，他与一群改革派人士合作，其中以阿克巴尔．甘吉最为知名。一群聚集在新计划出版社周围的宗教知识分子感到害怕。夏赫拉姆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他日后表示，当时大家不觉得莫赫塔里遭到逮捕，也没有他遭到逮捕的迹象。他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失踪，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三四天后，莫赫塔里的儿子在停尸间认出诗人的遗体。

同一天晚上，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赫也失踪了。普扬德赫是莫赫塔里的朋友，他是一名作家与译者，最近才

将〈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波斯文。他被人发现勒死在德黑兰西南方的夏赫里亚尔。

夏赫拉姆根据杀死莫赫塔里的凶手提供的证词重建了他的朋友兼导师在人生最后一刻经历的过程。夏赫拉姆描述这段历程以纪念莫赫塔里，彷佛这段痛苦的描述可以让夏赫拉姆回到过去，让莫赫塔里可以在爱他的人的陪伴下死去，而非孤独地陷入恐怖之中。

莫赫塔里当时前往德黑兰北区位于自宅附近的约旦大道商店购买牛奶与灯泡。他不知道有多达八人的袭击者分别搭乘宝狮与出租车尾随着他。当他返家的时候，其中一部车下来几个人向他出示传票。他们告诉他，他被捕了，并且要他上车。他们载着他在德黑兰北区绕行几个小时。他们的计划是在情报部位于贝赫什特．札赫拉的办公室杀害他，贝赫什特．札赫拉是位于德黑兰南方的一处大型公墓；但这次行动是保密的，贝赫什特．札赫拉的情报长官知道这件事，不过他的属下却毫不知情。这些暗杀者等待着，直到大楼空无一人为止。

在夜色掩护下，他们穿过墓园，把莫赫塔里运到情报部大楼，然后将他带到专门用来做一些恐怖勾当的房间里。他们让莫赫塔里俯卧着，用绳索缠绕他的脖子。他们坐在他的

背上并且抓住他的脚。有人用脚踩住他的脖子，然后拉紧绳索。他们把布塞进他的嘴里，不让血流出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人，懂得从指甲颜色的变化来判断一个人断气了没。当莫赫塔里停止挣扎且没了气息，当他的甲床变成了灰色，他们将莫赫塔里塞进宝狮的后行李箱，接着把车开到德黑兰东南方的雷伊水泥工厂后方。他们拿走莫赫塔里皮夹里所有的物品，并且将他的尸体丢弃在那儿。

在朋友与家人的陪伴下，穆罕默德．莫赫塔里的妻子看着丈夫的灵柩送上灵车。她走向前去，把一支笔放进棺木里。她说道：「我目送他带着他的武器离去。」2

革命前，伊朗的文学菁英多半来自世俗左派。革命后，世俗左派遭到搜捕，未遭到消灭的则噤若寒蝉，伊朗的诗人与作家转而退缩到私人领域。延续以往的文学风格进行写作将招致审查、监禁与流放。穆罕默德．莫赫塔里在一九八一年担任伊朗作家协会干事，在一九八二年时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作家协会遭到查禁。革命教条主义干部发展出新的文学，不仅赞美伊玛目，也改写了宗教叙事。世俗作家在极为疏离而危险的生活中度过十年。马哈茂德．杜拉塔巴迪是一名小说家与剧作家，从贫困中一跃成为老一辈的菁英；他日后表示，当时他一直过着彷佛有人拿刀子从背后顶着他的日子。没有任何主流政治人物或机构出面捍卫这名世俗作家。

宪法的约束也无法保护他。

接着则是拉夫桑贾尼的主政时期，以及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这个时期的宗教知识分子，包括索鲁什、卡迪瓦、甘吉、哈贾瑞安与其他人，都不是从伊朗旧知识分子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他们是出身下层中产阶级的传统人士，这些人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思想的优越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们使用的是宗教与革命的语言。这是一种充满撕裂感的语言，夏赫拉姆觉得始作俑者就是沙里亚蒂：宗教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将伊斯兰教以及追求自决与自由意志的革命驱力融合在一起。但由于改革派是政府内部的人士——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因此相较于世俗左派，他们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发起大胆而挑衅的政治自由要求。宗教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这个系统。有些人甚至是这些要求的建立者。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获得容忍。

在这些新宗教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相信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批判神权政治的不公义，甚至抨击神权政治的不虔诚，而他们也要求做到政教分离。前总理梅赫迪．巴札尔甘的一九九二年演说让世人留下主张世俗主义的印象。一年后，《地平线》对这篇演说又加以详细阐述。巴札尔甘在《地平线》的文章中表示：「只要宗教与政府（甚至意识形态与国家）合而为一，并且掌握在统治者之手，民众就被剥夺了言论自由

以及管理自身事务的意志。输家一直是宗教，不是政府。」巴札尔甘写道，事实上，伊朗人「看着这些伊斯兰与穆斯林脸孔自认为是奉宗教与政府之名行事……，他们因此逐渐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宗教知识产生怀疑」[3]。《地平线》编辑在为巴札尔甘的文章写序时提到，他们要为前总理遭受伊斯兰激进分子不当对待一事致歉，因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地平线》圈子的人：「现在，热潮已经消褪，激烈的激进主义已经结束，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已经明确，许多人现在正乞求得到他的原谅，特别是攻击他的政策的年轻一代。」[4]

世俗知识分子以审慎而兴奋的心情关注改革派知识分子逐渐转向接近世俗化的国家观点。世俗知识分子的处境远比改革派人士来得艰困危险。此外，宗教异议人士也为同为知识分子的世俗派人士创造了喘息空间。于是，趁着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初期对出版采取较为自由的政策，世俗派编辑开始创立杂志，其中包括了《周末》。世俗作家也开始发表文章。世俗派知识分子开始在秘密聚会时重新接触，并且将这种聚会称为「共识会议」。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搬到德黑兰时，他进入的就是这个作家圈子。

宗教知识分子也试探性地向世俗知识分子伸出友谊之手。他们的动作不能说完全不具有自利的考虑。把旧文学菁英涵盖到改革派圈子里，不仅能证明宗教知识分子有诚意推

动宽容与言论自由，也显示他们对文学的看重，毕竟世俗派作家依然是伊朗文化品味的翘楚[5]。另一方面，世俗知识分子也察觉国家已经改变，他们不可能无视与排除宗教知识分子而还能代表伊朗的高层文化。他们于是同意让宗教改革派阵营的一些人权与女权活动分子参与他们的共识会议[6]。

毕竟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一九九四年十月，一百三十四名伊朗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的标题是〈我们都是作家!〉，他们要求恢复已经查禁的伊朗作家协会，并且要求停止审查[7]。联署人表示：

> 我们都是作家！这意味着我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与出版我们的情感、想象、观念与研究成果。我们的文字作品，无论是诗文或小说、剧作或剧本、研究或批判，乃至于我们翻译世界上其他作家的作品，都应该不受干预或不遭阻碍地传递给读者，这是我们的自然、社会与公民权利。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在任何条件下，有权阻碍这个过程……

请愿书还强调联署人的善意。他们主张，无论政府或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如何抹黑他们，他们的本意均与政治无关。

他们只想建立作家的集体组织，取得一个表达自由的空间。如果国内外有任何政治力量声援他们，那些都不是作家们该负的责任。尽管如此，「无论任何状况，捍卫任何作家的人权与公民权，乃是所有作家的职责与义务」。

这封公开信的联署人中就包括了穆罕默德．莫赫塔里、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赫与其他为人所知的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

「连环谋杀案」这个词是贴切的。就像连环杀人犯一样，犯下这一连串谋杀案件的凶手有着固定的类型特征。他们多半避开宗教知识分子，专挑世俗作家、译者与知识分子下手，许多受害者甚至名不见经传。与连环杀人犯一样，这些凶手也有着特定的犯案手法：绞杀、注射钾离子使心脏衰竭，偶尔手段凶狠残忍，就像佛鲁哈尔夫妇的案子一样。受害者都是在出门工作、赴约、办事途中失踪。他们的尸体会在几天后被发现。凶手心狠手辣，行事缜密，早在穆罕默德．莫赫塔里遇害之前将近十年，他们就已经犯下杀人案件。一九九八年的杀人案件之所以引发危机，除了因为这一连串案件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且犯案手法极为类似，也因为这些凶杀案发生在哈塔米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当时伊朗人多半期待国家应该走向更宽容而非更压迫的方向。

伊斯兰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存在于国家的表象之下，完全不受民选政府及其部会首长的掌控。现在，这股力量就源自于情报部，情报部是最高领袖辖下安全体制最秘而不宣的组织。根据日后一些描述，所有暴力的行动不应该仅追究情报部的执行人员，而应该溯及意识形态的创始者，也就是强硬派教士的圈子。宪法监护委员会、情报部与司法部门就是这些强硬派教士的据点。这些教士称为哈格尼圈子（Haghani Circle），哈格尼是他们受训的神学院名称，他们在这里接受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赫－雅兹迪的教导，梅斯巴赫－雅兹迪相信，把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从肉体上予以消除乃是善尽符合公义的职责。「杀死伪善者不需要法院命令，这是伊斯兰教法加诸于所有真正穆斯林身上的责任。」梅斯巴赫－雅兹迪在一九九九年如此说道，当时正是连环谋杀案引起争议的时候。「伊斯兰的命令就是将这些人从高山上推下，毫无顾忌地杀死他们。」[8]

〈我们都是作家!〉肯定在什么地方触动了狂热捍卫「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者的敏感神经。世俗文学菁英在长期遭受放逐后重新浮上台面，对新文化秩序构成威胁。宗教与世俗知识分子结盟的隐患令他们无法容忍，尤其宗教知识分子愈来愈公然地质疑「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过去，仰仗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权威与魅力，这类讨论很容易加以遏止。但是，

随着一九九〇年代宗教智性主义的出现以及西式社会科学逐渐流行，大家开始主张理性的辩论，反对一味要求服从或符合革命精神。伊朗的知识分子与权力菁英之间开始出现无可弥缝的鸿沟，梅斯巴赫－雅兹迪与哈格尼圈子相信最高领袖的权威绝对而不可能有错，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最高领袖仍须做到符合逻辑，而且应该受到人民主权某种程度的限制[9]。

这些隐身在安全机构里的力量杀死的世俗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里毫无立足之地也毫无法律保障，凶手或许认为自己只是在善尽神圣责任。他们也许顽固地认为可以靠一己之力清除伊朗前革命时代的文学文化。他们或许也了解到自己一时间还无法对付他们的政治对手改革派人士，因为这些人尚未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于是他们将目光转移到世俗派思想家，企图杀鸡儆猴，警告改革派人士，有一道他们应该感到畏惧而不应该去踩踏的红线。

宗教知识分子并未因此缄默。相反地，索鲁什与巴札尔甘在同一期的《地平线》与其他刊物共同发表声明，抨击神权政治不仅以暴力侵害人权，也伤害了宗教尊严。一九九五年，巴札尔甘去世，他的追思仪式在伊朗革命伊斯兰主义的诞生地侯赛因宗教会所举办。在沙里亚蒂曾经慷慨陈词的讲经台上，索鲁什表示：「一个宗教成为压迫工具而民众遭到打击与剥夺的社会，要比毫无宗教的社会更加邪恶，因为后者

的压迫者并未以真主之名犯下罪恶，也未将自己的罪恶归于宗教。」[10]

伊朗的世俗知识分子成了无情死亡机器的猎物。根据纪录，从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八年，超过八十名伊朗作家与知识分子在类似的状况下死亡：遭到绑架、失踪、尸体被人发现。侯赛因．巴拉赞德赫曾经担任沙里亚蒂的助手，一九九五年一月，他在马什哈德被闷死。艾哈迈德．米尔．阿拉埃伊是伊斯法罕的一名作家与译者，一九九五年十月死亡，死状可疑。艾哈迈德．塔法佐利是一名作家与译者，一九九六年一月，他的尸体在德黑兰被发现，头骨遭到击碎。易卜拉欣．札尔札德赫是一名编辑与出版商，他利用传真机将公开信〈我们都是作家!〉发送出去，一九九七年二月，他遭到绑架，三月被刺身亡。六名前政治犯分别遭到绑架，他们的尸体于一九九六年在马什哈德被人发现。一九九八年四月，前总理穆沙迪克的孙女遇刺身亡。一九九八年九月，在克尔曼，担任老师同时也是诗人的哈米德．哈吉札德赫与九岁的儿子被刺死在床上。

一九九六年八月，大约二十名世俗作家，其中许多是〈我们都是作家!〉的联署人，一行人包车前往邻国亚美尼亚参加文学节。半夜，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搭乘的巴士正朝着悬崖急驶而去。司机故意松开手刹车，然后跳出车门逃

逸。一名乘客冲向前去踩住刹车，成功停下车子，车头已经越过绝壁，其中一个轮胎还差点悬空。

同年夏天，安全部队突袭德国文化专员的家中晚宴。出席的作家与知识分子遭到监禁与审问。法拉吉．萨库希也在其中，他当时担任《周末》的编辑，同时也是〈我们都是作家!〉的联署人。往后两年，萨库希一再遭到囚禁，而且被迫坦承自己参与了西方破坏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他被迫表示，《周末》遵循德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脚本。

这段期间，夏赫拉姆在作家协会的朋友经常提到一个人，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名叫哈什米，哈什米要不是将他们传唤到情报部进行审问，就在他们试图出国时在机场拦住他们。后来夏赫拉姆才知道，哈什米的本名叫梅赫达德．阿里哈尼，是专门负责对付世俗左派诗人与作家的情报部官员。这个计划的目的明显就是清算。

接下来到了一九九八年深秋，佛鲁哈尔夫妇、玛基德．谢里夫、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与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赫在三个星期内先后失踪。伊朗作家与知识分子知道，自己已成了俎上肉。名单浮上台面：姓名字段表列出即将失踪的知识分子。侯赛因．巴什里耶赫是一名社会学家，他曾在战略研究中心吸引一批追随者，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某些版本的名

单上。虽然他符合名单的特征描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世俗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伊斯兰改革派思想有着实质影响力，但他不相信有人会伤害他。他认为自己并非公众人物，而仅是个不过问政治的学者。尽管如此，他的妻子还是在门上安了两道锁，朋友也劝他们到别的地方过夜。恐慌的作家们在伊朗城市四处漫游寻找可以歇息的地方，他们连听到脚步声都感到害怕，而且为了安全将家人送往外地农场。有些人完全与外界断绝来往，只跟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与家人连系。有些人索性出国，等待风暴过去。改革派的报章杂志在哈塔米主政下刚要开始成长发展，此时大声疾呼决心与正义，要求情报部部长古班纳利．多里－纳贾法巴迪如果无法保证伊朗知识分子的安全，就应该马上辞职。

总统哈塔米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他无法针对伊朗异议分子遭到谋杀而引发的抗议声浪提出令人信服的响应，那么他提出的扩大言论自由与法治的主张将从一开始就沦为空谈。另一方面，如果他能让光线照进安全体制最阴暗的深处，那么他不仅是向选民证明深层改革的可能性，也让强硬派理解改革派是一股不可轻忽的力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哈塔米宣布他已经组成委员会调查此事。几乎没有人对此抱持期待。众所周知，伊斯兰共和国绝不会调查自身的弊案。但情报部内部却有人告密，而且提

到离职同事与佛鲁哈尔夫妇谋杀案有关。哈塔米利用这项证据要求情报部对此事负责。令伊朗人震惊与讶异的是，情报部部长多里－纳贾法巴迪竟因此引咎辞职，他原本是最高领袖强加给哈塔米的首长，现在他的位子转而由哈塔米成立的委员会主席接任。

情报部表示，一群人数约三十名的恶劣探员，在前情报部副部长扎伊尔德．埃玛米的命令下，未经司法程序就在国内外杀害伊朗异议人士。一九九九年二月，埃玛米与他的探员被送进监狱。四个月后，据称埃玛米在狱中吞食除毛粉自杀身亡。

哈塔米因成功查明此事而声望提升。过去伊朗官方从未对杀害异议人士负责，也没有人为这类事件受到惩处。这是首次有总统仅凭舆论的压力与相对自由的报导就成功行使权力压制了安全机构。总统哈塔米证明强大的改革运动确实能有所建树。

但哈塔米也证实了改革运动的局限。情报部的「恶劣分子」遭到清除，主犯又凑巧自杀，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副部长真的有能力主导如此广泛的跨国行刺计划——夺走超过一百条人命——而完全没有任何上级指示？这样的计划究竟获得多高的层级的授权？是总统拉夫桑贾尼主政时

期的情报部部长阿里．法拉希安下的命令？还是拉夫桑贾尼本人？抑或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里面是否有教士介入，例如哈格尼圈子，他们曾经祝福这项计划，也许他们曾经发布伊斯兰教令，判决这些受害者死刑？有些强硬派官员宣称，埃玛米与他的党羽听令于国外的恶棍。他们公布一份录像带，在影片中，埃玛米的妻子在刑求下承认这件事，而刑求的过程因为过于残酷，导致她的一颗肾脏坏死[11]。

在《今日晨报》上，阿克巴尔．甘吉无情地向总统及改革派政府提出上述问题。《今日晨报》不只是一份报纸，它属于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所有；哈贾瑞安是战略研究中心的改革派战略研究人员，他曾经是情报部官员。据说在穆萨维时代，哈贾瑞安曾试图阻止哈玛米的任命案。显然他应该知道情报部一些内情。

至于甘吉，他不只是一名作家，他生来就像只牛虻，思想敏捷，干劲十足，而且激进得无可救药，无论是一九八〇年代身为革命卫队成员，还是如今的自由派鼓动者，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在改革派眼里，甘吉是个强大但却令人恼怒的盟友。众人无法期望他的言行与团队一致；他是最大胆的思想家，也是最不愿妥协的批评家。

当扎伊尔德．埃玛米被捕时，甘吉为哈塔米喝采，但并

未因此放松批评。「把每个人的目光引向情报部，这是个视觉上的幻影，」甘吉写道，「这些思想界与政治界的邪恶吸血者，无论他们如何掩饰，无论他们是否身居高位，都应该一个一个揪出来。」

这不只是对行凶者施加报复的问题。甘吉坚持，整个国内弥漫着「暴力意识形态」，政府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连根拔除，这是政府的道德责任。他又说，伊朗的宗教领袖不应该默不作声，否则这就证明他们也是共犯。更确切地说，正直的教士不应该让行凶者「在宗教的领域摆起谋杀与犯罪的摊位，或者是在宗教的圆顶下立起邪恶的大旗」[12]。

当扎伊尔德．埃玛米死于监狱时，甘吉公开质疑官方宣布埃玛米是自杀而死的说法。甘吉在《今日晨报》提到他被单独监禁的经验：守卫每半小时就会注视他一次；他一个星期只能洗一次澡，每次只能洗五分钟，而且整个过程都有守卫在旁边观看[13]。甘吉质疑，像扎伊尔德．埃玛米这么重要的犯人，狱方怎么可能任由他一个人取得有毒的物品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自杀？是否有人该为这起事件负起过失责任，又或者政府应该发起调查，查明埃玛米死亡的真正原因？

甘吉的文章俘获许多读者。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书名为《鬼魂的地牢》，一出版就畅销。甘吉在书中追溯哈格尼

圈子成员之间的链接，显示这些教士——法拉希安与多里－纳贾法巴迪也包括在内——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情报部。他宣称，有一支暗杀小队秘密开会，由「幕后掌权者」发布伊斯兰教令杀害某些特定敌人，真主党支持者也听命于同一批教士。甘吉书中的内容，除了推测之外还带了点戏剧成分与 B 级片的语言。他笔下的人物包括一名「红袍阁下」与某个名叫「主钥」的人。但甘吉的论证也条理分明，他并未放弃越过扎伊尔德．埃玛米继续往上追究责任的念头。他点名法拉希安与梅斯巴赫－雅兹迪，最后还提到了拉夫桑贾尼。

日后，甘吉表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动摇政权的基础，他暴露了政权隐藏的计划与最见不得人的腐败。他知道哈梅内伊试图控制损害，哈梅内伊只承认四起谋杀——佛鲁哈尔夫妇、莫赫塔里与普扬德赫——而且想把责任局限在埃玛米及其党羽身上。但甘吉了解，该负起责任的人更多更广，不仅包括他们的同僚与长官，还必须追究过去。甘吉显然指的是拉夫桑贾尼。后来，甘吉表示，他认为他可以将责任一路追究到哈梅内伊身上。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哈塔米的支持——哈塔米不应该只是整肃情报部，宣布胜利，然后结束这件案子。

哈塔米警告甘吉，认为他追查得过于深入，也过于急切。不久，甘吉开始收到反对者的各种警告。他的文章受到严厉

审查，甚至在出版前被删除多达三分之二的内容。「我们有十个编辑，而不是一个编辑。」甘吉日后说道。他开始从电话与传真机收到死亡威胁。

在这段期间，甘吉曾一度被情报部传唤，而且也被军事法庭传唤了一次。他在那里被告知，如果他继续写作，他将坐最少十五年的牢。当他写下一篇题为〈嘲弄死神〉的文章时，他知道自己的冒险之旅即将告终。他在文章里写道，他觉得自己像是参与一场决斗，随时可能被杀。为了访谈消息人士，他必须前往陌生的地方与陌生人见面。每次见面都可能是个陷阱。但他一次次顺利生还而且发表了文章，但每次发表遭受的审查都更甚以往。

终于，甘吉在二〇〇〇年被捕。二〇〇一年，他将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与五年国内流放。他将成为伊斯兰共和国最难对付的政治犯之一，撰写激进的反神权政治宣言，而且进行长达五十天的绝食抗争，直到他的医师告诉他，他再继续下去将对脑子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为止。

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不像甘吉那么有名，但也锲而不舍地从事写作，追查连环谋杀案的幕后真相。他怀疑改革派分析家只将刺杀计划追溯到拉夫桑贾尼政府，是因为在拉夫桑贾尼主政之前，这些改革派连同他们的伊斯兰左翼朋友与

权力核心有着密切关系。但二十八岁的夏赫拉姆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他相信刺杀计划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时就开始了。他把数十年来发生的超过三十起谋杀案与一九九八年的谋杀案连系起来。在一本谈论情报部副部长，书名为《权力游戏：鲁霍拉．侯赛因尼安》的作品中，夏赫拉姆分析了扎伊尔德．埃玛米亲近人士的公开发言，显示伊斯兰共和国为了混淆真相，故意发表彼此冲突的叙事。

夏赫拉姆的作品使他四处求职都遭遇闭门羹。夏赫拉姆原本在报社编辑文化版面，向伊朗读者介绍世俗派诗人与作家，此外也在出版社任职，并结识一些重要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但现在这两个地方的职位都没了。有时，他甚至连房租都付不出来。他卖掉电视，把妻子碧塔与孩子送回拉什特，从连环谋杀案到他们遭受迫害这段暴力而骚动的期间，他让妻儿与岳父同住。「他们打算杀死我所有的朋友。」他绝望地对妻子娘家的人说道。

莫赫塔里原先相信对话。他是主动向政权中的改革派寻求沟通的人士之一，即使他并不认同他们的宗教理念。他相信和平共存与和平奋斗。他遭到谋杀是个可怕的错误。朋友的遗体被发现后才过了十天，夏赫拉姆就发表一封公开信。他把这封信称为〈诗人的份额：孤独、爱与死亡〉。他写道，在伊朗，希望本身令诗人与作家窒息。

之后，夏赫拉姆开始写书，而且从未停止。他把这一点归功于他对莫赫塔里的回忆。但他在德黑兰的生活却走了样。他身无分文，与家人分隔两地，他的作家圈在巨大打击下伤痕累累。四年过去了，他一直在写书。他完成的三本书只有一本成功通过审查获得出版。二〇〇一年，有朋友告诉他，一家新的改革派报社正筹备成立，报纸的名称叫《信任报》。也许夏赫拉姆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报社的编辑比夏赫拉姆来得保守，但在两人共同认识的朋友建议下，这名编辑决定给予这个年轻诗人机会，因为夏赫拉姆在新闻圈向来以聪明与敢于报导著称。夏赫拉姆于是成为《信任报》文学版的编辑。

一日，夏赫拉姆信步走到政治版编辑工作的地方。年轻的副编坐在桌旁，桌上散落着文件。他看起来不大可能超过二十二岁，身材修长，轮廓细致，黑色的短发侧分，一丝不苟，梳得整整齐齐。他有着纤细的手指，清澈的褐色眼睛似乎盯着某个更清晰或更美丽的事物，而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他的头低低的，看起来正在努力工作。但当夏赫拉姆走近时，年轻编辑说道：「哈啰，拉菲札德赫先生。」

夏赫拉姆感到吃惊。

「我认识你。」年轻编辑说道。他自我介绍，他名叫鲁兹

贝赫．米雷布拉希米，也来自拉什特。他询问夏赫拉姆是否愿意为他的版面写一点政治评论。

「你怎么知道我写政治评论？」夏赫拉姆问道，心里有些提防。

「我读过你的书，」年轻编辑说道，「我喜欢你看事情的方式。」

过了一段时间，夏赫拉姆才接受这项提议。到了那个时候，他与鲁兹贝赫已经成为朋友。一股共同的忧郁使两个人愈走愈近，不久，财务的拮据使他们成为室友。下班后，他们一起回家，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为了散步而一起散步；他们可能一边聊天，一边穿过整座城市，或者只是默不作声地走着，直到喧嚣的车声重归寂静为止。有时走在路上，鲁兹贝赫会为夏赫拉姆吟唱传统民谣，他明亮而高亢的嗓音，响彻了昏暗的街道。

遭到逮捕的可能，一直萦绕在夏赫拉姆心中挥之不去。他试着不去想这件事。某天晚上，两人步行前往德黑兰东北部的国家公园时，夏赫拉姆对鲁兹贝赫开玩笑说：「我希望如果我被捕时，他们会连你也一起逮捕。原因只有一个：你可以在监狱里唱歌给我听。」

第九章　伊朗历四月十八日

要说伊斯兰共和国造就了谁，那么这个人就是阿里．阿夫夏里。他的家族效忠新政权与新政权充满魅力的领袖，革命年代的暴力与他们完全沾不上边。他不受饮酒、妇女服饰与男女有别禁令的影响，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会恪守这些规定。阿里．阿夫夏里生于一九七三年，才二十几岁就已长得高大魁梧、满脸胡须，他虔诚信仰的态度深受统治教士的肯定。

阿里．阿夫夏里的父亲纳吉是德黑兰西北部小城加兹温的非神职宗教老师与周刊出版商。阿里从小在父亲藏书丰富的书房里获得养分与形塑自我，房间深处的书籍延伸了学校老师给予他的想象。纳吉与妻子是虔诚的信徒、传统的中产阶级，即使对革命国家的行动有些疑虑，却还是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

对阿里来说，革命是在深秋的某个夜里来到加兹温。巴列维国王的军队封锁街道，形同实施军事戒严，但他的父亲

无视宵禁，前去照料阿里重病的祖父。纳吉回家，被打得遍体鳞伤，眼镜也被打碎了。阿里当时六岁。两个月后，巴列维国王下台。阿里激动不已，他感到既兴奋又恐惧。在他家族所属的庞大氏族里，有霍梅尼的支持者，也有批评者；两方的争论极为激烈。但阿里认识的人当中，并没有偏离政治主流太多的分子，因此没有人受到第一个骚动十年的影响。有时伊拉克战机从头上呼啸而过，巨大的黑色双翼随即将焦虑带往加兹温以外的地方。

阿里记得战时配给，民众为了领取基本的家用物品而大排长龙。在那段政治动乱与经济崩溃的岁月里，纳吉的教师薪水几乎难以养活妻子与三个小孩。压抑的气氛令人感到不适，就连不愿走极端的人也有此感受。阿里的同学想参加派对与穿自己想穿的衣服。阿里没有这种想法，但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让他们这么做。

沙里亚蒂尽管个人并不穷困，但谈到社会正义时，往往流露出丰沛的情感。对阿里．阿夫夏里来说，能让他流露情感的是自由，虽然他个人并未受到这方面的压迫。自由也是一种正义。阿里厌恶体制使用胁迫、力量与不公正的手段将自身的价值加诸在他人身上。对于之后的革命世代来说，阿里是个超乎想象的生物：他参与政治活动——在后革命时代的伊朗，这是个毁灭性的职业——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

而是为了捍卫别人的权利。

在父亲位于加兹温的书房里，年轻的阿里．阿夫夏里阅读历史，特别是穆沙迪克以来的历史。他阅读文学，外国与伊朗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巴尔札克，以及赫达亚特、萨迪、阿雷．艾哈迈德。他读诗。他阅读伊斯兰，而且阅读伊斯兰传入之前与之后的波斯历史。最重要的是，他阅读沙里亚蒂。从沙里亚蒂身上，他发现了现代与振奋人心的伊斯兰教，一个号召众人参与政治行动的伊斯兰。但是，读了沙里亚蒂之后，阿里也读了《伊朗革命两步骤》，作者梅赫迪．巴札尔甘是遭到驱逐与蔑视的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理。阿里试图调和巴札尔甘的自由理性与沙里亚蒂的诉诸行动。《宇宙报文化副刊》发表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的文章时，阿里十五岁。他大量阅读《文化副刊》与之后《地平线》的文章。索鲁什接替了沙里亚蒂的地位，而阿里上大学之后，决心追随这位令人兴奋的新思想家。

一九九二年，阿里就读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工业工程系，这所大学的前身是德黑兰理工大学。做为伊朗最具声望的理工大学之一，拥有一万名学生的埃米尔卡比尔座落在不断蔓延扩大、单调而又拥挤的首都市中心。这里的天空低垂厚重，到处都能闻到刺鼻的废气，但城市街道却持续着永不止息精力充沛的脉动。低矮而年久失修的混凝土建筑物，山上的流

水顺着堆满垃圾的深沟险象环生地从边石与马路之间宣泄而下，加上难以呼吸的空气，德黑兰绝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德黑兰的色彩与生命力，它惊人的日常动力，使它从众多居民数百万的城市中脱颖而出，而且某种程度上透过其本身的路线，开辟出该城居民们的希望与威胁。

阿里．阿夫夏里前往德黑兰，心知自己将成为活动分子。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的高中老师回忆他是个温和、传统的年轻人，没有理由感到不满足。他不是个愤怒的人，但却是个倔强的人，无论身体或心理上都是如此。一旦他挡住你的去路，你几乎无法期望能将他推到一旁。

独立学生行动主义在伊朗革命后几乎完全消失。大学校园里的伊斯兰学生协会是霍梅尼领导班子下辖的一个单位。学生协会相当强大，然而只有在他们服从命令时是如此。每个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都要派代表参加全国协调委员会，这个单位负责监督所有的协会，要求他们与霍梅尼的观点一致。全国协调委员会有个古怪而令人讨厌的名称：巩固统一办公室。学生称之为巩固办公室。直到霍梅尼去世为止，这个办公室一直是当时相当强大的伊斯兰左翼的支柱。

阿里．阿夫夏里进大学的时候，拉夫桑贾尼才刚开始担任总统，巩固办公室及其代表的伊斯兰学生协会开始主张独

立于国家体制。霍梅尼已死，随他逝去的还有「巩固统一」的目标。伊斯兰左翼已经失势，随之消散的则是学生运动对权力的把持。苏联与东方集团已经瓦解，冷战的对立也不再存在。

此外，总统拉夫桑贾尼是个麻烦人物，对过去的伊斯兰左翼是如此，对现在的学生运动也是如此。巩固办公室对于拉夫桑贾尼走向政治与文化自由主义表示欢迎，但对于他将伊斯兰左翼排除于权力之外则感到愤愤不平，而且坚决反对他们忧心的利伯维尔场计划。霍梅尼死后三年的时间，伊斯兰学生协会觉得自己逐渐在扮演一个暧昧的新角色，从伊斯兰共和国的拉拉队，转变成共和国的谨慎批评者。伊斯兰共和国响应的做法是建立自身的组织来做为控制大学的可靠工具。这些组织包括特殊的校园巴斯基小组，以及大学里的真主党支持者与最高领袖办公室。

阿里．阿夫夏里很可能加入了巴斯基。他的背景没有理由让他被排除在外。他深受大家欢迎，是体育竞技的领袖——他担任登山社社长，也在文化与政治上表现杰出。但阿里的计划起初保持低调与谨慎，但实际上却是颠覆性的。他觉得埃米尔卡比尔的学生并未享有相同的权利。支持政权的学生才能享有特权。他们参加学校赞助的校外活动，前往其他城市、山区与造访圣地。不受欢迎的学生则不准随同前往。

真主党支持者、巴斯基与最高领袖办公室执行下的气氛是苛刻而惩戒的：男学生不准聆听女歌手唱歌，更不用说西方的音乐或任何巴列维国王时期的音乐，即使在自己的宿舍也一样，图书馆则设下比国家还严苛的规定。男女学生不许在校园里交谈，就连讨论学业或分享笔记与书籍也不行。有时候，在大学里，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学生会堵住建筑物的大门，不让穿短袖的男学生进入。有时他们会把这些学生的名字登记起来，罚他们两个学期不准上课。

阿里．阿夫夏里把这些不平等与限制列为他的活动主要目标。他参与了宿舍的文化办公室，并且在办公室创办组织，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参加校外旅行，他运用自己身为虔诚学生的影响力，说服宿舍管理人员不要因为学生听了某种音乐或读了某种书籍就加以惩罚，相反地，应该鼓励学生之间进行辩论。真主党——阿里知道这些人，因为他跟这些人熟识——可以忽视世俗自由派的反抗者，或受挫、受惊吓的世俗左派的子女，却无法忽视阿里．阿夫夏里。因为他可以很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阿里先是被推举参加系里的学生会，然后在一九九四年被推举加入了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阿里感到受宠若惊。因为能加入伊斯兰学生协会的人都是参加过两伊战争的退伍军人，他们是非常虔诚而且传统的年轻人，来自于与政权

有着紧密关系的家族。但是，与阿里一样，他们也在寻找一个新的政治模式，一个能让他们摆脱统治阶级内部左翼与右翼无聊派系斗争的观念。而他们找到了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索鲁什用伊斯兰的语言跟他们说话，谈到伊斯兰教的承诺。但索鲁什同时也是现代的、民主的，而且让学生感受到他是非意识形态的。「我们想传布索鲁什博士的观念，从伊斯兰法学进展到伊斯兰现代主义，追求自由而非正义，建立市民社会而非政府。」阿里日后回忆说。

埃米尔卡比尔大学是趋势的引领者。有些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支持哈梅内伊的强硬派政策，有些大学要求回归一九八〇年代的伊斯兰左翼正统，起初只有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宣扬《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的新观念。然而，不到三年的时间，埃米尔卡比尔的改革主义就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其中最能明确显示与过去决裂的，就是学生重新恢复了梅赫迪．巴札尔甘的名誉，这位处境艰难的自由派总理在革命骚动期间被激进派学生与其他人赶下台。毕竟，正是巩固办公室的先驱接管了美国大使馆，羞辱了巴札尔甘的临时政府，而且见证了一九七九年后激进派教士的傲慢权力。

一九九五年，巴札尔甘去世，阿里在埃米尔卡比尔协助

举办了一场追悼会。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恢复巴札尔甘过去被学生否决掉的名誉。但校园巴斯基破坏了这项计划，他们威胁讲者，不让他们上台致词。阿里日后把这起事件视为让他转变成反对派人士的开端。从那时起，他成了情报部注意的对象。

当索鲁什在德黑兰大学演说遭到真主党支持者攻击时，埃米尔卡比尔的伊斯兰学生协会发表声明，敦促内政部介入此事：「当法律在光天化日下遭到违反，即使它在夜里保护国家又有何用？」学生质问说，「当大学的文化领域遭人侵犯，而执法人员视若无睹时，权力主张有何意义？」阿里．阿夫夏里与其他学生活动分子表示，索鲁什应该到埃米尔卡比尔演说，该校的学生将会保护他[1]。他们决定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举办演说。

大约有五千名学生前来聆听这场演讲。阿里负责安全维护，他将两百名自由派学生组织成战斗队，负责阻挡真主党支持者进入圆形剧场。学生控制了校园清真寺的音响系统，并且用它来播放革命歌曲。但民兵认为这些歌曲是用来煽动反伊斯兰共和国，因此他们切断了清真寺的电力。他们抓住索鲁什，不让他进入会场演说。阿里．阿夫夏里与学生活动分子决心让计划继续进行，即使现场只有负责开场的讲者。他们从邻近的大学建筑物找到其他电力来源。国家安全部队

索性切断整座校园的电力做为响应。学生们有发电机但没有汽油；他们用自己的摩托车启动发电机，这使他们能开启灯光与麦克风。讲者完成了开场内容。索鲁什虽然未能上台演说，但埃米尔卡比尔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已然证明他们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反对力量。

两个月后，安排索鲁什演说的活动分子开始消失，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或遭受讯问。阿里．阿夫夏里知道快轮到他了。一名情报部代表在伊斯兰学生协会办公室现身，要求跟阿里说话。阿里跟那名探员边走边谈。逐渐地，阿里发现自己被一群人包围，他们静静护送他穿过后门进入车内，他被蒙上双眼，被车子送到托希德监狱，这是由情报部掌管的监禁中心。

阿里被单独监禁。讯问他的人并未动手打他。他们只是大声侮辱与咒骂他：骂他愚蠢、低能、弱智。骂他在群众中制造骚动，损害了国家安全。就在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因举办索鲁什演讲而造成混乱那天，总统拉夫桑贾尼正准备大张旗鼓宣布他的铁路计划。阿里掀起的风波移转了民众对政府伟大成就的注意，讯问者对此加以责备。阿里这么做必然是受到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指使。学生活动分子必然是受到改革运动的控制，而改革运动则是失势的伊斯兰左翼搞出来的。阿里什么也没说。十天后，他被带到法官面前。法官轻蔑地

说道，沙里亚蒂与巴札尔甘创立的是一个脱离正轨的宗教。他下令让阿里在埃温监狱关上一晚，隔天早上让他保释出狱。

同年秋天，严密的保安气氛弥漫着埃米尔卡比尔大学。但伊斯兰学生协会却在这种肃杀的情绪中获得能量。协会提名阿里．阿夫夏里担任协会在巩固办公室的代表。阿里现在成了全国学生代表，这群学生认为自己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他们阅读而且赞扬索鲁什。此外，这一年是选举年。阿里与巩固办公室的改革派人士支持哈塔米对抗保守派候选人国会议长阿里．阿克巴尔．纳提格－努里。学生带动哈塔米的选战，而阿里身为选战的学生协调者，由他来带动学生。

巩固办公室有一辆挂着政府车牌的车子，这是霍梅尼时代留下来的。阿里不应该使用这辆车来进行选战，却这么做了。他开着车到城市各处拜访从事选战的人士。在伊斯兰夏赫尔，一个位于德黑兰南部的贫穷小区，他看到志工彻夜制作长达百公尺的旗帜，上面写着哈塔米的姓名。在德黑兰北部，他看到学生深夜将哈塔米明信片扔进行驶车辆的车窗里。真主党支持者有时会将展示哈塔米照片的车窗打破，于是阿里协助组织他所谓的「反压力团体」，负责保护哈塔米支持者的人身安全，不让他们受到真主党支持者的侵犯。选战最后几天，巩固办公室让学生搭乘四辆巴士巡回整座城市，为哈塔米宣传造势。最后，四辆巴士的学生都被逮捕，罪名是组

织「宣传狂欢」。

某天夜里，阿里开着挂着政府车牌的车前往位于德黑兰中心的法特米广场。车里还有其他三名学生活动分子与一张他们准备张贴的巨幅哈塔米海报。警察要他们停车，而且以滥用车辆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学生们在司法大楼地下室待了两天，其他许多为哈塔米竞选的人士也已经被拘留在那里。

但他们及时在一九九七年选举日当天离开，而这天，伊朗历三月二日，也将成为传奇的一日。在埃米尔卡比尔，有一场哈塔米胜选的盛大庆祝会。阿里日后回忆说：「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遭遇的每一个问题都将获得解决。」

如果阿里．阿夫夏里曾怀抱着这样的幻觉，那么这些幻觉很快就破灭了，总统哈塔米任命极为保守的大学校长，而非与强硬派争执来确保较为自由派的人士出任校长职位。阿里认为，哈塔米想避免对立，只会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强硬右派绝不会让步，他们仍控制国会、司法部、情报部、宪法监护委员会与民兵。不过接下来哈塔米大胆地处理连环谋杀案，使阿里稍微放下心中的忧虑。哈塔米毕竟还是有点斗志。

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曾经将改革派的策略定义为「由下而上施加压力，在顶层进行协商」。阿里．阿夫夏里与活动分

子知道，他们的角色是发起群众压力，让政治人物有协商的空间。这是个需要手腕的工作。他们必须推动，但不能太用力也不能推太远。他们要激励哈塔米，但不能太过火。学生们为竞选国会议员与市议员的改革派人士助选。他们抗议国会强硬派人士不断试图弹劾哈塔米底下最自由派的几名部长。充满活力的新兴报章杂志出版的内容无惧于统治建制的挑战，学生成为这些报章杂志热切的阅读者与捍卫者。

阿里把改革想象成一只鸟。一只翅膀是学生运动，另一只翅膀是独立媒体。两只翅膀合在一起可以振翅高飞，推动哈塔米的计划前进，让它愈来愈高，向它的对手与大众证明，整个势头是站在哈塔米这一边。因此，对于强硬派对报章杂志的严厉对待，学生活动分子特别热心地进行抗争。特别教士法院创设新的分支机构处理新闻媒体的冒犯行为，将负责核发出版执照的教士的起诉权限划归最高领袖办公室管辖。报纸的消失与其出现时一样快速；编辑面临监狱的刑期；出版商丧失了出版执照；年轻的作家不断更换工作，拚命地向不再存在的出版商追索最后一张薪水支票。巩固办公室对于这一切的侮辱发起了抗争。真主党支持者，也就是强硬派民兵，则以暴力响应学生的抗争行动。

一九九九年七月，国会针对是否通过全面性的新法，让强硬攻击新闻媒体的行为予以正式化进行辩论[2]。这项立法

将大幅限制伊朗的出版品数量，而且将去除对新闻媒体冒犯行为的立法限制，这表示随时可以起诉，而且不仅跟过去一样针对总编，也扩及到个别作家与记者。记者被迫泄漏他们的新闻来源，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有部分落入了库姆的教士手里。

哈塔米与底下的部长敦促国会反对新闻法。「我们必须制定符合自由的法律，而不是符合法律的自由。」哈塔米的指导部部长抗议说[3]。但保守派的国会议长有不同的看法：「新闻媒体是文化入侵的门户，所以让我们采取措施。」他警告说。

在投票前夕，改革派报纸《你好》刊出一篇爆炸性的故事[4]。文章表示，新闻法是扎伊尔德．埃玛米的独创，而埃玛米正是恶名昭彰的连环谋杀案的策画者。《你好》刊出了埃玛米写的情报部内部备忘录的摘要，里面提到不仅要推动国家限制出版执照的发放，还要运用安全机制「个别地」对付作家，「运用法律，让他们无法写作或出版」。

如果这份文件属实，那就表示国会的主流保守派正在为令人不齿的情报部恶棍效劳，后者也支持以箝制做为审查手段。情报部随即否认这份备忘录，宣称它是伪造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同月稍晚，当《你好》的发行人被传唤到特别教士法院时，他却被控犯下出版机密文件与其他罪名。七月

七日下午，《你好》遭到停业，编辑被逮捕，就在同一天，国会通过了新闻法。

当时正值暑假，也是考试前的温书时间，绝大多数学生都已返家。但这则消息不容忽视。留在德黑兰大学的学生找来朋友到校园加入他们的抗争行列。随着群众人数增加，学生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们高唱反司法部的口号，冒险冲出校园。当学生再次回到大学时，发现真主党支持者拿着石块与棍棒等待着他们。活动分子进行反击，也对民兵丢掷石块。到了星期四晚上，在逮捕行动与许多人受伤的状况下，现场一片混乱。

第二天是伊朗阳历四月十八日星期五，情况变得更加恶化。

阿里．阿夫夏里在加兹温。他在前去朝觐（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之前，先在加兹温停留探望自己的家人。深夜一通电话使他放弃了这次计划而且迅速赶回首都。星期六刚过中午，阿里回到校园，他看到的是一幅彷佛被入侵军队劫掠过的景象。

午夜时分，革命卫队冲进学生宿舍，将学生从床上拉下来痛打，打破窗户，而且在房间放火。学生们遮住自己的脸，用石块与汽油弹进行捍卫。警察从走廊蜂拥而入，用棍棒将

学生打倒在地。一名学生回忆自己看到朋友被抓着长发在走廊地面拖行，而地面满是碎玻璃。这个朋友之后在医院住了二十天。一个名叫埃札特．易卜拉欣．内贾德的学生在当晚的混战中被杀。战斗结束后，宿舍已经烧成空壳。

警察封住校园大门，但阿里与其他学生领袖知道进入学校的秘密通道。大学里充满了吵闹而激动的学生。巩固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决定，学生将静坐，以和平的方式抗议宿舍攻击事件。他们要求延后考试，直到事件得到适当处理为止。然而，即使活动领袖开会商议对策，学生们还是继续朝校园聚集。随着一些抗议者开始高喊反对最高领袖的口号，警察已无法阻挡群众，而巩固办公室也难以掌控它们。群众冲破校门，朝着内政部而去。

技术上来说，内政部控制了警察。但内政部是由改革派人士主掌，而改革派人士坚称他们并未参与宿舍攻击事件。阿里开始觉得不仅学生的抗议手段有误，而且学生还被卷入一场更大的计划之中。也许最高领袖与他的盟友想引诱学生发起大规模街头抗争。然后他们可以派出革命卫队镇压学生，同时以维护法律与秩序为由弹劾哈塔米无法维持街头安宁与国家安全。阿里与政府改革派人士来往的经验，也让他怀疑这个场景有可能发生。

群众已经聚集在内政部前面，阿里赶紧来到群众面前。他力劝学生回去。「我了解你们的关切与你们的痛苦，」他说道，「我相信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必须揪出来绳之以法。」但他坚持内政部并非元凶。在毫无组织与愤怒的状况下上街，学生只会破坏自己的目标。学生应该回到校园持续抗争。

阿里开始引导群众回到大学——他日后估计现场群众大约有六万到七万人，但绝大多数新闻来源都认为接近二万五千人。在返回大学路上，有一群学生开始鼓噪要带领群众前往总统府。阿里．阿夫夏里同样否决他们的提议。哈塔米不应该为此事负责。「让我们去哈梅内伊的官邸前抗议，」另一名活动分子说道，「他该为此事负责！」

这个说法可能更接近真相，但对阿里来说，却是最糟糕的意见。学生将一无所获而且还要遭遇暴力。但群众对于口头劝说充耳不闻。于是阿里与巩固办公室成员躺在街上阻止学生前往最高领袖官邸。

最后，学生领袖终于成功说服群众返回校园。阿里回忆说，他们在校园里进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学生们高呼口号，包括「杀害佛鲁哈尔夫妇的凶手躲藏在哈梅内伊的袍子里」。一般民众带食物给校园里的学生。当真主党支持者再度发动攻击时，学生义勇队抓住民兵，没收他们的武器，包括

枪枝与刀子。他们将民兵移送内政部，而且附上一份民兵携带的武器清单。第二天，示威转变成巩固办公室组织的静坐抗议，而且明确提出他们的要求：警察首长必须革职、找出宿舍攻击事件的凶手并予以起诉、废除新闻法、允许《你好》复刊、让民众知道连环谋杀案的完整真相。

但阿里可以感觉到群众正逐渐脱离他的掌握。不是每个人都支持巩固办公室的改革派策略。更激进的学生认为，抗议群众应该离开校园，占领国营电视台与警察总部这类国家机构。另一部分的群众甚至不是学生，而是一群愤愤不平的无组织人士，他们急欲将静坐抗议转变成暴动。到了星期一，随着德黑兰示威扩大，抗议也蔓延到全国其他城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终于不得不出来喊话。

哈梅内伊谴责德黑兰大学宿舍攻击事件。「这起惨痛的事件令我痛心，」他说道，「在伊斯兰的制度里，攻击一个团体的住所与容身之处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在半夜或者是在聚会礼拜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无论是不是学生，都是我的孩子，看到他们如此窘迫与不安让我感到煎熬与难过。」[5]

哈梅内伊表示，即使抗议者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也原谅他们，他要求大家冷静，并且告诉强硬派人士：「即使民众

焚烧或撕毁我的照片，也不能采取激烈行动。」然而在此同时，哈梅内伊也意有所指地表示，有外国势力介入让街头示威升温，绝不能让美国人在街头赢得胜利。「我想告诉学生，注意身旁的敌人，在你们当中，可能有假扮成你的朋友的陌生人。」哈梅内伊警告说。

这些话并未缓和学生的苦恼或响应他们的要求。数百名学生决定不顾巩固办公室的反对，他们离开校园上街抗议。街头示威很快攀升成为暴力与混乱，商店窗户被砸毁，车辆被焚烧，更多的学生受伤与遭到逮捕。革命卫队用催泪瓦斯驱散校园学生。国营电视台播放德黑兰市中心的骚乱景象，指控学生攻击清真寺、抢夺银行与焚烧巴士。

就在前几个晚上，攻击睡梦中的学生成了不可否认的野蛮行径，之后最高领袖还在电视上表现出痛心与悲伤，但此时强硬派却成功控制了公共叙事。国家媒体把学生形容为暴力、无政府与反革命。如阿里．阿夫夏里担心的，有些抗议者的行为协助加深了这种印象。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三，强硬派人士让德黑兰大学校园与周边街道挤满了穿着严谨伊斯兰服饰的反示威抗议人士，他们手上拿着印了哈梅内伊脸孔的旗帜，口中高喊「美国去死」。改革派人士指控这些人全是用巴士从各省或

郊区运来的假抗议群众。无论这些人是谁，绝大多数外国媒体估计他们的人数达到十万人，但伊朗国营媒体则报导群众超过一百万人。当天，数千名强硬派民兵骑乘摩托车巡回德黑兰，沿途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街道在监控下陷入不安的沉默。

在大学校园里，头上包着缠头巾的教士轮番向强硬派群众演说。其中一名教士对改革派学生的谴责尤其猛烈。他是一名保守派教士，与世俗体制、拉夫桑贾尼以及最高领袖有着紧密连系。他差点就要求将抗议的学生予以处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哈桑．罗哈尼。

「凡是试图反叛的人，我们都将坚决而果断地予以消灭，」罗哈尼说道，「过去几天参与暴乱的人都将受到审判，并且以对抗真主与在世间播下腐败的种子的罪名加以惩罚。」[6] 这些都是死罪。

当天大约有二千名学生被捕，包括阿里．阿夫夏里的兄弟。绝大多数人大约在一个月后获释，但有些人——特别是没有大型组织当靠山的人——却被判处漫长而恐怖的刑期。

「那一天，他们几乎埋葬了和平的大学学生运动的心与灵魂，」一名学生领袖日后哀叹说，「没有人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民众还很高兴政府能够打击无政府主义。」

马努切尔与阿克巴尔．穆罕默迪这对来自里海南方马赞德兰省阿穆尔附近村落的兄弟，属于运气不好的人。他们率领一个民族主义学生团体，由于是世俗团体，所以连改革派人士也无法庇护他们。马努切尔的拱形浓眉使他有一张忧伤的脸孔，在外国记者眼中，他有时看起来豪迈，有时又看起来脆弱；当他的苦难来到终点时，他被那些在华府的失策下流亡的伙伴形容成「通报悲剧的孩子」。

马努切尔的父亲是个稻农，是村里极少数有读写能力的人。妻子十三岁就嫁给他，生了六个小孩，其中包括阿克巴尔与马努切尔。村民们有争端，或者需要有人帮忙写信，都会到穆罕默迪家求助。穆罕默迪家是村里第一个拥有靠汽油运转的冰箱的人家。绝大多数家庭会把容易腐坏的东西储藏在沟渠里。马努切尔的母亲用冰箱制冰，然后将冰块分送给在家门口大排长龙的邻居。

马努切尔在焦虑与祷告中长大——祷告自己可以上天堂，焦虑自己无法将目光从女人身上移开，因此可能犯下罪过。他会在离祷告还有一段时间之前就进行洗净双手与脸孔的仪式。他试图训练自己的心灵不受诱惑。村里的学校只能上到小学四年级，之后他必须到邻近的小镇上学，单程就要

花上一小时的时间。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医师。

马努切尔疼爱自己的弟弟阿克巴尔，而阿克巴尔就像每个弟弟那样，也尊敬自己的兄长。阿克巴尔富有同情心，有原则，重视人情。但他也骄傲而顽固。日后，马努切尔提到自己的弟弟时，说他有着圣人般的另一个自我。他的阿克巴尔试图帮助孩子、行动不便的人、乞丐与受伤的人。小时候，这对兄弟一起观察成年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往往令他们反感与惊恐。一九八〇年代的国营电视台赞美有些人以伊斯兰之名进行杀戮与暴力。穆罕默迪兄弟看到他们的宗教被用来从事这种目的，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最后，他们不仅变得世俗化，还成为无信仰者。

当马努切尔决定就读德黑兰大学经济系时，他拒绝参加伊斯兰学生协会，他不信任这个组织，认为那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单位。他与阿克巴尔决定创立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独立于国家，具有民族主义与世俗色彩，而且秘密开会与招募成员。他们公然与神权统治对立，使他们在当时的政治领域处于边缘地位，但马努切尔不断向听者吹捧自己的理念，就连《纽约时报》也形容他是「口若悬河的自我营销者」[7]。

马努切尔那种年轻人自吹自擂的态度无法说服伊朗学生相信他是个重要人物，却在伊朗历四月十八日——又称为

一九九九年七月校园危机——之后给了当局机会将他当成有用的替罪羊。政权里的强硬派可以藉由逮捕穆罕默迪兄弟来完成许多事。这对兄弟既有名又孤立；与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在体制内少有资源，因为他们是世俗派人士。为了杀鸡儆猴，治安当局决定拿这些经常宣称自己可以代表学生运动，实际上扮演的角色却极其有限的年轻人开刀，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在这场不安之后获得胜利，而又不冒犯到有着深厚社会与制度根源的学生团体。于是国营电视台宣布阿克巴尔与马努切尔是学生暴动的元凶；而且表示他们是外国间谍，在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指示下企图推翻伊斯兰共和国。

革命法院判决穆罕默迪兄弟犯下向真主宣战罪。一开始他们被判处死刑，之后减轻为十五年刑期。最后，两人服刑七年二个月，但这绝非怜悯他们。穆罕默迪兄弟遭受的是专门为死刑犯准备的特别野蛮的刑求。讯问者用电缆抽打他们，让他们以受迫姿势吊在天花板上，将他们的头按在马桶里，用震耳欲聋的噪音震裂他们的鼓膜，而且连续数天每天有二十三个小时剥夺他们的睡眠。他们在马努切尔面前刑求阿克巴尔，又在阿克巴尔面前刑求马努切尔。他们让兄弟俩以为自己即将遭到处决，又让双方以为对方已经死了。他们用铁棍殴打马努切尔的体侧，直到他有几节脊椎骨被打断为止。

马努切尔早期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他承认自己是学生抗

争的领袖，在美国与其他国外强权的指示下发动暴乱。其他学生也受到胁迫，在认罪时把马努切尔牵连进来。官方叙事在这套屈打成招的戏码下逐渐成形。接下来剩下阿克巴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日复一日，讯问者要求阿克巴尔招认自己的兄长参与了反对国家的外国阴谋。阿克巴尔拒绝。到头来，马努切尔遭受的刑求固然痛苦，但弟弟的抵死不从却让他更难过。

他们的母亲第一次到监狱探望阿克巴尔时，居然认不出他来。他的体重不到一百磅。他的肾与胃都在出血；他因为鞭笞而双脚青紫，有几片脚趾甲已经脱落。他有一块椎间盘碎裂。因为脑部遭受重击，他已经失去大部分听觉与一部分视觉。一名为他的头部与脸部伤害动手术的医师发现血栓正快速朝他的脑部移动。二〇〇六年七月，阿克巴尔进行绝食，要求得到医疗照顾。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说法，他在七月三十日「获得内容不详的医疗」[8]。他的状况愈来愈糟。他的家人表示，阿克巴尔并未被送到他该去的加护病房，而是送到一般监狱，并且被弃置在担架上死去。

在媒体与国际人权团体的压力下，司法部同意给马努切尔二十天的假期，让他参加弟弟的追悼会。到了第十八天的晚上，在伊朗库德民主党的协助下，马努切尔偷偷越过伊拉克边界。库德族人带着他越过山区进入土耳其，然后从土耳

其逃往美国。

带着受伤的脊椎与饱受惊吓的心灵的马努切尔，成了弟弟的福音传布者。连同他的姊妹，马努切尔以什叶派的方式让阿克巴尔成为世俗的殉道之人。伊斯兰共和国，或许还包括整个世界，从未给予阿克巴尔应有的注意。马努切尔把弟弟的狱中回忆录翻译成英文，而且以阿克巴尔的名义设立基金会。马努切尔逃离了埃温监狱，但再也无法看到故乡马赞德兰的森林。

马努切向辽阔而冷漠的美国西部通报这个悲剧，他住在拉斯韦加斯，因为这里很便宜，他也把消息带到了对他而言比阿克巴尔活着的时候更加狰狞的伊朗。

学生暴动之后几天，哈塔米一直默不作声。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未做出特别声明，也未公开露面。学生与他们的支持者先是震惊，然后转变成愤怒。他们都曾是总统的支持者。显然，哈塔米至少可以对他们说句支持的话，对逮捕与殴打学生以及将穆罕默迪兄弟与另外两人刑求致死者表示谴责。

被软禁在家的阿亚图拉蒙塔泽里毫不犹豫地现身。他称

学生是「真正的革命之子」，是「国家的眼睛与光明」[9]。蒙塔泽里又说，反击学生的强硬派势力「背叛了宗教与国家」，把暴力加诸于伊斯兰教之上。阿克巴尔．甘吉也声援学生。然而学生希望听到的是哈塔米的支持，而哈塔米却避而不见。

总统确实早有安排，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他在西部城市哈马丹有演说行程。随着这一天的到来——离强硬派在德黑兰大学进行反示威抗议已经整整两个星期，原本只是例行性的巡视各省，此时却成为哈塔米个人精神强度的测试。上万名观众涌入了哈马丹足球场。

总统赞扬学生与学校人员是「国家进步与提升最重要的推手」，并且批评警察与民兵涉入宿舍攻击事件[10]。他也暗示，这些肮脏龌龊之事乃是强硬派对于他起诉连环谋杀案所做的报复。但哈塔米也强调，他支持革命国家，他与保守派人士并无嫌隙。「政府、总统与最高领袖之间并未出现分裂」，哈塔米说道，任何相反的表象都是「幻觉」[11]。

可惜的是，哈塔米哀叹说，学生抗争演变成暴动，他谴责这是「丑恶而冒犯的事件」。他把暴力归咎于邪恶的外来势力想惹事生非，但也语带暧昧地表示，除了外国的阴谋者，也可能是强硬派挑衅生事。哈塔米宣称：「所有该为德黑兰近期暴动负责的人物与团体，无论他们是谁，都该受到严厉的

惩罚。」[12]哈塔米又赞扬安全部队的自我克制:「亲爱的各位，今日为了平息暴乱，为了国家扑灭暴力的火焰，其他人使用坦克、装甲车与重武器，我们的部队却未使用枪炮来对付暴乱。骚动以冷静的方式平息了，而且未开一枪一弹。」[13]

这场演说的目的似乎是要讨好两方的听众，然而实际的效果相当有限。比较激进的学生不由得相信，在学生与最高领袖之间，哈塔米选择了领袖，因此绝对不能再信任他。学生过去实在太愚蠢了，居然会期待哈塔米的行事作风会不同于其他政府官员。但改革派的学生活动分子，例如阿里．阿夫夏里，则对政治操作尚未失去耐心，他们虽对哈塔米心存怀疑，却仍愿意给他机会。阿里相信，哈塔米已经将关心的重点放在两个可实现的目的上，而这两个目的都值得学生支持。总统决心减轻穆罕默迪兄弟与其他人的死刑。另外，他也把重心放在国会选举上，而改革派有把握赢得这场选举。

阿里与朋友要求哈塔米关注被监禁的学生。他们写信而且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可以看到改革派政府深陷于与革命卫队、警察以及司法部的斗争之中，后三者认为这些抗争者不应该被当成学生看待，而应该视为决心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外国间谍。穆罕默迪兄弟在那一年的夏天没有被绞死已经算是胜利，但这样的胜利还不够。

在学生的助选下，改革派以压倒性的多数赢得二〇〇〇年二月的国会大选。哈塔米的权力大增。他的派系主导了政府的两个民选单位——行政与立法部门，民众的支持已藉由选举两度获得确认。然而，在体制内，改革派却陷入孤立。阿克巴尔．甘吉在此之前曾写下几篇文章，而他也因为这几篇文章被捕入狱，甘吉在文中指出拉夫桑贾尼在连环谋杀案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报复，拉夫桑贾尼不再支持哈塔米与哈塔米的同僚。阿里．阿夫夏里与学生活动分子乐见其成。他们一直不信任拉夫桑贾尼，认为他是投机分子，对政治自由化并未抱持长期持续的兴趣，而他们反对拉夫桑贾尼主要还是因为经济观点。他们支持改革派的经济左派立场。但拉夫桑贾尼绝不甘于屈居人下，他利用自己主掌的利益权衡委员会的保守派教士进行运作，并且试图让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国会的立法。

改革派议员起草废除引发学生暴动的新闻法，而他们拥有可以通过的票数。但最高领袖命令新任国会议长，改革派教士梅赫迪．卡鲁比，未进入投票程序就撤回新的新闻法法案。革命卫队包围国会，威胁一旦议员不照办，就冲进国会大楼逮捕他们。卡鲁比撤回法案，改革派新闻媒体继续遭到逮捕、威吓与停业。之后，国会通过的法案绝大多数都遭到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

阿里．阿夫夏里与朋友要求哈塔米号召他们走上街头。他们想在国会前面发动示威，要求宪法监护委员会不得阻挡民意代表立法。但哈塔米拒绝了。他不想摊牌。

事情发展至此，阿里．阿夫夏里了解光是选出改革派还不够——至少在民选代表仍对最高领袖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时是如此。在伊朗北部古尔甘召开的一场活动分子会议中，阿里提出了新策略，他称之为「超越哈塔米」。学生应该上街，以非暴力的方式要求制度做出根本性的变革。一时间，巩固办公室看起来不像是苏维埃的青年团体，倒像是波兰团结工联。阿里．阿夫夏里成为团体新策略的喉舌，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必须提出所谓的「全面批评」，这个异议立场针对的对象也包括哈塔米在内。

在古尔甘会议前不久，阿里才在牢里关了将近两个月，其中有十九天是单独监禁。德国绿党在柏林召开伊朗反对活动分子会议，而阿里是参与的几名活动分子之一。讯问者连续八个小时不间断地侮辱与威胁他，有时还把他关进玻璃屋里任由太阳曝晒。他后来获得保释。当法院宣判他五年刑期，但可获得缓刑时，埃米尔卡比尔大学的学生起而抗议。阿里．阿夫夏里将以行动证明他的「全面批评」立场：他在演说中批评哈梅内伊以及向哈梅内伊屈服的改革派人士。两个星期后，阿里又受到法院传唤，这一次他被指控试图推翻政

权。

面对即将遭受的苦难，阿里并未做好准备。就算他要求活动分子的视野要「超越哈塔米」，他依然是忠实的反对派，而直到最近为止，他也仍是支持总统与国会的政治派系。在学生运动内部，他一直是稳健与合作的力量。然而现在他却被指控侮辱最高领袖与宣传对抗政权。他可以面对这些指控。但他很快发现到，讯问者还要他承认其他的罪名：计划对伊斯兰共和国发动武装叛乱，在巩固办公室秘密囤积武器，以及其他叛国罪名。

与穆罕默迪兄弟不同，阿里与其说是替罪羊，不如说是有价值的目标。他的逮捕显示强硬派已经把学生运动视为真正的威胁。监禁一个全国知名而且与政府人员有交情的学生领袖，打击而且羞辱他，强硬派想藉此压制以阿里为领袖的学生运动的士气。阿里不会被遗留在监狱里等死，也不会容他在深夜沿着偏远的公路逃亡。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目的都是为了公诸于众，用来显示监禁他的人拥有不可抵抗的权力。

阿里．阿夫夏里一开始监禁在埃温监狱的某一区，后来他才知道这一区与革命卫队有关。讯问者在日落时来找他，然后整晚讯问，每天晚上都是如此。最多曾经同时出现十名

讯问者，不过房间里通常一次不超过三到四人。他们一整个晚上轮番讯问。阿里被蒙上双眼，面向墙壁站着，一名讯问者不断地威胁与辱骂他，另一名讯问者则是好言相劝。其中一个人说，只要他愿意合作，国营电视台有个好职位等着他。另一个人则说，如果他不合作，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在甘吉描述的鬼魂地牢里，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阿里晚上不许睡觉，白天也几乎没睡。然后，某天早上，守卫用毛毯将他裹起来塞进车里。睡眠剥夺使他晕车，他吐在车内。等到他抵达革命卫队监狱，也就是五十九号监狱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他被蒙上双眼，一直到他进了单人牢房为止，牢房里空气不流通，非常闷热。

「五十九号监狱跟你待过的监狱完全不同，」当晚，他的讯问者如此说道，「在这里，你不会获得宽容。你要是不照着做，就只有死路一条。」

阿里的讯问者对他拳打脚踢，主要是殴打头部与体侧。一名讯问者想讨论哲学。行动本身有善恶吗？讯问者问道。或者，一个人的看法与意图是否决定他的行为是善或恶？阿里也许提到索鲁什与穆塔兹拉学派的说法，但这些讨论最终只会招来一顿痛揍。讯问者不仅要阿里坦承犯下叛国罪，也希望他重复他们的信念——对于当前时事，对于连环谋杀案，对于改革派人士。讯问者告诉阿里，他只有两个选择：投降

或坟墓。比他更强壮的人都在这里倒下了。

阿里在牢房里感到炎热难耐，在讯问室里又觉得寒冷刺骨。他吃得不多又睡得少，因为他被迫连续数天站着。如果阿里开始打盹，讯问者会用力拉扯他的头发逼他站直。有一回，他甚至连续四天都醒着。他感到头晕目眩、毫无方向感且极其孤独。刑求者在他耳边不断低声地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严酷的刑求。如果阿里不认罪，他会强奸阿里。他会用瓶子鸡奸他。他会将他吊在天花板，把他鞭打得半死不活。他会拔掉他手指与脚趾的指甲。他会让阿里在牢里关二十年。

阿里在五十九号监狱待了一个月，然后才被送回埃温监狱。他被关在一间冰冷的地下牢房，身上只有单薄的睡衣，与一条毛毯。到了吃饭时间，他必须站起来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脖子后面，直到守卫把饭菜送到然后离开为止。他应该要在白天睡觉——疲惫已经撕裂了他的精神，但浑身颤抖使他难以入眠。夜间，他被带回到讯问室。有时，讯问室会有多达四人讯问他；他可以感觉到有二到三人从后面打他的头。有一次，阿里正坐在椅子上，一名讯问者用力打他的体侧，让他摔倒在地。那名讯问者用力抓他的头发，逼他坐回椅子上。他们告诉阿里，如果他再不认罪，就等于害他的父亲、妹妹与朋友遭受跟他一样的刑求。

一天夜里，一名讯问者告诉阿里，要他做好遭到处决的准备。讯问者拽着被蒙上双眼的阿里来到监狱空地。另一名讯问者正在讲手机，听起来是在恳求法官收回成命。但第三个声音却突然说道：「不。绝不可能。处决必须执行。」讲手机的男子恳求能大发慈悲。「不行，」第一个讯问者说道，「这个家伙没救了。」讲手机的男子恳求阿里想想自己的父母然后认罪，而不是去面对等待着他的行刑队。长达三十分钟的时间，讯问者来回议论著阿里的命运。这是头一次，阿里感觉自己的意志崩溃了。也许他们不是真的想杀他，但也许真的是。

他想象自己承认有罪。但刑求他的人心里想的可不是如此。他们要他认罪的内容将会牵连其他人，而且必然导致他自己也要遭到处决。他要说巩固办公室储藏了武器，而他计划要刺杀某个省长。他要指认某些特定人士，把他们牵连到他们从未犯过的罪名上。他的刑求者，把他绑在一张像是当初鞭打穆罕默迪兄弟的床上，并挥动了准备用来鞭打他的电缆。

「我觉得自己像个落单而脆弱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置身于一群陌生人当中。」阿里日后在向人权组织做证时说道[14]。他已经抵抗了一百四十天。他担心如果自己继续撑下去，刑求会变得愈来愈严酷，到头来也许要招认的罪名要比目前被

要求的更重。「结果，」阿里对人权团体说道，「我接受了将汽油弹偷偷运到大学宿舍的部分指控。于是他们将我从床上松绑。」

接着开始了阿里第二阶段的监禁，也是最糟糕的阶段。狱方把他送回到五十九号监狱。在讯问室里，阿里协商他的认罪措词。他同意录像，条件是讯问者只能将罪名加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能更动的文字非常有限。他要供称，在改革派指示下，学生运动进行颠覆政权的非法活动。他要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天真、无经验而且容易上当的人，而现在的他已能分辨是非，也准备好要向最高领袖道歉。阿里与讯问者草拟了一份文件，然后将文件呈交给某个单位，阿里认出那个单位是「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对供词做了补充，然后送回给阿里，命令他将这些修改添加进去。

编辑的过程似乎没完没了：从阿里到讯问者再到「专家」，就这样反复不断地来回。然后是录像。阿里日后回忆，他被迫预演文字内容七到八次，目的是为了最后在摄影机前面能够自然地进行描述。之后，他们一共拍摄了四次。阿里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在拍一出电影。有时，他拒绝念出某些台词，例如提到学生试图颠覆政权。于是他被转移到单人牢房，或遭到毒打，直到就范为止。总之，写下供词、编辑、预演与正式录像，一共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当摄影机开始拍摄时，

阿里的讯问者站在摄影机后面，未出现在画面中，但直接面对着阿里的视线。

二〇〇一年五月某个早上，阿里被叫起来梳洗。他可以刮胡子与理发，而且获准淋浴洗澡，狱方也让他换了一套衣服。然后阿里被蒙上双眼，在经过一段难以辨识方向的车程之后，抵达了革命卫队空军基地，这里依然在五十九号监狱的范围内。国营电视台的记者与摄影师已经在那里。阿里的讯问者也在现场。他们告诉阿里，他将接受采访，但这段采访不会对外公开；他们只是希望录制一段比过去质量好一点的短片。其中一段采访，讯问者坐在采访者的椅子上，而摄影镜头只拍摄阿里；另一段采访，电视台采访者提出问题，讯问者则站在镜头刚好拍摄不到的位置。阿里则依照背诵的脚本回答采访者的问题。

当天的两段采访被合在一起之后在国营电视台播放。阿里坐在办公椅上，与采访者隔着一张玻璃咖啡桌。他解释学生运动如何运用公民不服从这个策略，企图以世俗政权来取代伊斯兰共和国。阿里强忍住内心的不快，向最高领袖、伊朗人民，以及最重要的，伊朗共和国的战争殉难者及其家属致歉。他穿着灰色格子图案衬衫与深灰色的长裤。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只留下看起来十分阴郁的八字胡，肩膀倾斜。他坐在一个毫无特征的米色房间里，身旁是一个塑料盆栽与

电视机。有时，摄影机捕捉到阿里的眼神，深不可测，令人难以捉摸。

阿里．阿夫夏里已经被抹除了。他认不出自己。在国营电视台脸不红气不喘地说谎的那个人是个怀有恶意的冒名顶替者。几年后，阿里读到奥斯威辛幸存者的描述，得知在纳粹集中营里被迫违反自己的信仰行事的人往往比较早死。他们说出了阿里的感受。他背叛了每个人，他消除了自己的人格。独自在牢房里，阿里用头撞墙，希望一死。他没有胃口。自杀的冲动几乎使他发疯；这种冲动是狂乱的，没有任何计划。天花板上有几条裸露的电线。阿里想到了些什么，于是努力而近乎着魔地谋画着，不过却构不到电线。终于他有了主意。

他要让讯问者将他刑求至死。他们有的是办法结束他的痛苦。当然，最好还是靠着自己结束生命，但他绝对不可能构到那些电线。他能做的就是撤回供词而且进行反抗。剩下的部分就由狱方来操心了。而这么做也能暴露这些人的野蛮行径。

阿里写信给承审法官，解释他遭到暴力取供，采访都是演出来的，他陈述的内容全是讯问者要求他说的。司法部要求他不许撤回，但现在的阿里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很快地，

他又被送回讯问室。他在加兹温的父亲据说因为经营的杂志刊登的讽刺漫画而被法院传唤。监狱人员告诉他，接下来他要忍受的一切会让他忘了先前所有的刑求。但阿里已经对这些恐吓无动于衷。他的牢房就在机场跑道旁，飞机起降的噪音让他日夜都无法成眠。但有件奇怪的事却在他身上发生。

一开始，他感到饥饿。监狱的伙食还是一样，但此时他却狼吞虎咽。他面对的是相同的讯问者，而且还是一样遭到孤立——往后六个月，他一直待在单人牢房——但从自我否定的深渊中，他却逐渐摆脱刑求的影响。既然他已经放弃生命，刑求者就无法再威胁他。真正的抵抗看来就是如此。他并未认罪，但也没有死。相反地，他逐渐恢复元气，而且觉得自己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他了解他的刑求者并非万能——他可以选择屈服，也可以选择拒绝。六个月后，他们放弃从他身上取得供词的念头。殴打停止了。过去，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精神的力量被监禁他的体制吸得一乾二净，现在，他却发现自己重新找回这股力量。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阿里．阿夫夏里获释，他召开记者会，解释他五月是因为受到威吓才做出虚假供述。他希望全世界能够知道伊朗监狱内部发生的事。他再次向伊朗人民道歉，但这一次是为了他做出虚假供述而道歉。阿里还有该服的刑期，两个月后，他回到埃温监狱，在普通牢房服刑两年。

与先前忍受的状况不同，在这里，他可以读书与打排球。父母可以去探监。他写的文章与信件也被偷偷挟带回校园。

二〇〇三年，阿里再次出狱。巩固办公室并未忘记他。学生们几乎一致同意征召目前成为研究生的阿里重新加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此时的阿里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举办校外教学与主张男学生可以穿短袖的年轻人。而他的目光也已经远远超越了哈塔米。阿里主张伊朗需要一部新宪法。选举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伊朗需要举办公投来决定政府该采取的形式。阿里．阿夫夏里提出的任何目标，前改革派，也就是现在巩固办公室当中的自由派分子，都愿意追随。

但阿里无法留下来继续为公投奋斗。二〇〇五年，法院针对一件尚待判决的案子判处他六年徒刑。如果阿里入狱服刑，等他出狱时已经三十八岁，几乎把一生的四分之一都给了伊朗刑罚体系。前往杜拜是容易的，从杜拜到都柏林也没那么难。他最后流亡，生活于弗吉尼亚州雷斯顿，仍然是研究生，但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系统工程系。要说伊斯兰共和国造就了谁，那么这个人就是阿里．阿夫夏里。但伊斯兰共和国已无他容身的地方。

第十章　总体计划

一九五六年，世界第一家室内购物中心于明尼苏达州伊代纳开幕，里面设立了两家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之间有个如天井般的中庭，引进了明亮的自然光，电扶梯横跨中庭，室内花园与数十到数百家商店为整座商场增添光采。这家购物中心名叫南谷。在当时是个建筑上的创新与惊人之举。与过去美国郊区公路两旁的带状商场不同，南谷购物中心将单调无窗的外墙转变成由停放的车辆构成的庞大护城河。这座购物中心的一切活力都面向内部，开创性的建筑师维克多．格鲁恩将这座商场想象成小区里充满活力的室内闹区，若不如此安排，整个空间可能会沿着离心的方向发散出去。

格鲁恩是维也纳犹太人，于德奥合并后踏上美国海岸。在纽约市，格鲁恩从一无所有的流亡生活打造出商场建筑师的传奇事业。当时，兴建商场在建筑业属于粗糙而低下的领域。格鲁恩却做出彻底的改变。他相信商店设计——商店的外观、橱窗展示，乃至于商店周遭的环境——可以吸引顾客，

也可以赶走顾客，零售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营造出一种氛围来引诱消费者，甚至一开始就让消费者忘了这是个消费生意。这种现象称为格鲁恩效应。然而，这个效应的创造者却与这个效应格格不入，格鲁恩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憎恶汽车、带状商场与郊区，尽管如此，他却让这些事物布满整个美国地貌。

对于不断向外蔓延且极度仰赖车辆的德黑兰来说，格鲁恩是个独特却又意外地善于调适的都市计划者。更特别的是格鲁恩作品影响了伊朗政治人物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在格鲁恩的都市幻想上横跨了一座名叫改革的建筑物的人们。这些改革派人士把城市政治转变成用来实现他们最深刻与最具野心的计划的剧场。与之前的格鲁恩一样，他们将逐渐发现，计划的力量有一半来自于对计划的颠覆。

格鲁恩起初想象购物中心可以对抗美国带状发展的缺点。购物中心可以为位于美国城市外围的睡眠小区提供城镇中心；在南谷周围，格鲁恩计划为伊代纳建造公寓房屋、医院、公园、湖泊、公路与学校。购物中心会像欧洲的城镇广场那样吸引郊区居民彼此接触交流。居民在购物中心购物，然后坐在中庭花园喝咖啡，一边与邻居聊天，一边驻足观赏巨大的长颈鹿雕像。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地，地价一飞冲天，投机者蜂拥而至，身为格鲁恩客户的零售业巨人从中赚得巨额的财富。购物中心孤立于停车场的后方，与其说它固定了什么事物，不如说它助长了无计划与无限制的「分散」（scatteration），「分散」一词是当时格鲁恩与社会批评家珍．雅各布争论时提出的。

法兰克．洛伊．莱特在南谷购物中心刚开幕时曾前去一探究竟，他想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而当时他已预见到大致的结局。对于购物中心著名的中庭，莱特说道：「谁想坐在那个荒凉而毫无生气的景点呢？你弄的中庭花园汇集了村落所有的坏处，却完全没有村落的魅力。」[1]

然而，购物中心却在商业上迅速获得成功。格鲁恩的设计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人能联想到这个设计是出自建筑师之手。格鲁恩虽然心里感到矛盾，却不后悔这么做，他依然继续进行。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末，他已经从设计商店转变成重新设计整座城市。在德州电力公司董事长的指示下，格鲁恩将德州沃斯堡重新想象成一座步行购物中心与人行道咖啡厅的城市，车辆透过环状道路进城，但必须将车停在停车大楼里，行人则搭乘路面电车在这座无车城市里通行。就连珍．雅各布也觉得这是个令人吃惊的计划。但这项计划在德州州议会触礁，州议会担心这项计划的施行会侵害私有

财产权而且增加「贪污舞弊」的可能[2]。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从加州的弗雷斯诺到纽约州的罗彻斯特，格鲁恩已经在美国地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格鲁恩痛恨美国的建筑环境，因此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维也纳，他发现当地的凝聚力正受到邻近购物中心的威胁。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国王穆罕默德．雷札．巴列维的消息。

这位伊朗国王向格鲁恩提出了德州电力公司在各方面均无法提出的条件：取之不尽的资金、无限的权威，以及一座如同巨大画布的世界首都，有着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才刚起步的都市计划历史。格鲁恩与出身名门的伊朗总建筑师阿卜杜勒阿齐兹．法尔曼法马扬合伙，拟定了第一份德黑兰总体计划。

格鲁恩的传记作家日后写道：「战后美国［格鲁恩］的世界如此令人失望，有部分是他自己的杰作。他比任何人都该清楚了解，有计划的发展与无计划的蔓延，两者之间的选择并不是那么简单。」[3]出乎意料的结果就是格鲁恩事业的故事。在美国是真实的，在伊朗则更加真实，格鲁恩的德黑兰总体计划想决定所有的事，但精确地说，是什么也没决定。

德黑兰最初是从古城雷伊的北部郊区开始发展，直到格鲁恩与巴列维国王离开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郊区合并起来

才让城市达到成熟的阶段。然而，就第一世界的郊区定义来说，德黑兰的郊区其实不是郊区。它们是在基于需要以及在重大的社会变迁下自然产生的小区，对于君主制与之后的革命政权来说，这些郊区也构成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

德黑兰北依阿勒布尔兹山脉，南邻卡维尔沙漠，整座城市地势落差很大，北部边界要比东南部边界高了六百公尺以上[4]。地形上的高低起伏深深铭刻在城市的灵魂上。北部高地有干净的水、连绵的视野与清新的空气。南方平原有工业区、贫民窟，有毒的烟雾与北部山脉居高临下阻挡的视野。这里的景色是戏剧与美的灵感来源。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看到蜿蜒的溪流与攀缘山丘而上的村落。德黑兰低矮、对称的建筑所展现的优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衬托出阿勒布尔兹山脉的高耸陡峭。瓦利亚斯尔大街——德黑兰宏伟的中央干道，在革命后改成现在的名称——是中东最长的通衢大道，沿线种植了约六万棵高耸的悬铃树。

一九三〇年代拆除城墙之后，德黑兰的人口开始成长，先是二十世纪中叶在城市东部有计划地建立中产阶级小区，然后——巴列维的现代化政策把没有土地的伊朗农村人口成群送往首都——在城市南部建立非法的聚落。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七九年，德黑兰人口从十六万增加到五百万[5]（二〇〇四年将超过一千二百万[6]）。许多新移民与大家庭挤在城市

贫民窟的小公寓里，在这里，没加盖的阴沟把泥泞的巷弄一分为二，一个房间就是一户人家。有些人在城市外围建立临时居所。有些贫民窟是用泥砖甚至是用锡罐搭建。革命爆发时，德黑兰有整整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住在贫民窟或简陋搭建的屋子里[7]。技术上来说，非法占住的小区不属于德黑兰的一部分，因此居民没有资格获得城市服务，例如下水道与垃圾收集，城市当局表示无论如何要提供这些服务是很困难的；但这些需求十分庞大，满足这些需求已经演变成人道、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定的问题。

格鲁恩与法尔曼法马扬把德黑兰想象成巨大的花朵，沿着阿勒布尔兹山麓这条东西轴线延伸发展。与玫瑰一样，德黑兰是由众多同心圆组成的。十座副城市，每座城市有一个市中心，围绕着市中心有十座城镇；每座城镇有自己的中心，围绕着城镇中心发展出四个小区；从小区中心产生五个邻里。绿色河谷切穿了地图，公路与大众运输路线顺着河谷修建。为了维持原有的优雅与绿意，计划再度明确划分城市南北：北部是高所得与低密度的住宅区，南部是低所得与高密度的住宅区，此外还有工业区。

密度——在城市单位面积上设定居住的人数——是德黑兰的命运。格鲁恩与法尔曼法马扬认为德黑兰整体的人口密度要维持得非常低。他们设想的是一座像洛杉矶那样蔓延、

低矮的城市，一座可以在破坏相对较少的空间中延伸，保留传统伊朗庭院住宅，拥有广大公园与花园的城市。格鲁恩与法尔曼法马扬设定的城市疆界，每五年以预定的成长数向外扩张，直到抵达二十五年的扩张区域边缘为止。城市要对城市疆界内的地区提供服务，例如水、垃圾收集与电力。

德黑兰总体计划于一九六八年通过。根据一名建筑史家的说法：「很少有巨大城市像德黑兰那样仅凭一个理想主义的规划愿景就进行开发；美国城市的规划很少在大学或办公室里产生，就算有，也无法达到像德黑兰这样的程度。」[8]但是，城市的大量人口却位于城市疆界之外，不在城市提供服务的范围之内，也不在城市总体计划的考虑之列。

就在格鲁恩的计划获得采纳的同时，新通过的市政法允许君主以粗暴而不受欢迎的拆除手段来解决大量非法占住的问题。从一九七四年到革命前夕，巴列维国王当局任意拆毁非法占住的小区，他们经常利用深夜派遣准军事部队与推土机来执行任务。当发现进展太慢时——一九七八年九月，离霍梅尼从法国飞抵国内只有五个月——当局决定改变策略，他们把格鲁恩计划里针对当年设定的城市疆界进行扩大，并且承诺将占住的居民纳入扩大的市区之中，使他们可以获得自来水与电力的服务。之后，巴列维国王便流亡了。

德黑兰总体计划的各项缺失与隐含的菁英主义，成了伊斯兰共和国必须继承的帝国包袱。该计划的一切起源出处都与新政权格格不入。计划的作者甚至不是德黑兰本地人。然而这终究是德黑兰唯一拥有的都市计划。荷兰建筑史家沃特．范斯提堡特写道，就像罗马的军管城镇被中世纪的混乱覆盖，或殖民地的哨站被巨大城市超越，德黑兰的故事因此成为它的总体计划被颠覆的故事。但在巴黎与雅加达，范斯提堡特表示：「经过数个世纪与不断世代交替之后，城市的原始码早已被遗忘，所有的遗迹已经在城市羊皮纸上被刮除得无影无踪……。然而，在德黑兰，这个过程是在十到十五年内发生的，要忘记原始码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决定。」[9]

德黑兰与伊朗其他大城市是君主制时期的权力中心，也是用来展示虚矫的世界主义与可疑的现代主义的橱窗。伊斯兰共和国改弦易辙，刻意规避城市，尤其是德黑兰，并且将自身的认同与民族主义和伊朗农村连系起来。从巴列维时代[(1)]开始兴建的德黑兰地铁系统失去了资金挹注。都市计划成为过去的事物。资源缺乏，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油价崩跌更让情况恶化，伊朗于是将国家拥有的资源投入于大力改善农村生活，将现代化的好处拓展到长期被边缘化的伊朗农村人口。

伊斯兰共和国将电力、干净的饮用水、现代设备、令人印象深刻的医疗网络以及家庭计划带到农村[10]。在巴列维国

王执政时期，农村妇女平均生育八个子女；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平均只有两个[11]。伊斯兰共和国的农村妇女受教育的时间是君主制时期的两倍。拉夫桑贾尼政府把新设的大学网络延伸到偏远地区。到了二〇一五年，伊朗的乡村与都市地区在教育与生活水平上已差异不大。这些将成为伊斯兰政权的杰出成就。

然而，虽然伊斯兰共和国极其重视农村文化，在其统治期间，伊朗却成为比巴列维国王时期更为都市化的国家。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伊朗的都市人口成长了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八三年，伊朗的城市人口已经多于乡村人口。新移民需要合宜的地方居住，同时还要有基本的都市设施。「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一个反帝国主义革命口号如此说道。一九八五年，在德黑兰外围道路两旁占住的民众嘲弄地叫嚷着：「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既没有水，也没有电！」[12]

在德黑兰外围地区，移民聚落静静地扩张。占住者现在已不只是搭建棚屋，还开始建立城镇。在德黑兰的西边，在通往邻近城市卡拉季的道路沿线，十年的时间，城镇人口成长了四倍。就在革命政权忙于处理国内的骚动与国外的战争时，占住者已经创造了既成事实。他们从城市管线取得电力与自来水，实际上是窃取了城市未提供给他们的服务。他们

占有的土地是公有地，他们兴建的居所是私有的住处。

伊斯兰共和国的回应与巴列维国王大致相同：进行拆除，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然而，这是一场消耗战。到了一九八九年，当局改变做法，试图整合新聚落以进行控制，向他们收取提供城市服务的费用，甚至将土地出租给他们。伊斯兰共和国将德黑兰的疆界一路拓展到维克多．格鲁恩最后的二十五年扩张线，比原先的计划早了约十年。然后，当局对于新聚落的邻里组织进行渗透，或者以教士控制的协会加以取代。

忽视并未让德黑兰丧失居民或核心地位。相反地，在整个一九八〇年代，德黑兰毫无限制且毫无计划地膨胀，形成一种密度与蔓延的对流。德黑兰被自身的污染所窒息，极度严重的交通阻塞使邻里间陷入孤立，绿色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强制伊斯兰化产生了一群愤怒而疏离的中产阶级，他们紧邻着政治上有权但经济上遭受剥夺的群体。街道难以通行，气氛肃杀，空气脏污。无计可施。城市几乎快要破产。伊朗的财产税传统上偏低，加上石油收入下降，市府几乎没有资源流可以汲取。德黑兰的需求规模——无论进行全新的规划还是大众运输与基本服务——令它的预算相形见绌。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伊斯兰共和国委托研究迁都到较容易管理的地方的可行性。但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差异不大。即使政府

离开，德黑兰仍将继续窒息下去。就在此时，总统拉夫桑贾尼决定任命新的市长。

戈拉姆侯赛因．卡尔巴斯希要求要有花[13]。因为德黑兰不仅欠缺预算，也欠缺美。花无法收容无家可归的人或净化空气，但花可以提醒德黑兰人他们的城市可以是什么样子。一九九〇年春，刚上任不久，卡尔巴斯希就要求德黑兰人在自家的门阶、家中与工作场所放置花盆。在住家与店铺、办公室与饭店之外的地方，市民也要协助新市长展示色彩与绿意。这将是卡尔巴斯希所做的最不重要的事——最不持久，最没有争议，最不昂贵，但却具有象征性。

在卡尔巴斯希之前，德黑兰内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或注意市长是谁。三十五岁，身材瘦长，下巴方正，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具穿透力的目光，无论是好是坏，卡尔巴斯希都将深刻转变伊朗首都，就连批评者也称他是伊朗的罗伯．摩斯[(2)]。他是个名人，有许多粉丝，也有许多诋毁他的人。民众在街上马上就会认出他来。卡尔巴斯希有部分是教士，有部分是技术官僚——身为库姆的阿亚图拉之子，他未读完神学院就在一九八四年当上伊斯法罕省长——他是管理者、生意人，也是出席过总统内阁会议的政治要人。

这位新市长肩负着过去的市长未曾肩负过的任务。一九八八年通过的法律要求伊朗城市必须财政自主。在一个赋税极轻的国家，这项法律意味着城市要不是必须与市民协商提高税率，就是要找到有价值的事物进行贩卖。

如果卡尔巴斯希提高德黑兰的财产税，他很可能为德黑兰可预见的未来提供一项稳定的经济基础。要提高税率，卡尔巴斯希必须与民众协商，解释他的计划，取得支持，并且针对税金如何运用向纳税人负责。这些都是中央政府从未做过的事。伊朗是典型的食租国家（rentier state，这个词是伊朗学者在一九七〇年创造出来的）：石油提供中央政府源源不断的岁入，不需要仰赖人民的生产力或合作。卡尔巴斯希并未改变这项安排。相反地，他复制这项安排。德黑兰也许没有自己的石油供给，但卡尔巴斯希却看到德黑兰手中有一项更为巧妙的资源：密度。

格鲁恩计划已形同虚设。从一九九〇年代初的标准来看，格鲁恩计划想象的是一座不可能的城市，城市的建筑物不能超过两层楼高。然而正因这个理由，这个依然停留在纸面上的计划竟然成了一个聚宝盆。

卡尔巴斯希出售权利给土地开发商，使他们可以超越格鲁恩计划设定的密度限制——有时超出的幅度达到四倍—

—此后又略微将限制做了调升。市政府主掌总体计划的施行，却靠着贩卖违反计划的权利来获得收入。当某家公司向卡尔巴斯希提出一套新的城市总体计划时，却遭到他的回绝。对他来说最好的做法是维持原计划，反正没有人期待他能够执行，然后藉由豁免开发商不受计划限制来取得酬金。

卡尔巴斯希从德黑兰的北部开始。新建的高层建筑改变了德黑兰的天际线，完全无视地震安全法规（德黑兰刚好位于主要断层在线）与邻里的凝聚力。现代，毫无特征，巨大，就像德黑兰所有事物那样，这些建筑物不是浅褐色的混凝土建筑物就是浅褐色的砖造房屋，这些楼房挤进狭窄的巷弄中，彼此簇拥紧挨，创造出一座座密集、窄小而拥挤的钢构大楼群，每一座大楼都依照建商自己的想法建造，对法规或计划视若无睹，也没有开阔的视野或疏散空间。市政府有时甚至与民间开发商合伙，从贩卖新建案的豪华公寓获利。营建部门大为景气，成为德黑兰的主要雇主与经济引擎。紧接而来的是不动产投机风潮。德黑兰面临住房危机，数十万家庭苦无适当居所，但德黑兰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住房单位闲置，价格高到乏人问津，这些住房的建造与出售只是为了转售牟利。

对于已经拥有房子的人来说，这个时期让他们发了一笔横财，他们可以将住所上方的垂直空间贩卖出去。但对于租房的人来说，日子变得更困苦了。即使平均公寓大小减少了

一半，投机仍使居住成本包括租金在内增加为原来的三倍。工人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勉强在首都过活。许多人转而寻求德黑兰外围不受法规管制的开发案。而在德黑兰市区，停车空间、污水下水道与垃圾车数量均不充足。居民怨声载道。尽管如此，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卡尔巴斯希却让城市预算增加为原来的五倍[14]。总计从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八年，他筹措了六十亿美元，其中有四分之三来自于贩卖密度。而他运用这笔资金的方式再次让德黑兰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

卡尔巴斯希投资公园、高速公路、广告招牌、购物中心、文化中心、森林种植、运动中心与彩色亮面报刊。浅褐色的城市突然间有了色彩。卡尔巴斯希开辟了六百座新公园，是过去数量的三倍；他把一万三千处空地辟建成休闲娱乐区；他移除了过去存在于公园周围的栅栏[15]。卡尔巴斯希的公园有长椅与游戏场、水池与喷泉、售货亭与卖吃的摊位，可以容纳老人在此玩双陆棋，也能让青少年在这里偷偷摸摸地交换情书。

卡尔巴斯希并未改善德黑兰两极化的现象——相反地，他经常被指控让北部地区获得较多绿色空间与奢华的发展，但也藉由快速移动的高速公路与重启的地铁系统将南北两区链接在一起。纳兹阿巴德这个邻里小区位于德黑兰充斥着贫民窟的南部地区，德黑兰的屠宰场就位于此地。纳兹阿巴

德的周边弥漫着动物残骸的臭味，长久以来一直是都市祸害的温床，包括犯罪与卖淫。卡尔巴斯希关闭屠宰场，把这里改造成一座宏伟的文化中心，设有剧场、咖啡厅、画廊、教室、图书馆、体育馆、溜冰场与游泳池，四周还有草坪。巴赫曼文化中心不仅成为德黑兰南部青年的去处，也成为德黑兰北部菁英聚集的地方，他们会来这里看电影与参加每周一次的音乐会。

公路固然实际连通了德黑兰的南北，但真正产生效果的还是听音乐会与看电影的移动人群，他们跨越了以往避之唯恐不及的邻里小区，使德黑兰终于成为一座单一的城市。在卡尔巴斯希担任市长期间，德黑兰总共设立了一百三十八座文化中心，巴赫曼文化中心只是开端。有些强硬派人士不认同德黑兰市长介入国家的文化生活。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警告卡尔巴斯希，反对对德黑兰「伊斯兰认同」的侵蚀[16]。但德黑兰各个文化中心与公园也舒缓了伊斯兰共和国累积的压力。无论有心还是无意，革命政权开辟了一座花园，但它却没有能力照料：伊斯兰共和国养成了一批年轻人、受过教育的妇女与中产阶级新成员，这些人全开始挑战共和国。卡尔巴斯希找到了拥抱这些人口的方式，甚至运用他们强大的活力来建设这座由他经营的城市。

在卡尔巴斯希之后，伊朗的都市生活再也不一样。在革

命时期离开故乡的伊朗人，他们写的德黑兰生活回忆为世界文学市场增色不少，然而他们笔下的德黑兰——交错于低矮房屋之间的巷弄宛如公共大院，街坊邻居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屋顶成为夏夜里一家人入睡的地方——已不再有。德黑兰南部日益广大的贫困之海，在流亡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是社会动荡的恶兆，是革命的先声。到了卡尔巴斯希时代的末尾，德黑兰已经成为某种外表看起来熟悉，内部看起来却陌生的事物，它是一座在仓促中竖立起摇摇欲坠的摩天大楼且污染足以与雅加达和北京相提并论的巨大城市。新的环境不仅需要新的文学，也需要一套城市治理结构的新取径。

凡事都有代价。卡尔巴斯希成就的基础正是他谩骂的总体计划。德黑兰的经济建立在几乎全出自想象的商品上：格鲁恩未能预见到的密度，透过精心设计的黑箱，交到了无须负责之人的手里。德黑兰看似继续运转——或许还比过去运转得更好。但要维持运转，德黑兰必须与投机者合伙与违背计划，继续危险而毫无管制地朝着垂直空间攀爬而上。

协助穆罕默德．哈塔米取得权力的改革派人士把目光望向市政府。他们猜想他们可以在这片开放的田野种下新的民主制度——被联邦政府的绿色河谷横切的花中之花。

在总统哈塔米的顾问中，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有着特殊地位。他幽默的目光衬托着他松弛的脸颊与下巴。他的金框大眼镜落在布满斑白胡渣的脸颊上，在他的八字胡与理得极短的头发仍旧乌黑之时，他就已经戴着这副眼镜。哈贾瑞安是个知识分子，认为政治理论是一门可以加以应用的科学——彷佛民主改革是伊朗可以一丝不苟进行的一连串化学反应。

哈贾瑞安与其他改革派人士使用的专有名词是「政治发展」四个字。伊朗只有威权政府的经验。伊朗需要负责任的政治制度，但伊朗也需要积极参与的公民。「政治发展」指的是对上述两者的培养。因此，哈贾瑞安的改革不只是以民主人物取代威权人物。他认为，要建造庞大的政治基础设施必须从伊朗从未有过的事物开始：地方政治。

哈贾瑞安提到伊朗宪法有个条款允许民众直选自治的市议会。革命之后，这个条款就跟格鲁恩的计划一样束之高阁，从未实现也从未施行。哈贾瑞安主张，举办市议会选举将可推动整个国家朝着政治发展之路前进。市议会选举将可为十万名以上的新政治人物提供训练场地，否则这些人永远找不到登上台面的机会。市议会选举也能让伊朗人体验到什么叫做竞争式民主与自治。

卡尔巴斯希过去是技术官僚，他决心让德黑兰再次运转，即使他的政策是透过黑箱与威权的方式加以实施。哈塔米及其盟友对此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想改变的与其说是围绕在他们周遭的有形空间，不如说是权力制度。当哈贾瑞安看着这座摩肩擦踵充满活力的首都城市时，心里想的不是如何管理或规划像德黑兰这种规模的城市，而是德黑兰不适当与过时的政府结构。问责与透明对卡尔巴斯希来说是之后的事，对哈贾瑞安来说却是重点所在。

哈贾瑞安认为，伊朗社会充斥着行动、精力与无来由的不满。选举市议员可以吸收部分精力，并且将这种精力导向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伊朗民众将开始组成利益团体、市民组织，最后形成政党。根据哈贾瑞安的理论，最初实际上只需要两个政党。人民将会决定哪一个政党更能代表他们，并且迫使与形塑政党符合人民的需求。之后，将出现更多的政党。

这些观点与如何经营伊朗城市没有太大关系。但哈贾瑞安的说法旨在提出愿景。他对访谈者表示，卡尔巴斯希是以公司治理的方式管理德黑兰，他重视菁英，把一般市民当成「岁入的主要来源」[17]。哈贾瑞安设想的则是向居民征税而且也让居民能参与治理的城市。

在哈贾瑞安的建议下，哈塔米把举办市议会选举定为竞选承诺，而且在一九九七年就任总统之后着手准备市议会选举。改革派成立了政党，称为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而且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参与阵线将成为伊朗的全国性改革政党。但参与阵线起初只是一个地方性组织，组织的性质也极为模糊。参与阵线的成员对于贩卖密度或对城市财政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并未采取统一的立场，他们也未对危险而人口过多的首都提出地震防灾计划，或对已经成为首都经济引擎的营建业提出更完善的管制建议。无论是这些还是其他议题都将为地方政府的改革派人士带来分裂与纷争，进而导致他们的困窘与失败。当改革派人士来到德黑兰市议会，把他们抱持的许多政治希望投注在市议会时，他们在世人面前的表现，彷佛是派去管理铸造厂的哲学系出身者那般。

市议会选举还没举办，一九九八年四月，市长卡尔巴斯希就因为盗用公款、行为不检与管理不善等罪名遭到逮捕。许多改革派人士猜测，卡尔巴斯希真正的罪名是在总统选举期间支持哈塔米，卡尔巴斯希最后的临门一脚，改变了选举结果。有几天的时间，市长是在监狱里处理市政。支持群众开始上街游行。这些指控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相信，加上卡尔巴斯希极受欢迎，他的逮捕显然带有政治意味。

卡尔巴斯希在六月接受审判[18]。法官同时身兼检察官。整个审判过程经由电视播送，又称为「卡尔巴斯希秀」，是伊朗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考虑到家庭观众，市长要求审判的播送时间与晨礼或世足赛的时间错开。当审判的时间与伊朗对美国的赛事冲突时，法院同意择日再审。

在伊玛目霍梅尼司法大楼铺满褐色嵌板与礼堂式座位的房间里，法官高坐在舞台上，在他的前方有一张巨大书桌，卡尔巴斯希与他的律师拥挤地坐在舞台前的木椅上。卡尔巴斯希憔悴而愤怒，一绺平直的头发盖住他的额头，他不是可以轻易被威胁的人。他直接跟法官争论，表情阴郁而激动，他低着下巴，歪斜着头，冰冷而怀疑的目光对着上方，斜斜盯着与他对话的人。「我不接受任何指控，」他在审判第一天说道，「这些全都是谎言。」法庭挤满了人，法庭外还有数百名旁观者透过电视观看审判过程。

卡尔巴斯希在投机开发的影子经济里进行未受管制的交易，这使他在面对诉讼时左支右绌。卡尔巴斯希被指控盗用数百万美元公款、收受贿赂、对公有财产进行不当交易、非法占用公有财产、非法进行政府交易以及从事「专制与独裁的行为」，而他则主张市府没有一分钱进到他的口袋里。「我所做的只是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转变成现代与适合居住，拥有数百公里公路、绿色空间与文化中心的城市。」他

对法官说道。

实质而言，卡尔巴斯希的辩护有时显得无力与混乱，主要是因为许多指控出乎市长及其法律团队的意料之外。但卡尔巴斯希有一套更大的策略。在全国民众观看审判下，市长一再将审判拉回到司法部的强制手段以及程序正当性的问题上。卡尔巴斯希提醒观众，他是到了法庭才知道自己遭受许多指控，而警察在此之前已先冲进他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机密文件。当法官提出在牢里遭受讯问的市府官员的认罪文件时，卡尔巴斯希反驳说：「你组织了一群七十人的队伍，其中绝大多数只有高中学历，而你竟然让这些人负责进行调查。他们把每个人都带到地下室，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了罪。这是什么意思？」[19]

七月十一日，法院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庭，卡尔巴斯希做出结案陈词。他说了四个小时。他哭泣。他提到自己的革命历史。他惋惜地表示，这场调查耗费了市府的时间、金钱与工作。在经过八年半，每天工作十五小时之后，市长哀叹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法官判处卡尔巴斯希五年有期徒刑（上诉后减为两年）、鞭刑六十下、罚金五十三万美元，以及褫夺公权二十年。

一九九九年二月，德黑兰市长才刚入狱服刑几个月，伊

朗便举办了第一次市议会选举。这是伊斯兰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政治领域，有大约三十三万人参选。改革派人士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支配了全国各地的市议会，但最具决定性的还是德黑兰，十五席中取得了十四席。

改革派人士扩展了派系的观点与出身背景。有些人是接近卡尔巴斯希与昔日市府管理阶层的技术官僚。有些人，如易卜拉欣．阿斯加札德赫，曾是一九七九年攻占美国大使馆的主使者，是较为激进的民粹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如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来自哈塔米旗下思想较具前瞻性的智库。关于市长一职，德黑兰市议会任命了一名中间路线的技术官僚担任。

一旦取得权力，改革派人士也面临与卡尔巴斯希相同的选择。如果要征税，市府必须与民众建立信任关系，这是拥有石油租与威权历史的中央政府从未做过的事。而这也意味着要对目前看似顺利运转的城市——甚至是近年来管理成功的象征——进行财政与政治上的重新安排。

所以，德黑兰还是继续沿着卡尔巴斯希标记的道路前进。二〇〇〇年，市府委托一项新的德黑兰总体计划。但往后六年，这项计划一直未获通过，更不用说施行。德黑兰的都市计划者开始怀疑改革派市议会，就像先前的卡尔巴斯希那样

陷入进退两难的状况。要采纳都市计划意味着要管制密度，而这就表示要另寻筹募资金的管道。

此外，德黑兰市议会成员也未将心思放在市政上。有相当数量的市议员决心参与全国性的选举。一名市议员参选总统；其他市议员则参与国会选举，还找来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担任主要的改革派谋士。

哈贾瑞安的企图心仅止于最初的参选市议员。但他先把德黑兰市政搁在一旁，在他主导的国会大选中（他向记者表示，他阅读美国的政治期刊，从中学到了如何进行联盟与选战[20]），改革派获得了全面胜利，在二百九十个席次中取得将近百分之七十七的席位。对于一个正在爬升的改革运动来说，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或许足以弥补都市管理的挫折。

二〇〇〇年春，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开始收到死亡威胁。一卷录音带通知他即将遭到处决。他是强硬派特别痛恨的人物，强硬派不仅认为他是改革派的谋画者，也怀疑他是阿克巴尔．甘吉报导连环谋杀案幕后的深喉咙。毕竟，哈贾瑞安曾在情报部工作，而且握有甘吉发行报纸的执照。

某个星期日的早上八点三十五分，哈贾瑞安在德黑兰市政府白色石头与玻璃大楼的附近停车。他与一名同事走向大楼，才刚在建筑物入口处爬了几阶低浅的阶梯，一群人突然

靠近他。其中一人交给哈贾瑞安一封信，其他人则拦住问他问题。此时一台马力强劲的红色摩托车在路边停下，这是一种专门提供革命卫队与巴斯基使用的摩托车。一名年轻人从机车后座跳了下来。

他的名字叫扎伊尔德．阿斯加尔，根据他日后的说法，他接下来做的事完全是依照清真寺伙伴的指示，他们以沙赫勒雷伊的某个极端主义教士为中心的圈子。他宣称自己并不反对扎伊尔德．哈贾瑞安。他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甚至在市议员选举时投票给他。但他被告知，刺杀这名被称为改革运动首脑的人物是他的「宗教责任」[21]。

由于不知道哈贾瑞安长什么样子，阿斯加尔一时有点犹豫，他等待共犯告诉他谁才是他的目标。然后他走向哈贾瑞安，朝他近距离开枪。他瞄准市议员的太阳穴，但因为手抖了一下，结果打在哈贾瑞安的脸上。

阿斯加尔跳回机车上，与共犯扬长而去。阿斯加尔脱掉额外多穿的裤子，让目击者无法认出他来，接着他去看电影，到银行缴水费，然后回家，途中还在首都交通壅塞的街道来回穿梭。

当扎伊尔德．哈贾瑞安从昏迷中醒来，一颗子弹仍留在他的脖子根部。他的双腿瘫痪，说话有困难。他在这场刺杀

行动中活了下来，但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样子。改革运动也是一样，市政厅也是如此。

改革派谴责哈贾瑞安刺杀未遂事件是强硬派指使的政治行动。总统哈塔米表示：「自由之敌误以为他们可以藉由刺杀为国服务的虔诚知识分子来达成他们的目标。」[22]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冷静与克制。他公开表示，目前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仓促地认定与政治有关不仅会激起民众情绪，也于事无补。不可否认，刺客使用的是国家民兵才能使用的摩托车。但保守派发言人认为，这也只能说明阴谋行刺的人当中有人是革命卫队成员，但不能说阴谋来自于体制内的权威。

八人遭到传唤与审判。五人被定罪，刑度从三年到十五年不等。就连法官也对于被告出庭时神色自若以及对目标的缺乏敌意感到困惑。他要求对被告进行精神评估，结果发现他们心智正常。但在审判时却找不到这些人与任何指挥链有所连结。

或许，是哈贾瑞安长期的政治观点、深富远见的耐心，以及拒绝放弃他觉得已经掌握的历史契机，使德黑兰市议会免于陷入个人的敌对与政治的阴谋。或许，未来早已经铭刻好——铭刻在政治发展的难题中，要求从某个地方开始，却总是需要某个尚未满足的条件；铭刻在德黑兰的城市管理上，

只会产生不受欢迎的选择，过去的管理者从来不需要响应市民，更不用说承诺让他们的城市成为通往民主改革的跳板。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在遭受枪击的八个月后，哈贾瑞安返回工作岗位。脑干损伤使他无法久站，也无法维持平衡；当他尝试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彷佛在游泳池里移动。空气成了他前进的阻力。他的左手瘫痪，右手颤抖，因此无法写字。他说话结巴，脸孔呆滞，但内心依然热切。

德黑兰市议会已经崩解成充满敌意的派系。议员、市长、内政部为了谁有权主掌哪个领域、谁能决定城市如何取得资金，而彼此争斗。一名议员与市长的争端诉诸仲裁。另一名议员因为涉嫌共谋杀害哈贾瑞安而被短暂起诉（他最后获判无罪）；还有一名议员因为诽谤一名涉及卡尔巴斯希审判的警官而被判入狱；两名议员辞职，据说是因为「某些内部组织问题」[23]。哈贾瑞安为了到国外寻求医疗而试图辞职，议会却不接受。遭受压力之下，市长终于下台，但继任者几乎马上就与和前任市长不和的议员发生冲突。

城市根本的问题依然存在。德黑兰依然建筑过量与污染超标，密度贩卖依然支撑着城市经济，却也损坏了城市的稳定性。地震学家持续针对都市倒塌的可能性发布可怕的警告。谣传有些市议员藉由贩卖垂直空间给开发商而获利。

一开始原本是具有前景的地方自治实验，最后却沦为争吵不休的闹剧。到了一月，国家仲裁委员会解散德黑兰市议会，理由是议会未能定期开会而且未能针对预算做出决定。市长遭到解职，并且因为贪污滥权被判入狱五个月。离伊朗第二次地方选举还不到三个月，德黑兰整个管理机制已明显崩溃。

德黑兰市府与改革派自己做到了强硬派想对他们做的事，那就是显示改革运动的每一项缺失——自负浮夸、为小事争吵、管理上毫无经验、好高骛远。

强硬派报纸把握每个机会尽可能夸大改革派的失败。《宇宙报》主编提到德黑兰市议会时表示：「过去四年来，市议会唯一漠不关心或不大注意的事就是德黑兰的问题以及履行市议会的法定责任。」[24]《宇宙报》另一名评论者则幸灾乐祸地说，这个自吹自擂的民意机关已经「胎死腹中」[25]。一群「无经验的政治人物」只把选举当成他们全国政治事业的「跳板」，罔顾民众的信任。市议员「每天彼此争吵，任由德黑兰的处境愈来愈混乱」。

这些社论肯定打中了改革派的要害，主要是因为这些指控都是真的。但强硬派的批评却未提到即将离职的市长遭到逮捕与受审，也未提到哈贾瑞安遇刺的事——这两起事件不

仅打击了改革派政治人物的士气，也让他们丧失重要的建言、支持与专家见解。强硬派同样未指出改革派愿景的鲁莽。当哈贾瑞安想象市议会可以在国家的政治发展上扮演角色时，他没有考虑到一些小瑕疵就足以破坏整个市府政治：个人的敌对与争权夺利、人性的弱点、有系统的贪污、需要用岁入来解决的问题，以及源源不断的岁入创造出更多的问题。

《宇宙报》社论撰稿人没有提到的是，与管理伊朗日渐膨胀的现代城市的市议会不同，农村地区的地方议会表现得很成功。保守派学者把这一点归因于农村社群的凝聚力，他们选举出自己有理由认识与信任的地方领袖担任议员。学者也提到这些地方议会处理事务的规模与性质较容易管理而且属于他们熟悉的内容。半个世纪之前，伊朗只有一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现在则有六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大约七十座城市人口介于十万到百万之间。改革派人士可能想象自己可以藉由在地方层级开启直接民主，而能从基层开始发展。但实际上，他们却是从伊朗管理难题中最不熟悉也最难处理的地方开始发展。

虽然改革派未能在都市治理上成功巩固自己的势力或理念，但确实创造出让其他人成功的条件。由于改革派将都市机器安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因此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政治人物将从中崭露头角。德黑兰市议会最终

在全国政坛孕育出强大的新力量——只是这些力量不属于改革派。

二〇〇三年，市议会选举相当低迷，实际上几乎已经从全国的舞台上消失。保守派只要不惹出事端，那么几乎是稳操胜算。低投票率对他们有利，因为强硬派绝对会坚定地出来投票。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伊朗人必须被说服相信这场选举值得他们出来投票，然而即将卸任的市议会的表现却起不了这个作用。在各个省分，地方议会过去四年来默默做出良好的成绩，因此大约有九成五的选民出来投票。在城市地区，投票率则接近六成五。至于德黑兰则出现惊人的低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十[26]。

保守派在德黑兰市议会十五个席次中取得十四席。在拥有四百万名合格选民的城市里，他们只拿到八万五千到十九万票就取得胜利[27]。然而，赢家不是全国知名的保守派人物，而是来自之前没没无闻的团体，这个团体名叫伊斯兰伊朗建设者同盟，他们主张「保卫伊斯兰革命的成果」，不让「唯物主义者」影响决策[28]。建设者同盟宣称他们不属于任何派系，而且鄙视党同伐异。总统哈塔米对于这个立场表示欢迎，他敦促刚出炉的德黑兰市议会能避免介入全国性的政治，而且要牢记低投票率限制了人民对他们的授权。

正当改革派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失败的原因之时，新德黑兰市议会也开始着手加强对首都的控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市议会任命了新市长。他是前阿尔达比勒省省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交通工程师，与巴斯基有着密切关系。十五票有十二票赞成，任命案通过，他宣誓打击贪污与确保透明。如果改革派未能建立地方政府，然后把首届德黑兰市议会搞得一团糟，他绝不可能出现在伊朗政坛的光照下。他的名字叫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

(1)指两任巴列维国王，雷札．巴列维与穆罕默德．雷札．巴列维在位时期，时间为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七九年。

(2)二十世纪纽约和其市郊的建筑大师。

第十一章　奇迹室

札赫拉．卡泽米，两岁之后又叫吉巴，她在中年时加入国际摄影记者这个人数少但向心力强的群体。只要哪里有冲突，这群记者就会在当地出现。卡泽米有一头蓬松而凌乱的鬈发，脸孔看来细致，却又带着粗犷的气质，宽阔的嘴巴，眼神精明且带着警戒。她是伊朗人，生于设拉子，但她在革命前就前往法国留学，回来伊朗只是为了访问。卡泽米已经身为人母，而且是加拿大公民。她的工作使她必须前往非洲、拉丁美洲与中东，有时为了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还必须住在难民营里。二〇〇三年，卡泽米五十四岁，她在这一年前往伊拉克拍摄美国入侵造成的后果。她计划从伊拉克前往中亚，但乌兹别克与土库曼的签证迟迟未核发，于是她决定到邻近的伊朗等待。

就像所有拥有双重国籍的公民一样，卡泽米使用伊朗护照入境。而也像所有访问记者一样，她向指导部申请记者证，使她能够拍摄德黑兰居民的日常生活。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

三日，她拍摄埃温监狱大门外的景象。同月稍早，曾有进行抗议示威的民众遭到逮捕，他们的家人因而在此祈求祷告。监狱入口的守卫注意到这名外国女子与抗议民众交谈，偶尔还拍摄照片。他向一名中尉请示这件事是否许可。中尉说，只要卡泽米是获得授权的记者，而且没有造成不安，就不构成问题。

然而有人向监狱安全长官示警，安全长官与另一名监狱官员大步走进群众当中，并且以威胁的口气质问卡泽米，难道她没有看见监狱墙上的告示，上面写着禁止摄影？目击者，包括守卫塔上的看守，看到安全长官要求查看卡泽米的袋子。当她拒绝时，安全长官抓住她的手臂并且抢走她的袋子，然后一拳打在她的头上，力道之大，卡泽米倒在地上，她惊魂未定地坐直身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没有办法起身。然后，这名摄影记者就被带进监狱大门。

把卡泽米带进监狱的守卫与司机日后表示，她进去的时候几乎失去了意识。她昏倒在车里，无法站立，全身瘫软无力，必须被搀扶着走进监狱。她令人担忧的伤势以及她做出的微不足道的冒犯行为——在禁止拍摄的地点进行拍摄，这甚至不算是犯罪——并未让她得到一丁点仁慈的待遇。她并未被带到监狱的医疗室，反而被带到单人牢房。根据日后的描述，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候[1]。德黑兰的检察长扎伊尔德.莫

塔札维与副检察长一同赶往监狱，在半夜对卡泽米讯问了四小时。往后四天，卡泽米将轮番受到莫塔札维、警察的情报单位，以及情报与安全部的监禁。

扎伊尔德.莫塔札维看起来像富家子弟。他的脸孔饱满，头发乌黑发亮，八字胡梳得整整齐齐。他带着无框眼镜，穿着闪亮的灰色三件式西装。他的嘴唇缺乏血色，说话的语气温和但让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接任检察长之前，他负责主持特别法院，专门审理报刊违规事件，他要求报社停业而且监禁记者，因此赢得了「报刊屠夫」的称号。许多记者与编辑都曾亲眼见过他，因为他总是喜欢面对面恐吓对方。他有每个编辑部的联络方式，而且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决定审查的内容。为了让人相信他的大公无私或屈服于他的意志，莫塔札维会描述一个带有恶意阴谋的世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记者，都是国际谍报网的一员，企图颠覆伊斯兰共和国。

在一个自认为被强大敌人围困的国家里，这种说法虽然夸大，却非空穴来风。美国小布什总统入侵伊朗的两个邻邦，而且宣布伊朗是「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成员。小布什也明确采取伊朗「政权更迭」的政策，表达了资助伊朗反对团体的意愿。伊朗强硬派最在意的就是前苏联卫星国的不流血革命，这些国家的反对势力获得西方基金与政府分支机

构公开或不公开的支持，最后成功推翻违反美国利益的专制政权。伊斯兰共和国想象自己是这类行动的潜在目标，这种想象并非毫无理由。然而，决心避免「天鹅绒」革命却导致了偏执顽固与肆无忌惮地对内镇压。

莫塔札维随即宣布卡泽米是间谍。他没有证据，因为这名摄影记者在被捕时让自己的底片曝光，因而无法成像。此外，虽然莫塔札维否认这一点，但卡泽米的文件齐备，获得指导部与情报部的批准，而情报部要求把被告交由他们来监管，并由反情报人员进行讯问，却遭到检察长拒绝。更确切地说，札赫拉．卡泽米先被埃温监狱与检察长拘禁，接着被警察的情报单位拘禁；然后她又被交回给莫塔札维，最后才在六月二十六日交给情报部。但此时卡泽米的状况已无法进行讯问。她开始吐血，紧接着被送往军医院，最后陷入昏迷。

卡泽米住院后，负责检查的医生表示，她的全身有广泛的瘀青，包括脚掌、胸部与手臂后方。日后有法医推测，她手臂的瘀青可能是防卫时造成的——可能是为了阻挡钝器的打击。她的鼻子与手指断裂，几片脚趾甲与指甲被压碎；她的脖子有「深刻而平行的线形擦伤」，背上则有条纹状的伤口；骨盆检查显示瘀青与「非常严重的性侵」相符。检查她的脑部发现，头部各处出现多重挫伤，内部出血；最后一击是在下巴，或许发生在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击让她的头部突

然后仰与脊椎的连接断裂，颅底出现骨折，最后造成脑死。七月十日，她被移除了维生系统[2]。

札赫拉．卡泽米遭到谋杀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闹剧，清楚显示哈塔米在改革安全体制上的局限。情报部终于交由民选政府来掌控，但最高领袖办公室却透过部分司法部门来维持情报与执法网络，这些人是极端强硬派，而且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卡泽米事件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文件，其中包括情报部与检察长办公室相互对立的报告，以及出现非政治人物的信件指出有股压力要他们掩盖真相。然而由于萨依德．莫塔札维严厉的审查手段，这些文件绝大部分都不为伊朗民众所知。

七月，指导部主管外国新闻的穆罕默德．侯赛因．霍什瓦格特对外以书面声明表示，札赫拉．卡泽米是中风而死。之后，霍什瓦格特又否认这项声明，他说莫塔札维曾把他叫到检察长办公室，对他进行威胁。毕竟，他曾批准卡泽米的文件；莫塔札维告诉他，他是卡泽米进行间谍活动的共犯，有可能被关进监狱。霍什瓦格特难道不知道，他批准的这些说英语的记者实际上是派来送钱给反对派的？莫塔札维口授了新闻稿，要霍什瓦格特在他用复印机假造的指导部公文用纸上打字，然后逼迫霍什瓦格特签署文件并将文件交给报社。然而莫塔札维错估情势。霍什瓦格特有豁免的办法，因

为他的妹妹嫁给了最高领袖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极端强硬派的阿亚图拉，据说曾经与其他阿亚图拉发布教令授权进行连环谋杀）。莫塔札维那千真万确是犯罪的行为被掩盖了，霍什瓦格特成了关键证人。[3]

卡泽米住院后，负责检查的医师也拒绝保持沉默。卡泽米的遗体被仓促埋葬，他在病历上模糊写着她曾经中风，或者可能是因为意外跌倒而导致头部受伤。「鉴于札赫拉．卡泽米女士受到的不人道待遇，以及伊斯兰共和国当局火速埋葬她以掩盖刑求的证据，加上我是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晚间轮值急诊的住院医师，也是当时院内负责检查她的医师，」夏赫拉姆．阿札姆医师写道，「我认为基于道德与身为人类的责任，我要向国际人权组织做证与公布关于她身上因刑求、攻击与殴打造成的伤害，而且要在揭露伊斯兰政权不人道与野蛮的本质上尽微薄的心力。」[4]阿札姆与最高领袖并非姻亲，也没有其他人脉关系，因此他逃离伊朗，在加拿大寻求庇护。他的家人几乎可以确定是在胁迫下发表声明，宣称阿札姆有精神疾病，从未在事件发生的医院工作过，而且受到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利用。

总统哈塔米委派委员会调查卡泽米谋杀案。这个委员会由情报部、司法部、内政部、卫生部与指导部的部长组成。这几个部会或多或少涉入了这起正受到调查的事件。总统的

委员会开了七次会，试图将各部会主管范围内的纪录拼凑起来。报告提供了卡泽米遭到拘禁的时间轴，认为致命的一击必定发生在六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委员会提到，这段期间与卡泽米有过接触的人都必须接受调查。奇怪的是，委员会并未公布时间轴的完整内容来厘清事实，这么做等于把嫌疑人限缩在检察长办公室与情报部，而其中讯问卡泽米最久的就是检察长及其下属。

总统委员会的报告还有一些疑点[5]。它不只一次暗示卡泽米是个难相处的人而且粗鲁好辩，彷佛这可以解释或合理化她遭受的虐待。报告提到卡泽米宁可选择待在埃温监狱，也不肯交出相机与其他物品。一名颇具声望的伊朗人权律师指出，监狱又不是饭店，怎么可能让你选择待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她被告知可以离去[6]？此外，报告没有厘清也没有质疑，为什么一个没有前科的女性，只不过是在限制区拍了照片，就要被检察长办公室与其他人连续讯问好几个小时。

札赫拉．卡泽米的母亲在埋葬前看过遗体一次，明显看出她的女儿遭到殴打。她被迫签署文件同意迅速埋葬，但她也向国会表达她的关切。根据伊朗宪法第九十条规定，凡是对立法、行政或司法行动有怨言的人，可以要求国会调查公开报告的结果。过去，伊朗民众并未因为这些要求而获益，但现在国会是由宣称支持法治的改革派主导，那么九十条似

乎就成为卡泽米家的一根救命稻草。宪法九十条委员会开始对卡泽米案进行最全面的调查，而委员会得出的报告是露骨而令人不安的。

报告中蕴含着政治的弦外之音。情报部在一九九九年哈塔米的大力整顿之后，已经与民选的改革派政府结盟，而且以避免司法以外的暴力为荣，另一方面，包括检察长办公室在内的司法部，仍与哈塔米从情报部整肃出去的人员藕断丝连。在向宪法九十条委员会宣誓做证之后，情报部官员愤怒地指出他们是被莫塔札维捅的娄子拖累。他们坚称，他们的建议是释放札赫拉．卡泽米，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她从事间谍活动；如果莫塔札维坚持她是间谍，就应该把她交给情报部，因为情报部才有专门的反情报人员。认为她应该被关押在埃温监狱，受到持续的监视与无情而暴力的讯问，这些都违反了情报部的建议。情报部副部长抱怨说：「情报部既然已经建议释放这个人，怎么可能日后又跑到监狱里把这个人杀掉？」

莫塔札维鄙视宪法九十条委员会，也不去开会，此举惹恼了委员会成员。莫塔札维写了一封专横的信响应委员会的问题，暗示国会议员不懂法律[7]。对此，委员会成员引用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主张卡泽米的监禁极有可能违法；指出莫塔札维伪造监狱人员对卡泽米医疗状况的报告，而且虚构卡泽米未取得情报部记者工作许可的故事；监狱纪录被轻描淡写，

目击者也被噤声。真相被掩盖的规模很惊人，但委员会揭露详情的决心也不可小觑。检察长办公室不仅止于有错。委员会指出，大约二十名监狱人员与守卫曾经以证人身分做证，事后却被监狱的情报人员追究，要求他们推翻证词。但国会议员毫不怀疑谁才是卡泽米谋杀案最终该负责的人，在某个委员会成员在演说以及在给检察长的公开信中严厉抨击莫塔札维之后，整个结果已相当明朗[8]。

根据法律，宪法九十条委员会完成的报告应该向大众宣读与刊载于报章杂志上。经过两个半月的延宕，中间毫无任何解释，委员会的代表终于在十月二十八日于国会宣读报告，而整个过程也在国营广播电台播放。然而，就在平面媒体准备刊载委员会报告内容的那天晚上，奇怪的事发生了。

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二十四岁的《信任报》政治编辑，他认为札赫拉．卡泽米事件令人震惊，但也希望此事能激励改革派人士。在一连串事件之后，改革派运动似乎已土崩瓦解，如德黑兰市议会的失败、学生运动遭到击溃、国会的毫无建树、重要改革派成员扎伊尔德．哈贾瑞安遭到有恃无恐的枪击、阿克巴尔．甘吉遭到监禁，以及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被迫流亡。鲁兹贝赫猜想，卡泽米事件以及这起事件暴露司法部赤裸裸的滥权，或许能促使改革派采取行动。就像连环谋杀案一样，卡泽米事件有可能激励改革派捍

卫法治。鲁兹贝赫心里清楚，毕竟发生在卡泽米身上的事，也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他或他的同事身上。能持续不断地调查此事与揭露加害者，国会与媒体的改革派人士才能确保记者不会遭到肆无忌惮的虐待与杀害。

宪法九十条委员会报告支持鲁兹贝赫的乐观想法。国会改革派成员揭露检察长明显妨碍司法。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有利政治行动，而是为了维护法律。在最好的状况下，改革派的派系只要能尽心尽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信任报》打算以整个版面报导宪法九十条委员会的报告。但是，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之间，莫塔札维打电话给《信任报》主编，告诉他如果《信任报》报导宪法九十条委员会报告，检察长将会重启原本搁置的对《信任报》的诉讼，届时将导致报社停业。鲁兹贝赫的上司通知他，报社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他协助准备的页面撤下。

十月二十九日早上，报纸保持缄默，彷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虽然国会才刚发表司法部涉及谋杀案的严厉报告，但要不是《新茉莉花报》在莫塔札维打电话之前就已经将报纸送印，这则故事将就此石沉大海。各家报纸顶多只是简要说明委员会的发现。前一天才在广播播放与在国会宣读的报告，此时彷佛已经完全从公共纪录上抹去。美国经营的波斯语广播电台——法尔达电台——的一名记者试图追根究柢。他访

问了鲁兹贝赫，鲁兹贝赫坦白告诉他，莫塔札维以停业要挟《信任报》不准报导国会委员会的发现。记者问鲁兹贝赫，是否愿意公开表明这项主张。鲁兹贝赫愿意。莫塔札维的行为是非法的，鲁兹贝赫补充说；国会已经透过现场的广播宣读报告，说明这份报告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

鲁兹贝赫以为其他编辑也会跟进一起揭露莫塔札维施压的事实。他将因此开启反对暴力审查的水闸门。读者将会知道，媒体并未串通起来蒙骗读者，而是在暴力胁持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然而，没有人出面呼应鲁兹贝赫的说法。鲁兹贝赫年轻而瘦弱，有着超乎年纪的教养，此时只能只身应战。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从缓慢靠近的断崖边一跃而下，而他几乎没有注意到断崖就在那里。

小时候，鲁兹贝赫曾被告诫，不要去注意长辈不愿解释或描述的罪行。不要跟犯罪扯上关系，就不会知道加害者，也不会知道受害者。然而，鲁兹贝赫的世代浸泡在犯罪的氛围中，一股威胁感潜伏在孩子视线的边缘——父母的恐惧散发着动物的气味，时时疑心必须要牺牲别人才能让自己得到安全。父母善意隐匿的真相外溢到意识的范围之内。罪恶感就像影子，与投射出自己的本体分离，却在与自己最无关连的地方安顿下来。

对鲁兹贝赫这个世代的伊朗人来说，暴力与秘密构成已知地貌的疆界，就像区隔吉兰省与德黑兰省的阿勒布尔兹山脉一样。小时候，在拉什特，鲁兹贝赫会跟家人一起去探望亲戚的坟墓。但每当他接近某个未标记的墓园时，母亲都会特别留意他，用一种紧张的口气叫他回来。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带有一种神秘气息。有时候，他会自己到这个地方，看着坚硬的地面，彷佛如果他看得够用力或站得够久，只要吹一口气，就能看出这块地方有何邪恶之处，能让来此安慰死者的人不敢入内。很久之后，他才逐渐知道，这是一九八八年监狱屠杀，拉什特受害者被埋葬的地方——他们被当成异教徒，与信仰者埋葬的地方区别开来。

拉什特是一座懒洋洋的绿色城市，人口只比五十万多一点。它是吉兰省的首府，紧挨着里海海岸，曾经是重要的丝绸交易城镇。拉什特是伊朗最早拥有剧院、图书馆与银行分行的城市；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拉什特是反对君主制的自由派行动主义的中心，有时也享有诙谐的名声，因为这座城市的气候、政治乃至于两性关系都相当温和而节制。大家常说，革命很晚才抵达拉什特。鲁兹贝赫在革命后的一个月，也就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出生。

鲁兹贝赫的姊姊丽塔革命时是六岁——年纪已经大到足以留下深刻的记忆。革命好战分子冲进萨瓦克总部杀死九个人当天，她正在市中心。当他们年纪大一点，经过市中心时，她告诉鲁兹贝赫——当时三岁——她在哪边看到被杀死的人的手与腿。日后，当鲁兹贝赫一些较冲动的朋友鼓吹推翻伊斯兰制度时，这段回忆——即使不是他的——总是在他的脑子里浮现。政治暴力表现于外在，却对内在造成影响。

鲁兹贝赫的母亲是个裁缝，拥有高中学历，从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她是个有教养的人。她嫁给比她大十六岁且不识字的出租车司机——一个冷淡而有威仪的人，富有温情却不善于表达。他们的三个子女取的昵称都用 R 开头：丽塔、鲁兹贝赫、拉苏尔。鲁兹贝赫五岁之前，全家住在祖母家的一个房间里，祖母家是个传统的庭院住宅，位于拉什特最古老的邻里小区。战争期间，米雷布拉希米一家搬到夏勒库自己的房子里，这个小区的道路尘土飞扬，许多房子尚未盖好，公用设施极其简陋。

鲁兹贝赫个性平和而含蓄，能够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养成的性格与他的父亲差异不大：冷静、若有所思、和善、不张扬。这种行为举止使他不同于旁人，他一直无法确定这样是好是坏。这使他人难以解读他内心的想法，却又容易将自身的感受投射在他身上。

鲁兹贝赫的父母不是特别虔诚的人，但鲁兹贝赫自己却是。他自己阅读《古兰经》，每天做礼拜，而且在什叶派神圣月分穆哈兰姆月上清真寺。由于父亲无法读写，所以鲁兹贝赫会大声朗读父亲带回家的报纸与杂志上的体育新闻给父亲听。逐渐地，鲁兹贝赫开始阅读报纸与杂志的其他版面，他想象自己有一天可能会成为记者。

一直以来，与其说鲁兹贝赫生活在有形世界，不如说他沉溺于书本与观念的世界。高中时代，他加入了大龄孩子组成的类似沙龙的圈子。他们每周轮流在每个人家里聚会，讨论宗教、电影、小说以及政治哲学作品。透过这个团体，鲁兹贝赫对笛卡儿与马基维利产生兴趣。他透过这些思想家得到对西方的理解，并且拿这些理解与他对伊朗的看法做比较。他为一份地方杂志撰写政治哲学文章。圈子里有两个男孩喜爱沙里亚蒂，但鲁兹贝赫认为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思想太僵化，太无所不包。他比较喜欢索鲁什与另一个类似的思想家，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穆智台希德．沙贝斯塔里的前教士，他们认为宗教不是完整的体系，而可以由其他的理解来源加以补充。鲁兹贝赫与朋友订阅了《地平线》，他们阅读了索鲁什与沙贝斯塔里在新颖性与影响力均处于巅峰时期的作品。

这段时期的政治，对鲁兹贝赫来说依然相当遥远而难以理解。他没有想支持的行动者。鲁兹贝赫年轻时绝大多数时

候，伊斯兰左翼都是令人恐惧的对象。他们的成员在拉什特市中心巡逻，对于违反严格行为与服装规定的年轻人来说，这里成了危险的地方。当伊斯兰左翼的重要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改革运动成员时，鲁兹贝赫与朋友依然对这些改革派人士过去的激进主义感到恐惧，他们怀疑这些人致力于公民自由只是一种权宜手段。然后，哈塔米于一九九七年竞选总统。鲁兹贝赫从未听过这个性格温和的图书馆员。敌对阵营形容哈塔米是自由派，会把伊朗的思想空间炸开。这么说是为了恐吓选民，却对鲁兹贝赫产生极具说服力的效果。他认为，如果保守派这么害怕与仇恨哈塔米，这就表示哈塔米很可能是个正面的力量。

当哈塔米于伊朗历三月二日当选总统时，鲁兹贝赫感到晕眩。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好事应该会逐渐发生。他的感受与他出生当年革命分子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他很庆幸自己是在年轻的时候遭逢这样的时代。

许多伊朗父母希望子女能成为中产阶级，米雷布拉希米家也不例外，他们希望鲁兹贝赫能成为工程师。只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准进入大学的工程学系就读。鲁兹贝赫不想成为工程师。他刻意消极表现好让自己遭到淘汰：他不想准备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果然就没考上。他的父母感到失望，但鲁兹贝赫却觉得获得解放。他入伍当兵，被派到了伊朗库

德斯坦。

Sarbazi，或者是义务役，就跟每个地方一样，在伊朗，绝大多数年轻人只要有办法都想避免当兵。但鲁兹贝赫却愿意当兵。他发现自己有个特质，在未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发挥这样的特质：适应环境，这使他在面对变化的时候，就算做不到无动于衷，也能表现得极具弹性，即使他看起来对任何经验都毫无反应。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放满书本的房间、监狱以及在国外，他依然是原来那个鲁兹贝赫。鲁兹贝赫认为，由于兵役是强制性的，为了抗拒兵役而破坏服兵役的经验并没有好处。他认为独立、新奇、旅行、机遇都可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在当兵期间，每天都会写日记。他称之为「大兵之旅」。战友都笑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当兵不是自我探索的旅程，而是多绕了一段路，要履行不愿履行的责任，要等待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但鲁兹贝赫对于自己的日记感到自豪。他持续写日记，还把日记给了弟弟拉苏尔，让他为自己的兵役做好准备。

鲁兹贝赫获得解放——藉由服兵役让自己从年轻人的依赖中解放，藉由在工程学考试失利让自己从父母的期望中解放。当他回到拉什特，他报名参加另一种大学入学考试，当时都认为这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考试：人文学科考试。他的分数可以就读拉什特公立大学的社会科学，或德黑兰私立

大学的政治科学。家人希望他留在拉什特，这样无论学费与住宿都是免费。但现在鲁兹贝赫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喜爱政治学，他会想办法支付伊斯兰自由大学的学费以及德黑兰的住宿费。他只跟父母拿了登记入学的费用，其余的就靠他工作赚取。他在大学念书时就已经在当记者，他在《信任报》找到工作，这份报纸从拉什特选出的国会议员获得许可。

伊斯兰自由大学由拉夫桑贾尼政府创立，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校园网络，收取学费，让各地区更多的伊朗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与公立大学不同，公立大学是行动主义的传统温床，伴随着诸多的危险，包括民兵的冲突与各层面的监视，私立大学校园则是以典型的拉夫桑贾尼风格管理：严厉禁止学生结社与从事政治活动，以此来确保校园正常运作与安宁和谐。鲁兹贝赫的思想饥渴是在政治方面，他靠着阅读来获得满足，特别是世俗左派社会学家侯赛因．巴什里耶赫的作品。

鲁兹贝赫高中时就已经阅读巴什里耶赫的作品，当时有一个经济学与政治学杂志刊载了巴什里耶赫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伊朗青少年难以企及的政治哲学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巴什里耶赫论宽容的作品特别让鲁兹贝赫感兴趣。鲁兹贝赫开始自己写文章，等到他到了德黑兰之后，他开始幻想自己会遇到这位启蒙的社会学家。某天，他把自己论民主化的作品

草稿做了总结，然后鼓起勇气前往德黑兰大学校园寻找巴什里耶赫的办公室。他向教授介绍自己是来自另一所大学的学生，尽管如此，他仍希望向巴什里耶赫本人求教。不知道巴什里耶赫有没有可能阅读他这个大学新鲜人的文章，并且告诉他哪里写得对或哪里写得不对。

巴什里耶赫接受了。他要鲁兹贝赫把文章留下，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来找他。巴什里耶赫慷慨而坦率地批评了他的文章。鲁兹贝赫又提出一个请求。巴什里耶赫在博士班开了一门比较政治科学的专题讨论课程，鲁兹贝赫希望能够旁听。巴什里耶表示欢迎，而鲁兹贝赫也让他成为自己的导师。他上了西方哲学课程，与巴什里耶赫的伊朗社会学课程，之后又读了巴什里耶赫所有的作品。对鲁兹贝赫来说，他从巴什里耶赫的作品获取的东西远比《地平线》的文章来得多。鲁兹贝赫认为，索鲁什、卡迪瓦、沙贝斯塔里是伊斯兰学者，他们最关心的是让他们热爱的宗教从扼杀宗教的政治体系中解放。巴什里耶赫关注的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同样地，对鲁兹贝赫来说，政治与历史要比宗教更能让他挖掘出他想知道的最深刻的真理。

鲁兹贝赫觉得，在伊斯兰共和国长大有时就像在一个走廊的房间全都上锁的家中长大一样。门后头的房间，彷佛隔着毛玻璃，仅能看到模糊的轮廓：人质危机、监狱屠杀、两

伊战争、巴札尔甘政府的倒台。但要真正进入这些房间，了解历史的细节，以及知道形塑历史的人物的动机，则需要钥匙。

易卜拉欣．阿斯加札德赫，一名好斗的市议员，他在一九七九年时曾是人质挟持行动的领袖，他手中就有一把鲁兹贝赫一直想探索的上锁房间的钥匙。透过阿斯加札德赫，鲁兹贝赫想象自己可以重新找出攻占大使馆事件的逻辑与气氛——与美国断交，对鲁兹贝赫出生后的伊朗造成深刻的影响。阿斯加札德赫曾在访谈中承认挟持人质是一个可怕而代价高昂的错误，鲁兹贝赫想取得阿斯加札德赫的同意，刊载这段访谈。根据鲁兹贝赫的说法，阿斯加札德赫私底下差点就同意了，但他实在无法公开抨击这场使他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的活动。

于是鲁兹贝赫继续关注其他上锁的门把。有一次，他与报社同事到库姆采访一九八〇年代的绞刑法官萨迪格．哈勒哈里——他是一名教士，在他的直接命令下，有数百名，或许有数千名异议分子、库德族人、保皇派菁英、将领与其他人在革命后的恐怖时期被行刑队枪决。在行为或精神变态上，扎伊尔德．莫塔札维都无法与这名老教士相比。对鲁兹贝赫与其他一般伊朗人来说，哈勒哈里的脸是令人恐惧的事物——白色缠头巾的下方是一张臃肿的圆脸，配上不自然的小眼

与残酷扭曲的上唇。但鲁兹贝赫在库姆见到的他却是一个已经失势、近乎滑稽的人物。

哈勒哈里在与鲁兹贝赫见面的同年死去。他原本就个子矮小，此时看起来又缩得更小。哈勒哈里头上并未缠着头巾，而是戴着大盘帽，看在鲁兹贝赫眼里不禁联想起婴儿帽。他已经到了帕金森氏症的末期，回答记者的问题往往十分古怪而且离题。但他的长期记忆似乎仍完好无缺。没错，哈勒哈里告诉鲁兹贝赫与他的朋友，他的确签署了超过一千份处决命令。「许多人逃掉了，」他回忆说，「如果再让我逮住他们，我还是会处决他们。」

鲁兹贝赫不是个生性叛逆的年轻人。对于老一辈，即使谈不到尊敬的程度，他也渴望遇见能让他毫无保留加以赞美的人物。鲁兹贝赫注意到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他在巴札尔甘主政期间担任副总理，温文儒雅的他因为从美国大使馆搜出的文件而被指控叛国，他在牢里待的时间跟鲁兹贝赫活的时间一样久。一九九七年，他在短暂请假期间出版了两本回忆录。鲁兹贝赫在书店橱窗看到，马上趁着被禁之前买下这两本书。他有很多书都是这样买下来的——趁着审查人员发现它们的存在之前，赶紧将其藏匿起来。但这两本书很特别，鲁兹贝赫才花两天的时间就看完了。

鲁兹贝赫从小就听过埃米尔恩特札姆这个人。与绝大多数伊朗民众一样，他知道的埃米尔恩特札姆是个犯人，而不是思想家或政治舞台上的行动者。然而由于他是伊斯兰共和国关押最久的犯人，因此在高知名度之外，他也享有民众普遍对他的好感。他经常被称为伊朗的纳尔逊．曼德拉。与曼德拉一样，他在牢里与在家中遭受软禁的时间总共有二十七年。在这段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恐怖的暴行，包括一九八八年的屠杀事件。而他从未离开过监狱，因为他从未认罪。

一九九八年，埃米尔恩特札姆请假期间，在血腥的一九八〇年代担任埃温监狱典狱长的阿萨多拉．拉杰瓦尔迪在市集遇刺身亡，他在退休后成了市集里贩卖女性内衣的商人。哈塔米与其他官员颂扬这名象征伊朗现代监狱体系最滥权时代的人物。私底下，许多伊朗人却欢呼正义得到伸张。埃米尔恩特札姆在广播中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访谈。「恐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说道，「我对于这则新闻并不感到高兴。一个极度无情、暴力、邪恶而残暴的人居然被当成英雄、殉难者、人民公仆。」由于针对拉杰瓦尔迪做出的这类声明，埃米尔恩特札姆又被送回了监狱。

二〇〇二年，鲁兹贝赫得到一个罕见的机会撰写与埃米尔恩特札姆相关的报导。埃米尔恩特札姆在他的一本书里几乎指出一名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人质的挟持者，而且在他遭到

逮捕后不久曾经讯问过他。那名知识分子则是写了一篇愤怒而冗长的文章争论埃米尔恩特札姆回忆的内容。鲁兹贝赫在《信任报》刊出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做为响应。他在文中指出，过去曾经指控过埃米尔恩特札姆的人，即使现在有许多人的政治立场更靠近埃米尔恩特札姆而非保守派菁英，他们似乎还是无法坦然承认过去的错误。

文章刊出后不久，《信任报》主编把鲁兹贝赫叫到办公室。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妻子打电话过来。她想知道是谁写了这篇关于她丈夫的文章。鲁兹贝赫接过电话，那名女士告诉他，她的丈夫想对于他写的内容向他致谢。

鲁兹贝赫吓了一跳。他甚至不知道埃米尔恩特札姆已经保外就医，如今则断断续续地软禁在家中。鲁兹贝赫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过去探望这位前副总理。埃米尔恩特札姆仍然处于被关押的状态，在他家的门口设有一个小亭，守卫会在这里监视访客的一举一动。鲁兹贝赫如果到了那里，将会引起注意，甚至接下来会遭受监视与怀疑。但他可以因此见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未想过还有人能够见到埃米尔恩特札姆。

埃米尔恩特札姆同意每周见他一次，鲁兹贝赫将两人的对话内容编纂成书，这本书将在数年后出版。对鲁兹贝赫来说，这些对话已不仅仅是记者的访谈而已。埃米尔恩特札姆

不可思议的平静与轻松的神色让鲁兹贝赫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大半生都在牢里度过的男人怎么可能如此快乐？不仅如此，鲁兹贝赫很肯定埃米尔恩特札姆不只是快乐，而且还很乐观，他的心灵总是专注想着未来会有更好的事情降临。不仅如此，埃米尔恩特札姆是个爱国者。他在牢里一直认真想着自己的国家。他思索着革命与革命的影响；他为了伊朗的未来而在脑子里构思计划，甚至考虑到了德黑兰的地铁系统。他原谅自己的仇敌，因而能放下愤怒的重担。鲁兹贝赫视埃米尔恩特札姆如父而加以赞扬，他觉得埃米尔恩特札姆也爱他如子。

鲁兹贝赫开始以《信任报》为名对埃米尔恩特札姆的批评者进行访谈。他找到讨厌埃米尔恩特札姆的作品或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公众人物，刊出他们的说法，准备之后刊载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响应。鲁兹贝赫希望用这种方式将埃米尔恩特札姆的话语偷渡到报纸上，然后驱使报纸的读者转而去阅读埃米尔恩特札姆的著作。在此同时，他也协助埃米尔恩特札姆将文件组织成档案，并且帮他将信息补充到书籍与报纸上。保守派报纸提到两人的关系，发表一篇文章表示《信任报》的政治编辑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已经成了埃米尔恩特札姆的经理人。鲁兹贝赫的同事提醒他要小心。但鲁兹贝赫至今从未做过如此有意义的事，因此他不打算停手。

某日，埃米尔恩特札姆告诉鲁兹贝赫，他接到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学生活动分子的电话，对方希望他过去演讲。他感到高兴但也存有疑虑。鲁兹贝赫是否知道这个学生团体？它是宗教团体吗？鲁兹贝赫知道埃米尔卡比尔校园受到自由改革派学生领袖阿里．阿夫夏里的影响，阿夫夏里目前正在坐牢，但校园里的活动分子应该与他的路线相同。鲁兹贝赫鼓励埃米尔恩特札姆前往。

二〇〇三年五月五日，埃米尔恩特札姆与一小群随行人员进入圆形剧场，剧场里满满都是与鲁兹贝赫年纪相仿或更小的学生。当主持人说出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名字时，现场欢声雷动，口哨声与掌声足足持续了十五分钟。

埃米尔恩特札姆演讲了两个小时。他谈到自己遭到逮捕与指控，其中一些指控令学生发笑。埃米尔恩特札姆因为美国官员在信件中称呼他「亲爱的」，因为他是巴哈伊教信徒，同时也是个犹太人，因为他很有钱，而判他有罪。他谈到过去，也谈到新的世代。鲁兹贝赫觉得每个人都喜爱埃米尔恩特札姆。二十五年前，学生活动分子让他判处终身监禁。现在，学生活动分子将他当成反抗上一代建立的国家的图腾。

哈塔米担任总统，起初为伊朗年轻人带来了希望，他们相信与日俱增的变革，相信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所谓的政治

发展的过程，相信通情达理的人有能力将稳健节制引进到他们服务的体制之中。哈塔米对连环谋杀案的响应显示改革派政府并非毫无力量。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迫使情报部对杀害反对派人士负责？但在此同时，哈塔米显然无法约束司法部，司法部部分官员，包括德黑兰检察长办公室与特别教士法院，看起来都听命于最高领袖。

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仍被软禁。特别教士法院对哈塔米的两名部长提出政治指控。一九九九年二月，特别教士法院传唤穆赫辛．卡迪瓦，这名异议教士曾主张「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与伊朗的君主制传统更为接近，而与什叶派传统无关。卡迪瓦被指控破坏伊斯兰体系、侮辱霍梅尼与哈梅内伊、误导民众、支持蒙塔泽里以及支持政教分离。四月，卡迪瓦被判处入狱十八个月。学生发起示威游行，他们高举旗帜，上面写着：「我们跟卡迪瓦的想法一样，你们也可以逮捕我们。」[9]

二〇〇一年，哈塔米第一任任期结束时，国家已经停掉了一百零八种报章杂志，穆赫辛．卡迪瓦、阿克巴尔．甘吉与许多学生活动分子及记者仍在狱中受苦。改革派同盟濒临分裂。自由派学生号召进行公民不服从与对整个政府体制进行公投。改革派教士如国会议长梅赫迪．卡鲁比与总统本人要求选民要有耐心，他们仍持续与保守派进行协商，然而后

者的态度却愈来愈强硬。

一群世俗改革派政治人物采取了强硬但不失弹性的中间路线。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是领袖之一。他是知识分子，也是善于政治运作的人物。塔吉札德赫是哈塔米的追随者——他们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期间一起在指导部工作——当老教士当上总统时，他让塔吉札德赫主掌治安与政治事务的敏感职位，其中包括了监督选举。二〇〇〇年国会选举——改革派大胜，尤其在德黑兰，改革派囊括了全部的三十席——使塔吉札德赫成为保守派忌惮的人物。宪法监护委员会认为有舞弊行为，宣布约有七十万张选票无效。塔吉札德赫反对。他表示，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干净与最自由的选举」。宪法监护委员会将塔吉札德赫告上法院，塔吉札德赫也用同样的方式反击，对大权在握的委员会主席进行象征性的诉讼。二〇〇一年，法院判决内政部副部长缓刑一年，禁止担任公职三年[10]。

塔吉札德赫从不认为街头抗争应该列为改革派的一项策略。民众遭受严重的侵害而且缺乏组织。一旦抗争变得激进，保守派将会出手镇压。他们将会封闭改革派仅存的一丁点运作空间，他们将会在监狱里毁掉更多的年轻人，而我们将一无所获。塔吉札德赫与其他改革派人士总是劝告支持者不要受到挑衅，也要求他们的同事坚持进行内部的协商与妥

协。但在二〇〇一年后，塔吉札德赫改采较具威胁性的路线。他仍然不鼓励街头动员，却号召政府中的改革派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反对压迫与揭露政治暴力的深层非法体制。调查札赫拉．卡泽米事件的宪法九十条委员会报告正是他想做的事。

在德黑兰中南区一个名叫埃斯坎达里的邻里中，诗人与作家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与鲁兹贝赫以及《信任报》另一名同事同住在不到十四坪的一房公寓里。他们住在四层公寓的三楼，屋内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床与书。

夏赫拉姆接受鲁兹贝赫的邀请，开始为《信任报》政治版撰稿之后，两人就成了好友、室友与同事。夏赫拉姆年纪较大而且已经颇有名声。他的作品《朝改革开枪》最近才刚通过审查，只被改了几个字。这本书的主题是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夏赫拉姆与另一名共同作者从报摊案与法律文件重构了刺杀哈贾瑞安未遂背后的过程与动机。这两名记者把枪击案与国家支持的其他暗杀行动连结起来并且探讨哈贾瑞安的理念，显示国家为什么把哈贾瑞安列为特定目标。撰写与改革派相关的内容使夏赫拉姆获得一些掩护，这是过去他撰写与伊朗作家协会的朋友相关的文章所未曾有的。只要改革派仍掌握权力，审查的红线就有足够的弹性来容纳他们的想法。但夏赫拉姆不认为这种状况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夏赫拉姆认识改革派人士，虽然认识的程度比不上他与其他作家的关系。在一九九〇年代，他曾在改革派出版社新计划工作，他在那里认识了塔吉札德赫与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现在，他与《信任报》的编辑，包括鲁兹贝赫，在工作时偶尔会与塔吉札德赫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接触。夏赫拉姆尊敬一些官员，但对另一些官员则敬而远之，他知道有些改革派成员过去曾是伊斯兰左翼，这些人或许无法容忍他们过去协助建立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动。除此之外，就像他的老朋友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一样，夏赫拉姆也寻求彼此的共通点。

在法院判决不许担任公职期间，塔吉札德赫大胆创立了在线刊物《今日报》。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虽然在《信任报》工作，却也开始为《今日报》写稿。伊朗的在线媒体是相对新颖的事物，而且可能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来探索敏感的主题。另一家报社的朋友介绍夏赫拉姆撰写部落格。这项科技看起来容易使用而且难以审查。回到《信任报》之后，夏赫拉姆开始到处问人，是否有人能够教他如何贴文与更新网站？一名精通网络的同事帮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各建了一个部落格。

鲁兹贝赫、夏赫拉姆与其他几名同一个圈子里的记者是这个新媒体的先驱。虽然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但他

们的部落格读者很少，主要都是知识分子、记者与活动分子，因此他们并不担心招来报复。但部落格——绝大多数明显不是政治性质——很快就在伊朗这个缺乏未受监控的公共空间的国家出现爆炸性的成长，成为一种分享经验的工具。到了二〇〇五年，波斯文成为部落格世界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有了部落格，伊朗人可以规避审查机制，关掉网站然后在别的地方放上网站，科技永远走在陈旧的情报机制的前头。

鲁兹贝赫把他的部落格称为「晚间通信」（shabnameh），即「秘密流通的小册子」，这是秘密出版物（samizdat）的波斯文名称。这个部落格主要是用来发表未删除与未审查的报纸报导版本。夏赫拉姆贴的文章谈的是言论自由与书籍和报纸的审查。他仍继续提到连环谋杀案。他报导了最近一些谋杀案的说法，这些谋杀案都是由同一个阿亚图拉下令执行的，这名阿亚图拉可能是连环谋杀案的幕后主使者。他还提到一桩恶名昭彰的法院案件，一名被控杀害安全人员的妇女宣称她是为了不被性侵才进行防卫。

就算夏赫拉姆不是有名气的人，二〇〇三年他在在线——在《今日报》——发表的文章也必然让他引起注意。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奇迹室〉，内容是关于强迫认罪。奇迹室就是讯问室，政治犯进到里面，彷佛被施了魔法似的，马上变成卑躬屈膝愿意认罪的人。夏赫拉姆分析了几个已经公开的认

罪案例，包括阿里．阿夫夏里，他试图解释讯问者如何毁了一个人。他特别提到一个知名的改革派记者（与人质挟持者）最近才在压力下「认罪」。夏赫拉姆指出，认罪标志着转变：即使是著名的改革派人士也成为众人抨击的对象。夏赫拉姆的文章与文章标题将被收录到伊朗政治学字典中，使刑求的心理控制成为可形容的事物。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初，鲁兹贝赫被传唤到情报部总办公室。在放置了桌椅的讯问室里，一名和蔼可亲的探员告诉鲁兹贝赫，扎伊尔德．莫塔札维向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投诉他。三天前，鲁兹贝赫在法尔达电台告诉记者，莫塔札维要求报社不要报导卡泽米事件。莫塔札维在投诉中指出，他的办公室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明令禁止伊朗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此外，莫塔札维也指控鲁兹贝赫诽谤他，说他的行为是非法。

鲁兹贝赫的讯问持续约三个小时，但他不觉得自己受到不友善的对待。他解释说，尽管莫塔札维下了命令，但他相信宪法保障他的言论自由。鲁兹贝赫又试图说服讯问者，让民众知道政府并不支持对札赫拉．卡泽米施加暴力，这反而是好事。他对情报部探员说，莫塔札维不能代表政府；他知道，但绝大多数民众不知道。他的讯问者告诉他，他们担心他的安危。他们来自情报部，而情报部属于改革派政府。但鲁兹贝赫也听说有些较不具同情心的情报人员与革命卫队

及检察长有关，而这些人知道他与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关系。

鲁兹贝赫回答关于卡泽米与莫塔札维的问题，但也回答了关于改革运动与最高领袖的事。有人告诉情报部，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曾经训练鲁兹贝赫进行心理战。鲁兹贝赫笑了。他回答说，他这辈子只见过哈贾瑞安一次，而且是在这位政治策略家遭到枪击之后。鲁兹贝赫从这些问题了解到，他的手机已被监听一段时间，但其实他早已怀疑这一点，因为当他打电话时总是会听到哔哔声。

鲁兹贝赫在被言语警告与告诫不许再与外国媒体说话后便被释放。他知道探员想跟他建立某种关系。他们递给他名片，告诉他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一名讯问者问鲁兹贝赫，如果他们想知道他对某事的意见，是否也可以打电话给他？

鲁兹贝赫拒绝了。他不喜欢与情报部探员交谈，他很果决地告诉他们。如果讯问者想知道他的意见，可以去看他出版的作品。

或许是因为性格，也或许是因为世俗左派的背景，夏赫拉姆似乎总是超然于伊朗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之上。他进入的世界充满繁复的结构——新闻报导参杂了政治，政治参杂了严密的监视，而一切的监视均来自于内部分化的国家。他

用一种近乎刻意的纯真或者说道德姿态来看待这个世界：拒绝将他生活的这个世界视为真实。若非如此，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与心事重重的年轻人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维持友谊。

夏赫拉姆偶然间在电影院首次遇见帕亚姆。夏赫拉姆的诗人朋友介绍他认识这位精瘦、脸庞窄小的年轻人，他当时应该不超过二十一岁。夏赫拉姆听过帕亚姆的名字。他曾经是作家，为电影周刊写稿。二〇〇一年，一名资深的文化人物被捕，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是他熟识的人之一，也跟着遭到逮捕。帕亚姆年轻无经验，从未涉足政治。他不是大家眼中那种会对身体酷刑做出英雄式抵抗的人物。做为释放的条件，普遍相信他同意供出不利于朋友的讯息，因此他成了一名告密者——现代版的塔沃布，但不是在监狱里面运作，而是在监狱外面。他有一种胆小如鼠的特质，但同时间又让人产生怜悯与不安。

夏赫拉姆很肯定地认为帕亚姆是被派来认识他的，但他没有拒绝。相反地，他同意跟他见面，而且总是在公共场合。有时鲁兹贝赫也会加入。夏赫拉姆觉得自己没有可隐瞒的事。他对待帕亚姆就跟对待其他人一样，没有差别。稍微认识夏赫拉姆的人都知道，夏赫拉姆一向坦诚待人。他公开与帕亚姆谈论伊斯兰共和国，谈论共和国官员，甚至谈论伊斯兰教。

帕亚姆坚持要到夏赫拉姆工作的地方看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夏赫拉姆终于同意顺道带他拜访一下《信任报》，他与记者们交谈，双方都感到十分愉快。

某天夜里，夏赫拉姆在《信任报》工作到很晚，他接到帕亚姆打来的一通绝望的电话。

「我是来道别的，」帕亚姆对夏赫拉姆说道，「我背叛了我的老朋友。我说了太多事情。」他活不下去了，他说道，他决定自杀。

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商议之后决定去找帕亚姆，发现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浑身脏兮兮，彷佛一直睡在街上一样，于是他们将他带回到他们的公寓洗澡。当他洗澡的时候，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清洗与熨烫他的衣服。在他们的陪伴下，帕亚姆似乎获得了安慰，他不再提起自杀的事。三个年轻人决定去德黑兰郊外的达尔班德，这里有一条小径可以爬上阿勒布尔兹山麓，而小径两旁有传统的餐厅与茶馆。帕亚姆从外表完全看不出他有一辆起亚普莱特，于是由他开车，他问鲁兹贝赫与夏赫拉姆是否能顺道让他去一下办公室。他想在那里抽一点哈希[1]。

帕亚姆在法特米广场附近的一栋建筑物旁停车，这里离内政部不远。鲁兹贝赫与夏赫拉姆坐在前厅，而帕亚姆则消

失在建筑物里。很久之后，鲁兹贝赫才知道，这个办公室隶属于一个特殊的网络情报分支单位，而这个单位又隶属于平行的情报机构——不是情报部，而是从情报部被整肃出去的人员组成的谍报组织，与莫塔札维和革命卫队进行合作。

帕亚姆出现了，于是三个年轻人继续前往达尔班德，享用烤肉饭与水烟。他们谈起一个彼此熟识的朋友，一个从真主党支持者叛逃出来的人，现在已经逃到土耳其。夏赫拉姆想跟他说话吗？帕亚姆急切地问。夏赫拉姆犹豫了一下，但太迟了。帕亚姆拨通电话，并且把电话放到夏赫拉姆的耳边。夏赫拉姆跟那个朋友问好。然后帕亚姆把电话塞给鲁兹贝赫，鲁兹贝赫也温和地希望他们共同的朋友能够平安。

索尔玛兹.夏里夫注意到鲁兹贝赫时，她正在《信任报》担任体育记者。鲁兹贝赫与她认识的其他男人大不相同。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且头脑清楚，整个人似乎包覆在一个平静的力场里，完全没有一般年轻人的冲动莽撞。她猜想着鲁兹贝赫是否不快乐，是否因为谈恋爱而分神，还是说正投入于一场行动。她想认识他。某个星期四晚上，当一群同事，包括鲁兹贝赫在内，要去奇特加尔公园时，鲁兹贝赫也邀请索尔玛兹一同前往。索尔玛兹马上就答应了。她是透过报社里共同朋友的介绍才认识鲁兹贝赫，但这是他们第一次说话。两个月后，索尔玛兹要求鲁兹贝赫娶她。

索尔玛兹几乎不知道还有谁跟自己有这么大的不同。鲁兹贝赫的脑袋驱使他埋首于观念世界，但索尔玛兹则是专注于具体事物。她虽然善于处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却不总是那么务实；她大胆而固执，相信只要敢于追求，即使看似不可能的事也会实现。她鼓励自己的母亲结束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而且找到一份律师工作。她的妹妹实际上由她抚养长大，她们住在德黑兰西南部梅赫拉阿巴德机场附近的一栋混凝土建筑物里，她们拥有其中一层公寓。十七岁时，索尔玛兹靠着直接打电话给电视台，告诉对方他们实在应该雇用一名女性体育记者而首次得到记者的工作。索尔玛兹不愿受到局限，就连她自身的精神状态也不例外：沮丧的时候，她会找出令她沮丧的事物，压制它，打败它。她有自己的一套进取的方式，她不受自我意识影响，也不怕失败。但索尔玛兹也有像女孩子的一面，她讲话滔滔不绝，兴高采烈，而且讨厌独处。

在鲁兹贝赫身上，她发现这个男人喜欢独处，而她喜欢人际关系，他喜欢静态，而她喜欢动态活动，他内敛，而她外放开朗。他们彼此互补，却也相互冲突。但两人不是没有共同点。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理想主义与世俗性，也以不同的方式在变化无常的生活中展现机智。他们反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同情伊朗的地下女性主义运动。他们终于同

意结婚，只不过是基于双方家庭在困惑不解下施加的压力。

他们的婚礼只有挚友亲人参加。索尔玛兹的父母与妹妹到场，还有父方的一个亲戚担任她的证婚人。鲁兹贝赫的父母与姊弟也来了。他的证婚人是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当这对新人到政府单位进行登记时，一名官员拿走了他们的文件并要求查看证婚人的身分证。

「这位埃米尔恩特札姆，」官员指着手里的身分证说道，「跟那个埃米尔恩特札姆有亲戚关系吗？」

「你在说什么？」鲁兹贝赫问道，「这位就是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天底下只有一个埃米尔恩特札姆。」

这名官员连忙起身离开桌子，他紧紧抱住埃米尔恩特札姆，亲吻他的脸颊。他说，他一直梦想见到埃米尔恩特札姆。这名官员不让他们缴费；他说，在他的档案里藏有埃米尔恩特札姆签字的婚姻文件，这样就已经足够。

鲁兹贝赫与索尔玛兹在二〇〇四年三月，也就是波斯新年之交结婚。当时正值鲁兹贝赫人生的不稳定时期。他离开《信任报》，在《共和国报》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索尔玛兹也在《共和国报》工作，负责报导妇女议题与社会事务。但他们很快就没了工作，因为《共和国报》才发行十三期就因

为坚持报导卡泽米案件而遭到停刊。鲁兹贝赫与其他人仍继续上班，却不许发行报纸。

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想知道所有的事：关于夏赫拉姆的人生、他的家、文件以及他工作的数据源。有一天，帕亚姆警告夏赫拉姆不要将任何文件放在公寓里。夏赫拉姆觉得帕亚姆是在吓唬他，并没有把帕亚姆的话放在心上。但夏赫拉姆的朋友相当在意。一些朋友看到夏赫拉姆与帕亚姆一同外出，便警告他帕亚姆是个危险人物。他必须与这个人断绝来往。到了适当的时候，他确实这么做了。

往后几个月，日子相当平静。夏赫拉姆并未发表任何文章。鲁兹贝赫逐渐搬离埃斯坎达里的公寓，与妻子住进火车站附近狭小的单间卧房。夏赫拉姆计划前往拉什特与家人共度一星期，让他们搬进新的公寓，并且让女儿入学念小学一年级。就在他离开之前，他在《信任报》工作，一名年轻人拿传票给他。但传票已经过期。年轻人向他致歉，并且告诉他隔天早上到警察局报到。夏赫拉姆同意并且继续工作。

四十分钟后，年轻人又回来了。夏赫拉姆现在就必须离开，他说道。一名高阶警官正在街上等他，他会回答所有问题。夏赫拉姆与年轻人争论，如果高阶警官想见他，他应该过来。不，年轻人坚持，夏赫拉姆必须离开。如果拒绝，他

将遭到逮捕。

正当夏赫拉姆满心狐疑的时候，逮捕已经开始。在《信任报》办公室外，一群同事站在门边正注意夏赫拉姆发生什么事时，另一个人突然出现，命令夏赫拉姆跟着他走。他亮出手枪与手铐，并且抓住夏赫拉姆的手。

夏赫拉姆认得这个人。他见过这个人一次，他看到这个人跟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说话。

「你不是帕亚姆的朋友吗？」夏赫拉姆问道。

不是，那个人回道。

第一站是埃斯坎达里的公寓，夏赫拉姆看着一群人四处翻找文件。他看到书架上有伊朗宪法与刑法典，于是问自己是否能带着这些法典。这些人说没有必要，因为他很快就会获得释放。然后他们让夏赫拉姆上了一部黑色汽车，车窗全用窗帘遮住，他们朝夏赫拉姆的后脑勺敲了一下说道：「把你的头低下来。」

夏赫拉姆双眼被蒙住，却仍仔细留意车子何时停止。他不在任何已知的监狱里。停车的地点感觉很安静，很像住宅区。他觉得自己被带着穿过一个庭院，往左沿着走廊前进，然后进入一栋大小类似都市房屋的建筑物。逮捕他的人拿走

他的眼镜、皮带与鞋子。他听见铁门打开的声音。他被推进一个漆黑的牢房里，里面有个大通风口。夏赫拉姆一连坐了几个小时，他听见古怪的声音，却无法辨识那是什么。

终于，他被拽到椅子上，他的手被反铐在身后。他听到低沉的声音。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

「不知道。」夏赫拉姆说道。

「你在奇迹室里。」

夏赫拉姆笑了。接着他连人带椅被摔在地上。他双手被铐住，两眼也被蒙住，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打他踢他。他不知道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当他苏醒时，他在浴室里。他用手摸脸，却发现手上全是鲜血。

＊ ＊ ＊

(1)哈希（hash）是大麻的树酯，被归类为毒品。

第十二章　蜘蛛的房屋

有些人，舍真主而别求监护者，他们譬如蜘蛛造屋，最脆弱的房屋，确是蜘蛛的房屋。假若他们认识这个道理（就不会崇拜偶像了）。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一节

在被逮捕之前，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反复做着同样的梦。他站在美丽的花园里，四周都是鸣叫的鸟儿。他想离开，花园却没有出口。每一条路都是死巷，其中有一条路通往一间房间。鲁霍拉．侯赛因尼安，连环谋杀案发生时的情报部重要官员，就站在那里，他头上缠着缠头巾，身上却未穿袍子。侯赛因尼安没有说话，他比了一个手势，指示夏赫拉姆

卷起袖子：像这样，像这样。

夏赫拉姆从不相信梦境，却相信监狱里的庭院就是梦里的花园。有时，在牢房里，他可以听见鸟叫声。日后，他搭乘出租车绕行这座监禁中心，还在谷歌地图上研究它。在青年广场附近，位于侯赛因宗教会所左侧的位置，有一间拥有优雅庭院的屋子，没有人知道这里藏着六间奇迹室、九间单人牢房与照着阴暗绿光的狭窄走廊。

牢房非常小，一个人必须后退几步才能转身。夏赫拉姆估计他的牢房大概是一公尺乘以一点五公尺的大小。牢房里总是阴阴暗暗，走廊的绿色灯泡几乎没有亮度。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是装有栅栏的窗户，门上有个窄缝让人送饭进来。换气扇一次可以运转好几个小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

第一个月，夏赫拉姆几乎很少待在牢里。他在讯问室里遭到毒打，然后讯问，然后再被打。讯问室的窗户贴着白色薄膜，他无法看到外面，但外面的人却可以看到里面。讯问者在讯问他时开启摄影机，在殴打他时却关掉摄影机。

夏赫拉姆的脸在反复地殴打与掌掴之后已变得麻木。讯问者抓着他的头去撞墙。有一次，他们拿洗脸盆朝夏赫拉姆头上砸，把洗脸盆砸碎了。他们用缆线抽打夏赫拉姆身体后方从肩膀到脚跟所有的部位。他们告诉他，他们可以逮捕他

的父亲，并且抓来在他的面前刑求。他们威胁要伤害他的孩子。他们提醒他，德黑兰每天会发生数百件交通事故，他的家人可能会遭遇其中一件。或者，他们可以把他的妻子碧塔关进监狱，「你知道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夏赫拉姆的讯问者告诉他，他这一辈子都在犯错。他们想知道他抵达德黑兰之后的人际与活动。夏赫拉姆不满地表示，他来首都时才二十二岁，他已经忘了所有的事。

「如果你忘了，」讯问者告诉他，「那么在这里，你会想起所有的事。」

他们在夏赫拉姆的公寓找到一份革命卫队文件，这份文件不是他的，也不是鲁兹贝赫的，而是第三名室友的。他们要夏赫拉姆坦承这份文件是他的。他们还要夏赫拉姆坦承自己有非法的性关系。他们列出夏赫拉姆认识的每一个女子，要求他至少坦承与其中一位有性关系。他们问他关于作家协会、他的作家朋友，包括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与侯尚．戈尔希里的事。他们希望他能把才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也牵连进来。

一开始，夏赫拉姆的讯问者告诉他，他们将逮捕鲁兹贝赫，但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夏赫拉姆试图让他们相信鲁兹贝赫并不重要。他说他不知道他的朋友的新地址。某日，他们

带夏赫拉姆上车，要求他带他们到鲁兹贝赫新婚的住处。夏赫拉姆带着他们到三个巷弄的三座建筑物。他不知道哪一间是鲁兹贝赫的家，他说谎。路看起来都很像。他与鲁兹贝赫曾经约定，如果两人之中有人被捕，被捕的人要隐瞒另一个人的信息二十天，让对方有时间离开伊朗。夏赫拉姆遵守了诺言。

他们只给夏赫拉姆一套衣物：裤子、内衣与短袖衬衫。他连续七十二天穿着这套衣服，而且他只被允许在牢房清洗一次衣物。他一天可以上三次厕所，每次三分钟，他们要求他上厕所时必须进行净礼。夏赫拉姆认为自己的饮食被下了药，因为他开始产生幻觉。他会看见自己站在路中间，或身旁围绕着一群想杀他的人。

但无论什么药物都比不上单独监禁本身更有威力或更恐怖。他的感官变得疲乏，他逐渐看不见东西、听不见声音也尝不到味道。牢房里没有东西可以触摸，没有东西可以嗅闻。只有脑子里的记忆勉强使他维持与经验世界以及人类关系的链接，但就连记忆也开始脱离他的掌握。一开始，在讯问或者在他一个人在牢房里时，他的眼前会浮现自己心爱的人的身影与脸孔。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虚无逐渐笼罩住碧塔与他的孩子，令他痛苦的是，最后连她们的脸也消失了。他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怒吼，但再也想象不出女儿的眼睛。

两人共同熟识的朋友催促鲁兹贝赫赶快离开伊朗。与改革派网站相关的网络技术人员几个月前就开始失踪。夏赫拉姆不是程序设计师，而是作家，他的被捕显示镇压已经开始转向政治层面。此外，鲁兹贝赫的生活与工作与夏赫拉姆关系密切。但一向冷静的鲁兹贝赫却无视这些警告，任由二十天流逝。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在此同时，他与夏赫拉姆的家人一起散布他的朋友失踪的消息，他接受报纸采访并造访政治部门希望逼迫对方放人。

鲁兹贝赫与妻子搬到德黑兰南部一个名叫戈姆洛克的小地方，此地在前革命时代是知名的通往红灯区的入口。索尔玛兹在忙于向指导部申请发放女性运动杂志执照的同时，也努力整顿公寓，使其看起来有家的样子。她没有处理家务的本事或经验，但她努力让自己学习烹饪。正面装着玻璃门的角落柜摆在这对夫妇的小客厅里，里面展示着葡萄酒杯与小雕像；蓝色与白色的碟子挂在墙上。框着金边的大幅结婚照俯瞰着柳条长椅，整个空间顿时拥挤起来。照片中，鲁兹贝赫的西装翻领上别了一朵红花，索尔玛兹则抓着他的肩膀。他们看起来聪慧、不自在而且年轻。

某天晚上，鲁兹贝赫在家中对新婚妻子问道：「如果我被逮捕，你会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索尔玛兹一边笑一边揶揄说，「等你被释放了，他们会升你当主编。」

索尔玛兹机敏地知道记者会把政治犯捧成英雄，但她也想纾解鲁兹贝赫内心的紧张。之后，她在浴室里看着镜中的自己。他问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她会怎么做？

她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对自己这么说。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但她会让那些该负责的人受苦。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晨，索尔玛兹把鲁兹贝赫摇醒。她告诉他，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鲁兹贝赫在一间小咖啡厅被捕，当时跟他坐在一起的有夏赫拉姆的哥哥与另一名同事，那名同事浑身是血。鲁兹贝赫起身站在床边，此时门铃响起。

夏赫拉姆并未透露鲁兹贝赫的住址，但他们的前室友保守不住秘密。他现在站在鲁兹贝赫家门口，旁边是逮捕夏赫拉姆的人。他们要找鲁兹贝赫，他隔着门告诉索尔玛兹。他被逼着带他们来这里。索尔玛兹看了鲁兹贝赫一眼，心里犹豫了一下。她在心里做好准备，绝不显露任何感情。她深信，自己的冷静可以让鲁兹贝赫保持平和，也能让他们面对接下来的事。于是她打开家门。

两名男子冲进来，彷佛预期会有一场追逐。但这间公寓几乎没有行走的空间，更不用说奔跑。要抵达卧室的衣柜还必须翻过床铺。

其中一人吃惊地环视整间公寓，不假思索地说：「这就是你们的公寓？中情局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他们出示一张撕破的文件，上面潦草地写着搜索鲁兹贝赫的家与监禁他的指示。上面没有信头，也没有公文章，字迹更是一团乱。两名男子都穿着便服，但他们说是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派他们来的。其中一人对鲁兹贝赫说：「我知道你写了文章，而且接受反革命电台的采访，你从事的是反政权的工作。」

鲁兹贝赫无法想象这么小的空间居然搜索了两小时之久，但莫塔札维的手下不放过任何可能。他们清空鲁兹贝赫的活页夹，检查他的照片，翻阅他的书籍的每一页与检查家具下方；他们甚至搜索冰箱看能不能找到酒，持有酒类饮料也可以成为指控他的借口。当他们连非法的卫星小耳朵都找不到时，脸上不禁露出失望的神色。

索尔玛兹的平静似乎激怒了他们。「看起来这位女士还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一名探员对另一名探员说道，此时鲁兹贝赫正在浴室里匆匆换上衣服。

「我了解，」她冷静地回答，「但我的信仰将帮助我渡过难关。」

「你最好帮你的丈夫做早餐，」那个人回嘴说，「往后几天他可吃不到任何东西。」

「我也会为你们两个人做早餐。」索尔玛兹说道。而她确实做了，但那两个人没有吃。

探员瞧见鲁兹贝赫有一些 CD：索鲁什演说的录音，还有一些电影。他们把这些东西、鲁兹贝赫的文件与鲁兹贝赫本人装进停在外头的伊朗国产佩坎汽车里。

在他们离开之前，一名探员用手指着索尔玛兹的脸。「不要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他命令她，「如果你这么做，你会尝到苦头。」

佩坎汽车载着鲁兹贝赫来到莫塔哈里街的警察局，他在地下室等了约两个小时。当逮捕他的人将他移送到一部车窗涂黑的面包车时，鲁兹贝赫看了一眼城市寻常的大街景象，大家还是一如往常地活动。然后他的双眼被手帕蒙住，双手被铐在身后，他的头被塞在驾驶座的下方，面包车以一种容易让人晕车的方式曲折地前往花园里充满鸟儿的秘密监狱。

欧米德．梅玛瑞安还没准备好要面对厄运，厄运却已经找上门。欧米德是个受欢迎的男孩，有企图心、聪明、努力工作而且很快就获得成功。他有一头剪得又短又整齐的浓密鬈发，还有一张椭圆形的爽朗脸孔，他有一种率真的特质，看起来坦诚而让人有所期待。他似乎总是乐于受邀参加派对，认为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他说话的速度很快却含糊，往往一个字还没说完下一个字就接着出现；聆听者经常会听漏他说的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希望」，这个名字很适合他。

欧米德来自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是拥有高中学历的公务员，他们先后在德黑兰东北部的拉维赞地区与覆盖着沙砾的偏远城市卡拉季将他抚养长大。欧米德读诗也写诗；他在高中时代既沉迷于沙里亚蒂，也热衷阅读索鲁什。欧米德大学读的是冶金工程，却发现自己的志业是小区组织者。

以一筒冰淇淋的代价，欧米德与朋友在邻里的清真寺担任数学与物理学家教。六个月的时间，他们有将近十二名家教，教授的学生将近一百人，其中许多是极为贫困的孩子。欧米德与朋友开始发行新闻通讯，他们雇用一名心理学家担任婚姻与家庭咨询的热线人员。于是在偶然间，欧米德居然组织了哈贾瑞安设想的公民团体：一个邻里的协会，可以协助民众根据彼此的相似性、需要与需求组织起来。

但清真寺是个有争议的空间。在清真寺里，欧米德与朋友的外表与谈吐看起来就像外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受过教育，毫不掩饰自身的世界主义。虽然伊玛目[1]欢迎他们，虽然聚会者渴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当地的巴斯基不信任他们带来的影响，他们游说伊玛目，说欧米德与他的朋友有女朋友，说他们是罪人与异教徒。巴斯基拥有欧米德的团体没有的金钱、权威与人脉。民兵开始要求欧米德在发行新闻通讯之前必须先让他们过目。最后，欧米德将他的团体登记成非政府组织，使其与德黑兰其他地区的类似团体连系起来，并且迁出了清真寺。

如果欧米德不那么乐观的话，他也许会了解他在清真寺的经验是个不祥的前兆。市民社会的话题，听在西方人耳里相当的平凡无奇，却让欧米德的伙伴感到兴奋，但这个话题也让伊朗的宗教分子感到威胁，甚至构成侮辱，因为他们早已认为自己是公民行动者。清真寺如果不是市民社会的机构，那么清真寺是什么？巴斯基又是什么？这些傲慢的年轻人算哪根葱？他们想以什么样的外国观念来取代他们辛苦赢来的革命秩序？谈到巴斯基，他们几乎无法理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影响：像欧米德这样的年轻人产生的疏离感，以及他们怀抱的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渴望。

哈塔米主政期间，内政部发放了数百个非政府组织的许

可。有些组织只是为了申请补助以及为履历灌水。有些组织则确实想为社会福利尽一份心力，如哈贾瑞安说的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搭起重要的桥梁。欧米德完全没想到这会是一份危险的工作。总统自己也把扶持非政府组织视为施政的重点。有些新组织服务环境，协助城市进行资源回收。有些组织维护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与福祉，或协助教育移民，或提供小额贷款，或解决不断增加与隐藏的毒品问题。欧米德这个刚崭露头角的组织者相信，身为公民，不只是每四年投票一次，也不只是仰赖政治人物来改变一切。一个非政府组织应该面对德黑兰难解的困境，实际从第一线解决问题。

欧米德将他的非政府组织转变成其他非政府组织领导者的智库与资源中心。他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市民社会的另类思想家」，并且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黑兰办公室的补助。欧米德是组织的对外窗口，负责与新闻编辑、改革派国会议员与改革派市议员开会讨论。他还发行杂志。当有报纸找他担任专栏作家时，欧米德觉得自己成功了。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喜欢听到陌生人讨论他的观念。不久，他负责在德黑兰市政府与协助市府的非政府组织之间担任协调工作。之后，内政部聘请他担任社会议题的顾问。藉由这份工作，欧米德得以接触机密信息、官方报告与高层政治人物。他不能公开他秘密得知的信息，但可以指点其他

记者去调查他知道值得挖掘的来源与话题。

前德黑兰市长戈拉姆侯赛因．卡尔巴斯希鼓励欧米德参加二〇〇三年的市议会选举。欧米德是个合理的选择。他有贪婪的野心，在政府与媒体都有人脉，而且熟悉整个都市地貌。他也十分聪明与容易相处。他在德黑兰各地竞选拉票，他的演说最多有五千名民众参与。他提醒听众，他只是一般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搽着古龙水，而不是什么阿亚图拉的儿子。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逆民粹主义。而这么做并非没有效果。然而，当母亲告诉他，她不会去投票时，欧米德知道这场选举输定了。

「欧米德，亲爱的，」她说道，「就算你选上市议员，你又能做什么？」

虽然这场市议会选举以改革派惨败收场，但欧米德在一千二百名候选人中还是取得体面的第五十四名。他不会沉溺于追悔过去。他是那种甚至连自己的落选通知都会好好欣赏一下的人，好让大家能注意到他这位落选者。接下来，他把精力投入于同时以波斯文与英文撰写部落格，以及继续投入于市民社会的另类思想家。

藉由推动市民社会之便，欧米德也开始到国外旅行。他出国参加会议，主要是在欧洲。两年内，他拜访了九个国家。

他与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上司向欧洲基金募款出版书籍与训练市民社会领袖。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而那些被推举出来的领袖也期望并且从这些工作中获益。日后欧米德才知道自己的做法让自己成了靶心——他从事的计划正是莫塔札维这类强硬派人士最畏惧的，因为它构成天鹅绒革命的基础。届时欧米德将发觉自己就像一个士兵，与军队一起往前冲，却太晚发现所有人都已经撤退，只剩下自己被遗留在无人地带。

鲁兹贝赫靠着自己的手指研读牢房的墙壁。缓慢地，按部就班地，从地板开始摸到墙壁，直到他可以抵达的高度为止。他摸到其他犯人留下的刻字；他摸到突起物、草皮与斑剥的油漆。他有着盲人或外科医师未结老茧且严谨的手指。牢里没有书，也没有光线让你观看或阅读。鲁兹贝赫只能阅读墙壁，他把读到的东西记在心里，一公分一公分地记下来。

鲁兹贝赫的牢房所在的走廊与夏赫拉姆不同，与夏赫拉姆关在同一区的犯人到鲁兹贝赫牢房所在的走廊拖地，鲁兹贝赫因而从他口中得知这一点。鲁兹贝赫附近的犯人有一个来自马什哈德，他因为在合法市集贩卖法律书籍影印本而被捕。有一个则是伊朗的日本黑道组织老大，他的名字叫哈吉．阿里，身上到处都是刺青，他被指控进行海洛英与古柯碱的非法交易。哈吉．阿里只关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出去了。

马肃德．戈瑞伊希是改革派网站的年轻网络管理员，鲁兹贝赫在这个网站发表文章。马肃德也被关在这里，由于他拒绝认罪，因此在这里待了九十天。凌晨两点之后，守卫已经入睡，这些犯人会经由牢房顶端的通风口彼此交谈。

鲁兹贝赫一抵达，讯问随即展开。起初，他只被问一个问题。讯问者拿了一张纸放在他面前，要他承认所有的非法性关系。鲁兹贝赫写道，他没有。

「站起来。」讯问者命令他。

鲁兹贝赫起身。讯问者给了他一巴掌。

「你对我说谎吗？」

「我没有理由说谎。」

讯问者殴打鲁兹贝赫，撕掉纸张，然后命令他坐下，同样的问题又再问一遍。鲁兹贝赫又回答同样的答案。

「你很顽固吗？」讯问者问道。

「没有就是没有！」鲁兹贝赫叫道，「你们把我抓来这里，指控我有非法性关系。起诉书在哪里？我犯了什么罪？」

讯问者命令鲁兹贝赫站起来，然后打他的肚子与胸部，

让他整个人摔在墙上。这是鲁兹贝赫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愤怒地殴打。当天讯问足足持续了九个小时。有时候，逮捕他的人会抓着他的头去撞桌子或撞墙。对方一度拿着警棍威胁鲁兹贝赫，但最终没有真的使用。第二天的讯问与殴打从早上八点持续到半夜之后。往后，时间表固定为每日六小时，分别是早上四小时与下午两小时。鲁兹贝赫会藉由短暂的上厕所时间来辨别时间。

几天后，鲁兹贝赫接受指控，希望能结束一切。是的，他说。他跟一个女性有性关系。讯问者将一个女性记者名单摆在他面前：「哪一个？」

鲁兹贝赫很快察觉出这是个计划，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他是否做了，而是他何时做了。讯问者引导他指出某个特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曾经是鲁兹贝赫在《信任报》工作时的同事。她也报导了札赫拉．卡泽米事件。她是鲁兹贝赫的朋友。他们有时会一起散步，或出去喝咖啡，谈论工作；有一次，鲁兹贝赫陪她与她的男朋友到里海旅行，他们都住在鲁兹贝赫在拉什特的家里。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女朋友。她是他与妻子的共同朋友，就是她介绍妻子与他认识。但与鲁兹贝赫一样，而与绝大多数伊朗人不同，她不与父母同住，独自一人住在德黑兰的公寓里。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他们的朋友经常到她那里聚会。

鲁兹贝赫的讯问者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所有的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们把其他被囚禁的记者写下的声明拿给鲁兹贝赫看，上面提到他与他的前同事之间的关系。

这名女同事最近结婚了，她离开新闻界，与丈夫开始新的生活。现在鲁兹贝赫很有可能摧毁她的生活。讯问者逼迫他承认的事将在她的婚姻种下不信任的种子，而且为她的司法档案添加弹药。抗拒只会招来殴打。鲁兹贝赫说服自己相信讯问者对他的保证，他招供的事不会用来对付他的朋友。

接下来，鲁兹贝赫必须描述他们的性行为，讯问者说道。要生动详细。

「我独自一人跟她在房间里。」鲁兹贝赫回道。但当鲁兹贝赫无法进一步描述时，讯问者直接说出自己的耸动幻想。最后，鲁兹贝赫写下他说的一切。

鲁兹贝赫在狱中的遭遇，其中最难堪也最难以复元的就是这件事。当那名女性同事被捕时，莫塔札维的副手把鲁兹贝赫的供词放在她面前，告诉她，她很有可能因为自己做的事被石头砸死。

他们留下了一团混乱。家里遭到彻底翻查之后，索尔玛

兹坐在柳条长椅上，内心感到苦恼不已。鲁兹贝赫被带走后，她在那里大概坐了四十五分钟。她有时哭泣，有时只是睁着眼睛发呆。她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内心深受到冲击。

不要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那个人是这么说的。但媒体的关注是唯一能拯救鲁兹贝赫的方法。而她又是个记者，她所有的资源都在那里。但不一会儿，索尔玛兹告诉自己，那个人说的是国际媒体，他并没有说国内媒体。

索尔玛兹振作精神，前往《信任报》。她的心情沉重，这让体育组的同事感到疑惑，但她一个字也没说。她拿起电话，打给她认识的一个伊朗劳动通讯社编辑，这个通讯社与改革派政府关系接近。电话忙线中，她花了半小时才打通电话。「他们今天带走了鲁兹贝赫。」电话一接通她就马上告诉对方这件事。她觉得自己所在的房间突然变得静悄悄。

新闻一上线，索尔玛兹的电话马上就响了。记者们打电话向她寻求评论。她告诉法尔达电台记者，她无法向国际媒体透露讯息，但对方可以追踪国内新闻并且注意后续的报导。

她不回公寓，那里让她产生威胁感，独自一人的她容易产生幽闭恐惧。第一天晚上，她到鲁兹贝赫的叔叔家过夜，鲁兹贝赫的叔叔经常陪在她的身旁；第二天晚上开始，她与她的母亲同住，直到她无法忍受为止。她母亲的公寓在梅赫

拉阿巴德机场附近，这里成了五个月前才经由婚姻结合的两家人的总部，但在共同的焦虑与无助下，两家人非但未变得更紧密，反而渐行渐远。

索尔玛兹从夏赫拉姆家人那里得知，这两个人曾被带到莫塔哈里街的警察局。鲁兹贝赫被带走之后的头三天，索尔玛兹天天都上警察局，要求见她的丈夫。她连续几个小时驻守在警察局入口附近，每一个进出的人都逃不过她的监视。但似乎没有人知道鲁兹贝赫在哪儿。到了第三天，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心烦，有个人终于跟她说话。

「你丈夫不在这儿，」他说道，「你去梅赫拉阿巴德机场的第九支局找副检察长。」索尔玛兹照做了。

「你的动作很快。」当索尔玛兹自我介绍时，副检察长如此说道。

确实如此——不仅快速而且密集。索尔玛兹至少一天进行一次访谈，每通电话就能至少产生一则新闻报导。她决心让鲁兹贝赫的名字停留在报纸上，藉此表明鲁兹贝赫不会就这样静静地消失不见。她去见了穆赫辛．雷札伊——前革命卫队长官，见了梅赫迪．卡鲁比——不久前才卸任国会议长，与两个改革派政党。没有人知道鲁兹贝赫在哪儿，也没有人知道如何释放他。

索尔玛兹首次与副检察长见面也没得出结果。但到了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她接到一通电话。在此之前，她把电话交由鲁兹贝赫的叔叔代接，现在，他沿着《信任报》的楼梯冲上来，对她大喊。鲁兹贝赫在在线。

「索尔玛兹，」鲁兹贝赫对妻子说道，「你必须停止接受访谈。」

索尔玛兹试图让他在在线多留一段时间。「你为什么这么说？」她问道。

「我很快就会出来了，」他温和地回道，「别担心。」

「我知道了。」她说道。索尔玛兹试图让对话保持含糊。她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她怀疑鲁兹贝赫的讯问者就在旁边，用扩音器监听着他们，事后证实确实如此。

往后一个星期，索尔玛兹未再接受采访。但她每天都在编纂关于鲁兹贝赫、夏赫拉姆与其他至今仍被监禁的部落客的新闻，她要求她想到的每一家报纸的同事将这些新闻段落穿插到任何能扯得上边的新闻报导里。那个星期，她完成了三篇新闻，然后接受了一次采访。

「鲁兹贝赫一个星期前打电话给我，」索尔玛兹向记者表示，「他告诉我不要接受采访，因为他很快就会获得释放。但

直到现在他仍未获得释放，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很担心他的健康。」

索尔玛兹发誓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麻烦人物，她在这方面确实出乎意料地擅长。她没有政治背景，但精明与固执相加之后使她适合从事这场战斗。此外，当她征询希林．伊巴迪的意见时，这位人权律师告诉她要谨慎小心。索尔玛兹是个年轻记者，很容易成为目标，这对狱中的鲁兹贝赫没有好处。伊巴迪建议她少露面，并且把鲁兹贝赫的母亲推到台前。

当米雷布拉希米一家从拉什特前来，索尔玛兹带他们到机场的副检察长办公室。

「鲁兹贝赫认罪了。」副检察长通知他们。

鲁兹贝赫的父母看起来很崩溃。索尔玛兹气恼得握紧拳头。他们就坐在对这一切幸灾乐祸的人面前。

「既然如此，」索尔玛兹冷冷地说，「你们已经了结鲁兹贝赫的事了。什么时候释放他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米雷布拉希米先生有些承受不住。他跟鲁兹贝赫一样，都是极为敏感却又不善于表达的人，他已经习惯把什么事都放在心里。索尔玛兹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此时的他正沉浸于个人的痛苦世界中。索尔玛兹与

米雷布拉希米太太请他先回拉什特，他从未离开家这么久的时间。就在同一天，他们被告知可以跟鲁兹贝赫见面，于是鲁兹贝赫的母亲、鲁兹贝赫的弟弟拉苏尔与索尔玛兹又来到副检察长办公室。

他们在机场建筑物的庭院站着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车子来了，被上了手铐的鲁兹贝赫从后座被拽出来。他满脸胡子，整个人瘦了一圈。他身上穿着结婚时穿的西装——逮捕他的人从衣柜随便拿出一件让他换上，乍看之下，西装的尺寸大了一号，整个人似乎埋在衣服里似的。鲁兹贝赫的母亲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索尔玛兹抓着米雷布拉希米太太的手。「不行，」她严厉地说，「忍耐一下。」

所有人就这样不知所措地站了一段时间。索尔玛兹发觉每个人都在等她拥抱自己的丈夫。于是她上前拥抱鲁兹贝赫，他们在副检察长用来做礼拜的小房间里坐下来。

米雷布拉希米太太打破沉默。「他们说你认罪了。」她说道。

就在这一刻，索尔玛兹突然理解强制认罪的残酷效果。鲁兹贝赫的母亲感到羞耻，这正是莫塔札维的手下期望的。

此外，认罪的内容与性有关，索尔玛兹知道每个人都在担心她要如何承受。但索尔玛兹并不在意鲁兹贝赫在她之前是否跟别人有过性关系。她自己之前就有过男朋友。

鲁兹贝赫转身对索尔玛兹。「直到我出狱之前，无论你听到什么，都不用理会。」鲁兹贝赫说道。

索尔玛兹沉着得近乎冷酷。

「无论什么代价，做就对了，」她回答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讯问者说自己名叫基沙瓦兹，但鲁兹贝赫也听到有人叫他另一个名字：法拉赫。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都是「农夫」。他是从情报部被整肃出来的人员。鲁兹贝赫相信，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会连络莫塔札维。虽然他没有比鲁兹贝赫高多少，却较为壮硕，手也较为厚实多肉。当鲁兹贝赫终于看清楚他的长相时，发现那是一张他永远无法忘怀的脸孔，因为实在太平凡了。

在过去的人生里，鲁兹贝赫一直相信仁慈的真主会在黑暗的时刻指引他。但在狱中，他完全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存在。在这里，只有基沙瓦兹或法拉赫。这个人牢牢掌握鲁兹贝赫的生死。他可以施加或不施加疼痛，可以让鲁兹贝赫与外界

保持或断绝连系，可以给他或不给他食物、尊严乃至于空气。他拥有真相，他可以传递、摘录、扭曲或拒绝真相。他知道鲁兹贝赫的一切，而鲁兹贝赫无法逃脱他的意志。讯问者就是真主。鲁兹贝赫进监狱时还是个遵守教义的穆斯林。现在既然他见到了这位真主，他决定再也不做礼拜。

基沙瓦兹想得到鲁兹贝赫朋友与同事的个人信息。在伊斯兰共和国严苛的道德规章下，几乎每一个伊朗人都曾犯下某种足以入狱的罪行：婚外情、饮酒，甚至与异性握手。一开始原本是宗教命令，最后却演变成与普世的勒索制度无异的事物。正确的信息可以让讯问者轻易地操纵政治犯。讯问者可以从人身上取得手写的供词，再向其他人展示这些对他们不利的供词。鲁兹贝赫知道，因为这就发生在他身上。这会让犯人陷入困境而且孤单无助，找不到反抗的理由也没有人可以信任。一旦犯人说出不利于朋友与爱人、同事与雇主的供词，他将无处可去，只能求助于真主。

鲁兹贝赫觉得，自己崩溃之后，反而享有一段时间的平静。他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放松是为了生存，就像一个人从高处摔下来一样：身体愈僵硬，就愈容易摔个粉碎。鲁兹贝赫合作了。他会继续取得讯问者的信任直到不需要为止，也许那会是出庭受审的时候。他说出自己知道的秘密，但有些并没有说。他还有一些想要保留的小尊严。他从未哭泣。

他一直都很冷静。他不再有任何要求。他不再要求使用浴室或在狭窄的监狱庭院里散步。他不再要求与家人讲话。他试着忘记自己的妻子。

基沙瓦兹把鲁兹贝赫的性供词放在一旁。殴打停止了，但正事才刚开始。讯问者告诉鲁兹贝赫，鉴于他的罪名的严重性，他未来二十年可能要待在牢里。鲁兹贝赫相信他的话。

当讯问者想得到更多关于另一名犯人的信息时，他们将这名犯人与鲁兹贝赫关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讯问鲁兹贝赫。鲁兹贝赫告诉他们这名犯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当讯问者拿到逮捕新犯人的令状时，他们将令状拿给鲁兹贝赫看并且问他：他对欧米德．梅玛瑞安了解多少？鲁兹贝赫刚好一无所知。然而，当他们问起鲁兹贝赫的前同事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的信息时，鲁兹贝赫却能说出贾瓦德的工作史，基沙瓦兹感到不耐。他想把贾瓦德与被罢黜的巴列维国王流亡中的儿子雷札．巴列维连系起来。当鲁兹贝赫犹豫时，讯问者拿出逮捕索尔玛兹的令状。鲁兹贝赫不把他的同事送进牢里，就只能让自己的妻子被逮捕。当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首次遭受讯问时，他大声地咒骂鲁兹贝赫。

有一天，基沙瓦兹让鲁兹贝赫读一份东西。那是一篇社论，标题是〈蜘蛛的房屋〉，文章刊载于与最高领袖有关的《宇

宙报》。在文章中，《宇宙报》极端强硬派执行编辑侯赛因．沙里亚特马达里宣称揭露了美国中情局在伊朗的工作网络。欧洲与北美有二十三名伊朗流亡人士与美国情报单位合作，沙里亚特马达里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他把这些流亡人士与伊朗国内七名知名的改革派人士连结起来，其中包括哈塔米的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国会议员贝赫札德．纳巴维、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前人质挟持者穆赫辛．米尔达马迪。但连结这七个人与流亡海外的二十三个人的关键点是十三名年轻、没有名气的网络记者，他们向伊朗内部与西方进行宣传。这些国际阴谋的马前卒包括了「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与「欧米德．梅玛瑞安」。沙里亚特马达里建议收网，逮捕他指名的这十三个年轻人。

连续几天，鲁兹贝赫接受指示写下所有指控的供词，但要这么做必须先证实〈蜘蛛的房屋〉的假设。除了非政治的指控（非法性关系、饮酒以及与女性握手），他还被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参与非法示威、加入非法组织、侮辱最高领袖、接受反革命媒体采访扰乱民心，以及散布反政权宣传。讯问者还拿出笔记让他充实自己的供词。其中一项不利于他的证据就是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从达尔班德打电话给在土耳其的叛逃者。

鲁兹贝赫告诉自己，他会在牢里合作，但出狱后就会跟阿里．阿夫夏里一样推翻这些供词。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这些指控可以说完全离谱。鲁兹贝赫从未参加过游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他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他发表的作品隶属于改革派阵营，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派系。但鲁兹贝赫不仅承认自己参与示威游行，还承认自己是主要的组织者。

某日，鲁兹贝赫很高兴地得知希林．伊巴迪同意担任他的辩护律师。然而，当委任契约送来狱中让鲁兹贝赫签名时，连同契约送来的还有莫塔札维的便条：莫塔札维指示，鲁兹贝赫要拒绝签名，否则的话就要再加五年刑期。根据这位检察长的说法，伊巴迪是以色列的间谍。鲁兹贝赫必须公开表示他认为伊巴迪不适任，他不会被她利用。鲁兹贝赫必须照着他们拟好的稿子亲笔将内容写下来。稿子上的字一大堆都拼错了。鲁兹贝赫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抄，希望声明书上大量的拼写错误——报纸的编辑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基本的错误？——能引起报章杂志的注意。

到了九月底，欧米德．梅玛瑞安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他受邀到华府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演讲，但当他在法兰克福准备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时，两名警员冷淡地阻止了他。他的名字在禁飞名单上。欧米德居然成了国际恐怖分子。他亮出他的记者证。警察告诉他，这种错误经常发生，但他就

是不可以上飞机。

欧米德返回德黑兰。十天后，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到他工作的地方逮捕他。他们把他扔在面包车的地板上，上面盖了一件毛毯，并且用脚踩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起身。在秘密监狱的牢房里，灯光不断闪烁，透过牢房天花板附近的通风口，他可以听见其他犯人的喊叫声。有时欧米德想象自己是在坟墓里，其他人就在他的上方走来走去。他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感。有一回，他问监狱守卫时间，守卫回答说：「谁在乎现在几点？」总之现在是六点钟，守卫还是告诉他了。当欧米德觉得已经过了六七个钟头时，他又问了一次。现在是七点钟。五天后，欧米德觉得自己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两个月。他现在了解，时间是心灵空间的地图。现在他没有地图，没有方位，就连小时的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

犯人，包括日本黑道老大与其他犯罪者以及年轻记者，以四人为一组共同使用浴室，但厕所没有门。他们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大便。淋浴间有摄影机。欧米德拒绝在摄影机前脱下衣服，直到他被关了十六天，再也忍受不了身上的味道为止。欧米德崩溃啜泣。他只能想象谁在看这个影片，为了什么目的。即使在他获释后过了一年，他仍无法忍受洗澡时触摸自己的身体。

夜以继日，欧米德听见守卫对着他与其他同牢房的犯人吼叫笑骂。「出来，畜生！」当他们打开牢房的门，让犯人去浴室或去讯问室时，会这样辱骂他们。有一回，欧米德在浴室看到另一名犯人，他的裤子沾了血块，脚也断了。他是来自德黑兰南部的一个普通人，因为跟巴斯基打架而被关进来。

讯问者告诉欧米德，他是个叛徒，他绝不可能被释放。他们命令他列出近年来他干了什么「臭事」，结果欧米德列出的清单里完全没有违法的事，他们于是抓着他的头去撞墙。有一回，他们踢他的肚子，直到他呕吐为止。他休息的时候仍觉得恶心，监狱的食物在肚子里翻搅着，让他感到焦虑。有一天，讯问者要求他招供关于去美国的事。他们告诉他，他们已经知道一切。其他人已经提出对他不利的供词，他们手中握有他在华府与保皇党会面的演说讲词与照片。档案足足有一百页。

「我从未去过华府！」欧米德抗议说，「我没办法去！我在禁飞名单中，就跟各位一样！」

基沙瓦兹，或法拉赫，从他对暴力的痴迷，欧米德感觉到他是个变态的人，有一段时间他已经不大理会欧米德，但还是持续揍他踹他。有一回，基沙瓦兹要踢欧米德，却被欧米德闪过，他一脚重重踩在椅子上。这位讯问者顿时暴怒，

把欧米德压制在墙上。欧米德设法打开讯问室的门。「别来烦我!」他大喊,「住手!」但只有其他犯人听得到他的呐喊。当欧米德濒临崩溃时，基沙瓦兹说道，也许欧米德愿意找个能给他认罪建议的人谈谈。

基沙瓦兹找了夏赫拉姆。夏赫拉姆同意跟欧米德谈谈，但不是在讯问室。他要在监狱庭院跟欧米德见面。基沙瓦兹同意了。

夏赫拉姆在入狱前从未见过欧米德，但听过这个人。他看得出来欧米德非常苦恼与动摇。夏赫拉姆知道，入狱后的头两三个星期，压力是最大的。他自己体验到的远比他在研究「奇迹室」时想象的强烈得多。夏赫拉姆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帮助欧米德，也可以建立一个关系，为两人提供一条救命索。

夏赫拉姆了解，要赢得信任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予信任。于是他决定冒险。他给了让欧米德日后认为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忠告。然而不只是忠告有这样的效果。夏赫拉姆就像兄弟一样看着欧米德的眼睛。欧米德无法马上放松到能接受这份温情，然而一旦他做了决定，便能发现夏赫拉姆身上蓄积着深厚的正直与力量。

「你有要保守的秘密，也有想保护的人。」夏赫拉姆第一

次在监狱庭院见到欧米德时，便这么对他说。这是真的：欧米德曾经看到同事参加派对饮酒作乐。他与几个女性有过关系，他知道的个人秘密可以用来伤害其他人。他不想说出这些秘密。「你需要为自己隐瞒一个故事，并且编造另一个故事给讯问者，」夏赫拉姆建议他，「否则的话，你会将一切和盘托出。」

夏赫拉姆告诉欧米德，要在自己知道的个人秘密——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周围建起一道墙。如果他说出这些秘密，就无法将这些秘密追讨回来。他不应该谈论与外国的接触，以免被指控从事谍报活动。他不应该做出不利于朋友或同事的供词。但他必须给出一些东西，至少显示他愿意合作。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让自己的供词伤害他无法伤害的人，要不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就是因为这个人很有名。

欧米德恪守这些忠告。他把他所知的人的个人生活全密封起来。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不再提供可以用来伤害别人的证词，也不让刑求者切断他人生最重要的关系。此外，他依然能够招供。

关于他的性供词，他捏造了几个不存在的女性姓名。基沙瓦兹环绕着他，暗示性地抚摸他的脸颊或手臂，逼迫他说

出更生动的细节。性接触是怎么开始的？他用色情片助兴吗？谁带保险套？她是这样张开嘴巴吗？欧米德因害怕与恶心而颤抖，全身都汗湿了。他从未向最亲近的朋友吐露这些细节。这位五十五岁满脸胡子看似虔诚的讯问者喜欢称呼欧米德「小帅哥」，而他似乎是那种会将手伸进裤子口袋抚摸自己的人。

欧米德永远搞不清楚这些性骚扰与侵害身体隐私的行为是为了满足这些狱方人员的喜好，还是为了羞辱一个在严守身体与情欲生活界线的文化中长大的穆斯林男性。也许两者都有。有一次，基沙瓦兹向欧米德展示他从欧米德计算机里找到的一张珍妮弗．罗培兹的照片。她是谁？欧米德跟她有性关系吗？

欧米德的政治供词，就像鲁兹贝赫一样，完全遵循〈蜘蛛的房屋〉的样板。欧米德被告知必须坦承他在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贝赫札德．纳巴维这些改革派分子的指示下撰写文章与部落格，用意在于「抹黑」伊斯兰政权与发动天鹅绒革命。改革派人士计划在十五年内毁灭伊斯兰社会，他们交给欧米德的任务是增加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与向他们回报可能阻碍他们的任何「革命抵抗势力」。为了换取欧米德的合作，改革派人士出钱让他出国旅行。

欧米德反对这些说法，他从未见过也几乎不认识这些政治人物，他的文章表达的是他自己的观点，他出国旅行的钱来自透明的管道，包括他工作的报社以及他参加会议的主办者。然而他的反对很快就遭到瓦解。基沙瓦兹确保欧米德能够了解，如果他不承认这些指控，他会面临更严重的指控，例如担任间谍。欧米德签字的供词包含了令人愤怒的真相。他曾经造访外国，访谈外国政要，在工作期间曾与外国记者交谈，他还写下这些接触的过程。他还解释自己做这些事是为了提高外国人在伊朗社会的地位，以实现美国中情局的阴谋。

欧米德逐渐相信，自己与其他部落客——当时有二十名部落客遭到监禁——成了伊朗分裂的两个情报建制开战的炮灰。哈贾瑞安认为，要挽救政权必须改革政权；已故的扎伊尔德．埃玛米则相信，反对派必须以暴力加以清除。这两个团体共享相同的根源，他们都来自霍梅尼时代血腥的安全体制。基沙瓦兹宣称他曾在一九八〇年代亲自击溃伊朗人民党的领袖。他也自满地表示：「我们把阿里．阿夫夏里打得头破血流。」但欧米德也不该对自己盟友的过去存有幻想。

「用来关押你的这些秘密监狱可不是『我们』盖的，」基沙瓦兹嘲弄欧米德，「是你的朋友——你的改革派朋友建造这些地方。」

即使如此，欧米德心里并不孤单，他也从未想象自己在这个世界是孤伶伶一个人。改革派是他的朋友与同事。他深信，等到他出狱，告诉他们自己承受的一切以及他们也将清楚面临的危险时，他们将会支持他。

索尔玛兹认定，在梅赫拉阿巴德机场的检察长办公室第九支局找不到出路。副检察长没有实权。她必须直接跟莫塔札维谈。但这位检察长可以说是声名狼藉，札赫拉．卡泽米事件已经证实这一点。一名记者同业告诉索尔玛兹，如果她去见莫塔札维，他会用他的眼睛对她催眠，她将说出他想要的一切讯息。年轻记者如果可能，每个人都不想碰到这位检察长。索尔玛兹认为自己无法继续回避这件事。她鼓起勇气，给莫塔札维留下讯息。

莫塔札维回电时，当时刚好是傍晚，索尔玛兹正走过母亲家附近一处空旷地带。整个空间是宁静的，空气也略带寒意。「我收到你的讯息了。」莫塔札维知会她。

「我打电话是想知道我丈夫的案子，」索尔玛兹解释说，「我想知道什么时候会释放他。」

「我怎么知道你是他的妻子？」莫塔札维回道。

索尔玛兹一时克制不住，愤怒地回道：「我想没有人会想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她话一出口，当下就后悔了。她的语气完全不对。她对其他人说话时一直克制住脾气，偏偏在跟最危险与最有权力的人物说话时失去控制。

对方没有响应，她聆听着，内心感到害怕。终于，莫塔札维说道：「明天来找我。」

索尔玛兹心情沉重。她做了什么？她冲回母亲的家，告诉聚集在那儿的亲戚关于电话的事。

鲁兹贝赫的叔叔笑了。「你为什么要那样说？」

「我不知道，」索尔玛兹难过地说，「他问了一个蠢问题。」

检察长办公室让索尔玛兹联想到水族馆。在楼上，她穿过一道安全门来到一间有着玻璃墙的房间。墙的另一边是会客区。索尔玛兹与母亲在早上八点半抵达，他的母亲不放心让女儿与莫塔札维独处一室。到了下午，她们仍未见到检察长。索尔玛兹开始怀疑莫塔札维叫她过来只是为了让她无事可做，浪费她一天的时间。

索尔玛兹仔细观察会客区。这里一定在某处装设了摄影

机。当她在天花板附近的角落发现一台摄影机时，她扭转身子眼睛直盯着那台摄影机。她看着摄影机的样子很古怪，而且时间很长，会客区的其他人也不禁转身望向她看的地方。半小时后，柜台人员引领她与她的母亲去见检察长。

当她们走进房间时，莫塔札维并未起身。但他指示她们坐下，语气中带有一种刻意的客气。

「你真是个积极的女士。」他对索尔玛兹说道。

索尔玛兹仔细观察莫塔札维的脸。她了解，他不高兴看到她。但他很好奇。索尔玛兹惊讶于他个子的矮小。在房间的另一边，也就是办公桌的对面，有一台小电视机，上面播放着从等候室传来的景象。

「我要我的丈夫回来，」她回答说，「他是无辜的。」

「你错了，」莫塔札维说道，「他不是无辜的。他没有告诉你所有的事。」

「我不在乎他婚前做了什么，」索尔玛兹回道，「我不相信他犯了罪。」

「我会建议继续过你自己的人生，」莫塔札维对她说，「再婚。你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你的丈夫将在牢里关二十年。」

索尔玛兹知道她只剩最后一张牌。她的纪录是干净的，而且她还是个失去丈夫的新婚妻子。「我们才结婚五个月，」索尔玛兹恳求说，「如果你放了鲁兹贝赫，我会看牢他。我会确保他不会犯下任何有害体制的罪名。」她曾经听说有妻子会扮演这种角色。

但莫塔札维似乎对她提出的任何请求都不感兴趣。他的举止充满了自信，几乎可以说是漫不经心。「鲁兹贝赫对我们来说毫无价值。」他曾经轻蔑地对索尔玛兹说出这样的话。她会永远记得这句话。

索尔玛兹看似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但觉得自己毕竟走到了某个地步。她与莫塔札维的关系起了个头，无论有没有用，她都将反复运用这个关系。

索尔玛兹开始固定到检察长等候室报到。每一次她都会等候一到两个钟头，然后她会转身看着监视摄影机，直到莫塔札维让她入内为止。奇怪的是，她一点都不感到害怕。

「你很爱顶嘴，」莫塔札维曾经这么评论，「你似乎没搞清楚自己身在什么地方。比你更重要的人物都曾在这里崩溃过。阿克巴尔．甘吉的妻子也曾来这里求我饶她丈夫一命。」

索尔玛兹曾经在等候室看过甘吉的妻子。由于知道监视

器的存在，她刻意与她保持距离。甘吉太太首先获准进入检察长办公室。索尔玛兹可以听见甘吉太太在办公室里高声数落莫塔札维的暴行。索尔玛兹暗自窃笑。

不去检察长办公室的时候，索尔玛兹也没闲着。她让鲁兹贝赫的家人接受媒体采访，自己则把大部分时间投入于打电话给有力人士，希望他们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鲁兹贝赫获得释放。索尔玛兹认为，鲁兹贝赫是因为与改革派人物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贝赫札德．纳巴维的关系——无论关系有多么薄弱——而成为被针对的目标。这些人远比鲁兹贝赫有权力。这些改革派人士当然能不断打电话给莫塔札维要他释放鲁兹贝赫。索尔玛兹每天都会打电话到政治人物的办公室，要求他们打电话给莫塔札维。然后她会不断地打回去询问，是否他们已经打了电话。她不在乎自己是否惹恼对方；她擅长做这种事，而这么做确实有一定用处。但这个经验却让她感到苦涩。鲁兹贝赫曾经为易卜拉欣．阿斯加札德赫工作，甚至曾经在二〇〇一年支持他投入短暂而不顺利的总统选战，但阿斯加札德赫不接索尔玛兹的电话，也不回复她的讯息。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有好几个星期没打电话，直到他听说索尔玛兹一直在抱怨为止。当他确实连系上时，他指出他的电话也许无法帮助她的处境，而这无疑是真的。

只有两个政治人物帮上忙，索尔玛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梅赫迪．卡鲁比曾经是激进派教士，现在则是国会里的中间改革派人士，他接到索尔玛兹的电话，并且立即透过他的儿子做出回应，他的儿子定期向索尔玛兹更新卡鲁比为鲁兹贝赫采取的行动。另外则是哈塔米的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他的部落格相当受欢迎，而且自己也是〈蜘蛛的房屋〉指名的人物，他深具同情心，有时会向她报告事情的进展，甚至晚上还会传笑话让她开心。

索尔玛兹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找莫塔札维时，这位检察长问她一件事。莫塔札维告诉她，她可以帮助鲁兹贝赫，只要她签下自己的一份小小的认罪书。认罪书里必须提到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贝赫札德．纳巴维与埃玛德丁．巴吉，其中埃玛德丁．巴吉是社会学家，也是《共和国报》编辑，曾经积极揭露连环谋杀案。索尔玛兹必须表明这三个人利用年轻天真的记者来追求自己的野心，而他们也逼迫鲁兹贝赫散布关于政权的谎言。

「我不认识这些人，」索尔玛兹抗议说，「如果你对这些人不满，为什么要逮捕鲁兹贝赫？」

「快轮到他们了。」莫塔札维阴沉地说。

索尔玛兹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她了解自己与鲁兹贝赫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孤立无援且十分危险，他们正为那些更为

重要且不愿为他们挺身而出的人的野心付出代价。为了让鲁兹贝赫出狱，她会签下她需要签下的一切。然而，即使她决心这么做，她还是无法在检察长摆在她面前的纸上动笔写字。

「我会宣读你写下的关于你丈夫的案件的公开信，」莫塔札维催促她，「你是作家，写吧！」结果，最后是由莫塔札维一个字一个字口授让她写下认罪书。

十一月的某一天，鲁兹贝赫已被监禁超过四十天，他与夏赫拉姆被关进同一间牢房，这间牢房并不比他们的单人牢房大多少。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关在一起，是希望从他们的交谈中找到将他们入罪的理由。于是两人开始讲述故事与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晚上，鲁兹贝赫唱歌给夏赫拉姆听，正如他很久以前开玩笑时承诺的。

十天后，鲁兹贝赫与夏赫拉姆，连同欧米德与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一起被移转到埃温监狱。当天，十七名与他们案子相关的犯人获释，这些人现在被称为「部落客案件」，不过其中还包括市民社会的活动分子与记者。

相较于秘密监狱，埃温监狱的环境改善许多，饮食更是天差地别。埃温的守卫由一般的工作者担任，对他们不会抱

持恶意。鲁兹贝赫、欧米德与夏赫拉姆也不再单独监禁。相反地，他们共享由两间单人牢房组成的套房，里面有淋浴间与小厨房。这些套房位于埃温监狱第九区四楼，当国际人权团体来访时，这些套房可以做为监狱的示范牢房。这些套房也刚好位于死刑牢房区。这里的走廊回荡着暴力的声响，到了清晨，牢房的人可以听见死刑犯被拉出去处决。

沿着他们牢房所在的走廊走下去，有一间牢房关着恶名昭彰的连环杀人犯，名叫穆罕默德．比杰赫。才二十四岁，比杰赫已经杀害与性侵约十七名八岁到十五岁的男孩，此外还包括三名成人。他与他的共犯引诱他们的受害者到德黑兰南部的沙漠，用毒药或用沉重石块敲击头部的方式杀死他们，然后加以性侵，再埋进很浅的坟墓里。

欧米德有个主意。他能不能访谈比杰赫？他问守卫。他想象自己在出狱后发表一篇文章，也许就在比杰赫被处决的时候。没有人会比他更晚接触到这名杀人犯。同牢房的人揶揄他：即使在牢里，欧米德还是满脑子想着下一次的良机。当然可以，守卫告诉欧米德。只要他不在乎与比杰赫在同一个牢房里待一个晚上。欧米德想一想还是算了。

在共同监禁的牢房里，鲁兹贝赫、夏赫拉姆、贾瓦德与欧米德苦涩地争论谁透漏了跟谁有关的什么事情以及为什

么。最初的几个小时是丑恶的情感宣泄。〈蜘蛛的房屋〉这篇社论，从各方面来看，都与夏赫拉姆所谓的强迫狱中认罪没什么差别，扭曲、曲解与层层加添充满恶意的非真相。欧米德对于与鲁兹贝赫关在同一间牢房感到不自在，他觉得鲁兹贝赫说得太多，说得太轻易，任由讯问者予取予求。鲁兹贝赫则认为，他们既然已经同意在获得释放之前要彼此合作，现在陷入争吵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也只有在相互揭丑之后，这几个同牢房的人才能进行协商。他们了解，他们的案子彼此连结。贾瓦德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了解，贾瓦德与他们被当成一个群体，藉此来加添他们案子的严重性。他们也了解到，他们都是在临时起意的状况下被逮捕，他们遭受讯问藉此从中随机取得证据，现在他们被用来构陷已知的目标，如塔吉札德赫与纳巴维。

他们在秘密监狱的那几个星期——夏赫拉姆待了将近三个月，鲁兹贝赫两个月，欧米德比鲁兹贝赫稍微少几天——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伤害，他们在监狱里过的每一天都在加重这样的损伤。他们同意，最重要的就是出去。然后他们可以遵循阿里．阿夫夏里的例子推翻他们的供词。眼下他们要做能让自己出狱的事。

他们在埃温监狱不断为基沙瓦兹撰写与重写他们的供词，而基沙瓦兹是个严厉的编辑。欧米德的重点是构陷纳巴

维、塔吉札德赫与其他改革派人物，他承认从他们身上拿钱并且奉命抹黑伊斯兰共和国。他也诽谤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分子。夏赫拉姆则承认一些已经去世的诗人与作家朋友有罪，并且承认为了吹捧自己的名声而刻意与这些人沾亲带故。鲁兹贝赫揽下一切与街头示威有关的责任，并且表示这都是与改革派阴谋家共谋的结果。

他们的动作缓慢而审慎，因为他们注意到，只要他们忙于撰写供词，基沙瓦兹就不会来烦他们。然后还有排练。每个人依序但从未一起进行，他们坐在典狱长办公室，里面做了布置，有盆栽与一壶柳橙汁，他们要向摄影机朗读他们的供词。

夏赫拉姆注意到，这个过程一直等到他身上可见的瘀青治好时才开始。但普遍来说，部落客从一开始身上就没有瘀青。他们遭受的是典型的白色刑求——对身体的伤害远不如对灵魂的伤害。

伊朗司法总监阿亚图拉马哈茂德．哈什米．沙赫鲁迪是伊拉克出生的教士，个性相对温和。他表面上任命莫塔札维担任检察长，但据说他曾数次试图撤换莫塔札维，却发现这位检察长后头有他无法挑战的势力撑腰而作罢。阿亚图拉沙

赫鲁迪每个月举行一次民众会议，数千名民众可以直接向他陈情。民众排队从他身边经过，若不是向他本人，就是向他的副手提出要求。索尔玛兹决定加入民众的行列，她必须向阿亚图拉本人陈情。

索尔玛兹用她最近经常得手的方式取得参与民众会议的许可：持续提出要求，几乎到了骚扰的程度。她前往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手里拿着请求信函。发言人拿了信，把信放到一旁，然后急着到楼上，他说他会注意这件事。索尔玛兹从楼梯底下对他喊道：「我会在这里等着，直到你回来告诉我获得许可。」索尔玛兹知道，她只剩这个办法了。而她也得到她想要的。

索尔玛兹一看到阿亚图拉沙赫鲁迪就对他产生好感。有些教士流露出野心、严厉乃至于残酷，有些教士则是不折不扣的教士，他们对宗教诚恳，致力于维护宗教的正义观。索尔玛兹觉得沙赫鲁迪属于后者。沙赫鲁迪是个包着黑色缠头巾的教士，六十几岁，留着白色长须，脸上带着随和的笑容。索尔玛兹把信函交给他，恳求他能尽快处理她的案子。她是个年轻新婚妻子，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她希望丈夫能回家过开斋节。此外，她知道她的丈夫的看守人已经违反了沙赫鲁迪自己通过的禁止在狱中蒙上眼睛与上铐以及不许连续讯问四十八小时以上的法律。「我是个记者，」她向他求

助，「我知道违反你的法律是什么意思。」

阿亚图拉沙赫鲁迪要索尔玛兹等待他的手下准备信件。索尔玛兹离开民众会议时，手里紧抓着盖印的信封，上面盖的是司法部的章。她要将这封信拿给莫塔札维。但索尔玛兹觉得不应该在不晓得信里面写什么的状况下把信交给检察长。当晚，她与朋友轮流拿着信封对着灯光，试图辨识信封里折迭的信纸里打了什么字。她们花了三个小时与很大的耐心才辨识出里面的字，并且将其誊抄在索尔玛兹的笔记本里。当她们完成时，她们欣喜若狂。那是让鲁兹贝赫交保出狱的命令。

早上，索尔玛兹回到莫塔札维的办公室。「我有释放我丈夫的命令，」她对检察长的助理说道，「请把它交给莫塔札维先生。」

然后她坐下来等待。这次她不看监视摄影机。她估计莫塔札维需要一点时间平静下来。她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她知道她需要保释金，她说服一名记者朋友签下价值八百万土曼的财产证明。她的包包里就放着这份文件。

「你对我的助理说谎，」当她进来时，莫塔札维对她说道，「沙赫鲁迪先生并未下令释放你的丈夫。他只要求我合作。」

索尔玛兹拿出她的笔记本，然后向莫塔札维宣读信件的誊本，彷佛她本人就握有这封信件的副本。

「坐下，」他终于说道，「我们来谈谈保释金的事吧！」

索尔玛兹让他看朋友的财产证明。他缓慢地复述她朋友的名字，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但这笔钱还不够，」他告诉她，「鲁兹贝赫的保释金是五千万土曼。」

「我以为你说过鲁兹贝赫对你们来说毫无价值。」索尔玛兹愤怒地说道。五千万土曼，超过了两万美金，这是其他部落客保释金的两倍以上。

「他确实毫无价值，」莫塔札维肯定地说，「但我们谈的是保释金。」

无论是鲁兹贝赫还是索尔玛兹的家人都没有价值五千万土曼的财产。索尔玛兹父母的房子已经抵押，鲁兹贝赫的父母则是租房子。索尔玛兹可以想到的亲戚里没有人有这样的财力。更糟的是，她已经跟鲁兹贝赫说她能让他获得释放。现在，他正在狱中等待，完全不知道索尔玛兹正为了筹钱东奔西跑。

索尔玛兹又开始打电话。她留了讯息给阿斯加札德赫，但他没有回应。当她终于想办法用电话联络上阿斯加札德赫时，她已经顾不上礼貌。他能不能帮鲁兹贝赫付保释金？阿斯加札德赫说他会想办法。索尔玛兹知道他不会。就一名改革派报纸的编辑来说，索尔玛兹甚至是更不愿意低头的那种类型。索尔玛兹对阿斯加札德赫说，她已经求过自己所有的家人。但鲁兹贝赫难道是因为她的家人坐牢吗？她说，你们这些改革派同为一个党，一起推动议程对抗保守派。你们当中有人成为保守派打击的目标时，你们理应彼此帮忙。年轻的记者为了改革派付出一切，却要独自承担所有的风险。

最后，索尔玛兹找上鲁兹贝赫的母亲。她回想起，不是有个家庭成员曾经跟鲁兹贝赫家同住一年，之后自己买了房子吗？想请那位亲戚出保释金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至少她欠鲁兹贝赫家一份人情。她是他们最好的与唯一的可能。

索尔玛兹拿到那个亲戚家的财产证明，但也只值三千万土曼。索尔玛兹知道，两家人只能筹到这么多了。她必须想办法补足其余的部分。于是她带着三千万土曼财产证明去见莫塔札维，并且在绝望下想了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有件事你必须知道。」索尔玛兹郑重对检察长说道。她提醒莫塔札维，她曾经向他承诺，她会管好鲁兹贝赫，让他

远离纳巴维、塔吉札德赫与巴吉的不良影响。但现在塔吉札德赫与巴吉找上她。他们听说她还没凑足保释金，他们愿意补足剩下的差额。

「我必须接受他们的钱，」索尔玛兹说道，她尽可能装做无辜的样子。「但这是笔很大的债务，如果他们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我们不得不照做。我不知道在这种状况下，我要如何不让鲁兹贝赫不受他们的影响。」

这个计划很疯狂，索尔玛兹心想，但有可能成功。而它确实成功了。检察长大笔一挥，降低了保释金。

当晚，索尔玛兹在母亲公寓外头等待。犯人的家属都知道这项例行规定：埃温监狱固定在晚上九点放人。如果你的亲人到了十点还没到家，那么当天就不是他的大好日子。但索尔玛兹已经交了保释金。鲁兹贝赫一定只是暂时受到耽搁。直到午夜，她都在外头的寒风中坐着。然后她上床休息，心中首次感到真正的无望。

鲁兹贝赫日后才知道，莫塔札维与他的手下当时正急于加快脚步。他们接到释放他的命令，但决心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才放人。基沙瓦兹向鲁兹贝赫等人说明他的计划。

他们可以获得保释，条件是他们获释「之后」要公开认罪，以交保后的自由人身分亲自将认罪书交给他们各自认识的媒体公布。

他们一直想象自己的认罪书会在他们还在监狱的时候公开，届时将予人屈打成招的印象。然后他们在获释之后将会推翻所有的供词。这样的期望一直支持着他们。然而莫塔札维棋高一着。鲁兹贝赫现在发现，从监狱释放并没有让他真正获得自由。他看起来会更像是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而不是阿里．阿夫夏里。

鲁兹贝赫先出狱。他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附带了一项条件，那就是他必须公开发表认罪书，他们才会释放同牢房的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的认罪书公开后，第三个人才会获释，以此类推。鲁兹贝赫日后描述夏赫拉姆、欧米德与贾瓦德成了人质，他们成为他的自由的担保品。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上，鲁兹贝赫走出埃温监狱。他在大门的群众中寻找熟悉的脸孔。没有人知道要来接他。他背着自己的衣物，接下来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达拉克赫附近的北部山麓，到梅赫拉阿巴德的南部平原的边缘。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希望家里有人能帮他付出租车钱。他按了机场附近一栋公寓的门铃，时间刚好是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当索尔

玛兹想到谁可能在门外时，她光着脚冲出来。两人在楼梯上拥抱。索尔玛兹注意到，与先前在副检察长办公室见到时不同，鲁兹贝赫看起来干净而且梳理过。她紧紧抱着他，内心高兴不已，深信他们的苦难终于已经结束。

朋友与亲戚几乎马上抵达。到了午夜，索尔玛兹母亲的公寓已聚集了二十到三十个人，包括一些鲁兹贝赫移往埃温时被释放的部落客。鲁兹贝赫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但他的内心其实承受不起。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却不敢说。一旦他公布自己写的认罪书，这不仅将羞辱到自己，也让自己成为有罪之人；在指控他人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合作者。到时候，这些人会怎么看他？他告诉自己，狱中的朋友全仰赖他的良知。如果他谈起认罪书，如果他在当晚的聚会跟任何人提起自己仍背负着压力，那么他想象可能有人会向检察长通风报信，泄漏他的两面手法。鲁兹贝赫已经出狱，身旁却仍跟着无所不在的真主。

第二天早晨，第一通电话响起。鲁兹贝赫将在离岳母家不远的自由广场与基沙瓦兹见面。鲁兹贝赫告诉索尔玛兹自己的秘密，解释在他面前还有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她仔细观察自己的丈夫。他过去总是一副孤高的样子，但现在似乎处处要仰赖她，他仍被监禁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他的消极就像塑料手铐一样，愈挣扎就铐得愈紧。她知道，她必须坚定

他的意志。

索尔玛兹与鲁兹贝赫一起前往自由广场。她跟朋友借了一支录音笔，然后把录音笔塞进鲁兹贝赫胸前的口袋。索尔玛兹告诉他，他只需要打开开关，接下来都不用去碰它。她不知如何或何时或何处，但她确定这个强迫取供的证据有一天可以派上用场。

基沙瓦兹跟索尔玛兹打招呼，彷佛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她。不过他必须跟鲁兹贝赫单独谈谈，他对她说道。于是他把鲁兹贝赫带进车里，索尔玛兹则在路旁等待。

认罪书写好了吗？这名讯问者问道。鲁兹贝赫恳求再给一点时间。他前一晚才获释，他甚至还没回拉什特向父母报平安。但欧米德、夏赫拉姆与贾瓦德正在等待，他反对说。他递给鲁兹贝赫一枝铅笔与一张纸，口授了一张莫塔札维要他提及的主题列表。鲁兹贝赫要在下午把认罪书写好，把副本交给基沙瓦兹，然后在离开前往拉什特之前公布认罪书。

鲁兹贝赫把认罪书传真到伊朗学生通讯社与伊朗劳动通讯社这两家由改革派人士控制的新闻媒体之后，便与索尔玛兹出发前往拉什特。他知道这两个新闻媒体都不会公布强制的认罪书，但他还是要走完整个流程。

三天后，基沙瓦兹透过索尔玛兹的手机找到鲁兹贝赫。这名讯问者很愤怒。鲁兹贝赫还没公布他的认罪书！他的朋友还在监狱等他！鲁兹贝赫抗议说，他已经将认罪书传给两家通讯社了。他们没有刊载跟他没有关系。莫塔札维很不高兴，讯问者坚持地说。鲁兹贝赫必须回德黑兰，公布认罪书，并且向检察长办公室回报。鲁兹贝赫与索尔玛兹返回首都的路上，一个朋友打电话通知他们，一份由鲁兹贝赫署名的认罪书已经由法尔斯通讯社公布，这家通讯社是革命卫队的喉舌。莫塔札维亲自传真了这份认罪书。

之后，检察长打电话给鲁兹贝赫曾经工作的报社，命令他们的编辑完整公布认罪书，而且还要下耸动的标题：「完整揭露！」、「改革派记者的认罪书！」与「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透露改革派运动的神秘团体」。认罪书的部分内容如下：

> 我，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因涉及一连串网站而遭到起诉……。过去几年，我跟一些像我一样的人遭受一些人的控制，他们的做法都是为了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利用像我这样的人来实行他们的邪恶计划……。我猛烈攻击体制的各种不同的支柱，特别是司法部，我对他们提出各项指控，我说他们违反人权……
>
> 过去几年确实存在着一个可怕的网络……，一端位

于国内，另一端则位于国外……。我因为软弱而参加了这个网络……，国外一些组织与个人支持像我这样的人，这是可耻的，因为我践踏了国家的法律而且犯了罪……

关于我被单独监禁的说法绝不是真的。在监禁期间，我受到狱方的仁慈对待与尊重。在此，我要对于他们的仁慈表达感谢，愿真主保佑他们成功与幸福。

我被监禁在埃温监狱，而且已获得释放，重新回到家人温暖的怀抱……

谨祝所有人民的真正公仆拥有荣耀与坚定不渝。

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欧米德与夏赫拉姆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获释与否取决于鲁兹贝赫的认罪。讯问者显然说谎而且做了虚假的承诺。欧米德认为，如果鲁兹贝赫反悔而且向改革派求助，那么他们在还没公布认罪书之前，这些认罪书就会受到质疑，届时压力将会返回到莫塔札维身上。但同牢房的人都不信任鲁兹贝赫，因此没有人给他这项建议。假使鲁兹贝赫向基沙瓦兹通

风报信，说其他人并未充分悔罪呢？像欧米德就几乎无法看出鲁兹贝赫看似不可思议的平静之下，究竟外表的恭顺会在何处停止，而内心的拒绝又从何处开始。

欧米德从不怀疑他们即将获得帮助。记者同盟正在组织支持部落客的静坐抗议。就连欧盟也施压要求释放部落客。此外，检察长办公室采取了拖延战术。鲁兹贝赫获释后快一个星期，夏赫拉姆与欧米德面临新的威胁。夏赫拉姆得知他的弟弟巴赫拉姆被捕。而基沙瓦兹告诉欧米德，他的兄弟将是下一个。

终于，埃温的典狱长到牢房探视欧米德、夏赫拉姆与贾瓦德。「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当他走进牢房时，突然这么说道。不到三十分钟，欧米德与夏赫拉姆就被释放，并且被命令要马上公布认罪书。贾瓦德则继续留在埃温监狱。

基沙瓦兹抓紧机会对夏赫拉姆提出最后一次警告。「外面有恶棍等着你，」他说道，「他们要你继续说出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小心点。你有三束花。」夏赫拉姆知道基沙瓦兹是在说他的三个孩子。「那三束花就是你的保释金。」

夏赫拉姆再也没回到埃斯坎达里的公寓，即使他所有的物品都在那里。相反地，他决定尽快前往拉什特。夏赫拉姆催促欧米德，他们必须想出一个策略。他们必须尽可能让刑

求他们的人找不到他们。夏赫拉姆没有手机，欧米德则是封锁他们的电话。他们必须连络自己信任的每一个人，无论国内或国外，解释他们在狱中遭遇的一切。夏赫拉姆写信给希林．伊巴迪，打电话给在国外报导伊朗新闻的朋友，而且警告他在《信任报》的同事与长官。他知道，他的案子与他调查的连环谋杀案有关。他的生命面临危险。他会尽可能少去德黑兰，但这么做还是不够。

欧米德回到拉维赞的老家。他一直是个开朗的人，什么事都不藏在心里，直来直往，容易亲近，特别是跟他的父母。现在，他必须与自己无法与外人分享的记忆争斗，与无法向外人解释的焦虑对抗。他感到屈辱与愤怒，他经常哭泣。有时，当他独自一人在房间哭泣时，他可以听到母亲也在门外头哭泣。

但是，对现在的欧米德来说，主动与人连系反而合乎情理。他写信给住在国外的两名伊朗记者，解释他刚遭遇的苦难。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这些信件，但夏赫拉姆说服他将自己与鲁兹贝赫的名字也加进去。于是欧米德深吸一口气，他找出他曾在认罪书里提到的每个名字，警告他们并且致歉，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对方的愤怒。

透过非政府组织的同事，欧米德取得一名纽约人权观察

研究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欧米德另外设立了一个电子邮件账号而且写了一封长信给国际监督团体，详细描述部落客在狱中遭受的待遇。人权观察很快公布了一篇报告，提及的内幕震惊了莫塔札维。在夏赫拉姆的建议下，下一次欧米德与人权观察连络时，他加入一段错误信息来掩盖自己的踪迹。不是我，他可以这么告诉莫塔札维，他不是这些报导的来源——无论是哪个来源报导了夏赫拉姆在狱中遭到笞刑，他与其他目击者都知道那不是真的。

然而，与鲁兹贝赫一样，欧米德也做了难以置信的事。想到自己的兄弟与夏赫拉姆的子女受到威胁，欧米德在获释的第二天带着自己与夏赫拉姆的认罪书前往伊朗学生通讯社与伊朗劳动通讯社。认罪书用漂亮的字迹写成，一方面是拖延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一切感到厌烦。政府经营的改革派通讯社拒绝刊载这两封认罪书。伊朗学生通讯社甚至要求欧米德带着律师过来。最后，欧米德带着认罪书到法尔斯通讯社，而法尔斯通讯社早已有了认罪书的副本。就跟处理鲁兹贝赫的手法一样，莫塔札维命令改革派报社遵循法尔斯通讯社的做法，公布欧米德与夏赫拉姆认罪书的第一页或第二页。编辑们打电话向欧米德道歉，但他们还是遵照莫塔札维的指示做了。

认罪书全部公布之后，原本在鲁兹贝赫被监禁时善待索

尔玛兹的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在部落格上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厉的文章，标题是〈悔罪的与不悔罪的部落客〉，毫不客气地拿鲁兹贝赫、欧米德、夏赫拉姆与在他们之前无条件获释的其他部落客的案件做对比。阿卜塔希称鲁兹贝赫、欧米德与夏赫拉姆是塔沃布，拿他们与一九八〇年代狱中那些令人痛恨的合作者相提并论。

愤怒的欧米德在出租车里打电话给阿卜塔希。阿卜塔希写的文章完全不公平，欧米德大声斥责说。他完全不知道部落客遭遇了什么。欧米德告诉副总统，事实上，讯问者很清楚地表明，阿卜塔希很快就会在监狱看到他们，届时他们期望从阿卜塔希身上得到非常生动的供词。阿卜塔希打断欧米德的话说，他的电话已经被录音了。欧米德要他怎么做？道歉，欧米德要求说。阿卜塔希随后发表一篇文章，坦承这件案子可能有一些他不知道的面向。

鲁兹贝赫在国外没有认识的人，也与改革派政治人物没有关系。他没有名气、年轻而且与政治人物没什么瓜葛，政治人物也不可能为他冒险。他在狱中独处，他现在还是独处。就连他的朋友也已经不信任他。莫塔札维或基沙瓦兹打电话给他时，他会接电话，他们要求什么，他绝大多数都会做到。

他的理由是，贾瓦德还在狱中，而他坐牢是因为鲁兹贝赫。最审慎的策略就是顺从与保持低调，直到他能彻底决裂为止。

鲁兹贝赫的名声已经毁了。改革派媒体与菁英几乎口径一致地谴责他：这名年轻部落客在狱中崩溃，出卖了他的同事。他背叛了整个伊朗历三月二日运动。他理应更坚强才对。现在莫塔札维固定找他进办公室，要求他做出一篇又一篇自我毁灭的公开声明。十三次，这是鲁兹贝赫到检察长办公室报到的次数。莫塔札维要他签署关于国会宪法九十条委员会的认罪书，做为不利于改革派人士的证据。当他签署的这封宪法九十条委员会认罪书到了《宇宙报》的手中，《宇宙报》打电话给鲁兹贝赫要求他做出评论时，鲁兹贝赫划下底线。他在电话里表示，如果《宇宙报》公布信里的任何内容，他就会撤回所有的供词。

鲁兹贝赫原本就沉默寡言，现在的他几乎完全不说话。他躲避人群，就连亲戚在拉什特的婚礼他也不参加。街上有时会有陌生人认出他来，而且表达了同情与理解，但菁英们却冷酷地表示不认同。某日，流亡海外的伊朗政治讽刺作家易卜拉欣．纳巴维——他曾收到欧米德的信，但鲁兹贝赫不知道——发表文章谴责国人对于明显受到强迫的年轻人做出过分的要求。任何人只要在监狱待上一小时，就可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写道。谎言不会发出亮光，只会显露黑暗。

该被指责的不是这些年轻人，而是他们的讯问者，他们应该为自己做了这些肮脏事，而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感到羞耻。当鲁兹贝赫读到这篇文章时，他没有说话。他无声地哭着，没有察觉到索尔玛兹看到了这一幕。

当夏赫拉姆在德黑兰时，欧米德、夏赫拉姆、鲁兹贝赫与索尔玛兹四人结成了紧密的圈子。夏赫拉姆认为，他们需要彼此，尽管他们不信任彼此。他们已经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保守派已经伤害他们，现在改革派则害怕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莫塔札维手中潜在的武器。他们孤伶伶地站着，所以他们必须站在一起。他们有一个秘密聚会地点，一家不起眼的咖啡厅，他们会在夜里到这里，小心翼翼地甩掉任何人的跟踪，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地方。

对欧米德来说，鲁兹贝赫已经投奔敌营，现在的他对其他人已成了包袱。鲁兹贝赫完全想不到欧米德是这样看他的。他认为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努力摇桨对抗想将他们冲往可耻命运的急流。然而鲁兹贝赫的沉着让人猜不透他的想法。他确实令欧米德感到不信任，而欧米德也刻意跟他保持距离。他们的迫害者努力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粉碎信任关系，缔结相互毁灭的新关系。这三个天真的年轻人，每个都是年轻世代的一时之选，他们心存善念，有着积极进取的想法，但迫害者却将他们改造成充满争议性，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人物。

欧米德想跟鲁兹贝赫疏远，但夏赫拉姆拒绝。他告诉欧米德，如果鲁兹贝赫完蛋，所有人都会跟着完蛋。他们该做的是支持鲁兹贝赫，如果鲁兹贝赫不了解，那么就要向他证明，他依然有可能回归正常生活。纳巴维的文章与阿卜塔希撤回批判，两者都是欧米德努力不懈争取的结果，而且都产生了效果。现在，他们要带鲁兹贝赫去见记者同盟的领袖拉贾布．阿里．马兹鲁伊，而马兹鲁伊对于这些年轻部落客公布认罪书的事感到气恼。

马兹鲁伊斥责他们，但也听他们把话说完。夏赫拉姆与欧米德觉得自己帮了鲁兹贝赫的忙。他们认为，鲁兹贝赫必须了解，如果他能积极面对，那么这些人会原谅他——他必须了解，自己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但鲁兹贝赫对那天晚上的记忆却是，当其他人——例如他的前编辑埃玛德丁．巴吉——都能体谅他的苦况时，马兹鲁伊却显得苛刻而心胸狭窄。巴吉曾对鲁兹贝赫说，如果鲁兹贝赫认为说出对他不利的供词能对他有帮助的话，那就说吧。

晚间在咖啡厅的聚会，这三个部落客与索尔玛兹讨论每日发生的新闻与他们的选择。他们可以跟莫塔札维决裂，并且说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不难想象莫塔札维会杀了他

们。他们可以继续合作，直到这位检察长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为止？但谁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而且这段时间，莫塔札维又会让他们做出什么伤害性的事？如果他们想摆脱束缚，那么他们就需要在体制内寻找盟友。否则他们只能孤军奋战，成了这场危险游戏的弱小玩家。他们决定尝试去见总统。欧米德去找哈塔米的发言人，那是他过去处境较好的时候认识的，同时也去找阿卜塔希。

拉贾布．阿里．马兹鲁伊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总统哈塔米。他描述自己的儿子做为部落客案件的被告在牢里忍受的一切，而且提到夏赫拉姆、欧米德与鲁兹贝赫遭到强迫取供。总统应该调查这件事，他写道。检察长办公室在部落客案件上应该受到调查。

「悔罪的」部落客还来不及为这项调查高兴，愤怒的莫塔札维立刻将他们找来。他要求他们亲自写信做出回应，反驳马兹鲁伊的说法，并且指责那些「不悔罪的」部落客都是说谎者，而且要表示自己对于在狱中的状况感到满意。莫塔札维提醒他们，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还在牢里，他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们写了一封信，否认他们曾受到单独监禁，否认他们曾遭受刑求，而且感谢司法部给他们机会认错与赎罪。他们

夸大其词到极端荒谬的程度，他们宣称监狱守卫出于好心，还将自己的食物分享给犯人吃。莫塔札维并不领情，相反地，他大为光火。他告诉他们，他不会公布这封信。但他也不让他们回家。他另有安排。

「当你们走出这个房间，会有记者等着你们，」莫塔札维说道，「把你们会在法庭上以及在信上谈到的关于马兹鲁伊先生的事告诉他们。」贾瓦德已经从埃温监狱离开，他将被带到记者会上跟他们会合。

「这是最后一件你们必须要做的事，」莫塔札维告诉他们，「不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在伊朗，很多人死于车祸。不只记者会死于车祸，商人、国会议员、屠夫也都会死于交通事故。」

在检察长办公室外，一群记者等待着他们。伊朗劳动通讯社与伊朗学生通讯社的记者在那里，还有强硬派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以及法尔斯通讯社。欧米德看到法尔斯通讯社记者跟基沙瓦兹打招呼，彷佛两人是老朋友。基于某种原因，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也在现场。改革派伊朗劳动通讯社记者悄悄走到鲁兹贝赫身旁向他保证他们通讯社不会提出任何问题。

四名年轻人坐在一排硬背椅子上，在他们面前是一张低

矮的咖啡桌。在最左边的位置，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穿着风衣，戴着眼镜，眼睛看着地上。在他身旁，欧米德怒目而视，摆出一副拒绝的姿态，他双臂交抱，翘着二郎腿，表情紧绷。夏赫拉姆穿着灰色西装外套，他翘起下巴，对着摄影机；只有他看起来愤怒多过于受创。鲁兹贝赫看起来若有所思，他穿着黑色外套，双臂抱胸，满脸战兢。

一阵漫长的沉默，他们面前的记者似乎在等待信号。于是夏赫拉姆指向法尔斯通讯社记者，提问开始。

部落客们抨击马兹鲁伊而且否认他的说法。欧米德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一边说一边流泪，描述自己如何试图抹黑伊斯兰政权。然后一名强硬派记者嘲弄欧米德像个婴儿般哭泣，但欧米德毫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以让任何人都能清楚看出他遭到胁迫。夏赫拉姆坦承在作家朋友的影响下，自己变得世俗。鲁兹贝赫说自己成了改革派的炮灰。莫塔札维曾经指示鲁兹贝赫将马兹鲁伊家族牵连上圣战者组织，但鲁兹贝赫没这么做。

到了末尾，一名电视台记者走到这些部落客身旁，试图安慰他们。「我们都知道莫塔札维是个禽兽。」那名主播说道。

那天，欧米德对着讯问者发火。他已经到了极限，没有下一次了。再继续逼他，他就要反咬检察长一口。他要把所

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他无法再听命于莫塔札维。

记者会在当天晚上八点播放，然后一再回放。但播放时却未提及记者会是在检察长办公室举行这件事。贾瓦德回到埃温监狱。夏赫拉姆前往拉什特，但莫塔札维经常把他找来德黑兰。

基沙瓦兹继续与鲁兹贝赫在公共广场或街角见面，并且把他拉进车里说话——彷佛他们是黑手党，鲁兹贝赫日后若有所思地说。索尔玛兹要鲁兹贝赫秘密从口袋录下所有对话内容。有一回，基沙瓦兹告诉鲁兹贝赫一个好消息——他帮鲁兹贝赫找到一个写作的好出路:《宇宙报》会付他一笔可观的稿费，请他写一本关于改革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其实是由间谍组成的书。基沙瓦兹已经帮鲁兹贝赫安排好与《宇宙报》编辑侯赛因．沙里亚特马达里见面，也就是〈蜘蛛的房屋〉的作者。鲁兹贝赫只须在文件上签名。鲁兹贝赫不妨也加入《宇宙报》，基沙瓦兹鼓吹着；毕竟，他在改革派已经没有朋友了。鲁兹贝赫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此之前，基沙瓦兹也曾试图劝诱这三名年轻人到《宇宙报》旗下的研究机构工作。欧米德非常生气。他宁可上吊自杀，也不能这么做。如果他们还与沙里亚特马达里见面，这场游戏就结束了。他们等于把自己的灵魂卖给莫塔札维。

基沙瓦兹曾对欧米德说，十六家强硬派报社的价值比不上一名改革派人士跳出来反对自己的阵营——例如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这样的人物。

总统哈塔米对马兹鲁伊的信做出回应，他要求宪法观察委员会调查部落客案件。由数名高阶教士、政府部长、教授与拥有法学背景的国会议员组成委员会，邀请几名「未悔罪的部落客」前来做证。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在委员会聆听证词。他在部落格发表文章谈起这场会议，认为单独监禁与刑求的说法是可信的。

莫塔札维迅速采取行动。他打电话给宪法观察委员会主席，斥责他只找「未悔罪的」部落客出来做证。这位检察长谎称，鲁兹贝赫、欧米德与夏赫拉姆——「悔罪的」部落客——对此有意见，他们要向国会申诉，而这将迫使国会组成宪法九十条委员会调查此事。莫塔札维坚持，「悔罪的」部落客对于监狱的状况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委员会也应该听听他们的说法。委员会主席同意了。莫塔札维没有先征询鲁兹贝赫他们，就排定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出席委员会。

鲁兹贝赫接到莫塔札维办公室的电话，他只有几个小时可以准备。鲁兹贝赫被告知，检察长要他、欧米德与夏赫拉姆立刻到办公室报到。他们将出席宪法观察委员会。此时鲁

兹贝赫脑中浮现一幕景象：莫塔札维与基沙瓦兹会胁迫他们，然后在他们做证时紧紧盯着他们，确保他们不会偏离脚本。与在记者会上时一样，这三个前犯人将成为莫塔札维手里的工具，用来免除他对他们犯下的罪行，同时也用来打击说出真相的部落客。鲁兹贝赫转念一想：他们也许可以抓住没有预先通知这个机会。他对莫塔札维的助理说，他无法出席；他有工作，人不在德黑兰，今天不可能。然后他关上手机，用索尔玛兹的手机打电话给欧米德。

「我们在革命广场见面，」鲁兹贝赫对欧米德说道，「我有话要跟你说。」

鲁兹贝赫告诉欧米德电话的事，以及他想象莫塔札维可能采取的计划。鲁兹贝赫自己也有一套计划。他们应该避不见面，让莫塔札维相信他必须重新安排与委员会见面的时间。但在此同时，他们应该自行参加委员会。没有这些恶棍或脚本或威胁，他们才可以向亲近总统的人畅所欲言，而他们应该会聆听。鲁兹贝赫开玩笑地说，真主没有选择透过他们的改革派盟友来帮助他们，或许是想透过莫塔札维来做这件事。

欧米德吓了一跳。他已经同意私底下与委员会的某个成员见面，不过还没有约好时间。他没有想到鲁兹贝赫跟他的想法一致，更不用说是向整个委员会做证。鲁兹贝赫提出的

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跟他平日的行事方式相比，更让人有这种感受。欧米德马上就同意了。两人可以说是首次彼此坦白内心的想法，相信自己的人生将彻底获得改变。最坏的状况，他们可能再次遭到逮捕。但他们已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获得自由与洗刷污名。

鲁兹贝赫打电话给阿卜塔希确认会议的时间与地点。阿卜塔希唐突而粗鲁。然而是的，两点在巴斯德街的总统办公室召开会议。

欧米德、鲁兹贝赫与索尔玛兹在两点进入会议室。夏赫拉姆无法及时从拉什特赶来。在他们面前坐着阿卜塔希、司法部长、国会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专家会议的一名年迈的阿亚图拉，以及几名法律专家。

当他们走进会议室时，司法部长感到困惑。莫塔札维打电话说这场会议已经取消，他对他们说道。鲁兹贝赫解释说，他们摆脱莫塔札维，自己前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决定说出我们过去从未说过的事，」鲁兹贝赫说道，「我们相信你们。」

「等一下，」司法部长说道，「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即将要说的事可能造成负面的结果或让你们惹上麻烦，你们要知道，

我们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

索尔玛兹按捺心中的愤怒。即使鲁兹贝赫与欧米德冒着各种危险坐在他们前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一个副总统，一个司法部长——居然说自己无能为力。他们缺乏这些年轻人的勇气，而阿卜塔希居然敢说这些年轻人是懦夫。

「我们坐在三个政府部长前面，而他们却说他们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这实在让我们感到遗憾，」鲁兹贝赫回答道，「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知道我们一走出这栋建筑物，马上会有麻烦上门。」

「好的，好的，」委员会主席说道，「我们会聆听你们要说的事。」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鲁兹贝赫又说，「唯一重要的是你们是总统的亲信，只要总统能知道我们的经历，这样就够了。」

鲁兹贝赫首先说他的故事。索尔玛兹描述鲁兹贝赫监禁期间，她与莫塔札维会面的过程。他们播放了索尔玛兹要鲁兹贝赫录的音，证明讯问者在鲁兹贝赫获释后仍继续骚扰与强迫他。

司法部长不耐地打断鲁兹贝赫。鲁兹贝赫一直提到压力，

到底是什么意思？

欧米德要求索尔玛兹，现场唯一的女性，先离开房间。

「为什么你要我们描述压力是什么？」欧米德愤怒地质问司法部长，「你一直是讯问者！多年来你一直在情报部门工作。你是司法部长！你一直是监狱体系的头子。现在你说你不知道？你说谎！」

欧米德突然走到在椅子上睡着的教士身旁，大声把他叫醒。他开始重演他遭受的讯问，详细描述自己遭受的性虐待，殴打自己，把文件扔到委员会成员头上。他问道：「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讯问者是性变态，我们就要因此付出代价？就算他们跟伊拉克打过仗。为什么我们该因此付出代价？」

两个小时后，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心神不宁。当欧米德说话时，有些委员甚至哭了。阿卜塔希用手机捕捉了鲁兹贝赫与欧米德红着眼眶的照片。二十四小时内，阿卜塔希将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发布关于这场会议的贴文，而且将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证实「悔罪的」部落客已经推翻他们的供词。一夜之间，合作者变成了英雄，而最支持他们的就是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

但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对于鲁兹贝赫与欧米德参加委

员会会议浑然不知的莫塔札维，在另一场访谈中宣称，鲁兹贝赫等人会站在他这一边。这些「悔罪的」部落客将会更正大家对部落客案件的理解，这位检察长信心满满地解释。当鲁兹贝赫看到这篇访谈时，脸部的肌肉抽了几下。一旦莫塔札维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也许真的会杀了他们。

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欧米德那天下午出现在巴斯德街时，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就在那个星期，莫塔札维打电话给每个认识他们的人，留下指示要这三个年轻人自首。他把给鲁兹贝赫的传票交给为鲁兹贝赫保释的亲戚。他也留下讯息给鲁兹贝赫，提醒他在德黑兰不会有人注意到多发生了两起交通死亡事故。在拉什特的夏赫拉姆则收到警告，他的孩子的生命有危险。往后二十天的时间，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欧米德无家可归，他们白天在街头流浪，晚上未事先告知就出现在朋友家中，他们在任何地方待的时间仅供他们睡觉。但这些部落客已不再分歧：他们都不悔罪，鲁兹贝赫也不再被同侪拒于门外。

由于宪法观察委员会的关系，哈塔米向司法总监阿亚图拉沙赫鲁迪提到部落客的案子。沙赫鲁迪起初不认为莫塔札维会做出部落客指控的事。但哈塔米坚持必须调查此事。

沙赫鲁迪派了代表秘密听取这些部落客的报告。在夜色

掩护下，这些部落客在离埃温监狱不远的办公室与这名中间人会面。他们谈了五个小时，拿出他们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包括他们偷偷从监狱带出来的遮眼布。在听了代表的报告之后，沙赫鲁迪表示，他将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亲自与这些部落客见面。

夏赫拉姆从拉什特过来。大家选他担任报告的开场与结尾。他们被告知阿亚图拉只给他们一小时的时间，因为之后还有一场高层会议要开。在司法部的房间里，鲁兹贝赫对沙赫鲁迪表示，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莫塔札维做为沙赫鲁迪的下属，他的行动肯定获得司法总监的知情与认可。现在他才知道检察长通常是独立行事。但莫塔札维的行为反映了司法部恶劣的一面，沙赫鲁迪不应该让自己的名声被他们的行为玷污。鲁兹贝赫跟沙赫鲁迪谈到死亡威胁，他说莫塔札维曾经告诉他：「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国家有四分之一是我的。」

沙赫鲁迪轻声笑道：「幸好他有四分之一就满足了。」

当欧米德详细说到讯问时跟性有关的部分时，阿亚图拉似乎确实感到不安，嘴里有时低声说着「真主至大」。性的供词冒犯了身为虔诚者的他。即使部落客犯了这种罪，他们也不应该讯问细节，沙赫鲁迪解释说；讯问罪人罪行的细节，

本身就是一种罪。他也对于夏赫拉姆的孩子遭到威胁感到震惊。「喔!」他叫道,「我的下属真的做了这样的事吗?」沙赫鲁迪取消稍后的会议,与部落客谈了两小时而非仅一小时。然后他起身去做礼拜。

夏赫拉姆在沙赫鲁迪出去时拦住了他,他握着阿亚图拉的手。

「这场会面会有什么结果?」夏赫拉姆问道,「当我走出这扇门,很可能有另一辆黑色车窗的白色汽车等着我。我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再度把我带走?我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再写一封信,说我刚刚告诉你的事是个谎言?」

沙赫鲁迪接下来说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有人从任何地方打电话给你并传唤你而且说他们需要跟你讨论一些事情,不用遵从他们或响应他们,」阿亚图拉指示说,「只要告诉他们,你的案子正由某个令人尊敬的先生处理,他们必须遵循我的指示。」

「好好过你的日子,」司法总监对这名担惊受怕的年轻记者说道,「不要担心这些事。」

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欧米德终于回到自己的家。第二天,司法部宣布,部落客案子不再由检察长办公室处理,改

由三人委员会调查。最终，委员会洗清所有人的罪名，却未免除被检察长起诉的四人：鲁兹贝赫、欧米德、夏赫拉姆与贾瓦德。他们必须在法院结束他们的案件。在案子悬而未决的漫长期间，沙赫鲁迪指定处理这件案子的人贾马尔．卡里米－拉德车祸身亡，案子又回到检察长办公室。

但对欧米德来说，情况还是乐观的。部落客成功洗刷虚伪认罪的污名，而且将污名返还给莫塔札维。民众得知真相后激起广泛的愤怒。就他所知，这是伊朗历史上首次有司法部最高长官被迫与被告见面，聆听监狱体系中的各种虐待。

鲁兹贝赫恢复了自由之身，至少暂时如此，但却找不到工作。莫塔札维从中做梗。报社如果雇用鲁兹贝赫或索尔玛兹，哪怕只是担任自由撰稿人，都会面临停业的威胁。鲁兹贝赫的最后一个机会，来自于一个他在入狱前完全想不到的来源。梅赫迪．卡鲁比，这位曾经担任国会议长的教士为他的温和派改革运动设立报社。在被逮捕之前，鲁兹贝赫曾批评卡鲁比而且支持他在改革派派系内的对手。但索尔玛兹告诉他，在他坐牢的时候，卡鲁比曾给予协助与同情。现在，卡鲁比即将发行的报纸《国家信任报》的编辑雇用鲁兹贝赫到委员会中，协助构思报纸与建立编辑人员。《国家信任报》让鲁兹贝赫在这段紧张而艰难的时期找到了发挥精力的管道。

到了二〇〇五年六月，夏赫拉姆与欧米德都已悄无声息地离开伊朗。欧米德告诉鲁兹贝赫，他将到一座偏远城市进行一项计划。但事实上，三人中唯一拥有国际连结的欧米德则是经由伊斯坦堡一路前往美国。

夏赫拉姆只告诉鲁兹贝赫他要离开。他没有护照。他把自己的命交给了偷渡客，经由土耳其在伊朗边境的一座肮脏而焦虑的难民城镇前往加拿大；透过联合国难民署，申请过程可能——实际上也是如此——长达数年。这是让无法离开伊朗的人离开伊朗的方式。总有一天，他的三个孩子都将会说英语，也许甚至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但夏赫拉姆与碧塔却是格格不入。

在多伦多郊区，夏赫拉姆仍旧写诗，就像过去那样。他也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发文，为设在欧洲的波斯文网站写文章，谈在伊朗谁被逮捕与谁被杀害，谈一名大学教授性侵一名学生，谈在胡泽斯坦警察杀害十八名女性的时间。这种存在方式一点也不自然。有时，夏赫拉姆想象伊朗的水一直跟着他。当他在加拿大打开水龙头将玻璃杯盛满，从水龙头出来的水却是来自伊朗。他喝下这些水，又排出这些水。有时，夏赫拉姆想象自己是在火的加热下不断变大的气球，他体内的暖空气来自伊朗。他在凉爽的多伦多街头上下飘荡，街上的人单纯为了自己而工作而休息而生活，而他很快就会爆炸。

鲁兹贝赫继续在伊朗待了一年，直到二〇〇六年八月。他日后说，入狱前的他已经死了：一个新鲁兹贝赫取代了他的位子。有时候，新鲁兹贝赫依然让索尔玛兹操心。刑求者让他内心的光明变得黯淡，将他的精神载运到更远离外表的深处。但鲁兹贝赫在牢里也想了很多事。他了解伊朗的司法部就跟政府其他部门一样复杂且派系林立，在那里有良知的人与精神变态及充满权力欲的人龙蛇杂处。情报体制也是一样。鲁兹贝赫依然相信，开启伊朗未来的钥匙是诚实清算自己的过去。他批评改革派人士，因为他们回避这类讨论。

到了总统第二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鲁兹贝赫对哈塔米已不抱任何幻想。他相信，当哈塔米要求阿亚图拉沙赫鲁迪调查部落客案子时，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旁边的人强迫他这么做。对比之下，沙赫鲁迪是真的对他们的故事感到烦恼而着手进行纠正。但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这个案子使改革的力量变得更强了。不是总统个人能伸张正义，而是体制本身，前提是体制内的人员能拥有开放的心灵。而这样的发展——艰苦的、不可抵抗的、心理的与政治的——必须来自于社会。

如果鲁兹贝赫能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工作，他很可能会继续待在伊朗，即使知道自己仍将被判刑入狱。但拮据与压迫逼得他与索尔玛兹先是前往法国，然后转往美国。他们离开

德黑兰之前最后见的人是他们的老朋友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

二〇〇九年二月，德黑兰法院终于对部落客的一些指控判刑。夏赫拉姆判刑九个月与鞭刑二十下。欧米德判刑两年九十一天与鞭刑十下。鲁兹贝赫判刑两年与鞭刑八十四下。几年后，上诉法院放弃对他们的所有指控。然而为时已晚，早在他们被判刑之前，他们人已不在伊朗。

＊ ＊ ＊

(1)这里的伊玛目只是该清真寺的教长，不是历任什叶派领导人伊玛目。

第十三章　盖棺论定

藉由批评我们的理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代替我们死去。

——卡尔．波普尔，《框架的神话》

除去我们的观念，我们将仅存血肉之躯，我们将与任何其他动物与植物无异。这么说不对吗？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二〇〇八年访谈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六日，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与他的

随员费力地穿过拥挤的德黑兰大学科技学院大厅。学生们一直期盼总统在一年一度的学生日这天造访，这是纪念一九五〇年代初巴列维国王暴力镇压大学示威游行的日子。有些学生高唱学生运动歌曲来迎接总统的随行人员，有些学生则唱着国歌。但跟随官方代表来到典礼大厅的电视台摄影机却捕捉到不同的情绪。学生向摄影镜头举起手写的标语牌：

「哈塔米！言论自由怎么了？」

「伊朗国民厌恶专制主义！」

「八年了，学生们想得到响应。」

「我们将像蜡烛一样矗立，不惧火焰。」

典礼大厅太小了。学生们把外头的走廊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吼大叫敲打着大厅的门，直到他们的手流血为止。总统的随员将学生们击退。大厅里，总统结束演说，学生领袖一个接一个地抨击总统。哈塔米未能履行他承诺的改革。他允许当局关闭报社与暴力镇压学生抗争。

「哈塔米先生！」另一名发言的学生叫嚷着，「我们是否有必要努力了八年，最后才知道我们问题的根源居然是我们的精神已经被专制主义击溃？」一名年轻女性起身抗议许多学生从破晓就开始等待，却无法进到这个房间；她又说，走

廊的警卫「辱骂我，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

哈塔米日后表示，这个羞辱的场景恰恰证明伊朗已经走出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后的暴力镇压：集会的学生可以安心地当面批评总统，这种状况在他之前的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那天在德黑兰大学发生的事，几乎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好是坏，有些事确实没有做到，而总统只能无助地站着，观看这场混乱并与之争论。

被挥舞的标语与指控的口号包围——「哈塔米，你无视我们!」与「哈塔米，把我们的选票还来！哈塔米，叛徒，叛徒!」学生们高呼着——总统仍一如以往：做得太少，做得太晚。他冷静地解释礼堂太小。他告诉学生要「克制、聆听与包容」。终于，当大厅内外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完全掩盖了其他所有的讨论时，哈塔米找来安全人员。

「各位!」他无力地告诫，「麻烦快一点，不要再打学生了。」[1]

在演说中，哈塔米重提改革派的两难，但他的听众早已认定改革不过是空话。哈塔米肯定改革伊斯兰共和国是伊朗走向民主唯一真正的道路。政权必须保存。「为了民主、自由与不受外国控制，我把捍卫革命视为我个人的职责。」哈塔米说道。事实上，其他可行的方案并不存在。此外，他补充说：

「长时间持续的暴政是我们长期的痛，而治愈这个痛苦的药方就是人民统治。我们需要自由。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总统哈塔米自己曾经说过，从他上任以来，每九天就遭遇一场危机。不仅民选机构——总统与国会——受到权力更大的教士机构的监督，还有深层的暴力网络规避总统的掌握。到了二〇〇三年，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在希望与高度抽象下诞生的改革运动已然搁浅，因为反对势力远比改革理论家预想的来得顽强且无情。

从哈格尼圈子的强硬派教士，到被整肃的情报部人员，到德黑兰的检察长办公室，到真主党支持者这类民间武装性质的压力团体，乃至于被派去杀害扎伊尔德．哈贾瑞安的神秘小队，伊斯兰共和国充斥着这种在社会上运作的类似黑手党的网络组织。许多改革派人士发现，监督这些力量的人获得了高度支持而且相信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竞争者是符合正义的行为。这些人反对民主改革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基于深刻而无可超越的原则。

当改革派取得总统职位时，他们一直有个共通的信念，认为保守派愿意妥协而民选机构是可以取得的而且是可以促成改变的有效手段。改革派充满自信地认为——或许就是在这里犯了致命的错误——民众压倒性地支持他们。但改革

派选择要民众只当个选民。一九九七年，几乎所有的改革派人士都认为民众缺乏组织、具有激进倾向而且容易愤怒。街头抗争只会引发安全体制的强烈反弹。伊朗历四月十八日的事件加强了这层忧虑。因此改革派致力于开启言论与结社自由的窗口，让伊朗人开始成立市民机构。这么做最终有助于宣泄沉默大多数人的企图心，让民众的苦况可以被听见。

但到了二〇〇三年，改革派这项战术共识被粉碎了。保守派不愿妥协。与改革派不同，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不存在协商的政治过程。民众开始将他们的愤怒转向改革派，改革派在面对强硬派的压迫时往往表现得软弱与妥协。哈塔米与他的盟友该怎么做？

五名改革派杰出人士举行一场专题讨论。他们意见交换的文字纪录读起来像是存在主义剧作的最后一幕。五个人在迷宫中摸索着，最终却在一间上锁的房间找到彼此。每个人都提出了脱逃计划，但这些计划看起来崇高，实际上完全徒劳。就在他们说话的同时，墙变得愈来愈高，也密封得更严实，更加凸显出他们计划的无用。

这些思想家思考的问题是，哈塔米与他的盟友究竟该待在政府还是该离开政府——以及，无论是哪一种决定，其目的是什么。总统的第二任期大概还剩两年的时间，而总统的

专业智库，还陷于煎熬与麻痹、愤世嫉俗，以及不可能会改变的逻辑泥沼里。

其中一名发言者——记者、活动分子与前人质挟持者阿拔斯．阿卜迪——表示，既然他们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能，那么改革派就应该负起道德责任离开政府。其他四名思想家驳斥阿卜迪的说法。想象随后必然会出现的镇压！到时候将没有人可以保护人民，改革派取得的少数成果也将遭到推翻。

阿里雷札．阿拉维塔巴尔——改革派社会科学家，曾经是战略研究中心文化单位的主管——认为改革派应该孤注一掷。改革派应该针对他们关注的所有基本议题举行公民投票：去除宪法监护委员会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赦免政治犯，授权国会，掌控司法部，出版自由，除了以色列外，与所有国家关系正常化。改革派必须做好准备，如果公民投票遭到禁止，就应该辞职与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改革派真正的盟友在政治体制外，不在政治体制内：「民主的基础是和平对话，」阿拉维塔巴尔说道，「但对话的对象不包括法西斯主义者。」

但这是战争，其他理论家表示反对。使用这项策略，改革派绝对无法取胜。这么做只会疏远对手，使社会两极化，最终将产生一个强人来解决这场混乱。

前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认为伊朗菁英倾向于将政治视为零和游戏：有人赢就有人输，输家将完全遭到排除或遭遇更糟的状况。改革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允许政治对手分享权力，迫使统治体系包容多样性、批评与不同意见而不施加报复。塔吉札德赫认为，改革运动在追求目的的同时也重视手段：要实现合法、宽容与非暴力，就不能采取与这三者相反的手段。塔吉札德赫表示，问题在于伊朗强硬派并不接受这种交战守则。强硬派只要能采取强制手段，就不会尝试说服，强硬派也倾向于将批评者从公共领域中除去。

只要伊朗缺乏强大的市民社会或私部门，政府就成了伊朗唯一的政治行动领域，非政府部门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容易遭受暴力。塔吉札德赫认为，改革派撤退到政府以外的领域完全没有好处。他表示：「除非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法治，除非我们的民间机构已经获得授权，除非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限制，除非我们已经培养出有能力的公民，否则改革派仍必须掌控这个政府。」

因此，塔吉札德赫建议哈塔米仍应继续担任总统。他对选民负有责任。改革派应该继续努力实现目标。在此同时，改革派也该利用自己的民选职位来揭露与阻碍对手的暴力阴谋。

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将近三年前，一枚子弹打进他的颅底，他是社会科学家也是政治行动者，是分析家也是参与者。他在专题讨论里使用的语言虚无缥缈十分抽象，但他的野心却是平凡而世俗，彷佛他是个从事理论的物理学家，却在解释如何修理汽车引擎。当哈贾瑞安协助推动的运动开始质疑自身存在的目的时，他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家产制国家，是一种诉诸传统价值的专制政体，统治者掌握军队乃至于经济做为遂行个人意志的工具。

哈贾瑞安承认，他的由下而上施加压力，在顶层进行协商的战术失败了。他有些后悔：「我们应该创造希望与恐惧，我们应该同时争斗与妥协，我们应该与这些［教士］机构的领导者协商。而我们什么也没做。」但哈贾瑞安即使经历了这一切而个人也遭受伤害，他仍拒绝相信协商是不可能的。「我很坚定地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对手当中没有教条主义者，」哈贾瑞安说道，「如果我们对于他们的理性所做的假定是错的，那么就表示我们的伊朗历三月二日运动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上。」

哈塔米为伊朗带来的事物，哈贾瑞安称之为「二元主权」，意思是指在统治机制内部同时存在着两种彼此竞争的政治力量。哈塔米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果，与过去相比，整个体制已经变得较有活力且较能做出回应。问题出在体制的另一

面——神权政治——控制了治安部队。为了进行协商，改革派也需要权力。

改革派现在最佳的选择是坚定自己的信念，逼迫保守派将改革派驱逐出去。改革派的荣誉与效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哈贾瑞安表示，出走是一种开小差的行径。「就民众看来，这种行为显示了无能、恐惧、临阵脱逃、不稳定与放弃。」驱逐将使改革派取得上风：「驱逐将伴随着监禁、筛选与软禁，这将使改革派更为主动与有组织，反观出走只会造成消极的不作为。」

哈贾瑞安认为，这个策略将暴露出强硬派的不宽容，从而使强硬派失去正当性：「国家在出走政策下还可以存续，但驱逐国家的反对派——举例来说，透过政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生存。」[2]

总统哈塔米没有辞职。他没有举行公投，没有揭露强硬派的暴力网络，也没有逼迫保守派驱逐他。他做完第二个任期，遵守底线，到了卸任之时，支持者已大幅减少。

哈塔米肯定知道自己的支持度正在衰退。但由于新闻审查、政党几乎非法、民意调查因为监视与不信任而极不精确，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伊朗民众无足轻重。往后几年，民众对于哈塔米总统任期末尾的不满将被归因为经济萧条或政

治压抑，对改革感到不耐或反对改革，被西方孤立或受西方宰制，敌视西方或渴望西方。从二〇〇四年开始，选举结果也隐藏了一些谜团，因为候选人的获准参选愈来愈严格，而选民在政治选择上则愈来愈自我。

改革派掌握的第六届国会蹒跚地结束任期，这届国会在宪法监护委员会任意使用否决权之下陷入瘫痪。二〇〇二年九月，哈塔米引进了两项全面性的改革法案，将授予总统与民选国会更大的权力，同时缩减司法部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不意外地，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了这两项法案。持续的结构改革只能到此为止。

宪法监护委员会完成对国会的斗争。在第七届国会选举于二〇〇四年二月举行之前，委员会否决了超过两千名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在两百九十个席次中，改革派人士——包括八十七名现任议员——实质上被禁止竞选其中的两百席。在此之前，宪法监护委员会从未如此党同伐异地行使监督权。

国会改革派人士并未等待哈塔米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在三个星期的静坐抗议后，有一百二十五名议员辞职。他们在声明中把伊朗的宗教政府比拟成邻国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我们无法继续参与一个无法捍卫人民权利的国会。」他们表示。大约三十名省长与十二名内阁部长也递交辞呈。内政

部长宣布，他不会依照既定时程举办大选。就连谨言慎行的梅赫迪．卡鲁比也警告宪法监护委员会：「我们看到有几个老人想主导这个国家。」

但哈塔米无论怎么劝说都不愿表态。令许多顾问感到作呕与困惑的是，哈塔米退回部长与省长的辞呈，而且坚持在排定的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日举行大选。

批评者指责哈塔米为一场遭受操纵、实际上已经算是政变的选举的正当性背书。改革派想象伊朗选民会待在家里，但他们没有。全国的投票率低于上次国会大选，但整体仍相当可观，而且显然高于改革派所想象的在他们未参与选举下的可能投票率。在德黑兰，虽然投票率很低，但以伊斯兰伊朗建设者同盟自称且强烈支持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派系席卷全部三十席。国会落入保守派之手，哈塔米成了跛脚鸭。

哈塔米担任总统时，阿克巴尔．甘吉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牢里。讯问者常常对他说，只要说一句话就能重获自由：「我错了。」甘吉下了决心，就算要关他五十年，他也不说这句话。他毫不间断地忍受了六年，他日后回忆，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告诉自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他独自一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罪名负责。他不止一次因为绝

食抗议被送进医院，其中一次维持超过八十天。他的身体因此大不如前。

「这个体制的目标就是要瓦解与摧毁我，」甘吉在〈给自由世界的信〉中写道，这些信于二〇〇五年从埃温监狱流出，「我的身体处于完全衰弱的边缘，然而既然我相信自己的推测（我自己的意见），我就没有理由否定其中的真实。」他批评波普尔，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所有的推测都要经过证伪之剑的测试，这句话其实没什么意义。致力于『批判理性』，与『在监狱的强迫下放弃自己的信念』，两者不能相提并论。」[3]

甘吉首篇长度宛如一本书的〈共和国宣言〉于二〇〇二年从埃温监狱偷渡出去。在宣言中，甘吉与改革派完全决裂，他主张世俗的自由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宗教将不具有任何官方特权。含糊其词的改革派策略无法建立这样的国家——哈贾瑞安的「二元主权」也不可能。「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就是无法与共和国共存。

甘吉相信，伊朗政治思想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一九〇五年的立宪革命。这场运动迫使卡加王朝诸王在伊朗建立君主立宪国。然而这场运动其实应该废除君主制才对。若是如此，伊朗人或许就不会误以为可以从专制统治者身上获得一小

部分权力。二元主权、立宪主义——这些都是懈怠的托词，涣散了伊朗共和派的精力，使其无法真正对专制统治产生威胁。

与哈贾瑞安一样，甘吉也援引韦伯来对伊朗当前的政府形式进行分类。甘吉认为伊朗属于素檀主义[1]，是家产制的一种，但素檀主义仰赖的不是传统，而是专制统治者个人的裁量。这样的政权是无法改革的。甘吉认为，改革派应该停止与伊斯兰共和国合作，也不应该参与选举，因为选举只是伊斯兰共和国的遮羞布。改革派应该抵制选举，退出政府，利用人民的力量，透过公民不服从，反对不公正的法律与要求以公投决定伊朗的政府形式。甘吉要求与人民「肩并肩」来进行这场斗争。「如果公民不服从需要领袖与计划，那么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组织力的群体与领袖，」甘吉于二〇〇五年表示，「而不是以缺乏领袖为由而放弃这场争取自由的斗争。」[4] 甘吉指出，市民社会的建构，本身就是在一个法律上没有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国家里进行公民不服从。当中不存在折衷的可能。

甘吉是以一个已经被关在牢里，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人的立场来写作。甘吉写道，即使民众捍卫暴政或无视暴政，「热爱自由的民主人士仍然有权（不，是有责任）独自一人反对这样的体制」。有人说，他是在哗众取宠，他的作品是在

进行危险的煽动。但他没有看出细微差别的天赋，也没有政治生存的本领，因此难以对他人构成影响。甘吉拥有的只有勇气，而且是令人屏息的勇气。

「我完全不相信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理论，我认为它是反民主的而且违背人权，」甘吉写道，「我无法忍受主奴关系，最高领袖上升到神的位阶，而民众下降到奴隶的层次。我要代替哈梅内伊先生向学生、记者、部落客……、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家人、札赫拉．卡泽米的家人……，这些年承受的一切道歉。」他又说，「我要代替哈梅内伊先生向一九八八年夏天在全国各地遭到处决的犯人家人致上深刻的歉意。」休假期间，甘吉与部落客见面，他写道：「逼迫犯人写悔罪信，这是伊朗斯大林主义者从斯大林的讯问者那里继承来的方法。」[5]

甘吉写作时往往引用许多说法：哈菲兹[(2)]、莫塔哈里与苏格拉底，佛洛伊德、傅柯与阿多诺，托克维尔[(3)]、罗尔斯[(4)]与洛克，理察．罗蒂[(5)]、米兰．昆德拉、克洛德[(6)]．勒佛，乃至于当代的欧洲学者，如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弗兰科．莫雷蒂与英国社会理论家戴维．比森。他逐渐远离他的革命根源，他日后描述，这个革命根源发端于他儿时在德黑兰南部贫民窟生活的阶级仇恨土壤里。二〇〇五年，甘吉认为保守派的社会正义说词不过是用来掩盖压迫的外衣。一个人在主张社

会正义的同时，怎么可能也主张人类存在着不平等的阶级，例如男人与女人、教士与俗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如果伊朗统治者只容许在财富分配上追求正义，那么他们理应允许新闻自由来揭露伊朗阻碍经济公平的贪污腐败。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至于总统哈塔米，他一直是从事改革工作的错误人选。「他不具备改革精神。」甘吉日后回忆说。哈塔米不是很清楚市民社会是什么，甚至也不知民主为何物。所以难怪他无法坚持。「我们需要像甘地、哈维尔、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物，」甘吉坚持说，「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甘地。」

明确反对宪政秩序的不是只有甘吉而已。学生运动的激进派也要求针对伊斯兰共和国举行公投，用来呼应一九七九年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那场公投。活动分子发起在线请愿，而且以取得六百万份联署书的特大号野心来命名。

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形容这场公投运动纯属妄想。激进派凭什么想象自己可以将公投强加在保守派身上？此外，激进派的策略建立在一个假定上，那就是「民众」不仅想建立世俗的共和国，也愿意为了建立世俗共和国而让自己暴露在暴力之下。但伊朗社会是多样的、分裂的与受过创伤的。如

欧米德．梅玛瑞安日后说的，领先民众一步将成为领袖，领先民众五步将孤独一人。

欧米德反思说，甘吉讲的事，每个人都知道；但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直接把事情说清楚就能有帮助。哈塔米的含糊其词可以当成软弱，也可以认为是政治上的机敏。哈塔米统治着一个分裂而彼此不信任的国家，国家的长期稳定仰赖缓和紧张；此外，哈塔米的对手掌握所有的强制工具。像欧米德．梅玛瑞安这样的人，在改革时期建立脆弱的新机构，鼓励伊朗民众相互合作，他们觉得一旦激化政治气氛与惹恼保守派人士，将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在哈塔米第二个任期开始运作。这些组织的创立者的目标不在于赢得一场观念的战争，而是说服所有党派放下武器追求共同的建设性目标。

非政府组织网络将像先前的改革派媒体那样，被政权内部的政治战争所摧毁。二〇〇四年国会大选之后，强硬派报刊开始宣传这些市民团体是外国阴谋改变政权的施力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宇宙报》刊出社论〈蜘蛛的房屋〉，而其他与安全体制接近的媒体也开始暗示非政府组织与西方政府和基金会有关，认为他们想依照塞尔维亚模式来改变伊朗的政权。活动分子抗议说，他们已经努力拒绝外界的资助，也曾要求美国记者转达，希望小布什政府公开表示停止支持

伊朗的市民社会。但在伊朗政治体系内部，留下来的人完全没有非政府组织网络的支持者。改革派已经完全从国会与德黑兰市议会消失，学生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改革以外的地方，媒体逐渐受到审查，国际压力产生了反效果，哈塔米则慢慢淡出。

二〇〇五年大选前夕，改革派菁英依然高喊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毕竟，改革派的计划不只是政治运动或政治提议；它也是思想的转变、民众的风潮与文化的分水岭。这一切可以说是真的。但如同欧米德懊悔地指出的，许多改革的具体成果也确实遭到逆转：制度建立又废除，民选官员取得又失去，报纸刊载又受到审查。也许改革派理论家需要这种愿景式的乐观主义才能让他们专注于遥远的前景。也许，这是一种傲慢或逃避现实——拒绝反省自己为什么全盘皆输。

《地平线》持续发行，直到哈塔米第一个任期快结束为止。如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设想的，《地平线》一直是一个思想泉源，而不是政治喉舌。《地平线》的两名创立者离开《地平线》后创立了一个受欢迎的改革派日报，他们把在《地平线》培养的感性带到哈塔米短暂改变的媒体地貌上。索鲁什的追随者之一，一个名叫易卜拉欣．索尔塔尼的年轻人，他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加入《地平线》圈子，当时他是个对哲学怀抱热情的医学系学生，后来成为《地平线》的主编。

索尔塔尼的《地平线》持续将索鲁什的文章与访谈放在头版。其他的页面则是伊朗学者翻译与辩论的外国哲学家作品，针对自由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互动进行讨论，此外也讨论拉丁美洲文学与诗。一如索鲁什对科学的看法，或许《地平线》的编辑与撰稿人也这么看待他们的报纸涉及的领域：哲学是狂野的，哲学没有祖国。他们眼前的工作不是透过追索他们观念的起源来主张国家的认同，而是打造一个符合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家认同的自由国家理论。

二〇〇〇年秋天，索尔塔尼与同事收到司法部的信函，命令他们停止发行《地平线》。这道命令让索尔塔尼措手不及。过去几个月，没有人阻碍刊物的发行；索尔塔尼才刚出刊十到十一月号的第五十四期，里面有索鲁什谈科学与政治发展、约翰．基恩谈媒体与民主的文章翻译，以及其他谈苏格拉底与黑格尔的文章。而这一期却成了改革运动旗舰刊物的最后一期。尽管《地平线》尽可能不卷入政治争论，但最终还是走上与其他改革派报刊同样的命运。

《地平线》的领导人物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并未流亡，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他在伊朗不能发表文章也不能教书，无论到哪里演讲都受到干扰。大约从二〇〇〇年开始，索鲁什连续换了几所大学的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空空如也，办公室门上没有名牌，书架上只有书档没有书，公文包里也

只有一个晚上的换洗衣物，让他可以轻易打包走人。他曾分别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与乔治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有时人在德国，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会在华府国会图书馆如迷宫般的走廊上看到他。这种四处游走的生活似乎很适合他。随着年纪渐长，索鲁什变得平静、孤独，而且也不那么好斗。

索鲁什又重读马克思，在面对这个德国巨擘时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产生智性上的敌视。而在面对他曾以波普尔的说法加以嘲弄的马克思主义时，这是他第一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影响与解释力感到由衷敬畏。「我想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些不公允。」索鲁什坦承说。他现在了解，承认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不表示贬低了理性。更确切地说，这些力量的行为模式与佛洛伊德的潜意识行为模式一样。「可以这么说，你会因为周遭的某种社会与经济因素引导你倾向于理性，某种利益会驱使着你，把某些话语放在你的舌头上，把某些思想放在你的心灵里。」索鲁斯反思道。或许，他的心灵也存在着某种奇妙的生命旅程。

但索鲁什仍认为，做为政治解放的处方，马克思主义失败了。一直受人渴求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在伊朗未能实现，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无法实现。索鲁什猜想，伊朗许多改革派心里一定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深具吸引力，而

且能与伊斯兰教义兼容。「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让社会主义与社会自由、民主等事物兼容。」

索鲁什批评哈塔米担任总统的表现。二〇〇三年七月，他发表一封公开信，评论总统正站在交叉路口上。「他要么与民众站在同一阵线，要么与保守派合作，但无论加入哪一边，他都是输家，」索鲁什写道，「他不可能加入人民，因为人民要求的不是如改革派所想的对现存的神权政治进行改革，而是朝着成熟的民主与世俗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也无法加入保守派，因为他们认为哈塔米是一条用过的手帕。」

索鲁什认为，哈塔米必须坦承，面对强硬派的民间武力团体，他无法真正治理这个国家。改革派必须揭露这些民间武力团体赖以运作的资金来源与指挥链，他们必须让这些民间武力团体受到约束。至于学生，索鲁什猜测学生们肯定士气低落，因为他们从未被赋予应有的权利，而袭击他们的人也未受到司法应有的制裁。这些怨言都是有凭有据。

索鲁什坚信观念具有道德与实践的力量，他认为哈塔米在行动上的优柔寡断源自于他在思想上的犹豫不决。他认为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缺乏理论的愿景，导致缺乏行动的勇气」。结果，「他有时采取这种做法，有时又采取别的做法。他会提出某个观念，其他人会追随他，但之后他又会突然急

踩刹车。他会收回成命，突然中止一切，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6]。

索鲁什担心哈塔米的表现将给还有一线生机的思想计划带来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理论的辩论，正如我们需要制度的建立与政治行动一样。」索鲁什表示。透过辩论而产生的共识，将是出类拔萃的共识。改革派的企图心是民主与政治世俗，这种世俗主义，索鲁什将其定义为国家应对宗教保持中立，政治体系的正当性并非来自于神，而是仰赖制度本身的公义。

索鲁什比他的改革运动追随者更强调民主不只是自决或自由，而是一种权利。「所有重要的现代政治制度都建立在权利之上，」索鲁什认为，「如果我们想达成政治的现代性，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路径。如果我们看重权利概念的程度仍不及家庭与荣誉，那么我们的现代体制将缺乏意义；它们将徒具空名。」[7]权利来自于强大的、保护的、独立的司法制度。这是索鲁什在英国留学时看到的。他现在认为，独立的司法制度比市民社会更为重要；司法制度应该成为哈塔米首要且最不能妥协的目标。

索鲁什的愿景虽然大胆而不妥协，却不像他的好朋友与追随者甘吉那样是个政治激进分子。他依然是那个下层中产

阶级男孩，当有人找他加入游击队战士时，他会拒绝，而且表示社会也需要哲学家。他知道伊朗是个虔诚而保守的地方，但也觉得自己与这个地方构成一个整体。如果他能自由为伊朗选择统治者，他会选择虔诚的统治者，尽管他们统治的不一定是个神权国家。

与许多伊朗思想家一样，索鲁什也反复思索伊朗面临的一个经典的两难处境——如此地经典，以至于成了一种陈腔滥调：伊朗是个永远遭传统与现代性撕裂的国家。索鲁什认为，把传统说成是一件可保存或可丢弃的事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传统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上千件事物。把现代性当成一个可建构或可拒绝的状态也同样毫无意义：现代性同样也是多样的，或许更重要的是，现代性与其说是经由计划或选择产生，不如说是人类持续努力下意外产生的结果。

「我们既不现代，也不传统，」索鲁什表示，「我们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我们只是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彷佛身处于黑暗一般。有时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时则什么都看不见。」对索鲁什来说，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况并不需要哀叹。相反地，它可以激发出动力。或许，在过去的某个时代，伊朗人曾经生活在一个哲学与伦理、科学、政治兼容并存的世界里。「如今我们并不处于那样的均衡状态。我们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失去了过去的和谐，而未来的和谐亦尚未获

致。」

二〇〇五年五月，前总统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似乎即将取代哈塔米成为下任总统。多年来，改革派总是处处针对拉夫桑贾尼。改革派认为拉夫桑贾尼涉及连环谋杀案，造成经济腐败与不平等，而且其统治时期采取了比改革派主政时期更为高压的手段。此外，改革派也畏惧拉夫桑贾尼的实用主义。与真正的保守派不同，拉夫桑贾尼知道如何打开压力阀门——让民众获得肤浅的自由，例如稍微放松服装的规定——以及如何向外界展现出温和的形象。但是，与真正的改革派不同，拉夫桑贾尼完全无意让政权民主化。

拉夫桑贾尼的竞选活动充斥着来路不明的资金，闪耀着华而不实、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拉夫桑贾尼阵营印制大量浮夸的贴纸与海报，总部挤满穿着闪亮凉鞋与戴着窄小头巾浓妆艳抹的女性，年轻人争抢打工的机会，把竞选广告丢进正在等红绿灯的车子车窗内，种种安排使拉夫桑贾尼阵营呈现出年轻朝气的样貌。竞选海报也不同于以往：在他小小的眼睛下方，并没有蓄留任何胡须，这位脸庞圆胖的阿亚图拉微笑着，但紧绷而阴郁的笑容并未激起喜悦的情绪。

拉夫桑贾尼有着近乎神话的幕后影响力，他是个愤世嫉俗且不愿表态的候选人。他的竞选大会挤满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他们可能是受到节庆气氛的吸引，也可能心里想着，无论自己想做什么，总是要交给最有力量的人，才更有可能实现。社会学家与新闻记者埃玛德丁．巴吉解释说：「民众是这么判断的：哈塔米是好人，但软弱。拉夫桑贾尼不是好人，但强大。」

改革派对于是否该推出候选人莫衷一是，更甭说决定候选人是谁。所以到最后他们推出了三个候选人：梅赫迪．卡鲁比，这位民粹主义教士仍相信可以跟保守派协商，他的立场最接近中间派，他吸引的是曾经投票支持哈塔米的传统中等收入选民；卡鲁比的主要竞选承诺是全国每人发放五十美元现金。穆斯塔法．莫因是无特定色彩的前教育部长，与学生立场接近，代表世俗的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参选；莫因争取改革运动中偏向现代、都市与知识分子的选民支持，而且采取塔吉札德赫在二〇〇三年专题讨论时提出的策略，利用政府的地位，采取某种内部的行动主义。第三位候选人是穆赫辛．梅赫拉里札德赫，仅在北部省分知名，他的出现使改革派的选票更加分散。

对于拉夫桑贾尼的右翼来说，战场也同样拥挤：受欢迎的保守派候选人穆罕默德．巴格尔．卡里巴夫是伊朗的警察

首长，这位革命卫队成员宣称自己是现代保守派，知道年轻人关切什么，也通晓现代科技；穿着紫色外套看起来像是恶棍的竞选人员骑着摩托车在德黑兰大街小巷为阿里．拉里贾尼竞选，他是国家媒体与文化机构里的强硬派人物；知名度不高的德黑兰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大选中最大的黑马，他紧追在其他两名保守派候选人之后，而其他两名保守派候选人又紧追在中间派前总统之后。没有任何政治协会或报纸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

学生领袖甘吉与其他一些改革派人士要求抵制这场总统大选。鉴于国会发生的事，已没有理由让一个决心驱逐忠诚反对派的政权取得民意的正当性。就连一些公开反对抵制的改革派人士私底下也承认他们自己不会去投票。哈塔米任内的表现使他们不再乐观，而且也暴露了政权内部的僵化。此外，没有任何一名改革派候选人能激起他们的热情。

最后，受抵制与冷漠伤害最大的是莫因，因为他的选民最容易响应不合作的激进号召。出乎许多改革派人士的意料，索鲁什支持卡鲁比，尽管他与莫因有私交而且思想上也较为接近。索鲁什认为，卡鲁比与伊朗社会的特质较为相符，而且较能担负起这个历史时刻赋予他的角色。此外，索鲁什也欣赏他观察到的卡鲁比的行事作风，特别是「他能提供思想家与学者相对自由的风气」[8]。

拉夫桑贾尼在六月十七日的第一轮投票以百分之二十一的票数轻松取得领先。改革派在抵制之下依然拿到约百分之三十五的票数。然而这些票数还要分配给三名候选人，这三人已经没有胜选的可能。卡鲁比拿到百分之十七点二，莫因百分之十三点八，梅赫拉里札德赫百分之四点四；光是梅赫拉里札德赫拿到的比例就足以让卡鲁比打进第二轮与拉夫桑贾尼一较高下。然而拉夫桑贾尼将在右翼遭遇意料之外的挑战者。大选前夕，最高领袖从原本支持卡里巴夫转而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以百分之十九点四的票数稍微落后拉夫桑贾尼。在德黑兰，改革派选民的抵制最为明显，艾哈迈迪内贾德甚至在第一轮领先拉夫桑贾尼约二十万票，而改革派则是远远落后于他们两人的全国总票数[9]。

梅赫迪．卡鲁比高喊选举舞弊。他曾公开宣称，当他在十八日清晨五点睡觉时，他还排名第二，两个小时后醒来，就掉到第三。事实上，事件的发展比卡鲁比说的更加离奇。在某个时点，内政部与宪法监护委员会同时发布了部分计票信息，两者相差了六百万票。内政部宣称已计入一千五百万票，卡鲁比排名第二；但宪法监护委员会却宣称已计入二千一百万票，艾哈迈迪内贾德排名第二。

卡鲁比发表公开信表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得票比例遭到灌水。刊载公开信的报纸被禁止流通。卡鲁比辞去所有政

治职位，包括最高领袖的顾问一职，而最高领袖指控他「毒害风气」。更令人惊讶的是拉夫桑贾尼，这位稳居首位的候选人居然表示有人进行「一场有组织的选举干预」，并且认为巴斯基与革命卫队利用尚未注销的六百万份死者的出生证明硬是将艾哈迈迪内贾德拱上第二位。

因缘际会之下，艾哈迈迪内贾德成为拉夫桑贾尼巧妙的陪衬。拉夫桑贾尼这位年迈的阿亚图拉是个近乎无懈可击的政治局内人，他十分富有，除了扩大了经济的不平等，也是著名的阴谋家与心口不一之人。至于说到政治局外人，则非艾哈迈迪内贾德莫属。这位德黑兰市长是个直言不讳的一般人，是下层中产阶级农村移民之子，是经济民粹主义者，会说出把国家的石油收入送到人民厨房餐桌上这样天真而简单的话。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社会保守主义缓和了传统选民的焦虑，就连他不是教士这件事也能讨好忧虑神权统治的民众。这位市长的脸看起来其貌不扬且饱经沧桑，比例上也带有某种喜感：滑稽的笑容，旁分的发型像极了俯冲而下的翅膀，激动的时候，眉毛几乎可以垂直扬起。不整齐的胡子与长年穿着的风衣，使他成了都市菁英眼中的粗鲁之人与乡巴佬，然而这样的印象却掩饰不了他深邃眼神透露的精明聪慧。

与之前的哈塔米一样，艾哈迈迪内贾德可以动用德黑兰市府的财库做为他的竞选基金，同时也跟哈塔米一样，他精

心设计了一场竞选活动，即使不是用在第一轮，那么也必定会在第二轮发挥。第一轮到第二轮之间隔了一个星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廉价竞选广告在这段时间持续在电视台播放。影片中，艾哈迈迪内贾德开着他的一九七七年宝狮，然后画面持续停留在他位于德黑兰南部的小屋子里，即使他当了市长，也依然住在这里。广告还以巴列维国王时代奢华的市长宅邸照片做为对照。旁白告诫说，贪婪必须从政府官员中清除。「当有这么多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多？」搭配上一九六〇年西部片《豪勇七蛟龙》的主题曲，旁白提到了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童年。市长没有钱，他必须自己想游戏与制作玩具。「青年是什么？」旁白问道，「青年是纯洁、勇气、牺牲与服务他人。」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传单列出他的对手可能认为他不应该担任总统的五个理由：首先，他的衣服不像他的安全人员穿的那样昂贵。其次，他从不用公务车来参加儿子朋友的生日。第三，他在市议会开会的时候，不是由他说两个小时的话，而是他坐下来听人家讲七个小时的话。第四，与前任市长不同，他不抽烟斗或搭乘昂贵的防弹汽车。第五，与其将税金交给忠诚者，他宁可分给年轻人协助他们成家。

改革派对于这种来自右翼的民粹主义攻击毫无准备。有些改革派分子在半强迫之下转而支持拉夫桑贾尼，要求支持

者把票投给他。但这种支持只能说是心不甘情不愿。第二轮投票前一晚，一张海报上写着：「我们是莫因的支持者，因为我们不想落入巴斯基的手里，所以请把票投给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就连拉夫桑贾尼阵营也采取嘲讽的战术。一些年轻竞选人员高唱他们的候选人是「DJ 阿里．阿克巴尔」来刺激艾哈迈迪内贾德阵营。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德黑兰街头充满兴奋的情绪，但整个气氛却逐渐从节庆转变成紧张。各种竞选工具，从海报与保险杆贴纸到 CD，如雨点般从道路两旁撒向行驶经过的车辆。在第一轮较少出现的年轻留胡子男性，在这个时刻为艾哈迈迪内贾德阵营在城市里占得大片区块；他们看起来认真而严肃，特别是与拉夫桑贾尼阵营略带嘲讽的作风相比格外明显。十字路口站满了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人。

艾哈迈迪内贾德阵营的年轻选民与志工，许多人在四年前曾投票给哈塔米。他们是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年轻男女，有些人曾支持哈塔米的号召，寻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但他们觉得在改革派主政的八年期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他们想象艾哈迈迪内贾德这样一个不裹头巾的一般人更能了解他们的经济问题。而就改革并未给予他们任何足以改善生活的自由来看，他们并不担心艾哈迈迪内贾德会从他们身上夺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四日，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八月，他任命的内阁清楚显示他的意图。他从极端强硬派的哈格尼圈子教士挑选部长人选，甘吉过去曾经提到，他认为哈格尼圈子与连环谋杀案有关。曾经审判德黑兰市长卡尔巴斯希案子的法官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被任命为情报部长。新任内政部长穆斯塔法．普尔－穆罕默迪曾经在一九八八年监狱屠杀时服务于三人委员会，负责签发处决犯人的命令。另一方面，德黑兰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很快就以艾哈迈迪内贾德最亲密的伙伴与政治盟友的身分出现。

选后，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如丧考妣地为这个令他失望且难以饶恕的亲人整理个人遗物。就他看来，改革运动已经死了。有时他甚至觉得，改革运动早该死了。

对鲁兹贝赫而言，哈塔米具体呈现了改革运动的承诺与失败，因此，当他看到总统于七月三十日卸任时，心中也产生痛苦的矛盾情绪。他在部落格里写道：「我只为哈塔米先生感到悲伤，他曾经掌握的一切，绝大多数都将烟消云散。」后来，鲁兹贝赫质疑自己的悲伤。哈塔米举行一场典礼庆祝自己回归私人生活。在典礼上，他被问到阿克巴尔．甘吉。「甘吉自己的问题比较大。」哈塔米说，他把甘吉监禁的延长归咎于他拒绝闭嘴。

鲁兹贝赫写道:「坦白说，不久之前，我想写信给他，我是在他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写的，我感谢他而且让他知道我有多么赞赏他在总统任内持续做出的贡献。这封信我准备了一段时间，但哈塔米对甘吉表达的立场使我打消了寄信的念头。」

鲁兹贝赫写道，当他重读这封信时，他感到沮丧。「然而，当我们喊叫的时候，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做点什么!』我们得到的只有他的沉默……。无论如何，现在依然是如此，我们必须坐下来，带着恐惧与永无止尽的希望，期盼未来的重聚。」

「惭愧的是，我必须对那些支持改革派，甚至在梦境里也努力支持的人说，下一次大选，你们恐怕连海报都不能贴。」

＊＊＊

(1)素檀为突厥领导人的意思，可直译为君主。此处原文是sultanism，可解释为君主主导国家的「君主主义」。

(2)哈菲兹（Hafez）十四世纪波斯著名诗人。

(3)托克维尔（Tocqueville，一八〇五至一八五九），法国思想家、政治家。致力于探讨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以《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闻名于世。

(4)罗尔斯（Rawls，一九二一至二〇〇二）美国政治哲学家，在其名著《正义论》中使用社会契约论的概念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此理论被称为公平即正义。

(5)理察．罗蒂（Richard Rorty，一九三一至二〇〇七），美国重要哲学家，提出实用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以真、善、美、理性作为万事万物本质的追求，改以思索某个文化中的人是如何生活与思考。

(6)克洛德．勒佛（Claude Lefort，一九二四至二〇一〇），法国政治哲学家、社会运动家，对民主与极权政治的研究可与汉纳．鄂兰比肩。

第四部　反抗

第十四章　普通人

伊朗从未有过像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这样的政治人物[1]。伊朗过去遭受君主制与博学教士、贵族与学者的父权式管理，就连穆罕默德．穆沙迪克的统治也是贵族式的。无论他们谈的是社会正义、国家尊严或市民社会，全是从菁英的角度出发。艾哈迈迪内贾德则非如此；他是个普通人，也是个煽动家。整个国家的反应如同喝了某种新的烈酒——有

时欢欣鼓舞，有时心存怀疑，彷佛看到一个平时稳重的亲人脚步不稳地离开餐桌。

艾哈迈迪内贾德巡视全国，两年内造访了约两千座城镇；几乎可以说他是对着欢迎他的群众撒钱。他当场承诺会以联邦基金推动某座城镇的宠物计划或满足最明显的需求，并且赢得如雷的掌声。他就像是游戏节目主持人或信仰治疗师。他创造奇迹；他慷慨捐赠，为平民百姓赐福。他长久停驻一地，想感受民众热切的眼神。跟在身后的国家官员手忙脚乱，努力挤出预算与违反规定，才不至于让他燃起的希望落空。

为了履行总统冲动做出的承诺，必须掠夺国家的石油稳定基金，这是哈塔米政府设立，用来在油价下跌时维持国家经济的措施。有时，总统还会径自下令银行发行更多的通货。艾哈迈迪内贾德既没有愿景也不回顾过去。石油价格高涨，因此（他如此相信）偏远民众都喜爱他。

有人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与伊朗的偏远地区有着关连性，尤其国际新闻媒体与德黑兰上层阶级有这种想法。然而艾哈迈迪内贾德完全是首都的产物。艾哈迈迪内贾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他是巴列维国王时代迁入德黑兰的数百万农村移民之一。艾哈迈迪内贾德还在襁褓中，他的家人便从一个名叫阿拉丹的村子搬到德黑兰。他的父亲是个铁匠，在经济较

多元的东部地方纳尔马克打造铁门。令艾哈迈迪内贾德耿耿于怀的恐怕是他这个背景的男性常见的某项特征：国内移民，这些伊朗人从未真的见识过村落生活，却吸收了父母对城市的疏离感，但实际上城市却是他们成长茁壮的地方。

艾哈迈迪内贾德个子矮小，身材瘦而结实，个性骄傲自信，他年轻时的照片几乎每一张下巴都微微上扬，彷佛随时准备好要闪躲拳头。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念大学的时候知道了沙里亚蒂——他在离家很近的纳尔马克科学与工业大学攻读工程，他日后将以自己对沙里亚蒂对社会正义的激进号召所做的诠释投入政治事业。但与许多沙里亚蒂追随者不同的是，艾哈迈迪内贾德转向伊斯兰右翼而非左翼。与索鲁什一样，他受到霍甲提耶赫这个右翼反巴哈伊教团体的吸引。艾哈迈迪内贾德若不是科学与工业大学的创办人，那就是伊斯兰社团的早期成员，这个团体也跟索鲁什一样，致力于以伊斯兰教对抗马克思主义。

革命后，艾哈迈迪内贾德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他加入委员会整肃大学的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团体。早在阿里．阿夫夏里之前，艾哈迈迪内贾德已经是巩固统一办公室全国学生会议的成员。但当学生们攻占美国大使馆时，艾哈迈迪内贾德却退却了。挟持人质的人来自伊斯兰左翼，而艾哈迈迪内贾德来自右翼：根据一些说法，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学生如

果要占领美国大使馆，那么也应该占领苏联大使馆。而根据另一些说法，他认为占领大使馆将导致违法乱纪的状态出现[2]。无论如何，对于一名深具野心的年轻革命分子来说，他丧失了占领大使馆这个良机。人质挟持者一跃成为伊朗永久的政治阶级，艾哈迈迪内贾德则必须花费很大的努力才能爬升到那个阶级。

年轻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到西部发展。他的革命伙伴告诉他，伊朗西部边疆地区省分有他可以担任的政治职位，当时他才二十四岁，他要负责协助镇压库德族叛乱与约束种族多元的边疆地区服从愈来愈高压的中央政府。一九九三年，他成为大小适中、种族多半是阿塞拜疆族的阿尔达比勒省省长。他是个不得人心的省长——一个德黑兰人，他的首要选择应该是阿尔达比勒省以东的地区。艾哈迈迪内贾德利用职位之便与纳提格－努里角逐总统，而纳提格－努里是一九九七年总统大选时哈塔米的保守派对手，日后艾哈迈迪内贾德因为涉嫌挪用地方公款竞选总统而遭到调查。哈塔米掌权之后，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清理门户，撤换所有旧省长，以改革派人士代替。艾哈迈迪内贾德永远不会忘记塔吉札德赫做的这件事。

当艾哈迈迪内贾德回到德黑兰时，他肯定觉得改革派夺走了一切。一九九九年，他竞选市议员落选；二〇〇〇年，

竞选国会议员也落选。根据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艾哈迈迪内贾德在那段时间积极反对哈塔米，甚至成了真主党支持者私下集会的固定讲者[3]。但直到二〇〇三年保守党派系伊斯兰伊朗建设者同盟在城市选举获胜之后，艾哈迈迪内贾德才得以重振雄风。

与改革派一样，建设者同盟也是革命之子。巴斯基、革命卫队、强硬派神学院与其他革命机构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足以让他们产生一批对政治充满渴望的新阶级。这些年轻男女沉浸于早期革命时代的说词，对于统治的复杂一无所知。他们说着过去的语言，对于尚未尝试的事跃跃欲试。他们不仅反对改革派的融合主义与不虔诚，也反对右翼志得意满的父权主义。他们拥护艾哈迈迪内贾德，使他成为这座被他称为家乡之充满生气、艰困且人满为患的城市的市长。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德黑兰市成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心头大患。无论意外与否，这座城市的基础运作模式并未改变。先前，当卡尔巴斯希让一切开始运作时——密度贩卖、过度建设、营建业与房地产炒作的赌局，所有的状况似乎都表现出拉夫桑贾尼派系的心态：以效率与成长为名，从事不透明乃至于有些无情的作为。改革派虽然大谈人民参与和政治发展，主政时也无法以更透明或更公平的做法来取代卡尔巴斯

希的体制，改革派失败了，充分反映出他们的无效率与高谈阔论。现在轮到艾哈迈迪内贾德上任，一个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强硬保守派，一个拒绝入住市长官邸而只让自己住在卡尔巴斯希过去豪宅官邸的秘书房里的普通人。但艾哈迈迪内贾德也延续德黑兰的密度贩卖政策。

跟过去一样，城市计划者请求市长停止贩卖建筑许可。德黑兰人口即将超过九百万，将对地震安全与饮水供给造成严重问题。艾哈迈迪内贾德拒绝。「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建设，」一名城市计划者回忆艾哈迈迪内贾德对市议会这么说，「你们能想象没有建设的德黑兰吗？德黑兰还会是一座活着的城市吗？」只开了一场会议，艾哈迈迪内贾德便大笔一挥，把计划者的报告揉成一团废纸丢进垃圾桶，并且将德黑兰的密度增加了百分之十，超过过去两年计划者审慎协商的标准。

艾哈迈迪内贾德接受的是交通工程师的训练，我们可以说最终他在市长任内最持久的成就是铺设方便车辆回转的避车道。尽管如此，他却倾尽全力设法让大家能牢记他的名字，例如他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对两伊战争殉难者的崇敬，以及重视他出身的传统下层阶级的价值。他对民众表示，他要把两伊战争死者的遗骸埋葬在德黑兰的公共广场。德黑兰将成为两伊战争殉难者的纪念碑。当德黑兰市民群起

反对，认为这个做法过于可怕而且只是一种操作手法时，艾哈迈迪内贾德便把坟墓迁到大学校园与公园。

艾哈迈迪内贾德对于卡尔巴斯希设立的文化中心的表演节目加以限制并且增加伊斯兰的内容，他宣布他的首要目标是增加对邻里宗教团体、清真寺与巴斯基的补助。他为贫困的邻里重铺街道，却对富有的邻里置之不理，他在城市管理与革命卫队之间营造紧密的关系。但这些作为并未让艾哈迈迪内贾德成为伊朗民众眼中的英雄或恶棍，当然任何人也想象不到他日后会成为总统。日后只有一种特色可以用来形容这两年的德黑兰市政生活——无礼而轻慢地看待专家知识，但善于玩弄象征政治。

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痛恨经济学家，他们小气而令人扫兴，总是找理由不让民众开心。「这些人会直接说出我们的决定提高了民众的预期，然而这些决定不符合经济学的科学，」艾哈迈迪内贾德抱怨说，「如果你们的经济学无法协助满足民众正当的需求，那么我们会痛恨你们的经济学！」[4]

当这位伊朗的新总统承诺将石油收入带到民众的餐桌与改善伊朗下层阶级的命运时，他并不打算透过经济计划或任何结构变革来改善伊朗的财富分配方式。更确切地说，他的想法是直接发钱。艾哈迈迪内贾德解散了「管理与计划组

织」，该组织是经济学家在政府内部的据点，负责解决伊朗深层的问题。艾哈迈迪内贾德直接将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注入到伊朗经济中。他把这笔钱用来赠与农村、补助年轻新婚夫妇、仓促提高薪资与掠夺国家的储蓄。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主政时代不存在经济计划，只有事情发生后的损害控制。

艾哈迈迪内贾德上任后大约过了一年，五十名经济学教授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他收回成命。他们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做法有挥霍石油盈余与加速通货膨胀的风险。「经济学就跟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家写道，语气中带着迂腐又带着恳求，「是人类知识累积的结果，经济学的科学成果可以用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基于这一点，经济学可以而且必须用来拟定政府的经济政策。」[5] 艾哈迈迪内贾德心情愉快地舍弃他们的建言。

短短一年间，通货流动性提高将近四成。伊朗人使用发放的现金购买进口物品，此举打击了本地产业而且造成物价飞涨。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伊朗的通膨率已达到世界第四，仅次于津巴布韦、乌兹别克与缅甸；到了二〇〇八年夏天，通膨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八。在此同时，艾哈迈迪内贾德大砍利率，这个举动鼓励借贷，驱使国家脆弱的银行部门濒临毁灭，而且促使伊朗城市出现超现实的房地产泡沫。二〇〇七年，德黑兰的房地产价格增加超过

了两倍，同样的状况在二〇〇八年再度出现。

分析家扎伊尔德．莱拉兹提到，租房子的伊朗人「晚上睡觉，隔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于贫穷线下」。二〇〇六年，将近七十万名伊朗城市居民掉入贫穷线下。自拉夫桑贾尼改革以来，不平等的状况首次恶化。但艾哈迈迪内贾德仍幻想自己深受民众爱戴，只有改革派菁英视他为眼中钉。

艾哈迈迪内贾德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似乎就跟财政政策一样：他大搞破坏且冷眼旁观别人如何来收拾残局、抱怨结果或推测他的动机并且将这些推测结合成政策。艾哈迈迪内贾德震撼了世界舆论，他否认犹太人大屠杀而且邀请其他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人、反犹太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主义者与其他邪恶的西方人前往德黑兰参加赞扬他的观点的会议。他写了措词傲慢、杂乱无章、弥赛亚式的信给世界各国领袖。他甚至邀请德国总理安格拉．梅克尔一同抛弃被不公平地强加在她的伟大国家之上的历史罪恶感与屈辱的重担，与伊朗一起共同结盟对抗二次大战的战胜国[6]。艾哈迈迪内贾德显露出对外交或世界历史的无知，而且把前几任总统努力在各国为革命伊朗争取到的空间（也许不被喜爱，但至少受到尊重的国家）一扫而空。

然而与经济政策不同的是，外交政策长久以来一直不属

于总统的职权范围。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挑衅，明目张胆的反犹太主义，以及煽动风格，固然惹出了许多事端，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仍牢牢控制着深层的治安国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事务都是如此。如果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夸张言行是为了替伊朗提供时间与黑暗的掩护，使其能研究核技术，那么这就不是派系政治造成的变动，而是前后一贯的外交政策体制下的理性决定，这个体制不仅清楚美国在伊朗的两侧疆界进行军事部署，而且了解自己身为「邪恶轴心」的一员已成为美国试图改变政权的目标。在国内也是一样，司法部、情报体制与民兵都在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命令之下，与哈塔米时代不同，他们已无须向总统负责。如果言论自由的空间受到限制，如果改革派政党与媒体遭受压力，这已经不只是总统单方面的作为。这些事情就这样发生，而总统也批准这类措施，因此在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个任期，治安机构与民选政府之间已没有太大隔阂。

然而，如果哈梅内伊期待艾哈迈迪内贾德会以身为他的副手的身分来行事，那么他就严重误判这个人的性格。这个来自纳尔马克既冲动又浮夸的矮小男人，不可能完全屈居人下。艾哈迈迪内贾德进行了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整顿，据说撤换了二万名官员，包括所有的银行经理与大约四十名外交官[7]。「他们非常傲慢，」总统的童年朋友纳瑟．哈迪安谈

到艾哈迈迪内贾德与他的阵营时说道，「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与伊朗整个政治结构作对，不邀请任何人成为他的伙伴，包括保守派。你在内阁里看不到保守派，你也看不到保守派担任任何政治职位。」这么做必将付出代价。保守派因此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是极端强硬派与民粹主义派，与总统有关；另一个是传统保守派，较有经验也较为审慎，最终忠于哈梅内伊。

总统的宗教倾向相当古怪，他无意间提到他个人与马赫迪的关系，马赫迪是隐遁的第十二任伊玛目与什叶派弥赛亚。艾哈迈迪内贾德提到自己在纽约向世界各国领袖演说时，看到自己被光芒环绕着，他还提到在自己的光环沐浴下，各国领袖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艾哈迈迪内贾德宣称美国已经派间谍到伊拉克与伊朗搜捕马赫迪，因为他们知道马赫迪的回归已经迫近并且试图阻止伊朗获得恩典。传统的伊朗教士认为这种言论具有冒犯性、自我中心而且触及异端的底线。极端强硬派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赫－雅兹迪则鼓励这种说法。

阿亚图拉梅斯巴赫与总统已是旧识，十多年来他一直从旁助长总统的精神错觉。这位专横的教士带有一种术士与迷信的气质，他认为某些凡人可以开启与马赫迪直接沟通的管道，让马赫迪透过他们说话与行动。艾哈迈迪内贾德显然就

是这类幸运儿。二〇〇五年，梅斯巴赫与他的支持者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竞选，而且欢呼他的当选是一种神迹。对梅斯巴赫来说，这一切有如神助。光是上任第一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就从联邦预算拨出三百五十万美元给梅斯巴赫设于库姆的机构；到了二〇一一年，分配金额达到七百万美元[8]。

怀疑者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神秘主义信仰就跟他发放现金一样是一种政治工具——掠夺无知者与绝望者，养成被动与盲从的心态。身为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出资设立第十二伊玛目的神龛，鼓励容易受到影响的人前去见证第十二伊玛目即将来临的无所不在的异象，而且表示他的政策乃是崇高的隐藏世界创造的结果。伊朗自巴尼－萨德尔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俗人总统反而比之前的几任教士总统更敢于将自己神圣化。

梅斯巴赫的政治目标并非秘密，他试图将改革派从权力中心清除出去与巩固宗教的专制政权，他公开贬低人民主权、言论自由、妇女权利、权力分立与伊斯兰改革。梅斯巴赫相信，民选机构应该完全依照最高领袖的指示行事[9]。因为真主透过最高领袖来统治伊朗，所以抱怨独裁主义就是亵渎神明。「我们等着看，这些宣称自己是改革支持者的狐狸将待在地狱的什么地方。」梅斯巴赫说道，那些参与式民主的支持者也是一样[10]。「人民怎么想并不重要。人民是无知的羊群。」[11]梅

斯巴赫认为政府应该管制言论的内容，「就像政府应该管制造假或遭受污染的食物流通」[12]，他要求以暴力去除反对他的说法的人[13]。艾哈迈迪内贾德也轻视一切在伊朗建立民主的努力，认为这些都是反革命[14]。艾哈迈迪内贾德就像梅斯巴赫手上的工具，一如梅斯巴赫像是他手上的工具。

梅斯巴赫在体制内有强大的支持者，包括主持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深阿亚图拉，但其他的传统教士则反对他。传统教士不仅根据教义反对隐遁的马赫迪会干涉人世，更不相信马赫迪会选择凡人来进行干涉。此外，传统教士也担心艾哈迈迪内贾德与梅斯巴赫藉由操弄民众的信仰来正当化总统的政策，如此将损及伊斯兰[15]。

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个总统任期有两次期中选举。第一次是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实际上是一次二合一选举。伊朗人在选出市议会的同一天，也将选出专家会议。专家会议是一个高阶教士组织，负责在哈梅内伊无法视事时选出下一任最高领袖。专家会议选举往往十分平静，每八年选举一次，候选人是从在此之前已经拟好的资深阿亚图拉名单中产生。把专家会议选举与市议会选举排在同一天，是为了驱使民众投票。艾哈迈迪内贾德为进一步刺激选情，又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关于市议会，是与建设者同盟相关的阵线，性质神秘，称为「服从的怡人香气」(Pleasant Aroma of Service)。

在专家会议部分，艾哈迈迪内贾德支持梅斯巴赫与搭配他的一名极端强硬派学者。

梅斯巴赫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二〇〇六年秋，他的团体提出一波候选人名单，企图以此来改变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认为他们提出的名单有一半以上不符资格，监护委员会不仅刷掉绝大多数的改革派名单，同时也将许多梅斯巴赫的学生拒于门外。即使如此，与梅斯巴赫合作的教士理论上仍有可能在八十六席专家会议中赢得四十席。

但选民不支持强硬派伊斯兰学者，也不支持「服从的怡人香气」。改革派赢得约四成的市议会席次，甚至在某些城市取得支配地位。在选举中表现优异的保守派市议会候选人往往与艾哈迈迪内贾德无关。最戏剧性的是，在专家会议方面，拉夫桑贾尼的得票数令梅斯巴赫相形见绌，达到后者的两倍。这是两次期中选举的第一场，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公众地位。

在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主政期间，伊朗成了一个紧绷蜷缩的国家，既让人感到压迫，又让人感到困惑。用来规范可接受的行为与讨论的红线从未清楚或前后一贯地划定；现在，这些红线却像持续收紧的绞索勒住了在哈塔米时代尽管困难却已经获得扩大的公共领域。

结果，改革并非不可逆转。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大学教授可能遭到解聘，而大约有两百名教授遭到这样的命运。学生可能因为他们的行动主义而遭到惩罚，而他们也确实因为「标记」系统基于政治理由将他们标记出来而遭到开除。艾哈迈迪内贾德引进了「社会安全计划」，派遣警车到城市广场骚扰服装不适切的妇女；他通过法律，损害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而且设立配额，限定女性在大学某些领域的入学人数。到了二〇〇八年，与拉夫桑贾尼以及卡鲁比有关的报纸成了批判性报刊最后的堡垒。卡鲁比的政治阵线与他的报社同名，称为国家信任党，由行事谨慎的教士组成，是唯一仍在政坛活跃的改革派政党。

当改革派停下脚步，扪心自问要如何取得进入政坛的通行证时，他们必须向艾哈迈迪内贾德明确表达一件事。这句话曾经在别的地方说过，那就是：笨蛋，问题出在经济。伊朗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它们早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与改革派之前就已经出现。政府的收入有百分之六十五仰赖石油。一旦伊朗人了解他们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穷人就会开始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富人。钱就摆在那里，那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什么有些伊朗人可以过着富足的生活，而有些伊朗人只能穷困潦倒？这种安排的不透明总能让煽动家找到利用的机会。事实上，经济不当管理的历史与伊斯兰共和

国一样长久，或许早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

石油使伊朗人仰赖国家，国家控制石油，而国家独立于人民之外，人民几乎不需要参与经济来维持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以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在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如法律与医学，以及进取的潜力，成为世界众多经济体的生产力的驱动者，但在伊朗，中产阶级却成了累赘。如果国家的收入仰赖可征税、有生产力的中产阶级，国家很可能必须经营与这些公民的信赖关系与合作气氛。但有了「石油租」（oil rents），政府便看不出有刺激生产力的必要或好处。

数字说明一切。在哈塔米主政时期，由于石油景气的关系，贫困减少，不平等的状况并未恶化，到了二〇〇五年，伊朗生活水平甚至达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来最好的时刻。但石油租倾向于在营建业这类部门创造无技术性的工作。在哈塔米的两任总统期间，文盲的失业率从百分之十七下降到百分之八；拥有研究所学历的人，失业率从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失业率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四十三。

伊斯兰共和国创造的最大成果反而使自己沦为受害者。后革命时期的伊朗大力提升社会流动性，从农村现代化、降低农村出生率，到扩及全国的大学体系。成为中产阶级的伊

朗人达到历史新高，然而成了中产阶级之后，伊朗人却发现自己失去目标[16]。专业领域必须接受政治正统的严格审查，私部门的工作数量也不多。艾哈迈迪内贾德就职的时候，伊朗大体上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要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许多伊朗人必须仰赖不稳定而且最终来说是毫无生产力的收入来源：兼差、担任中介、变卖家产。伊朗中产阶级怨声载道，但连经济学家也批评中产阶级的抱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渲染夸大。一般认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主要倾向于支持改革派，而改革派已经出局：艾哈迈迪内贾德因此认为忽视或敌视中产阶级并不会产生政治或经济成本。

无论如何，艾哈迈迪内贾德运气很好。他主政的时期刚好遇上伊斯兰革命以来石油价格最戏剧性攀升的时候。他把石油收入转换成流动性的现金并且扩大放款。他成了一个庇护穷人而且让容易受骗之人精神获得提升的总统，但他无意解决伊朗广大中产阶级的长期不安，这些中产阶级跟其他人一样面临着物价高涨与房地产泡沫。原本应该让人觉得欣欣向荣的时期，却像是陷入了经济衰退。一旦遭遇了油价下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伊朗甚至没有可仰赖的积蓄。

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二〇〇五年选战利用经济的挫败赢得大选，但到了二〇〇八年，同样的问题却成了他的大敌。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签署一封公开信，指责艾哈迈迪内贾德

的政策导致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同年三月的国会大选，就连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政治盟友也对他的经济计划避之唯恐不及，纷纷公开批评他造成通膨。总统的保守派批评者以相当大的差距赢得国会选举，而这些人纷纷要求总统低头。

到了二〇〇八年国会大选时，曾在执政的改革派政党中居于多数的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似乎已成了遗迹。此时的参与阵线总部设在德黑兰中部一栋破旧的浅色砖造联排住宅里，二楼办公室专供坐着轮椅的愿景家扎伊尔德．哈贾瑞安使用。在离「四月七日广场」不远的联合基本教义派阵线闪亮的玻璃总部里，票数在伯仲之间的候选人激烈争辩着重要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参与阵线的理论家则聚集起来进行着他们认为足以举起整个地球的抽象讨论。伊朗深陷在素檀主义体系里，还是只处于素檀主义的处境中？官员的谎言是否让民众对于不诚实习以为常，从而削弱了国家的伦理？在伊斯兰教里，人权是否被奉为神圣？这些全是在哈贾瑞安遇刺周年纪念论坛上讨论的主题，而论坛召开的时间刚好碰上国会大选。一名改革派哲学家在会上吟咏道，人必须能够想象，但不能沦为幻想。

参与阵线在国会仍有几个议员，绝大多数来自各省。改革派的少数派领袖努拉丁．皮尔莫阿岑是胸腔外科医师，出身阿尔达比勒省的显赫家族，当他听说他的同事绝大多数—

—包括许多现任议员——在竞选连任时遭宪法监护委员会判定资格不符时，他刚好在美国参加一场会议。皮尔莫阿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抗议说，他认为这是一场不自由与不公平的选举。不久他便发现到，自己成了情报部长在电视上威胁的对象。皮尔莫阿岑被放逐到波士顿，基本教义派要对付的改革派立法者又少了一位。

到了二〇〇八年秋，离总统大选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改革派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选民是最不可能投票的一群人，因为他们获准拥有的候选人少得可怜，而且有着令人沮丧的权力经验。想在来年赢得总统大选，改革派需要两个条件，然而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振奋人心的候选人与高投票率。

二〇〇八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篇以「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八十八」自称的组织签署的宣言[17]。这个团体由全国各地八十八名年轻改革派活动分子组成，他们宣称如果穆罕默德．哈塔米要参选总统，那么他们会给予支持。这群年轻活动分子觉得，哈塔米是唯一能轻松击败现任总统的改革派人士。尽管哈塔米在担任总统八年期间表现未尽如人意，但依然广受爱戴与尊敬，在伊朗人刚忍受了四年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游乐园游戏后更是如此。

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是认真的。他们未经过前总统的同意就开始在全国各地组织哈塔米的竞选活动，并且在各省成立竞选团队，每个团队都有八十八个成员。省的团队往下组织城镇的团队，大城市如德黑兰则在每个分区设立团队。在改革派政治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不是一场由候选人组织的选战，哈塔米反而是选战活动招募来的候选人。

一九九七年，哈塔米在不情愿下成为候选人；据说，二〇〇一年时他更加不愿意，而且是流着泪同意竞选连任。二〇〇九年二月，他无疑是在怀抱着沉重心情下投入选战。但国家的局势是惨淡的，而选战比他个人更为重要。这是他人生第三次走上选战之路，年轻人曾经因为失望而厌恶他，但现在却蜂拥前来支持他。虽然他有许多事情未能实现，但哈塔米依然在选民心中有着某种代表性——他或许象征着他们的伊斯兰共和国更好的天使；他代表着邀请的脸孔，而非排斥的脸孔。不过，哈塔米告诉他的追随者，他很乐意让贤，他想专注于说服前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代替他出马竞选总统。

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已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做了一件后革命时代重要当权者从未做过的事：他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从霍梅尼时代的权力顶端，当时穆萨维是伊朗的战时总

理与最高领袖宠爱的儿子；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他的伙伴与他的对手彼此争夺他们努力实现的革命遗产；穆萨维则几乎完全退隐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他是建筑学教授与画家。他拒绝所有恳请他竞选的要求，即使他在老一辈伊朗人心中代表着失落的革命力量与正直。

哈塔米的前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说道，身为当代政治人物，穆萨维「就像未剖开的瓜，大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18]。在这关键的二十年间，穆萨维的同事绝大多数戏剧性且出乎意料地从伊斯兰左翼转变成自由派的改革主义。然后他们撑过了哈塔米令人失望的八年总统任期，并且遭受各方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穆萨维从未公开支持他的前盟友。从他持续接触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把他归类为改革派；但从他过去具体的历史表现来说，他依然是霍梅尼的人马。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穆萨维宣布参选。哈塔米如他原先承诺的退出选举，并且要求支持者支持穆萨维。「我知道如果我参选的话可以拿到选票，」哈塔米说道，「但选举不只是在星期五投票而已。我们也需要一个候选人，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的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推动议程。米尔．侯赛因就是这样的人物。」[19]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包括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八十八，并不认为这是个理所当然的选项。他们不认识穆萨维，而穆萨维与革命年代的连系在他们眼中并非值得称道的优点。此外，他还是个含糊不清的候选人。他刻意与参与阵线的支持者保持距离，而且表示如果他是改革派人士，那么他同样也是「原则主义者」（principlist），这个词正是保守派系对自身的描述。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穆萨维未能明确凸显他的外交政策与对手有何不同，特别是关于核议题、以色列与对美关系，他甚至回避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但他倒是明确表示他会尝试废除宗教警察[20]。

首先，穆萨维主要的竞选口号是回归理性与负责的经济政策与计划。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伊朗遭受战争、禁运，石油收入也创下历史最低，但当时并未出现匮乏或通膨失控。相较之下，艾哈迈迪内贾德则是挥霍而不专业。此外，穆萨维的意识形态背景是左翼的民粹主义者，而艾哈迈迪内贾德则是右翼的民粹主义者。与艾哈迈迪内贾德一样，穆萨维也是个禁欲者，他质疑官员腐败的同时，自己则维持着朴实的生活与谦卑的个性。

穆萨维并非选战中唯一的改革派人士。梅赫迪．卡鲁比持续参加选举，但从未当选，他也登记参加这次选举。卡鲁比在二〇〇五年大选表现不错，之后他对于权利与自由的发

言也渐趋大胆。许多老一辈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菁英支持卡鲁比，不仅因为他的理论立场，也因为他持续要求人道对待政治犯家庭。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考虑支持卡鲁比，因为他明显最符合年轻活动分子的需求。但最终执行总部还是决定把票投给最明显也最有机会获胜的候选人。

穆萨维随即承接已经渗透到全国各地的选战基层组织，而且取得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的支持。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在海报与其他选战宣传上印制了穆萨维的习惯动作，他把手摆在胸前，在伊斯兰教中，这是向对话的那方表示谦恭的手势。穆萨维的阵营选择以绿色为代表，这是伊斯兰的传统象征色彩。

这一切并不表示二〇〇九年选举将会是一场令人兴奋的选战。从巴尼－萨德尔之后，伊斯兰共和国的民选总统总是连任成功。艾哈迈迪内贾德充满争议，甚至在保守派内部也不受欢迎，从期中选举已能看出端倪，但在保守派内部他并没有真正的对手。穆萨维是改革派实际的候选人，但没有人期望改革派会出来投票；于是穆萨维转而争取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选民支持，试图让他们产生对早期革命意识形态以及两伊战争共同目的怀旧情绪。只要在二〇〇五、二〇〇六与二〇〇八年大选都不出来投票的改革派选民这次也不出来投票，那么这场选举将成为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主场的激烈战

斗。

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认为每次选举都是一次机会，可以向世界证明伊朗革命的坚定不移，以及向伊朗的敌人显示伊斯兰共和国的重要性与深受民众爱戴。伊朗的高投票率是一项骄傲，这显示选战期间相对自由的气氛，然而在官方主导下只有投票前两个星期的时间是如此。鉴于前三次选举的投票率惨不忍睹，伊斯兰共和国急欲「炒热场子」——在德黑兰常常听到的说法——创造兴奋的情绪，刺激观望的人出来投票。

于是，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初，伊斯兰共和国尝试了新事物：总统电视辩论，这可以说是一种「美式」的做法。然而对美国观众来说，伊朗采取的风格却让他们感到陌生。伊朗政治人物不会流畅地针对焦点群体做出精彩的片段陈述，而是随意漫谈，打断对方谈话，在陈述前先做开场白，但在开场白之前又有一段开场白。他们不是对民众说话，而是对对手说话，他们既没有拟稿也没有排练，尽管偶尔带着矫揉造作的波斯上流社会举止，但争辩时仍充满火爆。伊朗的观众深受吸引。

六月三日，穆萨维与艾哈迈迪内贾德摆好架式[21]。穆萨

维即兴演说，反击偶尔出现的一连串攻击，许多观众是第一次藉这个机会认识穆萨维。在电视摄影棚里，两人分坐在一张椭圆形大桌的两边，面对着彼此，桌子中央摆着白色的花卉。穆萨维是个优雅的人，一举一动都很专业；他的身材苗条，白发苍苍，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还留了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他的动作节制，目光冷淡。对面的艾哈迈迪内贾德看起来比平常更为短小精悍，穿着较为合身的灰色西装外套；他也变得非比寻常的严肃，嘴抿成一条线，眉毛像括号一样，膝盖上摆了一迭文件，面前的桌子上也摆了一迭。

总统的语气有时威吓，有时自我怜悯，有时又阿谀奉承；他一开场就表示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对手，而是三个人的连手：穆萨维、哈塔米与拉夫桑贾尼联合起来以无情的阴谋对付孤军奋战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民众不应该被愚弄：艾哈迈迪内贾德对抗的不是穆萨维，而是整个旧体制，这个旧体制觉得他们的特权遭到艾哈迈迪内贾德无私服务民众的威胁。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都成了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责任。「这些问题难道都是过去四年创造出来的？」总统苦涩地问道，「在此之前的二十四年呢？难道之前是天堂，是乌托邦，你们把它交给我，是我把它变成地狱，我难道没有做过一点好事？」

总统抱怨穆萨维指责他的外交政策过于鲁莽。但是，过去四年伊朗已经在核计划上获得重大进展，而且赢得第三世

界国家的尊敬。「如果穆萨维先生认为我们应该试图支持与取悦三到四个强权，那么这么做将有违已逝的伊玛目的思想以及伊斯兰革命的价值与我们的独立地位。」

艾哈迈迪内贾德提出许多合理的论点，主要是关于穆萨维的纪录，总统认为穆萨维在公民自由的表现上并没有比他好多少：在穆萨维主政时期，只有一家报社敢批评总理提出的预算，而穆萨维却斥责这间报社是革命之敌。相较之下，艾哈迈迪内贾德却容忍较多的批评。穆萨维自己的政府曾经剥夺总统的权力而且以强制手段对付国会中的对手，在这种状况下，他有什么资格说艾哈迈迪内贾德独裁？

但总统也显露出情感上反复无常与凶暴的一面。他抛出拉夫桑贾尼的儿子们犯罪的说法，而且阴沉地提到他们的父亲：「我们相信他实际上是幕后主谋。我们知道谁负责运作谁的选战委员会与进行什么会议，以及谁在组织这些会议与选战。」到了辩论快结束的时候，艾哈迈迪内贾德拿出一张穆萨维妻子的照片，她过去曾担任大学校长。「我有一份关于某位女士的档案，」总统嘲弄说，「你认识这位女士。在竞选时她总是陪在你身旁，这已经违反所有的规定。」艾哈迈迪内贾德指控穆萨维的妻子假造学历。「这是违法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表示。这个举动不管在何处都会引起震撼，但在伊朗尤为无耻。攻击一名受尊敬的文化人物以及一名虔诚者的妻子是

极不尊敬的表现，高举她的照片更是如此。

穆萨维并未因为对方的欺凌而退缩，也未佯装自己与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共通点多于歧异点，对于艾哈迈迪内贾德笑里藏刀地表示他是因为很喜欢穆萨维才想教导穆萨维的说法，穆萨维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响应。治理国家的方式有两种，穆萨维表示。一个是以「冒险、不稳定、好出风头、呼口号、想象、迷信、自私、自我中心为基础，不实行法治，而且总是走极端」。如果这种做法听起来不大妥当，穆萨维提供了「集体智慧」与「稳健」的道路。穆萨维解释说，他之所以决定要参选总统，是因为国家已经偏离了航道，他认为整个局势十分危险。

穆萨维表示，艾哈迈迪内贾德有一种倾向，当法律妨碍他时，他会嘲弄法律。他立下糟糕的前例，也为民众做了恶劣的示范。对于自己不同意的国会立法，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且只凭一时兴起就废除管理与计划组织。无论走到哪里，穆萨维都听闻大学生遭到逮捕、羞辱与开除，出版商遭到查禁或因为作品审查而破产，艺术家乃至于教士遭到压迫。艾哈迈迪内贾德将民众区分成自己人与非自己人，毫无必要地迫使无数伊朗人——包括文化菁英——成为反政府分子。

穆萨维表示，艾哈迈迪内贾德古怪的外交政策已经伤害伊朗的尊严，而且使伊朗与其他国家陷入紧张。他的极端主义特别让以色列获益，以色列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表示遭受伊朗的威胁。这是一场「灾难」，这位前总理说道。而身为候选人的穆萨维也公开嘲弄说，至于有人说他是三合一的候选人，「哈塔米先生不是什么无名小卒，他当过八年总统；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先生也是。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表示意见，……［国家广播网络］在你的控制之下；你可以邀请他们进行座谈，共同讨论。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要说的是，你的外交政策对国家与我们造成伤害，伊朗因为你的经济与外交政策而陷入困境。」

也许因为身为传言中的前总理而有着无可质疑的高度，也许因为他已经有二十年未曾出现在人们面前，也许因为他的性格，穆萨维的再次出现建立了一个拒绝受到威胁的形象。有传言说穆萨维是在哈梅内伊的命令下离开政坛，因为最高领袖对于他的固执感到忌惮。这位前总理在现场直播的表现加深了这层印象。伊朗人看着这场辩论会，许多人在那天晚上决定要去投票。

三十五岁的阿希耶赫．阿米尼刚好也是这场辩论会的观

众，她不是改革派人士，她的内心并没有什么宏大的观念或派系政治的想法，但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她倾尽全力与穆萨维描述的违法状况对抗。如果强硬派统治的四年期间是伊朗活动主义的寒冬，那么阿希耶赫就是其中极少数仍旧存活的耐寒常绿植物。

哈塔米主政时期，活动分子充满愿景，也深信各种理论。每个人的努力都成为像哈贾瑞安这类人士设计的大型挂毯上的一条线。此外，他们想象自己有着强大的靠山——他们都在总统的召唤下行动，成为时代的先驱。他们日后遭受牢狱之灾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因此感觉自己遭到背叛与遗弃。阿希耶赫．阿米尼是个活动分子，但她投入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运动。

二〇〇九年春，阿希耶赫．阿米尼决定不投票。她觉得伊朗人也几乎不会去投票。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政权，也不相信它有改革的可能。而改革派的候选人乍看之下也无法激励人心。梅赫迪．卡鲁比从未让她感兴趣。她不认为卡鲁比有机会胜选，就算能胜选，她也怀疑卡鲁比有意愿或能力做出大幅改变。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二十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这让阿希耶赫感到困扰。穆萨维是政治人物，是前总理，这样一个与体制如此接近的人物居然对一切默不作声？这样的人如果获得权力，他能拥有什么影响力？

阿希耶赫回伊朗北部老家时，意外发现家人与朋友都在热烈讨论这位前总理。穆萨维与哈梅内伊过去的冲突使他在批评最高领袖的选民心中格外具吸引力，他总是与身为艺术家及知识分子的妻子札赫拉．拉赫纳瓦尔德连袂参加竞选活动，这点也让人感到兴奋。在此之前，伊朗政治人物从来不会跟妻子一同竞选。穆萨维的做法清楚显示他对妻子的尊重，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女性政治能力的肯定。尽管如此，阿希耶赫依然未被说服。

在德黑兰，阿希耶赫与女权运动团体开会讨论选举策略。阿希耶赫认为，她们能做的最明确决定就是不要为任何候选人背书，但要清楚表明她们会把票投给支持女权的候选人。想得到妇女的票，就必须支持与妇女相关的议题。她们特别提出两点：首先，她们希望伊朗批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其次，她们希望修改宪法的四个条文。她们要求候选人响应她们的需求，藉此将性别平等的议题推到总统大选的台面上。

女权运动可以针对议题投票，但终将面临一个暧昧的状况：投票给支持女权议题但没有胜选可能的候选人，是否有利于女权？阿希耶赫认为没有。最终而言，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女权活动分子支持卡鲁比，因为他对女权运动的需求给出最令人满意的响应。其他人——包括阿希耶赫在内—

—最终投票给穆萨维，因为他是最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而且最有能力反制强硬派的人。

对阿希耶赫来说，穆萨维与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电视辩论是转折点。她从未看过改革派人士能像穆萨维对艾哈迈迪内贾德那样地对强硬派人士说话。哈塔米那些人总是恭敬、妥协与谨慎，但穆萨维毫不掩饰他的批评。他说话直接，毫不畏惧。他痛斥总统在经济上的表现。他甚至说艾哈迈迪内贾德是疯子。阿希耶赫因此确信，如果有人可以挺身而出反对哈梅内伊，这个人就是穆萨维。

第十五章　阿希耶赫

夏娃不够高

我要摘下所有的苹果。

——阿希耶赫．阿米尼

离马赞德兰省夏赫萨瓦尔不远的地方，阿勒布尔兹山脉在此逐渐隐没到里海海岸，阿希耶赫．阿米尼在此地一处种着奇异果与柑橘的果园里长大，家里的农场一路延伸成为庭园，直到河岸为止。阿希耶赫在四姊妹中排行老三。阿希耶赫小时候，当时尚未爆发革命与战争，家中还养着牲口，而且雇用了园丁与管家。革命后，夏赫萨瓦尔改名为通内卡邦，

阿米尼家则成为中产阶级。

阿米尼家源自于封建时代的旧乡绅。阿希耶赫知道她的祖母是重要人物，因为每个人包括她的父亲在内在她面前坐着都必须挺直身子。在伊朗北部，女性可以拥有社会权力、财产与卷起袖子裤管在田里工作。但许多男人依然可以拥有好几个妻子。因为如此，阿希耶赫的家族四处延伸。她的堂表亲戚人数众多，有时让人觉得整个伊朗北部都住着她家的人。阿希耶赫的父亲是个老师，小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喜欢做礼拜，才九岁就学会了礼拜仪式。他教导女儿伊斯兰，但只是点到为止，他的信仰是自愿的，而不是为了强制或政治。

阿希耶赫五岁时，革命爆发。有些事她永远记得。当她开始上学的时候，她不能穿白色鞋子，也不能穿短袜子，她就读的学校需要通勤半个小时。她觉得规定穿戴的深色头巾很丑，她哭了，但母亲温柔地解释说，这是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最重要的是，她记得阿姨的三个儿子：他们是革命分子，在巴列维国王时代被关进牢里；君主制被推翻前，他们获得释放，之后待在北部接近阿希耶赫家的地方，当地的亲戚并未参与政治斗争，因此较为安全。阿希耶赫喜欢三兄弟中的老大；当他来阿米尼家拜访时，位于夏赫萨瓦尔附近的农场老家人潮川流不息，大家都想向他打听德黑兰的消息。

阿希耶赫与她的姊妹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自然与文学的茧。当她们不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就跟着大姊一起，大姊喜爱阅读、写故事与画画。二姊阿夫苏恩比阿希耶赫大两岁，喜爱波斯古典诗；她记诵哈菲兹的诗文，而且在写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才华。阿希耶赫也写诗，但她不让人知道这件事。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画家，其次才是一名作家。她有着清晰的理解力与努力不懈的动力。

阿希耶赫年轻时的生活地貌充满高低起伏，虽然危险却极其美丽。位于农场的家，有果园与溪流，有哈菲兹的诗文集以及绘画与书籍，有山脉与里海，有家人的拥抱，阿希耶赫因此得以不受国家动荡的影响：战争、禁运、革命、政治暴力。这个国家已经陷入穷困，年轻人带着残缺的身体从前线返乡；许多人甚至无法回来。在阿希耶赫的大家庭里，有些人效忠新政权，有些人反对新政权。有年轻人被关在牢里，有亲戚相信是其他亲戚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是从德黑兰回来的三兄弟。

三兄弟的父亲，也就是阿希耶赫的姨丈，是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吉拉尼，他是专家会议的成员，有一段时间还是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监狱大屠杀时期是伊朗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对许多新政权的反对者签署了处决命令，而他也是判处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间谍罪无期徒刑

的法官。吉拉尼认为笞刑有其必要，而且相信处决异议分子与腐败分子可以为共和国清除毒素，否则将会污染共和国的纯净。阿希耶赫父亲的亲戚觉得家族与吉拉尼的关系可以帮助惹上法律麻烦的年轻亲戚。但吉拉尼毫不偏袒。即使一名十八岁的亲戚因为包包里带着传单而被十分钟审判判处死刑，吉拉尼仍要阿希耶赫的父亲不要对他提出任何要求。

法官的长子，也就是阿希耶赫小时候喜欢的那个表哥，在一九七八年的车祸中丧生；另外两个儿子加入了圣战者组织，他们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反叛父亲。但吉拉尼是个正直到令人害怕的人物，他爱他的孩子，阿希耶赫很确定这一点。她相信吉拉尼不是残酷的人。但吉拉尼坚持，法律之前，他不能用不同的标准看待自己的孩子。一九八〇年，据说他对自己剩下的两个儿子签署了处决命令。据说吉拉尼曾这么说，如果这两个孩子改过自新，如果他们忠于国家与伊斯兰，那么他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但他们拒绝了。他们逃离父亲的房子，藏匿在圣战者组织的安全屋里。他们躲过了追捕与处决，但据称其中一人在一场对安全屋的攻击中死亡，另一人则在一九八一年一场差点引发内战的街头冲突中丧生。

这则故事在伊朗人尽皆知。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吉拉尼成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当时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如此地僵化与嗜血，就连自己的子女也不放过。阿拔斯．埃

米尔恩特札姆在保外就医时曾到医院探望这位阿亚图拉，往后五年的时间，吉拉尼将一直维持昏迷状态直到死去，而埃米尔恩特札姆则宽恕了吉拉尼并为他祷告。但在阿希耶赫家中，这段家族往事成了不能说的禁忌。阿希耶赫的阿姨，也就是三兄弟的母亲，支持她的丈夫。死去的三兄弟隐没在沉默的布帘之后，却更加深了他们的身影，愈想将他们从记忆中抹去，他们的轮廓却愈加清晰。三兄弟的六个姊妹虽然有深厚的手足之情，却只能在沉默中悲伤。多年后，当阿希耶赫短暂从监狱获释时，这段沉默稍稍被划破了几秒。一名亲戚说道，如果阿希耶赫关在埃温监狱，也许她还能闻到三兄弟的味道。

虽然阿希耶赫与阿夫苏恩周围肆虐的政治战争撕裂了整个家族，但她们还是照常每星期四下午到夏赫萨瓦尔公立图书馆参加诗文聚会。阿希耶赫首次接触文学生活，而她喜欢这种日子。但到了学校选科的时候，阿希耶赫选择了数学与物理学。她擅长这两个学科，它们可以帮她在物资匮乏的一九八〇年代找到每个人都向往的工作，例如工程师或医师。四年后，她可以参加「大学入学考」（concours）。但在准备考试的某天晚上，她跟姊姊读书读得很晚，结果在家里的火炉前面睡着。半夜，当她的姊姊为火炉加添柴火的时候，燃烧的木头滚出火炉，落在熟睡的阿希耶赫身上。她养伤一个

月，因此错过考试。她必须再等一年才有机会参加。

阿希耶赫的父亲决定，与其让阿希耶赫一直待在家里读书，不如让她离家独立生活，这就好像十八岁的她依照原定计划开始上大学一样。未来一年她将住在马什哈德，生活费由父母资助，有家教帮她准备「入学考试」，她要努力蓄积力量与资源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有两个朋友陪她一起去。三个年轻女孩住在一起，一同学习，这是阿希耶赫人生中最棒的一年。

马什哈德的诗文圈有着传奇色彩。阿里．沙里亚蒂曾在马什哈德的诗文圈遇见年轻时的阿里．哈梅内伊。现在，阿希耶赫．阿米尼加入这样的圈子。这个圈子主要由老人组成，都是些七八十岁的古典诗人。阿希耶赫在里面形塑出奇妙的反差。她只有十八岁，写的是现代的自由诗，而且她的精力充沛。阿希耶赫吵着要朗读自己的作品，老诗人尽可能不理会她。最后，当她终于有机会朗读时，老诗人纷纷露出鄙夷的神色。他们根本瞧不上现代风格。其中一个诗人嘲弄说，这不是诗，而是散文。阿希耶赫负气离开，决定再也不回这个圈子。

然而几天后，一名老诗人找到她。他对于她受到的粗鲁对待表示歉意。他解释说，那个圈子无法提供年轻人任何东

西，但她的作品非常好。老诗人提供指导、支持与批评给阿希耶赫。因此，尽管阿希耶赫仍花时间在数学上，但她在城里接受的却是诗人教育。阿希耶赫写诗与阅读哲学。她大量阅读前革命时代伊斯兰哲学家阿拉梅赫．塔巴塔巴伊的作品，而且藉由阅读威尔．杜兰特一九二六年的作品《哲学的故事》来学习西方哲学。

杜兰特的影响力在他的故乡美国已逐渐消褪，却在遥远的伊朗生根。他的作品符合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一般美国人的品味，他的一系列历史作品，其中有许多是与他的妻子阿里尔合写，常居畅销书榜首位，而且曾赢得普立兹奖。与波普尔一样，杜兰特原是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变成自由主义者，他的世界观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务院一致。这或许是他的作品受到富兰克林图书计划青睐的原因，富兰克林图书计划是美国图书出版者委员会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于一九五二年在十七个开发中国家推动的非营利出版计划，该计划最初的补助就是来自国务院[1]。

富兰克林图书计划是典型的美国输出品——部分是公开的外交工作，部分是市场殖民，部分是基于高尚的动机，想提升与美国结盟的发展中国家的识字率与文化表达。每个国家的编辑由当地知识分子担任，由他们选择符合该国文学喜好的书籍出版——绝大多数翻译自美国作品。在当时，富

兰克林图书计划最具企图心的前哨站就是伊朗。富兰克林图书计划在伊朗出版了约八百种书籍，其中大约五十种是以波斯文写作。短篇小说作家萨玛德．贝赫朗吉在一九六〇年代抱怨过的学校课本，就是富兰克林图书计划的出版品：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小学使用的课本是由富兰克林图书计划从英文书翻译过来的，里面充满与伊朗当地无关或不可理解的文化内容。

传统上，伊朗的图书出版商也自兼零售商：他们的店面都是贩卖自家商品的精品店。富兰克林图书计划把全国图书零售的做法引进到伊朗，大量生产廉价的平装书，并且在各个地方贩卖这些书籍，如公车站旁边的小摊子、杂货店或任何会吸引行人驻足的地方。这些廉价、容易取得、绝大多数是翻译的作品受到广大伊朗人的喜爱。即使富兰克林图书计划早在一九七七年就已终止，而伊斯兰共和国早已将富兰克林图书计划在伊朗各地的资产国有化，但还是有一些想象不到的美国作者与书籍仍留在伊朗的正典书籍里。威尔．杜兰特轻松易读的作品是提供伊朗读者简易的西方哲学传统介绍的作品之一。

对阿希耶赫来说，首先接触的是杜兰特，然后是塔巴塔巴伊，最后才是索鲁什。在此同时，不令人意外地，阿希耶赫荒废了数学。她的大学入学考试考砸了。数学没有通过，

她也未能进入菁英公立学校就读。阿希耶赫心高气傲，她不能忍受自己去念比她的姊姊们差的学校。她决定再重考一次，但这次她报考的是人文学科。

阿希耶赫必须靠自己完成四年学业。她回到夏赫萨瓦尔附近的农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苦读，从早上直到半夜。最后，她的热情与她的学习成功汇聚起来。她尝试快速阅读，直到自己能在短短四小时内消化一本书为止。她喜欢自己阅读的东西。她的新闻学考试成绩排名全国第十七名。不久，她前往以她最喜爱的哲学家阿拉梅赫．塔巴塔巴伊为名的大学就读。这是伊朗数一数二的人文学科大学。阿希耶赫心想，哲学可以靠自己阅读；但社会与政治记者是一门职业，她必须在学校里学习。

当时，阿希耶赫不是个政治动物，而她也从未成为一个政治动物。但她发现政治总是如影随形，就像她攀登陡峭的阶梯时旁边的栏杆一样。成为一名记者，必须攀爬政治的结构，而且必须抓住政治以寻求支撑，即使不愿意也不行，即使采访的新闻本身与政治无关也一样。一九九三年，当阿希耶赫搬到德黑兰时，她即将从事的领域还没有一个共同的专有名称，那是国家结构中的一个空缺，她的工作的成败，完全仰赖国家特权的运作。日后，阿希耶赫才了解这个空缺叫做市民社会，而它将自然而然成为阿希耶赫的家。对比之下，

阿希耶赫觉得政治不过是对权力的追求，而对此她毫无兴趣。

阿希耶赫成为阿拉梅赫．塔巴塔巴伊大学新闻系的大一新生之后，就跟几个朋友去逛新闻博览会，她决心说服编辑给她机会，让她为真正的报纸写稿。如果阿希耶赫是个政治动物，她首先一定会关心这是什么样的报社；但她完全没想那么多。于是她误打误撞地找上《宇宙报》，这是一家强硬派报社，实际上是安全部队的打手。阿希耶赫当时完全不知道《宇宙报》曾经抨击与威胁过许多她喜爱的作家。一名主持《宇宙报》副刊一年多的编辑给了阿希耶赫第一份工作。当他离开《宇宙报》前往中间派的政府报纸《伊朗报》时，他也把阿希耶赫找去写稿。

跟强硬派报社相比，《伊朗报》的立场比较不那么极端，而且规模很大。阿希耶赫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这里工作。她很不喜欢服装规定：在所有政府机构里都必须穿戴最严格的头巾，也就是穿上黑袍或宽松外套搭配包覆整个头部称为马格纳耶的头巾。她也不欣赏新闻编辑部里的性别区隔。但她还是感到高兴，这份工作满足了她的企图心。她在报社里表现杰出，不用徒劳地与这个世界对抗。她努力学习新闻工作，她尊敬自己的老师与上司；此外，她也对社会学产生兴趣，特别是约翰．洛克与当代的市民社会理论。

某天，一名同事邀请阿希耶赫去采访一名著名的作家：贾瓦德．莫贾比，他是诗人、讽刺作家与少数能撑过革命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杂志编辑。阿希耶赫想到能与这个人见面就兴奋不已。但阿希耶赫不知道莫贾比与连环谋杀案被揭露之前的许多作家一样正面临死亡威胁，而且经常遭受调查与骚扰。莫贾比以及他那时髦而美丽的妻子的出现，深深吸引了阿希耶赫；当莫贾比得知阿希耶赫写诗时，他还要求阿希耶赫朗诵几首诗文，这更让阿希耶赫感到受宠若惊。她答应了。莫贾比邀请这位年轻的陌生人参加他的作家圈子，妻子出于保护的念头同时也担心丈夫的生命安危，她开口问道：他确定可以信任阿希耶赫吗？

这个圈子很小而且很吹毛求疵，莫贾比对阿希耶赫说道。她必须准时、严肃认真、守纪律而且够坚强。是的，阿希耶赫说道，是的——她会做到任何要求。聚会不对外公开，莫贾比又说。她不能带任何人来。这些作家不会对外发表聚会里的东西，但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发表任何作品。这个团体还需要一个诗人。阿希耶赫将是这个诗人。莫贾比将成为阿希耶赫最重要的导师，她将从这个人身上学到，身为作家，要如何做到自由。

当阿希耶赫的上司接手《青年伊朗》时——这是以青年为导向的《伊朗报》副刊——他让阿希耶赫担任这份刊物的

文化编辑。这是个大胆的任命。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所里，阿希耶赫是女性、单身而且非常年轻。现在，她要负责二十八页的刊物内容。她的长官认为她做得到，阿希耶赫也认为自己做得到。但她觉得自己周遭的同事都等着看她失败。她的下属年纪比她大，而且厌恶向她报告。报纸的总编对她的做法挑三拣四。她埋首努力工作，经常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下班后还继续把工作带回家做。

有一天，一名年轻同事把她拉到一旁。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他难过地说，「但请你辞掉这份工作。」

「为什么？」阿希耶赫问道。

那个年轻人似乎努力要忍住泪水。他告诉阿希耶赫，每天，他们的同事都在说她坏话。「大家不喜欢年轻单身的女孩在这里担任编辑。」他对她说。

「也许真的是这样，」阿希耶赫回答说，「但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一九九六年年底，阿希耶赫并未特别留意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她认为，拉夫桑贾尼卸任之后，纳提格－努里将取代他的位子。她无法想象除了最高领袖，还有谁能下这个决

定。但她与大学里的改革派教授哈迪．哈尼基关系不错，他总会告诉她一些大致的政治局势。大选前某天，阿希耶赫发现教授心情不好。教授告诉她，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刚刚回绝了改革派希望他参选的请求。穆萨维宁可退出政坛当个艺术家。现在，改革派提不出候选人了。

阿希耶赫其实并不是很关心选举的事，但为了安慰哈尼基，她突然想到一个相当可爱的教士，他是个图书馆员，她最近才为报社采访过这个人。

「你有比穆萨维更好的人选，」她对哈尼基说道，「例如，你有哈塔米。」

哈尼基笑了。「阿希耶赫，」他说道，「你是个诗人。你应该专心写诗才对。」他解释说，如果阿希耶赫了解政治的话，她会发现哈塔米不适合竞选总统。他是个文化人，几年前就已经脱离政坛，因为他不喜欢跟人争斗。

「好吧，」阿希耶赫说道，「我只是觉得大家会喜欢这个人。」

几个星期之后，在大学走廊上，哈尼基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冲到阿希耶赫面前。

「你怎么知道？」他几乎是大喊着说。

哈尼基后来成为总统哈塔米的文胆与顾问，在选战期间，他希望阿希耶赫能帮他一个忙。哈塔米的新闻办公室急需一名编辑。基于与哈尼基的关系，阿希耶赫自愿在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哈塔米的竞选阵营帮忙。

阿希耶赫一直无法确定，但她怀疑自己到哈塔米阵营帮忙一事决定了她在《伊朗报》的命运，因为《伊朗报》支持的是纳提格－努里。哈塔米当选的一个月后，阿希耶赫与上司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她觉得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辞职。阿希耶赫总是开玩笑说，新总统感谢她无偿付出的方式，就是送给她失业这个礼物。

哈尼基帮阿希耶赫在总统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但阿希耶赫只待了一天。她是个记者，而且希望继续当记者。新闻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发展中，眼前出现了许多新的刊物，包括一份名叫《妇女报》的报纸。阿希耶赫认为以性别来区隔新闻没什么意义，她甚至反对这一点。但《宇宙报》的一个前同事也去了《妇女报》，他希望阿希耶赫能过去跟他一起工作。结果，阿希耶赫去了《妇女报》，在这份报纸短暂的存续期间，她都在这里工作；而她也在这里遇见她的丈夫。

贾瓦德．蒙塔泽里是个摄影记者。他有一张宽阔的圆脸，

一双温和的眼睛，长长的胡子与一头长发融合成一体。他的长发与长须，加上照相机，在德黑兰街上显得特别醒目。不到一个月，贾瓦德就离开《妇女报》到《三月报》工作，这是哈塔米之前的内政部长阿卜杜拉．努里经营的报纸，他在一九九八年被强硬派赶离部长职位。

一九九九年四月，阿希耶赫结婚那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正在美容沙龙的她，并且告诉她一个坏消息：《妇女报》被查禁了。她的工作没了，但阿希耶赫几乎一时反应不过来。贾瓦德仍有工作，她仍感到快乐。超过五百名宾客正等着她。

阿希耶赫不久就找到工作。她是个积极的记者，在前后两家报社分别报导了库德斯坦示威抗议与设拉子地震。工作给予她精力，让她感受到清楚的目标。在她的周遭，伊朗的新闻媒体也在改变：更多年轻女性进入新闻界；改革派的报纸仍不自由，但比昔日的报纸大胆得多。伊朗历四月十八日测试了独立报导的底线与阿希耶赫超然的程度。

阿希耶赫正赶往开会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告诉她，因为德黑兰大学暴动的关系，前方道路封闭。阿希耶赫取消会议并且打电话给贾瓦德，告诉他在德黑兰大学门口碰头。他们发现校门深锁。从大门望进去，可以看到学生与教职员又恐慌又流泪地到处乱窜。一名新闻系学生偶尔会到阿希耶赫的

报社开会，他认出了阿希耶赫。「我认识她，」他喊道，「让她进来。」当时还是一大清早，他们是最早进入满目疮痍的校园的记者。

当天，贾瓦德拍到了深具代表性的照片。狭小的宿舍房间在手榴弹攻击下化为灰烬，床垫被烧得精光，只剩下金属床架，墙壁的油漆也完全剥落。在其他房间，电视机被砸毁，财物遭到洗劫，空调被扔到底下的街道；在遭到破坏的走廊上，一名学生展示背上一道道的红色鞭痕。窗户被砸碎，学生从这里被扔出去。

学生告诉阿希耶赫，攻击者说他们这么做全是为了他们的伊玛目。但攻击者是利用学生睡觉的时候攻击宿舍。阿希耶赫在这场冲突中并没有特定立场：她是记者，必须报导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她无法完全抽离此事。往后一个星期，她与贾瓦德置身在学生当中，记录这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战斗，并且报导被国家新闻媒体扭曲成无法辨识的故事。

暴动开始的几天后，阿希耶赫与贾瓦德听到枪声。他们知道有学生遭到枪击。在最近的医院里，他们假装成家属进去看他。这或许是贾瓦德拍摄过最怵目惊心的照片。根据官方的说法，没有学生受伤。但在病房清澈的绿光下，学生插着管子，失去意识，腹部与胸部缠着绷带。氧气罩模糊了他

的脸孔，下半身盖着一条印有儿童卡通图案的被单。

《三月报》的发行人阿卜杜拉.努里看了贾瓦德的照片，他郑重提醒贾瓦德，公布这些照片，不仅他个人需要担负风险，就连报社也会遭受波及。但这些照片实在太重要，不公布不行。贾瓦德坚持公布。《三月报》在封面显著报导了这些照片，而且连续两个内页也刊登了照片。抗议的学生高举《三月报》，就像举着抗议的标语牌一样。阿希耶赫了解，学生们几乎没得到响应。学生每天都跟阿希耶赫说，他们想跟总统哈塔米对话。虽然总统派了部长前来，但他本人却从未现身。

星期三，强硬派发动反示威游行。阿希耶赫与贾瓦德走到街上的电话亭，阿希耶赫要打电话给编辑。当她说话的时候，看到四五个穿白衬衫裹着阿拉伯头巾的壮汉走了过来，准备带走贾瓦德。阿希耶赫挂上电话。

「你们要带他去哪里？」她问道。

「那是他的太太，」其中一个人说道，「连她也一起逮捕。」

这些人并未将阿希耶赫与贾瓦德带到监禁中心或警察局，反而将他们带到法特米广场上一个双拼式房屋的服饰店里。他们把阿希耶赫与贾瓦德带到店铺后头，并且要求店铺老板离开。

其中一人手上有枪。他用枪指着阿希耶赫并且对贾瓦德说：「你们为阿卜杜拉．努里工作吗？」

「是的。」贾瓦德说道。

持枪的男人逼近阿希耶赫。他问贾瓦德：「你们相信阿卜杜拉．努里、贝赫札德．纳巴维、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扎伊尔德．哈贾瑞安跟以色列合作吗？」

「我不知道。」贾瓦德说道。

「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大声斥责说，「你们跟他们一起工作，而他们为以色列工作，他们发动了这个星期的示威游行。他们为了以色列杀死学生。」

「我怎么会知道？」贾瓦德说道，「我只是个摄影师。」

「不，」那人说道，「你是个摄影编辑。」

这是真的。阿希耶赫被枪指着肚子，脑子飞快地思考着。

「让我解释一下，」阿希耶赫插嘴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我可以是老师，老师只负责教学生，老师无法决定教育制度。我可以是在银行工作的人，但不是为银行做决定的人。我们是记者，我们无法为整间报社做决定。你的问题是跟报社有关。」

那人思考了一下。她也许是对的，他坦承。但要这么说的话，就跟为改革派报社工作一样，她应该也可以为强硬派报社工作才对。她要不要换到另外一边呢？

「我要考虑一下。」阿希耶赫说道。她试图让自己的说法听起来自然。「这么做我必须先辞掉现在的工作，我需要考虑。」

「那就好好考虑。」那人命令说。

之前阿希耶赫的袋子被其中一个人拿走，现在他将袋子里的东西全抖落出来。阿希耶赫的胃开始翻搅。几天前，一个朋友给他一张照片复印件，上面显示一名教士正在亲吻国王穆罕默德．雷札．巴列维的手，有人还开玩笑地在照片下方写上司法部某个高阶教士的名字。阿希耶赫把复印件放在自己的袋子里，现在这可能为她惹来无法形容的麻烦。

逮捕者找到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些跟她独立接案的文化电视节目上古时代计划有关的笔记。这个电视网络刚好属于强硬派人士所有。

「这是什么？」其中一名逮捕者问道。

阿希耶赫的心头大石顿时落下。「那是电视节目要用的，」她说道，「帮你们强硬派制作的电视节目。」

这些笔记来得正是时候：充分证明她只是个接案的记者，对于自己的工作不抱特定立场，即使是政治性的报纸也一样，她也会为强硬派电视台的历史节目做笔记。

「回去告诉阿卜杜拉．努里，」其中一名穿白衬衫的男子在放了他们之前对贾瓦德说道，「我们会逮捕他与其他人，我们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有很多他们与以色列串谋的证据。」

走出店铺到了街上，阿希耶赫在她的袋子里四处翻找。感谢老天，教士与巴列维国王的照片刚好塞在那些人没有检查的拉链夹层里。阿希耶赫突然一阵放松，整个人瘫倒在人行道上。

第二天早上，第一通电话把睡梦中的阿希耶赫唤醒。

「昨天我要求你们不要为你们的报社工作，而来为我们工作。」电话那一头传来说话的声音。阿希耶赫挂上电话。

但电话一直打来。「我们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们知道你们的一切。好好想想你们要如何跟我们合作。」

贾瓦德回到工作岗位，但阿希耶赫感到担忧，她不敢离开公寓。她写了封长信给总统哈塔米，坦白说出她的想法。她表示，她本身不是改革的信仰者，但显然总统是的。必须

有人保护像她这样的人才行，她与她的丈夫正陷入危险。安全部队要她为他们工作，她不想这么做。她能向谁求助？

阿希耶赫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她前往《三月报》时已经是傍晚的时候。贾瓦德在报社看到她，吃了一惊。

「我来找阿卜杜拉．努里。」她只是简单跟贾瓦德说了一句。她在努里办公室外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当努里读到她的信时，阿希耶赫发现他眼眶泛泪。

「我会把信交给哈塔米总统。」他说道。

不仅如此，努里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宣读了这封信。或许是因为如此，电话不再打来。也或许是因为骚扰者失去了兴趣。无论原因为何，阿希耶赫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贾瓦德却失眠了，他经常因为梦里遭人跟踪而惊醒；他担心的不只是示威抗议的照片，还有连环谋杀案受害者丧礼的照片。他恳求阿希耶赫考虑离开伊朗；但阿希耶赫无法想象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家乡、说的不是波斯语的国家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考虑搬到另一座城市。他们决定前往恰巴哈尔，伊朗最南端的城市，位于偏远的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但在他们能够离开之前，阿希耶赫在德黑兰接到另一份工作邀约。这份邀约来自哈贾瑞安的报纸《今日晨报》，甘吉也为这份报

纸写稿。《今日晨报》是伊朗媒体界最热门的报社。阿希耶赫接受了这份工作，恰巴哈尔的事就等下一次再考虑。

阿希耶赫得知自己怀孕之后，已停止工作六个月。她还没做好准备，她的生活已经满档。当她不能到报社工作时，她画画、写诗或弹奏弹拨尔（传统的长颈鲁特琴）。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母亲，直到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以及与贾瓦德深谈之后，她才决心正视怀孕这个事实。

阿希耶赫已经准备好面对人生的许多事，却未对怀孕做好准备。一开始是不公平：贾瓦德的生活与工作还是跟以往一样，阿希耶赫的身体却变得笨重、情绪反复无常、嗜睡、容易突然产生需求。她不想停下脚步，她要向自己与同事证明，她可以跟以前一样努力工作，达成跟过去一样的成果。某天，她在街头待了十六个小时，报导警察围捕游民的新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她的羊水破了。医师命令她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都要待在床上休息。

阿希耶赫必须待在家里，她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她的体内有一具引擎不断空转，因为她哪里也不能去。阿希耶赫知道自己爱着未出生的女儿，她希望女儿一切安好。但阿希耶赫自己却过得不好，她每天哭泣。她看着贾瓦德，彷佛两人之间隔着无法连系的距离。贾瓦德试着安慰她：孩子

很好，没有问题。她为什么要哭呢？

女儿出生之后，阿希耶赫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司法部勒令《今日晨报》与《三月报》停业。贾瓦德一开始在一家巴西杂志社找到工作，之后则与阿卜杜拉．努里开启下一段冒险，一家名叫《征服报》的新报社。但阿希耶赫被绑住了，她有个婴儿，而且这个婴儿连续七个月晚上都不睡觉。睡眠剥夺损害了阿希耶赫的心灵，让她失去活力，她对过去做的事与见的人都失去兴趣。她关心她的女儿，而且觉得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已经结束。她不仅找不回过去，也找不回过去的自己。

艾娃一岁的时候，有一天，贾瓦德下班回家，他问太太说：「有茶吗？」

「没有。」阿希耶赫说道。

「有吃的吗？」

「没有。」阿希耶赫说道。

「你今天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阿希耶赫有气无力地说，「我在照顾孩子。我有孩子。」

「我以为我娶了一个诗人与记者，」贾瓦德说道，「我不知道我娶了一个像你这样的家庭主妇。」

那天，阿希耶赫最后一次为了自怜而流泪。第二天早上，她开始寻找保姆与工作。

不久，阿希耶赫又有了工作，而且是两份工作。阿希耶赫在《伊朗报》共事过的一个编辑介绍她去《信任报》，她在那里担任社会编辑，负责特别报导与访谈。阿希耶赫通常早上八点半上班，到了下午四点就到幼儿园接艾娃。晚上，艾娃入睡之后，阿希耶赫便开始管理一个名叫「伊朗妇女」的网站。她仍然反对性别特定的新闻，但《妇女报》的一些朋友请她帮忙，所以她便协助管理网站。

阿希耶赫开始四处采访，把艾娃交给她的姊姊或其他家人照顾。她觉得在脱离职场这么久之后，现在的她终于恢复昔日的状态。她到伊朗南部的巴姆报导当地的地震灾情。然后，她听说美国正计划攻打伊拉克。二〇〇三年初，世界各地的记者开始聚集到伊拉克库德斯坦，而且通常是经由伊朗前往；但就阿希耶赫所知，伊朗新闻媒体并未注意到这则消息。

阿希耶赫前往伊拉克。她在当地遇到了半岛电视台工作人员、几个德国记者以及杰出的伊朗摄影记者卡维赫．戈雷

斯坦。戈雷斯坦留着显眼的八字胡，他丰富的职业生涯跨越了二十世纪。一九六〇年代，他为富兰克林图书计划工作，拍摄伊朗学童使用富兰克林图书的照片。一九七〇年代，他拍摄的伊朗贫困照片惹恼了伊朗王后；一九八〇年代，他拍摄的革命审查制度纪录片激怒了众多穆拉[1]。他让伊朗人的喧嚣生活化为无声的经典黑白照片，他在德黑兰大学教授摄影，贾瓦德曾经是他的学生。在阿希耶赫眼中，戈雷斯坦就跟自己的叔伯一样慈祥。在伊拉克库德斯坦城市艾比尔、苏莱曼尼亚与哈拉布加，阿希耶赫晚上回到旅馆之后，会跟戈雷斯坦与其他记者轻松谈笑，聊着美国入侵的可能性。

在苏莱曼尼亚，戈雷斯坦劝说阿希耶赫到伊朗与伊拉克交界的山区探险，有三个强硬派伊斯兰民兵团体驻扎在那片山区。如果她能像他们的妇女那样穿着完整的头巾，把手与脸遮盖起来，这样就可以在不激怒对方的状况下进行采访。阿希耶赫深入调查了一下，她发现那片山区布满了两伊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大量地雷，只有极端主义者才知道如何安全地穿越。阿希耶赫没有去，但戈雷斯坦去了。二〇〇三年四月二日，戈雷斯坦踩到地雷，当场被炸死。

阿希耶赫回到德黑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第一次怀孕时遭遇很多困难，之后也让她生活失去方向。现在，她才刚找回自己的步调。再者，她与贾瓦德的生活非常不稳定。

他们经常得无预警地外出，每次外出都带有风险，他们的员工流动率也很高。这是她本来的自我，她熟知的生活。她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

阿希耶赫的医师拒绝帮她堕胎。她有两个医师朋友，其中一位是妇科医师，但他们都回绝了。他们解释说，不仅因为在伊朗堕胎是违法的，也因为他们不认同这种做法。其中一位医师告诉阿希耶赫，她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找到愿意进行地下堕胎手术的医师，无论他多么无耻与昂贵；另一个是吃药让自己出血而影响怀孕，此时急诊室就必须进行子宫扩刮术。

阿希耶赫选择第二种做法。她只能盲目进行。她从黑市买来的药不是药丸，而是注射剂。她不知道注射器里装了什么。她雇了一个女人来帮她注射。这个女人一眼就看出这个注射剂是做什么用的，她要求阿希耶赫先付她胎儿的迪亚，或称血钱，让自己免于赔偿，以免阿希耶赫事后翻脸不认人。阿希耶赫付了。

阿希耶赫整晚疼痛无比，但没有流血。她知道自己无法再怀着这个胎儿，胎儿已经受到损伤，没救了。但是，如果她没有流血的话，没有医院会清空她的子宫。于是她自己又打了第二剂。她再度感到疼痛。她的医师朋友要她走路或奔

跑促使子宫收缩。阿希耶赫做了，尽管疼痛，她还是持续地走路跑步。但就是没流血，阿希耶赫只好去做地下手术，无论价钱多少。

堕胎医师年纪很大，阿希耶赫觉得这个人有毒瘾。他没有病人，而且似乎只做堕胎手术。他的病房很脏。他对阿希耶赫说，她除了要给他昂贵的费用之外，还需要付钱雇用一名麻醉医师与一名护理师。阿希耶赫同意了。到了手术当天，这些人出现了：麻醉医师有一张明显泛黄的脸，阿希耶赫觉得他喝醉了；护理师则踩着一双很高的高跟鞋，脸上浓妆艳抹。在肮脏的病房里，阿希耶赫把自己的命交给这些给人不祥预感的陌生人。贾瓦德虽然支持她的决定却很担心，他不断问她，确定要这么做吗？阿希耶赫认为她没有第二条路走。

接下来几天，她持续流血，身体抖得很厉害。她无法寻求医疗或建议，除了贾瓦德，她不能跟任何人说自己做了什么。她跟《信任报》说自己病了，要请假几天。之后，她恢复了原有的生活，至少在一切都改变了以前。

二〇〇四年夏天，阿希耶赫的家乡马赞德兰省的内卡镇发生的事引起她的注意。她正在寻找伊朗媒体报导的与妇女相关的故事，准备将这些故事贴到妇女新闻网站上。她看到一名十六岁的女孩因为犯下「不贞洁的行为」而遭到处决；

但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这名女孩也有可能是二十一岁。到底哪一个才对？阿希耶赫感到困惑。为什么报导的年龄不一致？为什么年轻的女孩要遭受绞刑？她在网站的下一场会议上提出她的疑惑。他们应该派人到内卡镇查明真相，阿希耶赫说道。但没有人想去。阿希耶赫决定亲自前往。

在内卡镇街上，男人们告诉阿希耶赫，阿特法赫．萨哈阿雷赫不是个好女孩。她出卖身体，一个男人解释说；像阿希耶赫这样的女士不应该打听这样的事。阿希耶赫转头看着他。他的意思是说，为了尊重她的身体，所以就杀了这个女孩？此外，他是谁，他凭什么告诉阿希耶赫该怎么做？另一个男人对阿希耶赫说，阿特法赫有精神疾病。

最后，阿希耶赫发现一扇没关上的小木门，门上挂着黑色旗帜与哀悼的牌子。这大概是阿特法赫的家。房子看起来只盖了一半，一副破败的景象。屋里有个年轻人似乎昏倒在楼梯上，他的眼皮半掩着，眼睛上吊，口水流淌到下巴，成群的苍蝇停在他的脸上。

「先生？先生？」阿希耶赫担心地喊着，「你还好吗？」

「你是谁？」有人从她的背后问道。阿希耶赫转过身去，一名肌肉结实的年轻人带着戒心看着她。

「我是记者。」她回道。

「你来得太晚了，」年轻人说道，原来他是阿特法赫的堂哥，「我们失去她了。」

往后几天，阿希耶赫找到女孩的亲戚，把她的故事拼凑出来。阿特法五岁时，她的母亲跟别的男人跑了，最后死于一场车祸。阿特法赫的父亲因为伤心而沉溺于毒品，疏于照顾自己的小孩。阿特法赫的一个兄弟溺死在河里，另一个兄弟染上毒瘾。阿特法赫在八岁时跟她的祖父母一起住，但他们年老体衰，没有能力照顾她。

阿特法赫法九岁时被邻居性侵，他付钱给阿特法赫做为封口费，然后不断故技重施。他还带其他男人来找她。她不断被性侵，又不断拿到封口费。这笔钱成了她的生活费。阿特法赫十三岁时，道德警察首次逮捕她。当地法官判处她鞭刑一百下，这是官方对婚外性行为的惩罚。根据伊朗刑法，一名女性被判处鞭刑一百下的上限是三次。第四次被逮捕时，就可以判处死刑。

阿希耶赫从未听过这些法律。她生活的世界，这些法律从未适用过。每个人都有婚外性行为，整个社会都有罪，为什么有人因此被绞死？特别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她的童年未受到妥善照顾，她因此沦落，受到他人的暴力对待。这个

女孩确定是十六岁：阿希耶赫找到她的出生证明。国际法禁止处决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但伊朗刑法却规定女孩九岁而男孩十五岁有犯罪能力。而根据阿希耶赫的查证，阿特法赫只被逮捕两次，还不到三次，结果居然被判处死刑。

内卡镇的法官要阿特法赫死，阿希耶赫这么认为。他亲自将绞索套在孩子的脖子上，然后在市镇广场上用吊车将孩子吊死。这是伊朗典型的处决方法，比使用活门的绞刑台花费更长时间也较为痛苦。法官谎报阿特法赫的年龄以规避法律。这个法官性侵过阿特法赫吗？有些报告提到，愤怒的阿特法赫在法庭上扯掉自己头巾，法官决心惩罚她的顶撞行为。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阿希耶赫永远得不到答案。但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让法官不想放过阿特法赫。

阿希耶赫曾经报导过地震、示威抗争、战争的流言，但没有任何一件事比阿特法赫更能紧紧抓住她。阿希耶赫可能会有一个跟阿特法赫一样的妹妹、另外的自我（alter ego）或女儿吗？或许绝无可能，阿希耶赫生活在拥有相对特权与安全、文学与企图心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在一开始是与阿特法赫受苦与死去的地方如此接近。也许，阿特法赫就是所有这一切。她是不公不义下永远无法安息的灵魂，一个阿希耶赫永远无法纠正的冤屈，无论她这辈子再怎么关注阿特法赫，甚至为她写诗，费尽心力去做这孩子生前人们不会挂念

着为她做的事。日后，阿希耶赫轻声呼唤阿特法赫的名字，彷佛在叫唤一个亲密的朋友。阿希耶赫会说，阿特法赫改变她的人生。

回到德黑兰，阿希耶赫反复翻阅她在内卡收集到的笔记与文件：与阿特法赫父亲与姑姑们的访谈，甚至她短暂在校期间的成绩单。但阿希耶赫什么也写不出来也睡不着。每当阿希耶赫试图写下故事时，她总是哭泣直到天明。最后，当她终于把报告整理好时，她的报社却不打算刊载。

「为什么不刊载？」阿希耶赫质问，「我有所有的档案。」

「因为你对抗的是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她的主编回答说，「你对抗的是司法部，而我们不能这么做。」

阿希耶赫把报告寄给另一家报社，同样遭到回绝。最后，《女性》杂志，一份长期与《地平线》分享空间与交换观念的女性出版品，同意在对阿希耶赫的报告进行编辑之后予以刊载。

采访阿特法赫事件之后，阿希耶赫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她发现自己一直想着有多少女孩被关在监狱里，因为性罪名而等待处决那天的到来。她的朋友夏迪．萨德尔是人权律师。阿希耶赫带阿特法赫的父亲与哥哥到德黑兰与夏迪

见面。当然，他们可以指控内卡镇的法官绞死一名青少女。但这名法官是教士，他的案子必须由特别教士法院审理。当夏迪把案子送到特别教士法院后，该院大法官极端强硬派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却下令这个案子已经结案定案。

阿希耶赫的阿特法赫报告刊载没几天，她就听说有一个女孩被判处死刑。事发地点在德黑兰西南部的城市阿拉克，女孩十九岁，名字叫蕾拉，据说她的心智年龄只有八岁。蕾拉也因为不贞洁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她同样是幼年遭到性侵的受害者。阿希耶赫在晚上九点得知这个案件，隔天早上四点，她就搭上开往阿拉克的巴士。这次她没有太晚，蕾拉还活着，她被关在监狱里。

蕾拉的母亲首次让她卖淫的时候，据说她才八岁，有些数据甚至说是五岁，她的对象是一个六十岁老头。之后她的母亲与哥哥让她每天卖淫，并且靠她卖淫的钱养家。蕾拉首次生产是在九岁，之后又在十四岁生下双胞胎。十岁时，在生下第一胎之后，蕾拉首次因卖淫而遭受一百下的鞭刑。蕾拉十九岁时被判处死刑，罪名之一是乱伦，因为她的哥哥们跟许多镇民一样都曾性侵过她，此时的蕾拉不会说话，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在法院大楼里，判处蕾拉死刑的法官恭敬有礼，他让所有人离开房间，好让他能跟来自德黑兰的记者谈话。他告诉阿希耶赫，法律就是法律，他的工作就是适用法律。而法律对蕾拉这么严厉是因为她的卖淫破害了家庭生活。法官向阿希耶赫解释，如果社会是苹果，蕾拉就是虫子。

「你有小孩吗？」阿希耶赫问道。

「有。」法官说道。

「男孩？女孩？」

「都有。」法官说道。

「我的女儿四岁，」阿希耶赫说道，「再过三四年，可能就会有人性侵她，你会因为她是社会的虫子而判她有罪。这怎么可能？你怎么解释这件事？」

「我是在蕾拉十九岁的时候判她有罪，不是八岁。」法官回道。

当然，阿希耶赫说道，但从八岁到十九岁，这个女孩一直遭到奴役；她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阿希耶赫从夏迪．萨德尔的事务所带了委任协议书过来，她最想做的是到狱中探望蕾拉并且让她签下协议书，这样蕾

拉将会拥有一个律师与一个奋战的机会。阿希耶赫对法官访谈了一个小时而且与他争论。阿希耶赫要求法官让他带走蕾拉，让蕾拉重新生活；然后法官再来判断，蕾拉是否真的对社会没有好处。

法官笑了。「去吧，」他终于说了，语气中带着轻蔑，「去看你想看的东西吧。」法官写了一张便条给狱方，命令监狱人员让阿希耶赫探视蕾拉。

阿希耶赫很兴奋，她可以为蕾拉做任何她未能为阿特法赫做到的事。监狱人员接到法官的便条，但没有仔细看上面写什么。他们以为阿希耶赫是蕾拉的律师，于是他们将被判死刑的女孩带到阿希耶赫面前：一名高挑、美丽的年轻女性，带着婴孩般的表情，她无法说话或阅读或写字，她看着阿希耶赫，露出单纯困惑的样子。

阿希耶赫手臂环抱着蕾拉，轻轻地在她耳边说话。

「我是你的姊妹，」阿希耶赫说道，「我想帮你。你的状况不大好。你必须相信我。我向你保证，我会帮你。」

阿希耶赫拿出夏迪．萨德尔的委任书：「我只需要你在上面签字。」

但蕾拉不会签名。于是阿希耶赫将墨水涂在蕾拉的手指

上，然后在签名栏上盖章。警卫暴跳如雷。阿希耶赫骗了他们，他们现在才发觉阿希耶赫不是蕾拉的律师；在阿希耶赫将蕾拉的手指按在委任书上之前，蕾拉还没有律师。

「这个女孩已经判死刑了!」警卫一边怒吼，一边收走了委任书。「她很快就要处决，你不能这么做。出去!」

阿希耶赫回到德黑兰，她要夏迪到阿拉克去见她的新客户。夏迪到了监狱，协助蕾拉在委任书上签名。阿希耶赫在《妇女》杂志上报导蕾拉的案子，她的文章引发了震撼。她的电子邮件信箱被支持者灌爆，每个人都在问，他们能为蕾拉做什么。设法让蕾拉重审与获得释放，阿希耶赫回道。监狱官员指控阿希耶赫，而阿希耶赫不知道把律师的委任书带到监狱里是违法的。然而由于是法官自己签名允许阿希耶赫进入监狱，于是他下令放弃起诉。

蕾拉的故事不仅在伊朗国内人尽皆知，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一开始是国外的伊朗记者与部落客报导此事，之后便迅速传遍了国际媒体与人权组织。挪威首相谢尔.马格纳.邦德维克得知蕾拉的案子之后，还写信给总统哈塔米表达关切。终于，蕾拉获得第二次审判的机会，这次是由一名较年轻、较具同理心的法官审理。

当法官仔细考虑的时候，阿希耶赫在法庭门外踱步。

「放轻松，」法官走出门外告诉阿希耶赫，「她会获得自由。」

但阿希耶赫感到担心，她对法官说，光是获得自由对蕾拉来说还不够。如果她的家人逼迫她重操旧业，阿希耶赫或任何人就完全帮不上忙了。

「我可以将她送到德黑兰做为惩罚，」法官提议说，「但之后你要怎么做？」

「你就这么做吧。」阿希耶赫说道。而法官确实这么判了。

阿希耶赫与夏迪找到一个为贫困年轻女性设立的组织来照顾蕾拉。她们募款来维持蕾拉的各种需要，包括保姆，因为她无法照顾自己，还有心理医师来协助医治她的长期创伤，以及私人家教教导她读写与通过相当于小学五年级的考试。阿希耶赫尽可能常带蕾拉到自己家里，这样她才能跟艾娃一起玩，体验一下家庭生活。蕾拉的心理医师告诉阿希耶赫，让蕾拉接触贾瓦德非常重要，因为她缺乏正常的与男人交流的经验。

「你就像母亲一样地照顾我，」蕾拉曾对阿希耶赫这么说，「你应该帮我找个丈夫。」

阿希耶赫经常拍摄蕾拉的影片。当她拍得够多了，她打

算把这些影片剪辑起来，寄给第一次审理蕾拉案子的法官，并且问他，现在的蕾拉是否对社会有好处？

加兹温有一名年轻女性，因为杀害一名她宣称要性侵她的男性而面临死刑。阿希耶赫同样发现承审法官是个亲切的男性，但这名年轻女性无法说服他相信她这么做是出于自卫。依照伊朗法律，这种案子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免除死刑：迪亚，也就是血钱，被告支付受害者家人赔偿金。但加兹温的这名女性付不出这笔钱。于是阿希耶赫在妇女新闻网站以及她先前成立的部落格上张贴募款告示。不到十五分钟，阿希耶赫已经募到了足以换取加兹温女孩性命的金额。她与两个朋友租了车，带了一盒糖果与一张支票，前往哈马丹郊外山区的受害者家中。

阿希耶赫变了。她依然是那个干劲十足的报纸编辑，每天要处理《信任报》十六页的版面，而且还要当个诗人；但她现在也成了另一个人：她变得极为关注未成年死刑犯与犯下不贞洁罪的贫困年轻女性的故事，她们的生命还没开始就变得廉价。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发生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得体还是残酷，都有赖于国家的良知判定。同事们指责她：她不能既是个记者又是个活动分子，而且这些是死刑案件，

是已经成定局的事，不值得她花上记者时间去报导。阿希耶赫只知道自己有工作要做。如果身为记者的她都不知道这些法律与这些法律执行的状况，那么她要如何让她的七千万同胞更加了解这些事？

在哈塔米第一个总统任期刚开始的时候，阿希耶赫与她昔日的教授、当时的总统发言人哈迪．哈尼基争辩关于市民社会的问题：哈尼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可以由上而下设立的计划；阿希耶赫反对，她认为从定义来说，市民社会应该来自于民众，而非来自于政府。两个人的争辩越演越烈。阿希耶赫对哈尼基说，他现在不是以一个社会学教授的身分跟她说话，而是以他现在担任的职位，也就是以政府的立场在跟她说话。哈尼基请她离开，并且断绝两人的关系。现在，几年过去了，阿希耶赫在会议上见到哈尼基。哈尼基公开承认说，市民社会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来自像阿希耶赫这样的人士。

但阿希耶赫不知道总统哈塔米与改革派人士对于她关注的议题抱持什么立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阿希耶赫宁可与改革派合作而非改革派的对手。但阿希耶赫既不信任政治人物，也不期望能信任政治人物。当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于二〇〇三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总统哈塔米的评论贬低了伊巴迪的成就。哈塔米说，伊朗可以为诺贝尔的科学与文

学奖项感到骄傲，但和平奖则不是那么重要。阿希耶赫在专栏中做出回应，她认为伊巴迪获得肯定这件事足以荣耀伊朗。

阿希耶赫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女性主义者，她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在维护儿童权利。伊朗有将青少年处以死刑的恶劣传统，先将青少年关在牢里，等到他们成年后再处死他们。伊朗也是全世界死刑执行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然而，随着阿希耶赫对死刑案件的关注愈来愈广为人知，女权活动分子也渐渐将阿希耶赫视为她们的阵营。她们找阿希耶赫前来聚会，共同商讨希林．伊巴迪从斯德哥尔摩得奖返国后的庆祝事宜。

这场会议让阿希耶赫印象深刻，参与者的背景极为广泛——与会的女性有些是严肃的穆斯林与伊斯兰主义者，有些则是世俗派人士，她们从事的工作也反映出非常广泛的关切。当希林．伊巴迪的飞机降落时，机场涌现了大批人群。人群不仅是为了祝贺，也为了保护。在众目睽睽下，没有人能伤害希林．伊巴迪。为了这个活动而进行的各项组织工作，只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在此之前，伊朗的女权活动分子已经组成网络。往后一年半，同样的团体将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会。透过开会，活动分子们达成共识，认为伊斯兰女性面临的最重大议题，乃是法律本身的歧视性质。

根据伊朗法律，女性在婚姻、离婚或继承上没有平等权利。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妻子，而且可以有所谓的临时婚姻，形同合法嫖妓。孩子的国籍承袭自父亲，而非母亲。女性的生命与肢体，价值（血钱）不如男性；在法庭上，女性的证言效力不如男性；名誉杀人，女性的性行为使家族蒙羞，男性亲戚以此为由杀死该名女性，这种杀人行为在法律上不算杀人。然后，在刑法责任能力的年龄起算上，女性比男性早了六岁。

二〇〇五年夏天，哈塔米的总统任期已接近尾声，先前开会讨论如何表扬希林．伊巴迪的女权活动分子，此时组织了一场静坐抗议。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德黑兰大学前面，贾瓦德拍照，阿希耶赫写作。这是伊朗二十年来首次出现女权示威抗议，上一次是为了抗议霍梅尼强制女性穿戴头巾，这一次是为了抗议法律的基础不平等。

对于那些因为相信哈塔米的承诺而感到恼怒的人，阿希耶赫．阿米尼对于他们的感受并没有强烈的体会。但相较于一九九七年，阿希耶赫觉得自己对于二〇〇五年总统大选的胜负更加关注。她并不期望奇迹出现：民主、言论自由、解放的市民社会。她不认为在国内能有与强硬派一较高下的候选人，也不认为人权支持者能敌得过司法部。她只希望跟政府之间能有合作的空间，有脱落的线头供她拉扯，在国家沉

重的盖子之下能有些许针孔供像她这样的活动分子呼吸。她为女性、青少年与伊朗法律下生命的神圣性争取权利，这是个漫长而缓慢的路途，无论谁当总统，这一路上都将遭受敌视。而基于这个理由，一旦总统也成为敌视她的人，整个世界必将更为不同。

没有人想把票投给穆斯塔法．莫因，莫因是哈塔米的教育部长，也是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的候选人。阿希耶赫的朋友与亲戚对她说，如果连哈塔米都无法有所建树，那么对于更缺乏魅力的莫因他们还能期待什么？如果连哈塔米都无法击败强硬派势力，那么莫因又怎么可能敌得过？尽管如此，莫因做的事却赢得阿希耶赫的尊敬：莫因让竞选团队邀请女权活动分子、人权活动分子与记者前来与他进行讨论。阿希耶赫同时具有这三种身分，因此受到邀请。阿希耶赫发现当活动分子发表他们的挫折与期望时，莫因都仔细聆听着。

莫因开始高谈性别平等，并且引用《古兰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权活动分子打断了莫因。

「不要再提真主了，」她说道，「我要你回答我，你不是真主派给我们的使者。如果我们投票给你，你必须为我们做事。」

选后，阿希耶赫从莫因的朋友那里得知，莫因认为这场会议是这场选战中最棒的经验。他对他的朋友说，从女权活动分子口中，「我听到了这三十年来我从未听到的声音」。

会议之后，阿希耶赫深信莫因当选总统的话，必能提供她持续工作所需的空间，而且也会比她记忆中的拉夫桑贾尼政权卷土重来更能与她意气相投。当顽固的改革派人士呼吁抵制选举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阿希耶赫．阿米尼反而恳求她的朋友与家人跟她一起投票给莫因。可是她无法说服贾瓦德或她的姊妹。当艾哈迈迪内贾德挤进第二轮时，她愤怒地指责她的亲人。她坚持，他们以及其他抵制第一轮选举的人都要为眼前的可怕选择负责。他们必须硬着头皮投票给拉夫桑贾尼，因为另一个选择更令人无法忍受。

艾哈迈迪内贾德就任总统时，一股寒意几乎马上降临在剩余的改革派报刊上。阿希耶赫回忆说，有些审查来自报刊内部，而且是可预期的。此时不是与检察长办公室作对的时候。阿希耶赫的编辑要她停止发表这么多女性报导，《信任报》不是女性主义报纸。经过几次争论之后，阿希耶赫离开《信任报》，到欧米德曾经待过的负责推广市民社会的非政府团体。她负责管理团体的网站，并且利用自己的时间研究死刑案例。现在她看起来完全像是个活动分子而非记者，而她的工作也更直接地落在新政府的视线范围之内。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情报部长是过去曾经担任特别教士法院院长的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在他的直接命令下，审理阿特法赫．萨哈阿雷赫案子的法官免于遭到起诉。在获得任命后不久，穆赫辛尼－埃杰伊宣布「市民社会」可说是敌人的战略工具，这里的敌人指的是美国。包括阿希耶赫在内的活动分子们现在知道安全部队将以此为借口来进行扫荡。

穆赫辛尼－埃杰伊发表声明后不久，希林．伊巴迪打电话给阿希耶赫。「我们彼此认识，但我们距离遥远。」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说道。伊朗的人权活动分子从现在起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伊巴迪找来大约十名领袖组成团体，其中包括阿希耶赫。他们与他们的组织是哈塔米时代曾经获得培养与放逐的重要市民社会场景的残余。现在，他们遭到孤立而且处境危险。他们必须捍卫彼此，来因应未来可能遭遇的逮捕。他们组织一个秘密网络，定期见面，如果无法见面，便在在线会合。

对阿希耶赫来说，这个网络可以带给她力量与支持。尽管笼罩的阴霾逐渐扩大，阿希耶赫还是持续进行研究与拥护人权。她接受未成年人被判处死刑的案子；她无法判断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她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无论这些年轻人在十八岁前做了什么，国家都不应该处死他们。如果伊朗的法

律不认为他们是孩子，那么至少国际法是这么认定的。

住在拉什特的德拉拉．达拉比从四岁就开始画画，聪明的她深获父亲的喜爱。十七岁时，她与一个十九岁的男孩交往，这个男孩名叫埃米尔．侯赛因．索图德赫。埃米尔．侯赛因想娶德拉拉，他急着筹钱来准备迎娶的事。根据德拉拉日后的说法，二〇〇三年某天夜里，埃米尔．侯赛因引诱她到她父亲的一个有钱的女性亲戚家中。德拉拉表示，在亲戚家中，她被埃米尔．侯赛因下了镇静剂，因此当埃米尔．侯赛因杀死亲戚并且洗劫亲戚家时，她无法反抗。埃米尔．侯赛因恳求说，如果他们被抓，就让德拉拉出面顶罪，因为她只有十七岁，不会被判死刑。埃米尔．侯赛因已经十九岁，他必定要面临死刑。

埃米尔．侯赛因的朋友偷偷把事情告诉德拉拉的父亲。达拉比先生把德拉拉叫到面前，他想知道那个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德拉拉承认是真的。她的父亲一气之下，不想再听任何解释，直接报警把他的女儿与她的男朋友带走。往后两个星期，他完全没有德拉拉的消息。然后他得知德拉拉已经坦承犯案。

德拉拉的父亲到狱中看她，问她是否真的杀害亲戚。

「你怎么会这么想？」德拉拉回答说，「我有能力杀人吗？」

与埃米尔．侯赛因的预测相反，当二〇〇五年二月这个案子开始审理时，德拉拉在案发时的年龄并未让她获得宽大处里。虽然她推翻自己先前的说法，却还是被判处死刑。往后三年，她的律师不断要求再审，而他也找来阿希耶赫到拉什特研究与公开这个案件。

每当德拉拉的父亲向阿希耶赫提起女儿，都忍不住哭泣。如果他能聆听德拉拉的说法，相信那是她男友犯下的罪行，并且从一开始就阻止她为她的男友顶罪就好了。阿希耶赫想看德拉拉的画，原本预期只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少女的作品，但她却看到了杰出而惊悚的景象，其中有许多是德拉拉在狱中完成的作品，她用手指取代画笔，绝大多数是以黑白两色呈现，并且添上显眼的红色。画中的人物骨瘦如柴或蒙上双眼，遭到监禁或面对绞索；他们在黑暗中发出亮光，被阻隔在铁丝网与栏杆之后，他们的脸上满是摧残的模样。德拉拉描绘了死亡、监狱与她对不公义的印象，像她这样的人，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都会被当成天才。

「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你女儿的报导，」阿希耶赫对达拉比先生说，「但我更倾向于将你女儿的画作展示给世人。这些画

比我的解释更能说明一切。」

二〇〇六年五月，阿希耶赫接到一通令她困惑的电话。一个住在马什哈德的老朋友读到阿希耶赫关于青少年死刑犯的报导，这个朋友想知道，阿希耶赫是否也报导其他形式的司法处决案件，例如石刑。

石刑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刑罚，通常用在通奸者身上，人们会把已婚的妇女与她的爱人埋在坑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然后持续朝他们的头部与身体丢掷石块，直到他们死亡为止。显然伊朗刑法并未授权执行这种野蛮的刑罚。事实上，阿希耶赫曾经问过夏迪．萨德尔这类案件，因为夏迪曾经看过某些案子里提到这种刑罚。夏迪向阿希耶赫保证，二〇〇二年，大法官阿亚图拉沙赫鲁迪已经下令中止石刑。夏迪说，也许有些犯人被判处石刑，但这种是虚有其表的威胁，不可能执行，实际上执行也是非法的。

阿希耶赫向在马什哈德的朋友说明夏迪的解释。那两个人不可能被实施石刑。但朋友坚持阿希耶赫应该亲自来马什哈德看个究竟。

朋友与同事都警告阿希耶赫别管这件事。如果真的有石

刑，一定是秘密执行，无论是谁下的命令，必然会想办法隐瞒这件事。但阿希耶赫还是去了马什哈德，而且找到了消息来源。那个人是阿希耶赫待在马什哈德那一年认识的老朋友的邻居。他为革命卫队情报单位工作，而且目睹了一切。

阿希耶赫与一名同事邀请他上他们的车，让他带着他们前往执行石刑的地点。这名卫队成员带着革命卫队情报单位的无线电，每当无线电发出细微的爆裂声时，阿希耶赫就觉得自己的皮肤一阵刺痛。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这个人，但之后这个人说话了。这名卫队成员对阿希耶赫说，他原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穆斯林，但那天经历了贝赫什特．雷札公墓的事情后，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了。

被处刑的两个人名叫马布贝赫与阿拔斯。判刑的法官写信给革命卫队的情报单位、省政府、巴斯基与当地的巴士站，表示将在公墓进行一场伊斯兰仪式，希望有人能自愿参与仪式。许多人登记报名，有些人是革命卫队成员与巴斯基，有些人是巴士司机。然而没有人知道要进行什么仪式。

阿拔斯与马布贝赫被带到现场，他们人还活着，身上却穿着寿衣；他们被放进地面已经挖好的坑洞里。但女人的坑洞不够深，她的胸部必须完全被土盖住才行。于是又把她拉上来，把洞挖深一点。

一名在马什哈德担任重要法官的高阶教士向众人吟咏诗句。他告诉大家，他们对这两个人丢掷的每一块石头，都将用来建造他们在天堂的家园。他自己先丢了第一块石头。

阿拔斯默不作声，也许他已经死了，也许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他一息尚存的身体。但女人却哀号着，她说：「请砍下我的头，砍掉我的脚。但不要用石头丢我。」

他们抵达公墓。阿希耶赫的同事蹒跚下了车，在一旁呕吐。卫队成员继续说着故事。他告诉阿希耶赫，他不想参与这件事。法官叫唤他，要他丢石头。他说他的工作是保护群众，他不是自愿者，他不会放弃他的职责。但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别的事情。这名法官，这名教士，嘴里不断说着真主与先知。但这名卫队成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真主与这样的先知。

「有石刑的影片。」卫队成员对阿希耶赫说。

「在哪里？」阿希耶赫问道，「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影片。」

卫队成员说：「我有一份拷贝。如果你能保证有国家愿意提供我还有我的家人安全避难所，我就把影片给你。」

阿希耶赫无法做出这样的保证，但她也对这名卫队成员产生恐惧。现在他知道她是谁，也知道她知道这件事。她告

诉他她会留意这件事，但她永远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阿希耶赫很清楚，石刑确实发生了，而且是秘密执行。阿希耶赫拿这件案子去找承审法官，法官拒绝接受访问。阿希耶赫说，没关系，但能不能告诉她，是不是他下的判决？

他是依据法律下的判决，法官回答说。法律不是他制定的，他必须执行法律。

阿希耶赫提醒法官，司法总监曾经下令停止执行石刑。法官露出轻蔑的表情。他解释说，伊斯兰教法是最高的律法，而非司法部。身为法官，他不对任何德黑兰官员负责，而是对伊斯兰教法本身负责。他会自己下决定，不受条约、立法或沙赫鲁迪的政策影响。

阿希耶赫把这段陈述以及其中蕴含的对司法部职权的理解，带回给她在伊斯兰女权社群的朋友。她们先前决定把歧视性的法律做为抗争的重点，但现在她们才理解先前未曾理解的事。她们可以将她们的要求告诉政府，甚至直接向司法总监申诉，或许可以得到聆听与响应。但是，在伊朗体制下，法官都是由接受伊斯兰法学训练的教士出任。最强硬的法官认为他们是向比国会通过的立法位阶还高的伊斯兰教法负责。阿希耶赫不久将会知道，伊朗的宪法与刑法模棱两可，居然同时支持上述观点以及与其相反的观点。

阿希耶赫的所有案子都与律师夏迪．萨德尔进行非正式的合作：阿希耶赫进行研究以及与被告接触，夏迪提供法律建议与辩护。现在，阿希耶赫去找夏迪，告诉她自己在马什哈德知道的一切。她深信石刑确实存在，但她没有档案证据。如果阿希耶赫公开报导这件事，司法部会说她说谎，届时阿希耶赫既无法提出证据，也无法让自己免于报复。那些该为此事负责的人将在她挖掘出更多证据之前设法让她闭嘴。在哈塔米时代，要公开这类故事已经有风险；现在，在强硬派统治的压迫越演越烈以及更加不透明的状况下，做这种事简直是有勇无谋。

同年稍早，阿希耶赫在拉合尔的会议上见到几位巴基斯坦的女权活动分子。她曾与她们提到巴基斯坦的石刑问题，而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也有石刑。在巴基斯坦，石刑不是司法惩罚，而是村民们自愿进行的族间血仇（vendetta）。巴基斯坦女性主义者开始透过揭露与谴责来去除石刑。阿希耶赫提议，她与夏迪可以尝试这种做法。她们不会具体谈论个案，只会向民众传达石刑的不当；在此同时，阿希耶赫则继续研究马什哈德的案子，直到可以向大众公布为止。

夏迪欣赏这个想法，她找了第三个伙伴加入，这个人是著名的女性主义前辈，拥有革命运动与伊斯兰左翼的背景。她们三人与另外两名女性共同发起「永远停止石刑」（Stop

Stoning Forever）运动，后者因为居住国外，所以可以传播她们的发现与引起国际注意而不用担心风险。

阿希耶赫回忆活动初期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她原本独自投入死刑案件，但现在却逐渐产生影响，拥有了伙伴与更大的目标，在她的身边也有了强大的团结力量。阿希耶赫与伙伴面对的每一件案子都跟过去接触的案子一样悲惨，但在下班后，她们会在晕眩的派对中唱歌跳舞，藉此纾解内心的焦虑与消耗剩余的精力。有一次，她们当中的三人租了一辆巴士，带着她们的孩子前往北部的克拉尔达什特，这是位于马赞德兰省的一处草木葱郁的谷地。她们整个周末都待在阿希耶赫朋友的度假屋里，放松之余也计划着运动的未来。

当一群妇女在足球场外静坐，抗议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时，阿希耶赫与其中一名伙伴也参与其中。伙伴的脚因为警察的攻击而严重受伤。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二日，当其他团体在德黑兰四月七日广场发起女权示威抗议时，阿希耶赫也前往支持。妇女们面对封锁线与警察，而警察以警棍、胡椒喷雾剂驱赶她们，并且用有色颜料标记她们，让警察能够逮捕脱逃的抗议者。当天有七十人被捕，阿希耶赫不在其中。七十人当中有十四人被以「破坏国家安全」或「危害公共秩序」的罪名判刑。

这段时期与阿希耶赫所知的其他时期一样黑暗，但这段时期也是伊朗妇女运动团结的时期。这场运动就像在花岗岩山腰建立城市一样，注定要经历艰困。四月七日广场抗争之后，有些女权活动分子发起所谓的百万联署运动。她们印制小册子，上面详列歧视女性的法律。活动分子私底下将小册子发放给妇女，向她们解释内容并且收集废止这些法律的联署签名。

阿希耶赫与她的伙伴采取不同的做法，她们的武器是透明化，因此她们的运动仰赖媒体。她们也肩负报导的重担：她们需要确实的证据证明司法部并未遵从中止石刑的命令。

阿希耶赫让参与运动但已经移居国外的伙伴采访自己，在访谈中，阿希耶赫提到她曾听说马什哈德有一起石刑案件，而她正对此进行调查。这个访谈终于引起阿希耶赫希望得到的响应：受害者家人的朋友跟她们连系，他要带她们去见被石头砸死的妇女的子女。

阿希耶赫回到马什哈德寻求完整的故事与相关证据。根据家人的说法，马布贝赫嫁给家暴的丈夫，他不仅把马布贝赫打得头破血流，还带其他女人回家过夜。马布贝赫完全不想嫁给这个男人，是她的父亲坚持把她嫁过去的。她曾经四度尝试与家暴的丈夫离婚，但父亲告诉她，如果她这么做，

她将无家可归，因为他不会支持马布贝赫这么做。阿拔斯爱着马布贝赫，于是杀了她的丈夫。在刑求下，马布贝赫被迫承认她与阿拔斯有性关系，因此犯下杀人罪。阿希耶赫无从确定这种说法是否真实，马布贝赫的家人则是予以否认。但这显然是对这两人实施石刑的理由。

马布贝赫的家人给了阿希耶赫两份文件：一份是法院判决书，证实石刑确有其事；另一份是法医报告，证实了死因。阿希耶赫于是在部落格上公布她所知的一切，这则故事没有任何报社敢刊登。司法部长贾马尔．卡里米－拉德召开记者会，他表示，这则石刑故事是谎言。国家媒体散布谣言，说永远停止石刑运动拿了外国的钱，宣传虚构的故事，散布西方对伊斯兰律法的偏见。

技术上来说，石刑并不局限于女性议题上。至少就被指控与已婚妇女发生性行为的男性来说，被施以石刑的状况也不少见。但最终来说，通奸还是属于女性的议题。男性在法律上可以拥有四个妻子与多个情人；女性想要反对，也只拥有有限的救济手段。女性提出离婚的权利与男性并不对等，就算真的离婚成功，她们也会自动丧失七岁以上子女的监护权。已婚妇女如果没有丈夫允许，甚至不能外出工作。拥有情人的女性，将会与她们的情人以犯通奸罪为由而被处以石刑。阿希耶赫与永远停止石刑运动的伙伴希望藉由揭露石刑

依然存在，将一连串歧视性的家庭法公诸于世。

永远停止石刑运动的创立者持续接受访谈。阿希耶赫在全国进行游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城市，从监狱到监狱。二〇〇六年一整个夏天，阿希耶赫只有两个周末与家人共度。阿希耶赫与伙伴发现有十四个人被判处石刑，而且找到他们的家人与律师。夏迪建立一个网络来协助没有律师的石刑受害者，很快地，永远停止石刑运动拥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阿希耶赫负责外勤，夏迪负责法务，而第三个伙伴负责活动分子运动。她们无法在国内发表文章，于是就把案例的内容发送到国外，给像国际特赦组织这样的团体，然后这些信息就会像回力镖一样送回到伊朗。

阿希耶赫忙着计划德拉拉．达拉比二〇〇六年秋天的画展。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到狱中见过德拉拉，也见过德拉拉的法官。不知何故，与之前阿特法赫的法官一样，阿希耶赫觉得这名法官似乎决心处死这名孱弱的女孩。阿希耶赫希望自己能让德拉拉成为一个艺术名人，藉此先发制人，影响法官的决定。

阿希耶赫为德拉拉找到了画廊。这间画廊属于莉莉．戈雷斯坦所有，她是在库德斯坦被地雷炸死的摄影师卡维赫．戈雷斯坦的姊姊。当阿希耶赫与贾瓦德把德拉拉的画拿

给莉莉．戈雷斯坦看时，她感到吃惊。她不在乎这些画作的质量，因为她认为这个运动的宗旨很重要，因此她无偿提供空间供画作展出。但莉莉还是对阿希耶赫说，这些画「令人惊艳」。光从画作本身来看，德拉拉的作品值得举办展览。

展出第一天出现了戈雷斯坦画廊从未见过的盛况：五名大使到场，还有大批摄影师、记者与活动分子出现。此次的新闻报导遍及全球。德拉拉的照片，戴着蓝色头巾，目光低垂，指关节顶着嘴唇，露出沉思的模样，出现在远至意大利与布基纳法索的抗议者标语牌上。她展览上的画作也是一样。

画廊墙上贴着德拉拉的声明：「在你面前的画，不是无言的景象与色彩，它们是我们生活上如照片般的痛苦现实。每天，我眼前见到的脸孔，只有墙壁。三年来，我用颜色、形式与言语来捍卫自己。这些画是对我从未犯过的罪行的誓言。在这些色彩带我重回世间之前，我只能从墙的后头向前来观看我的画作的人致意。」2

德拉拉继续在墙的后头待了两年半。然后法官秘密行刑，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任何通知。二〇〇九年五月一日，德拉拉．达拉比在早上七点打电话回家，若有人听见，她说的最后几句话就是：

「喔，母亲，」德拉拉说道，「我看到刽子手的绞索就在

我的面前，他们要处死我了。请救救我。」[3]

司法部长贾马尔．卡里米－拉德在每周记者会上几乎都会提到阿希耶赫与她的同事，他威胁说，国内某些势力胆敢威胁司法部，这个问题必须处理。阿希耶赫从其他人那里得知，司法部长正伺机逮捕阿希耶赫，因为她的做法触怒了他。如果有任何事或任何人可以让阿希耶赫停手，那就是司法部长；但阿希耶赫还是继续追查石刑案件。

在加兹温省的城市塔克斯坦，贾法尔．基亚尼与他据传的情人莫卡拉梅赫．易卜拉希米因为将近十年前犯下通奸罪而被判石刑，法院直到现在才要执行刑罚。永远停止石刑运动开始行动，以各种方式将她们对这个案子所知的一切公诸于世。终于，阿希耶赫得知石刑遭到中止，这对运动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几天后，阿希耶赫听到别的消息：基亚尼被秘密带往城外的山区，在那里被处以石刑。

阿希耶赫前往当地山区，一名村民为她指出血迹斑斑的石块。她把这些石头收集起来，带回德黑兰做为证物。她拍摄照片与影片，而且采访了当地村民。然后她在城市加兹温稍作停留，当地一名活动分子找她前来，阿希耶赫于是来此与他见面。这个活动分子有一份重要文件：有人偷偷从审理基亚尼案件的法官桌上拿了文件，并且将它扫描下来。扫描

的内容存在光盘里，他要求阿希耶赫阅读这份文件，然后销毁光盘。

这份文件是塔克斯坦法官给沙赫鲁迪的信，信中明确反对中止石刑。法官宣称，无论沙赫鲁迪下什么命令，他都不会停止执行石刑，因为伊斯兰律法站在他这一边。此外，法官引用了阿希耶赫从未看过的法律条文；条文授予法官裁量权，法官可以对违反贞洁的罪行处以石刑与一百下鞭刑。凡是认为这些惩罚具有合理性的法官，都可以独立于体制之外实施刑罚。虽然宪法规定，法院必须根据国家法律进行判决；但宪法也规定，如果国家未提供相关法律，法官可以诉诸「伊斯兰来源与可信的教令」。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刑法典上。塔克斯坦法官最后说道，阿亚图拉沙赫鲁迪也许是司法总监，但在贾法尔．基亚尼的案子上，他毫无置喙余地。

阿希耶赫依照活动分子的嘱咐销毁光盘，但她把光盘的内容记在心里。她现在了解，司法部内部正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有些法官只根据国家的刑法典判决，但另一些法官则超越刑法典之外，引用伊斯兰教法来判决。愈来愈多的基本教义派法官不接受沙赫鲁迪的权威。不幸的是，沙赫鲁迪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只会让他的敌人更加肆无忌惮。

阿希耶赫不愿保持沉默，她在返回德黑兰的出租车上接

受德国之声与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访谈。她等待结果。但是，几天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贾马尔．卡里米－拉德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阿希耶赫有点难为情地承认，她当时确实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二〇〇七年春，阿希耶赫收到几个活动分子同事的信。去年在四月七日广场抗争时被捕的五名女性，将在三月四日开庭审判。信上表示，女权活动分子社群必须表现对这些妇女的支持，她们将在法院前面进行沉默抗议。

这些沉默抗议群众才刚在法院聚集，警察就开始抓人。警察粗鲁地抓住阿希耶赫，连大衣都扯破了。被告与她们的律师，包括夏迪．萨德尔，一同走出法庭，也参与抗争；她们也一起被抓。阿希耶赫与其他三十二名女性先被带到沃札拉，这里是道德警察平常使用的监禁中心。抓捕她们的警察也是女性，这些活动分子觉得有机可趁。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你们』，」一名活动分子对女警说道，「为了你们的女儿，你们的侄女、外甥女。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这些警察与被拘留者突然开始讨论起来。有些女警坦承，她们的确支持妇女运动，对于拘留她们也感到遗憾；有些女警则对着同情的女警大吼，要她们闭嘴。被拘留者被移往埃

温监狱，所有的讨论到此结束。

阿希耶赫从眼罩底下可以看到，讯问者手中有厚厚一迭档案。在档案的最顶端，阿希耶赫觉得自己看到了从自己的部落格打印下来的数据。讯问者抱怨，某天她遭到监禁的事引来大量的新闻报导。她能说什么？阿希耶赫不经意地想着，难道这表示她与她的同事很重要？但讯问者说话的语气与内容让阿希耶赫想到别的事。按理她现在不应该待在监狱里。安全部队原本是想持续监视她与其他女权活动分子，追踪她们的网络与活动，最后再一网打尽。但法院外头的抗争行为构成了挑衅，所以她现在才在狱中。

讯问者知道，活动分子计划下个星期在国会前发动一场女权示威活动；他指示阿希耶赫应该取消这场活动。阿希耶赫说，她不可能在监狱里取消活动。讯问者说，阿希耶赫迟早都会出狱。确实如此，阿希耶赫与其他绝大多数犯人都在被捕的五天后获释。只有两个人还关在牢里，她们是永远停止石刑运动的两个伙伴。

所有获释的妇女都收到相同的指示：取消示威抗议。但如果她们这么做，很有可能有些人未能及时收到通知。到场的妇女将受到残暴的镇压，组织者要为此负责。但是，如果她们不取消行动，阿希耶赫很确定她的朋友将会在狱中受苦。

阿希耶赫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应该取消示威，但她们也应该在原定时间前往国会，告诉那些误以为示威继续进行的人赶快回家。她们会直接向安全部队表示，她们来这里是为了取消示威。但安全部队依然用警棍殴打她们，阿希耶赫拍了一张活动分子的脚严重瘀青的照片。

剩下的两名犯人于三月十五日获释，其中一名的保释金是二十二万美元，另一名是二十八万美元。两人各自经营的组织都被勒令停止，但不包括永远停止石刑运动。

她们现在知道自己的工作已经受到严密监视，她们的生活也是。阿希耶赫知道自己的电话遭到监听，她的行踪也遭到监控。某天，一名陌生人顺道拜访阿希耶赫的一个邻居；他说他是为了处理保险事宜而来研究车祸报告，他问邻居大楼里的所有家庭与他们的车子。之后他离开，但过了几分钟又按了邻居门铃。他透过对讲机说道：「我忘了问你阿米尼太太的车子。她的车子是哪一辆？」

这个邻居并未告诉他阿希耶赫姓什么，而大楼里的人也只知道她的夫姓，大家都叫她蒙塔泽里太太。

某天傍晚，阿希耶赫独自在家。艾娃在朋友家，贾瓦德去工作。公寓很阴暗。突然间，阿希耶赫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她觉得很想哭，却发不出声音来。她以为自己快死了。

她去冲澡，然后检查电子邮件。她看到已经流亡的记者朋友留给她的问候短信。不知何故，她的情感决堤了。她发出剧烈的呜咽声，而且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的邻居跑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阿希耶赫骗他们说，她有个亲人去世了。

阿希耶赫的电子邮件信箱塞满恐怖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遥远的城镇，来自死囚的亲人与律师，这些死囚已无计可施，而他们听到阿希耶赫所做的一切。阿希耶赫得知塞姆南省有三个人即将遭到处决，她把这件案子交给另一个活动分子团体。但某天早上五点，阿希耶赫还是接到那些死囚律师的电话，他说这些人即将被绞死。就在这个时候，阿希耶赫的手突然麻掉了，她的手动不了。她看着自己的身体，彷佛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不久，她整个人又恢复原状。然后，阿希耶赫前往拉什特探望德拉拉的母亲。回程的路上，夜里，她的身体在颤抖，似乎是发烧引起的；这种状况现在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一次。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烧，她觉得应该是病毒引起的。她吃了药，但颤抖的现象没有改善。

运动内部出现了麻烦。阿耶希赫的伙伴们飞到了比阿希耶赫还高的高度：她们的国际连结更多，有时也更投入于构建理论上，阿希耶赫认为这只会让她们忽略本业。尽管业务量不断增加，运动内部还是出现了分歧与不合。某天下午，阿希耶赫正在讲电话，她与一名伙伴正在密切讨论，但她却

倒下了；电话掉落。她并未昏睡，她可以听到房间里的声音，但她动不了。大约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她一直躺在地上。

阿希耶赫开始觉得头痛：无论吃什么药或接受什么疗法都无法缓解这种头痛欲裂的感觉。阿希耶赫的伙伴没有回复她的电话或电子邮件；她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绝望的人正仰赖她们。最后，阿希耶赫去看神经科医师。医师怀疑，阿希耶赫可能出现某种神经性休克。除了休息，没有别的治疗方法。每天每夜，她的身体都会颤抖，她不断地发烧。然后有一天，她无法移动她的眼睛、肩膀、脖子。阿希耶赫去了医院。

阿希耶赫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从脑膜炎、艾滋病到疟疾，做了各种检查。阿希耶赫还做了核磁共振与腰椎穿刺。检查结果完全正常，但她的头痛以及现在连眼睛也开始的疼痛已变得难以忍受。她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要从头骨蹦出来。但医院不能收治她，因为根据检查结果，她很健康。急诊科医师说，也许她该去看眼科。她既愤怒又怀疑地离开医院。第二天早上，阿希耶赫醒来时，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见东西。

阿希耶赫的眼睛看起来就像两颗红色灯泡，彷佛她的眼睑外翻肿大成葡萄的大小。她去看了非常有名的眼科教授，他也说没有问题。阿希耶赫快被逼疯了，她问道，她已经看

不见了，为什么眼科医师还说她很正常？

「孩子，」教授说道，「我可以检查你的眼睛，但出问题的不是你的眼睛。」

阿希耶赫去看了德黑兰最顶尖的神经科医师，他确认了第一个神经科医师的说法：心理性的因素引发身体休克，因而导致神经系统的震荡。她的症状极为罕见，一百万人中会有一个例子像她那样，在极度压力下产生这样的反应。然而，当医师了解阿希耶赫的工作性质后，他相信他的诊断是正确的。医师开了高剂量的可体松帮阿希耶赫消肿，这种药物使阿希耶赫的记忆减退、心智迟钝。有时当她走出家门，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阿希耶赫脑袋变得不清楚，失去活力，而且对于永远停止石刑运动感到厌倦。她无法与夏迪沟通。但阿希耶赫连络上运动在蒙特娄的联系人，在国际组织的保护下，运动最近开始在当地运作。对方要阿希耶赫放轻松；没有她的话，这个运动无法继续下去。

然而事实上，整个情势早已翻转。阿希耶赫生病期间，她的同事解散了伊朗的永远停止石刑运动，并将其并入以蒙特娄为据点的组织。就这样，阿希耶赫建立的一切完全消失。她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是谁从中搞鬼。

阿希耶赫逐渐恢复健康，之后她受到情报部的传唤。讯问者很清楚运动的事，情报部探员曾经闯入她的办公室搜索档案。讯问者询问她的健康，特别是她的眼睛，彷佛想让她知道，他对她的事无所不知。在阿希耶赫看来，就连她的身体也遭到恶意的检视。但情报部最想知道的还是阿希耶赫协助组织的市民社会活动分子网络。

阿希耶赫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几个月。她失去了永远停止石刑运动、工作、朋友，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最先恢复原状的是最后两者，她的眼睛消肿了。二〇〇九年三月，阿希耶赫的身体状况已经可以让她前往纽约，向联合国的分支团体发表青少年死刑犯的演说。然而，当阿希耶赫想到死刑犯的家人将黯淡而脆弱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而她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运动已经瓦解时，阿希耶赫开始陷入沮丧。

阿希耶赫曾对讯问者念了一首诗：「我对你说过无数次／『别带着枪进入我的梦中』。」她还给一位在美国的外籍朋友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谈到人权工作者需要接受培训、咨询与休息时间，而她之前从未想过这些事。这位朋友将阿希耶赫的信翻译后发布在英语网站 Iranian.com 上，她还附上阿希耶赫眼睛的照片，只见令人吃惊的红色突起物塞在眼窝里，但这与阿希耶赫的医师当初看到的状况相比已是小

巫见大巫。

其他国家的人权工作者是否更有准备、训练更充分？阿希耶赫不知道。但阿希耶赫无法想象有哪个地方会比伊朗的情况还要更混乱。她曾在信里反省，认为自己过去与研究主题纠缠太深。德拉拉、阿特法赫以及其他人不断出现在她的梦中。她与母亲们一起坐在绞死她们儿子的绞刑架旁。她没有模范、导师或手册可以遵循，如果有的话，就能警告她保持距离或提醒她再这样下去也许会崩溃。

「真相是，我们是在一座遥远的岛屿上工作着，」阿希耶赫写道，「我们只身一人。当我用疼痛的双眼盯着天花板两个月后，我才了解这一点。」

＊ ＊ ＊

(1)穆拉：指受过伊斯兰神学与伊斯兰教法教育的人。在大多数的伊斯兰世界，地区的伊斯兰教士与清真寺领导者，都会被称为穆拉。

第十六章　污泥与尘垢的史诗

每个世代的命运必然掌握在自己手里。

——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1]

二〇〇九年五月底，德黑兰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政治夜生活。这些活动的颜色是绿色的，也就是总统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的代表色，从哈塔米时代以来，改革派选民一直弥漫着愤世嫉俗的心态，因此这种状况的出现，颇令大家感到意外。起初，当穆萨维参选时，众人并不认为这股所谓的「绿潮」（Green Wave）是由这位缺乏魅力且保守的候选人

带动的，也不认为是改革派知识分子过去提出的愿景此时突然复兴。毋宁说，这是一股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浪潮，点燃它的除了希望也包括愤怒。

穆萨维起初看起来不像是能承载这股愤怒情绪的人。在二〇〇五年受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禁欲主义与老派革命说词吸引的民众，知道穆萨维是货真价实的人物——他是伊斯兰左翼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宗教禁欲主义者，但他不像艾哈迈迪内贾德那样的折衷主义，也不像艾哈迈迪内贾德那样喜爱表现。穆萨维开始吸收急速增长的支持基础，是电视辩论会结束之后的事，从此他逐渐成为其他价值的代表，包括民权与自由以及最重要的法治。穆萨维的思想没有哈塔米那样先进，他绝口不提「政治发展」或「市民社会」。但穆萨维在选战演说时却能明确指责官方的谎言、欺诈与徇私舞弊，并且批评总统不尊重自己圈子以外的人的权利，他认为伊朗的殉难者牺牲生命并不是为了建立这种褊狭的政权。

日后，穆萨维提到「绿色」这件事时，他表示这是支持者做的选择，他个人只是从善如流。「我跟随你」这句话从此与这位前总理紧紧相连。几乎每个人都忘了他说这句话时其实跟绿色运动没什么关系。当然，穆萨维也有可能将「我跟随你」与绿色运动连结在一起。从穆萨维的个性，以及穆萨维在偶然间被征召参选，之后能超越哈塔米开创出自己的道

路来看，这确实是可能的。

午夜之前，阿希耶赫与贾瓦德来到德黑兰街头，并且一直待到破晓。穿着绿衣的群众跳着舞，彼此手臂相扣，释放出以往在街上难以见到的狂野喜悦。众人相互吟诗，不断奚落艾哈迈迪内贾德。巴斯基闯入绿色群众当中，为艾哈迈迪内贾德辩护，群众则与巴斯基辩论，双方几乎可以说维持着礼貌与和谐，充分展现出民主的气氛。阿希耶赫对于眼前的现象有点担心，她对贾瓦德说，这一切看起来很不正常。

六月八日，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八十八组织的穆萨维支持者，计划组成一条长八十八公里的人链，以全国各地城市做为环节。他们排成一列，每个人高举长五十公分的绿色带子做为象征。在德黑兰，人链沿着整条瓦利亚斯尔大街延伸，从北部的塔吉里什广场到南部的铁路广场。在内政部旁的法特米广场附近，许多人聚集起来，车子无法通行。当天，阿希耶赫带着艾娃上街，阿希耶赫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她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出来支持穆萨维。

就连穆萨维的选战志工也对自己协助促成的景象感到惊讶。一名年轻志工看到自己的母亲凌晨一点在广场中央，与年轻人一起高喊口号。她在一九七九年时是个左翼分子，协助霍梅尼取得权力；现在，她告诉女儿，她为自己的子女

带来恐怖的麻烦，她想扭转这一切。

五月底的某个晚上，一名地方记者发现，大批群众聚集在德黑兰北部的查姆兰高速公路，车辆无法通行，民众索性将车停在道路中间，下车与这些年轻人一起唱歌跳舞。这些都是支持穆萨维的群众，他们身上的怒气就跟所怀的希望一样明显。「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艾哈迈迪都没洗澡。」孩子们唱道。一个类似奇多的热销零食品牌，商标上有一只猴子，一名妇人探出车窗一边挥舞着零食袋子，一边指着上面的猴子叫道：「不要投给他！」骑着摩托车的巴斯基只是平静地微笑。

当哈塔米在自由足球场演说时，气氛令人吃惊：场地人山人海，连走道与草地都挤满了人，没有地方可以坐下。几天后，记者在同一个足球场参加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妇女集会，群众显然少了很多，而且年纪偏大，参加者只是尽到最基本的出席，大家看起来都有气无力的样子。记者计算了一下，有六十辆巴士从库姆载运妇女前来，此外也有巴士从洛雷斯坦省载人过来。一名知名女性运动员看到记者朝她靠近，露出惊恐的样子。她把大衣袖子拉起来，露出里面的绿色衬衫。「我们的领队说我们必须来这里，」她说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广场上的那位选战志工回忆她前往伊斯兰夏赫尔与沙赫勒雷伊时，这两个地方是已经并入德黑兰的南部郊区，主要是保守派的据点，但她发现许多人支持穆萨维，她一度以为自己走错了方向。在塔不里士，这里的阿塞拜疆族传统上不信任中央政府也不愿投票，但身为阿塞拜疆族的穆萨维却让足球场爆满，大家挤着要进去听他演讲。

南呼罗珊省的城镇比尔詹德在二〇〇五年时是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据点。一名外国记者曾于二〇〇七年报导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各省巡回考察时如同「摇滚巨星」般大受欢迎，他于二〇〇九年再次来到伊朗，却发现这些城镇疯狂地支持穆萨维，数千名绿衣群众呐喊着，竞相伸手，想用他们的指尖触摸候选人的白发。二〇〇七年，有人说，居民被迫出门投票给艾哈迈迪内贾德。但这一次，「这些人是玩真的。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充满爱」[2]。

二〇〇九年六月，大家似乎都不工作了，时间也似乎静止了。这场发生在天明前的节庆，充满了令人陶醉的非现实气氛。老一辈的观察者把这几个晚上发生的事比拟成一九七九年那段民众狂欢的时光，年轻人则兴奋地暗自预演他们一直向往的自由生活。但对阿希耶赫．阿米尼来说，在兴奋的情绪中隐约带着不祥的预兆。她猜想着，伊斯兰共和国为什么容许这一切？

伊斯兰共和国感到忧虑。几个月后，当革命卫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向教士与穿着制服的卫队成员解释夏日事件时（二〇一四年，贾法里进行说明的影片外流到海外的伊朗人媒体[3]），他表示不能让改革派重新掌权。这是「红线」，至于这条红线是革命卫队还是最高领袖决定的，贾法里并未明说。绝对要阻止穆萨维当选。当绿潮达到高点时，改革派人士公开呼吁革命卫队与巴斯基不许干预选举。这项呼吁的理由很清楚，贾法里说道：少了安全部队的干预，这场选举很可能进入最后决选的阶段。革命卫队不允许这种状况发生，因为艾哈迈迪内贾德并非稳操胜算。究竟革命卫队如何解决这场危机，以及在谁的指挥下进行，贾法里除了赞扬这次行动的成功，其他什么也没透露。

六月九日，离选举还有三天，穆萨维与卡鲁比阵营写信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警告可能有选举舞弊正在进行。他们说，他们从内政部里头的消息来源得知，印制的选票数量远超过可能的选民人数，生效章的制造数量也达到需要量的两倍而且已经发放。候选人表示，这些选票与生效章很可能用在不正当用途上，特别是选票最早开完的较小选区。但他们的要求似乎被选前的骚动所淹没。

六月十一日，大选的前一晚，阿希耶赫与朋友在瓦讷克广场附近发生小车祸。没有人受伤，但她们必须在广场后面

的警察局等候。阿希耶赫在那里看到了与前几个晚上完全不同的景象。巴斯基没有进入群众中为艾哈迈迪内贾德辩护。他们坐在摩托车上，躲在广场后头。阿希耶赫看到其中一个人头上还流着血。

「你怎么了？」阿希耶赫用最轻柔、最母性的声音问道。

「一些穆萨维支持者打我而且打破我的头。」他对阿希耶赫说。

当然，阿希耶赫说，他们揍他绝不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对穆萨维的支持。他跟对方起争执吗？

「结束了。」巴斯基回道。

「什么结束了？」阿希耶赫问道。

巴斯基笑了。另一个听他们说话的巴斯基也笑了。「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对她说，「医师，」他们都是这样称呼艾哈迈迪内贾德，「明天就到。」

这次轮到阿希耶赫笑了。「选举是明天，」她不悦地说，「不是今天晚上。」

「不，」一名巴斯基意有所指地说，「选举是今天晚上。」

选举日当天，阿希耶赫禁不住感到开心与期待。她从未见过投票所是这个样子。选民大排长龙，要排三个小时才投得到票，而从这些排队民众的情绪看来，他们都会投给穆萨维。

作票的传言在群众中传布着，有些听起来相当荒谬，例如有人说投票所的笔装着字迹会消失的墨水。另一些传言则较为可信，据说来自于内政部内部。但改革派人士向他们的支持者保证，安全部队作票顶多只能影响二百万到四百万张选票。随着德黑兰的投票率飙高，四百万张选票几乎左右不了选情。选举很可能进入决选阶段，穆萨维的优势只会更加明显。

下午，一些投票所突然关闭。还有一些投票所选票用尽。从前一晚开始，全国的简讯服务就陷入停顿，到了下午，许多改革派网站突然一片黑暗。阿希耶赫现在确定事情变得不对劲。到了傍晚，她接到一些不妙且令人困惑的报导。然后，投票才刚结束，就发生奇怪的事。

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召开记者会，他宣称选务单位确实出现了不法舞弊。他根据自己目前取得较大比例的选票宣布自己当选，而且要求最高领袖介入。

这是个奇怪的举措。穆萨维不可能已经知道选举的结果，但从他的话语与神态来看，显然他预期到什么，于是决定先发制人。

投票才刚结束，内政部就根据部分回报的讯息宣布选举结果：艾哈迈迪内贾德以明显的差距胜选，内政部当时宣布的数据是艾哈迈迪内贾德获得百分之六十九的选票，不过最后官方统计的数据是艾哈迈迪内贾德百分之六十三，穆萨维百分之三十四。

投票刚结束就宣布选举结果，这样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要统计伊朗的手写选票一般需要十二到四十八小时，而今年的投票率又远高于以往，官方统计投票率达百分之八十五，或三千九百万张选票。内政部表示，结果的计算是根据其中五百万张选票推估出来的。即使如此，这样的计票速度也超乎寻常，而光凭初步的计票结果就宣布最后的选举结果，这在伊朗也是闻所未闻。首都遭到封城，通讯堵塞，革命卫队与巴斯基被派往街头，内政部防守严密，像座碉堡一样。

艾妲．萨达特三十五岁，是来自加兹温的女权活动分子。她是阿希耶赫的朋友，是工厂技师与地毯织工的女儿。艾妲从十八岁开始自食其力，有时一天要在加兹温与德黑兰之间来回通勤八小时，而且跟阿希耶赫一样，她同时兼做好几份

工作。

虽然艾妲的学位是英文翻译，但她在二十几岁时就致力于解决加兹温省村落的虐童问题。艾妲认为伊朗的问题不仅出在政治上，也与文化有关。她觉得民众有必要学会不把暴力当成生活的常态。艾妲已经离婚，有一个小孩。在村落工作几年后，她来到德黑兰，参加了百万联署运动，与人权团体一起捍卫囚犯的权利。

二〇〇九年，艾妲加入卡鲁比阵营。艾妲觉得卡鲁比有勇气而且仁慈，对于她拥护的理念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卡鲁比比穆萨维更为公开地支持女权、人权与政治自由。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总统的这四年间，卡鲁比四处巡视，他这么做完全是基于自己的人道良知。

对艾妲来说，大选前两个星期是全然不同的体验。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主政的四年期间，她的组织每次开会都会有人遭到逮捕。现在，什么事都没发生，什么事都不用担心。只有在尝到自由的滋味之后，艾妲才知道自己有多渴望自由。她这辈子从未这样生活过。

六月十二日晚上，艾妲在卡鲁比的竞选总部。聚集在总部的学生、记者与活动分子对于回报的计票结果感到困惑，他们于是连络各省的竞选团队，此时，办公室主任要他们离

开这栋建筑物。从警方那里传来威胁，安全部队劫掠了位于各个建筑物的卡鲁比办公室，把他们无法带走的东西一一破坏。

当艾妲离开大楼时，她看到警察在摩托车上绑上封锁线，把整栋大楼围了起来。安全部队辱骂现场的竞选工作人员而且吼叫着要他们离开，否则就会遭到逮捕。艾妲冒险走上街头，就在两晚之前，这里还弥漫着令人无法习惯的自由气氛。现在，她看到只要年轻人带着代表穆萨维或卡鲁比阵营的绿色或白色标志，巴斯基便上前予以殴打辱骂。

安全部队在傍晚五点前攻入穆萨维其中一间竞选办公室，他的竞选总部则在晚上八点左右遭到攻击。在快天亮的时候，安全部队以催泪瓦斯与警棍攻击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八十八的总部。活动分子纷纷冲下楼梯，挣扎着要逃出去，一名父亲与他啼哭的孩子走散，有些志工受伤跛行。这是政变吗？志工们彼此问道。为什么要在半夜用催泪瓦斯攻击竞选办公室？

清晨两点，阿希耶赫．阿米尼接到一名知名记者的电话。

「今晚好好睡吧，」记者告诉阿希耶赫与贾瓦德，「因为已经结束了。他们通知所有报社，要求他们改变标题。艾哈迈迪内贾德将被宣布胜选。」

「我知道，」阿希耶赫听到自己说道，「我昨晚就听说这件事了。」

迅速开票，以及随后的通讯中断与威胁的气氛，还有对民众进行搜查、逮捕与攻击，一个才刚以三分之二多数重新选出总统的共和国，完全无法给人一种自信而守法的印象。选票的数量同样启人疑窦。据称穆萨维连在自己的家乡也输了。卡鲁比在二〇〇五年时紧追第二名而排名第三，这次拿到的票数却不到百分之一，比废票的数量还少。少数族裔与农村选民的投票模式也出现剧烈变化[4]。许多选区出来的票数多于当地的合格选民，不过这种状况在伊朗算是正常，因为民众可以在自己当时的所在地投票。尽管如此，有些村落还是突然多出了数百张选票，这样的增幅不可避免引起关注[5]。

穆萨维抱怨有许多他的选举观察员在执行工作时遭到拦阻。设拉子附近某个村落的研究员表示，选票还没在观察员面前进行计票，票箱就被封住而且迅速被搬出投票所[6]。阿塞拜疆省也出现类似的指控[7]。内政部的雇员持续外流一些令人苦恼的传言。六月十三日，某个雇员告诉《纽约时报》，内政部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准备清除一些潜在的怀疑者，然后换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支持者。这名雇员向记者展示他的内政部证件，他解释说：「这些人并未操纵选票。

他们甚至连选票都不看。他们只是写上名字然后在名字前面写上票数。」

对于认为这个选举结果有效的人来说，这一连串的疑点都可以而且将会予以反驳或解释。为了解决这起可能演变成带有恶意的全球争议事件，国外的统计学家会探讨选举数字，不考虑选举发生时的任何脉络，而寻求反常事件或缺乏反常事件的数学证据[8]。但在六月十二日傍晚，对许多伊朗选民来说，这种对选举结果的不信任正快速蔓延而且是发自内心地感到怀疑。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反对者相信，投票率就是致胜的关键，而他们已经赢得投票率，这表示他们不可能败选。艾哈迈迪内贾德要拿到穆萨维两倍的票数，他必须维持他在二〇〇五年拿到的选票，然而他在总统任内的表现过于极端且令人失望，他对保守派也失去吸引力，这可以从二〇〇六年与二〇〇八年的选举结果看出。此外，艾哈迈迪内贾德不仅要维持二〇〇五年的选票，他还要再多得七百万票才行。但在二〇〇五年选举中没有投他的人不大可能是强硬的保守派。当时强硬保守派几乎把票都投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而且最高领袖也要求他们出来投票，说这是对真主与国家的责任。本质上来说，艾哈迈迪内贾德已不可能从强硬保守派催出额外的七百万票。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支持者则认为，穆萨维阵营无法提出

选举舞弊的明确证据。他们说，改革派人士自以为是，完全看不出少数几个来自德黑兰北部常上镜头的年轻人不足以代表全国。承认自己是少数有这么难吗？为什么不能接受投票率激增不是因为绿潮，而是因为对总统有信心？民意调查在伊朗一直没什么公信力，但它确实显示选前艾哈迈迪内贾德居于领先地位（如果艾哈迈迪内贾德选前民调落后，那么改革派人士对选举结果不满还有那么点道理）。绿色人士往往有一种自恋心态，彼此吹捧，对于民众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更具热情完全视而不见。

穆萨维在声明中表示，在漫长队伍中排队数小时投票的民众知道自己投的是谁。与卡鲁比以及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右翼唯一的挑战者穆赫辛．雷札伊一起，穆萨维请求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这场选举无效并且重新进行选举。三名候选人都要求他们的支持者保持冷静。

穆萨维宣示：「我个人强烈抗议诸多明显的违法行为，我要提出警告，我绝不会屈服于这种危险的欺骗行为。一些官员做出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将危害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柱，而且将建立暴政。」[9]

穆萨维与卡鲁比要求允许举行示威抗议。内政部不同意，因为一旦许可，穆萨维与卡鲁比将会以此为由接二连三地进

行抗争。但无论如何，抗争还是发生了。选后第二天，六月十三日，德黑兰街头涌入约一万名抗议群众。黄昏时分，爆发冲突。年轻人焚烧各处的塑料垃圾桶，或许是为了阻止巴斯基与镇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离广场抗议者。革命广场聚集大批群众，有些人高喊：「打倒独裁者！」另一些人则唱着审判日的歌曲。有些抗议者向巴斯基丢掷石块，巴斯基则以警棍、橡胶软管与缆线加以还击。

前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是穆萨维竞选办公室主任，他在前往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总部开会时跟他的女婿讲电话。塔吉札德赫说，他相信他在内政部的老部下说的是真的，选举结果是造假。

塔吉札德赫的女婿要塔吉札德赫多加小心，但塔吉札德赫只是一笑置之。他说，没有任何讯问者可以从他口中得到假口供，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你们来监狱看我时别忘了带烟过来。」

塔吉札德赫在参与阵线总部开会时突然遭到搜捕，他与其他几位重要改革派人物一起遭到逮捕并且被送往埃温监狱。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从来不是心思细腻的人，即使他的力量强大，却常常用力过猛。六月十四日，这位总统

在瓦利亚斯尔广场举行胜利集会[10]。他告诉群众，他的支持者不应该理会另一边的恼火输家。他们就像输球的足球队球迷：「那些人为了自己的球队输球而生气，想找机会发泄自己的怒火。四千万人参与伊朗这次选举……，现在四五个躲在角落的污泥与尘垢打算闹事。但你们必须知道，伊朗人民的纯粹之河不会允许这些人得意猖狂。」[11]

后来，就连保守派也觉得「污泥与尘垢」这句话说得太过分，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艾哈迈迪内贾德收回这句话，他宣称他指的是那些暴动与纵火的人：他澄清说，那些人「什么都不是，他们甚至不能算是伊朗人民」。

但是，无论艾哈迈迪内贾德实际的意思是什么，他的话就像在易燃物上激起火花一样。卡鲁比的《国家信任报》刊登一张照片，抗议者高举旗帜，上面以绿色颜料写着「污泥与尘垢的史诗」。这句话呼应了一九九七年哈塔米胜选时众人说的那句话：「三月二日史诗」。另一个标语牌则写着：「我们不是污泥与尘垢，我们是伊朗人民。」狂野的流行歌手穆罕默德．雷札．夏贾瑞安要求政权掌控的广播电台行行好，不要再播放他的歌，他说，因为「这是污泥与尘垢的声音，未来也是」。

胜利集会当晚，诡异地重现了不久之前某个夜晚的场景，

全副武装的安全部队冲进德黑兰大学宿舍。他们将催泪瓦斯罐缓缓滚入学生宿舍的房间里，打破窗户，殴打学生，用空气枪射击学生，而且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安全部队用警棍打死了五名学生，另外射杀了两名学生。五名学生送医急救，在医院里待了二十天以上。

安全部队也闯入其他城市的大学宿舍：塔不里士、巴博勒、马什哈德、札黑丹、伊斯法罕、设拉子。据传设拉子有两名学生被杀，设拉子大学校长辞职以示抗议。就连保守派的国会议长也感到愤怒，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另一名保守派国会议员指责艾哈迈迪内贾德之前的言论，他还表示，在半夜攻击大学生的人才是污泥与尘垢[12]。但调查也是不了了之，只是对试图抹黑政权的不具名破坏者加以指责。

伊朗不是一个为了一点小事就会上街抗议的国家。抗争的代价太高，而回报太少。即使在改革派掌权的时期，总统哈塔米周围的改革派人士仍避免号召支持者上街。穆萨维也一样，但毕竟时代不同了，于是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星期日，水坝溃决。更多的伊朗人走上街头，数量远超过一九七九年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而他们采取的策略直接来自于女权活动分子的剧本。他们沉默地站在一起，许多人手里拿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的票在哪里？」

当阿希耶赫准备出门时，贾瓦德告诉她不要抱太多期待。他还记得伊朗历四月十八日的事，阿希耶赫也没忘。民众会走上街头，这点确然无疑。但穆萨维与卡鲁比则不会。这些政治人物将会做伊朗政治人物会做的事：他们会让民众独自去面对残暴的安全体制。

但穆萨维与卡鲁比现身了，还有民众，如果他们是孤单的，那么他们也是一群人一起孤单。

德黑兰是一座遭到截断与区隔的城市，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而且这种现象正无声无息地进行中，在安全的私人空间与充满威胁的公共空间之间，矗立着一道高墙。但现在情况似乎反过来，德黑兰居民肩并肩，越过占地五万平方公尺的自由广场与广场外的街道。从德黑兰大学附近书店林立的自由广场，到拥有独特拱形纪念碑与六角形花园的自由广场，各个年龄与各个阶层的伊朗民众以及这些年来持续奋斗的活动分子与改革派人士紧密挤在一起，几乎让阿希耶赫透不过气来。德黑兰的保守派市长估计群众有三百万人；阿希耶赫在大学认识的工程师认为有四百万人。广大的群众不约而同保持着静默，他们精神抖擞，毫不畏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群众显现的力量与团结是阿希耶赫从未见过的。即使几

年过后，每当阿希耶赫回想这一幕，都让她忍不住湿了眼眶。当阿希耶赫经过谢里夫大学时，她看到一辆面包车缓缓与群众同行，卡鲁比就站在车顶上。

「贾瓦德，」阿希耶赫回到家时说道，「你是个大输家。因为我活到现在为止，还没参与过像今天这么重要的活动。」

安全部队退却了，也许是接到命令，也许是因为群众的数量太多。但到了当天快结束的时候，枪声划破了示威群众的沉默与安全部队的自制。从录像画面可以看到，民兵在位于自由广场附近的总部屋顶上朝着群众开枪。在德黑兰，至少有八人被杀。在这一天，一名年轻女性走上街头，最后怀里却躺着一名陌生人的尸体，她的大衣浸渗着鲜血，在往后昏乱的夜里，她总做着怀里躺着那名死者的恶梦。

知名改革派人士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他们在自己的家中或办公室遭到逮捕，然后被秘密送往埃温监狱，绝大多数人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断了连系。他们是改革派的中层领导，他们叫得出许多人的名字，他们拥有人脉网络与政治愿景，他们也拥有组织技巧。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从革命时期就已经是全国知名人物，而且全在政府内部担任过职务。

他们当中有内阁部长、副部长与国会议员，也有人质挟持者、市议员、前总统发言人、拉夫桑贾尼与哈塔米的伙伴，

甚至有已经七十八岁的巴札尔甘时期的前外交部长。有些人，如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哈塔米的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受到监视已将近十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扎伊尔德．哈贾瑞安，他仍然需要全天候的照护与许多的医疗。

即使在伊斯兰共和国，这种做法也是前所未见的。主流政治派系整个领导阶层全被当成罪犯加以搜捕。他们的家人对此所知甚少，也无法提供什么讯息，但光是从中透露的一点内容就足以令人感到不安。哈贾瑞安的女儿表示，他的父亲在烈日曝晒下遭受讯问，他们偶尔会将整桶冰水倒在他身上造成他休克。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告诉妻子他被下药：「最后几天，他们让我吞下一颗药丸，我好像与这个世界的噪音与纷扰隔离了。」不久，一些被囚禁者，包括哈贾瑞安与阿卜塔希都发表声明，描述他们在埃温享受很好的待遇与生活质量。他们直到八月一日才公开露面，他们出现在电视上，状况令人吃惊，他们发表被强迫的自白与接受虚假的公开审判。

外国记者被逐出伊朗。网络虽然没有完全中断，但传输速度极为缓慢。当简讯服务仍然运作的时候，贾瓦德．蒙塔泽里收到指导部的简讯。简讯上写着，他未获得授权拍摄抗争照片。类似的简讯发给了所有的摄影记者。贾瓦德并未停止拍摄，也未停止将照片与影像传送给国外的朋友，无论网

络的速度有多慢或监控有多么严重。阿希耶赫为一个名叫每日上线的网站报导街头的情况，并且使用了五个假名。

尽管便衣民兵会毫无节制地殴打他们，但数千名抗议者仍持续每天上街。艾妲．萨达特一整天在街上走着，随身带着水瓶、香烟与打火机做为武装，据说这些东西可以抵挡催泪瓦斯。艾妲总是在讲电话，告诉记者她看到的东西，无论是在瓦利亚斯尔广场，还是在四月七日广场，只要在任何地方看到任何事物都会加以回报。艾妲经常被打，她的朋友因此开玩笑说不想跟她走在一起。有一次她咬了一个攻击她的巴斯基。她不确定对方隔着制服是否感觉得到，但她这么做总比白白挨打好。有时艾妲身上会被抹上绿色与黄色的颜料球，安全部队可以藉此标记出活动分子并加以逮捕。

艾妲如果没有在街头出现，那么就是在埃温监狱前面。数千人被逮捕，而其中有许多人至今仍下落不明。艾妲与一些活动分子同事正在寻找失踪者的家人，希望藉此建立起信息网络。艾妲也在搜寻埃温监狱贴在外头的清单，上面公布了最近被监禁的人的姓名。当清单公布时，即使监视摄影机对准了她，艾妲依然对着录音机大声念出名单上的姓名。然后她回家，把这些姓名誊抄下来，将名单寄给人权组织。艾妲收集了大约两千人的姓名，但这些名字顶多只占失踪者的一半。

有些伊朗人会在夜里爬上屋顶，然后大声呼喊，从一个屋顶传到另一个屋顶：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一九七九年时，革命群众也曾在午夜如此呼喊与回应。当时，这些呼喊代表着以真主之名抵抗雷札沙。现在，这些呼喊则象征着抗议运动面对暴力依然不屈不挠，而且拒绝被贴上反宗教或反革命的标签。民众要求回到过去，他们指责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腐败沉沦。

曾经，在阿亚图拉霍梅尼时代，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会诉诸最高领袖来仲裁争端。霍梅尼从不会站在明确的中立立场，而总是将掌权的派系筛选到只剩单一政党里的一小群人。在政府的核心圈中，霍梅尼扮演着利益平衡者与和事佬的角色。如果霍梅尼出现在二〇〇九年，他还是会以相同的方式行事。

哈梅内伊不是霍梅尼，他从一开始就是派系的一员。霍梅尼仲裁争端时，哈梅内伊就是被仲裁的人，当时的争端往往起于身为总统的哈梅内伊与身为总理的穆萨维之间的不和。现在，身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毫不隐讳他的强硬派立场，他偏袒艾哈迈迪内贾德是众所皆知的事，而他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由年迈的阿亚图拉艾哈迈德．贾纳提主导，贾纳提

也是强硬派，行事也跟哈梅内伊一样偏颇。

尽管如此，即使这是一种幻想，但最高领袖仍有要扮演的角色。唯有哈梅内伊能以最高领袖的地位团结全国民众、约束安全部队的过当行径以及抚慰绿色运动受伤的尊严。艾哈迈迪内贾德全心投入他选择的严厉路线，但哈梅内伊仍有能力松开艾哈迈迪内贾德设下的绞索。最高领袖即将在六月十九日主麻日于德黑兰大学发表谈话，全国民众都紧张地等待着。

礼拜堂挤满忠实的追随者。艾哈迈迪内贾德参加了这场聚会，穆萨维与卡鲁比则是缺席。哈梅内伊讲了一个小时。他一开始先赞扬伊朗人民不受外国阴谋抵制投票影响，踊跃参与这次选举。伊朗人民再次向世界显示，伊朗人民热爱与信任伊斯兰共和国。哈梅内伊坚称，四名候选人属于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而且支持伊斯兰共和国的正当性。哈梅内伊熟知这四名候选人，虽然他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但他也向强硬派群众表示，在这场选战中，没有真正的对立，选民是依据宪法做出自己的选择。

哈梅内伊终于提到艾哈迈迪内贾德与穆萨维的电视辩论会。即使哈梅内伊明白表示在二〇〇五年大选中，他个人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因为艾哈迈迪内贾德对内政与外交的

看法与他较为接近，但他仍斥责艾哈迈迪内贾德不应该指控拉夫桑贾尼与儿子犯下贪污罪。对于穆萨维攻击总统的诚信与性格，而且夸大了国家当前的困境，哈梅内伊也表达深切的悲伤。

最高领袖坚称，这场选举结果具有正当性。「伊斯兰共和国没有背叛人民的选票。」也许有一百万票或更少的票出现舞弊，但一千一百万票造假绝无可能。怀疑选举结果的人应该向宪法监护委员会申诉。街头压力只会造成反效果。诉诸街头抗争将成为暴政的开端。此外，最高领袖表示，抗争为渗透的恐怖分子提供掩护。当这类恐怖分子在群众中煽动暴力，而巴斯基做出适当反制时，出事了还能怪谁呢？

「看到这类事件，令人感到痛心，」最高领袖哀叹说，「看到他们攻击大学宿舍与伤害年轻学生，他们伤害的不是暴动的学生，而是虔诚的学生，而且是高喊口号支持最高领袖的学生。这种事让人感到难过。」

哈梅内伊发挥他的智慧与仁慈，他与人民的一体感，他对穆萨维与进行抗争的穆萨维追随者的痛苦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他避免恶言相向：

政治人物、政党的领导者，以及政治潮流的带领者，你们可以影响民众，有些团体会聆听你们的指示，你们必须留

意自己的行为。你们必须留意自己说了什么话。如果你们显露出一丁点极端主义，人民将会有所反应，因而可能导致非常敏感而危险的状况，其结果甚至连你们也无法控制……。如果政治菁英忽视法律，或一时气愤铤而走险，那么无论是不是出于本意，政治菁英都要对伴随而来的流血、暴力与混乱负责。[13]

穆萨维与卡鲁比向宪法监护委员会申诉，委员会承诺会随机检视几个票箱，但穆萨维与卡鲁比对于这个高层教士组织不抱期望，因为宪法监护委员会行事并不公正，而最高领袖也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不过穆萨维向来以顽固著称，此刻的他也完全忠于人们对他的评价。他针对哈梅内伊的演说提出一份声明，里面再次醒目地提到一九八〇年代是意识形态与希望的泉源[14]。

穆萨维表示，他参与选举是为了向伊朗人民保证，革命并非徒劳无功，我们仍有可能在这个堕落的现代世界维持精神的高尚。「我来是为了告诉大家，规避法律将导致暴政；我来是为了提醒，发挥人性的慷慨不会动摇政权的基础，反而能巩固它；我来是为了宣示，民众期望从他们的仆人得到真相与诚信，我们面临的诸多麻烦就是源自于谎言。我来是为了表明，落后、贫困、腐败与不公不义不是我们的命运。」

与哈梅内伊一样，穆萨维也赞扬民众的参与投票，但穆萨维认为，民众的踊跃投票是为了纠正政府的危机。哈梅内伊试图将政权的暴力归咎于穆萨维，穆萨维也对此做出直接的响应：「如果民众的善意与信任，不能换来对选票的保障，或民众采取文明与和平的方式，却无法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眼前将会出现危险的道路，要对这一切负责的是那些无法坚持和平行为的人。」

哈梅内伊认为光看艾哈迈迪内贾德胜选的票数就足以证明选举舞弊是不可能的，穆萨维则驳斥了哈梅内伊的论点。穆萨维表示，最高领袖这么说等于表示只要作票的数量够大，就足以证明没有作票。这种诡辩侮辱了共和国的国家基础，也鼓励了那些认为伊斯兰教与共和主义不兼容的人。霍梅尼留给伊朗的是比这更好的遗产。

穆萨维告诉他的追随者，他将永远站在他们这边。他鼓励追随者，不要让任何人偷走他们手中的伊斯兰共和国旗帜或他们的父辈奋斗得来的革命遗产。穆萨维告诉他的追随者：「要继续依据宪法明定的自由来从事社会运动，并且跟过去一样，坚持不使用暴力。」穆萨维也在革命的正统下划定自己的领域，认为这个领域理应受到安全部队的保护：

在这条道路上，巴斯基成员不是我们的敌人，巴斯基是

我们的兄弟。在这条道路上，革命卫队成员不是我们的敌人，革命卫队是革命与政权的保护者。军队不是我们的敌人，军队捍卫我们的边疆。神圣政权及其法律体系不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体制保障了我们的独立、自由与伊斯兰共和国。我们反对的是偏差与欺骗，我们要进行改革，一场让我们返归伊斯兰革命纯净原则的改革。

哈塔米曾经称呼穆萨维是「星期六的风云人物」，他指的是被选为总统之后的那个星期六。但没有人想象得到，穆萨维竟成为每个星期六的风云人物。伊斯兰共和国建国以来，没有政治人物像穆萨维那样向群众发表演说。哈梅内伊演说后的星期六是六月二十日，这一天因为被称为血腥星期六而被人永远铭记。穆萨维并未依最高领袖的要求解散支持者，而他的支持者也没有待在家里。他们集体上街，据估计有数万人，充分显示他们的无所畏惧。安全部队以刀子、剃刀与枪枝对付他们。超过二十人被击毙，被殴打致死或重伤的人不计其数。

瓦利亚斯尔广场与革命广场之间成了炼狱，年轻人倒在地上，被巴斯基用棍棒敲打头部，直到他们的脑袋流血为止。阿希耶赫与两个朋友正朝着革命广场走去，此时大批人潮突然朝她们的方向快速奔逃。阿希耶赫感觉自己被群众带着走，然后被两名身穿黑色制服与佩戴大型警棍的高大男子从群

众中拖了出来。他们把阿希耶赫压在墙上，殴打她的肩膀、背部与头部。当她倒地不起时，攻击她的人也消失在奔逃的群众里。阿希耶赫的朋友转头沿着与人潮相反的方向寻找阿希耶赫。但阿希耶赫无法奔跑，而此时的她们必须逃跑。阿希耶赫于是松开朋友的手，自己手脚并用匍匐着爬进最近的巷弄里。

口号的呼喊声与枪声越来越近，浓烟也逐渐遮蔽了天空。阿希耶赫的双眼感到灼热，渐渐地无法呼吸。她在地上拖着身体前行，努力按下离她最近的门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人来应门。一名男子打开门，示意她入内。在庭院里，男子将阿希耶赫全身泼湿，希望能洗净她身上的催泪瓦斯。虽然没什么用，但阿希耶赫对此感到庆幸，因为她在庭院睡着时因为控制不住尿意而失禁了，全身泼湿反而让她免于困窘。那名男子随后又让几名受伤的人入内。

巴斯基就在屋外的巷弄里，他们大声讨论是否该搜查这个街区的所有住户。在庭院里，受伤的抗议民众压低声音，担心自己可能会拖累屋主。阿希耶赫认出其中有一个人是《信任报》的同事，一个父亲与他年纪大约是在上大学的儿子，那儿子满脸鲜血，肩膀骨折。父亲热情地对阿希耶赫说，他的儿子是个诗人，他让他受伤的儿子朗诵自己作的诗给阿希耶赫听，藉此排遣时间。阿希耶赫的头仍感到晕眩，于是

她拿出录音机，把儿子朗诵的诗录下来。阿希耶赫昏昏沉沉地想到，这里是犯罪现场，也许有一天她会需要犯罪证据。

夜晚降临，阿希耶赫动身回家。交通壅塞，一个陌生人让她搭便车，剩下一半的路程，阿希耶赫改搭出租车。阿希耶赫从车窗望出去，目光所及之处，总会看到火光。阿希耶赫还听到枪声。

这是阿希耶赫人生第二度需要挂急诊，但她不敢去。安全部队在各家医院守株待兔。阿希耶赫的一个朋友因为头部外伤跑遍了各家医院急诊室，却发现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最后，他在一间牙医诊所缝合伤口。阿希耶赫找到了愿意到她家看诊的医师。医师说，她运气很好，棍子刚好打到她头骨的坚硬部分。阿希耶赫只需要休息，她的脑震荡就会复原。但阿希耶赫的瘀青很严重。医师为阿耶希赫的瘀青拍了照片，并且为她的脖子开了止痛药。

二十六岁的内达．阿加－索尔坦是来自德黑兰的中产阶级女孩，她攻读哲学、观光与声乐。事实上，她的名字有「声音」的意思。但在她最后的影片中，内达却沉默不语，正是这个影片使她成为国际象征。在影片开始前，她已经说出她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全身像火烧一样！」

在血腥星期六那天，内达胸部中弹，她因为流血过多而死，她的眼睛似乎直直盯着在现场拍摄的来源不详的摄影相机侧边的旁观者。影片中，穿着灰色裤子、黑色大衣的内达双手摊开躺在人行道上，男人们俯身狂乱地要止住她胸口冒出的鲜血。她凝视着，毫不眨眼地盯着，眼神充满恐惧，但随后目光逐渐变得空洞，鲜血如蜘蛛网般往外流淌，之后又从她的口鼻涌出。

内达不是那个星期的第一个死者，甚至也不是当天唯一的死者。但她却是唯一在摄影机前面死亡的人，而这个影片将被全世界的人看到。内达美丽的脸孔被深色的鲜血面罩覆盖，更令人感受到一种恐怖的意味——死亡战胜了生命，然而这一刻来得太早，令人错愕。伊朗国内有着根深柢固的殉难文化，内达成了承载数百万人愤怒与悲伤的器皿。

这名年轻女性毫无武装。她在错误的时刻下车，走上街道。两名男子努力想挽救她，其中一人是医师；在影片中，可以听见他大喊着要其他人压住内达的伤口。另一个声音是内达的音乐老师，他当天陪伴着内达，他叫道：「内达，不要怕！内达，撑下去。」他们试图让她恢复呼吸，然后他们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地将她送上车开往医院。

急救的医师留在现场，他看到群众围住一名民兵，民兵

叫道:「我不是故意的!」群众扯掉这名巴斯基的衬衫，拿走他的武器与他的身分证。然后他们争论该怎么做。他们几乎不可能将他交给警察，虽然有些人在气愤下想立即施以报复，但他们最后决定不让自己也变成杀人犯。于是他们放他走，但留下他的身分证。

目睹这一切的医师后来逃到英国。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子弹是从前方射进内达的身体，打断了她的主动脉，或许还有肺脏。没有贯穿的伤口。医师说，内达的眼神充满惊讶与明显的困惑。内达无辜的样子不断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他连续三天晚上都无法入睡。他因为无法挽救内达的生命而感到内疚，而在内达死的时候，他从她的遗体旁起身，发现自己就站在内达中弹的位置，他开始对自己的性命感到担忧。

影片中另一位目击者，内达的音乐老师，对媒体提到自己对于这个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的死感到痛苦与悲伤。「这是对政府毫无帮助的罪行，」他说道，「这是反人类的罪行。」[15]然后，这名老师遭到囚禁，而且显然被迫提出与医师不同的证词。他表示，内达不是从前面遭到射击，而是从后面，而且现场并没有民兵[16]。这位音乐老师在内达去世五周年时离开人世，据说是因为忧郁与沮丧。

伊斯兰共和国从各方面将内达的死怪罪给抗议者、圣战

者组织、英国广播公司与试图拯救内达的医师。穆萨维表示反对。六月二十一日，穆萨维谈起现在，甚至谈到过去：「要是那些该为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大学宿舍学生被杀事件负责的人能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同样的悲剧大规模地发生，也不会看到真相遭到无耻地扭曲。」[17]穆萨维主张，同样的罪犯，要为操纵选举负责，也要为残暴地对待人民负责，现在，他们居然敢否认数百人曾经目击乃至于记录的事实。

穆萨维坚称：「这棵维护伊朗人民权利的绿树，是在不公义的状况下由这个国家的青年的鲜血浇灌出来的，我会一直站在这棵树的绿荫之下，分秒都不离开。」[18]

当阿希耶赫看到内达死亡的影片时，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这名年轻女性的家人不出面。还有其他抗议民众被杀吗？伊朗是不是又回到了一九八八年，秘密地执行政治屠杀，消息封锁，就连尸体也消失在万人冢里？

某天，一名女权活动分子打电话到阿希耶赫家。那名活动分子说，她需要一件新大衣，她问阿希耶赫愿不愿意陪她去买衣服。阿希耶赫一听就明白这是暗号。好啊，阿希耶赫说，我也需要一件新大衣。

一群人总共六名活动分子聚集在一起，她们全听说了恐

怖而未经证实的事。有些抗议民众遭到枪毙，还有一些人可能遭刑求致死。但没有任何受害者的家人出面；也许他们仍在混乱中寻找他们的亲人，希望能在监狱与医院找到他们。这群女性认为已到了该重启她们的网络的时候。她们会寻找受害者并且向受害者的家人提供抚慰，同时鼓励他们发声。她们会依据传统，在每个受害者死后的第四十天举行追悼会。

她们获得的第一个案例来自于她们自己的网络内部。帕尔温．法希米属于一个名叫和平母亲的团体，阿希耶赫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法希米十九岁的儿子索赫拉布．阿拉比六月十五日在自由广场的抗争行动中失踪，此后法希米便一直寻找自己的儿子，但一无所获。当天，法希米与儿子一同前往自由广场，却被群众冲散。同一天，手机通讯塞车。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法希米跑遍监狱与医院，直到在一间警局里，她获准观看身分不明的死者照片。索赫拉布是「照片第十二号」。草率的验尸报告上写着索赫拉布的死亡日期是六月十九日，但没有注明死因，也没有解释从六月十五日到十九日索赫拉布人在哪里。当家人找回遗体时，他们发现索赫拉布胸口中了一枪。

法希米召集妇女网络的朋友到贝赫什特．札赫拉公墓参加她儿子的葬礼。阿希耶赫与艾妲．萨达特一同前往。她们一群人被巴斯基与革命卫队围住，但帕尔温．法希米并未因

此退缩。她一直维持着直言不讳的作风，悲伤与愤怒使她成为众所皆知的人物，每个人都叫她「索赫拉布的母亲」，她显示出国家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子民。

阿希耶赫在「每日上线」上发表关于索赫拉布的报导，不到一天的时间，消息已经传遍各地。帕尔温．法希米在墓园与家中分别举行了追悼仪式。阿希耶赫报导的三天后，在追悼仪式上，一名陌生人来到法希米的住所。她是一名英挺的灰发妇女，有着醒目的外表，从头到脚都是黑色。她的名字叫哈贾尔．罗斯塔米。

「我是内达的母亲。」她对聚集的追悼者说道，大家纷纷上前拥抱她哭泣。

罗斯塔米的女儿死后，一名年轻律师找到她，在律师的吩咐下，她一直保持沉默。律师向他们家人保证，只要保持低调，他就会帮助他们。当局甚至不让罗斯塔米在家门外悬挂黑色旗帜。但现在罗斯塔米已经准备好要摆脱律师，对外发声。

罗斯塔米告诉活动分子，不用为她的女儿举办四十日仪式，她会自己安排。但活动分子还是帮她宣传。当追悼者齐聚在内达的墓地时，镇暴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他们并殴打他们，而且逮捕至少五十个人。卡鲁比参加了追悼会，但穆萨

维却被禁止下车。

在德黑兰南部，经过沙赫勒雷伊，刚好位于贝赫什特．札赫拉公墓外围，有一座小城市，名叫卡赫里札克，二〇〇一年这里设置了监禁中心，专门关押毒品犯、性侵犯与所谓的恶棍。卡赫里札克监禁中心有可以关押五十人的地下牢房与金属货柜屋。夏天时暑热难耐，牢房的空气不流通，而且没有厕所。这里的设施到了二〇〇七年已不符合标准，但直到二〇〇九年夏天之前，这里的犯人遭受的待遇与命运，除了伊朗几个人权活动分子努力不懈地进行了解，几乎未得到任何关注。

七月九日，适逢伊朗历四月十八日事件十周年，在德黑兰一间警局的庭院里，扎伊尔德．莫塔札维的副手通知一百四十七名被监禁的抗议者，他们即将被巴士运往卡赫里札克。绝大多数被监禁者要不是已经在抗议时与民兵冲突受伤，就是在警局内遭受过殴打。有些人手臂与腿骨折，身上带着血块，或眼睛感染。这些人非但不会获得任何医疗，相反地，一抵达卡赫里札克，他们就像挤沙丁鱼似地被塞进弥漫着呕吐物与屎尿恶臭的铁笼里。这里的警卫特别残暴，有人提到他们将几名囚犯打到昏迷，到了隔天早晨，他们已经杀死了四名囚犯[19]。同一段描述也提到，在这个铁笼里关的囚犯多达二百人，包括一百四十七名抗议民众与穷凶极恶的一般囚

犯。

七月的高温炙烤着锡制的货柜屋，囚犯唯一分到的水闻起就像尿一样。他们没有食物，就连剩饭剩菜也没得分。警卫用熔化的沥青烫伤被监禁者的手脚，打断他们的牙齿，佯称即将要处决他们，反复以暴力性侵与鸡奸他们。有时，拥挤牢房里会充斥着一旁发动机的有毒废气。抗议民众被监禁的第二天，警卫又送来十几个新犯人。他们来自一个名叫「笼子」的地方，专门用来关押罹患传染病的犯人。「他们就像僵尸一样，完全不成人形。」一名目击者对《洛杉矶时报》说道[20]。

卡赫里札克的犯人在大热天搭乘挤爆了的巴士被运往埃温监狱。埃温监狱长官其实很不愿意收下这些犯人。他们必须记录这些犯人的身体状况，而这些犯人抵达时往往没了脚趾甲与牙齿，直肠有广泛的瘀伤，有些人在卡赫里札克才待了五天，身体状况就变得十分危急。二十四岁的埃米尔．贾瓦迪法尔在巴士上死亡。还有两个人，十八岁的穆罕默德．卡姆拉尼与二十五岁的穆赫辛．鲁霍拉米尼被送往医院。卡姆拉尼虽然已经昏迷，却还是被铐在床上，而且未获得适当的照顾，至于鲁霍拉米尼送到医院时已经回天乏术。这两个年轻人都因为在卡赫里札克受的伤而死亡。受害者的家人被禁止为他们举行适当的葬礼[21]。

当卡姆拉尼陷入昏迷时，另一个病人的访客帮他换绷带，她告诉记者，她永远忘不了她看到的一切。这个年轻人的牙齿都不见了，只剩下上排还有两颗牙齿，指甲也只剩下几片。他的头被打得凹陷，肾脏损坏，直肠的缝合痕迹显示他受到性虐待[22]。鲁霍拉米尼的父亲被告知儿子死于脑膜炎，但当他领回遗体与医疗纪录时，却发现鲁霍拉米尼并没有脑膜炎。鲁霍拉米尼因为遭到刑求而受伤，伤口未获得治疗而造成严重感染。他是因为身体承受剧烈压力而且不断遭受钝器击伤而导致心跳停止与肺脏出血致死。鲁霍拉米尼的父亲发现，他的嘴巴已经被「打得凹陷」，下巴也骨折了[23]。

夏日的某个深夜，艾妲．萨达特接到一名不认识的女性寄来的奇怪电子邮件。这名女性曾经与市府太平间的验尸单位有过接触，她与其他太平间工作人员看到了八名被监禁的抗议民众遭到性侵与杀害的证据。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项讯息，彼此认识的朋友说服他们去找艾妲，让她安排他们与卡鲁比见面。第二天，艾妲安排了会议。

卡鲁比聆听他们的报告，却未显露任何情感。他也许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指控，而这些指控当然也不是唯一的案例。七月二十九日，在给拉夫桑贾尼的公开信中，卡鲁比明确提到他曾与监禁中心内部的消息来源谈过话。卡鲁比写道：「在国内有着敏感地位」的官员，有些甚至是两伊战争的

退伍军人告诉他，一些被监禁的妇女遭到严重性侵，甚至造成子宫破裂。卡鲁比又说：「被监禁的年轻男孩也遭到严重性侵……，这些年轻男孩被性侵之后，陷入忧郁与严重的身心伤害。」卡鲁比哀叹说，这些报告实在太可怕，「即使其中只有一件是真的，那也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悲剧，与许多独裁政权相比，包括被罢黜的巴列维国王在内，这些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24]。

谈论性侵是打破禁忌的行为，更不用说是伊斯兰共和国虔诚的守护者施加的性侵。而要打破禁忌，最适合的人，或者说最令人震撼的人，莫过于教士本身。安全部队已经准备好要对付卡鲁比：在卡鲁比接见目击者的第二天，安全部队掠夺了他的办公室。而目击者也做了准备：至少艾妲认识的其中一人辞去了工作，逃往外省。

卡鲁比在公开信中要求国会调查卡赫里札克的性侵指控与虐待事件。卡鲁比发现，他的要求在令人意外的地方找到帮手，因为卡赫里札克的虐待事件发生在错误的人身上。卡姆拉尼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某个亲信的外甥。鲁霍拉米尼的父亲是保守派总统候选人与前革命卫队指挥官穆赫辛．雷札伊的重要顾问。这两个受害者是强硬派菁英的子弟，他们家人的怨言无法被当成煽动性言论而加以忽略。七月底，也就是卡鲁比发表公开信的时候，哈梅内伊亲自下令暂时关闭卡

赫里札克监禁中心。

强硬派法官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最近才被任命为伊朗的检察总长。他对性侵指控进行了司法调查，认为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指控。德黑兰警察首长承认卡赫里札克确有疏失，但并不严重。国会也马上推翻性侵指控，很可能是受到压力。但是，国会还是接受雷札伊的请求，对于卡赫里札克其他虐待事件进行调查。坚持进行调查的国会议员是基本教义派保守分子，而往后几年，将由这些人扛起公民自由的大旗。

穆赫辛．鲁霍拉米尼的医疗纪录与死亡证明是由一名与死者年纪相仿的年轻医师签署的。这名医师因为服兵役而被分派到卡赫里札克监禁中心。调查开始时，卡赫里札克的长官要求这名医师把鲁霍拉米尼的死因改成脑膜炎，但这名医师没有照做；相反地，他对委员会说：「鲁霍拉米尼在遭受严重刑求之后才送到我这里来。他的身体状况很糟，我没有充足的医疗用品，但我还是尽力救他。就在那个时候，我受到卡赫里札克长官的威胁，如果我说出死因与被监禁者受到的伤害，我也不用活了。」[25]

曾被关在卡赫里札克的囚犯对于这名医师的说词感到怀疑，他们对《洛杉矶时报》说，那名医师也曾虐待他们，

不仅拒绝医治他们，还动手殴打他们[26]。无论如何，这名医师在十一月神秘死亡。一开始，警方宣称这名二十六岁的医生死于心脏病，但当没有医学证据证明时，他们又改口说是中毒，最后说是自杀。来年九月，另一名曾经在卡赫里札克检查犯人的医师也遭枪击死亡。

国会将矛头指向扎伊尔德．莫塔札维，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位检察长签署命令将抗议民众送往卡赫里札克，同时也是他下令将三个年轻人的死因定调为脑膜炎，另外据说他也下令伪造死因报告。之后，莫塔札维改口说，他们的死亡是牢房过度拥挤的结果，而他们来监狱之前就已经受伤了。但到了二〇一〇年，当针对卡赫里札克进行的调查在各方面都指向莫塔札维时，艾哈迈迪内贾德决定摆脱这个人，他免除莫塔札维检察长的职务，改命他负责反走私的工作。

二〇一〇年一月，国会负责调查卡赫里札克的委员会公布最终报告。报告明确驳斥犯人罹患脑膜炎的说法，甚至认定莫塔札维说囚犯被带往卡赫里札克是因为埃温监狱已经满了的说法完全是谎话。事实上，埃温监狱还没满，真正满了的是卡赫里札克。委员会成员严厉指责司法部所说的他们对监狱设施的状况毫不知情。委员会成员表示，被监禁者死于「空间不足、医疗不足、营养不良、空调缺乏……，以及遭到殴打与忽视」[27]。

然而，委员会依然坚持，最终都是改革派的错。如果穆萨维与卡鲁比「未试图破坏法律与煽动民众情绪」，这些事都不会发生。这几个总统候选人必须「负起责任，而司法系统不能放过这类犯罪行为」[28]。

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九八八年，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接班人要求捍卫囚犯的权利并且反对对数千人进行屠杀，然而却遭到霍梅尼的拒绝，从霍梅尼拒绝的那一刻起，伊斯兰共和国的路线已然确立下来。霍梅尼重新指定的接班人阿里．哈梅内伊显然也对于以暴力对付政敌毫无愧疚之意。至于原本应该成为最高领袖的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则被排除于他所创建的制度之外，蒙塔泽里终其一生都以自己的良知发声。

二〇〇九年夏天，蒙塔泽里八十七岁。对于总统大选，他的评论是：「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选票的统计是公平的。蒙塔泽里表示：「这既不是伊斯兰，也不是共和国。」他提醒安全部队，殴打手无寸铁的抗议群众，「就算是根据命令，也无法让他们在面对真主时获得开脱」[29]。对于卡赫里札克事件，蒙塔泽里告诫哈梅内伊，光是关闭设施还不够。建筑物本身并未犯下任何罪行，但那些犯下罪行的人还会继续刑求与杀人。

在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的伊斯兰教令中，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对那些要求穆萨维提出选举舞弊证据的人表示，他们自己才负有举证责任。蒙塔泽里坚持，公仆有责任让民众相信他们是值得信任的，而且要在公正的法官面前进行说服。至于民众，如果民众认为政府是不正当的而且政府还「透过武力或欺骗」来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民众就有积极的义务要求政府解散。如同霍梅尼在一九七九年采取的做法，蒙塔泽里引用什叶派领袖伊玛目阿里的话：「不要背弃『行义去恶』原则，否则的话，你们当中最大的恶人将支配你们，而你们的祷告将不会被聆听。」长久以来，伊斯兰道德警察一直坚称，他们鞭打未适切穿着头巾的妇女是在「行义去恶」。现在，蒙塔泽里重申这个原则，要求抵抗不义的国家。

蒙塔泽里写道，一旦政权放弃追求正义，民众就没有必要保护这个政权。对伊斯兰统治的真正攻击，来自于政权内部：「这实在难以想象，不正义而且违反伊斯兰的行为如何能确保与巩固伊斯兰政权？」蒙塔泽里提醒掌权的教士，先知穆罕默德不会赋予在狱中取得的口供「一丁点法律或宗教价值」，而身为人民的仆人，政治人物没有权力限制言论与集会自由。蒙塔泽里说道：

> 一个奠基于手持棍棒、不正义、侵犯权利、夺取与伪造选票、谋杀、要求臣服、监禁、使用中世纪与斯大

林主义式的刑求、镇压、对报纸与通讯工具进行审查、以虚构的罪名关押思想家与社会菁英并且取得假口供，特别是透过胁迫取得，在宗教、理性与世界上睿智的观察者面前都是有罪的与毫无价值的。[30]

大约五个月后，十二月十九日，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在睡梦中去世。从德黑兰到库姆，从纳贾夫阿巴德到赞詹，绿色运动纷纷悼念蒙塔泽里，他们甚至在清真寺内与巴斯基及镇暴警察正面交锋，这是自六月二十日以来最庞大也最暴力的冲突，同时也是双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立。

大阿亚图拉的追悼期间刚好碰上阿舒拉节[(1)]，但伊斯兰共和国的安全警察完全不管什叶派最神圣节日的反暴力禁令。民众的录像画面显示警察开着警车辗过抗议民众，而目击者则宣称警察对着群众开枪。愤怒的群众攻击安全警察与放火焚烧警察局。当天，有数百名抗议民众，有些报导说甚至超过一千人被关进监狱，而医院则通报有数十人头部受伤与受到枪伤。阿里．哈比比．穆萨维是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的侄子，也是拥有两个子女的四十三岁父亲，他并未参与抗议，却在德黑兰胸部中弹身亡。他是新闻报导中在阿舒拉节当天被杀的三十七人之一。由于严格新闻审查的关系，当天的死

亡人数莫衷一是，而对于当天事件的报导，可靠性如何也值得存疑。在贴到 YouTube 的抗争影片中，有个影片显示大学生高呼：「蒙塔泽里，你终于自由了。」[31]

＊ ＊ ＊

(1)阿拉伯伊斯兰历的第一个月（穆哈兰姆月）的第十天。伊斯兰六十一年（公元六八〇年）穆哈兰月十号，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胡笙，于卡尔巴拉抵抗逊尼派伍麦亚帝国（第一个伊斯兰帝国），最后战死沙场。壮烈事迹，为后代什叶派穆斯林歌颂。

第十七章　知识分子肮脏战争的结束

任何庞大运动的顺从者、追随者、灵魂奴隶、应声虫，都无法满足独裁者，除非自由人与极少数的独立人士也开始谄媚他与他的农奴，独裁者才会感到满意。为了让自己的信条成为普世真理，独裁者会让国家将不一致列为犯罪。

——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这个主动接近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的年轻人，看起来有自杀倾向且孤独无助，实际上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诱骗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自投罗网。现在，法兹里内贾德已成为强硬派司法部充分承认的宣传者；他除了为革命卫队的法尔斯通讯社工作，也为隶属于最高领袖的

《宇宙报》写稿。

二〇〇九年六月初，法兹里内贾德在《宇宙报》发表了爆炸性的五篇系列文章[1]。他的文章标题是〈穆罕默德．哈塔米的天鹅绒政变任务〉，文章声称揭露了精心策画的国际阴谋，这个阴谋企图以「市民社会」这个恶毒力量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法兹里内贾德认为，当前的不安乃是西方阴谋长期计划下的结果。

法兹里内贾德用改革派的语言来攻击改革派，他用几颗事实的种子栽种出满园的幻想果树：学术交流成了与西方哲学家的秘密会议，而这些西方哲学家只是幌子，他们真实的身分是特务；市民社会的发展理论成了围困与颠覆革命国家的阴谋。耐人寻味的是，法兹里内贾德从这个假定推演出，市民机构、独立媒体与选民参与不可避免将授予世俗化力量，因此这些事物本质上具有颠覆性，必须予以禁止。根据这种观点，威权主义乃是伊斯兰政权的本质，而威权措施是唯一能保护伊斯兰政权的手段。

法兹里内贾德认为「天鹅绒政变」阴谋的源头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这两个单位透过位于美国、英国与德国的智库进行运作。早在一九八八年，这些外国情报单位已经与流亡海外的伊朗保皇党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连手，驱使

《地平线》圈子与战略研究中心在伊朗境内执行他们的命令。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负责将世俗主义灌输到思想领域，侯赛因．巴什里耶赫则以「政治发展」为掩护，有系统地阐述政治策略。他们招募了一批政治人员，包括扎伊尔德．哈贾瑞安、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穆赫辛．卡迪瓦，当然，还有担任行动先锋的穆罕默德．哈塔米。

一旦这些阴谋者成功让哈塔米上位，他们就开始推动城市与地方议会选举，表面上是要建立「参与式民主」与「市民社会文化」，实际上却是要没收地方资源，「将世俗主义散布到社会与文化各个层次」。然后，在巴什里耶赫的坚持下，改革派主导的内政部拨款资助「市民机构」或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将成为有能力推翻政权的颠覆性社会力量。

然而，不知何故，法兹里内贾德并未详细说明二〇〇一年改革派计划失败的事。美国中情局在关切下派遣探员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伯玛斯到伊朗「评估美国『转向民主』计划的状况」。事实上，哈伯玛斯确实在二〇〇二年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邀请前往伊朗[2]。他的演讲吸引了大批群众，而伊朗人也热切地与他讨论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地位。法兹里内贾德在文章里描述哈伯玛斯来伊朗是为了向卡迪瓦、哈贾瑞安与其他人传达指令。哈伯玛斯建议改革派人士建立民主机构，特

别是在大学与政党内部，而且要「做好进行公民斗争的准备」。当然，改革派人士依照哈伯玛斯的吩咐进行。但是，改革派在二〇〇三年输掉市议会选举，接着又在二〇〇四年输掉国会选举，他们的「市民社会」计划因此陷入混乱。

就在此时，西方派出第二位「安全与情报理论家」。法兹里内贾德写道，已故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察．罗蒂「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事实上，他是美国中情局思想领域秘密行动最老牌的领导人，曾经在一九五〇年代主持一个名叫『知识分子肮脏战争』的计划」[事实上，一九五〇年代，罗蒂仍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可能性的概念》]。法兹里内贾德声称，二〇〇四年六月，当罗蒂访问德黑兰时，他要改革派人士放弃地方层级的辩论与关切。改革派人士唯有「完全仰赖美国传统与遵循实用主义哲学才能达成目标」。与哈伯玛斯一样，罗蒂建议改革派人士组织「民主机构」，在危机时刻可以发挥功效，建立美国式的民主。

但阴谋者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到了二〇〇四年秋天才出现。根据法兹里内贾德的说法，澳洲政治理论家约翰．基恩是「英国军情六处的大脑」与「主钥」。基恩是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作品《民主与市民社会》的作者，他显然是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共产主义崩溃的幕后推手。法兹里内贾德表示，西

方政治哲学字典废弃「市民社会」一词已有一百三十年，但基恩的作品又让这个词汇重新回到西方政治哲学字典中，而且基恩重新想象这个词汇，使其具有「好战」的意涵。基恩也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耗资九亿美元的秘密计划的探员，负责渗透与颠覆什叶派宗教机构与社群，企图让伊斯兰教完全丧失政治地位。法兹里内贾德提到，这个计划记录在前美国中情局探员麦可．布兰特的作品《一个分裂与毁灭神学的计划》中。但这本书似乎只存在于一个名叫里亚卡特．拉札的人用乌尔都语写的部落格文章里，这位拉札宣称布兰特是「前美国中情局局长鲍勃．伍德华的左右手〔原文如此〕」。

基恩曾于二〇〇四年访问德黑兰。法兹里内贾德表示，当时，巴什里耶赫与索鲁什才刚结束与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兹以及「五角大厦战略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家）的重要会议，福山告诉他们，伊朗人要扮演让伊朗「波兰化」的角色。基恩与哈贾瑞安见面，指示他进行「软颠覆」并且告诉他最近期的「民主化模式」。基恩也建议改革派政府补助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与市民机构，以此来挑战政权，最终以天鹅绒政变来推翻政权。

法兹里内贾德把乔治．索罗斯与美国国会也牵扯到这个

阴谋里，但这里头的坏人不是只有美国人或英国人。根据法兹里内贾德的说法，一名有伊朗血统的荷兰国会议员指示希林．伊巴迪将女权运动与民权策略挂勾。伊朗的女性主义者发起百万联署运动正是源自于荷兰人拟定的计划，「这项运动公然在伊朗赤裸裸地推动与宣传卖淫」（法兹里内贾德之后直接将百万联署运动等同于「推广卖淫运动」）。

法兹里内贾德告诉读者，「针对第十届总统大选进行的绿色政变计划」有着多样的层次与复杂性，其中的策略与情报他无法一一加以厘清。但到了最后阶段，改革派动员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隐藏了这么久」），穆萨维在与英国大使会面后敲定了「令人屏息的选战活动」，并且宣布他将发起公民斗争。

在仔细分析公民斗争时，法兹里内贾德的语气变得拐弯抹角而含糊。败选的总统候选人计划引发一场正当性的危机。有组织与受过训练的市民社会间谍将走上街头，「到处破坏、发起恐怖行动与引发危机」，而且刻意造成原本不会那么严重的骚乱。法兹里内贾德认为，在伊朗，街头并不存在社会群众，上街的都是受过训练的颠覆分子，他们企图「瘫痪国家的神经系统」，导致政权的崩溃。

在法兹里内贾德的描述中，穆萨维推动了公民斗争，但

背后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哈塔米。法兹里内贾德提供了哈塔米访问世界各国的行程，其中令人怀疑的是，在二〇〇九年选战期间，这位前总统几乎一直待在国外。或许最启人疑窦的是，哈塔米访问突尼西亚的时候，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抵达埃及，这两个国家都位于北非。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四日的声明中，哈塔米恶意地「使用示威抗议、公民抗争这类词汇达七次之多」。

法兹里内贾德的文章只是司法部对付改革派领袖的前菜。二〇〇九年八月一日，德黑兰革命法院以电视播送审判实况，只见礼堂里满满都是被告。好几排前任高级官员穿着囚服，他们的脸色泛黄，眼窝凹陷，在他们旁边站着穿制服的男子。一开始，众人先聆听检察官长达二十五页的起诉书，然后再聆听被告自己陈述认罪内容。

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外观的退化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昔日矮胖而面带微笑的教士，现在却被剥夺了教士身分，阿卜塔希的身躯瘦了一半，整张脸很憔悴，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额头上挂着斗大的汗珠，满脸的疑惑。然而，真正让审判过程进入高潮的是扎伊尔德．哈贾瑞安的认罪内容，让人感到恐惧，又觉得荒谬。

哈贾瑞安病得很重，无法当众宣读，一名年轻的伊斯兰

伊朗参与阵线成员，同时也是犯人，负责为哈贾瑞安念出强迫认罪的内容。认罪书一共六页，全文由法尔斯通讯社对外发布[3]。在认罪书中，哈贾瑞安表明放弃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理论，他现在知道这个理论无法适用在伊斯兰共和国。哈贾瑞安表示，韦伯的理论是用来描述「民众被当成臣民而且被剥夺一切公民权利」的国家。这位脊椎还卡着子弹的政治理论家在胁迫下承认伊朗显然不属于这种国家。

哈贾瑞安指出：伊斯兰共和国是一种革命体制，韦伯并未讨论到这种体制。伊朗政权举行选举，「其正当性的来源在于期望有一天失踪的第十二伊玛目能够回归」；韦伯并未解释这类细节，这意味着他的架构对伊朗来说毫无意义。哈贾瑞安因为无知而一度「盲目地陷入这些误导的理论的陷阱中」；现在他懂了，于是他道歉。

哈贾瑞安又说：他很后悔自己不加批判地散布这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观念，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第十届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现在知道，许多这些观念引发的抗争威胁到国家的团结」。哈伯玛斯与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观念要负最大的责任。哈贾瑞安充满歉意地写道：「人文学科的理论包含了意识形态武器，可以转变成用来对抗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战略与战术。」

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提出的指控，将危险的西方观念与外国的阴谋连结在一起，这种手法就跟法兹里内贾德的文章一样[4]。莫塔札维的副手宣读起诉书，一开始是长篇引用他们宣称已经捕获的间谍的认罪书，然后所有的起诉内容完全围绕在这名间谍的供词上。

根据起诉书的说法，这名间谍向检察机关详细说明了法兹里内贾德曾经描述过的复杂阴谋结构。这些阴谋者包括开放社会研究所、洛克斐勒研究所、福特基金会、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自由之家、外交关系协会、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与英格兰的民主研究中心（由约翰．基恩主持）。荷兰的人道主义发展合作研究所支持妇女运动，而哈佛大学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则支持伊朗的部落客。

不意外地，检察机关把矛头指向吉恩．夏普的作品，夏普是一位年迈的美国非暴力斗争理论家，在全世界「天鹅绒」革命的场景中，都可以看到他谈论公民抵抗独裁制度的小册子的踪影。根据起诉书的说法，这些革命也是美国特务的杰作。副检察长阴沉地说，夏普手册中提到的一百九十八个步骤，伊朗已经执行超过一百个。他们宣称的间谍表示，套用在伊朗的模式来自乔治亚、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乌克兰与吉尔吉斯。然而克罗地亚并未发生这类革命，把克罗地亚涵盖进来充分显示这个消息来源或检察长对于

世界的走向一无所知。

这位宣称的间谍提到，天鹅绒政变总是依照单一的计划进行。大约在总统大选前两年开始准备，外国阴谋者挑选他们要的候选人。然后，「他们会投资大量人力、物力在候选人身上，例如让候选人的支持者透过类似金字塔结构的商业模式网络来教育民众（这种做法已经证明在选战中可以有效地吸引支持者）」。如果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输了，他们会提出选举舞弊的主张，要求在外国观察者参与下重新举办大选。起诉书暗示，外国观察者的介入是为了确保他们选择的候选人能够胜选。

起诉书指出，伊朗的通敌者网络，包括了夏迪．萨德尔与希林．伊巴迪，以及以纽约为据点的人权研究者哈迪．加埃米，加埃米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人权观察工作，还有如今正在流亡的前学生活动分子阿里．阿夫夏里。当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特务是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他的任务是瓦解伊朗对西化的抵抗，攻击伊斯兰共和国的神圣支柱，例如「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与政教合一。

副检察长宣称，索鲁什与其他宗教知识分子「逐渐把目标对准革命的文化基础并且开始摧毁这些基础。他们的思想讨论明显训练不足而且充满思想上的专断，而他们却故意隐

瞒这一点」。一旦建立起了思想基础，这些阴谋者便开始成立非政府组织形式的机构。然后，他们会将这些机构串连成一个网络。

改革派政党扮演的角色尤为恶毒。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的政纲居然大胆描述伊斯兰共和国是专制与反民主，而且鼓吹改革派人士争取进入每个民选机构，从国会、市议会到专家会议。起诉书引用了参与阵线政纲的一句话：「当整个政治体制面临威胁的时候，民选的领导人有能力利用这种危机来巩固民主体制，并且取得更多的协商权力。」然后政纲以一种可能出自修辞的语气问道：「这句话听起来跟叛国有什么不同吗？」检察机关也引用不具名的消息来源，宣称参与阵线在伊斯法罕与阿拉克的分支机构曾经对党员进行意见调查，如果美国人入侵伊朗，他们是否愿意把最高领袖交给美国人。

于是，一个愤世嫉俗与背信弃义的阴谋便围绕着第十届总统大选展开了。副检察长大量引用聚集在法庭上的被告在狱中的自白，尤其是阿卜塔希与塔吉札德赫。副检察长表示，这些阴谋者很清楚这次选举并没有出现舞弊，但他们早在选举之前就已经计划要让民众对选举制度丧失信心。因此，改革派人士伪造了一封由内政部官员写的信，想在选举日前引起关注。副检察长引用塔吉札德赫在狱中的口供，塔吉札德赫表示，在选举日当晚，他的数字与官方的数字吻合：「我从

未说过发生选举舞弊。他们提出的指控跟我没有关系，我并未涉入此事，然而既然我的党发出这样的声明，那么我也应该受罚。」

起诉书宣称，选后的「非法集会」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这些集会由这些被告组织，包括那些在抗争之前就已经被逮捕的人在内。他们也预先计划向外国媒体散布残暴镇压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的照片与影片。副检察长表示：「这些照片与影片显示出许多伊朗国内民众的痛苦脸庞，让观看者以为煽动者就是这些上街抗议选举的伊朗民众。」

副检察长宣称，庆幸的是，伊朗安全部队早一步破获恐怖分子的阴谋，这些美国派来的人员计划在投票所放置炸弹。然而混乱已经传布出去。阴谋者自制手榴弹，并且穿上偷来的革命卫队制服引爆手榴弹。著名的人权律师在办公室里偷偷存放武器与毒品。巩固办公室与其他学生叛乱分子攻击自己的宿舍以引发民众同情。副检察长对于学生宿舍遇袭的受害者无耻地流下鳄鱼的眼泪：「从报告以及被殴打与受伤躺在医院的人数可以看出，这场破坏与暴动的计划者与行动者为了实现目的，不惜牺牲这片土地上的无辜孩子。」

起诉书完全是依据这名宣称的间谍的陈述撰写的，然而这份陈述其实来自几个运气不佳的犯人自白。其中最主要的

犯人是一个深具企图心的年轻部落客，他曾经历过一连串耐人寻味的转变。侯赛因．德拉赫尚在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次担任总统时从伊朗移民加拿大，他热心自我推销，努力向美国媒体宣传自己，而且经常宣称自己是伊朗部落格文化的引进者。他在初期的部落格文章中自称是无神论者，而且公开支持伊朗成立世俗政府。西方的朋友与同事记得他是一个极度追求美食与享受生活的人，对于名声有着强烈的渴望。

德拉赫尚日后解释，他在哈塔米主政时期支持改革主义，其实是一种青春期叛逆的表现。德拉赫尚出身富有的保守派家庭，与政权关系亲近。他表示，他在移民加拿大之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体验以及对美国小布什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反感促使他反对改革。德拉赫尚认为，伊朗的改革派对新保守派提供协助与施惠，这些人已经被启蒙理性腐化了。德拉赫尚支持后殖民理论与爱德华．扎伊尔德、贾克．德希达以及茱蒂丝．巴特勒的作品。当德拉赫尚支持强硬派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辩护并且开始撰文赞扬艾哈迈迪内贾德，呆板地模仿伊朗官方的说法与抨击改革派分子以及人权分子时，他先前的朋友与同事都认为他别有用心。

德拉赫尚后来在公众面前做了一件鲁莽而思虑不周的事，他在二〇〇六年初以及二〇〇七年两度前往以色列，此举公然违反伊朗的禁令，尽管如此，此时仍无法看出德拉赫

尚政治立场的变化。德拉赫尚说他进行的是独立的外交任务。他希望影响以色列的舆论，使以色列民众反对与伊朗开战，同时也藉此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喜欢成为短暂的目光焦点，并且穿着印有「我♥伊朗」字样的 T 恤在特拉维夫街头摆出各种姿势拍照。

二〇〇八年，德拉赫尚一回到伊朗就随即遭到逮捕。讯问他的人就跟他之前的改革派朋友一样，完全不相信他已经改变立场。讯问者认为德拉赫尚是受到摩萨德[1]或美国中情局的指示，企图渗透伊朗政权。德拉赫尚日后表示，做为一名忠实的臣民，他返国时已准备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预期自己违反旅行禁令应该会被判三年。然而，德拉赫尚最后被判处两个死刑与将近二十年的刑期。他说，他就像一名遭己方空军误击的士兵（二〇一四年年底，哈梅内伊赦免了德拉赫尚）。

德拉赫尚日后坚称，每当有人提到检察机关是根据他的说词来起诉改革派领袖时，他都会痛苦地觉得自己遭到利用。然而，他这么说也可能是为了撇清责任。这些说词出自德拉赫尚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被要求写下的分析，他当时解释了改革派的观念与行动如何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他从未想过要勾勒一个由美国中情局主导的阴谋，也从未言之凿凿地表示自己目睹了一切。无论如何，在德拉赫尚写下供词时，伊

朗总统大选还有六个月才举行，穆萨维甚至还没宣布参选。

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在《宇宙报》发表的文章纯属幻想，而且如约翰．基恩响应时指出的，这些文章提到的叛国阴谋有可能涉及诽谤。法兹里内贾德很可能是在牢里获取了强硬派的观点，而这也为他的文章的恶毒更添几分感染力。法兹里内贾德的主题激励了检察机关正式起诉改革派领导阶层，显示这些文章的叙事并非出于偶然或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文章确实反映强硬派人士内心的预期，呈现出他们根深柢固的想法，因此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的成分。

大家经常说，即使是偏执狂也有敌人，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说确实是如此。或许伊朗安全体制希望面对的是一个简单的敌人，例如像牵线木偶那样被外国操控的伊朗国内异议派系与公民活动分子。当然，如果光靠举办专题讨论与寄支票给改革派政治人物与市民社会团体就能推翻伊斯兰共和国，那么华府早就动手了。伊朗具有一种强烈不想受到外国干预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精神特质不只局限在保守派身上。当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算拨款资助伊朗反对派人士时，伊朗反对派人士对此感到惊恐并予以拒绝。除了强迫认罪，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伊斯兰共和国会有人与外国勾结。

伊斯兰共和国畏惧的事物，其实已经存在于共和国内部。

伊朗改革运动的确借用了韦伯、哈伯玛斯与罗蒂的观念，但改革运动的意识形态却是自己形成的，他们与真主党支持者一样是革命本身的产物。改革派理论家面对伊朗独特政治制度造成的策略难题，必须公然与之进行争论，在这方面，外国人无法为他们出谋画策。西方没有任何哲学家或情报头子能像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扎伊尔德．哈贾瑞安那样有能力走出这个迷宫，或愿意投入心力解决这个难题。

塔吉札德赫与哈贾瑞安以及其他跟他们一样的人，相信伊斯兰共和国是动态的而且具有响应能力，能够摆脱专制。但哈梅内伊对于什么是伊斯兰共和国核心与什么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前后总共有五次公开审判，因此有五份起诉书。第二份起诉书比第一份起诉书更清楚揭橥政权的自我定义[5]。起诉书提到，外国人有几个恶毒的目标，例如「揭露违反人权的案件」，训练记者「收集与分析信息」，「创设网站，为举行大选而进行训练，呈现完整的二〇〇九年总统候选人信息」。选后，美国间谍又提供软件与服务器让伊朗民众能够规避政府的网络控制。起诉书显然相信聆听者会认为由政权来保护真正的国家利益是不证自明的事，这些保护措施包括审查报刊、控制网络、隐匿人权侵害的案件以及破坏选举过程。

往后一年半的时间，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一直不甘于沉默。这位前总理定期向追随者发表声明，而他的主张也越来越鲜明而具说服力。穆萨维不是改革运动的一员，他不会使用社会学的词汇，也没有掌权的苦涩经验。穆萨维的用语简单并强调精神面，重视道德而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绪。他把阿亚图拉霍梅尼说成是已逝的父亲，虽然霍梅尼的身影逐渐隐没在儿子身后，但他智慧的光芒却更加凸显。伊斯兰共和国一切的善良与正义，包括穆萨维自身的良好特质，全源自于伊玛目霍梅尼，尽管相反的状况也有可能是真的。革命最好的意图已经走偏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对穆萨维来说，绿色运动的目标在于重新恢复失落的纯洁。关于这一点，穆萨维无论在表达上还是情感上都呼应着沙里亚蒂。沙里亚蒂在一九七〇年代曾经告诫伊朗人要找回从未存在的过去，要「回归」充满渴望的自我。穆萨维在九月底表示，「我们需要伊斯兰共和国，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这也呼应了霍梅尼革命时说的话[6]。穆萨维指出，即使选举不如人意，霍梅尼依然尊重选举结果。当霍梅尼得知他支持的候选人在伊斯法罕败选时，他微笑说：「没问题，就让他们拿走伊斯法罕吧。」[7] 穆萨维口中的霍梅尼要求政治人物做到诚信，而且要尊敬民众。当政府的三个分支单位被迫要揭露伊朗门事件时，穆萨维告诫它们：「绝对不要做无法

向民众解释的事。」[8] 这个国家的创建者受到两次亵渎，第一次是受到外国人误解，第二次且严重程度不下于第一次则是强硬派恣意压迫民众，却想象霍梅尼会赞许他们的行径。

穆萨维坚持，伊朗民众想得到尊重，也值得受到尊重。他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不能容忍结果总是一成不变的堕落选举。当一个国家变得伟大时，公仆就不能再告诉民众该吃什么、该去哪里、该选举谁、该信任谁或信任什么。」伊朗民众希望得到健全的经济管理。他们不想要一个会攻击要求薪资的劳工或攻击要求权利的妇女的国家。穆萨维说道：「这里的绝大多数民众都『喜欢』彼此。他们不想被区分成真主党与魔鬼党，也不想被区别成一边是人类，一边是尘垢与牲畜。」[9]

穆萨维要求政权释放政治犯、报刊解禁、允许成立政党与示威游行、修改选举法以及让总统有权有责。这些要求都写入绿色运动的宪章中，而且也将绿色运动定义成民权运动。国外五名受敬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签名支持穆萨维的主张，而且增加了额外的要求：大学、神学院与军队独立于政治，各层级的法官与领导人民选产生。签名的人包括阿克巴尔．甘吉与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穆萨维对政权提出的是基本的要求，他对追随者的要求

也是普世的基准。在十月声明中，穆萨维思索被压迫者的尊严，这篇文章堪称世界抵抗文学的经典[10]。穆萨维提醒他的追随者，国家的形式结构只占现实的一小部分。伊朗人民的生活赋予这些结构意义与实质。象征可以强加在人民身上，但意义是不可让渡的。

穆萨维表示：「表层结构可以逮捕革命之子，把他们当成罪犯囚禁起来，让他们穿上羞辱的衣物，但民众可以看着这些景象并且感到自豪，而且从这些影像中创造出英雄。谁是这场对峙的赢家？……表层结构可以对这些家庭判刑使其陷入孤立，而民众可以拥抱这些家庭。说真的，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

藉由道德与思想正直的力量，伊朗民众即使无法纠正国家政治生活的外在结构，至少可以纠正内在的实质。而他们确实做到这一点。穆萨维说：「过去几个月，我们并未打破外在秩序，而是靠着改变意义而改变了社会。一旦我们可以在每个状况下指出方向，就不需要打破秩序。」因此，穆萨维对未来寄予希望。他指出：「有这么多国家的民众未选择行使这项权力，他们选择把权力交给强有力的人。他们无法成为他们的社会的领导者，但我们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与妻子札赫拉．拉赫纳瓦尔德位于巴斯德街的家成了监狱，屋子的门窗被焊死，房屋周围装设了泛光灯、摄影机与监视器。根据二〇一三年路透社的一篇报导，当局拆除了屋内所有门把，这对夫妻因此丧失了隐私，他们还没收了个人文件、艺术品、电话、收音机与计算机[11]。穆萨维与拉赫纳瓦尔德只有在很罕见的状况下才能阅读报纸或使用书房。他们几乎没有新鲜空气，拉赫纳瓦尔德因此出现了呼吸问题，于是穆萨维用拳头打破了一扇窗户。

亲近穆萨维家的人士告诉路透社，住进这对夫妇家中的警卫态度恶劣且粗暴。穆萨维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曾因为血液循环问题数次住进医院。到了二〇一三年春天，穆萨维体重少了二十六磅，而拉赫纳瓦尔德少了三十七磅。

梅赫迪．卡鲁比的家没有安全可言。在二〇一〇年的访谈中，他做了计算：「最近连续五天，每天都有人朝我家扔石头与手榴弹。我们的邻居吓坏了，他们的财产遭到烧毁与破坏。」卡鲁比思索，他预期这种状况不会改善。「但我关心的是伊斯兰，我担心这些人以伊斯兰为名攻击与骚扰民众，将在世人面前严重损害我们的宗教。」卡鲁比不会停止捍卫伊朗政治犯。他坚持说：「我将表明，他们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在监禁中心性侵犯人，而他们仍在监狱以残暴的方式刑求异

议人士。」[12]

二〇一一年，卡鲁比也遭受软禁，他被安置在情报部位于德黑兰中区的安全屋里。卡鲁比同样因为缺乏新鲜空气而萎靡不振。这三名反对派领袖从未被指控任何罪名，更不用说被法院判刑。但有传言说，除非他们公开悔过，否则他们不会获得释放。

穆萨维不再对外发表声明。起初他做的是推荐书籍，而这些书传达了讯息。第一本书是《绑架新闻》，加布列．贾西亚．马奎斯在书中描述接二连三有名人遭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绑架。这本书很快在伊朗贩卖一空，因为穆萨维的支持者想在这本书中探索相关的意义。第二本书内容晦涩却很容易引起共鸣，斯蒂芬．茨威格在书中描述一名十六世纪的神学家挑战约翰．卡尔文；这本书的书名叫《异端的权利》。

茨威格是奥地利犹太人，希特勒掌权后不久，他于一九三四年逃离欧洲。茨威格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异端的权利》。六年后，他与妻子在巴西自杀，他在自杀的字条上写着：「我自己的语言世界已经从我身边消失，我的灵魂故乡欧洲已经毁灭了自己。」[13] 在茨威格的作品中，《异端的权利》少为人知，英译本几乎马上就绝版了。作者大概怎么都想不到这本书居然在伊朗找到了第二春，一九九七年，波斯文译本在伊

朗出版。

《异端的权利》把约翰．卡尔文描绘成一个残酷的神权主义者，他在日内瓦施行沉闷无趣的禁欲主义，要求每个人都要像奴隶一般顺从他的神学，而且以冷酷而自以为正义的狂热进行个人仇杀。茨威格书中的主人翁是一名异议神学家与人文主义者名叫塞巴斯汀．卡斯特留，当卡尔文将一名异端连同其作品一起焚烧时，卡斯特留提出反对。卡斯特留坚持，国家无权主宰人的内在生活：「把一个人活活烧死，无法捍卫教义，只是杀死了一个人。」[14] 宽容而非迫害，才是基督徒对于异议人士的适当响应。卡斯特留写道：「当我思索异端究竟是什么时，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在与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都是异端。」[15]

面对大家对他的异端政策的批评，卡尔文的做法是，将阴谋者的罪名扣在对方头上，然后刑求政治反对派领袖，直到他们承认阴谋推翻他为止。卡斯特留是知识分子而非政治人物，当卡尔文诽谤他时，他不做反驳。卡斯特留是自然死亡，如果他再活久一点，很可能被当成异端处以火刑。茨威格写道：「专制君主永远的悲剧是，他们总是害怕拥有独立心智的人，即使这些人被解除武装与被噤声。事实上，被击溃的对手就算什么话也不说，光是拒绝成为暴君的逢迎者与奴仆这件事，就足以让他的持续存在成为暴君愤怒的根源。」[16]

二〇〇九年八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抨击社会科学。在向大学的学生与教职员演说时，最高领袖表示这些研究领域造成了怀疑、不确定性与世俗主义：「许多人文学科根据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以及对真主与伊斯兰教的不信仰。」[17]教导这些学科将导致信仰的丧失。思想正确的思想家应重新检讨国内的大学课程。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做出回应，他表示：「神权主义者希望人文学科以真主的意旨、精神与其他宗教内部教义的概念来解释人类与社会，一旦人文学科无法符合神权主义者的期待，神权主义者与伊斯兰学者（ulema）便嫌恶人文学科。」[18]这个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经出现，而索鲁什对此有着亲身体验。当时，对于人文学科的怀疑源自于意识形态的僵化、无知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深受伊朗大学生欢迎的恐惧。如今，要求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伊斯兰化则具有较直接的政治意涵。索鲁什猜测，对哈梅内伊来说，世俗化的政治科学「距离世俗政治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有人质疑他，索鲁什就会举遭受公开审判的扎伊尔德．哈贾瑞安为例。

教士在一九八〇年代想让学院知识伊斯兰化的企图最后以失败告终。但索鲁什建议，如果哈梅内伊想再次成立伊

斯兰社会科学，那么伊朗的知识分子不应该阻拦。相反地，他们应该鼓励最高领袖派出最优秀的人进行这项计划，让这些人埋首于这些知识领域中，这样他们也许就能「见识到从观察、数学、批评、反省、直觉、运气与机缘的子宫中痛苦孕生出知识的过程，这样他们才不会冒进或只想不劳而获」。然而，当他们完成工作，他们应该大胆地将他们的观念与世俗理性产生的观念做比较，以此来衡量他们的观念是否成功，而这两种知识形式也能「互相砥砺」。

对于这些「创建伊斯兰社会科学」的朋友，索鲁什只想提醒他们一句话。他们在进行计划时将遭遇不可解决的循环论证，因为他们想从《古兰经》提取出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工具本身就是世俗的。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学，他们几乎无法研究阿拉伯人的历史与文化，而不了解阿拉伯人，他们就无法了解《古兰经》。索鲁什强调，世俗的人文科学绝非「徒劳而毫无生产力」，它们是「解开宗教知识必要的黄金钥匙。」

大选以来，这已经不是索鲁什给予哈梅内伊的第一个建议，但却是最客气的建议。与许多流亡海外的知名伊朗人一样，索鲁什看到祖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内心感到无能为力的悲痛与愤怒。索鲁什连续写了好几封信给最高领袖，一封比一封词藻华丽，指责他成了一名暴君，旁边围绕着逢迎拍

马之辈，而且残暴地对待他的批评者。索鲁什表示，宗教专制主义将在伊朗燃烧殆尽，等到专制制度崩溃时，他将是第一个欢呼的人。索鲁什写道：「喔，真主，请为我做见证：我这辈子都关心宗教与教导宗教，我离弃了这个崇拜暴政的体制。如果我一时不察出了错误，居然有那么一天帮助了压迫者，我祈求祢的原谅与赦免。」

索鲁什哀叹说，如果哈梅内伊开放报禁与聆听批评者的声音，那么很多事都可以避免。最高领袖声称要打击经济腐败，如果能有记者加以揭露，经济就不至于烂到骨子里。哈梅内伊如果不是被自己的傲慢冲昏了头，那么他还有可能做出清醒的决定。索鲁什写道，无论如何，「统治快乐、自由、有知识与聪明的人民是值得自豪的事，而不是统治一群乖乖听话、极度悲伤的奴仆」。

索鲁什远在海外，但他的女儿基米亚与女婿哈梅德仍待在国内，他们既非公众人物也非政治活动分子。安全体制的探员找上哈梅德，将他的衣服脱光然后关在冷藏室里一整晚，他们威胁要杀了他而且逼迫他指责自己的妻子是个不检点的女人然后与她离婚，他们还要哈梅德抨击他的岳父是外国间谍。但哈梅德与妻子最后顺利逃到了美国。

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他在狱中写了一些信件。其中一封从狱中偷渡出去，是给哈梅内伊的公开信。其他的信绝大多数是给他的妻子。塔吉札德赫的妻子在自己的部落格发表文章，内容是关于她与塔吉札德赫之间的情感连系，这种公然展示私人亲密关系的做法，在伊斯兰共和国保守的伊朗文化下是一种藐视权威的行为[19]。

塔吉札德赫的妻子在信中写道：「当你告诉我，在关了一百七十天之后，你终于能看到天空与月亮，我焦虑的心情才得以解放。我实在太天真了。每天晚上我盯着我们城市上方灰蓝色的天空，寻找你的眼睛，心里想着在半小时的放风时间，你的眼罩会被取下来，你也能看着这片天空。」塔吉札德赫在回信的末尾写着：「我很骄傲能有你这样一个美好的妻子，能娶到你是我修来的福气……，真希望在狱中可以读到你所有的信，我可以开心地读信，也可以跟狱中的朋友炫耀这就是我的法赫里（塔吉札德赫妻子的名字）！我亲吻你美丽的脸庞，愿你幸福健康。你的爱，你的穆斯塔法。」

起初，塔吉札德赫研究讯问他的人，心想，或许在长期的强制讯问后，双方能有辩论的可能。然而他与逮捕他的人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双方完全没有任何坚实的共同点可以供他施力。二〇一〇年，从埃温监狱偷渡出去的信里，塔吉札德列举了他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讯问者理想中的政治制

度之间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完全不一样，塔吉札德赫想辩论，但讯问者只想强迫取供与用胁迫的方式让犯人悔悟[20]。塔吉札德赫发现，讯问者把不同的意见视为阴谋。在他们眼中，他重视的每一个观念都成了应该加以粉碎的威胁。因此塔吉札德赫认为，关在监狱里的人，反而是最适合统治这个国家的人。

塔吉札德赫的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原因不在于他反思了当前的状况，而在于他大胆描述过去遗留下来的影响。与穆萨维或其他知名的改革派人士不同，塔吉札德赫对于一九八〇年代并未怀抱浪漫的幻想。虽然塔吉札德赫认为革命十年留下了正面的遗产，但也承认革命十年是暴力与压迫的根源。他指控强硬派是建立在革命的错误之上而非革命的成就之上。但改革派也必须响应自己在暴力制度化上面扮演的角色。塔吉札德赫哀叹说，当司法部处决不计其数的政治反对人士时，他与其他伊斯兰左翼分子却以「默认」来响应革命法院的做法。塔吉札德赫写道：「因此，我们必须认罪，但不是在公开审判上认罪，也不是由讯问者强迫我们承认自己犯下从未犯过的罪，而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根据事实认罪。革命世代必须认罪，但不是承认自己为了扩大民主与维护人权而做的努力是有罪的」，而是为了自己过去犯的错误认罪。

现在，塔吉札德赫代表改革派忏悔，承认改革派未能捍

卫最初遭受迫害的异议教士，以及改革派最初未能采取强硬的立场捍卫人权。塔吉札德赫写道：如果「我们想要认错并且要求原谅，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为巴札尔甘受到的不当对待道歉，我们也要向所有政治活动分子道歉，他们想要合法参与政治，但他们的权利却因为各种借口受到忽视。我们也必须向伊朗人民道歉，因为他们被迫过着某种生活方式，私人生活也受到干预」。

跟塔吉札德赫一样发现自己在狱中受到讯问者暴力劝说的人，都有责任揭露与谴责刑求他们的人。尽管如此，塔吉札德赫表示，这些人必须先「获得真正受压迫的人的原谅，而且要承认如果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与国民责任，我们就不会陷入强迫取供与悔罪的困境」。

在信中，塔吉札德赫说话的对象不是要求他悔罪的革命法院，而是伊朗的年轻世代，这些年轻世代一直在等待他这个世代的革命分子，尽管等到现在完全是徒劳，他们在等待塔吉札德赫这个世代的人为自己协助建立的体制负起责任。塔吉札德赫打破他那个世代的「默认」，为空泛的认罪象征添入他经历过的历史意义。

二〇〇九年秋天，民众利用官方集会做为掩护来进行抗

争。抗议民众不可能获得官方许可，因此当政府庆祝圣地日[2]或攻占美国大使馆纪念日或学生日[3]时，一些最强硬的绿色分子便混入其中进行抗争，但通常只会招来暴力对待。

「哀悼的母亲」每个星期六都会在内达被杀的时间在郁金香公园聚会，这是离内达枪击地点最近的公园，聚会者身穿黑衣，手中拿着被杀的抗议民众照片，对经过的行人讲述死者的遭遇。警察非常粗暴地对待她们，就连参与的七十岁妇女也照样殴打，这个团体因此吸引了比预期更多的媒体注意。

某天，艾妲．萨达特被传唤接受讯问，而且连续讯问了十四小时。她被禁止离开伊朗，被禁止离开德黑兰，而且几乎被禁止开车。艾妲被迫停止工作，而在此之前她已经不再返家：有一个月的时间，她一直待在朋友家里。当天深夜，她从情报部步行回朋友的公寓。几个手持警棍的男子突然跳出来将她的脸、手与脚打得鲜血直流，他们告诉她，下一次他们会杀了她。

艾妲可以想象自己会有什么下场，在她之前的一些人，他们的家人必须四处筹钱保释他们，甚至要拿出房地产证明。除非承受得住刑求，否则自己所知的网络与秘密很有可能和盘托出。她是那种禁得起刑求的人吗？绝大多数人都办不到。

艾妲有个十一岁大的儿子，他现在已经懂得巧妙应付安全探员打来找她母亲的电话。艾妲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几年在加兹温做的努力，正逐渐远离她：同时做好几份工作，觉得每一天都十分漫长，深夜开着车行驶在危险的道路上，投入心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她曾为贫穷的农村家庭找来心理学家，希望打破虐待与暴力的循环。她曾设立免费的托儿所，让双亲都需要工作的孩子能得到照顾。她曾经成功阻止一起名誉杀人事件。现在，在德黑兰，她协助组织了哀悼的母亲而且公布了选后的各种虐待事件。她是卡鲁比与早期几起性侵案件之间的联系人。她是伊朗最秘密与最狂热的人权组织人权记者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将政治犯在牢里的信息传递到外界。艾妲知道很多事，她想象一旦讯问者从她身上得知这些信息可能造成的危害。

艾妲的护照已经过期。她被禁止出国，所以她不可能申请新的护照，但听说有偷渡客可以非法带人跨越土耳其边界。十二月，土耳其与伊朗交界的山区非常寒冷。偷渡客告诉艾妲，成功的机会一半一半，她可能平安渡过，也可能被逮捕或冻死。

艾妲没有时间犹豫或恐惧，她甚至没有时间回家打包行李。她从朋友那里尽可能带走一些保暖的衣物，买了一张前往伊朗阿塞拜疆最西北端的城镇欧鲁米耶的巴士车票，然后

在加兹温稍做停留，在晚间与她的父母告别。

「不要去。」艾妲的父亲恳求她。他曾去过当地山区，他知道冬季时那里有多么寒冷。

「这是唯一的办法，」艾妲对父亲说，「我不能搭飞机，我不能搭巴士。我甚至不能合法离开，因为我没有护照。这是唯一的办法。」

艾妲是偷渡队伍中唯一的女性。她把自己交在一群危险的男人手里，在正常状况下，她甚至不会跟这些人交谈。其他难民也都是男人，他们主要是阿富汗人与巴基斯坦人。艾妲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担心受到攻击。她用头巾紧紧裹住全身，然后与其他人保持距离。艾妲唯一交谈的是一名阿富汗男人与他年幼的儿子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让艾妲想起自己的孩子。艾妲帮忙照顾阿卜杜拉，而那位父亲则是向她哭诉自己去世的妻子，他的妻子死于一场自杀炸弹攻击事件。这个男人的悲惨遭遇让艾妲觉得自己的苦根本算不了什么，自己一定撑得过去。

阿卜杜拉的父亲协助留意艾妲的安全，但当他入睡后，原本也该跟一群男人挤在一间小房间睡觉的艾妲，竟害怕得无法闭上眼睛。这群衣衫褴褛的陌生人的每个动静、每丝听得见的气息，都让艾妲全身僵硬，最后她终于受不了，索性

离开小房间。艾妲坐在房间外面，寒冷似乎让她的血液都要冻结了。早上，艾妲与这群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男人必须像动物似地赶路，他们必须低着头躲在灌木丛与山丘后面，而高海拔快让艾妲喘不过气来。

艾妲走不动了，她坐在地上不断喘气，一名偷渡客走过来站在她面前。

「因为你走不动了，所以你要让其他人的性命遭受危险吗？」偷渡客质问她，「你受不了？你没办法呼吸？我大可把你丢在这里，让野兽把你吃了。你到底要走还是要留下？现在就做决定。」

艾妲站不起来。一名阿富汗人走过来，拿起她的包包并且抓起她的手，协助她加入其他人的行列。大约半小时后，他们来到边界附近。偷渡客已经买通一名边境守卫。有两批难民，艾妲是前面那批，男孩阿卜杜拉与他的父亲是后面那批。在他们面前有一条河。艾妲不会游泳，她怕水，但她现在不能迟疑。他们将在冬夜里渡河。当河水淹没她时，感觉没那么糟糕。然而一旦她抵达对岸，离开水面接触到寒冷的空气，全身的皮肤就像被刀割一样。

偷渡客犯了一个错。他买通边境守卫让第一批难民越过边界，但这笔钱却不包括第二批。边境守卫喝令第二批难民

站住别动，然后开枪扫射。当艾妲看见阿卜杜拉倒下时，她离他只有很短的距离。她已经站在土耳其领土上，湿透的衣物将她冻僵了，她无法动弹，甚至叫不出声音来，直到夜里更晚的时刻，她才逐渐恢复，但什么也不能做。

阿希耶赫．阿米尼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通常他们是在深夜遭到逮捕，然后被秘密送往监狱，至于要关押多久则无从得知。阿希耶赫曾经想象自己深夜时在九岁的艾娃惊恐注视下被逮捕，有时她觉得自己正等待着这一刻。阿希耶赫又回头连络夏迪．萨德尔，夏迪告诉她，要看出「每日上线」上哪个是阿希耶赫使用的假名并不难。凡是知道她写作风格的人都可以认得出来，情报部里一定有人的眼光跟夏迪一样锐利。

当阿希耶赫看到电视上的公开审判与强迫认罪时，她哭了。她的朋友，记者与电影制作人马兹亚．巴哈里变得很憔悴；他看起来像个崩溃的人，模样完全变了。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则是失魂落魄。如果这些人都会在狱中崩溃，那么她会怎么样呢？

某个星期五一大早，阿希耶赫的家门铃响了。那是贾瓦德熟识的人。她在瓦利亚斯尔广场的一场小型抗议中被捕，

两天前才出狱。她说，在她的牢房里关着三十六名妇女，有一半在审讯时都被问起阿希耶赫．阿米尼的事。那名女子坚持，阿希耶赫必须马上离家。阿希耶赫知道自己或许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总统大选之前，阿希耶赫曾经受邀参加瑞典的诗人节。现在，她回复瑞典大使。阿希耶赫告诉大使，她会参加诗人节，但必须带着女儿前往。在机场，阿希耶赫打电话给贾瓦德，并且让手机维持通话状态，好让贾瓦德知道她是否遭到拦阻。但阿希耶赫顺利通关了。

每当阿希耶赫从瑞典打电话给贾瓦德时，贾瓦德告诉她每天状况都在恶化。阿希耶赫关注的一名被告贝赫努德．休贾伊耶，他十七岁时在一场斗殴中杀了人，这名被告已经遭到处决。阿希耶赫与贾瓦德关在监狱里的朋友都被体制所吞噬，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帮助他们。马兹亚．巴哈里获释时，他发简讯给阿希耶赫，上面写着：别回来。阿希耶赫知道巴哈里在狱中被迫说了对她不利的事。

阿希耶赫的一切以及阿希耶赫所做的一切或多或少都与伊朗紧密连系，包括伊朗的复杂、语言、恐怖与辉煌。阿希耶赫不是工程师，工程师无论到世界哪个地方，他的技术总是能带着走。阿希耶赫身上背负着未完成的重任，她的国

家需要她，但她却无法在她的国家生活。有人告诉她，在埃温监狱女性牢房的墙壁上，刻着她的诗句。

阿希耶赫很幸运，透过遭危作家计划，她得以在挪威的特隆赫姆落脚，成为当地公立图书馆的驻馆诗人。贾瓦德前往特隆赫姆与妻女团聚。阿希耶赫出版了两部诗集，开始撰写回忆录，学习挪威语，而且用温暖而略带揶揄的角度看待她的新同胞。挪威的地貌——广大的崎岖地形、鲜明的蓝天与绿地、嶙峋的海岸与平滑如镜的峡湾，让阿希耶赫与贾瓦德想起了故乡马赞德兰。在特隆赫姆，夏日时夕阳永远不西沉，冬日时旭日永远不东升。这里的光线带有一种广阔平坦的性质，而生活则带有非现实的元素。机场高速公路从起伏的陆地与饱和的色彩构成的壮观而未破坏的景象中穿过。在通往阿希耶赫公寓的道路旁，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休闲景点：沙滩排球场。彷佛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而阿希耶赫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至少现在的她是如此。

＊ ＊ ＊

(1)以色列情报组织。

(2)圣地日（al-Quds Day）的 al-Queds 是阿拉伯文，意指耶路撒冷。一九七九年霍梅尼将斋戒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设定为圣地日，要对抗压迫巴勒斯坦的以色列。

(3)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准备出访伊朗时，不少大学生发起反对的示威活动，在与警方冲突之下造成诸多死伤。

后记

我上一次造访伊朗是在二〇一二年二月，那是伊朗的一段黑暗时期。绿色运动遭受镇压已将近三年，已经巩固权力的强硬派为改革取了新的名字：fetneh，「煽动叛乱」。有些改革派人士仍在牢里，未入狱的则隐退到私人生活中，至少暂时是如此，改革运动已经成为不具正当性的反对力量，甚至被归类为不合法。年轻人曾经一度在改革运动中找到宣泄公民能量与抒发悲情的出口，现在却必须面对令人极为不快的选择：默许、漠不关心或公然做出国家无法容忍的反抗行为。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伊朗的专制体制就像一条蛇，蜷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走在一条无聊但好走的小径上，四周围绕着美丽的风景，你很清楚如果自己走出小径，很可能会

惊扰到某种你看不见的事物，这些事物对你不怀好意，时时监视着你。二〇一二年，这种威胁已不再隐藏于暗处，即使是顺从的官员也会揶揄与嘲讽这种四处可见的威胁。伊朗分析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的「安全化」。威胁的公开化也有好的一面，它终止了煤气灯效应，划定了新而清楚的界线。当然，这些界线依然无情而严厉，而且似乎更进一步限缩了菁英舆论这个唯一允许的辩论空间。

尽管如此，辩论依然存在。伊斯兰共和国一个有趣的吊诡之处，在于伊斯兰共和国的威权体制总能从内部持续不断地形成对立。无论有多少人或多少团体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外，留在核心的人还是会继续分裂与相互挑战。在霍梅尼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时候，挑战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固有元素，伴随着算计与妥协，挑战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生命力量。当我在二〇一二年造访伊朗时，我无法见到任何改革派人士；但从竞选国会议员以及在报纸与网站发表批评文章的强硬派人士当中，我听到了关于各种主题朝气蓬勃的讨论，从经济到「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但所有的讨论都必须在意识形态相对正统的范围内进行。

如果有人蹒跚地走在权力核心的边缘，那么这个人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与之前的哈塔米一样，这位民粹主义总统在他第二个总统任期末尾也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放手一搏。

心高气傲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内阁任命上挑战哈梅内伊的权威，而当他未能成功任命自己的人选时，又在公众面前大发雷霆。《宇宙报》擂起了反对总统的战鼓，把总统的派系贴上「逆流」的标签，甚至暗示总统的参谋长是天鹅绒革命的特务。大家也许会说，艾哈迈迪内贾德遇到这样的事完全是报应。此外，艾哈迈迪内贾德还遭到围剿与孤立。保守派国会议员要求弹劾总统，传唤总统到国会，以威胁的口气质问他的经济政策。我永远忘不了我与总统的媒体顾问见面时他脸上的迷惘神情，当时他才刚被判刑入狱，罪名是侮辱最高领袖，然而事实上他一直都很尊崇最高领袖。艾哈迈迪内贾德另一名亲密盟友恶名昭彰的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因为卡赫里札克事件遭到起诉（最终，莫塔札维还是被宣判无罪——又一件只有在伊朗才会出现的案例，威权体制一方面自我监督，另一方面又自我赦免）。

在街上，民众想谈的是鸡肉问题。通货膨胀一直受到民众的抱怨，但现在通膨愈发剧烈，而且最直接反映在粮食价格的高涨上。正常状况下，在买不起羊肉的时候，鸡肉还是民众可以负担的肉品。但现在连鸡肉也变成奢侈品，这对于生活在资源丰富国家的伊朗人来说简直是尊严扫地。伊朗警察首长要求电视联播网不许播放鸡的画面以免引发社会不安，而这样的要求反而在社群媒体引发一连串与鸡肉相关的

笑话与嘲讽。经济运作不良的确造成严重问题。保守派建制要不是从各方面否认经济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这个时期，众人尚未开始谈论贸易禁运带来的可怕后果，而这场禁运即将扼杀伊朗的石油产业与金融部门。

二〇一二年，伊朗承受的压力尤其庞大，伊朗核计划导致的国际紧张达到几乎无法忍受的高峰。最严峻的禁运也在此时登场，每个人内心都想着军事对峙的可能。伊朗民众头上彷佛笼罩着厚重的乌云，这片乌云虽然从未发出轰隆的雷鸣，却也从未散去。在伊朗政府统治下，伊朗民众从未有过喘息的时刻，甚至连政治与言论空间仅存的一点空气也被挤压一空。通膨不断盘旋而上，在物资匮乏的几个月里，货币的价值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向下崩跌。情势看起来似乎难以维持，更可怕的是，这个可能性似乎即将成真。

写到这里，如果我说在伊朗并不存在无聊的总统大选，读者很可能会感到厌烦。但我认为这句话千真万确。二〇一三年，最高领袖似乎亲自选定了一个跟他一样极度僵化的候选人。扎伊尔德．贾里里是伊朗外交决策机构长官，也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的前核计划协商人员。一名欧洲外交官告诉我，他觉得贾里里这个人不过是官方的读稿机。《宇宙报》称赞贾里里是「超级真主党人」，许多人认为这是对贾里里的

背书。

我无法确定最高领袖是否真的全力支持贾里里。我感到纳闷的是，哈梅内伊是否很喜欢基于他自身的理由而随时改变想法。哈梅内伊既然已经决定性地击败国内的反对派人士，处于上风的他完全可以采取弹性策略。至少，他可以采取开放的立场。

在第一次总统大选辩论会上，哈梅内伊的一名亲信，本身不是具说服力的候选人，他攻击贾里里的外交政策立场，认为贾里里在外交上拒绝让步并未为伊朗取得任何成果，反而招致禁运。之后，原本不属于公共辩论主题的外交政策便成了众人攻击的焦点。这种状况使黑马有了可趁之机。哈桑．罗哈尼是一名务实的外交政策老手，他与不受欢迎的拉夫桑贾尼关系亲近，因此几乎没有人认为他有机会赢得选举。

与其他候选人相比，罗哈尼更像是伊朗外交的门面。二〇〇三年，他曾同意冻结伊朗核计划，当时他是伊朗哈塔米政府负责对外协商的人（之后艾哈迈迪内贾德可能得到最高领袖的支持，推翻这个协议）。罗哈尼不是改革派人士，他是长期维护安全体制的重要人物，一九九九年他对学生运动的敌视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完全不支持改革派的思想计划。但是，罗哈尼在伊朗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出面呼吁团结。

他要求拟定公民宪章，详细规定民众的权利，他甚至说，他会设法让绿色运动领袖解除软禁。

「先放下改革主义吧，」据说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曾这么规劝他的前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同志，「我们是伊朗人也是穆斯林。让我们参与这场选举来减少民众的苦难。」[1] 哈塔米与拉夫桑贾尼也支持罗哈尼。投票前三天，他们成功说服改革派唯一的参选人退选并且转而支持罗哈尼。这匹黑马终于胜出。

日后，我从接近伊朗政权的消息来源得知，哈梅内伊投票给贾里里，但他指示安全体制，无论如何要接受选举结果，因为他不想看到二〇〇九年的状况重演。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将是了不得的新闻，因为这等于是拐弯抹角承认二〇〇九年确实出现选举干预。无论如何，罗哈尼第一轮就以百分之五十一的得票率赢得选举。保守派的选票分散在几名强硬派候选人身上，贾里里只排第三。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不是在投票结束后就立即在星期五晚上宣布，而是跟过去一样，在星期六下午宣布。而这次选举结果迎来的不是抗争，而是庆祝。

罗哈尼重新燃起许多伊朗人的希望，但这些希望与哈塔米曾经燃起的希望并不相同。一名分析家告诉我，或许，改革派终于学乖了：他们过去用革命乌托邦主义换取自由派乌

托邦主义，但他们现在了解现实政治就是妥协。又或者他们是在布置一个长期的策略，若非如此他们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罗哈尼政府明确表示，所有的内政议题必须等核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进行，解决核问题就能够解除禁运，同时也能让总统获得派系支持。

伊朗与六国的核协议不仅提供了让伊朗核计划接受实质国际监督的可能，最终也能终结伊朗的孤立，减缓伊朗与美国长达三十多年的紧张关系。对伊朗民众来说，与世界连结而非与世界断绝往来的伊朗，必然是一个更安全与更美好的地方。大体而言，伊朗市民社会与绝大多数伊朗民众都支持这个结果。对于相信伊朗问题或美伊问题无法透过枪杆子解决的人来说（我也包括在内），也支持这个结果。流血与贫困无法让伊朗强硬派陷入困境，只会破坏伊朗最具前景的资源，也就是人民的善意与公民能量。

从各方面来说，在罗哈尼主政下，公共辩论的光谱扩展了，温和派与中间派报纸填充了这片新的空间。然而，这股微薄的力量无法对人权产生多大影响。伊斯兰共和国处决犯人的最高纪录是一年七百五十三人，将近一半与毒品犯罪有关，至少有十三名是少年犯[2]。根据二〇一四年的统计，伊朗监禁了三十名记者，仅次于中国[3]。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札赫拉．拉赫纳瓦尔德与梅赫迪．卡鲁比仍遭受软禁。二〇

〇九年后，改革派两大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与国家信任党遭到查禁。六年后，当新的改革派政党成立时，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一名成员遭到逮捕。二〇一五年二月，司法部宣布刊出前总统哈塔米的照片或甚至他的名字都属于非法行为。

在重新恢复的乐观主义与公民和平的时代里，谈论人权或民主改革成了不识时务的行为，更不用说是不礼貌的举动。罗哈尼政府不仅投入大量心力在外交上，也致力于务实的中间路线。就某种程度来说，在经历了二〇〇九年的动荡与之后数年的对立，产生的影响竟然与人们直觉的预期完全相反。对许多人来说，想继续参与伊朗政治体系并且希望伊朗政治体系能够产生建设性的改变——就最严格的意义来说，也就是继续成为一名改革派分子——意味着与二〇〇九年的事件和解并且找到新的平衡点[4]。

然而，随着二十世纪晚期的改革运动逐渐走入历史，这段围绕着伊朗革命的尊严与牺牲的历史就这样延伸到可见的视界之外。伊朗没有被动的公民文化，尽管从过去到现在，伊朗统治者千方百计想创造出这样的公民。从各方面来说，伊朗的公民一直有着永不止息的决心去挑战不公义与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在本书讲述的伊朗人故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相反地，他们用自己的梦想来充实伊斯兰共和国。他们以为伊斯兰共和国能接纳他们的哲学挑战与选举参与，能容纳他们致力组织的社群与他们坚持说出的内心想法。他们相信真理必须传扬，死者值得哀悼。他们当中一些人相信伊朗若能正视自己的过去，终能摆脱魔鬼的掌握。他们几乎所有的人最终都被迫离开伊朗，但伊朗还会有其他人，因为驱策伊朗人前进的动力是永不停息的。就像各种颜色的小鱼，不断猛冲前进，前进，再前进。

致谢

我特别感谢愿意与我分享故事且愿意提供细节出版的伊朗人，包括阿里．阿夫夏里、阿希耶赫．阿米尼、侯赛因．巴什里耶赫、阿克巴尔．甘吉、阿里雷札．哈吉吉、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艾妲．萨达特与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欧米德．梅玛瑞安、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与索尔玛兹．夏里夫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接受我的访谈，而后续一些辛苦的过程他们也总是愿意拨空参与，我不知如何适当地说明他们对于我的安排的配合程度，有时一起，有时个别访谈，他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顾他们生命中最痛苦的经验，好让我完成这份公共纪录。我很感激他们的坦诚相告、他们的勇气，以及更多的一切。

没有《纽约客》，这本书就不会存在。二〇〇五年，《纽

约客》给了一名毫无名气决心前往伊朗的记者机会。我要感谢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愿意信任我，感谢我的朋友与编辑丹尼尔．札雷夫斯基（Daniel Zalewski）安排一切与协助我克服人性与报导的复杂。感谢同样在《纽约客》的多萝西．维肯登（Dorothy Wickenden）以及斯科特．马可森（Scott Malcomson），二〇〇六年年底，马可森派我到伊朗为《纽约时报杂志》进行采访。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经纪事务所（Andrew Wylie Agency）的莎拉．查尔芬特（Sarah Chalfant）于二〇〇七年协助我构思本书，此后便持续给我支持、建议与鼓励。

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能在河源（Riverhead）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我的编辑贝姬．萨勒顿（Becky Saletan）有着清晰的愿景、文学敏感度、温暖的友谊以及对历史还有历史观念的热情，这些都为这本书以及我个人带来许多帮助。多亏贝姬，这堆不断蔓生而四处萦绕的稿子才得以成为一本书。感谢河源出版社（Riverhead）其他工作人员，特别是安娜．贾丁（Anna Jardine）、凯蒂．弗里曼（Katie Freeman）、金．马丁（Jynne Martin）、凯特．斯塔克（Kate Stark）、凯伦．梅尔（Karen Mayer）、葛瑞丝．韩（Hea Eun Grace Han）与玛莉萨拉．奎恩（Marysarah Quinn）。

在我进行研究期间，许多伊朗人与伊朗专家与我分享他

们的时间与知识，提供建议、洞察、介绍、翻译、分析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或经验。我无法说出仍住在伊朗的朋友与消息来源的真实姓名，但我希望他们知道我指的是谁，以及我有多么感谢他们。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玛赫布贝赫．阿拔斯戈里札德赫（Mahboubeh Abbasgholizadeh）、穆尔提札．阿卜杜拉瑞安（Morteza Abdolalian）、埃尔凡德．亚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阿尼萨．阿夫夏尔（Anisa Afshar）、拉敏．阿赫玛迪（Ramin Ahmadi）、玛西赫．阿里内贾德（Masih Alinejad）、玛里阿姆．阿姆泽加尔（Maryam Amuzegar）、巴赫曼．巴克提阿里（Bahman Baktiari）、埃米尔．巴尔玛基（Amir Barmaki）、梅赫尔札德．波鲁杰尔迪（Mehrzad Boroujerdi）、卡维赫．埃赫桑迪（Kaveh Ehsani）、哈雷赫．埃斯凡迪亚里（Haleh Esfandiari）、哈迪．加埃米（Hadi Ghaemi）、侯赛因、加兹安（Hossein Ghazian）、罗亚、哈卡基安（Roya Hakakian）、克凡．哈里斯（Kevan Harris）、玛苏德．胡曼（Masood Hooman）、穆赫辛．卡迪瓦、侯赛因．卡马里、马赫迪斯．基沙瓦尔兹（Mahdis Keshavarz）、尼卡．汉贾尼（Nika Khanjani）、阿札姆．哈塔姆（Azam Khatam）、阿拔斯．米拉尼（Abbas Milani）、玛里阿姆．米尔札（Maryam Mirza）、夏亚．莫哈杰尔（Shaya Mohajer）、玛努切贺尔．穆罕玛迪（Manouchehr Mohammadi）、阿夫辛．莫拉维（Afshin Molavi）、贾瓦德．蒙塔泽里、纳西德．莫札法里（Nahid

Mozaffari)、努拉丁．皮尔莫阿岑（Nouradin Pirmoazen)、阿里．拉赫尼玛（Ali Rahnema)、阿赫玛德．萨德里（Ahmad Sadri)、马赫茂德．萨德里（Mahmoud Sadri)、卡里姆．萨贾德普尔（Karim Sajadpour)、德贾瓦德．萨勒希－伊斯法罕（Djavad Salehi-Isfahani)、穆赫辛．萨泽伽拉、纳西德．夏姆多斯特（Nahid Siamdoust)、伊凡．西格尔（Evan Siegel)、易卜拉欣．索尔塔尼、卡姆比兹．塔瓦讷（Kambiz Tavana)、罗伯托．托斯卡诺（Roberto Toscano)、帕尔瓦内赫．瓦希德马内什（Parvaneh Vahidmanesh）与丽拉．阿札姆．赞加内赫（Lila Azam Zanganeh)。

这项计划获得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多萝西与刘易斯．B．库尔曼学者与作家中心（Dorothy and Lewis B. Cullman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Writers）的慷慨支持，睿智的珍．斯特劳斯（Jean Strouse)给予我许多协助。柏林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的盖瑞．史密斯（Gary Smith）在关键时刻热心支持我的作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给予我指引与挑战。

此外也要感谢史蒂芬．海因兹（Stephen Heitz）与威廉．卢斯（William Luers）让我参与他们的伊朗计划深具启

发性的会议，感谢现在任职于史都华．克里切夫斯基著作出版经纪事务所（Stuart Krichevsky Literary Agency）的戴维．帕特森（David Patterson），感谢《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的约翰．沃格特（John Vogt）。谢谢妳，卡萝．杰克（Carol Jack）。非常感谢马修．谢瑞尔（Matthew Sherrill）、戴拉．麦克尼可拉斯（Darragh McNicholas）与拉拉．札鲁姆（Lara Zarum）帮我严格查核事实。

我要感谢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愿意聆听我讲述漫长的伊朗阴谋故事以及在我写作遇到瓶颈时为我打气的人：基拉．布鲁纳．唐（Kira Brunner Don）、索妮亚．卡提尔（Sonia Katyal）、尼可拉斯．克里希（Nicholas Kulish）、丹尼尔．博格纳（Daniel Bergner）、盖瑞．巴斯（Garry Bass）、亚历山大．斯塔（Alexander Star）、艾米．沃德曼（Amy Waldman）、苏西．林斐德（Susie Linfield）、艾丽沙．夸特（Alissa Quart）、艾丽沙．勒文（Alissa Levin）、琳．格洛夫（Rinne Groff）。其中最感谢的是艾亚尔．普雷斯（Eyal Press），他把稿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支持与回馈。

我要向我的家人为我做的一切表达爱与感谢：玛丽．席科尔（Marie Secor）、罗伯特．席科尔（Robert Secor）、安娜．席科尔（Anna Secor）、南西．帕克（Nacy Packer）、安．帕克（Ann Packer）。感谢我的孩子查理与茱莉亚．帕克

（Charlie and Julia Packer）为我带来快乐。

最后有两个人是我最感谢的。穆罕默德.阿亚图拉西.塔巴尔（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一直慷慨分享他的知识与洞见。他赋予这部作品意义与目的，让我在庞杂的信息中不致迷失。我只希望完成的这部作品能不辜负他的帮助。

然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他是我灵感的来源，我的盘石，我的爱。然而，在花费这么多笔墨感谢许多帮助我的人之后，我发现我找不到任何字句足以充分表达我对他的感谢。

注释

数据源说明

除了极少数例外，基本上我不会对出自我的报导与访谈的数据加注数据源，这些资料有些是我先前在《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与其他出版品发表文章的基础。二〇〇四年到二〇一二年间，我到伊朗旅行了五次，在伊朗国内外访谈超过一百六十名伊朗人——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新闻工作人员、活动分子、教士、经济学家、商人与一般民众。我也曾在二〇〇五年、二〇〇六年、二〇〇八年与二〇一二年直接观察与选举相关的集会、座谈会、演说与投票所。

第一章　小黑鱼

1 Samad Behrangi, The Little Black Fish and Other Modern Persian Stories, trans. Eric Hooglund and Mary Hooglund (Washington, DC: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76), 1-19.

2 Brad Hanson, “The ‘Westoxication’ of Iran: Depictions and Reactions of Behrangi, Al-e Ahmad, and Shariat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5, no. 1 (Feb. 1983), 1-23.

3 同前，2。

4 Abbas Milani, Eminent Persians: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de Modern Iran, 1941-1979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and Persian Book World, 2008), vol. 2, 842.

5 Jalal Al-e Ahmad, “Samad and the Folk Legend,” in Iranian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ed. Michael Hillmann (Lexington, KY: Mazda, 1982), 141.

6 Ali Rahnema, An Islamic Utopian: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li Shari ‘ati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0), 192.

7 同前，177。

8 同前，38。

9 同前，292。

10 同前，107。

11 Ali Mirsepassi,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Negotiating Modernity in Ira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8.

12 Ali Gheissari, Iran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 101.

13 Rahnema, An Islamic Utopian, 125.

14 Farzin Vahdat, God and Juggernaut: Iran’s Intellectual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3-45.

15 Rahnema, An Islamic Utopian, 191.

16 Interview with Alireza Alavi Tabar in Ali Mirsepassi, Democracy in Modern Iran: Islam,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8.

17 Rahnema, An Islamic Utopian, 236.

18 H. E. Chehabi, Irania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of Iran Under the Shah and Khomeini (London: I. B. Tauris, 1990), 205.

19 Rahnema, An Islamic Utopian, 133-34.

20 Ervand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Prisons and Public Recantations in Modern Ir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05.

21 Rahnema, An Islamic Utopian, 315.

22 同前，356。

23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116.

24 Reza Khojasteh-Rahimi, “We Should Pursue Shariati’s Path but We Shouldn’t Be Mere Followers: An Interview with Abdulkarim Soroush,” June 19, 2008, http://www.drsoroush.com/English/Interviews/E-INT-

Shariati_June2008.html.

25 同前。

第二章　伊斯兰共和国

1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 Paul Shorey, in 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Including the Letters, eds.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752.

2 Saeed Amir Arjomand, After Khomeini: Iran Under His Success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秘密的揭露》曾经数次出版。

3 Hamid Ansari, The Narrative of Awakening: A Look at Imam Khomeini's Ideal,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from Birth to Ascension), trans. and ed. Seyed Manoochehr Moosavi (Qom, Iran: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of Imam Khomeini,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1994), 55.

4 Ruhollah Khomeini, “A Warning to the Nation” (1941), in Ruhollah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I: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 trans. and ed. Hamid Algar (Berkeley, CA: Mizan Press, 1981), 181-82.

5 同前，171。

6 同前，37。

7 同前，63。

8 同前，214。

9 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 “From Womb to Tomb: Religion, the State and War in Iran,” 本书作者取得的尚未出版的论文。

10 Khomeini, “A Warning to the Nation,” 269.

11 同前。

12 同前，270。

13 Ervand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Prison and Public Recantation in Modern Ir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24.

14 同前，169。

15 H. E. Chehabi, Irania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of Iran Under the Shah and Khomeini (London: I. B. Tauris, 1990), 64.

16 同前，258。

17 Khomeini, “A Warning to the Nation,” 330-32.

18 Chehabi, Irania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258-59.

19 Ervand Abrahamian, The Iranian Mojahed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8.

20 Plato, The Republic, 752.

21 Asgar Schirazi, The Constitution of Ira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trans. John O’Kane (London: I. B. Tauris, 1998), 27.

22 同前，31-32。

23 Hossein Bashiriyeh,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962-198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151.

24 Khomeini, “A Warning to the Nation,” 342.

25 James G. Blight, Janet M. Lang, Hussain Banai, Malcolm Byrne, and John Tirman, Becoming Enemies: U.S.-Iran Relations and the Iran-Iraq War, 1979-1988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299-300.

26 Chehabi, Irania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273.

27 Abrahamian, The Iranian Mojahedin, 58.

28 Bashiriyeh,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56.

29 David Menashri, Iran: A Decade of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0), 133.

30 同前，134。

31 Abrahamian, The Iranian Mojahedin, 60.

32 Bashiriyeh,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58.

33 Blight et al., Becoming Enemies, 73.

34 Bashiriyeh,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61.

35 Abrahamian, The Iranian Mojahedin, 66.

36 Menashri, Iran, 171.

37 同前，176。

38 同前，181。

39 Bashiriyeh,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60-61.

40 Scheherezade Faramarzi, “Executions Continue as Opposition Mounts Underground Campaign,” Associated Press, June 28, 1981.

41 Abrahamian, The Iranian Mojahedin, 68.

42 Reuters, “No Need for Defence Attorney, Iran Judge Tells Former Official,” Globe and Mail, March 19, 1981.

43 “Still Feuding, Fighting, Fussing,” Newsweek, U.S. ed., March 30, 1981, 44.

44 Reuters, “Former Iran Official Seeks Defence Right,” Globe and Mail, April 28, 1981,

45 Menashri, Iran, 178.

第三章　持续沉思的时期

1 Farhang Rajaee, Islamism and Modernism: The Changing Discourse in Ir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226.

2 Reza Khojasteh-Rahimi, “We Should Pursue Shariati’s Path but We Shouldn’t Be Mere Followers: An Interview with Abdulkarim Soroush,” June 2008, http://www.drsoroush.com/English/Interviews/E-INT-Shariati_June2008.html.

3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2, Hegel and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16.

4 同前，139。

5 同前，178。

6 Behrooz Ghamari-Tabrizi,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Abdolkarim Soroush, Religious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Reform (London: I. B. Tauris, 2008), 127.

7 同前，127。

8 同前，104。

9 同前，112。

10 同前，116。

11 同前，189。

12 “The 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ight to the End They Didn’t Know Where They Were Meant to Be Going,’” interview with Abdolkarim Soroush, published in Lowh, Oct. 1,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drsoroush.com/English/Interviews/E-INT-19991000-The_Story_of_the_Cultural_Revolution.html.

13 Ghamari-Tabrizi,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117.

14 Farzin Vahdat, God and Juggernaut: Iran’s Intellectual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9.

15 同前，195。

16 达瓦里思想的解释大部分参考 Vahdat, God and Juggernaut, chapter 5。

17 Ghamari-Tabrizi,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191.

18 见 Mahmoud Sadri, “Fardid: Passionate and Genuine but Deeply Flawed Intellectual,” http://nilgoon.org/archive/mahmoudsadri/pages/mahmoudsadri_002.html.

19 同前。

20 Maryam Kashani, “Never in Iran’s History Has Philosophy Been So Political: An Interview with Abdulkarim Soroush,” Jan. 30, 2006, http://drsoroush.com/en/never-in-irans-history-has-philosophy-beensopolitical/.

21 同前。

22 Ali Paya, “Karl Popper and the Iranian Intellectuals,”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s 20, no. 2 (Spring 2003), 61.

23 Ghamari-Tabrizi,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191.

24 同前，190。

25 Paya, “Karl Popper and the Iranian Intellectuals,” 61-63.

26 David Menashri, Iran: A Decade of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0), 218.

第四章　血的洗礼

1 Iran Times, Oct. 17, 2014, 2, 引自 Lawrence G. Potter, “New Casualty Figures for Iran-Iraq War,” message posted Oct. 16, 2014, to Gulf 2000 electronic mailing list, archived

at https://members.gulf2000.columbia.edu. 两伊战争的伤亡数字一直有争议，而且数据之间的落差甚大。也可见http://kurzman.unc.edu/death-tolls-of-the-iran-iraq-war/。

2 Djavad Salehi-Isfahani,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Iran,”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7, no. 1 (March 2009), 5-24.

3 同前。

4 Bahman Baktiari, 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Ira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actional Politic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 81.

5 这些质疑见波斯文网站：http://www.irajmesdaghi.com/page1.php?id=395。

6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Spotlight: Mir Hossein Mousavi, Iranian Prime Minister,” Oct. 29, 1981.

7 David Menashri, Iran: A Decade of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0), 306, 327, 356.

8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Iran Warns War Could Spread,” Dec. 20, 1982.

9 Reuters, “Annihilate Israel: Iran,”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 18, 1988.

10 “700 Protest Prison Death of Israeli Tourists’ Killer,” Chicago Tribune, Jan. 9, 1986, 5. The quote is from Tehran Radio.

11 Reuters, “Iran Marks Anniversary of Embassy Takeover,” Globe and Mail, Nov. 5, 1983.

12 停火后公开的霍梅尼信件简要提到武装部队总司令提出的报告，见 http://www.aftabnews.ir/vdceeo8jho8zn.html。

13 Dilip Hiro, The Longest War: The Iran-Iraq Military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43.

14 Robert Pear, “Khomeini Accepts ‘Poison’ of Ending War with Iraq; U.N. Sending Mission,”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88.

15 Ervand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Prisons and Public Recantations in Modern Ir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35, 169, 140.

16 Reza Afshari, Human Rights in Iran: The Abus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119-28.

17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139.

18 同前，140。

19 Houshang Asadi, Letters to My Torturer: Love, Revolution, and Imprisonment in Iran (Oxford: Oneworld, 2010).

20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169.

21 同前，154。

22 同前。

23 同前，168。

24 Afshari, Human Rights in Iran, 105.

25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174-75.

26 Afshari, Human Rights in Iran, 105.

27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Deadly Fatwa: Iran’s 1988 Prison Massacre,” Aug. 2009, 16,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publications/reports/3158-deadly-fatwa-iran-s-1988-prison-massacre.html.

28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129.

29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Deadly Fatwa,” 9-10, 12-13.

30 同前，88（伊斯兰教令与答问的全部译文）。

31 Christina Lamb, “Khomeini Fatwa ‘Led to Killing of 30,000 in Iran,’” Daily Telegraph, Feb. 4, 2001. 也可见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Deadly Fatwa,” 27.

32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211.

33 同前，211-12。

34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Deadly Fatwa,” 28.

35 同前，8，引用蒙塔泽里的回忆录。

36 同前，52-53。

37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219.

38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1987-1990” (1990), 11,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021/1990/en/.

39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Deadly Fatwa.”

40 同前，Appendix 5, 96。

41 同前，Appendix 6, 100。

42 同前，Appendix 7, 104。

43 Baktiari, 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Iran, 172.

44 Abrahamian, Tortured Confessions, 220.

45 Karim Sadjadpour, Reading Khamenei: The World View of Iran’s Most Powerful Lead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8), 6.

46 同前。

47 Menashri, Iran, 349.

48 Sadjadpour, Reading Khamenei, 7.

第五章　扩大与缩小

1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102.

2 Behrooz Ghamari-Tabrizi,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Abdolkarim Soroush, Religious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Reform (London: I. B. Tauris, 2008), 194.

3 穆塔兹拉学派理论的历史的简要说明大部分参考 Richard C. Martin and Mark R. Woodward, with Dwi S. Atmaja, Defenders of Reason in Islam: Mu’tazilism from Medieval School to Modern Symbol (Oxford: Oneworld, 1997)。

4 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 “Who Wrote the Qur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 5, 2008.

5 “Mohammad’s Word, Mohammad’s Miracle: An Interview with Abdulkarim Soroush by Kargozaran Newspaper,” Feb. 9, 2008, http://drsoroush.com/en/mohammads-word-mohammads-miracle/.

6 Ghamari-Tabrizi,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217.

7 Ali Paya, “Karl Popper and the Iranian Intellectuals,”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s 20, no. 2 (Spring 2003), 68.

8 Ziba Mir-Hosseini, Islam and Gender: The Religious Debate in Contemporary Ir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7-46.

9 Ghamari-Tabrizi,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217.

10 同前，218。

11 同前，219。

12 同前，220。

13 同前，222。

第六章　热月

1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65), 250.

2 同前，47。

3 Mehdi Moslem,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5.

4 同前，144。

5 同前，169。

6 Bahman Baktiari, 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Ira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actional Politic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 212.

7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20: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Ali Mirsepassi, Democracy in Modern Iran: Islam,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0.

第七章　伊朗历三月二日

1 Mohammad Khatami, Islam, Liberty and Development, trans. Hossein Kamaly (Binghamton, NY: Global Academic Publishing, 1998), 115.

2 同前，34。

3 同前，112。

4 同前，150。

5 David Menashri,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Ira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wer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84.

6 Genieve Abdo and Jonathan Lyons, Answering Only to God: Faith and Freedom in Twenty-first-Century Iran (New York: Henry Holt, 2003), chap. 3.

7 同前，70-71。

8 同前，73。

9 同前，74。

10 Iran Data Portal, http://www.princeton.edu/irandataportal/elections/pres/1997.

11 蒙塔泽里演说摘要，见 Ziba Mir-Hosseini and Richard Tapper, Islam and Democracy in Iran: Eshkevari and the Quest for Reform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103-108.

12 Mirjam Kunkler, “The Special Court of the Clergy and the Repression of Dissident Clergy in Iran,” in Saeed Amir Arjomand and Nathan J. Brown, eds., The Rule of Law, Islam,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Egypt and Ir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57-100.

13 Mehdi Moslem,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6.

第八章　连环谋杀案

1 Shirin Ebadi with Azadeh Moaveni, Iran Awakening: A Memoir of Revolution and Ho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137.

2 Hammed Shahidian, “Writing Out Terror,” January 8, 1999. （作者死后）二〇〇五年十月八日在 Iranian.com, http://iranian.com/BTW/2005/October/Terror/index.html 公开了未出版的手稿。

3 Ziba Mir--Hosseini and Richard Tapper, Islam and Democracy in Iran: Eshkevari and the Quest for Reform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69.

4 同前，67。

5 Reza Afshari, Human Rights in Iran: The Abus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特别是第十三章，“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Expression, and Press," 185-216。

6 Mehrangiz Kar, Crossing the Red Line: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Costa Mesa, CA: Blind Owl Press/Mazda, 2007), 125-29.

7 Hammed Shahidian, trans., "We Are the Writers!," Iranian Studies 30, nos. 3-4 (1997), 291-93.

8 "Rafsanjani to Succeed Khamenei?," Iran brief, Info-Prod Research (Middle East), no. 64 (Oct. 4, 1999).

9 Afshari, Human Rights in Iran, 206.

10 Mir-Hosseini and Tapper, Islam and Democracy in Iran, 71.

11 Ebadi with Moaveni, Iran Awakening, 139.

12 Akbar Ganji, "Assassination's Directors," in Writers Under Siege: Voices of Freedom from Around the World, eds. Lucy Popescu and Carole Seymour-Jon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2-53.

13 Akbar Ganji,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a Suicide," in Writers Under Siege, 153-55.

第九章　伊朗历四月十八日

1 David Menashri,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Ira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wer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136.

2 A. W. Samii, “The Contemporary Iranian News Media: 1998-1999,”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ERIA) Journal 3, no. 4 (Dec. 1999), available online on Rubin Center fo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bsite, http://www.gloria-center.org/1999/12/samii-1999-12-01/.

3 FDI: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in Iran, “Hard--liners Close Salam Newspaper,” News Flash, July 8, 1999, http://www.iran.org/news/bbc990708.htm.

4 Abbas Samii, “The Internal Struggle over Iran’s Future,” Crises in the Contemporary Persian Gulf, ed. Barry Rubin (New York: Frank Cass, 2002), 277-313.

5 “Iran’s Tiananmen Square, or 1979 Revisited?,” Mideast Mirror, 13, no. 131 (June 12, 1999).

6 Geneive Abdo, “Khatami Abandons Student Protesters: Iran’s Pro-Democracy Activists Left Stunned, Confused As President Sides with Hard-liners,” Globe and Mail (Canada), July 15, 1999.

7 Elaine Sciolino, Persian Mirrors: The Elusive Face of Ira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5), 242.

8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ran: Akbar Mohammadi’s Death in Custody Signals Need for Justice Reform,” Amnesty International, August 9, 2006, http://www.amnesty.or.jp/en/news/2006/0809_551.html.

9 Menashri,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Iran, 147.

10 Tarek Al-Issawi, “After Protests, Khatami Pledges to Continue Reform Program,” Associated Press, July 28, 1999.

11 “Iran Riots 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Me: Khatami,” Agence France-Presse, July 28, 1999.

12 同前。

13 Geneive Abdo and Jonathan Lyons, Answering Only to God: Faith and Freedo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Iran (New York: Henry Holt, 2003), 219.

14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Witness Statement: Ali Afshari,” 2008, 14,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publications/witness-testimony/3175-witness-statement-ali-afshari.html.

第十章　总体计划

1 Jeffrey M. Hardwick, Mall Maker: Victor Gruen, Architect of an American Drea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151.

2 同前，188。

3 同前，215。

4 Ali Madanipour, Tehran: 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8), 103.

5 Asef Bayat, Street Politics: Poor People's Movements in Ir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5.

6 Tehran Municipality, "Tehran, Social Situation," http://en.tehran.ir/Default.aspx?tabid=99.

7 Bayat, Street Politics, 29.

8 Wouter Vanstiphout, "The Saddest City in the World: Tehran and the Legacy of an American Dream of Modern Town Planning," in The New Town, a research and exhibition project by Crimso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Rotterdam, March 2, 2006, http://www.thenewtown.nl/article.php?id_article=71.

9 同前。

10 一九七七年，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农村家庭拥有电力；到了一九八四年，有百分之五十七拥有电力。现在，农村家庭也能购买冰箱（农村家庭从相同时期的百分之七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与电视机。

11 Djavad Salehi-Isfahani,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ural Poor," Radical History Review, no. 105 (Fall 2009), 139-44.

12 Bayat, Street Politics, 86.

13 Fariba Adelkah, Being Modern in Ir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

14 Kaveh Ehsani,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 Said Amir Arjomand and Nathan J. Brown, eds., The Rule of Law, Islam,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Egypt and Ir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162.

15 Asef Bayat, Making Islam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st-Islamist Tur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6.

16 同前，58。

17 Kaveh Ehsani and Sai’id Hajjarian, “ ‘Existing Political Vessels Cannot Contain the Reform Movement’: A Conversation with Sai’id Hajjarian,” Pushing the Limits,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at Twenty, special issue of Middle East Report, no. 212 (Autumn 1999), 42.

18 审判信息出自 “Tehran Mayor Denies Stealing ‘a Single Rial’ As Trial Resumes,” Agence France-Press, June 11, 1998。

19 Afshin Valinejad, “Tehran Mayor Accuses Authorities of Torture,” Associated Press, July 5, 1998.

20 John Daniszewski, “Shooting Leaves Iranian Reformist Seriously Hurt,”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3, 2000, A1.

21 Susan Sachs, “2 Trials Focus Attention on Iranian Justice,” New York Times, May 3, 2000, A12;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May 5, 2000, English text of report from Vi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Network 4, May 3, 2000.

22 Scott Peterson, “Are Hardliners Taking Aim at Reformis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3, 2000, 7.

23 BBC Monitoring Middle East, “Iran: Two Tehran Municipality Deputies Resign,” text of report from Kayhan website (in Persian), Jan. 17, 2002.

24 Hoseyn Shariatmadari, “Note of the Day” column on Kayhan website (in Persian), Jan. 9, 2003, 2. Translated for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Jan. 10, 2003.

25 Mohammad Mohajeri, “This Council Was Disbanded Four Years Ago” on Kayhan website (in Persian), Jan. 15, 2003,

2. Translated for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Jan. 16, 2003.

26 数字出自内政部发言人 Jahanbakhsh Khanjani in Ali Akbar Dareini, “Local Election Turnout in Tehran 10 percent, Conservatives in Lead,” Associated Press Worldstream, March 1, 2003。

27 “Khatami Worried About Low Turnout at Iranian Municipal Elections,” Deutsche Presse-Agentur, March 3, 2003.

28 Reuters, “Conservatives Crush Reformers in Iran; 14 of 15 Seats on Tehran Council Go to Hardliners,” Chicago Tribune, March 3, 2003, 3

第十一章　奇迹室

1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Impunity in Iran: The Death of Photojournalist Zahra Kazemi,” Nov. 2006,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publications/reports/3148-impunity - in-iran-the-deathof-photojournalist-zahra-kazemi.html.

2 同前，Appendix 4, 1-3。

3 同前，Appendix 6, “Khoshvaght Letter,” 1-4。

4 同前，Appendix 4, 1。

5 同前，Appendix 7, “Abdol Karim Lahiji’s Statement on the Special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Report,” 1-2。

6 同前，Appendix 2, “Report of the Parliamentary Article 90 Commission,” 4。

7 同前，Appendix 2, 4-6。

8 同前，Appendix 2 and Appendix 8, “Mohsen Armin Letter: Mortazavi Must Stand Trial.”。

9 Mehdi Moslem,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3.

10 Muhammad Sahimi, “Patriotists and Reformists: Behzad Nabavi and Mostafa Tajzadeh,” Tehran Bureau, Frontline, PBS.org, Aug. 11, 2009,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ehranbureau/2009/08/patriots-andreformists-behzad-nabavi - and-mostafa - tajzadeh.html.

第十三章　盖棺论定

1 “Iranian President Heckled During Speech to Students,”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Dec. 8, 2004. 哈塔米附英文字幕的演说，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Zw-yGlyTk。

2 Saeed Hajjarian, Abbas Abdi, Mostafa Tajzadeh, Hamidreza Jalaeipour, and Alireza Alavitabar,Reformation vs. Reformation: A Critical Dialogue (Tehran: Tarh-e No, 2006). Selected translations by Massood Hooman, commissioned by the author.

3 译文见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

2004_2009/documents/dv/ganjiletter100705_/ganjiletter100705_en.pdf。

4 freeganji.blogspot.com, accessed July 17, 2005.

5 同前。

6 Dariush Sajjadi,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Abdolkarim Soroush, broadcast on Homa TV, March 9, 2006, file:///Users/macbook/Desktop/Book/Interview%20notes/Intellectuals/Soroush/Dr.%20Soroush.webarchive.

7 Ali Asghar Seyyedabadi, “The Muddled Dream of Returning to Tradition: An Interview with Abdulkarim Soroush,” Nov. 19, 2006, http://drsoroush.com/en/the--muddled--dream-of-returning-to-tradition/.

8 Sajjadi,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Abdolkarim Soroush.

9 选举统计资料见 http://www.princeton.edu/irandataportal/elections/pres/2005/。

第十四章　普通人

1 Biographical details on Ahmadinejad are from Kasra Naji, Ahmadinejad: The Secret History of Iran’s Radical Lea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 同前，也可见 Alireza Haghighi and Victoria Tahmasebi, “The ‘Velvet Revolution’ of Iranian Puritan Hardli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Autumn 2006, 961。

3 Naji, Ahmadinejad, 46.

4 同前，234。

5 同前，233。

6 同前，181。

7 Haghighi and Tahmasebi, “The ‘Velvet Revolution’ of Iranian Puritan Hardliners,” 970, n. 13.

8 Ali Rahnema, Superstition as Ideology in Iranian

Politics: From Majlesi to Ahmadineja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9.

9 Jahangir Amuzegar, “Iran’s Theocracy Under Siege,” Middle East Policy 1, no. 10 (March 21, 2003), 135.

10 John Ward Anderson, “Iran’s Conservatives Face a Growing Split; Extremist Clerics Blamed for Rise in Secularism,” Washington Post, June 2, 2001.

11 Afshin Molavi, The Soul of Iran: A Nation’s Struggle for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105.

12 John Ward Anderson, “Islamic Democracy’s Power Politics; As Iran’s Election Nears, Key Issue Is Accountability—to the Public, or to God?” Washington Post, May 25, 2001.

13 “Rafsanjani to Succeed Khamene’i?,” Iran brief, Info-Prod Research (Middle East), no. 64 (Oct. 4, 1999).

14 Naji, Ahmadinejad, 70.

15 For Mesbah-Yazdi and Ahmadinejad (excluding Mesbah-Yazdi’s quotations on politics), see Rahnema, Superstition as Ideology in Iranian Politics, 54-99.

16 关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中产阶级的扩张，见 Kevan Harris, “A Martyrs’ Welfare State and Its Contradictions: Regime Resilience and Limit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Policy in Iran,” in Middle East Authoritarianisms: Governance, Contestation, and Regime Resilience in Syria and Iran, eds. Steven Heydemann and Reinoud Leende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也可见 Kevan Harris, “The Brokered Exuberance of the Middle Class: An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Iran’s 2009 Green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7, no. 4, (2012), 435-55。

17 见 Arash Ghafouri, “Setad 88—Iran’s Greatest Campaign in Support of Mirhossein Mousavi,” in Election Fallout: Iran’s Exiled Journalists on Their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Change, ed. Marcus Michaelson, trans. Evan J. Siegel (Berlin: Verlag Hans Schiler, 2011), 50-61,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ez/08560.pdf。

18 同前。

19 Muhammad Sahimi,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Mousavi,” Tehran Bureau, Frontline, PBS.org, Feb. 16, 2010,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ehranbureau/2010/02/the-political-evolution-of-mousavi.html.

20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ranian-elections-the-answer-to-ahmadinejad-a-622225.html.

21 双方辩论的誊本见 http://www.irantracker.org/analysis/mousavi-ahmadinejad-june-3-presidential-debate-transcript；英文字幕的影片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NmR15Lui8。

第十五章 阿希耶赫

1 Datus C. Smith, Jr., “Franklin Book Program,” Encyclopædia Iranica, vol. 10, fasc. 2, 187-90 (Dec. 15, 2002; last updated Jan. 31, 2012). Accessed online at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franklin-book-program. 也可见 Louise S. Robbins, “Publishing American Values: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s as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Library Trends 55, no. 3 (Winter 2007), 638-50。

2 引自 Robert Tait, “Dead Woman Painting,” Guardian, Oct. 25, 2006,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oct/25/worlddispatch.arts。

3 Claire Soares, “Delara Darabi, ‘Oh Mother, I Can See the Noose,’ ” Independent, May 4, 2009,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delara-darabi-oh-mother-i-cansee-the-noose-1678543.html.

第十六章　污泥与尘垢的史诗

1 Ruhollah Khomeini, “Address at Bihisht-i Zahra,” in Ruhollah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I: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 trans. and ed. Hamid Algar (Berkeley, CA: Mizan Press, 1981), 255.

2 Scott Peterson, Let the Swords Encircle Me: Iran—A Journey Behind the Headlin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476.

3 http://www.al - 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06/leaked-video-accuses-2009-election-fraud.html#;影片（波斯语）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870388962988721&set=vb.153044948056463&type=2&theater.

4 Ali Ansari, ed.,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Voting Figures in Iran’s 2009 Election,” Chatham House and Institute of Iran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June 21, 2009, 11.

5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Violent Aftermath: The 2009 Election and Suppression of Dissent in Iran,” Feb. 2010, 10,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publications/reports/3161 - violent - aftermath - the - 2009 - election-and-suppression-of-dissent-in-iran.html.

6 Eric Hooglund, “Iran’s Rural Vote and Election Fraud,” Tehran Bureau, Frontline, PBS.org, June 17, 2009, posted June 21, 2010,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ehranbureau/2010/06/irans-rural-vote - and-election-fraud.html.

7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Violent

Aftermath," 10.

8 见 Thomas Lotze, http://thomaslotze.com/iran/。

9 Reuters, "Angry Mousavi Says Iran Vote Result a Fix," June 13, 2009, http://mobile.reuters.com/article/idUSTRE55C1K020090613.

10 CNN, "Ahmadinejad Says Remarks Taken out of Context," June 18, 2009, http://www.cnn.com/2009/WORLD/meast/06/18/iran.ahmadinejad.comments/index.html?iref=24hours.

11 Robert Tait, "The Dust Revolution—How Mahmoud Ahmadinejad's Jibe Backfired," Guardian, June 18, 2009,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jun/18/iran-election-protests-mahmoud-ahmadinejad.

12 同前。

13 Juan Cole, "Supreme Leader Khameini's Friday Address 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formed Comment, June 19, 2009, http://www.juancole.com/2009/06/supreme - leader - khameneis-friday-address.html.

14 穆萨维的演讲译文见 http://iranfacts.blogspot.com/2009/06/my-translation-of-mousavis-latest.html。

15 Borzou Daragahi, “From the Archives: Family, Friends Mourn ‘Neda,’ Iranian Woman Who Died on Video,”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3, 2009, www.latimes.com/world/la-fg-iran-neda23-2009jun23-story.html#page=1.

16 “Key Witness Disputes Hejazi Account of Neda Death,” Press TV, July 29, 2009, http://edition.presstv.ir/detail/101954.html.

17 Mir Hossein Mousavi, “Public Response to the Election Fraud and Protests,” June 21, 2009, http://www.princeton.edu/irandataportal/elections/pres/2009/candidates/mousavi/21-june-2009/.

18 同前。

19 http://loln.wordpress.com/2009/07/28/ - first-hand-testimonials-of-a-21-year-old-iranian-protester-who-was-arrested-on-18-tir-protestsintehran-andtaken-to-kahrizak-camp/.

20 Borzou Daragahi and Ramin Mostagim, “Imprisoned Iranian Protesters Share a Bond Forged in Hell,” Los Angeles Times, Feb. 14, 2010,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0/feb/14/world/la-fg-iran-prison14-2010feb14.

21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Violent Aftermath,” section 3.1, Kahrizak Detention Center.

22 Borzou Daragahi, “Iran Roiled by Prison Abuse Claims,” Los Angeles Times, Aug. 12, 2009,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9/aug/12/world/fg-iran-abuse12.

23 同前。

24 引用卡鲁比信件的故事见 http://www.rferl.org/content/Two_Months_Later_Truth_About_Irans_Postelection_Crackdown_Still_Unknown/1796492.html ；http://www.nytimes.com/2009/08/13/world/middleeast/13iran.html?_r=0。这封信的完整译文见 http://khordaad88.com/?p=75，引用部分相同，只有用字上有些许不同。

25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Rights Groups Call for Independent Autopsy of Iranian Doctor Who Treated Tortured Prisoners,” November 25, 2009, http://physiciansforhumanrights.org/blog/iranian-doctor-autopsy.html.

26 Ramin Mostaghim and Borzou Daragahi, “Was Kahrizak Prison Doctor a Victim or Villain?,” Los Angeles Times, Feb. 14, 2010,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0/feb/14/world/la-

fgw-iran-prison-doctor142010feb14.

27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Violent Aftermath,” citing Complete Text of the Special Report of the Majlis, January 10, 2009.

28 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 “Violent Aftermath,” 54.

29 Warren P. Strobel and Jonathan S. Landay, “Iran’s Senior Ayatollah Slams Election, Confirming Split,” McClatchyDC, June 16, 2009, http://www.mcclatchydc.com/news/nation-world/world/article24542242.html.

30 Ahmad Sadri and Mahmoud Sadri, “Delegitimiz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th a Fatwa: The Significance of Ayatollah Montazeri’s Post-Election Legal Ruling of July 2009,” in Nader Hashemi and Danny Postel, eds., The People Reloaded: The Green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Iran’s Future (Brooklyn, NY: Melville House, 2011), 165.

31 Richard Spencer, “Grand Ayatollah Montazeri Death Sparks Protests,” Telegraph, Dec. 20,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ran/6851224/Grand-Ayatollah-Montazeri-death-sparks-protests.html.

第十七章　知识分子肮脏战争的结束

1 Payam Fazlinejad, “Mohammad Khatami’s Mission for a Velvet Coup d’État.” 英文译文见 docstoc.com。

2 Christiane Hoffmann, “The Unrest Is Growing: Habermas in Iran; Interview with Jürgen Habermas on His Visit to Ira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June 18, 2002, 英文译文见 www.pubtheo.com/page.asp?pid=1073。

3 引文出自 Charles Kurzman, “Reading Weber in Tehra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 1, 2009, http://chronicle.com/article/SocialScienceonTrialin/48949/.

4 由 Evan Siegel 英译的全文见 www.qlineorientalist.com/IranRises/the-indictment/#Indictmentt6。

5 起诉书英译见 http://www.iranhrdc.org/english/human--

rights--documents/indictments/3342-second-indictment.html。

6 Mir Hossein Mousavi, “Violence Is Not the Solution,” Sept. 28, 2009, http://www.princeton.edu/irandataportal/elections/pres/2009/candidates/mousavi/28-september-2009/.

7 “Mousavi’s Meeting with Reformist Parliament Opposition Delegates,” http://www.parlemannews.ir/?n=9919; “Reformist Delegates of the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 Meet Mousavi,” http://khordaad88.com/?p=1519.

8 出自穆萨维脸书,“Mir Hossein Mousavi in His First Video Interview After the Election: Explaining the National Unity Plan,” Oct. 19, 2009,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60862192605&ref=mf。

9 Mir Hossein Mousavi, “Interview with Kaleme: The Green Movement Is Standing Firm on Its Rightful Demands,” Feb. 27, 2010, http://www.princeton.edu/irandataportal/elections/pres/2009/candidates/mousavi/27-february-2010/.

10 Mir Hossein Mousav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3th

of Aban, ” Oct. 31, 2009, http://www.princeton.edu/irandataportal/elections/pres/2009/candidates/mousavi/31-october-2009/.

11 Yeganeh Torbati, “Insight: Ahead of Vote, ‘Kidnapped’ Iran Reformists Imprisoned at Home,” June 11,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6/11/us-iran-election-opposition-insightidUSBRE95A0OH20130611.

12 Laura Secor, “Iran’s Green Movement: An Interview with Mehdi Karroubi,” in Nader Hashemi and Danny Postel, eds., The People Reloaded: The Green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Iran’s Future (Brooklyn, NY: Melville House, 2011), 408-14.

13 关于茨威格的传记，见 Leo Spitzer, Lives in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Marginality in Austria, Brazil, West Africa, 1780-1945(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也可见 Care, “The Escape Artist: The Life and Death of Stefan Zweig,” The New Yorker, Aug. 27, 2012.

14 Stefan Zweig, The Right to Heresy: Castellio Against Calvin, trans. Eden and Cedar Paul (London: Cassell, 1936), 216.

15 同前，188。

16 同前，228。

17 Michael Slackman, “Purge of Iranian Universities Is Feared,” New York Times, Sept. 1,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9/02/world/middleeast/02iran.html.

18 这里引用的所有索鲁什的文字全出自：Abdolkarim Soroush, “A Word of Advice to the Advocates of Islamic Human Sciences,” Oct. 9, 2010, http://drsoroush.com/en/a-word-of-advice-to-the-advocates-of-islamic-human-sciences/.

19 Nazila Fathi, “To Reza in Jail: Love and Unity,”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May 15,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5/16/weekinreview/16fathi.html.

20 塔吉札德赫信件的引文出自 Muhammad Sahimi, “Tajzadeh: Reformists Should Ask Nation for Forgiveness,” Tehran Bureau, Frontline, PBS.org, June 15, 2010,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ehranbureau/2010/06/tajzadeh-reformists-should-ask-the-nation-for-forgiveness.html。

后记

1 Arash Karami, “Former Tehran Mayor Reveals Why Reformist Decided to Support Rouhani,” Al-Monitor, April 8, 201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04/former-tehran-mayor-explains-reformists-support-rouhani.html#ixzz3k2ryhelx.

2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hmed Shaheed,” March 12, 2015, http://shaheedonira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HRC-2015.pdf, 6.

3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2014 Prison Census: 221 Journalists Jailed Worldwide,” Dec. 1, 2014, https://www.cpj.org/imprisoned/2014.php.

4 一般来说，我对伊朗的民意调查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伊朗人在

跟亲人讲电话时很谨慎，更不用说是跟陌生人交谈了，因为伊朗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自己的政治言论会招来报复。所以，当民调机构打电话询问你对二〇〇九年事件的看法时，如果你的意见与官方不同，也许你会拒绝受访，也许你会说假话，也许你会大胆地说真话。我们不知道民众为什么采取某种回答方式，但我们知道民众衡量的不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因此，我在转达这些数字时，其实对这些数字存有很大的怀疑：二〇一五年的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访者说他们现在相信二〇〇九年的总统大选没有造假，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说抗议民众没有权利抗议，另外也有百分四十的受访者支持警方进行反制。尽管如此，在被问到抗议者是谁时，百分之四十一的受访者说抗议群众是一般平民，百分之二十一的受访者说他们是学生或年轻人。尽管国家宣传机器不断报导，却只有百分之九的受访者说抗议者是有钱人。人数最少的一群人，只有百分之六，相信政府的说法，认为示威抗争是外国人搞出来的阴谋。见 iPOS (Inform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Solutions) Poll, “Iranians’ Views on the Green Movement Legacy,” June 22, 2015, https://www.ipos.me/en/; IranWire, “View from Iran, The Green Movement,” June 23, 2015, http://en.iranwire.com/features/6576/.

参考书目

本书参考了大量具挑战性且吸引人的与伊朗相关的学术作品。我在这里列出对我理解伊朗与伊朗政治极有帮助的书籍与期刊论文。许多作者也慷慨回答我在电话里提出的与他们研究领域相关的问题。大量的当时报纸文章与网站则未列在这里，而是放在注释里，此外还包括了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纽哈芬（New Haven）的伊朗人权文献中心（Iran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普林斯顿大学伊朗资料开放平台（Iran Data Portal）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朗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编纂的珍贵资料。

Abdo, Geneive, and Jonathan Lyons. Answering Only to God: Faith and Freedom in Twenty-first-Century Iran. New York: Henry Holt, 2003.

Abrahamian, Ervand. The Iranian Mojahed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homeinism: 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Tortured Confessions: Prisons and Public Recantations in Modern Ir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delkah, Fariba. Being Modern in Ir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Afshari, Reza. Human Rights in Iran: The Abus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Al-e Ahmad, Jalal. Occidentosis: A Plague from the West. Translated by R. Campbell and edited by Hamid Algar. Berkeley, CA: Mizan Press, 1984.

——. “Samad and the Folk Legend.” In Iranian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ed. Michael Hillmann. Lexington, KY: Mazda, 1982.

Ansari, Hamid. The Narrative of Awakening: A Look at Imam Khomeini’s Ideal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from

Birth to Ascens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eyed Manoochehr Moosavi. Qom, Iran: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of Imam Khomeini,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1994.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Arjomand, Saeed Amir. After Khomeini: Iran Under His Success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sadi, Houshang. Letters to My Torturer: Love, Revolution, and Imprisonment in Iran. Oxford: Oneworld, 2010.

Axworthy, Michael. Revolutionary Iran: A Histor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Bahari, Maziar, with Aimee Malloy. Then They Came for Me: A Family's Story of Love, Captivity, and Survi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Baktiari, Bahman. 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Ira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actional Politic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

Bashiriyeh, Hosse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962–198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Bayat, Asef. Making Islam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st-Islamist Tur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treet Politics: Poor People's Movements in Ir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Behrangi, Samad. "The Little Black Fish," in The Little Black Fish and Other Modern Persian Stories. Translated by Eric Hooglund and Mary Hooglund. Washington, DC: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76.

Blight, James G., Janet M. Lang, Hussain Banai, Malcolm Byrne, and John Tirman. Becoming Enemies: U.S.-Iran Relations and the Iran-Iraq War, 1979–1988.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Boroujerdi, Mehrzad. Iran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The Tormented Triumph of Nativism.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65.

Brumberg, Daniel. Reinventing Khomeini: The Struggle for Reform in Ir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Buchan, James. Days of God: The Revolution in Iran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Chehabi, H. E. Irania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of Iran Under the Shah and Khomeini. London: I. B. Tauris, 1990.

Dabashi, Hamid. Theology of Discontent: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8.

——, and Peter Chelkowski. Staging a Revolution: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Ebadi, Shirin, with Azadeh Moaveni. Iran Awakening: A

Memoir of Revolution and Ho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Ehsani, Kaveh.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 The Rule of Law, Islam,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Egypt and Iran, ed. Said Amir Arjomand and Nathan J. Brown, 153–79.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Ganji, Akbar. The Road to Democracy in Ir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 “Who Is Ali Khamenei? The Worldview of Iran’s Supreme Leader.” Foreign Affairs 92, no. 5 (Sept./ Oct. 2013), 24–48.

Ghamari-Tabrizi, Behrooz. 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Abdolkarim Soroush, Religious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Reform. London: I. B. Tauris, 2008.

Gheissari, Ali. Iran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

———, and Vali Nasr. Democracy in Iran: History and the Quest for Lib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kakian, Roya. Assassins of the Turquoise Palace. New York: Grove Press, 2011.

Hanson, Brad. “The ‘Westoxication’ of Iran: Depictions and Reactions of Behrangi, Al-e Ahmad, and Shariat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5, no. 1 (Feb. 1983), 1–23.

Hardwick, Jeffrey M. Mall Maker: Victor Gruen, Architect of an American Drea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Harris, Kevan, “The Brokered Exuberance of the Middle Class: An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Iran’s 2009 Green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7, no. 4 (2012), 435–55.

——. “A Martyrs’ Welfare State and Its Contradictions: Regime Resilience and Limit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Policy in Iran.” In Middle East Authoritarianisms: Governance, Contestation, and Regime Resilience in Syria and

Iran, ed. Steven Heydemann and Reinoud Leenders, 61–8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Hashemi, Nader, and Danny Postel, eds. The People Reloaded: The Green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Iran's Future. Brooklyn, NY: Melville House, 2011.

Hedayat, Sadegh. The Blind Owl. Translated by D. P. Costello.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4.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ahanbakhsh, Forough. Islam, Democracy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in Iran, 1953–2000.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1.

Kadivar, Mohammad Ali. "Alliances and Perception Profiles in the Iranian Reform Movement, 1997 to 200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published online Oct. 2013. http://asr.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3/10/30/0003122413508285.

Kar, Mehrangiz. Crossing the Red Line: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Costa Mesa, CA: Blind Owl Press/Mazda, 2007.

Keddie, Nikki R. Modern Iran: Roots and Results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Keshavarzian, Arang. Bazaar and State in Iran: The Politics of the Tehran Marketpl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hatami, Mohammad. Hope and Challenge: The Iranian President Speaks. Translated by Alidad Mafinezam. Binghamton, NY: Institute of Global Cultural Studies, Binghamton University, 1997.

——. Islam, Liberty and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Hossein Kamaly. Binghamton, NY: Global Academic Publishing, 1998.

Khomeini, Ruhollah. Islam and Revolution I: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mid Algar. Berkeley, CA: Mizan Press, 1981.

Kunkler, Mirjam. “The Special Court of the Clergy and

the Repression of Dissident Clergy in Iran." In The Rule of Law, Islam,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Egypt and Iran, ed. Said Amir Arjomand and Nathan J. Brown, 57–10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Madanipour, Ali. Tehran: 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8.

Martin, Richard C., and Mark R. Woodward, with Dwi S. Atmaja. Defenders of Reason in Islam: Mu'tazilism from Medieval School to Modern Symbol. Oxford: Oneworld, 1997.

Menashri, David. Iran: A Decade of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0.

——.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Ira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wer.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Michaelson, Marcus, ed. Election Fallout: Iran's Exiled Journalists on Their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Change. Translated by Evan J. Siegel. Berlin: Hans Schiler, 2011.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ez/08560.pdf.

Milani, Abbas. Eminent Persians: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de Modern Iran, 1941–1979. 2 vol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and Persian Book World, 2008.

——. The Sha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Mirgholami, Morteza, and Sidh Sintusingha. “From Traditional Mahallehs to Modern Neighborhoods: The Case of Narmak, Tehra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32, no. 1 (2012), 214–37.

Mir-Hosseini, Ziba. Islam and Gender: The Religious Debate in Contemporary Ir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and Richard Tapper. Islam and Democracy in Iran: Eshkevari and the Quest for Reform.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Mirsepassi, Ali. Democracy in Modern Iran: Islam,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Negotiating Modernity in Ira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olavi, Afshin. The Soul of Iran: A Nation's Struggle for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Moqadam, Afsaneh. Death to the Dictator! A Young Man Casts a Vote in Iran's 2009 Election and Pays a Devastating Price. New York: Sarah Crichton Books/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Moslem, Mehdi.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ottahedeh, Roy.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Oxford: Oneworld, 2000.

Mozaffari, Nahid, and Ahmad Karimi Hakkak, eds. Strange Times, My Dear: The PE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Iranian Literature. New York: Arcade, 2005.

Nabavi, Negin, ed.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A Critical Surve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3.

Naji, Kasra. Ahmadinejad: The Secret History of Iran's Radical Lea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Nohmani, Farhad, and Sohrab Behdad. Class and Labor in Iran: Did the Revolution Matter?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ya, Ali. “Karl Popper and the Iranian Intellectuals.”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s 20, no. 2 (Spring 2003), 50–79.

Peterson, Scott. Let the Swords Encircle Me: Iran—A Journey Behind the Headlin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Plato. The Republic. In 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Including the Letters, ed.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trans. Paul Shore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opescu, Lucy, and Carole Seymour-Jones, eds. Writers Under Siege: Voices of Freedom from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opper, Karl.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2:

Hegel and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Chicago and LaSalle, IL: Open Court, 1990.

Rahnema, Ali. An Islamic Utopian: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li Shari’ati.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0.

——. Superstition as Ideology in Iranian Politics: From Majlesi to Ahmadineja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Rajaee, Farhang. Islamism and Modernism: The Changing Discourse in Ir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Rejali, Darius. Torture and Modernity: Self, Society, and State in Modern Ir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Saberi, Roxana. Between Two Worlds: My Life and Captivity in Ir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Sadjadpour, Karim. Reading Khamenei: The World View of Iran’s Most Powerful Lead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8.

Salehi-Isfahani, Djavad.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Iran.”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7, no. 1 (March 2009), 5–24.

———.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ural Poor.” Radical History Review, no. 105 (Fall 2009), 139–44.

Schirazi, Asgar. The Constitution of Ira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Translated by John O’Kane. London: I. B. Tauris, 1998.

Sciolino, Elaine. Persian Mirrors: The Elusive Face of Ira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5.

Soroush, Abdolkarim. Reas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Islam: Essential Writings of Abdolkarim Soroush. Translated by Mahmoud Sadri and Ahmad Sadr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abaar, Mohammad Ayatollahi. “From Womb to Tomb: Religion, the State and War in Iran.” Unpublished thesis shared by author.

Tajbakhsh, Kian.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Iran: Consolida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ocratic State?” Social Research 67, no. 2 (Summer 2000: Iran Since the Revolution), 377–404.

Vahdat, Farzin. God and Juggernaut: Iran’s Intellectual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Vanstiphout, Wouter. “The Saddest City in the World: Tehran and the Legacy of an American Dream of Modern Town Planning.” In The New Town, research and exhibition project by Crimso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Rotterdam, March 2, 2006. http://www.thenewtown.nl/article.php?id_article=71.

Wright, Robin. The Last Great Revolution: Turmoil and Transformation in Ir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Zweig, Stefan. The Right to Heresy: Castellio Against Calvin. Translated by Eden and Cedar Paul. London: Cassell,

1936.

索引

人名

三至五画

戴维．比森　David Beetham

小布什　George W. Bush

内达．阿加－索尔坦　Neda Agha-Soltan

尤尔根．哈伯玛斯　Jürgen Habermas

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

巴尔札克　Balzac

巴赫拉姆　Bahram

戈拉姆侯赛因．卡尔巴斯希　Gholamhossein Karbaschi

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　Gholam-Hossein Mohseni-Ejei

加布列．贾西亚．马奎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卡维赫．戈雷斯坦　Kaveh Golestan

古班纳利．多里－纳贾法巴迪　Ghorbanali Dorri-Najafabadi

斯蒂芬．茨威格　Stefan Zweig

尼可斯．普朗札斯　Nicos Poulantzas

尼采　Nietzsche

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

弗兰科．莫雷蒂　Franco Moretti

札赫拉．卡泽米　Zahra Kazemi

札赫拉．拉赫纳瓦尔德　Zahra Rahnavard

甘地　Gandhi

皮鲁兹．达瓦尼　Pirouz Davani

六画

伊尼亚齐欧．西洛内　Ignazio Silone

伊玛目侯赛因　Imam Hossein

伊玛目哈桑　Imam Hassan

休谟　Hume

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列宁　Lenin

吉巴　Ziba

吉恩. 夏普　Gene Sharp

安东尼奥.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安格拉. 梅克尔　Angela Merkel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米尔. 侯赛因. 穆萨维　Mir Hossein Mousavi

米兰. 昆德拉　Milan Kundera

艾妲. 萨达特　Aida Saadat

艾哈迈德. 米尔. 阿拉埃伊　Ahmad Mir Alaei

艾哈迈德. 法迪德　Ahmad Fardid

艾哈迈德. 梅夫塔希　Ahmad Meftahi

艾哈迈德. 塔法佐利　Ahmad Tafazzoli

艾娃　Ava

七画

佛洛伊德　Freud

克洛德．勒佛　Claude Lefort

克莱恩．布尔顿　Crane Brinton

克尔曼　Kerman

努拉丁．皮尔莫阿岑　Nouradin Pirmoazen

希林．伊巴迪　Shirin Ebadi

希特勒　Hitler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

沃特．范斯提堡特　Wouter Vanstiphout

铁托元帅　Marshal Tito

狄更斯　Dickens

贝赫札德．纳巴维　Behzad Nabavi

贝赫努德．休贾伊耶　Behnoud Shojaie

里亚卡特．拉札　Liaquat Raza

八画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尚－保罗．沙特　Jean-Paul Sartre

尚－雅克．鲁索　Jean-Jacques Rousseau

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　Payam Fazlinejad

帕尔瓦内　Parvaneh

帕尔温．法希米　Parvin Fahimi

拉卡托什．伊姆雷　Imre Lakatos

拉明．贾汉贝格鲁　Ramin Jahanbegloo

拉贾布．阿里．马兹鲁伊　Rajab Ali Mazrui

拉苏尔　Rasool

易卜拉欣．札尔札德赫　Ebrahim Zalzadeh

易卜拉欣．亚兹迪　Ebrahim Yazdi

易卜拉欣．阿斯加札德赫　Ebrahim Asgharzadeh

易卜拉欣．纳巴维　Ebrahim Nabavi

易卜拉欣．索尔塔尼　Ebrahim Soltani

法拉吉．萨库希　Faraj Sarkouhi

法赫里　Fakhri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法兰克．洛伊．莱特　Frank Lloyd Wright

法兰兹．法农　Frantz Fanon

芭芭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

阿卜杜拉．努里　Abdollah Nouri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Abdolkarim Soroush

阿卜杜勒阿齐兹．法尔曼法马扬　Abdolaziz Farmanfarmaian

阿夫苏恩　Afsoon

阿多诺　Adorno

阿克巴尔．甘吉　Akbar Ganji

阿克巴尔．穆罕默迪　Akbar Mohammadi

阿希耶赫．阿米尼　Asieh Amini

阿里　Ali

阿里．巴巴恰希　Ali Babachahi

阿里．米尔塞帕西　Ali Mirsepassi

阿里．沙里亚蒂　Ali Shariati

阿里．拉里贾尼　Ali Larijani

阿里．法拉希安　Ali Fallahian

阿里．阿夫夏里　Ali Afshari

阿里．阿克巴尔－努里　Ali Akbar Nategh-Nouri

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　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阿里．哈比比．穆萨维　Ali Habibi Mousavi

阿里．哈梅内伊　Ali Khamenei

阿里雷札．阿拉维塔巴尔　Alireza Alavitabar

阿里雷札．哈吉吉　Alireza Haghighi

阿里尔　Ariel

阿亚图拉艾哈迈德．贾纳提　Ayatollah Ahmad Jannati

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　Ayatollah Hossein Ali Montazeri

阿亚图拉哈什米．达斯特盖布　Ayatollah Hashemi Dastgheib

阿亚图拉马哈茂德．哈什米．沙赫鲁迪　Ayatollah Mahmoud Hashemi Shahroudi

阿亚图拉摩尔塔札．莫塔哈里　Ayatollah Morteza Motahhari

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赫希提　Ayatollah Mohammad Beheshti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赫－雅兹迪　Ayatollah Mohammad-Taghi Mesbah-Yazdi

阿拉梅赫．塔巴塔巴伊　Allameh Tabatabai

阿拔斯　Abbas H.

阿拔斯．阿卜迪　Abbas Abdi

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　Abbas Amirentezam

阿特法赫．萨哈阿雷赫　Atefah Sahaaleh

阿博尔哈桑．巴尼－萨德尔　Abolhassan Bani-Sadr

阿尔贝．卡缪　Albert Camus

阿萨多拉．拉杰瓦尔迪　Asadollah Lajevardi

九画

侯尚．戈尔希里　Houshang Golshiri

侯尚．阿萨迪　Houshang Asadi

侯赛因．巴什里耶赫　Hossein Bashiriyeh

侯赛因．巴拉赞德赫　Hossein Barazandeh

侯赛因．卡马里　Hossein Kamaly

侯赛因．沙里亚特马达里　Hossein Shariat-madari

侯赛因．德拉赫尚　Hossein Derakhshan

保罗．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哈什米　Hashemi

哈吉．阿里　Haj Ali

哈吉．阿姆贾德　Hajj Amjad

哈米德．哈吉札德赫　Hamid Hajizadeh

哈伯玛斯　Habermas

哈迪．加埃米　Hadi Ghaemi

哈迪．哈尼基　Hadi Khaniki

哈桑　Hassan

哈桑．罗哈尼　Hassan Rouhani

哈梅德　Hamed

哈菲兹　Hafez

哈贾尔．罗斯塔米　Hajar Rostami

哈维尔　Havel

乌伊拉德．范奥曼．奎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威尔．杜兰特　Will Durant

柏拉图　Plato

珍．雅各布　Jane Jacobs

珍妮弗．罗培兹　Jennifer Lopez

约翰．史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约翰．帕斯穆尔　John Passmore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约翰．韦恩　John Wayne

约翰．基恩　John Keane

约翰．卡尔文　John Calvin

英格玛．博格曼　Ingmar Bergman

韦伯　Weber

十画

唐诺．吉里斯　Donald Gillies

埃札特．易卜拉欣．内贾德　Ezzat Ibrahim Nejad

埃米尔．侯赛因．索图德赫　Amir Hossein Sotoudeh

埃米尔．贾瓦迪法尔　Amir Javadifar

埃尔凡德．亚伯拉罕米安　Ervand Abrahamian

埃玛德丁．巴吉　Emadeddin Baghi

夏迪．萨德尔　Shadi Sadr

夏勒库　Shalekoo

夏赫拉．谢尔卡特　Shahla Sherkat

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　Shahram Rafizadeh

夏赫拉姆．阿札姆医生　Dr. Shahram Azam

库姆　Qom

格鲁乔．马克思　Groucho Marx

海因茨．波斯特　Heinz Post

涂尔干　Durkheim

特拉维夫　Tel Aviv

纳吉　Naghi

纳瑟．哈迪安　Nasser Hadian

纳贾夫　Najaf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索尔玛兹．夏里夫　Solmaz Sharif

索赫拉布．阿拉比　Sohrab Arabi

茱蒂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马丁.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马布贝赫　Mahboubeh M.

马克西米连. 罗伯斯比　Maximilien Robespierre

马克思　Marx

马努切尔　Manouchehr Mohammadi

马哈茂德. 艾哈迈迪内贾德　Mahmoud Ahmadinejad

马哈茂德. 杜拉塔巴迪　Mahmoud Dowlatabadi

马兹亚. 巴哈里　Maziar Bahari

马基维利　Machiavelli

马肃德. 戈瑞伊希　Massoud Ghoreishi

马肃德. 拉贾维　Massoud Rajavi

马赫迪　Mahdi

十一至十二画

基米亚　Kimia

基沙瓦兹　Keshavarz

康德　Kant

梅赫里　Mehri

梅赫迪．巴札尔甘　Mehdi Bazargan

梅赫迪．卡鲁比　Mehdi Karroubi

梅赫达德．阿里哈尼　Mehrdad Alikhani

理察．罗蒂　Richard Rorty

笛卡儿　Descartes

莉莉．戈雷斯坦　Lili Golestan

莫卡拉梅赫．易卜拉希米　Mokarrameh Ebrahimi

莫拉纳　Mowlana

通内卡邦　Tonekabon

麦可．布兰特　Michael Brant

傅柯　Foucault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乔治．舒兹　George Shultz

托马斯．孔恩　Thomas Kuhn

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菲尔多西　Ferdowsi

黑格尔　Hegel

十三至十四画

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塞巴斯汀．卡斯特留　Sebastian Castellio

奥里亚娜．法拉奇　Oriana Fallaci

爱因斯坦　Einstein

爱德华．扎伊尔德　Edward Said

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　Javad Gholam-Tamimi

贾瓦德．莫贾比　Javad Mojabi

贾瓦德．蒙塔泽里　Javad Montazeri

贾克．德希达　Jacques Derrida

贾拉勒．丁．法尔西　Jalal ad-Din Farsi

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　Jalal Al-e Ahmad

贾法尔．基亚尼　Jafar Kiani

贾马尔．卡里米－拉德　Jamal Karimi-Rad

达里乌什．佛鲁哈尔　Dariush Forouhar

达尔文　Darwin

雷札．札瓦雷　Reza Zavarei

雷札．达瓦里．阿尔达喀尔尼　Reza Davari Ardakani

汉纳．鄂兰　Hannah Arendt

玛基德．谢里夫　Majid Sharif

碧塔　Bita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维克多．格鲁恩　Victor Gruen

维根斯坦　Wittgenstein

赫达亚特　Hedayat

十五至十六画

德希达　Derrida

德拉拉．达拉比　Delara Darabi

欧仁. 尤内斯库　Eugene Ionesco

欧米德. 梅玛瑞安　Omid Memarian

欧玛尔. 海亚姆　Omar Khayyám

鲁米　Rumi

鲁兹贝赫. 米雷布拉希米　Roozbeh Mirebrahimi

鲁霍拉. 侯赛因尼安　Ruhollah Hosseinian

穆罕默德. 巴格尔. 卡里巴夫　Mohammad Bagher Ghalibaf

穆罕默德. 比杰赫　Mohammad Bijeh

穆罕默德. 卡姆拉尼　Mohammad Kamrani

穆罕默德. 帕尔尼安　Mohammad Parnian

穆罕默德. 阿里. 阿卜塔希　Mohammad Ali Abtahi

穆罕默德. 阿里. 贾法里　Mohammad Ali Jafari

穆罕默德. 阿拉巴赫希　Mohammad Allahbakhshi

穆罕默德. 侯赛因. 霍什瓦格特　Mohammad Hossein Khoshvaght

穆罕默德. 哈塔米　Mohammad Khatami

穆罕默德．莫赫塔里　Mohammad Mokhtari

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赫　Mohammad Jafar Pouyandeh

穆罕默德．雷札．巴列维　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

穆罕默德．雷札．哈基米　Mohammad Reza Hakimi

穆罕默德．雷札．哈塔米　Mohammad Reza Khatami

穆罕默德．雷札．夏贾瑞安　Mohammad Reza Shajarian

穆罕默德．雷沙赫里　Mohammad Reyshahri

穆罕默德．穆沙迪克　Mohammad Mossadegh

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吉拉尼　Mohammad Mohammadi Gilani

穆罕默德．穆智台希德．沙贝斯塔里　Mohammad Mojtahed Shabestari

穆罕默德．穆萨维．霍伊尼哈　Mohammad Mousavi Khoeiniha

穆拉．萨德拉　Mulla Sadra

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　Mostafa Rokhsefat

穆斯塔法．莫因　Mostafa Moin

穆斯塔法. 普尔－穆罕默迪　Mostafa Pour-mohammadi

穆斯塔法. 塔吉札德赫　Mostafa Tajzadeh

穆赫辛. 卡迪瓦　Mohsen Kadivar

穆赫辛. 米尔达马迪　Mohsen Mirdamadi

穆赫辛. 梅赫拉里札德　Mohsen Mehralizadeh

穆赫辛. 雷札伊　Mohsen Rezaie

穆赫辛. 鲁霍拉米尼　Mohsen Ruholamini

穆赫辛. 萨泽伽拉　Mohsen Sazegara

霍贾托尔－埃斯兰　hojjat ol-eslam

鲍勃. 伍德华　Bob Woodwards

十七画以上

蕾拉　Leyla

谢尔．马格纳．邦德维克　Kjell Magne Bondevik

赛义德．库特布　Sayyid Qutb

扎伊尔德．阿斯加尔　Saeed Asgar

扎伊尔德．哈贾瑞安　Saeed Hajjarian

扎伊尔德．埃米尔西兹　Saeed Amirkhizi

扎伊尔德．埃玛米　Saeed Emami

扎伊尔德．莫塔札维　Saeed Mortazavi

扎伊尔德．莱拉兹　Saeed Laylaz

扎伊尔德．贾里里　Saeed Jalili

萨迪　Saadi

萨迪格．戈特布札德赫　Sadegh Ghotbzadeh

萨迪格．哈勒哈里　Sadegh Khalkhali

萨迪格．赫达亚特　Sadegh Hedayat

萨迪格．齐巴卡拉姆　Sadegh Zibakalam

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

萨尔曼．鲁西迪　Salman Rushdie

萨玛德．贝赫朗吉　Samad Behrangi

罗伯．摩斯　Robert Moses

罗尔斯　Rawls

丽塔　Rita

苏格拉底　Socrates

苏莱曼．哈特　Suleiman Khater

萝宾．莱特　Robin Wright

文献

一至六画

《一个分裂与毁灭神学的计划》 A Plan to Divide and Desolate the Theology

《三月报》 Khordad

《女性》 Zanan

《小黑鱼》 The Little Black Fish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 What Is Science? What Is Philosophy?

《今日晨报》 Sobh-e Emrouz

《今日报》 Emrooz

《天平报》 Mizan

《世界报文化副刊》 Kayhan-e Farhangi

〈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可能性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Potentiality

《末日的征兆》 Premonitions from the End of Times

《民主与市民社会》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伊朗的国家与革命》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伊朗革命两步骤》 Iran’s Revolution in Two Steps

《伊斯兰政府》 Islamic Government

〈共和国宣言〉 “Republican Manifesto”

《共和国报》 Jomhuriat

《地平线》 Kiyan

《存有与时间》 Being and Time

《宇宙永不止息》 The Restless Nature of the Universe

《宇宙报》 Kayhan

《百年哲学》 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

《西方毒害》 Westoxication

七至十画

《何谓启蒙？》 What Is Enlightenment?

《你好》 Salam

《每个人的民主课程》 Lessons on Democracy for Everyone

《来自另一半》 From the Other Half

〈奇迹室〉 “The Miracle Room”

《宗教知识的限缩与拓展》 The Contraction and Expan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征服报》 Fath

《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盲眼的猫头鹰》 The Blind Owl

《青年伊朗》 Iran-e Javan

《信任报》 Etemad

《哈萨纳克，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Hasanak?

《政治社会学》 Political Sociology

《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革命的剖析》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哲学的故事》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悔罪的与不悔罪的部落客〉 “Repentant and Unrepentant Bloogers”

《悔罪者讯息》 Repenters’ Message

《框架的神话》 The Myth of the Framework

《纽约客》 New Yorker

《纽约时报杂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鬼魂的地牢》 The Dungeon of Ghosts

十一至十三画

《国家信任报》 Etemad Melli

《基度山恩仇记》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妇女报》 Zan

《理想国》 Republic

《异端的权利》 The Right to Heresy

《通用语》 Lingua Franca

《揭露秘密》 Revelation of Secrets

〈敢于求知〉 “Dare to Know”

《朝改革开枪》 Shooting at Reform

〈给自由世界的信〉 “Letters to the Free World”

《周末》 Adineh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新天堂乐园》 Cinema Paradiso

《新茉莉花报》　Yas-e No

《绑架新闻》　News of a Kidnapping

《万夫莫敌》　Spartacus

〈诗人的份额：孤独、爱与死亡〉　“The Share of Poets: Solitude, Love and Death”

《资本论》　Capital

《雷恩的女儿》　Ryan’s Daughter

十四画以上

《对话》　Goftogu

蜘蛛的房屋〉　“The Spider’s House”

豪勇七蛟龙》　The Magnificent Seven

《宾汉》　Ben-Hur

〈嘲弄死神〉 “Play with Death”

《论革命》 On Revolution

《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

《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穆罕默德.哈塔米的天鹅绒政变任务〉 “Mohammad Khatami’s Mission for a Velvet Coup d’ État”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面包与葡萄酒》 Bread and Wine

《辩证法的冲突》 Dialectic Conflict

《权力游戏：鲁霍拉. 侯赛因尼安》 Power Play: Ruhollah Hosseinian

单位、组织、派系

二至六画

人道主义发展合作研究所　Hivos

人权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of Human Rights Reporters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巴斯基　Basij

文化大革命委员会　Cultural Revolution Institute

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

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市民社会的另类思想家　Alternative Thinkers of Civil Society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s

未来（民调机构）　Ayandeh

民主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　Mojahedin-e Khalq

伊朗人民党　Tudeh Party

伊朗民族解放军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of I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　IRIB

伊朗自由运动　Freedom Movement of Iran

伊朗作家协会　Iranian Writers Association

伊朗劳动通讯社　ILNA

伊朗学生通讯社　ISNA

伊斯兰伊朗建设者同盟　Etelaf-e Abadgaran-e Iran-

e Eslami

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　Mosharekat-e Iran-e Islami

伊斯兰共和党　Islamic Republican Party

伊斯兰思想与艺术中心　Howzeh-ye Andisheh va Honar-e Islami

伊斯兰学生协会　Islamic Students Associations

伊斯兰联合党　Motalefeh

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八十八　Setad 88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全国协调委员会　national coordinating board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自我责难派　self-blamers

七至十画

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研究中心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利益权衡委员会　Expediency Council

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儿童与青少年智性发展机构　Institute fo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和平母亲　Mothers for Peace

法尔斯通讯社　Fars News

法尔达电台　Radio Farda

波兰团结工联　Polish Solidarity

阿什阿里学派　Asharites

阿拉维高中　Alavi High School

建设公仆党　Kargozaran, Executives of Construction Party

指导部　Ershad

洛克斐勒研究所　Rockefeller Institute

科学院　Academy of Science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图书出版者委员会　American Book Publishers Council

美国图书馆协会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革命会议　Revolutionary Council

革命卫队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宰德派　Zaydis

库德民主党　Kurdish Democratic Party

悔罪者团体　Repenters’ Society

特别教士法院　Special Court of Clergy

真主党　Hezbollah

真主党支持者　Ansar-e Hezbollah

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　Students Following the Imam’s Line

十一画以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　Sazman-e Ettela’at va Amniyat-e Keshvar, SAVAK

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货币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新计划出版社　Tarh-e No

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复兴党　Baathist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Suprem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开放社会研究所　Open Society Institute

雅各布宾　Jacobin

塔列朗　Talleyrand

塔利班　Taliban

路透社　Reuters

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管理与计划组织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rganization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外交关系协会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摩萨德　Mossad

巩固统一办公室　Daftar-e Tahkim-e Vahdat

巩固办公室　Daftar Takhim

宪法监护委员会　Guardian Council

宪法观察委员会　Constitutional Watch Committee

战略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 Brotherhood

穆塔兹拉学派　Mutazilites

霍甲提耶赫　Hojjatieh

联合国安理会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难民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联合基本教义派阵线　United Fundamentalist Front

地点、地名、国家

三至五画

土库曼　Turkmen

土曼　toman

内卡　Neka

切尔西学院　Chelsea College

天堂花园　Eram Garden

巴士底监狱　Bastille

巴姆　Bam

巴博勒　Babol

巴斯德街　Pasteur Street

巴赫曼文化中心　Bahman Cultural Center

戈姆洛克　Gomrok

戈哈达什特监狱　Gohardasht Prison

日内瓦　Geneva

比尔詹德　Birjand

加兹温　Qazvin

卡拉季　Karaj

卡斯尔　Qasr

卡普里电影院　Capri Cinema

卡尔巴拉　Karbala

卡维尔沙漠　Kavir Desert

卡赫里札克　Kahrizak

古尔甘　Gurgan

四月七日广场

布什赫尔　Bushehr

弗雷斯诺　Fresno

札黑丹　Zahedan

瓦利亚斯尔大街　Valiasr

瓦讷克广场　Vanak Square

六至八画

伊代纳　Edina

伊拉克库德斯坦　Iraqi Kurdistan

伊朗库德斯坦　Iranian Kurdistan

伊斯法罕　Isfahan

伊斯兰自由大学　Islamic Azad University

伊斯兰夏赫尔　Islamshahr

吉兰　Gilan

多伦多　Toronto

托希德监狱　Towhid Prison

自由足球场　Azadi soccer stadium

自由广场　Azadi Square

艾比尔　Erbil

西奈　Sinai

克拉尔达什特　Kelardasht

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希亚赫卡尔　Siahkal

杜拜　Dubai

沃札拉　Vozara

沃斯堡　Fort Worth

沙希德．贝赫希提大学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沙赫勒雷伊　Shahr-e Rey

贝赫什特．札赫拉公墓　Behesht-e Zahra

贝赫什特．雷札公墓　Behesht-e Reza

津巴布韦　Zimbabwe

亚美尼亚　Armenia

亚兹德省　Yazd

呼罗珊广场　Maydan-e Khorasan

奇特加尔公园　Chitgar Park

拉什特　Rasht

拉合尔　Lahore

拉斯韦加斯　Las Vegas

拉维赞　Lavizan

明尼苏达州　Minnesota

法特米广场　Fatemi Square

波士顿　Boston

阿巴丹　Abadan

阿拉丹　Aradan

阿拉伯河　Shatt al-Arab

阿拉克　Arak

阿拉斯河　Aras River

阿勒布尔兹山脉　Alborz Mountains

阿穆尔　Amol

阿尔达比勒省　Ardabil

阿尔达坎　Ardakan

青年广场　Javanan Square

九至十一画

侯赛因宗教会所　Hosseiniyeh Ershad

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南谷　Southdale

南呼罗珊　South Khorasan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哈拉布加　Halabja

哈马丹　Hamadan

恰巴哈尔　Chabahar

查姆兰高速公路　Chamran Expressway

洛杉矶　Los Angeles

洛雷斯坦省　Lorestan

科学与工业大学　Elm va Sanat

约旦大道　Jordan Boulevard

胡泽斯坦　Khuzestan

革命广场　Enghelab Square

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London

埃米尔卡比尔大学　Amirkabir University

埃斯坎达里　Eskandari

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埃温监狱　Evin Prison

夏夫特　Shaft

夏赫里亚尔　Shahriar

夏赫萨瓦尔　Shahsavar

乌兹别克　Uzbekistan

特隆赫姆　Trondheim

纳兹阿巴德　Naziabad

纳贾夫阿巴德　Najafabad

纳尔马克　Narmak

马什哈德　Mashhad

马尔珍街　Marjan Street

马赞德兰省　Mazandaran

国家公园　Mellat Park

梅赫拉阿巴德机场　Mehrabad Airport

莫塔哈里街　Motahari Street

设拉子　Shiraz

都柏林　Dublin

麦加　Mecca

麦基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十二画以上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雅加达　Jakarta

塔不里士　Tabriz

塔吉里什广场　Tajrish Square

塔克斯坦　Takestan

塞姆南省　Semnan

奥斯威辛　Auschwitz

新清真寺　Masjed-e No

达拉克赫　Darakeh

达尔班德　Darband

雷伊　Rey

雷伊水泥工厂　Rey Cement Factory

雷斯顿　Reston

汉堡　Hamburg

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蒙特娄　Montreal

德州电力公司　Texas Electric Company

德黑兰　Tehran

德黑兰理工大学　Tehran Polytechnic

欧鲁米耶　Orumiyeh

缅甸　Burma

黎巴嫩　Lebanon

诺夫勒堡　Neauphle-le-Château

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　Sistan-Baluchestan

霍拉姆沙赫尔　Khorramshahr

霍拉姆阿巴德　Khorramabad

谢里夫大学　Sharif University

萨里　Surrey

罗彻斯特　Rochester

赞詹　Zanjan

苏莱曼尼亚　Sulaimaniya

铁路广场　Rah Ahan Square

郁金香公园　Laleh Park

其他

什叶派　Shiite

巴哈伊信徒　Bahais

毛泽东主义者　Maoists

以色列航空　El Al

卡加王朝　Qajar

斯大林主义者　Stalinists

伊朗门事件　Iran-Contra affair

伊朗妇女　Women in Iran

托洛斯基主义者　Trotskyists

每日上线　Roozonline

阿塞拜疆族　Azeri

佩坎　Paykan

奇多　Cheetos

社会安全计划　Program for Social Safety

阿舒拉节　Ashura

哈希　hash

指导式民主　directed democracy

迪亚　diyeh

乌尔都语　Urdu

起亚普莱特　Kia Pride

马格纳耶　maghnae

马尔贾. 塔克里德　marja al-taqlid

专家会议　Assembly of Experts

雪铁龙　Citroën

富兰克林图书计划　Franklin Book Programs

普立兹奖　Pulitzer Prize

黑色报告卡　Black Report Cards

塔沃布　tavob

圣地日　al-Quds Day

绿色运动　Green Movement

绿潮　Green Wave

弹拨尔　tanbur

德黑兰总体计划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ehran

穆哈兰姆月　Muharram

斋戒月　Ramadan

礼拜　namaz

宝狮 Peugeot

CHILDREN OF PARADISE

Copyright © 2016, Laura Seco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aura Secor,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Owl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伊朗的灵魂：革命、反美、神权政府，1979 年后伊朗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奋斗

作　　者　劳拉．席科尔（Laura Secor）

译　　者　黄煜文

选 书 人　张瑞芳

审　　定　陈立樵

责任主编　张瑞芳

编辑协力　李凤珠

专业校对　童霈文

版面构成　张静怡

封面设计　児日设计

营销统筹　张瑞芳

营销专员　段人涵

出版协力　刘衿妤

总 编 辑　谢宜英

出 版 者　猫头鹰出版

发 行 人　涂玉云

发　　行　英属盖曼群岛商家庭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二段 141 号 11 楼

划拨账号：19863813；户名：书虫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读书花园：www.cite.com.tw　购书服务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购书服务专线：02-2500-7718～9（周一至周五 09:30-12:30；13:30-18:00）

24 小时传真专线：02-2500-1990～1

香港发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团 / 电话：852-2877-

8606／传真：852-2578-9337

马新发行所　城邦（马新）出版集团／电话：603-9056-3833／传真：603-9057-6622

印 制 厂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22年10月

定　　价　新台币810元／港币270元（纸本书）

新台币567元（电子书）

ＩＳＢＮ　978-986-262-574-3（纸本平装）／978-986-262-577-4（电子书EPUB）

有著作权．侵害必究

读者意见信箱　owl@cph.com.tw

投稿信箱　owl.book@gmail.com

猫头鹰脸书　facebook.com/owlpublishing

【大量采购，请洽专线】(02) 2500-1919